

上下五千年

上古篇
春秋戰國篇
秦漢王朝篇
魏晉南北朝篇
隋唐五代篇
宋遼夏金元篇
明朝篇
前清篇
後清篇
民國篇
中華人民共和國篇

第五卷

科普教育与艺术修养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上下五千年

夏于全 常 桦 主编

第五卷

隋唐五代篇目录

第一章 隋朝的兴亡

第一节 统一的隋王朝的建立.....	(1)
第二节 隋前期巩固统治的政治与经济措施.....	(2)
一、三省六部制的建立	(2)
二、实行州县二级制	(3)
三、创立科举制	(4)
四、改革府兵制	(5)
五、制定《开皇律》	(6)
六、继续推行均田制	(7)
七、高颀与“输籍法”	(8)
八、统一货币和度量衡.....	(10)
九、厉行节俭政治.....	(10)
十、抑制豪门大族.....	(11)
十一、“开皇之治”.....	(12)
第三节 隋炀帝时期的统治	(13)
一、弑父篡位.....	(13)

二、营建东都·····	(14)
三、开凿大运河·····	(15)
四、出巡与扬威·····	(17)
五、隋征高丽·····	(19)
第四节 隋末农民起义和隋王朝的灭亡 ·····	(23)
一、王薄起义·····	(23)
二、瓦岗寨·····	(25)
三、河北夏王·····	(34)
四、杜伏威、李子通扫荡江淮 ·····	(36)
五、隋朝灭亡·····	(39)

第二章 从初唐到盛唐

第一节 唐朝统一帝国的建立 ·····	(42)
一、唐朝开国·····	(42)
二、薛举犯唐·····	(46)
三、定河东·····	(48)
四、取东都·····	(52)
五、唐平萧铣·····	(56)
六、北征刘黑闥·····	(59)
七、南讨辅公祐 ·····	(64)
第二节 唐王朝巩固统治的政治经济措施 ·····	(68)
一、均田制与租庸调制·····	(68)
二、科举制度的完备·····	(71)
三、中央官制和地方官制的完备·····	(74)

四、差遣制度的创立·····	(85)
五、周密的监察制度·····	(88)
六、加强府兵制度·····	(92)
七、修订《唐律》·····	(94)
八、修《氏族志》·····	(96)
第三节 唐太宗与贞观之治 ·····	(97)
一、玄武门之变·····	(97)
二、贞观之治 ·····	(100)
第四节 太宗时期的宫庭内部纷争·····	(107)
一、承乾骄奢 ·····	(107)
二、魏王开馆 ·····	(109)
三、东宫密谋 ·····	(111)
四、齐王造反 ·····	(113)
五、晋王即位 ·····	(114)
第五节 武则天称帝·····	(119)
一、武后临朝 ·····	(119)
二、鸩杀李弘、逼死李贤·····	(127)
三、废中宗 ·····	(129)
四、徐敬业讨武失败 ·····	(130)
五、奖励告密 委政酷吏 ·····	(133)
六、则天皇帝 ·····	(135)
七、武则天时期的经济和政治 ·····	(136)
第六节 武周统治的结束与宫廷政变的继续·····	(139)
一、中宗复位 ·····	(139)
二、武韦结党 ·····	(141)

三、太子政变	(142)
四、中宗之死	(145)
五、共诛诸韦	(146)
六、宋王让储	(149)
七、玄宗登基	(149)
第七节 开元盛世局面的形成	(154)
一、平定太平公主叛乱	(154)
二、安抚和控制王室贵族,稳定封建社会秩序	(156)
三、用贤纳谏	(156)
四、裁汰冗官,改革吏治	(158)
五、打击豪门士族	(160)
六、兴修农田水利	(161)
七、改善民族关系,维护国家统一	(161)
八、开元盛世局面的出现	(162)

第三章 唐代封建经济的高度繁荣

第一节 农业的发展	(165)
第二节 发达的手工业	(167)
一、唐朝的官府手工业	(167)
二、民间作坊的兴盛	(170)
三、异彩纷呈的手工业成就	(172)
四、主要手工业部门的发展	(173)
采矿业和铸造业	(173)
陶瓷业	(175)

纺织印染业·····	(177)
造纸业与印刷业·····	(179)
造船业、漆器和食品业·····	(181)
第三节 商业飞速发展·····	(183)
一、商业都市与乡村集市·····	(183)
商业都市的繁荣·····	(183)
乡村集市的普及·····	(185)
二、开元宝通的创制·····	(187)
三、邸店、柜坊和飞钱·····	(188)
四、富商大贾的活跃·····	(191)
五、互市及对外贸易·····	(193)
第四节 交通的发达与交通制度·····	(195)
一、大运河的疏浚整治和漕运·····	(195)
二、国内交通·····	(197)
三、交通制度的严密化·····	(198)
第五节 唐朝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199)
一、亚非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	(199)
二、唐与亚非各国的交流·····	(201)
三、玄奘法师西天取经·····	(208)
四、遣唐使来唐·····	(211)
五、鉴真东渡·····	(215)
六、阿倍仲麻吕·····	(217)
七、畅通无阻的唐代“丝绸之路”·····	(221)

第四章 唐朝的衰落与灭亡

第一节 安史之乱·····	(224)
一、天宝末年的社会危机·····	(224)
均田制和府兵制的衰败·····	(224)
唐玄宗对外发动不义战争·····	(225)
李林甫专权·····	(228)
杨贵妃专宠·····	(235)
天宝末年边镇尾大不掉局面的形成·····	(237)
二、安史之乱·····	(241)
安史之乱·····	(241)
洛阳陷落·····	(242)
郭李出兵·····	(246)
潼关失守·····	(247)
玄宗西逃·····	(250)
肃宗灵武即位·····	(252)
安庆绪弑父·····	(254)
血战睢阳·····	(255)
收复两京·····	(256)
胶战邺城·····	(259)
河阳之战·····	(262)
史朝义自杀·····	(265)
第二节 唐朝的衰落·····	(267)
一、藩镇割据局面的出现·····	(267)
二、德宗平定藩镇叛乱的斗争·····	(270)
四王作乱·····	(270)
朱泚称帝·····	(273)

困守奉天·····	(275)
梁州避难·····	(278)
收复长安·····	(281)
三、宦官专政 ·····	(284)
永贞革新·····	(284)
元和中兴·····	(287)
从元和到长庆·····	(291)
甘露之变·····	(293)
牛李党争·····	(301)
四、均田制的破坏和地主田庄的发展 ·····	(303)
五、两税法的实行和最终流产 ·····	(306)
第三节 唐末农民起义和唐朝灭亡·····	(311)
一、袁晁、方清起义·····	(311)
二、裘甫起义 ·····	(315)
三、桂林戍兵起义 ·····	(321)
四、黄巢起义 ·····	(324)
天补平均大将军·····	(324)
765 黄巢挺进江南——攻克广州 ·····	(328)
大举北伐克长安·····	(331)
大齐金统皇帝·····	(334)
狼虎谷的悲剧·····	(338)
五、唐朝灭亡 ·····	(339)
朱温篡唐·····	(339)
白马驿之祸·····	(347)
梁王受禅·····	(349)

第五章 五代十国

第一节 五代的更替·····	(352)
一、梁唐春秋·····	(352)
柏乡之战·····	(352)
魏州之战·····	(356)
胡柳陂之战·····	(361)
大梁之战·····	(363)
后唐灭亡·····	(368)
二、后晋和后汉的兴亡·····	(372)
三、后周的改革与统一战争·····	(376)
郭威和柴荣改革·····	(376)
后周高平之战·····	(383)
后周西取四州·····	(386)
后周第一次征南唐·····	(388)
后周第二次征南唐·····	(390)
后周第三次征南唐·····	(391)
后周北取三关·····	(392)
第二节 十国的政治经济·····	(394)
一、杨行密“发迹变泰”·····	(394)
二、前蜀经济的发展·····	(399)
三、孟知祥父子统治后蜀·····	(402)
四、长江中游的荆南和楚·····	(406)
五、南方沿海的闽和南汉·····	(408)
六、闽、楚灭亡和留、周二氏的兴起·····	(412)

七、南汉张遇贤起义	(415)
-----------------	-------

第六章 隋唐统一局面下的民族大融合

第一节 突厥及西域各族与隋唐王朝的关系	(419)
一、突厥的强大及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419)
二、西突厥的兴亡与唐对西域的行政管辖	(429)
三、后突厥的建立及其与唐的关系	(434)
第二节 回鹘经济文化的发展	(437)
一、回鹘的兴起	(437)
二、回鹘汗国的建立及其与唐朝的关系	(440)
三、回鹘经济文化的发展	(445)
四、回鹘的南下与西迁	(447)
第三节 吐蕃与唐的关系	(449)
一、吐蕃的兴起	(449)
二、唐蕃联姻	(451)
三、唐蕃会盟	(453)
四、河西归唐	(456)
第四节 南诏与唐王朝的关系	(461)
一、南诏统一“六诏”	(461)
二、南诏与唐的和战	(464)
三、南诏对中原文化的吸收	(467)
第五节 靺鞨与渤海国	(472)
一、渤海的兴起	(473)
二、渤海的经济	(476)

三、渤海与唐的关系	(478)
四、渤海的文化	(480)
五、渤海的灭亡	(484)
第六节 南方诸族经济文化的发展	(486)
一、江汉地区的民族融合	(486)
二、僚俚诸族对岭南地区的开发	(487)
三、流求与内地的联系	(490)
第七节 契丹的兴起	(493)
一、契丹部落的成长	(493)
二、流人和俘奴	(496)
三、耶律阿保机称帝	(498)

第七章 隋唐五代时期的思想和科技文化

第一节 隋唐时期著名的学术思想	(503)
一、隋和唐初“三教并用”的文化政策	(503)
二、王通和他的《中说》	(506)
三、隋代经学的成就	(510)
四、孔颖达编撰的《五经正义》和经学的统一	(513)
五、佛学思想的昌盛繁荣	(516)
天台宗的“止观”说	(517)
唯识宗的“万法唯识”“唯识无境”说	(521)
华严宗的“法界缘起”说	(524)
禅宗的“顿悟”说	(527)
六、道教思想的义理化发展	(530)

王玄览的援佛入道·····	(531)
司马承祯的“主静”、“坐忘”的修持之道·····	(532)
杜光庭的纳儒入道·····	(534)
七、韩愈的反佛斗争和道统论·····	(535)
八、柳宗元和刘禹锡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体系·····	(540)
九、刘禹锡的“天与人交相胜”学说·····	(546)
十、《无能子》的自然观·····	(551)
第二节 科技发明与文化艺术·····	(553)
一、天文仪器制造的成就和天文学名著·····	(553)
二、《缉古算经》与三次方程·····	(560)
三、赵州桥·····	(562)
四、唐代的地理学·····	(564)
五、唐代中晚期的史学·····	(567)
六、火药的发明·····	(569)
七、药王孙思邈·····	(575)
八、建筑艺术的发展——十里长安城·····	(577)
九、唐代书法绘画及其代表人物·····	(583)
王摩诘居官归隐·····	(583)
“颜筋柳骨”·····	(587)
“右相驰誉丹青”与“吴带当风”·····	(590)
书狂怀素·····	(596)
高 闲·····	(608)
聿 光·····	(612)
亚 栖·····	(616)
贯 休·····	(618)

道 芬·····	(629)
十、人才辈出的五代画坛 ·····	(632)
十一、雕版印书的盛行 ·····	(635)
第三节 隋唐五代文学运动及其代表人物·····	(636)
一、辉煌灿烂的文化奇葩——唐诗 ·····	(636)
二、唐代三大诗人 ·····	(642)
谪仙李白·····	(642)
诗史杜甫·····	(650)
人民的诗人白居易·····	(653)
三、新乐府运动 ·····	(660)
四、韩愈、柳宗元与古文运动·····	(664)
五、唐代传奇小说 ·····	(671)
六、饱经沧桑的唐末五代文人 ·····	(673)
七、唐五代词 ·····	(676)
关于词的特征、起源和发展 ·····	(676)
温庭筠及花间词派·····	(678)
李煜及南唐词人·····	(680)

隋唐五代篇

第一章

隋朝的兴亡

第一节 统一的隋王朝的建立

隋文帝杨坚，原是北周的勋戚重臣，被封为隋国公。他的女儿杨丽华，是北周宣帝的皇后，性情柔婉，举止端雅，颇得宫妃的敬重。妻子独孤氏出身于鲜卑贵族。杨氏和独孤氏这两大家族都是北周王朝的顶梁柱。这种联姻，当然是为了政治的需要。

宣帝的父亲周武帝历史上以灭佛而闻名，是位英俊的君主，儿子宣帝却是个庸碌的昏君。宣帝 22 岁做皇帝，还不到一年，就传位给 8 岁的儿子周静帝，自己当起太上皇，自称天元皇帝。这个昏君喜怒无常，看不中那位淑娴端庄的皇后，经常无故地责骂她，杨后却从容不迫，辞理不屈。一天，昏君暴怒，强令杨后自杀，并扬言要族灭杨氏全家。

后母独孤氏闻讯，仓皇进宫磕头求情，直磕得头破血流。

后父杨坚也奉召入宫。坦然而入，神色自若，打乱了昏君

事先要谋杀他的计划。

一场统治集团内部的冲突暂时避免了。

这场冲突的内在原因,要比帝后不睦的表面现象深刻得多。这是因为隋国公的潜在势力日增,对皇权构成了威胁。宣帝虽然昏庸,也已朦胧地感觉到了。同时,隋国公也在收揽人心,私下放风说:天元昏愤,又自剪羽翼,容颜憔悴,寿命不会很长了……。

果如杨坚所料,大约未出1月,宣帝就颓然死去。朝廷重臣刘昉、郑译等,有些原本就是杨坚的心腹,乘机假传遗旨,召杨坚入朝辅政。杨后得知此事,大为惊愕,转念又想,皇帝幼小,家父辅政,总比大权旁落为好。

杨坚辅政不到两年,就剪除了异己势力,将政权紧紧控制在自己手中。于是,由隋国公晋封隋王,由隋王而受禅称帝。公元581年2月,建国号隋,改元开皇。至开皇九年(589)隋南下建康灭掉陈王朝;终于结束了长期以来南北分裂对峙的局面,重新统一了中国。

第二节 隋前期巩固 统治的政治与经济措施

一、三省六部制的建立

隋废除了北周摹仿《周礼》所置的六官,恢复汉、魏旧制,

设置三师、三公,及尚书、内史、门下、秘书、内侍五省,御史、都水二台,太常、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少府、光禄、国子、将作等十一寺,左右卫(掌禁卫兵)等十二府。三师“不主事,不置府僚”,三公“参议国之大事……,无其人则阙”。三师三公名位虽高,实际是给这些大臣的荣誉虚职,并无实权。五省之中,秘书省职务悠闲,内侍省全为宦官,因此,处理全国军政机要的主要机构,是尚书、门下、内史三省和尚书省所辖的吏部、礼部、兵部、都官(后改刑部)、度支(后改户部)、工部等六曹,一般概称为三省六部制度。内史省即中书省,因避杨坚的父亲杨忠之讳而改称此名。三省长官分别为尚书令和左右仆射、内史令、纳言,相当于秦汉的宰相,负责制订方针、政策、法令,参预国家大政。内史、门下二省掌典机要,尚书省总理全国政务,六曹分掌官吏考核选择拔,礼仪、军政、刑法、户口钱谷、营建等方面的政事。各曹长官为尚书,副长官为侍郎。尚书省长官尚书令,一般不常授,实际长官是副长官左、右仆射,分掌六部事务。左右仆射与六部尚书合称为“八座”,属于显赫的官职。隋确立的三省六部制的中央机构,形式是继承汉魏旧制,实际上是总结了汉魏以来的统治经验,发展和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制度。

二、实行州县二级制

隋初的地方行政机构,沿袭北朝的州、郡、县三级制。当时滥置郡县,机构重叠,官吏日增,形成“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状况。为了

改变这一局面，杨坚按照“存要去闲，并小为大”的原则，裁减郡县数目，把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二级制。至炀帝时，又改州为郡，实行郡县二级制。同时，废除了州、县长官辟举本地人担任佐官的旧制，将地方官的任免权收归吏部，每年由吏部考核其政绩。隋还规定州县的辅佐官，皆选外地人担任，任期三年，不得连任。地方机构的改革，不仅提高了行政机构的统治效能，而且打击了世族地主的政治特权，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三、创立科举制

魏晋以降，选官制度的核心是九品中正制。世族子弟凭藉家世占据上品，步入清途，世代拥有政治特权。南北朝时期，随着门阀世族的腐朽与寒人渐掌机要，选官制度也逐渐发生变化。北周时，“选无清浊”，隋承此风，“官无清浊”，九品中正制终于被废止，这是科举制产生的前提。

从形式上看，科举制与汉代以来相沿接替的察举制存在着继承关系。东汉左雄建议被察举者须经考试，即所谓“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魏晋南北朝时期，察举制受到九品中正制的制约，基本为世族子弟垄断，考试只是间或举行。所试科目仍然是经学和文章。大至孝廉主要试经，秀才主要对策，有时兼及经文，南北基本相同。旧制规定州举秀才，郡察孝廉，隋代废郡，似乎已不再察孝廉。有些秀才为郡举，这是因为炀帝大业中改州为郡，州级行政单位已不存在的缘故。隋时秀才尚以试策为正规的考试办法，但除此之外，往往须加试杂文，录

取非常严格,隋朝一代秀才不过 10 余人。进士科初置时,考试内容也是试策,与秀才一科相似。明经之名早见于南朝,但不是经常科目。明经除试策外,还须试经。明经对策是学校的毕业入仕考试。梁制规定,通一经者方能入仕。学校以外的人也可以申请参加明经对策。梁代秀才、孝廉有员额限制而明经一科则无此限制。隋代明经,仍以面向官学生员为主,兼及自学者。

进士与明经两个科目不考虑家世背景,只是根据考试成绩决定录取与否。这种新的选拔官吏的方法适应了一般地主的要求,虽名额不多,录用的人在政治上也不占有重要地位,但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隋代科举制与后代相比,尚有不完备之处。考生须经州郡长官推荐,未能自由投考。这表明科举制处于初创阶段。

四、改革府兵制

府兵制是西魏时宇文泰所建。北周时,府兵制开始征募农民当兵,有向兵农合一发展的趋势。590 年(开皇十年),隋文帝对府兵制作了重大改革,规定:“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自此,府兵除有军籍外,还同其家属列入州县户籍,与民户一样申请土地。平时生产,闲时在军府接受军事训练。每年轮番宿卫京城,或者戍边,战时出征。府兵的最高领导是十二卫大将军,分统诸府军队。这样,改变了过去兵民分离的现象,使府兵制和均田制结合起来,成为“兵农合一”,“寓兵于农”的制度。府兵制的改革,使府

兵的家属能与民一样定居,不再跟随府兵调动而流寓无定,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安定和生产的发展,而且,这种“寓兵于农”的制度,使府兵制得到了巩固和扩大,加强了中央对军队的控制,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巩固。

五、制定《开皇律》

隋文帝针对北周刑罚苛滥的情况,581年(开皇元年),令高颉等制定刑律,583年又令苏威、牛弘修订,制成《开皇律》。《开皇律》共12篇,条目精简,刑律较轻。它废除了前代枭首,轘裂、孥戮等酷刑,减死罪81条,流罪154条,徒、杖等千余条。只保留律令500条。刑名分死、流、徒、杖、笞五种。死刑分绞、斩二等;流刑分1000里、1500里、2000里三等;徒刑分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五等;杖刑自60杖到100杖五等;笞刑分笞10到笞50五等。又规定凡有冤案“县不为理者,听以次经郡及州,仍不理者,乃指阙申诉”。还取消了州刺史对死刑的处决权,死刑执行必须经皇帝批准。总之,《开皇律》与前代刑律相比是宽缓清简的,并有明显减轻。这是法律史上的一个进步。但《开皇律》本质上仍然是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工具。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开皇律》中,特别订出所谓“十恶”之条,即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凡触犯者皆从严惩治,绝不宽赦。明显地体现了《开皇律》维护封建统治制度的特点。

《开皇律》继承和扩大了秦汉以后贵族、官僚享有的特权,沿袭了曹魏以后的“八议”。规定凡是在议亲、议故、议贤、议

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八议”之科者和七品以上官吏，犯罪皆减一等治罪，九品以上官吏犯罪者，听以铜赎罪。这个规定，明显表现封建官僚地主在法律上的特权。

隋朝统治者虽然制定了法律，但却经常不按法律办事。隋文帝常在朝堂杖杀官员，甚至盗一钱以上，三人同窃一瓜的，也都处以死刑。到炀帝时，刑罚酷滥的现象更严重。

六、继续推行均田制

隋朝在经济上继续推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农民授田依北齐田令，一夫受田 80 亩，妇人 40 亩，称为露田，丁男另受桑田和麻田 20 亩，叫永业田。露田死后要归还，永业田可以传子孙。地主官僚的奴婢受田，按其地位高低，限制在 60 人到 300 人之间，奴婢受田的数量与农民同。丁牛一头受田 60 亩，限 4 牛。隋制规定，自亲王至都督皆给永业田，多者百顷，少者 30 顷。京官从一品至九品都给职分田，多者 5 顷，少者 1 顷。各级官府给公廨田，以供公用。这种制度是在不触动地主土地私有的基础上推行的，对官僚地主有利。官僚受田较多，官位越高受田越多，而农民受田实际不足，有些狭乡的农民受田更少。同时，官僚地主兼并土地的情况依然存在，无地少地的农民，在整个隋代始终是存在的。

均田制是政府将所能支配的土地与一些无主荒地分配给农民耕种，使他们固定在土地上，以利于统治者剥削的制度；但另一方面实行的均田制，农民多少得到一点土地，土地兼并多少受到一些限制，这就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扩

大耕地的面积。

七、高颀与“输籍法”

高颀是隋代名相。在隋王朝的巩固和发展过程中，他对中国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作出了重大贡献。

高颀，字昭玄，又名敏，自言是勃海蓆（今河北省景县）人，生年不详。史载高颀的祖先在北部边疆作官，陷于辽东。其曾祖父高暲在北魏太和年间回归，官至卫尉卿。其祖父高孝安曾任兖州刺史。其父高宾在东魏任谏议大夫，大统六年（540年）避讒投奔西魏，被大将军独孤信引为僚佐。杨坚执政后，高宾历任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襄州总管府司录等职。

高颀“少明敏，有器局，略涉文史，尤善词令。”约在北周建德三年（575年）前后，高颀17岁，被北周齐王宇文宪引为记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他先袭武阳县伯爵位，又升为内室下大夫。北周武帝建德六年（577年），高颀参加了讨平北齐的战争，以功拜开府。

杨坚早就知道高颀精明强干，熟悉军事，富于谋略。大象二年（580年），杨坚当政，即派邗公杨惠向高颀转达他欲引之入丞相府的意向。高颀欣然允诺，出任府司录。当时丞相府长史郑译、司马刘昉因奢纵被杨坚疏远，所以，杨坚特别看重高颀。不久，尉迟迥起兵反杨，韦孝宽、崔方仲、刘昉、郑译等或故意回避，或怯战不独进。当此关头，高颀挺身而出，自请出击，并获全胜而归。以此大功，高颀进位柱国、改封义宁县公，迁丞相府司马，“任寄益隆”。

隋文帝立国之初，高颀拜尚书左仆射、纳言，进封勃海郡公，不久又加任左卫大将军，是最受重用、地位最高的大臣。当时，突厥经常侵扰边境，隋文帝派高颀戍边。还朝后除多有赏赐外，又领新都大监，加左领军大将军。

开皇二年（582 年），高颀节制诸军伐陈，又成功地绥集江汉地区。隋文帝采用了他提出的以疑兵、焚舍耗尽南方政权财力的计策，迅速削减南方实力。

约在此时，高颀受命修订隋律，创立各种制度，以百官班首协助文帝处理军国大政、要务。

当时，隋文帝省刑减赋，宽政治国，努力恢复国家经济，但自魏晋以降，民户多握在大家世族手中。加之少数民族相继入主中原，部落治民的习俗也渗入国家制度中。隋文帝以统一中国、实行中央集权为己任，就必须建设一整套新的治民体系。各地方长吏承旧制之习，不适应中央政府对民户的直接控制办法，而隋政府新的赋役之法在实施中也有一些新的问题要解决，即如高颀指出的，“人间课役，虽有定分，年常征纳，除注常多；长吏肆情，文帐出没，复无定簿，难以推校”。为解决上述问题，高颀于开皇三年（583 年）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划分民户等第和核定适用赋役等级的详细标准，即“输籍定样”。“输籍定样”以皇帝命令的形式颁发到各州，作为各地方在实施户口管理中核定户等和赋役的标尺。同时，又规定每年正月初五日由各县县令派员到所属乡村，按实际情况将三党或五党（每党为 100 户）民户划为一团，以团为单位按照定样核定户等。输籍定样的颁行，使国家对民户的管理大大前进了一步，实际而有成效地使税赋较为合理，避免了标准不明确、

各地在执行中尺度不一和官吏徇情枉法等弊病。

“输籍定样”即“输籍之法”是高颎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它所体现的按中央政府审定的标准定户等第并依此等第承担赋税的主旨,为唐代的户籍和赋税制度所师承。

八、统一货币和度量衡

隋以前,币制混乱,关东有常平钱,关中有五行大币、永通万等钱,当时民间私钱,名品众多,币质低劣,轻重不等,严重影响商品的交换和流通。隋朝建立后,首先宣布禁用各式旧钱,统一发行合乎规格的“五铢钱”,其重如文,每千钱重4斤2两。严禁私人铸钱,在关卡置百钱为样,样不同者,没官销毁。从此,全国货币始得统一。在统一钱币的同时,也统一度量衡。隋制规定以古尺1尺2寸为1尺(合今29.51厘米),以古秤3斤为1斤(合今668.19克),以古斗3升为1升(合今594.4毫升)。钱币、度量衡的统一,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也有利于巩固国家的统一。

九、厉行节俭政治

隋文帝总结了历代帝王“未有奢侈而能长久者”(《隋书·文四子传》)的历史教训,倡导节俭,身体力行。《隋书·高祖纪》称:关中饥荒,见老百姓吃的是豆腐杂糠,“上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责”,因此“撤膳不御酒肉者,殆将一期”。凡“居处服

玩，务存节俭”(《隋书·高祖纪下》)，“乘輿御物，故弊者随宜补用；自非享宴，所食不过一肉”(《资治通鉴》卷180，仁寿四年)。对自己的皇子们也严格要求他们不过分的豪华挥霍。太子杨勇仅仅因为“尝文饰蜀铠，上见而不悦，恐致奢侈之渐”。第三子杨俊由于“盛治宫室，穷极侈丽”，而被他“免官，以王就第”(《隋书·文四子传》)。正是在他和他的皇后独孤氏的监管下，朝内外吏属侍臣，纷纷以节俭束己，以至在六宫之中，至连一两胡粉和织现成的衣领也找不到。上行下效，“天下化之”。节俭成了一种社会风气，从而使社会财富得以迅速积累。在隋文帝统治的年代里，“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隋书·食货志》)，这不是偶然的现象。

十、抑制豪门大族

隋文帝削弱了山东(指太行山以东地区)江南的门阀士族势力。南北朝的士族大致可分三个集团：关陇、山东和江南。隋承北周，将相大臣多出身于关陇大族。北周灭北齐，就把许多山东士族，迁到关中，予以防范。隋平江南，命陈后主以下的大批南方士族，迁居北方。隋文帝继承西魏、北周的政策，正式下令废除了推行300余年之久的九品中正制，宣布以“志行修谨”和“清平济人”二科举人。唐人刘秩曾高度评价这一改革，认为可以收“里閭无豪族，井邑无衣冠，人不土著，萃处京畿”(《通典·选举典》)的效果。这一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门阀士族，加强了中央集权，起了巩固国家统一的作用。隋文帝通过均田制和“输籍之法”使农民摆脱地主的控制，转化为国

家的编户。杜佑在谈到“输籍定样”时说,“隋代之盛,实由于斯”(《通典·食货志》)。这一措施从财政上保证了中央集权国家的需要。把地方政权由三级制改为二级制,把州县长官自辟僚佐的权力,收归吏部掌握,实际上也是为了削弱“世袭刺史”、“世袭县令”,强化中央集权。隋朝在平陈之初,下令“人间甲仗,悉皆除毁”,以后又“收天下兵器”,严禁“私造”,只有关中和沿边地区“不在其例”。这一禁令当然有对付人民的一面,但是真正能够拥有大量甲仗和私造兵器的,还是豪门士族。因此,隋文帝收兵器也具有巩固国家统一的意图和作用。

十一、“开皇之治”

隋文帝开国,一改先朝弊政,励精图治,20多年后,国家呈现出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百姓乐业,一片兴旺繁荣的景象。开皇十二年(592年),财政官员呈报说:“府藏皆满,粮食布帛无处容纳,已堆积在走廊和房下了。”文帝诏令再造新库。后来,又奏呈说:“新库落成,亦堆积无余。”文帝只好下令说:“告知郡县,寓富于民,不藏于府,免除今岁租赋,赏赐百姓。”早在平陈之后,就宣布免除江南10年租赋。这样富庶的景况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700年前,曾一度见于西汉初的文景之治,今再见于开皇之时。

这时,朝廷府库中储积了多少财物,史无确数。曾有这样的记载,粮食布帛足够朝廷支用五六十年。即至后来隋末洛阳被围困,城内布帛山积,以致用布帛做柴烧,用绢代绳汲水。唐朝代隋之后,堆积的布帛还用了20多年。

伴随着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户口也迅然猛增。隋初北朝半壁河山有约 360 万户,南朝有户约 50 余万,合计不过 400 多万。20 几年后,全国已有 890 余万户,4600 余万人。户数比南北朝时约增加一倍,比西晋时约增长两倍,接近了东汉时的户口水准,即 1000 万户,5000 万人。当然,这是些相当粗略的统计数字,但从中也可窥见东汉以后人口的起伏变化,以及隋文帝时期人丁兴旺的景象。

隋盛时,中国的版图东起大海,西到新疆,南抵云广,北至大漠,东西 4600 余公里,南北 7400 余公里。

隋文帝,作为封建帝王,当然有其阶级的、历史的局限性,以及种种弊政,但他顺应历史的发展,统一了中国,又使国家迅速地富强起来,达到上述如此繁荣的程度,这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是少见的。

第三节 隋炀帝时期的统治

一、弑父篡位

隋文帝晚年“雅好符瑞,暗于大道”,生活上追求享乐,日趋奢侈。593 年(开皇十年),他令杨素在岐州(陕西凤翔县)督造仁寿宫,开山填谷,工程紧迫,民劳累死者上万人。两年后,宫殿建成,文帝和皇后独孤氏看到仁寿宫豪华壮丽,大加赞

赏，褒奖杨素忠心，赏钱百万，赐锦绢三千段。598年（开皇十八年），文帝又从长安到仁寿宫建行宫12座，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加重了人民的负担。隋文帝“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察细行，不察大体，为人忌才。在他晚年，为政昏愤，不少功臣如刘昉、郑译、梁士彦、宇文忻等先后被杀或贬黜，“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所信者只有杨素，任其上下欺诈，因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复杂尖锐，“正道因兹弛紊”，为杨广的夺嫡篡位提供了方便。

杨广是文帝的次子，其兄杨勇为嫡长子，立为太子，是皇位的继承人。杨广13岁封为晋王，20岁被任命为指挥统一战争的隋军主帅，功高权大，拥有军事实力，早有夺取杨勇太子位置的企图。他和大臣杨素、宇文述等勾结，收买宫人和大臣为其在内廷虚美，“矫饰仁孝”，骗得文帝和独孤皇后的信任。皇后独孤氏不喜欢杨勇，东宫近臣也说杨勇的坏话。600年（开皇二十年），文帝正式下诏废杨勇为庶人，立杨广为太子。

604年（仁寿四年），63岁的隋文帝卧病仁寿宫，杨广和杨素合谋，指使心腹张衡入宫刺杀文帝，“血溅御屏，冤痛之声闻于外”。杨广杀生父后，又矫诏处死杨勇，而夺得帝位。605年杨广即位称帝，是为隋炀帝，年号大业，并决定迁都洛阳。

二、营建东都

炀帝（杨广）即位之后，在洛阳兴建东都。原来长安地位偏西，从经济方面考虑，要把南北各地人民缴纳的粮食绢帛，全部运到长安，未免太觉困难。开皇四年（584年）开广通渠，引

渭水从大兴城到潼关,跟黄河相接,目的就在于解决运输问题。然而洛阳以西的黄河,水道并不通畅,三门峡尤其是当时无法克服的险阻,所以广通渠的作用只能减少一点困难,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炀帝决定在洛阳建设一个新都,使大部分物资毋须运往关中。大业元年(605年)三月,在大建筑师宇文恺的领导下,规模宏伟的大工程开始了。从这时起,到第二年正月完工,每月征用两百万个劳动力。130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东都早已毁掉,然而它的遗址,今天在洛阳市区以西,依然可以确实指出。据实地勘测,外郭城周围一共有50多里,城门位置和下水道等也都有遗迹可寻。城西北部的宫城是宫殿所在,皇城是文武官衙所在。从宫城中央各殿起,向南笔直穿过外郭城正中的城门,正对着城外的名山伊阙。

东都城,除宫城、皇城之外,有官吏百姓居住的坊,和丰都、大同、通远3市。市是商业区。丰都市周围8里,开12个门,内有3000余肆(店)。街道两旁,榆柳交荫,房屋整齐,堆满着珍奇的货物。当时有数万户富商大贾,从天下各地被迁到东都,来点缀升平。另外还有河北3000多家工艺户,也离乡背井,来到东都。因此,洛阳的商业和手工业都兴旺发达起来了。

三、开凿大运河

关陇地区的农业生产既然衰退,而江南地区经过东晋、南朝270多年间劳动人民的辛勤开发,却成为“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宋书·孔季恭传后论》)的富饶之区。然而隋王朝的政治、军事重心,却仍旧在北方。隋炀帝需要借运河来控制南

方。沟通南北的运河大工程，就是在这种新的客观形势下进行的。所以，运河的开凿，是符合时代的需要的。

运河的开凿，有重要的经济和政治意义。第一，它把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联系起来，从此大大地缩短了南北的距离，便于南北的交通；第二，它使南北物产的交流有了畅通的渠道，对经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以后沿运河的干线上，兴起了许多商业城市，这些城市都因为所处地理位置的优越而繁荣起来，通济渠南端的扬州（江都），便逐渐形成全国的经济中心；在海运尚未畅通以前，在内地的陆上交通尚未采用新式交通工具以前，运河一直是国内沟通南北的大动脉。第三，它使中华文明的区域进一步扩大。大运河沟通了长江、黄河两大河流域，促进了南北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使南北文化互相影响，互相吸收，使中华文明成为有机的统一的整体。

这条运河在开凿过程中，无论通济渠、永济渠，都征发了上百万的民夫。通济渠在大业元年三月开凿，同年八月就通航了。永济渠在大业四年正月开凿，也不到几个月就通航了。这样巨大的工程，是在官吏督役严急的情况下迅速完成的，不可避免地给人民带来了很大苦难。掘河的民夫，经久不息地劳动，受冻挨饿，加上疾病侵袭，死亡的人在半数之上。（《开河记》）

隋炀帝开凿运河主要是为了连结南北方，加强对全国的统治。他沿运河巡行南方，本身就是显示隋朝国力的政治军事大示威。同时，也有便于他本人巡游享乐的目的。大业元年（605）。他在下令开凿通济渠的同时，派官吏往江南造龙舟及各色船只数万艘，同年八月，通济渠这一段运河刚凿通，隋炀

帝就带了后宫、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并十二卫军士，浩浩荡荡，乘舟前往江都。沿途之上，穷奢极欲，征发无度，耗费资财，难以数计，给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痛苦。

隋炀帝除了营建东都洛阳与开凿几条大运河外，还在大业三年(607)巡行北方时“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隋书·炀帝纪》)，及登太行山，又开直通九十里，还派人去说服附塞的突厥启民河汗，令动员突厥民众，“举国就役，而开御道”(《隋书·长孙览传》)。

四、出巡与扬威

大业三年(607年)，炀帝率甲士50万人，马10万匹，出巡出塞。他事先下令让建筑师宇文恺造了观风行殿与六合城，随驾出巡。观风行殿是一座可拆可装的宫殿，下置轴轮，进退自如，其大可容纳数百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型活动房屋。六合城则是可拆可装的一座城池，周长8里，以板作骨，以布作饰，绘以丹青，上布旌旗，甲士可荷载负戈在城上巡逻。这恐怕也是古代最大的活动建筑。草原上一夜之间突兀树起一座城池，城中又起宫殿。突厥可汗与酋长们远远望见以为是神助天成，敬畏不已。离城10里就不敢再骑马，跪于地上匍匐而行，纷纷争献牛羊驼马。炀帝则厚赐可汗酋长以大量金帛。

当时，朝臣高颎、贺若弼等人就曾私议皇帝此次出巡过于奢侈。炀帝知道了，立即将他们以诽谤朝政的罪名杀掉了。

大业五年(609年)，炀帝又西巡张掖，并诏令西城17国的使臣前来晋见。又命令武威、张掖两郡的男男女女，都穿起

最华丽的服饰，驾上最好的车马，列队欢迎，队伍长达数十里。如此兴师动众，原是为了向西域人民夸耀中原的富有。

第二年，西域使团和成队的商旅倾慕中国之富有，云集洛阳。炀帝诏令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在皇城端门外大街上搭起戏楼，戏场周长约8公里，乐师多至1.8万人。灯火辉煌，如同白昼，通宵达旦。这场百戏从正月十五日开台，整整演了半个月，到月底方才收场。

这期间，商旅们要求在市内进行交易。整个市容整顿一新，小商小贩锦衣丽服，竟连卖蔬菜的也用精美的龙须席铺地。西域商人路经酒食店，店主热情邀请入座，醉饱出门，不收分文，以显示隋的富庶。但客人并不痴呆受骗，有人就指着市间树木上缠饰的彩绢质问说：“贵国也有穷人，衣不蔽体，为什么不给他们去做衣服，却用来缠树呢？”市上的人被问得无话可答。

炀帝这种虚荣浮夸的愚蠢行为并未赢得民族间的信誉，他的大民族思想，却招致了民族间的干戈。

大业十一年(615年)秋，当炀帝再次率领甲士出巡塞外时，突然遭到突厥人几十万骑兵的袭击，雁门(今山西代县)一带41座城堡被攻克39座。炀帝逃之不及，被围困在雁门城里。突厥人攻城甚急，飞矢纷纷落到炀帝脚前。这位不可一世的暴君，被吓得六神无主，抱着小儿子痛哭流涕，眼睛都哭肿了。

多赖将士奋勇，死守孤城，才得以转危为安。

五、隋征高丽

隋开皇十八年(598年)二月,高丽王高元率靺鞨士卒1万多人,入侵辽西,被隋营州总管韦冲击退。隋文帝恼恨高丽的侵袭,遂任命汉王杨谅、大将王世积同为行军元帅,率水陆两军30万人征伐高丽。并以尚书左仆射为汉王长史,以周罗睺为水军总管。

六月,隋文帝下诏废黜高丽王高元的官爵。与此同时,杨广的军队已从临渝关(今河北山海关)出动,但恰遇水灾,军粮运输中断,军中缺粮,且又流行疾疫。周罗睺所率之水军,从东来(今山东莒县、来阳以东地区)起渡后,遭遇大风,许多舰只被吹散沉没,人员损失十之八九。九月,只好退回。此时,高丽王高元已得知隋大军进击的消息,十分惶恐,急派使者入朝谢罪,称自己是“辽东粪土臣元”。隋文帝见此,遂下诏罢征高丽之军。这样,隋王朝于第1次征高丽之战前的初次进军,便半途而废。

隋大业八年正月初二,隋炀帝已将征高丽诸路兵马除一部分水军之外,均调集于涿郡,于是下诏,令左右24军开始向高丽进军。从初三起,每日出动1军,各军相隔40里,“连营渐进,终40日,发乃尽。首尾相继,鼓角相闻,旌旗亘960里。”各军准备会师于平壤城(今朝鲜平壤)。

隋大军刚刚进发不久,兵部尚书左侯卫大将军段文振便身患重病,病死军中。隋军未曾交战,便损失一员大将,炀帝甚为痛惜。

三月十四日，隋炀帝进至辽水（今辽宁辽阳东北），隋大军齐集辽水岸边列阵，高丽兵隔岸防守，隋军难以渡河。此时，左屯卫大将军麦铁杖自请为前锋，并告诉他 3 个儿子说：“我蒙受国家的恩惠，今天正是报效而死的机会，我死的有意义，你们就能永享富贵。”说罢便率部渡河进攻。由于隋军所架桥梁距对岸尚差 1 丈多远，使隋军无法直接登岸，只能跳入水中，涉水上岸，高丽兵居高临下，斩杀了众多隋军。麦铁杖跃上河岸后，与虎贲郎将钱士雄、孟叉等皆战死。² 天后，隋军将桥梁架通，诸军才相继过河，大战于河东岸，高丽兵惨败，死者以万计，隋军乘胜进围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市老城区），隋炀帝随之渡河。

五月，隋炀帝下诏告诫诸将说：“各军不得暗中偷袭敌人。凡向敌进攻，应兵分 3 路，要 3 路互相联系，不可孤军深入，以免招致失败。凡进攻和停止进攻均须奏报，不得擅自自动。”辽东城在隋军的攻击之下，危急万分，几次要求投降，但诸将不敢擅自作主，而派人奏报隋主，待奏报的人返回，高丽军又获得喘息机会，重新加固守备，又与隋军交战，如此反复几次，辽东城仍未攻克。隋炀帝对此非但不改变自己上述规定，反而责备众将怕死，扬言要诛杀他们。然而，高丽各城仍屡攻不下。

隋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统率的江、淮水军舰船于海中首尾相接数百里。六月，从汴水驶进离平壤 60 里时，与高丽兵相遇，将高丽兵打败。副总管周法尚建议待各军齐集后再攻平壤城，来护儿不听，挑选了 4 万锐卒，进达平壤城下。高丽军出兵与来护儿军交战，佯装败退，来护儿率军追入城内，被高丽兵打败，来护儿只率数千人逃回，高丽军追至隋军停泊舰船

处，周法尚已严阵以待，高丽兵才未敢攻击，撤军而回。

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从扶余道进兵，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从乐浪道进兵，左骁卫大将军荆元恒从辽东道进兵，右翊卫将军薛世雄从沃沮道进兵，左屯卫将军薛世雄从玄菟道进兵，右御卫将军张谨从襄平道进兵，右武侯将军赵孝才从碣石道进兵，左武卫将军崔弘昇从遂城道进兵，左御卫虎贲郎将卫文升从增地道进兵，各军都进至鸭绿水（今鸭绿江）西岸。

宇文述等军，人马都分给 100 天的粮食，并携带排甲、枪稍以及衣物、战具、帐幕、炊具等等，士卒不堪重负。但宇文述却下令：“士卒有遗弃米粟者斩！”士卒虽不敢明里丢弃，暗中则把米粟埋于宿营地下。这样，宇文述等军行至中途，便已断粮。

高丽王派大臣乙支文德至宇文述军宫诈降，以观宇文述军的虚实。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原先曾奉隋主的密旨，令其凡遇高丽王及文德来使，一律擒获。于是，于仲文欲下令捕获乙支文德。尚书右丞刘士龙为慰抚使，坚决反对，于仲文动摇，放文德回归。于仲文与宇文述放走了文德这个合法的“间谍”之后，追悔莫及，宇文述便以军中粮尽为由，欲率军退回。于仲文欲派精锐追捕乙支文德，宇文述坚决阻止。于仲文怒道：“将军统 10 万之众，不能打败小小贼兵，有何面目去见皇上”？宇文述等人不得已而听从了于仲文的意见，率领部将去追赶乙支文德。乙支文德早已看到宇文述士卒面带饥饿之色，为进一步疲惫隋军，他每次一与隋军交战，便佯装败退。这样，宇文述等军 1 日之内，7 战皆胜。宇文述既受这些胜利的鼓舞，又迫于于仲文等的压力，只得勉强率军继续东进，渡过萨水（今朝鲜

清川江),进至距平壤 30 里处,依山扎营。此时,乙支文德又派使者假装投降,并向宇文述请求说:“如果隋军撤回,高丽王便去朝见隋帝。”宇文述等见士卒疲惫,不宜再战,加之平壤城险固,难以在短期内攻拔,遂利用敌诈降之计,撤军而还。宇文述等军结成方阵而走,高丽军从四面包抄攻击,宇文述军且战且走。七月二十四日,到达萨水,全军渡过萨水一半时,高丽军从后面攻击隋军的后军,右屯卫将军辛世雄战败身亡,各军隋之溃败,无法制止,一天一夜急退 450 里,退至鸭绿水。将军王仁恭率部担任殿后,奋力抗击高丽军,才将高丽军击退。宇文述等九军当初渡过辽水东进时,共 30.5 万人;回至辽东城,仅剩 2700 人。数以亿计的军资器具也丢弃殆尽。隋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等所统江、淮等地水军,听到宇文述等兵败,也带兵退回。隋军唯有将军卫文昇所统之军全军而归。隋炀帝对宇文述等军的战败十分恼怒,欲将宇文述等治罪。但由于隋炀帝平时宠信宇文述,并将自己的女儿南阳公主嫁与了宇文述之子,不忍心诛杀,将宇文述、于仲文等除去爵位,贬为平民。杀刘士龙,以向天下谢罪。

炀帝第一次远征高丽,以失败而告终

炀帝并不甘心,第二年(613 年),又发动了第二次远征。同样,又遇到高丽人民的顽强抵抗。

正当高丽君民困守孤城、危在旦夕的时候,隋炀帝的后院起火,督运军粮的尚书杨玄感起兵反隋。同时,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的农民起义,也正如火如荼地发展着。东都洛阳垂危,炀帝只得撤军。

炀帝远征高丽,不但使国内阶级矛盾激化,也使统治阶级

内部分裂了。

第三年(614年),局势稍有缓和,炀帝犹未死心,又召集百官商议第三次远征。但是,朝堂上却寂然无声。炀帝不度时宜,一意孤行,再次向全国发出了征兵令。这次与往常不一样了,不少郡县公然抗命,应征来的士兵又不断逃亡。炀帝下令,以逃兵的颈血衅鼓,残酷镇压,然而无济于事,兵士逃亡仍有增无减。炀帝无可奈何,只好借高丽求和的台阶,下令撤兵。

炀帝的远征军归来,路经邯郸时,农民起义军一部袭击了远征军的后队,掠获了几十匹战马。

这个小小的袭击,却是个重要的信号。它标志着反隋力量壮大的必然趋势。这时,农民起义的烽火已在全国燃起,一场汹涌澎湃的阶级大搏斗开始了,——隋朝覆灭的丧钟敲响了。

第四节 隋末农民 起义和隋王朝的灭亡

一、王薄起义

暴君隋炀帝继位以来,进行无休止的横征暴敛,早已叫百姓透不过气来。3次征高丽的战争,全国规模的大征调,更使永济渠沿岸的村落,几乎找不到男丁。劳力缺乏,田园荒芜,再加上一场洪水,粮价涨了几百倍,人民靠树皮野菜充饥。他们

忍受不了兵役、徭役和饥饿的折磨，纷纷揭竿而起。

大业七年(611年)，齐郡邹平(今山东邹平)人王薄，首先在长白山(今山东章邱)起义。这座山在邹平、长山、淄川诸县交界，山势险峻，周围60里，号称第二泰山。这个地方历来是起义农民隐身的场所，早在北魏时期，就“多有盗贼”。由于山里产铁，过去有人在山里制造兵器。传说王薄是个铁匠，很会打造枪头。正因为长白山具有各种优越条件，因此隋末农民起义的领袖，不少人都在这里聚义。

王薄自称“知世郎”，他以先知先觉自居，借以树立自己的威望。他作了《无向辽东浪死歌》，号召人民起来反抗隋炀帝，从而得到人民的拥护。歌辞道：

“长白山前知世郎，纯着红罗锦背裆。长稍侵天半，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王薄起义好像星星之火，点燃了全国农民战争的序幕，农民大起义的熊熊烈火，便在全国各地燃烧起来。

同年，孙安祖、窦建德在高鸡泊(今山东恩县)、张金称在鄆县(今山东夏津)、翟让与单雄信、徐世勣据瓦岗，外黄王当仁、济阳王伯当、雍丘李公逸、韦城周文举等纷纷起义。

大业九年(613年)，孟海公据济阳周桥(今山东曹县)、孟让在齐郡(今山东济南)、郭方预在北海(今山东益都)、郝孝德在平原(今山东德县)相继起义。

大业九年(613年)六月，礼部尚书杨玄感，乘炀帝第二次

东征高丽之机，在黎阳（今河南浚县）起兵。在刘元进、朱粲、管崇等人的领导下，江南农民在余杭（今浙江杭州）、吴郡（今江苏苏州）一带发动了起义；在白瑜娑等人的领导下，西北农民在灵武（今宁夏灵武）等地起义。十二月，章丘杜伏威、临济辅公柝起义，与下邳苗海潮、海陵赵破陈等部会合。这时仅见于记载的起义军就达百余支，参加人数数百万。起义军“大则跨州连郡，称帝称王，小则千百为郡，攻剽城邑”（《隋书·炀帝纪》）。大业十年以后，各地起义队伍切断了长安、洛阳、江都隋朝三大据点的联系，隋统治集团陷入农民起义的大包围中。

二、瓦岗寨

风起云涌、星罗棋布的隋末农民大起义，自大业七到大业十二年（616年），经过五年的奋战，逐渐形成三大支队伍，一支是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一支是杜伏威、辅公柝领导的江淮起义军，一支就是翟让、李密的瓦岗军。

大业七年，东都法曹翟让犯了死罪，狱吏黄君汉钦佩翟让骁勇，以为他能拯救百姓，就暗中打开死牢门，将他放了。在东郡（治所今河南南滑县）边界，有一处山势特别险要，峰回坡陡，莽林环抱。山上结着一个寨子，栅高垒固，称瓦岗寨，寨中正聚集着起义的农民。翟让亡命到瓦岗，被拥戴做了寨主。翟让的同乡单雄信骁健勇猛，善用马槊，还有年仅17的徐世勣，先后率部投奔翟让，队伍很快发展到万余人。因为聚义瓦岗，所以称为瓦岗军。

杨玄感兵败，谋主李密被捕，和其余10多名钦犯一起被

押送东都。途中,李密等十余钦犯乘防守的人醉卧梦乡之机,凿墙穿洞,逃了出去。李密脱险后,为了躲避官府缉捕,改姓易名,转辗山村,四处亡命。后来他往来于外黄王当仁、济阴王伯当、韦城周文举、雍丘李公逸等结寨聚义的群雄之间,鼓动他们下山取天下。

李密在大业十二年约了王伯当,投奔瓦岗寨。李密上山初,翟让因听说他是杨玄感的亡命将军而不信任他,把他软禁在营外。李密靠了王伯当的帮助,去见翟让献策说:“如今昏君巡游江都,精兵集于辽东,这个形势如同过去项羽、刘邦奋起夺取天下的时机一样。足下雄才大略,瓦岗士马精勇,正可以席卷二京(长安、洛阳),诛灭暴虐,成就灭隋大业。”翟让因此对李密刮目相看。

李密见瓦岗人马愈来愈多,而粮草不敷供应,感到如果旷日持久,势必人马困疲,一旦强敌降临,就会涣然离散,于是向翟让又献一计,劝翟让下山夺取荥阳,养精蓄锐,然后大干一场。翟让称好。

荥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要隘虎牢关在郡境内。因此隋炀帝特派河南道讨捕大使张须陀为荥阳通守,全力对付瓦岗军。

李密部署翟让率兵从正面迎战诱敌,李密率精兵千余埋伏在荥阳北面的大海寺北密林中。张须陀一向藐视翟让,翟让且战且退,往北退了10多里,把张须陀的2万人马引到大海寺。瓦岗伏兵杀出,翟让回马杀回,和李密、徐世勣、王伯当一起围杀隋军。张须陀战死,隋军被歼1.5万余人。

紧接着,瓦岗军部署新战役。二月,李密、翟让带领7000

轻骑，兼程疾驰，一举攻克了洛口仓。进城后，立即打开粮仓，赈济百姓。消息传开，瓦岗义军声誉传四方。以文辞著名海内的祖君彦也来投奔瓦岗军，李密把军中书檄全委托了他。

瓦岗军夺取洛口仓的消息传到江都以后，隋炀帝吓得魂飞魄散，不敢再回东都。驻守东都的越王杨侗，任命裴仁基为河南讨捕大使，与虎贲郎刘长恭各自领兵，夹击瓦岗军。刘长恭领的是少爷兵，拖拖拉拉，走了 11 天，渡过洛水，在巩县东南石沙子河西岸列阵，南北长达 10 余里。李密、翟让早有部署、陈兵于石子河东岸，另有一部埋伏横岭下。翟让先接战，不利。李密即指挥后队蒲山公营横冲官兵队阵，隋兵大败，刘长恭在混乱中换上士兵衣服，逃回了东都。裴仁基失期未到，等听到刘长恭失败，吓得不敢前进，屯兵于巩县东南的百花谷，固垒自守。后来还屯虎牢关。

瓦岗军威震中原，翟让感到自己能力已不足继续领导，就让位给李密，奉李密为魏公。李密设坛场，即位，组织行军元帅府，改元永平；拜翟让为上柱国、司徒、东郡公，单雄信为左武卫大将军，徐世勳为右武卫大将军，其余都拜授官职，令他们各领本部，李密建立了独立政权，号令天下。孟让、郝孝德、秦叔宝、程咬金等各路英雄都络绎不绝地投奔瓦岗。隋朝的官员裴仁基、柴孝和、郑颢等也闻风纷纷献城投降。著名骁将罗士信等也率众归顺了李密。因裴仁基献出虎牢关，李密封他为上柱国、河东公。当时“道路降者不绝如流，众至数十万。”瓦岗军声威大张，成为隋末农民起义中最大的一支义军。

为了巩固基地，李密令护田茂广筑洛口城，方 40 里，同时派房彦藻向东扩展，攻克了安陆（今湖北安陆）、汝南（今河南

汝南)、淮安(今河南泌阳)、济阳(今山东曹县)。

经过几次反复的激烈的战斗,瓦岗军又夺隋朝另一大粮仓回洛仓,大修营堑,部署攻打东都。李密召集元帅府幕僚,命记室祖君彦草就了一篇讨伐昏君檄文,传檄天下。檄文中声讨炀帝有十大罪状,并说:“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这后来成了千古传诵的名句。

这时李渊还未入关,炀帝命监门将军庞玉,虎贲郎将霍世举率关内兵救援东都。柴孝和劝李密避其锋芒,自率精锐,乘虚入关,西取长安。李密认为这是他当年为杨玄感所出的上策,但顾虑到他的部下将士都是山东人,见洛阳还未攻下,就没人愿随从西进,未能依从柴孝和的计策。柴孝和非常惋惜,只得另献一计说,大军既然不能西进,就由他先入关中联络群雄,看机会吧。李密同意了。柴孝和率数十骑入关,说动了关中群雄万余人,准备响应李密。不久,李密在作战中,中流矢负伤。官兵气焰大张,庞玉、段达乘胜夜袭瓦岗军大营。李密箭伤未愈,与裴仁基仓猝应战,大败,弃了回洛仓,撤奔洛口。柴孝和联络的关中群雄听到李密兵败,统统变卦散去了。柴孝和只得轻骑归返瓦岗军。

可李密这时却自以为兵强,想做天下盟主,叫祖君彦写了封信给李渊说明此意。李渊这时正一心经略关中,倒不图虚名,写了封回信假意表示拥戴。李密把李渊的信展示给诸将看,说:“唐公拥戴我,天下肯定是我的了。”从此他不再考虑西进了。

八月,武阳郡丞元宝藏派门客魏征见李密上降表。魏征字玄成,落拓有大志,出家做道士,学识丰富,很有文名。李密立

即召魏征为元帅府参军，掌记室，并任元宝藏为魏州总管。

这时，河南、山东发大水，饿殍遍野。炀帝诏命开黎阳仓（今河南浚县西南）赈济灾民，吏不按时赈给，结果每天饿死的达数万人。徐世勣向李密建议说：“天下大乱，本是由于饥饿。如今若能夺得黎阳仓，大事就可成功了。”李密当即就派徐世勣领本部 5000 人马，会合元宝藏、郝孝德、李文相等一举攻破了黎阳仓，开仓济贫，远近农民纷纷投奔瓦岗军，10 多天时间就得兵 20 余万。武安（今河南涉县）、永安（今山西霍县）、义阳（今河南桐柏）、弋阳（今河南横川）相继投降。窦建德、朱粲也派使者来表示拥护。

自七月炀帝派江都通守王世充率江淮劲旅北上，同时命将军王隆、河北大使韦霁、河南大使王辩等同赴卫东都，讨捕瓦岗军。这时他们多已在东都会合，与庞玉、刘长恭合兵 10 余万，与瓦岗军夹洛水相持。十月末，王世充仗着兵多势众，摸黑渡过洛水，抢占黑石关，然后兵分两路，准备夹攻瓦岗军。李密发觉后，率精骑渡到洛水北岸去抄袭王世充的后路，被打败。柴孝和落水而亡。李密又返回洛水之南，分兵。一路东走月城，王世充尾随而至，包围了月城。另一路直奔黑石关，官兵连举 6 座烽火告急。王世充赶快从月城撤兵，援救黑石关。在途中遭到李密迎头痛击，杀得大败。李密反败为胜，消灭敌人三千多。

王世充大败后，坚壁不出。越王派使者慰劳他，叫他继续出战。王世充又是惭愧，又是害怕，再次率军到石子河与李密对阵。几天后，瓦岗军大军出动，王世充大败，向西逃回东都。瓦岗军重新振作起来，但东都始终未能攻取。

虽然这时李渊已经取了长安，但群雄中，瓦岗军仍最具备与李渊逐鹿中原的力量。可瓦岗军没有一鼓作气去攻洛阳，却发生了内讧。

石子河一仗刚结束，翟让的司马王儒信就劝翟让自任大冢宰，总领众务，夺李密的权，翟让没听从。话传到李密耳中，李密心生厌恶。总管崔世枢亲近李密，翟让无端将他私禁。翟让又以细故杖了元帅府记室邢义期。李、翟关系日渐恶化。翟让还作色责备房彦藻说：“你得了宝货，只给魏公，全不给我！要晓得，魏公是我立的。”

房彦藻回到元帅府，把翟让所说的话告诉了李密，并与左司马郑颢一起煽动说：“翟让贪愎不仁，心中无君，应该早作打算。”李密心存顾虑，说：“如今安危未定，就自相残杀，岂不被天下人耻笑。”郑颢说：“先发制人的，制人；后发制人的，制于人。毒蛇螫手，壮士解腕。忍痛割臂，为了存全大局。一旦他先动手，就只有后悔的份了。”于是李密决定除掉翟让。

第二天，李密在元帅府宴请翟让，请翟让和他的儿子摩侯及王儒信，还有王伯当、裴仁基、徐世勣、郝孝德等作陪，单雄信等立侍，房彦藻、郑颢往来张罗。李密说：“今天欢饮，不需多人，留下几个听使唤行了。”于是李密左右的侍卫都离开了宴会厅。房彦藻对李密说：“天气很冷，翟司徒的左右该赏赐酒食。”李密说：“听司徒的吩咐。”翟让说：“很好。”于是翟让的卫队也离开了宴会厅，厅上只剩下李密帐下蔡建德一个卫士。

还未进食，李密先取出一张良弓，请翟让习射。翟让刚刚把弓拉满，蔡建德突然跃身，从背后斫倒了翟让。接着，伏兵四出，翟让、摩侯、王儒信都被杀害。徐世勣想夺门逃走，被守门

卫士斫伤头颈，幸王伯当及时呵止，才免丧命。单雄信叩头求饶，李密才放了他。裴仁基等惊得不知所措。李密大声说：“与大家同起义兵，本为扫除暴乱。翟司徒专行暴虐，凌辱群僚，图谋不轨，我才忍痛除去。今只除他一家，与旁人无关。”又命人将徐世勣扶进内室，亲自为他敷药，竭力抚慰。

接着，李密怕事态扩大，命单雄信、王伯当等，赶到司徒营一一安抚，反复说明杀翟让的道理，并让徐世勣、王伯当、单雄信分统其众，防止了一场大乱。但火并翟让以后，瓦岗军的不少将士心存疑惧，怕做翟让第二，军心逐渐涣散，势力逐渐衰落了。

武德元年（618年）春，王世充集结兵力7万余人，正月十五命令各军在洛水造浮桥，渡过洛水与瓦岗军决战。虎贲郎将王辩最先登岸，攻破李密外围营栅。王世充不知这时李密大营惊慌，忽然鸣金收兵，于是李密率敢死队乘机追杀。官兵大败，几万人抢渡浮桥，落水而死的1万多人。王辩当场阵亡。这夜疾风寒雨，军士涉水时衣裤湿透，因此冻死在道路上又有万余人。王世充逃走，自己向越王侗请罪，越王遣使赦了他，把他召还东都。王世充屯兵东都城北的含嘉城，但不敢出战瓦岗军。

李密乘胜占领金墉城，扎营北邙山，浩浩荡荡逼近东都上春门。战鼓声一阵阵传入东都城内。十九日，段达、韦津领兵出战，望见密密麻麻的瓦岗军，不战自慌，返身而逃。段达在后逃进了城。韦津冲在前面，被瓦岗军杀了。

东都城门四闭，拒不出战。瓦岗军打了四五个月，毫无进展。这时宇文化及弑了炀帝，以皇后令立秦王浩为帝，自称大丞相，率领10万官兵，离江都北上，要踏平瓦岗寨。瓦岗军处

于宇文化及与王世充的东西夹攻之中，形势险恶。房彦藻为另一支义军王德仁所杀，瓦岗大将王君廓又投降唐朝，李渊称帝长安，一个又一个的坏消息打击着李密。

六月，宇文化及率军直扑黎阳，企图夺仓抢粮。瓦岗守将徐世勣在黎阳西新筑仓城，集中精兵把守。宇文化及赶到，受濠堑所阻。李密率步骑2万增援，抄宇文化及的后路。徐世勣挖地道出奇兵袭击，宇文化及大败，溃逃而去。

这时已经接了帝位的杨侗想利用瓦岗军来抵挡宇文化及，决定招安瓦岗军，派使者盖琮去见李密。李密虽然黎阳胜利，但仍担忧腹背受敌，见盖琮来招安，大喜，以为可解除西顾之忧，避免作战了。他上了降表，被册拜为太尉、尚书令、东南道大行台行军元帅、魏国公，奉令先平宇文化及，然后入朝。

七月，李密因已无西顾之忧，率全部精兵东击宇文化及，大获全胜，斩敌4万。宇文化及元气大伤，无力西进，带着2万多残兵败将，逃往河北去了。李密准备入朝，走到半途，获报东都兵变，王世充杀了主张招安的大臣，选了两万精兵来攻瓦岗军。李密因为久战，损失了很多劲兵良马，士卒疲病，只得放弃了进占东都的计划。

九月，李密留王伯当守金墉，邴元真守洛口仓，自率精兵，到偃师北邙山驻营。他召集诸将会议。裴仁基建议分兵扼守各交通要道，阻堵王世充东进，再选3万精兵，绕道河西，直趋东都，让王世充来回奔命，然后一战决胜。李密认为说得有理，避其锋芒，以逸待劳，养精蓄锐，确是上策。单雄信等武将们不服从，纷纷要求大战一场。李密又改变了主意。裴仁基苦争没用，顿脚叹息说：“魏公将来一定要后悔的！”

接着在偃师大战，结果失利，裴仁俨等 10 余大将重伤。但李密却并不在意，夜不设防。不料这夜王世充遣 200 多轻骑携带火种，潜伏在北邙山谿谷中。天一亮，王世充率江淮劲兵攻袭北邙山瓦岗军大营。李密来不及列队布阵，仓卒应战。这时，王世充的伏兵乘虚爬上山顶，居高下冲，纵火烧营。王世充命士兵把预先绳捆索绑的貌似李密的人牵过阵前，连声鼓噪：“捉到李密了！”声音传遍北邙山。瓦岗军以为李密真的被俘，失了斗志，向山下溃败。在溃败中，一些将领相继倒戈。李密集拢了 1 万多瓦岗军，驰奔洛口仓。

途中，获报镇守洛口仓的邴元真叛变。邴元真是翟让的老部下，翟让被杀，他一直怨恨在心，听说李密兵败，不等王世充来攻，就投降了。接着，单雄信叛变。偃师失陷，裴仁基、郑颢、祖君彦被俘。于是，李密投奔王伯当。

王伯当这时已放弃金墉，退保河阳。李密赶到河阳，召集诸将商议，想再图进取。可自从下山以来，瓦岗军从未遭受过如此惨败，因此诸将情绪低落，都说难以成功。

冬十月，李密带着 2 万瓦岗军残部与魏征等文官，进长安投降了唐朝。唐高祖李渊封他为光禄卿、上柱国，赐爵邢国公。消息传开，徐世勣、贾润甫等将领也相继降唐，秦叔宝、程咬金等多数将领投降了隋朝。瓦岗军就此瓦解。

不久，李密感到在唐朝只有虚位，郁郁不乐。他和王伯当两人密议离唐出关，招集瓦岗旧部，重举义旗，东山再起。接着，李密假意向李渊献策，愿亲往山东招收旧部，讨灭王世充。李渊同意。李密又要求贾润甫、王伯当同去，李渊也准许了。

十一月，李密与王伯当、贾润甫 3 人出了长安城，马不停

蹄，直奔黎阳。3 人到稠桑时，李渊反悔，敕追李密返回。李密估计返回必无生理，决意反叛。贾润甫哭谏说：“自翟让被杀，天下都说明公忘恩负义，如今归唐复叛，还有谁肯相助！”李密大怒，要杀贾润甫，被王伯当劝住。贾润甫不别而行。李密撕毁敕书，杀了使者，和王伯当两人继续东驰。

一路上，两人招集到几十名旧部，把他们装扮成妇女，裙下藏刀，进入桃林县（今河南灵宝），突然变服，抢占了县城。他们夺取粮械后，聚集了 1000 多人，直趋南山，乘险东行，准备去襄城依归瓦岗旧将张善相。

不料走进熊耳山，唐朝行军总管盛彦师的伏兵齐起。李密、王伯当等 1000 多人被冲作两截，首尾不能相顾，全部遭害。鲜血溅染熊耳山，瓦岗寨起义至此彻底失败了。

三、河北夏王

大业十二年（616 年）是中原瓦岗军发展壮大的时候，也是窦建德在河北群雄中崭露头角的时候。

河北义军主要的有张金称、郝孝德、孙宣雅、高士达、杨公卿等部，经常和隋军交战。单清河郡丞杨善会便和起义军打了 700 多仗。这年，隋炀帝派杨义臣到河北，加紧进攻，斗争更加残酷。杨义臣先打张金称，对峙了 1 个多月，隋军故意示弱，然后猛力袭击，打败了起义军。张金称被俘牺牲。

杨义臣乘胜进兵，要进高鸡泊打高士达、窦建德。建德劝士达道：“杨义臣善于用兵，兵锋正锐，势不可当。不如暂且退避，等他求战不得，士卒疲劳，再乘机进攻，才能取胜。”士达不

听,亲自引兵迎敌,打了个胜仗,便置酒聚会。几天之后,果然大败战死。高鸡泊起义军几年惨淡经营,险些儿废于一旦。窦建德虽预料及此,率领百余名精兵守险,终因众寡不敌,只能暂时撤走。杨义臣以为高鸡泊起义军已经解决,就带着主力撤走了。

窦建德乘此机会,收编余部,安葬阵亡将士,为高士达发丧成礼,士气大振,不久发展到10余万人,攻占了河北许多郡县。

第二年,他在乐寿(今河北献县)称长乐王,年号丁丑,建置官属,逐渐有了立国规模,比旧日割据水泊的局面,大大地跃进了一步。

大业十三年河间(今河北河间)七里井大捷,是窦建德在隋末大起义中的重大贡献。那时隋将薛世雄奉炀帝之命,从涿郡引精兵3万,南下解东都之围。照炀帝的原命,薛世雄南下,王世充北上,两支精兵,由薛世雄统一指挥,联合镇压瓦岗军。窦建德一举歼灭薛部,使瓦岗军减轻一半压力,大大地削弱隋朝在北方的统治力量,意义十分重大。

窦建德用的是诈败诱敌之计。薛世雄到了河间城南的七里井,窦建德设下伏兵,故意撤走附近各地军队,散布流言,说逃到豆子觚去了。薛世雄信以为真,不设防备。窦建德侦察清楚了敌情,亲自率领精锐,冒着大雾,突袭隋营。这一仗,薛世雄只带得几百骑逃走,3万精兵全部覆没。窦建德乘着战胜的余威,取得了河北大部分郡县。

公元618年,窦建德建国号为夏,改元五凤。次年迁都洺州(今河北永年)。他在境内劝课农桑,发展生产,自己布衣素

食,保持俭朴作风。从在本人辖区内的建树看,窦建德在同时的起义军领袖中,贡献最大。因此不仅在当时受到人民的拥护,就是到了唐代后期,魏州(今河北大名)还有夏王庙,父老们年年举行祭祀。

四、杜伏威、李子通扫荡江淮

窦建德起义后第二年,杜伏威、辅公 弼在长白山举起反隋旗帜。杜伏威是齐州章丘人,辅公 弼是他的好友,齐州临济人。他俩生活都极端贫困,最初参加左才相起义军,但得不到信任,就离开左才相,自己组织队伍。杜伏威强悍有力、大公无私,在作战中“出则居前,入则殿后”,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

大业十年(614年),齐郡一带农民起义遭张须陀的围剿,左孝友部失败。屯军祝阿(今山东长清县东北)的卢明月,也在这年年末被张须陀击溃,残部向河南方面转移。在这样的情况下,杜伏威、辅公 弼也离开齐郡,转向淮河流域。

十二月,杜伏威到达淮北。这时苗海潮领导下的农民军在下邳(今江苏邳县)活动。杜伏威为了壮大革命力量,派辅公 弼劝说苗海潮合力抗隋,并表示:如果你能当主帅,我们就听你指挥,假若你觉得无力领导这样大的队伍,就听我们指挥。再不然就两军较量一下,谁强就服从谁。苗海潮兵力较弱,只好和杜伏威合并。

两军合并后,杜伏威向淮南进军,准备包围江都。江都通守派宋颢前来镇压。杜伏威诱敌深入,把敌人引向芦苇荡,然后从上风纵火,迫使隋军陷入大泽,消灭了很多隋军,取得反

击战的伟大胜利。

大业十一年(615年),杜伏威合并了赵破阵部,占领安宜(今江苏宝应县西南)等地。冬天,进占六合(今江苏六合)。

同时,另一支农民军李子通夺取了海陵(今江苏泰州市),左才相部也到达淮河沿岸。他们的队伍,都发展到几万人,并且在淮南稳定下来。

大业十二年冬天,隋炀帝回到江都,派遣公孙上哲率近卫军围剿杜伏威。在盐城(今江苏盐城)一带被杜伏威歼灭。大业十三年(617年)正月,炀帝又派大将陈稜领精兵8000余人前来进攻。

陈稜是能征善战的将领,曾远征琉球,并多次打败农民军。他到达前线以后,坚壁不战,消磨农民军的锐气,以逸待劳。杜伏威、辅公祐识破了陈稜的诡计,送他一套女人服装,称他“陈姥”。陈稜终被激怒,全军出战。杜伏威、辅公祐各带几百骑兵闯入敌阵,把陈稜军打得大败。农民军乘胜攻破高邮(今江苏高邮),占领历阳(今安徽和县)。杜伏威自称大总管,以辅公祐为长史,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同时分遣诸将,向淮南一带扩大革命阵地,合并了不少小股农民军。后来又派大军渡长江,打败李子通,占领丹阳(今南京),建国称吴。在农民军统治区内,实行“轻赋敛”政策,取消殉葬之风,严惩贪官污吏,“无轻重皆杀之”。他们是江淮地区最强大的农民军。

江淮地区另一势力是李子通领导的农民军。李子通是东海(今江苏连云港)人,家境贫贱,以渔猎为业。平时,他经常扶老携幼,见义勇为。大业九年(613年),他在长白山参加左才相起义。由于李子通不好杀人,所以“人多归之”,半年之间,部

众发展到 1 万余人。后来他和左才相发生矛盾，自己引兵到达淮南，并且一度 and 杜伏威合作。

淮南农民军势力的发展，使隋朝的财政受了很大影响。他们为了摆脱困境，于大业十年（614 年），派重兵镇压李子通，子通失败，东奔海陵（今江苏省泰州市）。由于当时破产农民甚多，所以到这年七月，这支农民军又扩大到数万人。

武德元年（618 年）三月，江都政变，宇文化及带领 10 万人到中原争夺天下，他任命陈稜为江都通守。由于江都空虚，李子通乘机围攻陈稜。陈稜向大士族沈法兴和杜伏威求救。当时沈法兴正屯兵扬子（今江苏仪征），杜伏威在清流，他们之间相隔数十里。沈法兴招募江南流民，夜袭杜伏威，扩大了沈法兴和杜伏威的矛盾，因而无力协助陈稜，从而江都孤立。李子通猛攻陈稜，攻克江都，称帝，国号吴，年号明政。这样，农民军的声势大振，又有隋丹阳守乐伯通率万余人投降李子通，从此，这支农民军的势力便扩充到长江以南。

武德二年（619 年），杜伏威降唐。

武德三年（620 年）十二月，杜伏威派辅公祐围攻李子通。这时李子通的部众甚多，超过对方 10 倍以上。但辅公祐智勇双全，他精选甲士千余人，各执长刀打先锋，另以千余人殿后，有临阵懦怯者立即斩首。辅公祐亲自督战，双方战斗非常激烈。结果李子通大败，降者数千人。李子通粮尽，放弃了江都，渡江到了京口（今江苏镇江市），杜伏威进占丹阳。李子通奔向太湖区域，扩充农民军达 2 万余众，准备攻打沈法兴，夺取浙北地区。

沈法兴是吴郡大族出身，曾任吴兴（今浙江吴兴等县）太

守。他以诛伐宇文文化及的名义扩大武装，掌握精兵 6 万，占领了吴郡、余杭（今浙江杭州市）、毗陵（今江苏常州市）等 10 余郡，武德二年八月自称梁王，改元延康，署置百官。武德三年（620 年），李子通渡江进攻沈法兴，取京口。沈法兴败走奔吴郡，又被李子通击败，部下也纷纷反对他，最后投江自尽。李子通乘机占领沈法兴故地，占有“北自太湖，南至岭南，东包会稽，西距宣城”地区。

武德四年（621 年）十一月，唐政府平定中原，向江南进军。这时杜伏威、王雄诞已降唐，王雄诞奉命镇压李子通。李子通被俘，被解送长安。

五、隋朝灭亡

炀帝三次远征归来，形势每况愈下，郡县纷纷呈报告急文书，这使他忧心如焚，夜不能寐。这个临亡的暴君已如惊弓之鸟，听不得起义军的消息。谁若奏闻起义军“人多了”，“离洛阳近了”，他就暴怒杀人。他色厉内荏，心怀恐惧，在东都住下去感到不安全，意欲避难江都（今江苏扬州市）。

炀帝要下江都，朝臣们都明知群龙无首，王朝大厦也就崩溃了，但谁也不敢进谏。这时，一个叫任宗的小小尉官，挺身上书劝阻，立即被打死在殿下。途中，同样的事又发生多次。炀帝执意东行。

炀帝到了江都，但江南并不平静，反隋力量也在风起云涌。这时是大业十二年（616 年）。

炀帝起用了一批心毒手狠的刽子手统领官军，对反隋力

量进行残酷的镇压，一支支起义队伍被淹没在血泊中。可是正如史书所说，“隋将战无不捷，然百姓从乱者如市”，“败而复聚，其势益盛”。

大业十三年(617年)时，隋朝已处于苟延残喘的境地。农民军除三大集团和林士弘等外，还有许多独立活动的队伍。

河北北部有高开道，据渔阳(今蓟县)，称燕王；魏刀儿，据深泽(今河北深泽)，称魏帝。大河南北各军大多归附李密，但如王薄、孟海公等部和崛起于兖州(今山东滋阳)的徐圆朗，也都有相当的实力。其余声名较次的武装力量，更是难以计数。

在这土崩瓦解的形势之下，许多大贵族、官僚、豪强地主纷纷脱离隋朝，保存自己，以免为农民起义军所消灭，并寻求发展的机会。

大将罗艺自称幽州总管，割据涿郡。

马邑将领刘武周割据现在的山西北部；朔方将领梁师都割据现在的陕西北部。他们依附突厥贵族，始毕可汗封刘武周做“定杨可汗”，梁师都做“解事天子”。这两个是儿皇帝之流的人物。另外有一个郭子和，占了榆林，也受过突厥“犀利设”的封号，然而他因犯罪被徙，乘饥荒起事，有反压迫的意义。他兵力微弱，并不真心依附突厥，唐朝开国，他便归唐，并把了解到的突厥情况，报告唐朝。他与刘、梁二人是显然有区别的。

豪强地主薛举起兵金城(今甘肃兰州)，称西秦霸王，占有陇西各地。李轨也占有河西各郡，先称大凉王，继称皇帝。

太原留守李渊进兵关中，开始“化家为国”。

梁朝皇室后裔萧铣以县令起兵，建都江陵，取得现在的两湖和江西、广东的部分地区，差不多恢复了半个南朝。沈法兴

于唐武德元年(618年)起兵,占有余杭、丹阳等10多郡,差不多又是半个南朝。

这些地主割据政权的出现,使隋王朝的瓦解更加迅速。

大业十四年(618年),隋王朝的势力已土崩瓦解,只剩下洛阳和江都两地了。

隋炀帝在江都离宫,虽仍拥姬抱妾,然而如坐针毡。天天打卦问卜,以酒浇愁。

炀帝不想回到北方去,从驾的骁果(招募的禁卫军)却都思念家乡。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将领宇文化及利用兵心思变,发动兵变,用一条练巾结束了炀帝这个独夫的性命。

宇文化及领兵北上,想争霸中原,被李密打败;接着进入河北,自称许帝,这是日暮途穷,聊以自慰的举动。这个“皇帝”到第二年便被窦建德擒获杀死。

东都还打着隋朝的旗号,然而隋朝实际上是灭亡了,独夫杨广之死就是隋朝的结束。它是在农民战争的熊熊烈火中灰飞烟灭的。

第二章

从初唐到盛唐

第一节 唐朝统一帝国的建立

一、唐朝开国

隋末农民战争爆发以后,各地有不少官僚豪强趁机脱离隋朝统治,扩大自己的势力,准备夺取政权,其中最主要的是李渊集团。

李渊原来是西魏柱国大将军李虎之孙,其父李昺,曾任北周安州总管,袭封唐国公。隋朝建立以后,李渊先后任谯州(今安徽滁县)、陇州(今陕西陇县)、岐州(今陕西凤翔)刺史。大业九年(613年),杨玄感起兵反隋,炀帝调李渊为弘化(今甘肃合水)留守,节度陇右诸军。大业十一年(615年),李渊任山西河东抚慰大使,镇压毋端儿起义。大业十三年(617年)初,李

渊以太原留守兼晋阳宫监。晋阳(今山西太原)是军事重镇,兵源充足,“食支十年”。因此,李渊“私喜此行”,到达晋阳后,在农民起义如火如荼的形势下,便准备夺取政权。他令长子建成“于河东潜结英俊”,令次子世民“于晋阳密招豪友”。他们“倾财仗施,卑身下士,逮乎鬻僧博徒,监门厮养,一技可称,一艺可取,与之抗礼,未尝云倦,故得士庶之心,无不至者。”就这样,李渊为起兵反隋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摆在李渊面前的问题是:怎样消灭隋朝在河东的残余势力;夺取长安?怎样防止突厥在背后袭击?刘文静建议暂时和突厥妥协,避免腹背受敌两面作战。李世民同意这个意见,并提出占领河东以后夺取关中、在长安站稳脚跟后再反击突厥的作战方针。

李渊立即派刘文静出使突厥,给始毕可汗送去金帛,还把李渊的红旗改为红白狼头旗,表示臣服突厥,并且与始毕可汗约定,将来同突厥共定京师后,长安土地归李渊,子女财帛归突厥。始毕可汗喜出望外,立即遣使晋阳,送马千匹。

大业十三年(617年)七月,李渊正式建立了独立政权,自称大将军,开府置官。任裴寂为长史,李建成为陇西公兼左领军大都督,李世民为陇西公兼右领军大都督。刘文静、武士彠、唐俭、姜暮、长孙顺德等都参与大将军府工作。晋阳囤积的数百万斛粮食、数万匹杂缯,都由李渊控制。李渊父子率甲士3万人从晋阳出发,李元吉留守晋阳。

隋朝代王杨侑驻守长安,闻李渊宣布独立,立即派宋老生、屈突通加强河东防务,把主力部署在霍邑(今山西霍县)一带,阻击李渊。七月以后,李渊先打败高德儒,夺取了西河郡。

八月大败宋老生，夺取了霍邑。

大军在霍邑休整了 10 余天后，进围临汾（今山西临汾），隋兵迎降。不久，绛州（今山西新绛）郡守陈叔达也当了李渊幕僚。河东各县一举平定，成了李渊经营关中的根据地。

当李渊在太原起兵不久，平阳公主的丈夫柴绍，便离开家乡，投奔李渊。平阳公主则秘密回到郿县（今陕西户县），变卖家产，招兵买马，组成娘子军，后来和她叔父李神通合作，攻下郿县等地。

平阳公主的家奴马三宝，能言善辩，被提拔担任招抚使。他到关中义军中到处活动，结果把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等都争取过来，投向娘子军。从此平阳公主的势力扩大到盩厔（今陕西周至）、武功（今陕西武功）、始平（今陕西兴平）等地，兵力发展到六七万人。

李渊的亲戚段纶也在蓝田起兵，聚众万人，与娘子军合作。到李渊渡过黄河的时候，平阳公主和段纶的武装已经控制长安西部和东南部分地区，在关中策应李渊。

李世民渡过黄河以后，领兵西进，沿途小股反隋军队，都归附李世民，到达泾阳（今陕西泾阳）的时候，部众增至 9 万余人。当时有隰城（今山西汾阳）县房玄龄来降，李世民和他一见如故，引为谋主。正在这个时候，平阳公主带领娘子军来见李渊。从此以后，娘子军便归李渊统一指挥，全军扩大到 20 余万人。

李世民和娘子军会师后，严整军令，进兵阿城（秦阿房宫城），并派人报告李渊，约期会师长安。

李渊接报后，即日行军西行。十月，各路唐军在长安城外

会合，有兵 20 余万。李渊多次传谕守城隋军，宣称他拥护代王杨侑，愿与隋军共同防守关中。隋朝留守长安的代王杨侑只有 13 岁。辅佐他的京兆内史卫文升已年过 70，听说唐军兵临城下，忧惧成疾，不能视事。负责防守的左冯翊将军阴世师很讲气节，郡丞骨仪秉性刚鲠，不理睬李渊。于是李渊下令攻城。他宣布纪律，入城后不得侵犯隋朝宗庙、宗室和代王，违者灭三族。隋军虽然人数不多，但城固堑深，唐军损兵折将，一直攻到第 13 天，才杀败隋军，攻克长安。时已十一月。

攻克长安后的第七天，李渊拥立代王杨侑，即位大兴殿，为恭帝，改元义宁，遥尊炀帝为太上皇。李渊自任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总理万机，晋封唐王，以武德殿为丞相府。立建成为唐世子，世民为京兆尹、秦公，元吉为齐公，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其余随征官员，都有封赏。

武德元年（618 年）三月，江都兵变，隋炀帝被杀，宇文化及立秦王杨浩为傀儡皇帝即皇泰主。凶讯传到长安，五月，恭帝退位。恭帝退位后第七天，李渊改大兴殿为太极殿，在太极殿登皇帝位，是为高祖，改元武德，定都长安，建立唐朝。突厥始毕可汗派使者来贺，唐高祖在太极殿设宴奏乐，庆祝开国。次日，命刘文静与当朝通识之士以宽简为原则修改《隋开皇律》，制定《武德律》，以为唐朝开国法典。六月，大封随征将士。立李建成为太子。任李世民为尚书省长官尚书令，晋封秦王。元吉为齐王。裴寂为尚书省副长官右仆射、知政事，刘文静为门下省长官纳言（后改名侍中），萧瑀为中书省长官内史令（后改名中书令），都是宰相。

李渊定鼎关中，取得了政治和地理优势，他以关中为根据

地，平定群雄，去进行统一中国的大业。

二、薛举犯唐

武德元年六月，李渊刚封好诸子宗室，西秦霸王薛举率劲兵进攻泾州（今甘肃泾川）。

薛举原是陇西土豪，凶悍善射，骁武绝伦，家产巨万，专好结交豪侠，一向在边朔称雄。隋炀帝大业末年，群雄四起时，他在做金城校尉。金城令郝瑗为了镇压义军，招募了数千士兵，命薛举统领。一日，郝瑗设酒宴请将士。不料，薛举早有反心，与儿子薛仁果及同谋者在宴席上突然发动，劫持了郝瑗，开仓赈贫，就率领了这数千募兵举旗反隋。他自称西秦霸王，掠官收马，招集群盗。陇西巨盗宗罗喉率众归顺，岷山的羌人首领不久也举众2万投降了他。薛仁果也善于骑射，军中号为万人敌。不过几天工夫，西秦军就大破隋兵。不久，全部占有了陇西，定都兰州，号称30万，虎视长安，成了唐朝西面最大的威胁。

这次薛举意在夺取长安，进至高土塬（今陕西长武），安营扎寨，纵兵掳掠，扰得长安一带人心骚动。李渊想到西秦为大唐心腹之患，这时又正好潼关以东李密与王世充在东都胶着，就任命秦王李世民为西讨元帅，统领八总管兵西征。

唐军到达高土塬。李世民估计西秦粮少，利在速战，决定以逸待劳，命令挖筑深沟高壁，等待敌军疲倦再战。不料战事未开，李世民疟疾发作，只得把军事委托给行军长史刘文静、行军司马殷开山。

刘、殷两人率军进抵高土塠西南，但自恃兵多，不设防备。秦王在病中得知，赶快写信去阻止，可是已来不及了，薛举已经率师潜到唐军背后，一场大战，唐军大败，死亡一半以上，大将慕容罗睺、李安达、刘宏基在阵前被俘。李世民只得引兵退还长安。李渊罢了刘文静、殷开山的官爵。

薛举拔了高土塠，八月，又派薛仁果进攻宁州（今甘肃宁县）。郝瑗劝薛举乘胜直取长安。临发兵前，薛举忽然生病，召巫师来看治，巫师说这是死了的唐兵作祟。薛举平时残酷，凡是俘来的士兵都用断舌、割鼻子，或者用碓拷杀，这时听了巫师的话将信将疑，精神恍惚，不久就死了。薛仁果在泾州境内的折土塠城继了西秦霸王位。

在薛举死后七天，李世民仍以西讨元帅率数十万唐军西征。薛仁果此时兵锋将锐，先击败李世民的娘舅秦州总管窦仁轨，又在泾川大败唐军，俘杀泾州守将刘感，继而又俘获陇州刺史常达，陇州唐军 2000 人投降了薛仁果。

十一月，李世民再次进军高土塠。薛仁果派宗罗睺到唐营挑战，李世民仍下命令坚壁不出。唐将纷纷请战，李世民说：“我军新败，士气沮丧。贼军恃胜而骄，有轻我之心，应该闭垒不出，以逸待劳，等贼军骄慢，我军士气振作，可一战而胜。”下令：“敢言战者斩！”

两军对峙了 60 多天，西秦军粮尽，将领梁胡郎、内史令翟长孙率部降唐。李世民认为反攻时机到了，派行军总管梁实率军布阵浅水源，以引诱薛仁果出战。宗罗睺求战心切，尽其精锐来攻，而梁实则守险不出，在营中泛水、“人马不饮者数日”的情况下，顽强抗击薛军的进攻。又派大将庞玉出薛军之右，

在浅水源之南布下阵势，与西秦大将宗罗睺大战。两军酣战不休，庞玉渐渐不支。就在这时，大队唐军突然出现，领头的正是李世民。阵上唐兵见了，士气大振，呼声动地，与援军呼啸着内外夹击西秦军。西秦军大败，损兵折将，死亡数千。李世民亲率 2000 劲骑，乘胜穷追，一直追到折塬城下。

薛仁杲在城外列阵，隔泾水与唐军对峙。薛仁杲有勇无谋，平日只知施虐行威，不知树恩，将领们一向与他不和，这时愈加离心。骁将浑干等临阵降了唐军。薛仁杲怕了，引兵退入城内。这时大队唐军已陆续赶到，将折塬城团团围住。半夜里，西秦军争先恐后缒城而下，一批一批地直奔唐营投降。薛仁杲见大势已去，只得率百官开门出降。

李世民进城受降，得了西秦万余精兵，男女百姓 5 万余，献俘长安。李渊斩了薛仁杲及数十西秦头目，其余一概免罪。陇西平定，从此唐朝去了心腹之患。

三、定河东

武德二年(619 年)闰二月，唐朝正在做着稳定关陇局势的工作，为出兵潼关做准备时，盘据着马邑(今山西朔县)的突厥傀儡定杨可汗刘武周先发制人，任命妹夫宋金刚为西南道大行台，统兵 3 万，杀奔晋阳，要与唐室争夺天下。

刘武周本是马邑豪强，骁勇善射，曾随隋炀帝征辽，立过军功，回到马邑做鹰扬府校尉。马邑太守王仁恭因他是当地豪强的头，命他统管帐下亲兵，随侍左右。他私通了王仁恭的侍妾，怕事情败露，就乘天下大乱之机，纠合了乡间豪强，阴谋杀

了王仁恭，开仓放粮，收买民心，自称太守。他自感基础不牢靠，就投靠着突厥。依靠突厥骑兵，他大破隋兵，夺了雁门关，袭破楼烦郡，占据了炀帝行宫汾阳宫。仗了突厥的支持，他自称皇帝，建元“天兴”，声势喧嚣。易州巨盗宋金刚被窦建德战败后，率众 4000 投奔刘武周。刘武周封宋为宋王，把妹子嫁给了他。这时有人劝刘武周进图晋阳，南向以争天下。刘武周就命宋金刚为先行，率兵南下，突厥派了 500 骑兵助战。四月，直抵榆次（今山西榆次）北黄蛇岭，兵势凶张。

晋阳是大唐发迹地，镇守晋阳的并州总管是齐王元吉。元吉见敌兵压境，忙命车骑将军张达率部去保卫榆次。张达嫌兵力单薄，不肯听命。元吉非要他去，结果全军覆没。张达忿恨之下，投降了宋金刚，向他献计偷袭榆次。接着，进图并州（治所即晋阳），攻打介休（今山西介休）。李渊诏命左武卫大将军姜宝谊、行军总管李仲文迎杀。刘武周将黄子英在城外西南的雀鼠谷多次以轻兵诱战，一接战就往谷里走。最后，姜、李两将失了警惕，率全军追入谷内。忽然，伏兵四起，唐兵大败，全军覆没，两将侥幸逃出。

接到晋阳告急文书，李渊很忧虑。右仆射裴寂自告奋勇，愿领兵救援。李渊任命裴寂为晋州道行军总管，统率大军，往援晋阳。

大军到了介休，宋金刚紧闭城门，坚守不战。裴寂见一时无法攻克，就命令全军在城东南的度索原安营扎寨，等待时机。唐军到了度索原，已是人困马乏。恰在此时，宋金刚纵兵来袭，唐军仓促应战。姜宝谊被杀，裴寂带了残兵，一日一夜马不停蹄，逃进了晋州（今山西临汾）城。于是晋州以北城镇，全

被刘武周占有。

刘武周命宋金刚进军晋州，自己引大军直逼晋阳城下。元吉慌了，骗司马刘德威说：“你率老弱守城，我率强兵出战。”刘德威信以为真。不料当天深夜，元吉就带着妻妾，弃了晋阳，在晋阳劲兵的保护下，逃奔长安去了。次日一早，刘武周兵临城下，城中已毫无抵抗能力。晋阳土豪薛深率众开城投降，刘武周进占了晋阳城。

接着，刘武周传令宋金刚迅速南进。很快，河东的晋州、绛州、浍州、龙门相继陷落。

这下，李渊急忙写了手令。手令说：“贼势如此声势，难与他们争锋，应放弃河东，谨守关西。”李世民不同意，上表表示愿带3万精兵去平定河东，克复晋阳。

这年十一月，李世民引兵到达龙门，踏冰渡过了黄河，向北挺进到柏壁（今山西新绛西南），与宋金刚对峙。他传令大军休整秣马，坚壁不出。同时，一面征集粮草，一面派出小股兵力游击抄掠敌营，渐渐将宋金刚的凶焰杀了下去。

谁知这时宋金刚派出偏将尉迟恭、寻相在夏县与吕崇茂夹击永安王李孝基，大获全胜，把李孝基及多员唐将都俘虏了去。夏县在柏壁的南面，是唐军的后路，势在必争。李世民准备亲自出马，大将殷开山、秦叔宝请战。这时李世民已得知尉迟恭将回浍州，就向两将授计。两将领计而去，在夏县北的美良川设下伏兵。美良川是尉迟恭回军的必经之地。果然，尉迟恭和寻相领着刘军来了。等刘军渡河渡到一半时，殷开山、秦叔宝指挥唐军伏兵突然杀出。刘军猝不及防，仓促应战，溃不成军。唐军奋力追杀，斩敌2000余。尉迟恭字敬德，相传善使

两条竹节钢鞭，果然骁勇非常，与寻相杀出重围逃去。

尉迟恭逃出不久，又奉命增援蒲反（今山西蒲州）。蒲反距潼关不远，这次李世民只得亲自率步骑三千，离开柏壁大营，从小路连夜奔驰至安邑（今山西安邑）截击尉迟恭。结果，大获全胜，将刘军全部俘虏，但尉迟恭和寻相又突围逃出。

李世民回到柏壁，仍然坚守不战。如此一直相持到武德三年（620年）四月，宋金刚粮尽，又得知刘武周进攻潞州、浩州接连失利的消息，锐气日尽，果然自行退走了。李世民乘机挥军，衔尾追杀。

原陕州总管从介休城中潜逃到唐营，向李世民报告介休军情。李世民随即急行军到介休。宋金刚率全城2万兵马出西门，背城布下了7里战阵，要决一死战。唐大将李世勣奉命出战挑阵，宋金刚迎战。李世勣刚一接仗，便向后退。宋金刚求胜心切，在后紧赶。不料李世民乘机率精骑从敌阵后杀出，李世勣也返身杀回。宋金刚前后受敌，不想恋战，率轻骑逃出了重围。

李世民以为介休已是空城，唾手可得。不料到达介休城下时，城上旗戟林立，严阵以待。这时唐营中都说尉迟恭骁勇绝伦，李世民更有爱才之心，不想强攻，就命任城王李道宗和宇文士及进城劝降。经两人一再劝说，尉迟恭表示愿意投诚。于是李世民不动干戈，得了介休。他非常高兴，命尉迟恭、寻相为帅府统军，统领他们带来的8000人马。

等尉迟恭、寻相走开，行军元帅长史屈突通担心他们不是真心投诚，劝李世民小心提防。李世民不以为然。

不料没隔多久，寻相等降将都叛变了。将领们认为尉迟恭

也一定要叛变,就把他关了起来。屈突通、殷开山还劝李世民立即杀了尉迟恭,以免后患。李世民命令放了尉迟恭,还把他叫到自己卧室中,赐给他很多金银珠宝,对他说:“大丈夫意气相投,不要以小嫌介意。我终不信谗言来害忠良,您也应体谅。您如一定要走,我就把这些财物送给您作费用,以表曾经共事之情。”尉迟恭大为感服,从此忠心不贰,成了李世民的爱将。

刘武周听说宋金刚兵败,大为恐惧,弃了并州,逃往突厥。宋金刚收集了刘武周的余众,想重新决战,但众人斗志已失,不肯听从。宋金刚无奈,也只好带了百余骑北奔突厥。

刘武周余众在仆射杨元信率领下,出城将李世民迎进了晋阳。原唐俘将唐俭封了晋阳府库,献给了李世民。于是刘武周所占据的河东州县全部归唐。

宋金刚逃到突厥后,突厥看他不起。宋金刚自感没趣,不久又率所随轻骑离开突厥南奔,中途被突厥发现追杀。刘武周在突厥日子也不好过,与部属谋议逃归马邑,伺机东山再起。事情很快泄露,突厥杀了刘武周,与唐通使修好。河东局势从此稳定。李世民于是留下李仲文、唐俭镇守并州,自己离了晋阳,在五月班师回到长安。刘武周盘踞河东,原是悬在长安头上的一把刀,如今大患除去,唐朝可以一意东向,出关与中原群雄争夺天下了。

四、取东都

一出潼关,首先遇到的劲敌是王世充。王世充击败李密以后,还师洛阳,被隋皇泰帝杨侗策授相国,封郑王,总理百事。

王世充掌握了东都大权，在武德二年三月，废了杨侗，自做皇帝，建元开明，国号郑。

但他为人刻薄寡恩，族诛了原瓦岗寨的降将裴仁基，弄得众心日离，瓦岗寨降将秦叔宝、程咬金、罗士信都投降了唐朝。唐朝对东都的内情掌握得很清楚。

听说唐军东出潼关，王世充不敢怠慢，立即传令所属各州镇挑选精兵良将到洛阳集中。他置四镇将军，分守洛阳四门；皇城和洛阳周围要地也都派了兄弟子侄镇守；他自己率3万精兵作为别动队，严阵以待。

半月后，唐军前锋罗士信进围慈涧。慈涧东距洛阳仅二三十里，王世充得报，忙率3万精兵，前往救援。到了慈涧附近，遇到了李世民领着数十轻骑前来侦察。郑军见李世民人少，一拥而上，交枪竞进，团团几层，围住厮杀。唐骑并不惊慌，奋勇冲杀。李世民策马左奔右驰，张弓射箭，敌军应弦而倒。王世充大将燕琪认出李世民，舞枪驰来，要抢头功，也被李世民一箭射毙。唐骑终于杀退郑军，脱险回营。大家杀得血污尘埃满面，面目全非，在营门前被守营士兵拦住不让进去，直到李世民摘下头盔，才被认出，放进营去。

次日，李世民会合前锋罗士信，5万大军进抵慈涧城下。谁知城上不见一名守兵，原来王世充遭遇战吃了小亏以后怯敌，连夜撤回洛阳，将慈涧放弃了。

唐军进驻慈涧，稍事休整，随即调兵遣将，兵分四路，向洛阳进军。大将史万宝自宜阳南下占了伊阙龙门（今洛阳市西南）；刘德威越太行东下包围了河内（今河南沁阳）；王君廓攻克洛口、黄君汉攻克回洛切断王世充的粮道；李世民自率主

力,进屯邙山,连营结寨,步步进逼。在唐军声势的威慑下,王世充的将领们纷纷率部举州投降了唐朝。王世充只有凭着洛阳城墙坚固,物资充足,督众死守。

到武德四年(621年)正月,李世民重新作了部署。他挑选了千余骑精锐,都披皂衣玄甲,分为左右队,命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恭、翟长孙分别统带。每次战斗,他自己也身穿玄甲为他们的先锋。然后移动大营,渡过洛水,到青城宫扎营,逼近洛阳城。王世充见唐军源源渡水,想先发制人,便率2万精兵杀出城来。唐军猝不及防,有点惊恐。李世民镇定自若,从容指挥,稳定了军心。他将精骑队在北邙山布下战阵,自登武陵居高瞭望指挥。派屈突通率5000步兵渡水迎击。

屈突通与王世充刚一接战,就按计纵放烟雾。在漫天烟雾中,李世民率精骑队从邙山冲下,勇不可当。在混战中,李世民与精骑队失散,只有将军丘行恭紧随在后。很快,两人被郑军包围,李世民的坐骑被流箭射中倒毙,幸亏丘行恭救援脱险。丘行恭把自己的战马让给李世民,自己手舞长刀,在马前护卫,跳跃杀敌,终于杀开一条血路,与大队唐军会合。

这一场恶战,从早晨辰时直杀到午时。王世充逃回城中,李世民乘胜追击,直抵洛阳城下,加紧围攻。但城上武器精良,守卫极严,李世民下令从四面攻城,昼夜不停地攻了10多天,都没有成功。反而伤亡不少将士。

如此旷日持久,攻城不下,将士们疲倦不堪,都厌战了。行军总管刘弘基为将士们请求班师。李世民说:“我军大举东来,是为了一劳永逸。现在中原各地已望风服降,只剩下洛阳一座孤城,其势必不能持久。功在垂成,为什么要弃功而去呢!”传

令全军：“洛阳不破，决不回师。敢说班师者斩！”将士们因此不敢再请求撤兵。

就在这时，虎牢关传来警报，说河北窦建德起兵 10 万挺进中原，救援王世充，不日就要到了。

李世民派人送给窦建德一封亲笔信，告诫他王世充反复无常，不值得为他举国动员、耗费巨资，冒破国亡家的危险，劝他自动退兵。窦建德不理睬。如此，两军相持了月余。到四月下旬，李世民派王君廓率轻骑千余，切断了夏军的粮道，又俘虏了夏大将张青特。夏军屡战不利，士气低落下去，将士思归。这时夏国子祭酒凌敬向窦建德献了围魏救赵之计：乘唐军主力集中洛阳，北渡黄河，攻取兵力空虚的怀州、河阳，然后越过太行，进占唐老巢汾、晋，再南下关中，这样郑围自解。窦建德认为有理，准备行动。

五月，李世民获知窦建德的行动计划后，将计就计，将千余匹战马放牧在河中绿洲。果然第二天窦建德就调齐全部人马，从板渚出牛口，列阵 20 余里，擂鼓而进。李世民率轻骑先进，史大奈、秦叔宝、程咬金等将紧随在后，大军鼓勇渡过汜水，迎战夏军。李世民率史大奈、程咬金、秦叔宝等骁将卷着旗冲入夏阵，从夏阵后杀出时，突然展开卷旗，迎风飘扬。夏军见大唐旗帜出现在阵后，顿时大乱，纷纷溃退。窦建德见大势已去，也混在乱军中奔逃。

唐军紧追不舍，生擒了窦建德。

接着，李世民命囚了窦建德及王世充的使者王琬、长孙安世等，其余所有战俘全部遣送回乡，然后拨营起程，回到洛阳。

到了洛阳城下，唐军将囚车绕城示众。

王世充这才看到大局已定，无力挽回，只有投降。

李世民进了洛阳，先申明军纪，命令唐军分守市肆、维持市面，禁止侵掠。然后封存府库，取了部分金帛，赏赐将士；逮捕了王世充手下段达、单雄信、朱粲等十几员大将，押至洛水边斩首；打开牢门，将被王世充关押的无罪士民全部释放；还废了许多道场，勒令各寺庙各留 30 名名僧大德，其余僧尼一概还俗。经此一番措施，战后洛阳的人心安定了下来。

唐朝取了东都，天下震动。王、窦余部纷纷举地投降，窦妻曹氏与窦子世善也举山东之地奉传国玉玺投降了唐朝。于是中原、河北及山东地区全部平定，纳入大唐统治之下。

七月，李世民凯旋回到长安，献俘太庙。李渊诏废王世充为庶人，流放四川；在长安市上斩了窦建德。不久，王世充在流放途中也被仇人所杀。李渊并不惩办凶手，索性下令把王世充的儿子、侄子及所有亲属以谋反的罪名统统处死了。

五、唐平萧铣

唐高祖李渊在平定北方群雄的同时，已开始运筹扫清南方的割据势力，并相机占领了一些战略要点，以备完成统一大业。隋大业十三年（617 年）十一月，李渊初入长安，即命左光禄大夫李孝恭为大使招慰山南（今秦岭以南地区）。李孝恭首先击破朱粲，迫其退走江淮间。不久，李渊另遣邓元珪攻取商洛（今陕西省商南县）、南阳（今河南南阳县），派马元规进图荆襄，改派李孝恭自金州（今陕西省安康县西北）越大巴山至巴中（今四川省宣汉，平昌县）以略取巴州（今四川省重庆地区），

又增遣詹俊攻夺成都。至唐武德二年(619年),秦凉巴蜀之地已尽在唐的囊括之中。这就为唐顺流而下平掉南方最大的割据势力——萧铣,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萧铣是南朝梁室的后裔,原为隋罗川令,隋末大业十三年(617年),隋巴陵校尉董景珍、雷世猛等起兵反隋,遂推萧铣为盟主。唐武德元年(618年)四月,当李渊等正逐鹿中原之际,萧铣又趁机在南方扩展势力,自称梁帝,封功臣董景珍等7人为王,攻取南郡,徙都陵凌(今湖北),势力范围达到东起九江(今属江西),西抵三峡,北临汉水,南达岭南的广大地区,拥兵40余万。

唐武德二年(619年),李渊授李孝恭为信州总管,后又遣幕府李靖协助李孝恭以图萧铣。李靖至峡州(今湖北宜昌),被萧兵所阻,久不得进,险被李渊严责处死。同年九月,萧铣欲进取巴蜀,遣部将杨道生攻峡州,被诏峡州刺史许绍击退。萧军进攻受阻,反丧失八州、五镇,遂在峡州东之安蜀城与荆门城(今湖北枝城西北)据险与唐军成对峙之势。萧铣猜忌诸将,用罢兵营农的办法以削弱诸将兵权,结果自毁长城、兵势更弱。

唐武德四年,李靖乘萧铣内清之势,献攻取萧铣十策,李孝恭转奏李渊,得到赞许。二月,李渊命李孝恭为夔州总管、造舟船、习水战,积极备战以备南图。九月,李渊诏发巴蜀兵,以赵郡王李孝恭为荆湘道行军总管,李靖摄行军长史,统12总管,自夔州(今四川奉节)顺流而下,分军三道南进:以庐江王李瑒为荆郢道行军元帅出襄州(今湖北省襄阳),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今湖南省沅陵县)趋越陵(今湖南省常德市),以黄州总管周法明出夏口(今汉口),三路军共同指向江陵,对江

陵形成合围之势。至此，唐平萧铣的大规模的战役拉开了序幕。

唐军大规模进攻之时，正值秋汛，江水泛涨。萧铣认为三峡路险，唐军必不能进，故麻痹而不为备。唐军诸将也有俟水落时再进军之议。但李靖坚定地指出：“兵贵神速，机不可失。今兵始集，铣尚未知。若乘水涨之势，倏忽抵其城下，掩其不备，此必成擒。”李孝恭听从李靖的正确主张，率战舰 2000 余艘东下，果然乘虚连克荆门、宜都（均在今湖北省宜都县西北）两镇，直抵夷陵（今湖北省宜昌市）。萧铣这才慌了手脚，急命屯驻靖江（今宜都北清江入江口）口的文士弘率精兵数万驰援。李孝恭欲出战迎敌，李靖认为文士弘兵锋正锐，不宜马上与其正面交锋，建议且泊南岸，待其气衰，然后相机图之，李孝恭不听。十月初九，李孝恭留李靖守营，自率兵击文士弘，果遭失利，奔于南岸。文士弘军纷纷弃舟抢获战利品，军阵大乱。李靖乘机挥师出击，反败为胜，大破文士弘军，斩杀及溺死者万余众，获舟船 400 余艘，又乘胜追至枝城以东的百里洲，再予文士弘军以重创，文士弘于是败走北江。

于是李靖乘胜率轻兵 5000 为先导直逼江陵城下，李孝恭在后督军继进。此时，萧铣由于实行“罢兵营农”政策，仅留宿卫数千人在江陵，当他听到唐兵压境、文士弘战败消息后，大为恐慌，束手无策。“仓猝征兵，皆在江、岭之外，道途阻远，不能遽集，乃悉见兵出拒战。”唐军包围江陵，先攻破其外围水城，缴获大批舟船。李靖建议孝恭将所得船只尽散于江中。诸将皆不解为什么好不容易获取的敌舰而弃之不用。李靖说：“萧铣之地，南出岭表，东距洞庭，吾悬军深入，若攻城未拔，援

军四集，吾表里受敌，进退不获，虽有舟楫，又有什么用处呢？现在我们把这些舟舰放弃掉，使之塞江而下，萧铣的援兵见到，一定以为江陵已被我们攻破了，不敢轻易前进，待到他们侦察清楚，一来一往至少也要耽搁十天半月，那时我们早已破江陵了。”果然不出李靖所料，萧铣在各地的援兵看到顺流而下的船只以为江陵必已城破，顿时丧失斗志，踌躇不敢驰援。萧铣见水城已破，援兵又没有指望，无力再战，遂于十月廿二日率群臣出降。后数日，已聚集在巴陵的10余万援军，闻江陵城破，相继解甲投降了唐军。萧军主力遂已瓦解。唐军进入江陵后，李孝恭接受萧铣降官岑文本的建议，严明军纪，禁止杀掠，实行宽大政策，南方州县闻之，均望风归附。奉萧铣之命开拓岭表的刘泊，首先以端（今广东高要县）、康（今广东省德庆县）、封（今广东省封川县）、新（今广东省新兴县）、宋（今广东四会县）、泂（今广东省罗定县东）等州降唐，十一月，桂州（今广西桂林）总官李袭志亦降唐。十二月，居住昆弥（今云南昆明、大理、丽江县）之间的蛮族，遣使请求归附，整个岭南遂告平定。其后，唐又乘胜平定林士弘等割据势力，全国统一在望了。

六、北征刘黑闥

王世充在流放途中被杀、全家族诛和他的文武大臣被杀的消息传出以后，散布在河北、山东等地的窦建德的故将都惶惶不安，四出亡命。李渊不放心他们，让范愿、董康买、曹湛、高雅贤等进京。范愿先听到风声，就约了众将商议对策，说：“王

世充已经投降了，他帐下大臣段达、骁将单雄信等还是统统被杀。我们如果到长安去，一定不免一死。夏王俘了李神通，待以客礼，可唐擒了夏王，就加杀害。我们是百战余生，如不起兵报仇，有何面目去见天下英雄！”决定重举义旗。

范愿说：“汉东公刘黑闥果敢神勇、多奇略、宽仁容众，要重集夏王旧部，非他不可。”刘黑闥原为瓦岗寨裨将，后归窦建德，被封为汉东郡公，这时就在漳南务农。众人把反唐大计告诉刘黑闥，请他担任主帅。刘黑闥大喜，一口应允，当即命人宰牛共饮，定下行动计划。

各人按计分头活动，召集了旧部 100 多人。武德四年（621 年）七月二十九日，刘黑闥率领众人，突然袭取了漳南县城。八月，南下，攻陷鄆县（今山东夏津）。贝州刺史戴元祥、魏州刺史权威合兵来夺，都被刘黑闥击败战死，所带来军械粮草都成了刘军的战利品。其余窦建德的旧部闻讯都来投奔刘黑闥，人数增至 2000 人。于是刘黑闥在漳南设坛，祭奠窦建德，宣告反唐，自称大将军。

经过许多征战，刘黑闥进占洺州，接着又下相州、陷黎州、进卫州。不过半年，便全部恢复了窦建德的旧境。他又遣使北上，联络了突厥颉利可汗。突厥派骑兵增援，刘军势炎气盛。唐各地守将秦武通、陈君宾、程振都闻风丧胆，从河北逃回了长安。三天内，邢州、赵州、魏州、莘州就相继被刘黑闥占领。

武德五年（622 年）正月，刘黑闥自称汉东王，改元天造，定都洺州，封范愿为左仆射、董康买为兵部尚书、高雅贤为右将军，窦建德时的文官武将统统官复原位，一切行政都按夏王建制。如此，重又崛起了与唐对峙的河北政权。

李渊对此感到坐立不安，只得再派秦王世民和齐王元吉兴兵渡河北征。李世民统率大军，鼓勇而进，直趋相州（治所今河北临漳邺镇）。刘黑闥见唐军锐气正盛，弃了相州，退保洺州。李世民日夜兼程，推进到洺州东南 35 里的肥乡，在洺河南岸布下阵营。幽州总管罗艺也复率众数万南下，从北面来攻刘黑闥。刘黑闥留兵万人，交范愿指挥，镇守洺州，自己率精骑出北门，夜宿洺州城北 20 里的沙河，准备迎战罗艺。

就在这天晚上，唐将程名振奉李世民密计，将 60 个大鼓运到洺州城西二里堤上。夜阑人静，突然鼓声齐作，震得城墙和大地都颤动起来。守城刘军以为唐军大举来攻，惊恐失措，范愿急忙派人连夜出城，驰告刘黑闥。

刘黑闥闻报大惊，匆忙返回洺州，另派兄弟刘十善与行台张君立领兵 1 万迎击罗艺。刘十善、张君立领兵北驰 230 里，在鼓城（今河北晋县）截住罗艺。次日，就在徐河边上大战，刘军大败，伤亡 8000，两将逃回了洺州。洺水（今河北曲周）守将李去惑见刘军受挫，腹背受敌，举城投降了唐军。李世民大喜，派王君廓协助李去惑共守洺水城。

二月，刘黑闥引兵东攻洺水，在列人（今河北肥乡东北）被秦叔宝率 5000 骑截住大战。厮杀到黄昏，秦叔宝力怯而退。当夜三更，刘黑闥进军抵达洺水城东，掘壕作栅。次日一早，下令攻城。洺水城四面都是水，阔 50 步，深三四尺，一时难以攻下。刘黑闥命士兵从东西两隅填柴运土，修筑甬道，昼夜不息。

李世民见洺水吃紧，三次派兵去支援，都被击退。李世民恐怕王君廓守不住，召集诸将商议。少年将军罗士信自告奋

勇，愿去死守。

刘黑闥见城中换了守将，昼夜不停地急攻，攻了八日八夜都被罗士信杀退。到第九天，城上木石俱尽。罗士信也被叛兵抓住做了俘虏。刘黑闥爱他少年骁勇，劝他投降。罗士信词色不屈而被杀，年仅 20 岁。

见洺水失守，李世民恐再战失利，就拔营撤离。三月，他才与罗艺合兵，重新在洺水城南列营进逼，伺机攻城。刘黑闥恃勇挑战，李世民坚壁不出。刘军防备逐渐松懈。正好这时高雅贤升官为左仆射，在军中置酒欢会。李世民得报，即命李世勣引兵前去袭营。高雅贤带醉上马，单骑冲出，被唐将刺中落马。幸亏左右赶到救护，但还未回到营中就死了。与此同时，刘军从冀、贝、沧、瀛诸州筹集了粮草，水陆并进洺州，途中也被唐将程名振率奇兵截击，粮船被凿沉、粮车被烧毁、粮道被断绝。刘军连续失利，锐气大减，暂停进攻。

到三月底，刘黑闥因粮草将尽，想速战速决，向李世勣营地发起突然袭击。李世民得报，亲率兵救援，从背后夹击刘黑闥。刘黑闥见李世民从后面掩杀过来，迅速指挥部众，掉转马头，反将李世军团团围住。幸亏尉迟恭带领一队勇士及时赶到，杀入重围，杀开一条血路，护卫着李世民脱离了险境。

李世民回到大营，估计刘军粮草已尽，必来决战，便暗中派人在洺河上流筑堰堵住河水，密令在双方交战时决堰放水。不久，刘黑闥果然率 2 万步骑渡河南来，逼近唐营。李世民自率精骑，破了刘军前锋骑兵，乘胜驰入刘军后队，刘黑闥率军死战。两军自中午杀到黄昏，刘黑闥渐渐支持不住，与部将王小胡先退，余众仍在奋战。这时洺河守兵按令决堰，顷刻

洺水暴涨，汹涌而至，泛滥两岸，深达丈余。唐军乘势追杀，刘军溃不成军，被杀万余，溺死数千人，只有刘黑闥与范愿带了200余骑侥幸逃走，投奔突厥去了。

接着，李世民从河北南下，渡过黄河，进军曹州（治所今山东曹县西北），征伐与刘黑闥联运的徐圆朗。不久，他奉诏入朝，把征伐的事交给了齐王元吉。

可就在秦王南征曹州时，刘黑闥引了颉利可汗支援他的数万突厥骑兵南下，在新城（今山西大同东北）围杀了定襄王李大恩。接着，长驱南下，占了定州。亡命的董康买等故将重又聚兵响应。这时，李世民已班师在京。负责河北、山东军事的齐王元吉因战事连续失利而怯敌，不敢进讨。李渊想仍命秦王第三次北征。

这时太子中允王珪、洗马魏征见秦王功高，威胁太子地位，就劝说太子李建成：“秦王功盖天下，威震四海，殿下不建大功，何以自安？应当主动请求出征刘黑闥，建立功名，结纳山东英俊，才可自安。”太子依计请战。于是李渊诏太子建成为帅，出征河北。

十一月，李建成率大军北征，与齐王会合，向魏州（治所今河北大名东北）。这时刘黑闥正久攻不下，得报唐大军来援，立即引兵来攻。李建成避其锋芒，坚守不战。魏征献计，劝李建成把过去的囚俘统统释放，给他们生路，来离散刘军的军心。李建成依计而行。果然，等到刘黑闥粮尽，他的部众不断逃亡，有的士兵还缚了他们的官长投奔唐营。

刘黑闥见人心日离，便趁一个月昏天黑的晚上，连夜拔营北逃。逃到馆陶（今河北馆陶）永济桥，桥还没有架好，无法渡

河。于是给李建成、元吉的大军追上掩杀过来。刘黑闥背水为阵，拚死抵抗，一面亲自督兵加速架桥。等桥一架好，刘黑闥迫不及待策马奔过桥西。见主帅一逃，将士丧失斗志，立即溃不成军。唐军乘势蜂拥过桥追袭，不料才过了千余骑，大桥忽然崩塌，大军被隔在河东，只好眼睁睁看着刘黑闥带着残骑数百逃去了。

但过桥的千余骑在刘弘基的率领下，尾追不舍。刘黑闥不敢驻鞍休息，日夜兼程，奔到饶阳，从骑已仅存兄弟刘十善等百余。饶州刺史诸葛德威开城出迎，刘黑闥心存顾虑，不肯入城，经不住德威的涕泣坚请，才入城。诸葛德威给他们送来好酒好菜，他们在城边的商业区中，解鞍下马，就地铺设坐食。正当他们狼吞虎咽时，诸葛德威突然带兵将他们团团围住，刘黑闥等只好束手就擒。诸葛德威就缚了刘黑闥等献给李建成，举城投降了唐军。李建成下令杀了刘黑闥、刘十善。

二月，徐圆朗也被李神通和李世勣击败，山穷水尽，带了数骑弃城夜逃，在途中被人所杀。于是河北、山东复归唐室统治。

七、南讨辅公柝

河北的刘黑闥被扫平半年后，原已归唐的江南局势出现反复，淮南道行台仆射辅公柝起兵，在丹杨（今江苏丹阳）称帝，建立宋国，并与洪州（今江西南昌）总管张善安连兵，重新雄踞江南，与大唐南北对峙。这时，天下也只有江南义军与唐为敌了。

辅公 祐原是隋末江南最大的起义军杜伏威部的副帅。李世民围攻东都王世充时，派使者招降了杜伏威。李渊封杜伏威为吴王，任东南道行台尚书令、江淮以南安抚大使、上柱国；封辅公 祐为舒国公，任淮南道行台尚书左仆射。两人奉职，并灭了占据杭州的李子通、占据歙州（今安徽歙县）的汪华等江南农民起义军，将淮南、江南直到海边、岭南的大片土地置于他们的辖据之下。武德五年七月，李世民征伐刘黑闥、徐圆朗，一路取胜，声威播扬，也震动了江淮。杜伏威害怕自己再雄据江南，也要被唐征讨，就主动带了养子、左将军阚棱到长安朝见唐高祖，表示诚意归唐。李渊任命他为太子太保，仍兼旧职，留在长安；阚棱也受职左领军将军；辅公 祐则留守丹杨。

辅公 祐对杜伏威对自己外示尊崇、阴夺兵权的做法早就不满，于是不顾杜伏威还在长安，决意等待时机，重举义旗。到武德六年八月，辅公 祐缢杀了王雄诞，宣称杜伏威被扣在长安不能回江南，寄书命令大家起义。他称帝建国、设置百官，命左游仙为兵部尚书、东南道大使、越州总管。张善安原也是农民起义军将领，占据洪州，后来举地降唐，任洪州总管，这时也举兵响应。辅公 祐任命张善安为西南道大行台，仍据守洪州。

接着，辅公 祐大修兵甲，运粮储积、调兵遣将，准备与唐大干一场。

李渊接报，马上部署。辅公 祐起兵的十几天后，襄州道行台仆射、赵郡王李孝恭率领水军直下江州（今江西九江），岭南道大使李靖督领交、广、泉、桂 4 州兵北上宣州（今安徽宣城），怀州总管黄君汉从谯、亳率军南下，齐州总管李世勣引兵从淮、泗南下，四路水陆大军奉诏围剿辅公 祐。辅公 祐主动出

击，遣将领徐绍宗进攻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西），陈政通进攻寿州（今安徽寿县）。两州报急，李渊把秦王李世民从防备突厥的北线调回，任命为江州道行军元帅，负责部署征讨辅公祏。

唐军重新部署，决定先除掉张善安，翦除辅公祏羽翼，控制长江中游。安抚使李大亮奉命攻打洪州，与张善安隔涧对阵相语。这时辅公祏将领陈当世在猷州黄沙（今安徽泾县）大败，张善安胆怯畏敌，在阵前听了李大亮一番晓以祸福利害的劝说便动摇了，他说：“善安本来没有反心，是将士们促成的。但我现在投降，恐怕免不了死罪。”李大亮隔水高声说：“张总管有降心，就与我是一家人了。”说罢，单骑渡水驰入张善安的阵中，拉着张善安的手亲切说话，表示出一片诚意。张善安大喜，就答应投降，带了数十骑到唐营。不料在营门外，随骑被阻，只让张善安一人进营。张善安不知是计，就一人进营。谈了一阵子话，正要告辞。李大亮忽然变脸，下令武士把张善安抓了起来。

在营门外的从骑闻变，急忙回到张善安大营报告。全军大怒，倾营来攻唐军。李大亮派人宣话，离间张善安与他的将领关系，说：“我没有扣留张总管，是他赤心归国，对我说他怕还营后受将士挟制，自己要留下的。”张善安的将领们信以为真，果然大骂张善安出卖义军，愤然散退。李大亮乘机追杀，斩获很多，瓦解了洪州义军。接着，李大亮把张善安护送到长安。不久，张善安被杀。

张善安部失败以后，唐军便集中兵力围剿辅公祏。武德七年（624年）春，李孝恭破枞阳、宣州鹊头镇、芜湖，夺取梁山等三镇。李大亮也在猷州战胜辅公祏。针对着唐军步步进逼，

辅公祏在宣州当涂(今安徽当涂)横江筑成防线,由将领冯慧亮、陈当世率水军 3 万扎防在县西南长江东岸的博望山,陈正道、徐绍宗率步骑 3 万屯防在县东南的青林山,在博望山西的梁山夹江拉起铁索封锁江面,来防止唐军沿江东下。并在西岸沿江筑成连绵 10 余里的城墙,又壁垒相结。

这时,李孝恭和李靖率水师到达舒州(今安徽潜山)集结。李世勣也率步兵 1 万渡过淮河,到达硖石(今安徽寿县西北),从北面威胁辅公祏。大敌当前,冯慧亮等将领坚壁不战。李孝恭也不正面交战,只是派一支奇兵切断了冯军的粮道。冯军发生粮荒,冯慧亮遣军进逼李孝恭大营。

李孝恭采纳了李靖的作战方针。他组织老弱残兵当先锋进攻义军,把精兵安排在后面,结阵待命。先锋部队和冯军一接仗,就败下阵来。义军不知是计,出兵追击,追了几里,就中了唐军精兵的埋伏,一场激战,伤亡惨重。

杜伏威的养子阚陵也随军南征,这时突然出现在阵前。他脱下头盔,对江南义军说:“你们不认识我了吗?怎么敢来与我作战!”义军中很多原是阚陵的部下,一见到阚陵,听了煽惑,都不想打了,有的还投身下拜。就在这义军混乱的时机,李孝恭、李靖率军大肆驰杀,乘胜攻下了博望山、青林山义军防地,义军伤亡万余人。

接着,李靖率兵先驰,直抵丹杨。辅公祏猝不及防,弃城东走,李靖一路追杀。辅公祏逃到后来,只剩下心腹数十人,终于在武康(今浙江吴兴)被当地地主武装俘虏,解送到丹杨。辅公祏在丹杨英勇就义。李孝恭又捕杀了坚决反抗的义军将领。不久,又以谋反的罪名杀了阚陵。杜伏威在这年二月死去。

江南义军彻底瓦解，江南全部平定。就在这一年唐朝统一了天下。

第二节 唐王朝巩固统治的政治经济措施

一、均田制与租庸调制

唐初，在多年战乱之后，社会经济破坏严重，人民流离失所，政府财政困难。整顿田制和赋税制度，成为安抚流亡、恢复经济、保证财政收入、巩固政权的当务之急。

唐高祖在武德元年（618 年）十二月下令实行给内外官职分田制度：京官一品 12 顷，二品 10 顷，三品 9 顷，四品 7 顷，六品 4 顷，七品 3 顷 50 亩，八品 2 顷 50 亩，九品 2 顷；雍州牧及外州官二品 20 顷，三品 10 顷，四品 8 顷，五品 5 顷，七品 4 顷，八品 3 顷，九品 2 顷 50 亩。

武德二年（619 年），二月十四日，高祖下令征收租税：每丁租 2 石，绢 2 丈，绵 3 两。

武德七年（624 年），三月二十九日，唐政府首次颁行均田及赋税制度，其内容是：凡天下丁男给田 1 顷，笃疾废疾给 40 亩，寡妻妾 30 亩（若为户者 20 亩）。老男亦给田 40 亩。所受田以 20 亩为永业田，其余为口分田。受田人亡故，他名下的永

业田转授给他的承户人，而口分田则由官府收回另行授给他人。是为均田之制。赋税制度是：每丁岁 8 粟 2 石；调则随乡土所产：綾绢絁各 2 丈，布加 $1/5$ ；输綾绢絁者兼调绵 3 两，输布者麻 3 斤。凡丁岁役二旬，若不役则收其庸，每日 3 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通正役不过 50 日。若夷獠之户皆从半税。凡水旱虫伤为灾，十分损四以上免租，损六以上免(租)调，损七以上课役俱免。

武德田令和赋役令基本上继承了隋大业的制度，并明确了不把一般妇女和奴婢、耕牛作为授田及课役的对象。武德田令中没有一般妇女受田的内容，这在现存可见的均田制资料中是最早的。

武德七年(624 年)田令还包括给官永业田和给道士田的内容。受官永业田的限额是：亲王 100 顷，职事官一品 60 顷，郡王及职事官从一品 50 顷，国公及职事官正二品 40 顷，郡公及职事官从二品 35 顷，县公及职事官正三品 25 顷，职事官从三品 20 顷，侯及职事官正四品 12 顷，伯及职事官从四品 10 顷，子及职事官正五品 8 顷，男及积事官从五品 5 顷，职事官六品七品 2 顷 50 亩，八品九品 2 顷；勋官上柱国 30 顷，柱国 25 顷，上护军 20 顷，护军 15 顷，上轻骑都尉 10 顷，轻骑都尉 7 顷，上骑都尉 6 顷，骑都尉 4 顷，骁骑尉飞骑尉 80 亩，云骑尉武骑尉 60 亩；散官五品以上受田限额与职事官相同。五品以上各类官须在宽乡受官永业田，六品以下的则在本乡受之。道士给田 30 亩，女官、僧尼可能与之相同。

武德田令以本地耕地可以满足给田定额的地方为宽乡，反之则为狭乡。在宽乡可以按照全额受田，在狭乡则要减半。

同时,对于耕种一年休耕一年的瘠薄耕地加倍给授,对于宽乡的耕种一年休耕二年的耕地则再加一倍给授。

均田制是唐前期的基本土地制度,而与之伴行的租庸调制则是该期的基本赋税制度。均田的目的是要向得受田者收取赋税劳役。从武德时起的百余年中,唐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自租庸调。

唐政府曾在永徽二年(651年)、太极元年(712年)、开元七年(719年)、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多次修令,但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基本内容没有变动。而职分田和官永业田则有多次变更。

唐初,大量土地荒芜,封建国家有大批土地可以用于给授各类应受田者。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编户的增加,均田制的实施主要体现在永业田的继承、口分田的退还与给授,而不是按限额给授,即所谓“因田之在民者而均之”。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唐代欠田簿、退田簿、给田簿,以及敦煌文书中的唐代户籍簿等历史档案资料记载了封建国家依均田制的规定进行耕地使用权管理的情况,充分证明了均田制在唐玄宗朝及以前的唐代前、中期确实是实施了。封建国家尽量收回老、死、逃、绝户的口分田、永业田,将其重新分配给具备受田条件的人使用,以把更多的小自耕农束缚在土地上,使自己有较为稳定的财政收入和力役、兵役的来源。但是,封建国家更要维护统治阶级特别是其中、上层的特权,包括占有大量土地的特权。在唐代均田制下,官吏占有大额的官永业田、职田,皇帝还不时把巨额田产赏赐给勋戚大臣。地主阶级用种种手段侵吞兼并田产,逾限占田,政府很少去认真追究。这样,土地逐渐向

地主集中,政府能用于给授的耕地越来越少,根本不可能按额授田。受田定额只能是占田的最高限额,已受田数量与应受田额度之间无必然联系,均田使农民自己买的田地也被纳入其已受田数额之中,成为唐代均田制实施中的特点。

尽管如此,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是适应唐前期社会生产力、生产方式状况的,因而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直到均田制末期的天宝年间(8世纪中期),租庸调制的收入仍然占唐政府全部财政收入的60%左右,对巩固中央集权国家作用巨大。

随着地主经济的逐渐成熟和唐朝统治集团的不断腐败,土地兼并日益加剧。到了开元初年(8世纪20年代),土地兼并使大量均田农民破产逃亡,唐政府不得不一方面实行括户以防止租庸调收入过快下滑,另一方面则反复强调官僚贵族的占田限额以减缓土地兼并的速度。但这些都非治本之计。从高宗朝起,政府就日益重视户税和地税,使之由补充租庸调发展到与之并行。天宝年间,均田制迅速弛坏,租庸调制随之下落。安史之乱及随后的河北藩镇割据终于使实行了300年的均田制、租调制退出了历史舞台,让位给租佃制和以户税地税为先导的、按财产田亩计征的两税法。

二、科举制度的完备

唐代科举制在隋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科举分常举和制举二种。制举主要试策,由皇帝临时定下名目考选。制举名目繁多,有直言极谏科、贤良方正科、文辞清丽科、博学通艺

科、武足安边科、军谋越众科等百数十种。这是一种网罗非常人材的考试，平常人和官吏都可以应考。考中者，原是官吏的立即升迁，未入仕的由吏部授予官职。唐文宗以后，制举始实际停废。常举每年举行考试，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唐初，秀才科等级最高，唐太宗以后，士人趋向开始转向明经和进士二科，尤以进士科为重。在贞观 23 年中，进士共 205 人，在高宗、武则天统治的 55 年中，据不完全的记载，进士有 1000 余人，平均每年录取的人数较贞观时增加 1 倍以上。玄宗以后，进士科的地位更加突出，官僚虽位极人臣，但如果不是进士科出身，“终不为美”。

各科考试内容不同。明经主要试贴经，即选择考生所习之经掩其两端，中间仅露一行，用纸帖遮盖部分字句，测试其背诵经书的能力。这种考试比较容易。进士科在隋代仅试策，唐太宗时曾加试经史。唐高宗末年又加试诗赋杂文。天宝年间始专试诗赋。考试成绩分上中下三等，上等、中等为及第，下等即落第。每年应考者或八九百人或一二千人不等，能及第者少则 10 余人，多则 30 余人。由于考生多而录取名额少，所以考中进士非常不易。一旦及第便名闻士林，号称“登龙门”。明法科试律令，明算试《九章》、《夏侯阳》、《周髀》等数学著作。明书科试《说文》、《字林》等字书。这三种科目是为选择专门人才而设，考生被录取后只能在和专业有关的机构任职。秀才科仅试策，取消了隋代加试的杂文。由于录取标准异常严格，及第者屈指可数。此科渐渐成为一种虚悬的科目。武则天长安二年（702 年），又创立武举科。州县以下习艺者每年被推举至兵部课试。所试科目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等，又有马枪、

翹关、负重、身材之选。考试通过者，兵部即除官给禄。唐代武举亦属常举，但不重要。

参加科考者有二种来源。一种是国子监和州县学的生徒，由学馆荐举至尚书省参加考试。另一种是不在学馆，直接来自州县者，称为乡贡。他们首先自己在州县报名，即所谓“怀牒自列于州县”，经州县考试合格后，再举送至尚书省参加考试。允许考生自由报考，这是唐代科举制较之隋代更加完备的一个重要标志。

考官在不同时期也有变化。唐初由吏部的考功郎中主持科考，贞观以后，由考功员外郎主持。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玄宗以员外郎位望较轻，遂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科考，后成为定制。开元中，礼部考试通过后送中书、门下详覆。宰相如不同意，可以改动。详覆之制屡兴屡废。礼部考试是取得出身资格的考试，考中者仅取得进士及第或明经及第的资格，尚不能正式做官，只有再通过吏部铨试，才能释褐除官，故吏部试亦称“释褐试”。吏部铨选的主要标准是身、言、书、判。身指体貌丰伟，言指言辞辨正，书指书法遒美，判指文理优长。

唐穆宗、敬宗都曾下令科考及第者免徭役，唐武宗明确规定进士科出身的称“衣冠户”，有免除差科色役的特权。

礼部考试一般是正月考试，二月发榜。及第进士称主考官为“座主”，自称“门生”。同时及第者称“同年”。

唐朝入仕的途径除科举制外，还有门荫和流外入流。唐初，由此二途入仕的官员远比科举出身的人多。以后进士出身的宰相逐渐增加，到德宗、宪宗之际，由科举入仕的宰相及高级官吏才占了多数。科举制成为向地主政权输送官吏的主要

渠道。这是选官制度的一个进步,在削弱门阀士族等级特权、扩大唐政权的社会基础,提高官吏文化水平诸方面,科举制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唐以后,历经宋元至明清,虽考试内容、方法有所变化,但科举制度本身一直相沿不替。

科举制在实行中也存在某些弊端,曾出现冒名顶替、漏泄考题等舞弊现象。尤为严重的是座主、门生、同年结为朋党,相互援引,宦风由此败坏。牛李竞争中,牛党领袖李宗闵和牛僧孺就是同年进士,牛党骨干令狐楚、萧俛与皇甫湜亦有同年之谊。他们主张选用官吏以词彩居先,其党人经常“为举选人驰走取科第,占员阙”。他们通过进士科举结成势力雄厚的私党,往往一门父子兄弟都从进士起家,住居显要,成为新兴的进士贵族。由此,科举制为中小地主广开仕途的作用也大大降低。这些弊端到宋代因糊名、誊录的新规定的实施而得到克服。

三、中央官制和地方官制的完备

宰相制度 我国古代的国家机构,至六朝时期,政府组织系统紊乱,国无主宰,政出多门,机关虚设,官冗吏杂,权责不专。公元581年,隋文帝即位之后,立即废除了北周模仿《周官》所置的六官体制,建立了以三省六部为核心的中央政府新体制。

在隋唐时期的官僚机构中,官品最高的是所谓“三师”与“三公”。三师即太师、太傅、太保,正一品,“训导之官,天子所师法,大抵无所统职,然非道德崇重,则不居其位。无其人,则

阙之”(《旧唐书·职官志》)。三公即太尉、司徒、司空,也都是正一品,“论道之官也。盖以佐天子理阴阳,平邦国,无所不统,故不以一职名其官”(同上)。三师与三公都是名位高而无实权的虚职,不置僚属。这是皇帝对权重的功臣的一种巧妙安排,或是皇帝选拔最有经验的亲信充当辅佐的荣誉职称。

隋文帝代周以后,分割宰相的权力,确立三省长官并为宰相的体制。尚书省的令、仆射,门下省的纳言,内史省的监、令,都称为宰要。但实际上尚书令很少授人(仅杨素),内史监署,置未久即罢,所以隋代实为宰相的是尚书仆射、纳言和内史令。有时以他官加“参掌机事”行宰相之职、三省并相,又有所分工,即内史省职旨,门下省审议,尚书省执行。

唐初,沿袭隋制。高祖武德三年(620),改纳言为侍中,改内史省曰中书省,内史令曰中书令(《旧唐书·职官志》),以左、右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并为宰相。唐代相府机构变易之繁,宰相名称之多,为前代所少有。唐初,三省机关为相计,“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此宰相职也”(《新唐书·百官志》)。其后则屡经变易,名称繁多。不过,变化虽多,仍以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为常制。省的名称一变,省的长官官名一般也随之变化。终唐之世,中书令、侍中,以及改称的内史令、纳言、右相、左相、紫微令、黄门监等,均为宰相之任。高宗以后,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或“同中书门下三品”行宰相事。即令是三省长官、本宰相,如不加“同三品”、“同平章事”之号者,反不得入政事堂议政,而失去宰相之地位。

唐代宰相制度较之秦汉又有新的发展,在巩固唐朝政治

统治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首先,唐代宰相选拔制度的基本特点是任人唯贤。唐初,主要通过战功来选拔宰相。立军功之后,又表现出经国治世之才,有较高的政治威望,方可选入宰相集团。从武则天统治直到终唐之世,则以科举制特别是进士科作为选拔宰相的主要途径。科举制度完善之后,士人取得了进士出身,还要经过极为严格的吏部考试,方能做官。此外,唐制还规定,“凡官,不历州、县不拟台省”(《新唐书·选举志下》),不经过州、县官的锻炼考验,是不能到台省任要职的,不到台省任职便无法进入宰相集团;而且,宰相任职以后,和一般五品以上及台省官吏一样必须经过三考。三考即指3年任期,即使是宰相也不能例外。宰相考课的标准极严,要求很高。这一系列严格规定,保证入选宰相必须经过州、县及台省职位的锻炼,具备决断军国大事的才能和智慧,具备一定的文化或进士出身,任职后又能经受住皇帝“三考”的考验,能够保证最优秀的政治人才进入宰相机构,成为皇帝的有力辅佐。在专制制度下,皇权世袭、皇帝并不一定具备很高的政治才能,如果选拔宰相时能做到选贤任能,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统治集团的政治素质,弥补皇帝世袭与专权必然带来的统治者昏庸无能的弊病。

其次,宰相享有很大的权力,主要是参与军国大事及决定官吏任免甚至是皇位断承人选的人事权力。参加军国大政方针,是唐代宰相最重要的职权。唐代把相权分割成几个机关,实行宰相群体集体负责制,使宰相们互相监督,互相制约。遇有军国大事,便在政事堂召开宰相联席会议,决定政府一切最高政令。皇帝的一切诏、敕、制书,均需在政事堂会议讨论研

究,然后决定是否颁布,如果同意颁布,也需要宰相副署,并盖上“中书门下之印”才能生效。否则,就是违制,中央和地方各部门就可以不执行。唐代君王比较严格地遵守了这一制度,从而使唐代宰相制度在中国政治史上别具一格,卓有成效。唐代300年间,国家大政方针及法令,都是由宰相参与制定并实施的。唐太宗经常向宰相询问建国、施政、安民的良方。《贞观政要》详细记载了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名臣向唐太宗的频频进谏,突出反映了宰相在决定治国原则与方针政策上的举足轻重的作用。武则天虽然残忍、专制,但在决定国家大政方针时,亦不敢轻易越过中书门下宰相这一级。此外,如果皇帝决策错误,宰相也能谏止。

选拔官吏历来是政治生活的大事,唐代亦将这一大权委诸宰相。唐代主要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吏,考选规则及取士考榜等,均由宰相复核改定;对内外官的除授委任,宰相也有很大的提名与引荐权。贞观年间,四品以上官均由宰相提名奏上,皇帝同意则册授、制授。另外,宰相也参与对官吏的考核。唐代考官制度即根据国家规定的“四善”、“二十七最”对受考官吏进行考核。考核之日,皇帝为最高主考官,但须派宰相二人充任内外官考使。中书省的中书舍人和门下省的给事中为临考使。官吏的调整、调动及黜陟、奖惩,均由考试决定。文武官员如有失职及犯法之事,则由宰相拟议其处分、或免或降。宰相在人事上的职权,除了“择百官、进贤能”外,还能参与皇帝、皇后及太子的废立等大事。皇太子册立,除后期为宦官所操纵外,一般都由皇帝和宰相共同议定。

唐代宰相制度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实行集体负责制。

唐朝的宰相不同于秦汉，多是他官兼职，或者是宰相兼领他职，所以没有独立的办公机构——相府；它是集体负责制，主要任务是帮助皇帝议决军国大政，或者拟订皇朝政令，自己不能向政权的其它部门发号施令。肃宗时，宰相办公采取轮流值班的制度，宰相们在政事堂轮流值班执事，一般公务，值班宰相代表宰相集体处理，可以代签诸宰相的名字，盖上政事堂印；凡遇军国大事，则历抵诸相府第，约集大家集体议决平章。议决之后，经宰相联合署签，再盖上政事堂大印，方才有效。

政事堂制度 政事堂制度是宰相制度一项重要内容。政事堂创设于隋朝（《唐会要·中书侍郎》），最初并不是一个权力机关，而是宰相们议事决策，拟订重大诏令的地方。经过100年左右的漫长岁月，政事堂议事发展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旧唐书·职官志》载：“旧制，宰相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永淳二年（683）七月，中书令裴炎以中书执政事笔，遂移政事堂于中书省。开元十一年，中书令张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其政事印改为中书门下之印也。”

唐太宗第一次提高了政事堂的地位。武德年间，政事堂设在门下省，纯粹为宰相议政场所，后来因为中书出令与门下封驳之间发生矛盾，影响了政府的办事效能，唐太宗遂对中央政府的组织机构进行了整顿，整顿之前，宰相一般是在诏旨拟定之后于门下省进行事后检查。贞观以后，中书省职权逐步提高，中书令在拟定诏旨之前，多提前于政事堂进行讨论（《通典·职官典》），于是政事堂的地位日渐提高。

武则天进一步提高了政事堂的地位。武后光宅元年（684），正式将政事堂由门下省迁往中书省，政事堂遂正式成

为宰相议决军国大政的一项制度。自此以后，宰相在政事堂议政时，便采用轮流“秉笔”或“执笔”的制度。另外，武则天时改中书省为凤阁，门下省为鸾台。凤阁鸾台即中书门下，政事堂实际上成为权力很大的相府了。

至玄宗开元十一年（723）以后，政事堂改名为中书门下，并制专印，即“中书门下之印”（《通典·职官典》），并在政事堂下设置所辖各部门与属官（《新唐书·百官志》），凡属皇帝命令，必须经政事堂会议正式决议通过，并加盖“中书门下之印”，才能颁行生效。凡是没有加盖“中书门下之印”而由皇帝直接发出的命令，在当时被认为是违制的，不能为下属机关所承认。“中书门下政事堂”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至此完备。唐代政事堂是宰相集体议政的机构，它与君主专制制度在一个中央政权中有机地统一了起来。

以上这些特点，使唐代宰相制度能够发挥重要的历史作用。宰相是中央政府的首脑，是国家最高行政管理人。唐代宰相既任人唯贤，权力又大，又采取集体负责制，这就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的国家权力机关的效能，发挥到了这一制度所能达到的程度。由于皇帝传子，英明决断之主不常有；而宰相传贤，治国理民，多靠宰相辅佐，因此，君相权力的划分和相权的行使，就颇能决定历代政治的基本格局。唐代君主虽然也拥有“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的绝对权力，但大多数君主如唐太宗、唐玄宗甚至包括武则天等都能主动就教于宰相；而宰相亦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保证工作高效率；君相关系也比较和谐，宰相们互相合作，集体负责，在君臣及高官之间，体现出一定的民主作风，这大大提高了唐代政治统治的总体

水平和行政机构的办事效率，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君主的独断专行。

在我国封建时代，由于君主权重位隆，每遇君主年幼或昏君在位时，母后擅权，外戚横行，宦官祸国，便成为君主专制制度的赘疣。外戚、宦官专权违反了正常的封建政治秩序，必然造成政局动荡。唐代统治者逐步认识到，要缓和政局动荡，防止篡夺祸乱，唯一的办法是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特别是建立强有力的最高决策机构，作为皇帝专制统治的权力辅弼。“贞观之治”之所以能够出现，其中极其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唐太宗建立了这种“皇权专制——三省分权——政事堂集议”三者结合的中央集权新体制，极大地加强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向来是封建政治的重要内容。唐代宰相制度的演变过程，也体现了这一矛盾。宰相权力极大，是因为唐太宗等人认识到：“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是稳便，方可奏行”（《贞观政要·政体》），说明他是有意采纳政事堂制度，由相权对君权实行制约。武则天统治其间屡屡出现政治危机，但都因中书门下政事堂制度的制约作用，使得国家政治和社会经济能够稳定发展和前进。但这种制约，并不危及君权的独尊地位。皇帝主动加强宰相权力是有限度的，一方面，使宰相权力有所提高，另一方面，约束它不使超出君主专制权力的范围。唐初三省分权，使相职一分为三，互相牵制，目的是为了便于皇帝控制。唐太宗因为中书门下两省矛盾影响办事效率而提高政事堂地位，结果是使三省配合更加密切，进一步加强了皇权与相

权,高宗以后,以“平章事”、“同三品”等行宰相事,参加政事堂议决军国大政,他们品位不高,易于控制。政事堂从门下省迁往中书省,目的也是为了加强皇权。开元年间,合中书门下为一体,另设五房(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和刑礼房)办事,高高凌驾于相府之上,而原来的中书门下省机构名称仍在,却已成闲所。这一过程,充分暴露了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及其分合应变,唐代统治者比较妥善地处理了君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把君主个人专制与宰相集体议决这种对立面的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从而有效地集中了统治集团的智慧和意志,有力地强化了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唐代之所以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其重要原因就是有一整套完备的政治制度,其中重要的就是政事堂制度下群相对皇帝的有限制约和辅佐。

“安史之乱”使得唐政权受到极大的冲击,中央集权大大削弱。中央有宦官专权,地方有藩镇割据。在朝政日趋腐败的影响下,作为国家机器主体部位的宰相制度,逐步遭到破坏。由于使相制度的实行和馆职的侵夺相权,中唐以后宰相权力渐被剥夺。中唐以后宦官专权,宰相形同虚设,其权力也被侵夺殆尽。

行政管理制度 尚书六部与寺监机关都省是唐代中央行政管理中枢,尚书省下设六部,每部又分设四个司,共二十四個司。九寺五监则是唐代中央政府的办事机关。

从隋朝开始,尚书省共分六部,《武德令》定为吏、礼、兵、民、刑、工六部,《贞观令》定为吏、礼、民、兵、刑、工六部。武后光宅元年九月五日,依《周礼》六官,将顺序改为吏、户、礼、兵、

刑、工。这种顺序一直沿用到清朝(《唐会要·尚书省分行次第》)。六部共辖二十四司。吏部为六部之首,由于它职管天下官吏迁授、勋、封、考课等政令,因此,国家关于职官铨综之典,封爵册勋之制,权衡殿最之法,均由吏部掌握标准尺度。吏部掌握选士任官以及对官吏的管理,对国家政治起着决定作用。户部实际上是封建朝廷的财政部,主要职能是保证封建国家所需要的税收。礼部掌礼仪、祭享、贡举之政。兵部执掌武选、地图、车马、甲械之政。刑部掌律令、刑法、徒隶、按复讞禁之政。工部掌山泽,屯田、营建与工匠以及诸司公廨纸笔墨之事。

九寺五监是中央政府的办事机关。在国务活动中,寺监多承受六部诸司下达的政令,寺监执行任务完毕,必须“申复所司”。在处理具体事务时,寺监同六部有隶属与承受的关系。

隋唐时期,地方官制也逐步完备起来。唐代地方行政制度仿隋实行州、县二级制。唐有 358 州,较汉代的郡多两倍多。州刺史是唐代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唐代的县,玄宗时为 1573 个,比汉的县多了 200 余。和州地位相等的地方政权,还有府和都护府。府是州的别名,设于首都和陪都所在之州。都护府则设置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

州是唐朝最重要的一级地方政权,除三府外,全国地方遍置诸州。州长官为刺史。刺史是亲民之官,天子颇为重视。州按户口的多少分为三等:4 万户为上州,3 万户以上为中州,3 万户以下为下州。除上中下三等以外,还有辅、雄、望、紧之分。京师之地辅弼君王,故称“辅”,如同汉之三辅。其它则根据地理环境的远近美恶险要而分为雄、望、紧。京都所在称“京都府”,国内重要卫戍地区称“都督府”,边疆冲要地区称“都护

府”。京都府始置于开元年间,为京都、陪都或行都所在,如京兆府、河南府、太原府、凤翔府等,最多达到10个。府是州的别名。著名的“三都府”是指京兆府、河南府和太原府,河南府为东都,太原府为北都。三府长官置牧,规定由“亲王遥领”,实际的行政长官是府尹。州刺史的职权在总的方面和三府的牧尹相同。总的看来,唐代地方长官的权力远小于汉代,由此必然影响到州的地方建设。安史之乱以前,唐代地方政府组织比较完善,中央与地方关系处理得尚属得当,但随着中央政治的黑暗,安史之乱之后便逐步走向节度使的横行与割据。

府、州之下为县。三都之县在内曰京县,又曰赤县,城外曰畿县。又依地域的优劣美恶,有望、紧之别。还依户口多少分为上、中、中下、下四等。每县置县令一人。县级行政机构在封建国家机器运转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唐代在县令职掌中规定,县令要“养鰥寡,恤孤穷,审察冤屈,躬亲狱讼,务知百姓之疾苦”。为了加强县级行政机构的统治效能,唐代县的机构组织也很完备。县令、丞以下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司户佐,掌田、户、赋役,为国家征收赋役而设;二是司法佐,掌刑法,三是博士,掌教育。按《唐六典》定制,诸州中县编制定员,县令以下官吏共计52人,如果县的户口超过4000户,则县吏还可以增加7人(《唐六典·诸州县令》)。另有县学生25人。总之,唐代县级行政组织机构精简,职掌也很明确。

县以下的基层组织是乡、里、保、邻。四家为邻,五家为保,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乡置耆老(亦称“父老”)一人,里设里正一人。里正由地主富户或六品以下勋官担任,负责查核户口,收授土地,监督农业生产,征敛赋役。五百户以上的市镇设坊,

置坊正一人；城廓外设村，别置本正一人，村满百户以上的增置一人。

为了有效地控制地方，唐初从太宗时起或派使巡察地方，其属员“皆使自辟召然后上闻”（《通典·职官典》）。景云二年（711）置二十四都督府以统天下郡县，既而以其“权重难制”而罢。后又置十道按察使，开元二年（714）改曰按察采访处置使，至四年又罢，八年复置，十年又罢，十七年复置，二十年改曰采访处置使，分为十五道，天宝末又兼黜陟使，乾元元年（758）改曰观察处置使（《新唐书·百官志》）。二十四都督府的旋置旋罢，按察采访使的屡置屡罢，以及使府从临时到最终在开元时边疆节度使与内地采访使的固定设置，都表明中央政府既畏惧地方权力过重，随着社会矛盾的发展，又不能不加强地方事权。

为了统治内附的周边少数民族，太宗时又开始设置羁縻州县。“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新唐书·地理志》），也就是羁縻州县。贞观四年（630），唐太宗平定突厥，突厥表示愿归附，唐太宗除将10万户突厥内迁中原之外，又在其原地设置羁縻府州，在行政管辖方面，任命该族首领为都督或刺史，统率原来的部众，在行政上保持半独立状态，在政治上保留各族原有自治权力。唐太宗在突厥族设置羁縻府州取得成功之后，又推广至其他少数民族部落，见于史志的羁縻府州有856个，“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新唐书·地理志》）。羁縻府州虽有较大的自治权力，但都督、刺史都必须由中央任命，并取消原有的“可汗”称号。为了加强对羁

縻府州的管理，唐代又建立起都护府这一行政区划。

唐代最多时设置八个都护府，后减为六个（安西、北庭、单于、安北、安东、安南）。都护府是中央与羁縻府州之间的纽带，它代表中央行使对羁縻府州的管理权，负责管理边防、行政和民族事务。都护由汉人担任，由中央任命，不能世袭，都护府属官设置与内地府州相同，有长史、司马、录事参军事和功、仓、户、兵、法等曹参军事，分管各种行政事务以及人事、民政、财政、军事、司法等方面的事务。这些属官也由中央任命，所管辖的事务都要按中央的指令和政策进行。

羁縻府州和都护府的设立，有助于唐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管辖，也有助于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促使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团结壮大。“安史之乱”以后，羁縻府州制度大部分遭到破坏，原有的羁縻府州有些叛离，有些直接并入州县，最后因唐王朝的衰败而告终结。但是，唐朝的羁縻政策对以后元、明、清三朝制度民族政策有一定的影响。

四、差遣制度的创立

唐代的使职，是职官本制以外的差遣官。唐初高祖、太宗时为加强皇权，控制地方，即有使职之设。但使职多数出现在武则天至德宗这个时期，而高祖至高宗和顺宗至宣宗时期出现较少，唐朝末年则又有回升。

武德七年（624），唐朝在隋朝官制的基础上建立起一整套官僚机构，它是汉代以来政治制度演变的总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完善程度。那么，为什么在职掌官之外又出现大量使职

呢？原因主要是：

第一，社会发展的进程加快，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多变，要求政治制度与之适应。在实现统一和稳定之后，承担着调节社会生活职能的唐朝国家，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自然也与往常不大一样，这就要求有适应新形势的国家机关，执掌新任务的国家官员，足以应付复杂事态的政治制度。唐朝的使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第二，唐代使职的大量产生又是唐朝职官制度缺乏应变能力的结果。一个国家的政务，有基本的、比较固定的，也有突发的、临时的，因此，职官制度应该是既有经常性、稳定性，又有机动性，有应变能力。可是唐朝的国家机构“其官司之别曰省、曰台、曰寺、曰监、曰卫、曰府，各统其属，以分职定位，……职有常守，位有定员”（《新唐书·百官志》），各种机构中行使职权的官吏，各级官吏的组成和职掌，各项事务的办理规程，都已形成固定的模式，并著之格令，成为不可移易的常规固法。当然，唐朝官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名号禄秩”，也曾“因时增损”但变化的仅是皮毛，很少涉及其内容和实质（《新唐书·百官志》）。总的看来，唐朝的职官制度稳定有余而应变不足。可是，随着社会生活复杂程度的增长，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各种官员既定职责范围以外的事务，或者虽属职掌之内而实际上是对付不了的事务，不能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经济、政治、军事形势变化了，任务大大地增加了，客观形势迫使国家不能一概依然故我。因此，便有在职事官之外增设使职的措施。

第三，唐代使职的大量产生又是统治者因循守旧、昧于改

革的产物。国家作为一个社会体系的上层建筑,其政治制度应该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形势任务的变化而进行适时的改革。这就要求统治者,特别是掌握国家大权的最高统治者,具有明察全局、洞观事变的能力。具有锐意进取、勇于革新的精神。可是,唐朝的统治者,在政权巩固之后,却缺乏这种不断的革新精神,以为只要确守祖宗成法,便可以“有万世之安”(《唐鉴·玄宗下》)。但是,社会生产越来越复杂多变,原有职官无能为力事情不断发生,怎么办呢?只有随时补苴,临时置使,消极应付,大量的使职便这样出现了。

使职的内容包罗万象,在最高中枢出现了相当于宰相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翰林学士以及宦官充当的枢密使,到唐后期已取代了三省首长的权力地位,其中翰林学士被称为“内相”。地方上设置了十道采访使、节度使、观察使等,高踞于刺史郡守之上。在中央和地方各部门,上自宰相,下至尚书六部各司曹,几乎都有差遣使职喧宾夺主,取代旧有行政系统的职事。差遣使职名目繁多,如宣慰使(宣抚使、抚慰使、抚谕使)、青苗地钱使、两税使以及镇守使、山陵使等,各自处理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诸般事务,有的虽有使名而毫无实际意义的,如朱全忠逼哀帝让位时,有所谓押传国宝使、押金宝使等。按照各朝使职的年平均数和百分率对照一下,便可清楚地看出,唐代使职的产生呈现几个不同的阶段:高祖至高宗,年平均数都在 0.3 以下,百分率都未达到 5%,可作第一个阶段。武则天至玄宗,年平均数在 0.5 至 1.5 之间,比前一阶段高;百分率的和也比前一阶段大,可作第二阶段。肃宗至德宗,年平均数在 0.4 至 1.4 之间,稍低于第二阶段,但比第一阶段高;百

分数都在 5% 以上,可作第三阶段,顺宗至宣宗,年平均数都在 0.3 以下,只有敬宗朝 0.66,百分率都未达到 3%,可作第四阶段。懿宗至哀帝,年平均数和百分率都有回升,可作第五阶段。

由此可以看出,各朝普遍都有使职出现,所以使职不是某个时期有计划地统筹设置的,使职的出现也不是均衡的。如前所述,唐代的使职多数出现在武则天至德宗这个时期,而高祖至高宗和顺宗至宣宗时期出现最少,唐朝末年又有回升。这种不均衡状态,也是由社会生活的变化及统治者采取相应措施两方面因素所决定的。

使职差遣的盛行,造成了职官制度的混乱,宋人范仲禹说:“自古官制之紊,未有如开元者(《唐鉴》卷 8)。到唐玄宗天宝年间,设置的使职已相当多,深入到政权的各个方面,并掌握了相当一部分权力。有的权臣一人身兼数十使,如王缙一个身兼二十余使(《旧唐书·王缙传》),杨国忠一身更“凡领四十余使(《旧唐书·杨国忠传》),出现了“为使则重,为官则轻”的情况,这种情况到唐后期更加严重。使职既随机应变,随事补苴、毫无规则的使职差遣制度的盛行,是制度紊乱和政治控制能力逐渐削弱的表现,是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政治制度方面的反映,标志着李唐政治文明的逐渐衰落。

五、周密的监察制度

隋唐时期的中央监察机构为御史台。御史台的最高负责长官御史大夫,正三品,有副手二名,称御史中丞,正四品下。

他们的职务是“掌持邦国刑宪典章，以肃王朝廷”（《旧唐书·职官志》三）。御史台下属机构有三：台院、殿院和察院，分别由御史、殿中侍御史和监察御史任职。三院监察官品阶不同、职掌分明，构成一个十分严密的监察系统。高宗龙朔二年改御史台为宪台，御史大夫为大司宪，御史中丞为司宪大夫。武后光宅元年又改为左、右肃政台，睿宗景云二年令并而为一，仍称御史台。至开元初年始定制。

台院的侍御史在监察官中地位较高，从六品下，额定四员，其职主要是纠举百僚及入阁承诏知推、弹、公廨杂事。

推即推鞠狱讼，唐代由御史台官员负责和参与的推鞠形式，有西推、东推和三司推。西推、东推系台院将对中央及诸州的审讯事务划为东西两个部门。三司，本来指御史台、中书、门下三个机构。三司推则是一种特别审判，遇有大案，则由尚书刑部、御史台、大理寺一同审判，称为三司推事（《通典·职官典》）。

弹即弹劾。弹劾违法的官吏是侍御史的基本职责。御史行弹劾有一定的程序和仪式。对五品以上大官的弹劾（主要是京官）多采取仗弹的方式，即在皇帝坐朝时，御史服獬豸冠，对着仪仗宣读弹文。弹劾对那些犯不法行为的大官有一定的威慑作用。弹劾是“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官之罪恶”，实质是在朝廷起诉，是把司法权拉入行政权的一种形式。

公廨杂事指台内的日常事务。侍御史知杂事，就是总判台事，相当于台院的负责人。

殿院的殿中侍御史位次于侍御史，从七品下，定额六员，其职务主要是掌殿廷供奉的仪式。殿中侍御史的一项重要职

责就是检查朝班时百官的仪态行履，维护朝廷的秩序和尊严。此外殿中侍御史也有推按狱讼、监京城仓库和分巡两京的任务。

察院的监察御史在监察官中品阶较低，正八品上，额定十员，但职掌范围却十分广泛，权限也大。巡按郡县，检查地方官吏，作为监察官的职掌，早在秦汉时期已成制度，至唐更成为监察御史的主要任务。监察御史出使在外，往往数月半年。从高宗始，监察权开始直属皇帝，监察官因直接受皇帝委派，气派很大。

此外，巡查馆驿、监仓库、监诸军，也属监察御史的职掌范围。御史监军隋代即有，唐承隋制。玄宗时规定监察御史负责对尚书省六部实行监察。开始时，由一个监察御史负责监察两个部，后来大约事务繁重，改为由六个监察御史分别监察吏、礼、兵、工、户、刑各部，号称“六察官”，形成御史台对尚书省的分察制度。此制成为明代监察制度六科给事中系统独立出来的先声。

唐代对地方官吏的监察，还以十道巡按的方式进行。御史出巡制度的建立，对于由下而上的地方情况上报制度，是一个重要的补充，使中央得以更全面地了解各地的情况。出使御史要了解各地的吏治好坏、经济状况、治安情形，发现人才。唐代中期以后，中央政府为加强对地方政权的控制，御史的出使更为频繁，其检查了解的重点，也逐步转向财政方面。

十道巡按同监察御史的巡按州县稍有不同。一则监察御史出按州县，主要是推鞠狱讼，一般多带君主的敕命，或者是地方出了较大的案件，需要中央派监察官前往处理，带有特使

的性质,而十道巡按则是一种经常性的地方巡回检查制度。二则担任十道巡按的官员并不只局限于监察御史,也可由其他官员充任。

总之,台院、殿院、察院分置和十道巡按,构成了唐代严密而完整的监察系统。各级监察官由于职司“风宪”,也称“法官”,又称为皇帝的“耳目官”,可谓无所不纠,无所不察。御史若能行使其职权,认真纠举官吏的不法行为,对澄清吏治、保证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是有作用的。

唐代监察制度除御史台外,还有专门规谏皇帝的言谏制度,并设置了谏官组织,有左右散骑常侍、左右谏议大夫、左右补阙、左右拾遗等。谏官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国家决定的政策、法令,以及某些重大政策和制度,如认为不妥,有权向皇帝规谏。唐朝统治者从长期的统治中总结经验,认为这种规谏有助于皇权的行使和国家的统治,同时也是对宰相的一种监督,因此设置专官执掌。谏议大夫和给事中,同称侍臣,而御史则为法吏。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唐代宰相机关的门下省,就是拥有极大监察权力的领导机关。门下省对皇帝的错误可以言谏,对皇帝的诏书,可以封驳,是以皇帝为纠察对象,御史台的纠察对象是内外百官,是对下的监督和纠举。这就是说,在唐代,连至高无上的皇帝也要受到某种限制。当然,这种限制是以不触犯皇帝的逆鳞为原则,是以皇帝的喜怒情绪为前提的。

中书、门下两省谏官通过各种途径谏君,主要有:谏官随间相入阁议事;谏官知谏匭事;谏官知起居事及给事中“驳正违失”。谏匭为武则天设,虽有利用告密镇压“反对党”的政治目的,但此后唐宋两代均有谏匭的设置,并有匭院,成为谏

官和臣下进谏的一条重要途径。

监察制度实行的好坏,御史作用的发挥,常常依政治状况和皇帝个人的品质为转移。从史书的记载来看,唐初国家安定,政治开明,御史实行弹劾的阻力较小,监察官往往不畏强权,对不法官吏进行弹劾。但弹劾是否有效,最后决定权则掌握在皇帝手里。君主贤明,能属守于法,重视对贪官污吏的惩罚,则弹劾一般能够奏效;反之,若政治斗争激烈,则御史便成为君主博击臣下的工具。如武则天时,所任用的酷吏索元礼、来俊臣、朱子珣、侯思止、王弘义、郭弘霸等均任御史之职。他们罗织罪名,大兴冤狱,严刑逼供,滥杀无辜,此时的御史几乎成了杀人魔王。

除上述情况外,也有一类懦弱无能的皇帝,对监察官的弹劾是非不分,含糊了事。此时,监察官的弹劾只能是一种摆设。御史行弹劾要靠皇帝的保护,这是唐代监察制度的一大局限。但在特定的政治条件下,御史对不法官吏实行推弹,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吏治的迅速腐化,缓和了社会矛盾。

六、加强府兵制度

唐朝的府兵制比隋朝更加成熟和完备。636年(贞观十年),唐政府确定军府的名称为折冲府,府的长官为折冲都尉,军府的组织和府兵的编制已经完全制度化。府兵制的中央领导机构是十二卫,每卫设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是府兵的最高长官,直接隶属于皇帝。每卫统领折冲府(兵府,军府)多者六十,少者五十或四十不等。折冲府是府兵的基层单位设在全

国各地分三等，上府 1200 人，中府 1000 人，下府 800 人，长官称折冲都尉，副长官称果毅都尉。府下设团，每团 300 人，由团校尉统领；团下设旅，每旅 100 人，由旅帅统领；旅下设队，每队 50 人，由队正统领，队下为火，由火长统领。

唐朝征选府兵，是有明确的标准。府内三卫（指宿卫宫内的府兵）的卫士，均为品官子弟，限于三品至五品的子孙。外府的府兵，从有一定资产的均田农民和六品以下官吏子弟中征选，原则是“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府兵三年征选一次，民 21 岁入军，60 岁免役，任务是“番上”宿卫京师，戍边和战时出征。

唐代的府兵制有三个特点：一是和均田制紧密结合，寓兵于农，兵农合一。府兵平时生产，闲时操练，服役期间本身免征租调，但“番上”和出征自备衣粮甲胄，政府无养兵之费，所以府兵负担较重。二是体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精神。从府兵的布置来看，开元时全国军府共计 634 个，总兵力 60 多万。关中地区集中了 261 个军府，兵力 26 万，占总兵力的 41%。这样，拱卫了京师，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形成了“内重外轻”的形势，适应了中央集权的需要。三是将帅不长期掌握军队，难以专兵跋扈。府兵在地方属折冲府统领，番上宿卫归所卫的大将军统领。地方官和中央十二卫均没有调兵的权力，府兵的调遣要有皇帝敕书，兵部鱼符，地方长官合勘无误后才能发兵。战争时，兵部按皇帝的诏令，从各地临时调集军队，混合编制，行军之帅和高级将领都临时委派，战争结束后，“兵散于府，将归于朝”。这样避免了将帅专兵跋扈，不易形成割据势力。

七、修订《唐律》

唐初，统治者很重视刑律的制订，他们把刑律作为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工具。唐高祖时，在《开皇律》的基础上制订了《武德律》。贞观时，奉太宗令，房玄龄、长孙无忌等，历时10年编成《唐律》。高宗时，又令长孙无忌等按《唐律》的条文进行疏证诠释，撰成《唐律疏议》30卷，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封建法典。这部法典成为我国以后历代封建王朝制订刑律的依据，对亚洲各国也发生了重大影响。

《唐律》共12篇，502条。篇目有：“名例律”（即总则），“名”指刑的名目，有笞、杖、徒、流、死5种。“例”是量刑的准则，根据犯人的身份及犯罪的情节而定罪的轻重之法，共57条。“卫禁律”是关于宫廷陵寝、城关要塞、国防边防的保卫方面的刑法，共33条。“职治律”，是关于官吏失职、贪赃枉法、驿使贻误军机等处罚规定，共59条。“户婚律”是涉及户籍、田宅、赋役、婚姻、家庭等方面的法律，共46条。“厩库律”，是关于官私牲畜及宫物，仓库管理方面的法律，共28条。“擅兴律”，是关于擅自发兵，兴建等方面的刑法，共24条。“贼盗律”，是关于谋叛，大逆杀人，抢劫，偷盗等方面的刑法，共54条。“斗讼律”，是关于不同身份的人之间斗殴而进行不同量刑的标准，共60条。“诈伪律”，是关于伪造印玺，发兵符、官文书及各类欺诈的刑法，共27条。“杂律”，为其他各律所不包者，如私铸钱，私决河堤用水等刑法，共62条。“捕亡律”，是关于追捕逃犯及士兵、官吏、工匠和农民逃亡的刑法，共18条。“断

狱律”，是关于审讯、囚禁、判决的规定，共 34 条。

唐律较前代法律进步，主要体现在：第一，宽简。唐律制订时，对《开皇律》作了较大的删改，废除了前代的酷刑和肉刑，减除死刑 163 条，其中减入流配 92 条，减入徒刑 71 条，原有的死刑条，废除近一半，其余削烦去蠹，变重为轻的条文很多。第二，律文解释明确。《唐律疏议》对律文每条都有明确的解释，使断狱者有所依据，不得任意解释，避免了徇私枉法。第三，立法慎重、严整、稳定。贞观年间，唐太宗曾多次组织名臣研究立法和司法缺陷，对制订新律十分慎重。当时对判死刑审查甚严，规定“在京诸司奏决死囚，宜二日中五复奏，天下诸州三复奏”，630 年（贞观四年）判死刑的只有 29 人。唐律的内容严密完整，律文没有重复矛盾的地方。律文规定，执法者必须援律量刑，依法办事，违者置以重刑。这样一定程度上约束了皇权和人情的干预，减少了冤假错案，而且，律文颁行后，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几十年不变，对唐初封建统治的巩固起了很大的作用。

唐律的实质，在于维护封建剥削制度，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因此，律文中贯串着阶级的压迫和封建的伦理纲常的道德观念。如唐律和隋律一样有“十恶”“八议”的规定；为了维护封建国家对农民的剥削和奴役，唐律规定，农民不向国家按期交纳租税，逃避赋役，隐瞒户口等，都要科以轻重不等的刑罚。为了维护尊卑贵贱的封建等级制度，唐律规定，奴婢杀主者斩，奴婢有罪其主不请官司而杀者杖一百，无罪而杀者徒一年。这些都反映了唐律的阶级实质。

八、修《氏族志》

唐初世族地主，主要分四个地域集团，它们是山东世族、代北世族，江左世族和关陇世族，代北和江左世族，在唐代已经没落。山东以崔、卢、李、郑为首的世族，经过隋末农民起义的扫荡，也大为削弱，只有关陇世族居于唐上层统治集团的核心地位。他们是随着北周阶级关系变化而产生的。按理说，关陇世族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要高于山东世族。但是，由于关陇世族多是出身于军人，不同程度是混有鲜卑人的血缘关系，门第不高。因此山东世族历来看不起关陇世族。又由于门第观念的传统影响，社会上也以山东世族的门望为重。尽管山东世族在政治上已经失势，但唐朝的公卿大臣宰相之家，争相与他们攀婚，并且自愿陪送大量的钱帛资财。而李唐皇室及关陇世族，在婚姻上却门庭冷落。这说明关陇世族的门望和社会地位仍不及山东世族，山东世族仍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两者的差异形成了关陇世族和山东世族的矛盾。

此外，唐初随着庶族地主势力的发展，唐太宗曾提拔了许多庶族地主进入统治集团。这批新兴官僚地主，虽有官位和权力，但由于没有门望，常受旧世族出身的官僚奚落。如马周为监察御史时，御史大夫韦挺“以周寒士，殊不礼之”，因此，新兴的官僚地主，也要求改变旧的门第观念。

为了提高皇权的地位，顺应庶族官僚的愿望，唐太宗令高士廉等刊正姓氏，重修《氏族志》。638年（贞观十二年）书成，仍列山东世族崔民干为一等，唐太宗大为不满，说：“山东世族

“世代衰微，全无冠盖”，靠买卖婚姻混日子，“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经过唐太宗的一番训斥，《氏族志》才重新确定了“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的修撰原则。新修成《氏族志》100卷，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崔民干降为第三等，共293姓，1651家，颁于天下。

这次修《氏族志》提高了皇族、外戚及关陇世族的地位，提高了庶族官僚的门望。这种做法，有利于皇权的提高和中央集权的加强。

第三节 唐太宗与贞观之治

一、玄武门之变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四日，长安发生了一次政变，李世民杀死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迫使高祖交出政权。这场兄弟间自相残杀的惨剧是当时政局必然产生的结果。

太原起兵以后，太子建成和秦王世民都统领军队，身任元帅。他们各自收罗文武才智之人，作为羽翼。李世民官居特设的“天策上将”。府中有著名的十八学士：房玄龄、杜如晦多谋善断，陆德明、孔颖达精通经学，姚思廉擅长文史，虞世南以书法著名，其余于志宁、苏世长、薛收(死后由刘孝孙补)、褚亮、李玄道、李守素、蔡允恭、颜相时、许敬宗、薛元敬、盖文达、苏

勋,也都是一时俊彦。秦府猛将最多,尉迟恭、秦叔宝、程咬金等都在他的麾下。太子建成的手下,文官如魏征、王珪是后来的贞观名臣,武将如薛万彻等,也勇猛善战。他又有四方骁勇2000余人做东宫卫士,实力比秦府充足。齐王元吉地位声望不及两个兄长,但素以勇武著名,手下也有相当力量。

太子建成是名正言顺的继承人,但是在唐朝创业的过程中,秦王世民打的硬仗最多。两人既然旗鼓相当,必然会出现争夺皇位的斗争。齐王没有独树一帜的条件,便和太子暂时结成联盟,共同与世民较量。

武德七年以后,全国已经统一,唐王朝的统治地位已相当稳固。于是太子和秦王争夺皇位的斗争就更加明朗化。

一日,太子请秦王赴宴,王府亲随劝秦王提高警惕,最好不要去。秦王认为:过去兄弟之间虽然发生矛盾,也许还不会达到谋害同胞的地步,于是便前往东宫。

太子准备的宴席非常丰盛。席间太子和齐王频频举杯劝酒,不断颂扬李世民的武功。喝着谈着,忽然,秦王觉得头晕目眩,两脚发软。秦王情知不妙,他挣扎一下想站起来,但身不由己地倒在地上了。齐王看见他二哥倒下,便紧张起来,赶紧问太子:“这,这,怎么办?”太子把眼睛一瞪,喝道:“慌什么?派人送回去。”

李世民被送回秦王府,灌了许多解毒药,吐了不少苦水,才保住性命。皇帝晓得这件事以后,狠狠地训斥了太子一顿。

太子见秦王没死,还不甘心,就怂恿皇帝到郊外打猎,并要求秦王陪驾前往。父皇命令,秦王只好跟随出行。

太子叫部下给秦王备了一匹烈性马。秦王没有想到太子

又在耍阴谋，在打猎场上，纵马操弓，追赶一头鹿。突然，烈马野性发作，仰颈狂跳，把秦王甩出一丈多远，险些摔死。

秦王府的兵精将猛，是众所周知的事。为了削弱秦王的势力，太子和齐王绞尽脑汁设法瓦解秦王的队伍。凡是有调兵遣将的机会，他总是竭力设法把秦王的部将调开。例如，程咬金原来是秦王府左三统军，在打败宋金刚和平定王世充的战斗中，身先士卒，斩将蹙旗，建立奇功，封宿国公，是秦王府一员得力的干将。因此，太子很担心自己抵挡不了秦王，于是在皇帝面前造谣，结果把程咬金调任康州刺史，使他离开了秦王府，但程咬金并未立即离开长安，他设法拖延时间，以便维护秦王的安全。

另一方面，太子对于暂时无法调离秦王府的武将，便利用收买的手段拉拢。例如，尉迟恭是秦王亲手提拔的将领，膂力过人，勇猛善战。太子曾用一车金银珠宝收买他，但遭到尉迟恭的拒绝。太子没有买通尉迟恭，又以金帛贿赂段志玄和李安远，“潜引以为党援”。不过太子的瓦解活动都没有成功。

秦王李世民针锋相对，也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武德九年（626年）他曾派张亮带领1000余人，带着大量金帛到东都一带，“阴引山东豪杰”。在设法争夺太子的人员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效果。例如，常何与敬君弘原来都是太子的爪牙，担任防卫宫城的重任，经过秦王的瓦解活动，常何和敬君弘暗中脱离太子集团，变成了秦王的助手。

秦王沉着观变，准备抓住机会，给对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打击。他部下将校如尉迟恭等，看到本身的前途取决于秦王的成败，也都劝他早下决心。

政变发生在玄武门前，玄武门是宫城的北门，唐朝宫城在都城的北面，北门守兵是保护宫城的武力，抓住了这个关键就抓住了皇帝，就可以用最高统治者的名义发布命令，使自己处于合法地位。

六月四日那天，守卫玄武门的将领正是常何，他本是建成的心腹，这时已被世民收买。建成不了解这情况，毫无戒备地经玄武门去朝见李渊。世民乘此机会，带了尉迟恭等少数将士，发动袭击。他亲手射杀建成，尉迟恭射杀了元吉。东宫和齐王府的将士闻讯赶来，仗着人多，猛攻玄武门。世民一面使卫兵抵抗，一面使尉迟恭进宫，逼迫高祖下“诸军并受秦王处分”的命令。一场事变就迅速地结束了。

三天以后，高祖立秦王为太子；八月初九，禅位给太子。

二、贞观之治

李世民登上帝座后，次年改元贞观。他在位 23 年（627—649），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唐太宗。在他统治的时间里，生产关系有所调整，生产力发展较快，社会经济恢复迅速，人口也有很大增长，史称：“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贞观政要·政体》）。这就是被史学家称作“贞观之治”的时代。

唐太宗即位初年，曾“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唐太宗不同意这样的做法，说：“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役繁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资治通

鉴》卷192,武德九年)唐太宗这段话,可以说是贞观时期政治措施的指导方针。

唐太宗即位以后,采取了各种措施巩固政权。在政治上,改革中央和地方官制,并发展庠序,改革科举,修《氏族志》,以巩固中央集权制度,在太宗朝,三省六部制度和科举制都有较大的发展;在经济上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改革军事制度;修订《唐律》,完善了封建法制。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唐太宗也有许多颇为得当的措施。唐太宗时期的这些措施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与繁荣,使唐代成为中华文明发展和成熟的重要时期。

唐太宗统治集团中,有一大批出色的政治人才。其中最著名的是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魏征是贞观时期的著名人物,他对历史政治兴亡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并通过大量谏诤参与唐太宗的政治决策。他的谏诤,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法制和礼仪等各方面,而中心议题则是如何从隋末“丧乱”达到唐初“天下大治”。唐初的大政方针、唐太宗的政治作为和帝王风范,都受到魏征的很大影响。房玄龄、杜如晦是贞观时期的著名宰相,他们一个多谋,一个善断,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史称“房谋杜断”,对于贞观时期的政治清明也起了很积极的作用。

此外,贞观时期的著名文臣武将还有出身于农民起义将领的徐世勣(李世勣、李勣)、秦叔宝、程咬金,有寒素出身的刘洎、马周、张亮等,以及出身关陇士族的李靖、长孙无忌、于志宁、韦挺等,尽管他们背景不同、才能各异,却组成了一个出色的统治集团,成为唐太宗的有力辅佐。

唐太宗君臣较好地吸取了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总结出

丰富的、比较顺应当时历史发展要求的政治思想。贞观年间的一系列政治措施都是这些政治思想的直接体现。

唐太宗即位之后,首先实行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经过10年左右的社会动荡,战乱之余,唐初经济一片萧条,出现了“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贞观政要·纳谏》)的残破景象。在这种条件下,出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人民生活困苦。贞观四年(630)李世民狩猎时就发现“野人多褴褛”(《册府元龟·帝王部·狩猎》)。不设法恢复生产,农民生活就不能有所改善,社会矛盾就不能缓和,这对唐政权来说,确实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其次,唐国家财政处于左右支绌的严重拮据状况:“每岁纳租,未实仓廩,随即出给,才供当年”(《旧唐书·戴胄传》)。一遇水旱就更无力赈贷,穷于应付。为了改善人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改变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李世民所面临的当务之急,只能是首先大力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

唐初恢复农业生产的最大困难之一,是劳动力的严重不足。隋代极盛时全国户数近900万,而到贞观时期,骤降至“户不满三百万”(《通典·食货典》)。若以每户平均5口人计算,全国人口仅1000余万。为了尽快增加户口,繁殖人口,唐太宗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政策和措施。

首先,招徕、赎还隋唐之际流落到沿边各少数民族汉人和被掠去的汉人。其次,大力奖励男子及时嫁娶,提倡鳏寡婚配,以达到繁殖人口的目的。贞观一朝历时20余年,人口约增加了50%左右。

均田制的推行是唐初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重要物质条

件之一。此外,由于隋炀帝的横征暴敛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隋朝覆灭。李世民对此亲见亲闻,故能从中吸取教训,采取轻徭薄赋政策。从隋炀帝的竭泽而渔到唐太宗的轻徭薄赋,是当时赋敛政策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实行省徭减赋,就必须节约国家的财政开支。唐太宗并省州县、精简吏员、完善府兵制等项措施都能在这方面起显著的作用。除此之外,他还特别注意厉行节约。一是提倡俭朴,力戒奢靡,以纠正隋炀帝的腐化恶习。李世民即位之初,立即“纵禁苑所养鹰犬,并停诸方所进珍异”,因此“天下大悦”(《旧唐书·太宗本纪上》)。他曾对臣下说过:“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百姓不堪,遂致亡灭。此皆朕所目见”(《贞观政要·政体》)。他前后放免宫女 3000 余人,这不仅使隋末以来被幽闭深宫的女子获以婚配,而且也节省了宫廷费用。唐太宗的俭朴作风确实社会、政治方面收到良好的效果,所以开元年间有人说:“隋氏纵欲而亡,太宗抑欲而昌”(《资治通鉴》卷 210,开元元年)。当时的大臣如中书令岑文本,居“宅卑湿”;户部尚书戴胄,“居宅弊陋”;尚书右仆射温彦博,“家贫无正寝”;特进魏征,“宅内先无正堂”,生活都较朴素。史称贞观“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贞观政要·俭约》)。这对积累社会财富,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为了减省国用,除了俭朴之外,唐太宗还尽量避免和减少不必要的战争,以紧缩军费开支。直到贞观十八年(644)发兵征高丽以前,基本上没有发动过不必要的战争。这种政策,自然有利于农民安居垅亩,发展农业生产。

在政治统治方法上,唐太宗能够做到知人善任和纳谏。唐

太宗很能搜罗和使用人才，如李勣（即徐世勣）本来是农民起义军将领，魏征是其政敌李建成的幕僚，都为唐太宗重用。马周出身寒微，为中郎将常何家客，当时皇帝正下令让百官“上书言得失”，他替常何写了奏疏，“陈便宜二十余事，令奏之，事皆合旨”。唐太宗知道是马周所为，立即派人去召马周，没有来到之前，“凡四度遣使催促”。后来太宗先拔他为临察御史，最后官至中书令。李世民曾一再说：“我于马周，暂时不见，则便思之”。“周见事敏速，性甚慎重……朕比任使之，多称朕意。既写忠诚，亲附于人，实藉此人，共康时政也”（《贞观政要·任贤》）。求贤若渴的心情，跃然纸上。当时参与朝政的大臣，包括各个社会集团的人物。其中关陇贵族有长孙无忌、宇文士及、于志宁、李靖、侯君集、杜如晦，江东世族有萧瑀、陈叔达、岑文本、虞世南、褚遂良，山东旧族有高士廉、房玄龄、王珪，山东庶族有李勣、程咬金、马周等。唐太宗的目的是在更广泛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巩固政权。

唐太宗不仅能网罗各种人才，而且能知人善任，使之各得其所。卢照邻称其人才济济的盛况为“虞（世南）、李（百药）、岑（文本）、许（敬宗）之侔以文章进，王珪、魏（征）、来（济）、褚（遂良）之辈以材术显”（《幽忧子集·南阳公集序》）。唐太宗用人，了解臣下的优点和弱点，所以他能扬长避短，使各得其宜。例如常被人称道的“房谋杜断”，就反映了这一特点。史称：“房知杜之能断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谋，裨谏草创，东里润色，相须而成，俾无悔事”（《旧唐书》卷66《后论》），唐太宗任命房玄龄、杜如晦均为丞相，两人各具优点，互为补充，极有利于国家。史书又说唐太宗“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

才”(《旧唐书·太宗纪下》)。此语当然有些歌功颂德,但太宗能够搜罗和使用人才的优点,确是比较突出。

唐太宗还善于纳谏。魏征就是当时有名的“诤臣”。他先曾跟随李密,继又降于窦建德,后则紧事太子建成,每次都站在李世民的对立面。但唐太宗不避仇嫌,不计恩怨,任命魏征为谏议大夫。魏征性情抗直,敢于谏诤,遇太宗发怒,亦神色不移,据理力争。前后所谏 200 余事,多为李世民采纳。除了魏征之外,唐初的一些大臣都敢于进谏。这种风气的形成,是由唐太宗的“乐于受谏”所造成的。正如魏征所说:“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贞观政要·任贤》)。唐初很快就造成“臣以进言为忠,君以听言为急”等协调和谐的局面。

唐太宗为了集思广益,纠偏补过,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制度。

一是建立“谏官随宰相入阁议事”制度。这种制度规定,宰相入朝议事,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参与讨论,有所陈说,以便采纳。王夫之认为,这种制度使当时言无不尽,“而治得其理”;以王珪、魏征为谏议大夫,房玄龄、杜如晦为宰相,而太宗在各种政见之间加以明智的选择和折衷,可以集思广益,“足以折中群论而从违不爽”(《读通鉴论》卷 20《太宗二》)。

二是命令“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资治通鉴》卷 192,武德九年)。这种制度使五品以上的在京官员,可以随时被召见,询访外事,讨论政教得失。

三是中书舍人五花判事制度。唐制:“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省

审之，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之”（《资治通鉴》卷193，贞观三年）。政事凡经朝议决策，即交中书舍人草诏，舍人五员各执所见，各书一诏，署名后交中书省首长选择。又交门下省审核封驳。若有错误，给事中可涂归驳回中书省重拟。于是诏令既出，少有错失，因此“鲜有败事”。

除了用贤、纳谏以外，唐太宗还用各种手段笼络臣下。贞观十七年（643），唐太宗于凌烟阁为开国功臣长孙无忌等24人绘像纪功。唐太宗撰赞，褚遂良题字，阎立本绘画。这些作法，也是唐太宗用贤纳谏、表彰人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唐初对待功臣的态度和政策，吕温有篇论述写得生动、真切：“其始也，文为经、武为纬。智斯作，忠斯述。其末也，大不逼，小不遏，退者全，来者达。控而纵之，使自用之；推而引之，使自尽之。不设笼槛，以观辽廓之致；不顿缰锁，以极权奇之变。执一德而众力尽，悬大信而群臣竭。高祖聚之以义，太宗用之以道，高宗纵之以仁（《唐文粹·凌烟阁勋臣赞二十二首序》）。这里所提到的“大不逼，小不遏，退者全，来者达”，“不设笼槛”，“不顿缰锁”，在古代专制制度下是难能可贵的。

唐太宗不仅对朝廷大臣十分爱护重用，对地方官员也经常留意考察，以便做到用贤去污，锄暴安良。贞观八年（634），他曾派李靖等诸道黜陟大使巡行全国，升迁廉吏，惩治贪官。因此，贞观时期的吏治是比较清明的。

高太宗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措施，并且保持了比较开明、清廉的政治空气，从而使生产力得到迅速提高，封建经济走向繁荣，出现了比较昌盛的局面。有关史籍曾对“贞观之治”作过比较详细的叙述：“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绢一

匹易米二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物数千里不赍粮。民物蕃息，四夷附降者百二十万人。是岁天下断狱，死罪二十九人，“号称太平”（《新唐书·食货志》）。欧阳修这段评论，可能有些夸大，但“马牛被野”、“民物蕃息”、“号称太平”反映出生产发展、社会安定的局面。贞观之治所带来的政治清明与经济繁荣，使唐朝成为中华文明发展的盛世。唐太宗君臣的作为不仅巩固了李氏王朝，也使人民获得了一个较为安定的政治环境，能够安心地从事劳动生产，从而创建了一个在中世纪罕见的文化灿烂、国力鼎盛富强的中国。

第四节 太宗 时期的宫庭内部纷争

一、承乾骄奢

太宗即位当年就册立嫡长子承乾为太子，那年承乾8岁。承乾幼时很聪敏，所以太宗很喜欢他，很早就常叫他居守监国，还派了两个老功臣于志宁、张玄素做东宫僚属左庶子、少詹事。

没想到承乾成年后恃宠而骄，喜好声色犬马、游戏无度，退朝后就在宫中和宫女、宦官厮混，荒废学业。到贞观十年

(636年)长孙皇后去世后,他更加肆无忌惮、恣意作乐了。

张玄素、于志宁常常规劝承乾。张玄素提醒承乾:祸福都是渐渐地由小发展到大的,如果不谨言慎行,最终要丢掉储位。于志宁劝谏承乾要克俭节用,不要土木不停,要绝淫声、近君子、斥小人,还撰写了《谏苑》20卷。起初,承乾还怕他们奏闻太宗,表面上还装出接受的样子,正襟危坐、虚心倾听、引咎自责。朝廷公卿大臣都信以为真,认为太子贤德,没有察觉他的顽劣。太宗听说张玄素、于志宁一再谏劝太子,又高兴、又赞许。贞观十四年(640),提升张玄素为银青光禄大夫、行太子左庶事,于志宁兼太子詹事。

可承乾对张、于的规劝根本没听进去,反而胆子更大了,骄奢淫逸,多为不法,愈闹愈荒唐。

一次,张玄素听得东宫击鼓声,以为太子召见宫臣,急忙赶去。谁知进宫一看,原来是太子和宫女们在游戏取乐。张玄素叩首切谏,这次承乾一反往常谦逊之态,恼羞成怒,对着张玄素把鼓毁了。接着,一连几个月不见宫臣。张玄素尖锐地批评他:“朝廷选俊贤来辅助殿下,殿下如今数月不见宫臣,怎么纳谏补缺?这便是亲嬖佞、远忠良。”

承乾理也不理,依然我行我素,在宫内胡闹,还在农忙季节,征用民夫用来营造秘室。一次,他派了几个宫奴偷了老百姓的一头牛,在宫内架起铜炉大鼎,亲自烹煮,和宦官们大吃大喝,大闹为乐。又有一次,承乾私召突厥人达哥支进宫,向达哥支学突厥语,又换穿突厥可汗的服饰,命左右也穿胡服,在苑内做扮演突厥可汗的游戏。他以五人为一小部落,制幡旗、设毡帐,自己扮作可汗,高居帐中,一呼百诺。他又命左右烹了

羊羔，自己拔刀割肉，与大家同吃，边吃边说：“我已做过可汗，譬如今日死了，你们为我举哀礼。”说完，突然倒卧在地，僵卧不动。侍臣们就按照突厥丧礼，刺面流血，表示哀痛，然后跨马绕着他走。承乾又突然坐起，笑着说：“我有朝一日，能率领数万骑兵，游猎金城以西，投身突厥可汗帐下，做一名胡官，决不会差劲。”疯疯癫癫，不成体统。

于志宁上书，批评承乾纲纪不立，提醒他不听劝谏，就要使大业堕落。

承乾看完，勃然大怒。他对张、于两人如此唠叨憎恨不已，要除去这两颗眼中钉。他先是派了家奴去暗杀张玄素。家奴在拂晓前伏于途中，突然袭击去早朝经过的张玄素，几乎把张玄素打死。接着，又派刺客张师政、纥干承基去行刺于志宁。两名刺客潜到于府，见于志宁身穿麻衣，头枕土块，睡在草垫上，原来于志宁这时因母去世居丧在家。两人徘徊良久，不忍下手，终于离去。

尽管两次谋刺未成，但从此以后，承乾骄横奢侈，一天比一天厉害。

二、魏王开馆

承乾的名声逐渐败坏，朝廷内外，议论纷纷。这时，魏王李泰却一步一步加紧了夺储的活动。

太宗共有 14 个儿子，承乾，第四子魏王李泰和第九子晋王李治都是长孙皇后所生。太宗对他们特别宠爱，其余诸王都相继外任都督或刺史，只有他们三人留在长安。其中，对李泰

更宠爱。贞观二年，封李泰为越王，授扬州大都督，但并不到任。贞观十年，徙封魏王，遥领相州都督。太子承乾有点蹊脚，所以太宗出巡，也常叫魏王随从。有人告诉太宗，三品以上官职的官员都轻视魏王。太宗竟然把三品以上直到宰相房玄龄都召进宫中，变脸变色，厉声训斥了一顿。房玄龄等人都被训斥得惶惶不安、汗流浹背、跪拜请罪。李泰善文章、有才气，太宗内心想让他继承自己，只因承乾是长子，才立了承乾。但太宗特令李泰在王府别置文学馆，任他引召学士。

王爷开文学馆是循太宗当秦王时的旧例，太宗就是因此得取代建成而为太子的。这是一种特殊的荣誉、权利和安排。太宗的特别宠爱和安排刺激了李泰的野心，他自负才高，萌生了争夺储位之心。他乘机大开馆舍、礼贤下士、广求声誉，一时车水马龙、人物会聚、门庭若市。李泰又与黄门侍郎韦挺、杜如晦的弟弟工部尚书杜楚客等结为朋党，由他们在朝中活动。

贞观十六年（642年）正月，李泰听从王府司马苏勗的建议，把文学馆学士们撰成的《括地志》献给太宗。太宗看了很高兴，赐魏王俸禄可以超过太子。谏议大夫认为这事做得太不合礼制了，上疏向太宗指出这种做法是祸乱的根源，尊嫡卑庶才合礼制。

太宗认为褚遂良说得很对，但却没有加以纠正，反而叫李泰徙居武德殿。武德殿在东宫的西面，过去是齐王元吉的居住处，长安城中都认为魏王居住很不适宜。这时魏征还没死，就上书谏阻，说：“陛下爱魏王，就应抑制他的骄奢，不该让他住在这让人嫌疑的地方。”太宗这才命李泰搬出武德殿。

但是朝廷文武官员已经都揣知太宗宠爱魏王，以为他有

更换太子之意。驸马都尉柴令武和房玄龄的儿子房遗爱等 20 余人皆为李泰笼络，成了他的心腹。韦挺、杜楚客又为李泰在朝中邀结朝士、贿赂权臣，一起散布舆论，说魏王聪明。给事中崔仁师因此向太宗密奏，请求立魏王为太子。承乾担心自己的位子被魏王夺去，暗中指使人假冒魏王府属吏密书，揭发李泰罪恶，太宗识破是冒名诬告，因查捕不到上书人，不了了之。承乾同时也拉拢王公大臣。一时朝中文武，各有依附，形成朋党。

三、东宫密谋

东宫与魏王府勾心斗角，太宗还以为是由于太子月俸太少引起的，六月，诏谕以后东宫取用库物，不加限制。结果，承乾取用无度，更加骄奢，二个月内就用物超过 7 万。太子左庶子张玄素上书，劝太宗对太子用物应加节制。承乾晓得后，恨得咬牙切齿，又派人去行刺，仍未成功。

褚遂良觉得问题已很严重。八月，一次朝会时，太宗问大臣们：“如今国家什么事最紧急？”褚遂良就说：“如今四方没事，只有太子、魏王的名分的确定一事最急。”这时太宗已听到朝臣对魏王也有疑议，觉得李泰确也有点不法之事，想压抑一下他的势力，就采纳了褚遂良的意见，下令限制各王府的官僚。九月，又命魏征为太子太师，扶助太子。贞观十七年（643 年）正月，又对群臣说：“礼制，嫡子死，立嫡孙。现在太子的儿子也已 5 岁了，朕不会让支庶来代替嫡宗的。”想以此来平息天下废立太子的异议。

但是太宗没有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来纠正太子的骄奢，打

消魏王夺储之念。东宫与魏王府的卫储、夺储斗争在继续发展。

在魏征去世后，承乾更加无管无束。太常机构有一乐童，很美、善歌舞，承乾不顾礼法，把这美童私自召入东宫，狎游同卧，赐名称心；又宠幸挟左道的道士秦英、韦灵符。太宗得知后，大怒，把称心及道士等人都杀了，还将承乾狠狠地责备了一通。承乾非常痛心，在宫苑中为称心筑坟树碑，又在宫中辟室，画了称心的像，像前陈列木偶车马，命宫人早夜奠祭，他自己也多次进去，在像前徘徊流涕。他晓得太宗对他愈来愈不满意，索性推托有病，几个月不朝见。每日留在东宫，专习伎乐，歌舞戏玩，昼夜不绝；鼓角之声，传到宫外。

汉王元昌是太宗的庶弟，平日也为非作歹，多次遭到太宗谴责，心怀怨恨。承乾便和汉王特别亲昵，朝夕相处、寻欢作乐。承乾常将左右侍卫分为两队，与汉王各率一队，披毡甲、执竹槊，互相布阵，大呼交战，击刺流血，以为游戏。侍卫有畏缩不前的，就遭鞭打，有的被活活打死。承乾看了，却对汉王笑着说：“我今日做天子，明日就在御苑中设万人营，与您分别统率，看他们互相战斗，岂不有趣！”还说：“我做天子，极情纵欲，有人来谏，就杀了他；十人来谏，杀他十人。杀他几百人，谁还敢多嘴。”汉王说：“愿殿下早做天子。近日见内宫有一宫人，善弹琵琶，大事成功，把她赐给我。”承乾一口答应。

承乾决心先下手除掉魏王，争取早日接位。当时侯君集因为平高昌时私取了许多珍宝，被弹劾下狱，后被释放不问，官复原职，但他自认有功受辱，一直怏怏不乐。承乾得知侯君集怨恨朝廷，正巧侯君集的女婿贺兰楚石任东宫千牛，便多次命

楚石去邀侯君集到东宫密谈。承乾问侯君集如何才能巩固太子的位子，侯君集劝承乾早作戒备，否则就会像隋朝杨勇那样被兄弟杨广夺去储位，还举手煽惑承乾说：“这好手，当为殿下所用。”承乾大喜，送了侯君集许多东西，还叮嘱侯君集和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刺探太宗意图，伺机不轨。

承乾原怀疑东宫的一些丑事是魏王告发的，因此，他暗中派豢养的刺客张师政、纥干承基及百余壮士四出谋刺魏王，可因为魏王戒备也很森严，一直未能成功。汉王劝承乾早反，于是承乾和汉王，还有驸马都尉杜如晦之子杜荷等一起密谋。参与密谋的人，都刻臂出血，用白帛揩吸了血，然后把血帛烧成灰，和在酒里一同饮了，誓同生死，密谋举兵。杜荷对承乾说：“天文一有变，就立即起事。到时殿下只要假称病重，皇上一定会亲临东宫，那时动手，可以一举成功。”

四、齐王造反

正当东宫密谋在进行时，突然杀出了个“程咬金”，齐州（治所今山东济南）都督齐王李祐造反。

李祐是太宗的第五子，轻浮急躁，尤好游猎。他的母舅阴私智对他说：“大王兄弟众多，皇上百年后，必须多得武士相助才能保全。”劝他早作打算。于是，李祐在府中召养了许多剑客壮士。

王府长史薛大鼎多次规劝，毫无效果，太宗撤了薛大鼎，调吴王府长史权万纪任齐王长史。权万纪虽正直但偏急，将梁猛彪等王府壮士逐出王府，又入朝条奏李祐过失，又说李祐定

能改过。太宗非常高兴,表扬了权万纪,又下敕批评李祐。李祐大怒,说:“长史出卖我,一定要杀了他!”

权万纪因为已在太宗面前夸下海口,对齐王管得更严,不准齐王出城,把齐王的鹰犬也全都放了。他又以为梁猛彪等人要加害自己,逮捕了梁等数十人。太宗又诏李祐和权万纪一同入朝,这下李祐耐不住了。权万纪先行,李祐派了 20 余骑在中途追上权万纪,射杀了他。同时还追杀了太宗派任的王府典军韦文振。接着,私置官职,开库行赏,驱民入城,修缮甲兵城堞。

三月,太宗命兵部尚书英国公李世勣发九州兵讨伐齐王。李世勣兵还未到,齐州内乱。齐王府兵曹率千余人鼓噪举事,叛乱瓦解,李祐被捉,齐州悉平。李世勣发兵的第十天,就拘押李祐及其同党,解回了长安。李祐赐死,同党被诛 46 人。

太子承乾听说齐王造反,正在庆幸,对纥干承基等人说:“东宫西墙,离大内不过二十步,与卿等举大事,岂是齐王可比!”不料审问齐王一案,牵连出纥干承基,被逮下死狱,纥干承基想立功求生,就告发了东宫密谋。

四月,太宗命长孙无忌、房玄龄、萧瑀、李世勣与大理卿孙伏伽、中书侍郎岑文本、御史大夫马周、谏议大夫褚遂良诸大臣会审,查明确有其事。于是诏废太子承乾为庶人,汉王元昌自尽,侯君集、李安俨、杜荷等全都伏诛。

五、晋王即位

自太子承乾被废以后,储位出缺。魏王兴致勃勃、跃跃欲试,他早晚侍奉太宗,格外殷勤。太宗称赞他恭顺,当面许诺立

他为太子。中书侍郎岑文本、侍中刘洎也劝太宗立魏王为太子。长孙无忌不同意，坚持请立晋王李治为太子。李泰揣知太宗也很爱晋王，就故意撒娇，投入太宗怀里，说：“臣今日始得为陛下的儿子，是臣的再生之日。臣儿只有一子，臣死之日，就将他杀死，传位给晋王。”

太宗很感动，把李泰所说如此这般地告诉了侍从大臣，并表示不忍另立别人为太子。褚遂良立即表示反对，说：“陛下此言大错。试想：魏王一旦继任皇位，怎肯杀他爱子，传位给晋王。陛下前番既立承乾，又殊宠魏王，以致酿成兄弟争位之祸。前事不远，足以为鉴。陛下一定要立魏王，请先把晋王安置好。”太宗听了，流下泪来，犹豫不决，起身回宫。

李泰听到风声，恐怕太宗立晋王，就去恐吓李治说：“你和元昌关系密切，如今元昌犯罪，你能没事吗？”

李治还只16岁，被吓得整日忧形于色、呆若木鸡。太宗见了，感到奇怪，经过多次询问，李治就把李泰对他说的话原原本本告诉了太宗。

太宗听了，这才发现李泰阴险，对李泰感到很失望。他很后悔，不该许诺李泰为太子而把这事怪到承乾头上，召承乾面责。

承乾说：“臣贵为太子，还要求什么？就因魏王图谋东宫，才谋自安，被人教臣不轨的。如今陛下若要立魏王为太子，真是落入了他的算计。”

接着，太宗在两仪殿视朝听事后，命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勣、褚遂良和李治留下，把李泰恐吓李治的话告诉四大臣。他心灰意懒地说：“我三子一弟（指承乾、泰、祐和元昌）如此行

为,我心也碎了,活着还有什么味道!”说到这里便倒在了床上,拔出佩刀就要自杀。长孙无忌急忙上前抱住太宗。褚遂良夺下刀,交给李治。四大臣一起奏:“陛下究竟想立谁为太子?”太宗说:“我要立晋王。”长孙无忌等说:“谨奉诏。谁有异议,臣请就斩谁!”

太宗马上对李治说:“你舅舅同意立你为太子了,你该拜谢。”李治忙跪下叩头。

太宗还有点不放心,对四大臣说:“公等已同意,不知外界议论如何?”四大臣齐声说:“晋王仁孝,天下归心已久,请陛下速召百官,一问便知。”

于是太宗转临太极殿,召见六品以上官员,说:“承乾悖逆,李泰凶险,都不可立为太子。卿等以为选谁合适?”群臣欢呼说:“晋王仁孝,当为储君。”太宗很高兴。

这时太极殿外西门永安门的门官报告:李泰带了百余骑在门外探听消息。太宗立即敕令把李泰的随骑拦在门外,把李泰一人引入太极殿北宫外北苑幽禁了起来。

次日,太宗登太极殿的中门承天门,诏立李治为皇太子,大赦天下。太宗对大臣们说:“如立泰为太子,那末太子之位就变成可以钻营得之啦。从今往后,太子失德,藩王窥伺东宫,一并废黜,传及子孙,永为后法。”还说:“立泰,承乾和治都难保;立治,承乾和泰就都能安然无恙了。”

第四天,太宗诏以长孙无忌为太子太师,房玄龄为太傅,萧瑀为太保,李世勣为太子詹事,左卫大将军李大亮为左卫率,于志宁、马周为左庶子,吏部侍郎苏勗、中书舍人高季辅为右庶子,刑部侍郎张行成为少詹事,褚遂良为宾客,让这批

朝廷元老和重臣都做东宫僚属，辅佐新太子。萧瑀和李世勣还兼同中书门下三品，唐官制自此设同中书门下三品。

接着，太宗诏遣李泰出京，外任雍州牧、相州都督，降爵为东莱郡王。凡是李泰的亲信都迁官到岭南。他拿着李泰过去的表章对大臣们说：“李泰文辞美丽，岂非才士。我内心实爱着他，这是卿等都知道的，但为了社稷大计，只好断割私爱，让他离开京师，这也是两全之策。”九月，又把承乾安置到黔州，李泰安置到均州。这样，进一步解除了对李治的心理威胁，他的储位更加巩固了。

此后，太宗每日早朝，命李治跟随左右，让他了解政务，为他继位作准备。太宗又命刘洎、岑文本、褚遂良、马周轮流到东宫，与李治讲论学问。太宗自己也随时教导李治，吃饭时教导他要知稼穡之艰难，才能常有饭吃；骑马时，教训他要知道让马有劳有逸，不用尽其力，才能常得马骑；乘舟时，对他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犹如水，君犹如舟”；见李治在树下休息，就告诉他，木从绳就正，君主听从劝谏就能成为圣君。

贞观十七年年底，太宗敕选美女，充实东宫。李治遣于志宁去见太宗，把选美女推辞掉。太宗因此竟怀疑太子仁弱，想改立第三子吴王恪，秘密召见长孙无忌说：“公劝我立雉奴（治小名），可雉奴柔弱，恐不能守社稷。吴王恪像我，我想立恪，怎么样？”无忌竭力反对。太宗冷笑说：“公因为恪不是你亲甥才反对吗？”无忌据理力争，说：“太子仁厚，确是守国良主；储位至重，岂可一再更易！愿陛下郑重考虑。”太宗终于打消了更立吴王的念头。

太宗又恐吴王不服李治而生二心，告诫他说：“父子虽是

至亲，但犯了罪，天下之法也不能私用。过去汉已立昭帝，燕王旦不服，图谋不轨，霍光杀了他。为人臣子，不可不戒！”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正月，太宗自撰《帝范》，有《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12篇，把它赐给李治，告诉他“修身治国之道，全在其中”，嘱他谨守国家。

到贞观二十三年四月，太宗病重，嘱咐李治说：“李世勣才智有余，但你对他无恩，将来恐不能臣服。现在我将他贬居边远之地，如果立即就走，等我死后，你再授他仆射，他必感恩图报；他若徘徊顾望，就杀了他。”五月，诏令李世勣出任离长安1340里的叠州都督。李世勣晓得太宗用意，受诏后，家也不回，就离京而去。

这时萧瑀、房玄龄也都已去世，长孙无忌为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省事，褚遂良为中书令。太宗在翠微宫含风殿病榻上召见无忌、褚遂良托付后事，对两人说：“朕今日把后事全托付公辈。太子仁孝，公辈好好辅导他！”又对李治说：“无忌、遂良在，你不必忧虑！”再嘱咐褚遂良，说：“朕得天下，多得无忌出力，朕死后，不要让奸人谗害他！”即命褚遂良起草遗诏。一会儿，这位一代英主，就与世长辞了，终年53岁。

李治抱着长孙无忌号啕大哭，哀痛不已。3天后，发丧太极殿，宣读遗诏。四夷入仕唐朝及来朝贡的使者数百人，闻太宗死，都恸哭，剪发、割面、割耳，流血洒地，表示哀痛。

六月一日，李治即位，史称高宗。时年22岁。

高宗任命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同中书门下三品。不久又遵照太宗遗命，调李世勣回京任左仆射。李世勣果

然感恩不已，与长孙无忌、褚遂良同心竭力，辅佐高宗。

第五节 武则天称帝

一、武后临朝

高宗即位第二年(650年)，改元永徽。永徽初期，君臣兢兢业业，朝廷大体上相安无事，就是后宫王皇后与萧淑妃相互争宠，高宗两面为难。到后来，高宗索性撇了两人，另去长安安业坊感业寺寻访老相好了。

原来，太宗生前曾有一小宠姬，生得妩媚艳丽，14岁进宫，被封为才人。她就是大名鼎鼎的武则天，名曌。高宗做太子时，乘入侍太宗之机，与她偷过情。太宗去世，武才人和许多太宗嫔御一起被安置在感业寺中为尼。高宗进了感业寺，寺众接驾。高宗举目望去，其中姿容出众、丽色照人的正是武才人，只见她桃花如旧、人面依然，不过少了一头凤髻、两鬓鸦鬟。等烧过了香，高宗便携了武氏进云房叙旧，两人久别重逢、悲喜交集，不由情不自禁、相对哭泣。

这事给王皇后知道了。但王皇后正因妒忌萧淑妃，一想正好可给萧淑妃树一敌手，所以非但不责怪，反而劝高宗把武才人接回宫来，还暗中叫武氏蓄发。武氏蓄发不久，又是一头乌云，便随了内侍回到唐宫。这时她26岁。武氏十分乖觉，见了

王皇后，就恭恭敬敬地叩下头去，还说了许多恭维话，王皇后十分高兴。以后，武氏极力巴结王皇后，把王皇后哄得喜欢不尽。王皇后也就常在高宗面前说武氏的好话。不久，高宗封武氏为昭仪。

从此，萧淑妃和王皇后都日益失宠。王皇后见弄巧成拙，十分懊悔，就与萧淑妃联手，与武昭仪争宠。可高宗根本不理她们，只相信武昭仪的话。武昭仪见自己名位已定，又愈来愈受高宗宠爱，就开始了陷害王皇后、争夺后位的阴谋。

武昭仪先百般笼络宫女、女官，每次得到赏赐就全分给她们。这些宫人因为王皇后平时脾气大、不尊重她们，对王皇后素有怨言，如今见武昭仪对她们倾心相交，自然很感激，都乐意为她所用。然后，武昭仪就命受她笼络的宫人暗中监视王皇后，把王皇后的一举一动报告给她。她再添油加醋说给高宗听。可谁知高宗虽然不常与王皇后同房，却也没有废后之意。武昭仪只好另想良计。

机会终于来了。永徽五年（650年）十月，武昭仪生了个女孩，王皇后很喜欢，到昭仪宫中看玩。武昭仪心中盘算定当，等王皇后一走，就残忍无情，扼死了亲生女儿，然后再给死婴盖上被子。高宗来了，武昭仪承欢言笑了一会，就揭开被子，装作突然发现死婴，假意啼哭起来，并问左右有谁来过。左右都说：“皇后刚刚来过。”高宗听了，勃然大怒，说：“皇后杀了我的女儿！”武昭仪乘机大进谗言，于是高宗决意废王皇后。

废立皇后，在中国帝王朝代，可是国家大事，必须通过大臣。高宗感到首先要取得执政的舅舅长孙无忌的支持，当夜就带了武昭仪，御驾来到太尉府。君臣在厅上畅饮，饮到高兴处，

高宗忽然授长孙无忌的三个儿子为朝散大夫。长孙无忌推辞不过,接受了。这时高宗装作随便的样子,说皇后无子还要妒忌别人。长孙无忌方知高宗此来用意,但他假痴假呆,不接口,旁顾左右而言他。高宗与武昭仪见长孙无忌有意回避,心中不悦,罢席而归。

但高宗还不死心,暗中派内侍送去金银宝器各 1 车,绫锦 10 车,讨好长孙无忌。武昭仪又多次支使母亲杨氏到太尉府,祈请长孙无忌立武昭仪为后,长孙无忌不应许。卫尉卿许敬宗也屡去见长孙无忌,劝长孙无忌依允,给长孙无忌狠狠训了一顿。

这时武昭仪又生了个儿子。叫李弘。她得意非凡,非要取王皇后而代之。她命心腹宫女准备了一个木偶,上写高宗姓名与年庚八字,悄悄埋在王皇后宫中,然后便去报告高宗,高宗气冲冲来到王皇后宫中,命内侍挖掘,果然得一木偶,不由大骂王皇后。他不听王皇后分辩,也不顾大臣反对,准备一意孤行,要废王皇后。永徽六年(655 年)六月,高宗在武昭仪撺掇下,下敕禁止皇后母柳氏入宫,把吏部尚书柳奭贬到外州去做刺史。武昭仪又引许敬宗、御史大夫崔义玄、中丞袁公瑜、中书侍郎李义府为心腹,在朝臣中为她活动。瓦岗名将裴仁基之子长安令裴行俭获知高宗执意要立武昭仪为后,认为国家之祸将从此开始,十分焦虑,与长孙无忌、褚遂良商议怎么办。此事被袁公瑜侦知、告发,裴行俭也被贬为外任。

就这样,废立皇后事被长孙无忌等大臣顶了半年多,君臣冲突终于爆发了。

九月,高宗升许敬宗为礼部尚书,表明了要立武昭仪为后

的意向。退朝后，召长孙无忌、李世勣、于志宁、褚遂良入内殿议事。褚遂良看出了高宗的意向，说：“今日召我们，多半为了中宫的事。皇上心意已决。太尉是元舅，司空（李世勣）是功臣，不能让皇上背上杀元舅功臣的恶名。我起自草莽，无汗马功劳，得居高位，又受先帝顾托，不以死争，有什么面孔去见先帝！”表示由他去力争，阻止高宗废王皇后。于是李世勣称病不入。

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三人进了内殿，高宗劈面就问：“皇后不生儿子，武昭仪有儿子，今朕欲立武昭仪为皇后，怎么样？”褚遂良挺身反对，说：“皇后出身名门，是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时，拉着臣手说：‘朕佳儿佳妇，托付给卿。’这话陛下也听到。如今言犹在耳。皇后没有过失，岂可轻废！臣不敢曲从陛下，违背先帝遗命！”君臣不欢而散。

第二天，高宗临朝，正式提废立皇后的事。褚遂良跪奏说：“陛下一定要另立皇后，也应慎重从名族中选择，何必立武氏？武氏侍奉过先帝，天下人都知道，实在不妥，后世也要议论陛下！”说完，把朝笏放在殿阶上，脱帽叩头，说：“笏还给陛下，放臣归田里。”血都叩了出来。这番话无疑是揭了高宗的丑，高宗恼羞成怒，命令左右将褚遂良撵出去。武昭仪在帘内火上浇油，大声尖叫：“何不扑杀此獠！”长孙无忌闻言，急忙出班保奏：“遂良是顾命大臣，就是有罪，也不可加刑。”褚遂良才得免难。侍中、太子宾客韩瑗和中书令、检校吏部尚书来济也都涕泣谏阻废王皇后，弄得高宗无法可想。

可就在这时，李世勣背叛了长孙无忌、褚遂良，在另一天，单独去见高宗。高宗向他问计：“朕想立武昭仪为后，褚遂良坚

持反对,他又是顾命大臣。难道这事就这样算了么?”李世勣说:“这是陛下家事,何必还去问外人。”为高宗解决了难题,高宗主意打定了。许敬宗受到指示,就在朝房中,肆无忌惮地宣扬:“田舍翁多收了十斛麦子,还想换个老婆,何况天子呢!天子要另立皇后,关别人什么事,要妄生异议!”

于是,高宗放开了手脚,贬褚遂良到离长安 2400 多里的潭州(治所今湖南长沙)做都督,来儆戒反对另立皇后的朝臣。韩瑗悲泣不已,上疏再谏,说褚遂良是社稷忠臣、大唐的微子,不能远放。影射武昭仪是亡殷的妲己,一旦立为皇后,大唐易姓就不远了。高宗根本听不进去。

十月,高宗下诏说: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鸩毒,废为庶人。她们的母亲及其兄弟都除名,流放岭南。第七天诏立武昭仪为皇后。十一月初一,举行册立仪式,由李世勣把皇后玺绶授武后,百官在肃仪门朝见新皇后。武后从此走向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高宗内外政事,多与武后商议。武后原有政治野心,又有政治才干,渐渐地骄恣自擅,跟高宗争起权来。高宗被弄得很不高兴,转而想起废后王氏和废妃萧氏的好处来。王皇后、淑妃被废后,囚在冷宫别院。高宗找了一个机会,瞒着武后,去看望王皇后和萧淑妃。只见囚室严密封闭,只留一个壁洞供递送食物,高宗不觉惻然伤心,在室外呼喊:“皇后、萧淑妃在哪儿?”听得高宗声音,王皇后哭泣起来,回答说:“妾等得罪,贬为宫婢,哪能还有尊称!”又哀求说:“陛下如果还念旧情,使妾等重见天日,乞求名此院为回心院。”高宗应允说:“朕自有处置。”

谁知消息走漏，武后知道了，勃然大怒，跟高宗大吵一场，还想了一个狠毒残忍的惩罚王、萧两人的办法，说：“叫这两个婆子骨醉！”她矫旨派人将王、萧两人各杖一百，然后斩断了两人手足，叫做“人瓮”，塞进了酒瓮。王、萧两人晓得是武后之谋，萧淑妃大骂：“阿武妖猾，到这个地步！我愿下世投生做猫，叫阿武做鼠，扼她的喉！”浸了数日，两人就死了。

来人把萧淑妃的话回了武后。武后又恨又怕，命将已死的王、萧两人的首级割下泄恨，又下令宫中不许养猫。可是她仍经常梦见王、萧两人披发沥血来找她算账，吓得她一再迁居，最后不敢再住在长安，徙居到洛阳。

杀害了王皇后、萧淑妃，武后巩固了在后宫的地位，进一步挟持高宗。高宗昏庸，政事多听她取决，重用武后心腹许敬宗、李义府。许、李两人是唐初出名的奸臣，都在立武后中立了大功。许敬宗出身江东士族，隋末投奔李密。他为人无行，但写得一手好文章，被秦王召补秦府学士。高宗即位，就重用他，代于志宁为礼部尚书；后因嫁女纳贿，被弹劾降职，但很快召入为卫尉卿、加弘文馆学士，兼修国史，不久复职礼部尚书。许敬宗修国史，歪曲事实，凡恨的人，就写得坏，谁贿赂他，就隐去恶事。处理政事更是顺风阿旨，阴附武后。李义府也以善文章著名，也为人阴险奸猾，平时逢人先笑，但一肚皮坏水，只要稍有嫌隙就要暗中陷害。当时人都说他笑中有刀，因他阴柔而能害人，背后给他起了绰号，叫“李猫”。高宗拜他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

许敬宗为了进一步投靠武后，就在王皇后被害后，立即上奏说太子李忠是庶出的，应废庶立嫡。也就是要改立武后的儿

子为太子。李忠是高宗长子，永徽三年立为太子，但是后宫刘氏所生，没有坚强的靠山，他很知趣地主动提出让位。显庆元年（656年），高宗改封李忠为梁王，立武后的长子李弘为太子。从此，武后没有了后宫之忧，集中心思，来对付不合己意的元老勋臣，控制朝臣了。许敬宗、李义府是她的最好帮手。

武后撺掇高宗，升许敬宗为侍中，李义府参加政事兼中书令。许、李两人就迎合武后旨意，诬奏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勾结褚遂良图谋不轨。高宗准奏，将褚遂良一贬再贬，韩瑗、来济也被贬为外州刺史。不久，褚遂良、韩瑗忧愤而死。武后在通向执政的道路上，又清除了一个重要障碍。

接着，武后指使许敬宗伺隙构陷长孙无忌。恰巧这时有人告发太子洗马韦季方结党，高宗命许敬宗审理。许敬宗严刑逼讯，要韦季方攀诬长孙无忌。韦季方被逼不过，想要自杀，却又没有死成。

许敬宗竟抓住这个机会，诬奏韦季方想与长孙无忌勾结，陷害忠良，伺机谋反，如今事情败露，畏罪自杀。高宗不信，说：“舅舅怎么会谋反！”许敬宗说：“臣审得详细，反状已清楚，陛下还要怀疑，恐非社稷之福。”高宗不禁哭泣起来，说：“我家不幸，亲戚间屡有异志，往年高阳公主与房遗爱谋反，如今我舅舅又是这样！如果事情真是这样，该怎么办啊？”许敬宗说：“房遗爱是乳臭小儿，成得了怎么气候。可无忌与先帝谋取天下，做了30年宰相，如果一旦谋反，谁能挡得了他。请陛下速作决定。”

高宗仍下不了决心，命许敬宗再去详细审问。次日，许敬宗奏说：“昨夜季方已承认与无忌同反。季方供说柳奭曾劝无

忌立梁王为太子，如今梁王被废，无忌忧恐，为自安之计，才日夜与季方商议谋反。”高宗相信了，又哭泣起来，说：“舅舅果真如此，朕决不忍杀他。杀了他，天下人一定要骂朕，后世一定要骂朕！”许敬宗催促说：“古人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安危之机，间不容发。陛下若不早决，臣恐变生肘腋，后悔无及！”

高宗于是不再犹豫，也不召问长孙无忌核实，就下诏削去长孙无忌官职及封邑，押送到黔州安置。又废梁王为庶人，贬柳奭到象州，贬于志宁到荣州。不久，又派人到黔州逼长孙无忌自杀，到象州杀死柳奭。长孙无忌的子孙近亲也被杀的被杀，流放的流放。杀了长孙无忌，武后更加肆无忌惮，揽权行威。显庆五年（660年）十月，高宗小中风，头痛、目不能视，百官奏事，只得都委武后批决。武后聪明敏锐，涉猎文史，因此所处理的事都能符合高宗意思。于是政权渐渐移归武后，威势与皇帝一样。高宗称天皇，武后称天后，中外称之为“二圣”。

可是武后因此愈来愈骄横，不再奉顺高宗旨意，渐渐不把高宗放在眼里。高宗一举一动都受制于武后，不能自己做一点事，他对此愤愤不平，偷偷地召来西台侍郎上官仪商议对策。上官仪说：“皇后专恣，天下人都不赞成，废了她。”高宗认为不错，就命上官仪起草了废后诏。

谁知宫中早就布满武后心腹，奔告武后。武后急忙赶来，大吵大闹，吓得高宗畏首畏尾，不敢发出诏书，还说：“我初无此心，都是上官仪教我的。”于是武后立即唆使许敬宗诬告上官仪一状，说他串通废太子李忠，阴谋叛逆。高宗这时已毫无主意，一切听任武后。结果，李忠赐死、上官仪处死，凡平时与上官仪有过来往的朝臣士大夫统统贬官流放。

从此，高宗临朝，武后垂帘听政。政事不论大小，官员要升要降、要斩要杀，都由她说了算。天下大权，全归中宫，高宗不过傀儡一个，拱手而已。武后正式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二、鸩杀李弘、逼死李贤

武后意犹未尽，想进一步独揽朝政。上元元年（674年），她引用了一批文学之士，随侍左右。平时，命他们撰写《列女传》、《臣轨》、《百僚新戒》等书，藉以从思想上控制和督责臣民；朝廷奏议、百官奏疏，就命他们阅议参决，以分宰相之权。这些学士不经设在皇城的朝官衙门（“南衙”），出入宫城北门，时人称他们为“北门学士”。

武后正在得意逞志时，与亲生儿子发生了冲突。武后生了四个儿子，长子李弘，次子李贤，三子李哲，四子李旦。太子李弘与母亲性情迥异，仁孝谦谨，礼敬大臣朝士，所以很得人心。他多次奏请，违忤武后旨意。武后对他很恼火。李弘有两位异母姊姊义阳、宣城二公主，都是萧淑妃所生，被武后长期幽禁在掖庭，年过30，还未能出嫁。一次，李弘在掖庭见到了二公主，又惊，又可怜，立即奏请高宗，让她们出嫁。高宗应允了。武后得知后，怀恨在心。

当时高宗病发得很厉害，一班逢迎钻营的朝臣提议让武后摄知国政。可高宗接受了中书侍郎郝处俊、李义琰的谏议，要让太子监国。这样，武后要独揽朝政，李弘就成了她的障碍，她再也容不得这个亲子了。

上元二年（675年）四月，武后在合璧宫鸩杀了李弘。高宗

正想禅让给太子，得了凶讯，很悲痛，下诏谥李弘为孝敬皇帝。帝子谥皇帝，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

六月，立李贤为太子，随即又命他监国。不料李贤也与武后性情不合。正议大夫明崇俨以符咒奇术得武后宠信，他揣知武后不喜李贤，就经常密告武后，说李贤长相不好，不能继位，还是英王李哲貌像太宗，相王李旦相贵。宫中还有人议论，说太子是皇后姊韩国夫人生的。这些话传到李贤耳中，李贤心中又疑又怕。武后又命北门学士撰写了《少阳正范》和《孝子传》等书，不断送给李贤，暗寓训斥，还多次自写书信责备李贤。李贤愈加不安，日益消沉下去，沉湎酒色。

高宗调露元年（679年）五月，明崇俨奉武后命到长安办事，途中逢盗被杀。武后怀疑是李贤指使的，只是一时查不出证据。永隆元年（680年）八月，东宫司仪郎韦承庆向武后报告，说太子与户奴赵道生等狎戏。武后正苦于找不到太子的岔子，这下就抓住机会召李贤到洛阳训斥，又遣中书令薛元超，裴炎和御史大夫高智周三人负责案查东宫。临行时，又向三人面授旨意。三人带人在东宫搜来搜去，竟在马坊里搜出了数百件黑色甲冑，取为谋反的证据。他们又抓了赵道生，逼他招供受太子指使杀了明崇俨。

三人大功告成，回报武后。武后说：“做儿子的心怀逆谋，天地不容，罪不可赦！”要“大义灭亲”，处死李贤。幸亏高宗代子求情，废为庶人，得免一死。第二天，立英王李哲为太子。

次年（681年）十一月，李贤被流放到巴州（今四川重庆）。李贤在徙所，郁郁不欢，写了一首《黄台瓜词》：“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为可，四摘抱蔓

归。”后来有人把这词抄给了武后。武后越看越觉这是在讽怨自己，就暗中派左金吾将军丘神勣潜往巴州，逼李贤自杀而死，死时只有 32 岁。李贤处事明审，很有才干。他曾招集很多学者集体注释范晔《后汉书》，在史学上很有价值。

三、废中宗

自李贤被废后，高宗病势日重。弘道元年（683 年）十二月，崩于贞观殿，时年 56 岁。临死前，召裴炎受遗诏辅政太子。遗诏说，军国大事不能决定的，听武后意见。7 天后，李哲即位，是为中宗。中宗尊天后为皇太后，政事都由她裁决。又以刘仁轨为尚书右仆射，裴炎为中书令，把政事堂从门下省迁到了中书省。

过了元旦，中宗册立韦后。中宗生性庸弱，要授韦后父玄贞为侍中。裴炎再三谏阻，中宗大怒，厉声说：“我把天下给韦玄贞也无不可！难道还吝惜一个侍中吗？”裴炎听得呆了。后来，裴炎把这事报告了武太后，君臣设下计谋，准备废去中宗。

二月，武太后在乾元殿召集百官。裴炎和羽林将军程务挺按预先布置，带兵进殿。忽然，裴炎宣布太后敕书，废中宗为庐陵王，程务挺随即将中宗扶下了殿。中宗惊恐万状，问：“我有什么罪？”武太后斥说：“你想把天下送给韦玄贞，还能说没有罪？”中宗无话，垂头丧气，被押走了。

次日，立李旦为皇帝，是为睿宗。武太后把睿宗安置在别殿，所有国政，不得过问，仍由太后决定。此后，武后常在洛阳宫乾元殿后的紫宸殿中，垂下浅紫色的帐，临朝听政。

武太后想自做皇帝，因此，对姓李的，即使是亲生儿子，都不相信。不久，她把庐陵王李哲赶出京城，一徙再徙到均州（今湖北均县），同时，大封武姓，授侄子武承嗣为太常卿、同中书门下三品，武三思为右卫将军，还有武攸暨、武攸宁、武攸归、武攸望等，都晋级加官。还建立武氏五代祠堂，大封已故武氏祖宗。九月，改元光宅；更改官名，改尚书省为文昌台，左、右仆射为左、右相，门下省为鸾台，中书省为凤阁，侍中为纳言，中书令为内史，御史台为肃政台，其余省、寺、监、率等也都改换名称。还改东都为神都。她为替代大唐，建立武姓皇朝，做着一切准备。这一年，历史纪年称为则天后光宅元年。

四、徐敬业讨武失败

就在武则天一步一步走近皇位的时候，英国公徐敬业在江南起兵反武。

诸武用事，原唐室官更多受排挤，因此唐宗室人人自危，人情愤怨。不久，在扬州聚集了一批贬官，其中有李勣之孙英国公敬业、唐初四杰之一的骆宾王等。他们在扬州碰聚，同病相怜，怨恨大发。大家共推徐敬业为统帅，称匡复府上将，领扬州大都督；故御史魏思温为军师，骆宾王为记室，以匡复庐陵王为名，杀了扬州长史陈敬之，起兵反武。不过 10 天，聚兵 10 余万。

接着，由骆宾王起草了《讨武曌檄》。檄文列数武则天“秽乱春宫”、“残害忠良”等罪状，揭示她“窃窥神器”的野心。

这是篇千古名檄，精彩生动，气韵盎然。武则天边读边微

笑,读到“一抔之土未干”,不由惊叹,问侍臣:“这是谁写的?”侍臣答:“是骆宾王。”武则天说:“让这样的人才,流落在外,真是宰相的过失。”

武则天召裴炎问计。裴炎因匡复军右司马薛仲璋是他的外甥,不希望兴兵征讨,就对武则天说:“皇帝年长,不亲主政事,所以敬业这小子才有了借口。如果太后返政给皇帝,叛众便可不讨自平。”

武则天听了很不高兴,等裴炎走后,又召武承嗣商议。武承嗣认为叛军都是乌合之众,一扫就平。武则天将裴炎的意见告诉武承嗣。武承嗣说:“裴炎的外甥薛仲璋参加叛党,所以才说这个话。监察御史崔察说裴炎也参与谋反。”武则天马上召崔察讯问。崔察早受了武承嗣的密嘱,添油加醋说裴炎如果不反,为什么要太后返政呢。武则天深信了,立即逮捕了裴炎。不久,便斩了裴炎,把为裴炎说话的几位朝臣凤阁舍人刘景先、侍郎胡元范、太仆寺丞 仝先全都流放到边州。

与此同时,武则天命削去敬业祖、父官爵,劈坟斫棺,复本姓徐;并命左钤卫大将军李孝逸为扬州道大总管,侍御史魏元忠为监军,统率 10 万大军,日夜兼程,开赴江淮前线,征讨徐敬业。

徐敬业起兵后,犯了方向性错误,被武则天赢得了时间。起先,魏思温建议:“明公以匡复为名,应该率领大军鼓行进,直捣洛阳,这样天下义士都知道明公是志在勤王,自然四面响应。”薛仲璋反对,主张南取金陵,说:“金陵有王气,又有长江天险可凭,不如先取常、润州,作为基地。然后北图中原,进无不利,退有所归,这才是良策!”魏思温坚持说:“山东豪杰都因

为武氏专制，愤愤不平，听说明公举事，都自蒸麦饭为粮，举锄作兵器，等待南军北进。不乘这个情势建立大功，反而畏缩，自谋巢穴，远近闻知，谁不解体！”但徐敬业采取薛仲璋的意见，派左长史唐之奇守江都，自率主力南渡长江，攻占了润州（今江苏镇江）。兵发时，魏思温对右长史杜求仁说：“兵势合则强，分则弱。敬业不并力渡淮，收聚山东之众以取洛阳，失败就在眼前了。”等攻破润州，捉住润州刺史李思文，魏思温提议将李思文斩首示众，可徐敬业因思文是他的叔父，不肯听从，只将思文改姓武，关在狱中。魏思温叹说：“不顾大义，专徇私情，哪有不失败的，我辈死无葬身之地了！”

就在这时，李孝逸率军进抵泗州（今安徽盱眙对岸）。徐敬业闻报回师北上，暂屯高邮境内的下阿溪，派弟敬猷北上据守淮阴，别将韦超、尉迟昭屯兵都梁山（今盱眙南）。

官军前锋发动进攻，被南军杀得大败。李孝逸首战失利，不敢前进。魏元忠说：“天下安危，在此一举。如今大军逗留不进，万一朝廷另派大将替代将军，将军怎么办？”于是李孝逸引军向前，与南军再战，阵斩尉迟恭。

支度使薛克杨建议一举攻下都梁，说：“都梁地形虽险，但兵少，一举攻下，淮阴、高邮必望风瓦解。”行军司马罗艺认为还是改道直趋江都，活捉徐敬业，那时树倒猢猻散，定获全胜。诸将纷纷附和。魏元忠力排众议，说：“贼的精兵，都在下阿，这里都是乌合之众，利在一决。敬猷是赌徒出身，不懂军事，一攻即克。乘胜前进，就是韩信、白起再生，也抵挡不住。”

李孝逸听从魏元忠之计，进击都梁。韦超星夜逃窜，不战自溃。官军进攻淮阴，徐敬猷望风而逃。李孝逸沿运河南下，

直扑下阿溪。徐敬业沿溪列营迎战，连战连胜，连斩数将。李孝逸害怕了，想退兵。魏元忠不同意，建议火攻。正好这时南军疲弊，顾望不振。李孝逸因风纵火，大败南军，斩首 7000 余，溺死者不可胜计。

徐敬业兄弟两人，轻骑逃进江都，带了妻子，奔到润州，弃马登舟，顺流出海，准备去高丽避难。船行到海陵（今江苏泰州），被风所阻。部将王那相突然叛变，杀了徐敬业、敬猷、骆宾王，及敬业妻子等 25 人，携首级投降了李孝逸。其余魏思温、唐之奇等余党也全被肃清。徐敬业讨武，只因为存了点私心，希求金陵王气，不过 50 多天，就失败了。

五、奖励告密 委政酷吏

武则天平定了徐敬业之乱后，总是疑心天下臣民想推翻她，觉得宗室大臣不服她的久专朝政。她先杀了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又把废后的亲属全流放到崖州。不久，连平徐有功的李孝逸也遭贬。李孝逸后在流亡中病死。可武则天还不放心，为了控制人心，巩固她的专政，她奖励告密，委政酷吏，枉捕滥杀，树立淫威。

垂拱二年（686 年）三月，武则天命立时铸造铜匭，设在都门，大开告密之门。不管谁，都可把密奏投入铜匭。京都外有人要向她告密，即使是农民樵夫，官府衙门都要供给驿马，送到京城，好吃好住。密奏确实，给官做。不实，也不问罪。于是想投机做官的，想报私仇的，像黄蜂一样，涌到长安投匭，告密风盛行全国。

铜匭,是个铜匣,方形,四面各开投书口,可进不可出。铜匭四面分别漆以丹青白黑四种颜色,匭中也分置四隔,原规定不同内容的书疏可以分投于不同的隔中,其形式有如今日之“检举箱”。可是,实际它是专为告密而设的。

铜匭设置以后,告密者日多,案积如山,武则天就拔擢了一批新法官来刑讯治狱。这些人多是告密者,出身无赖,性残忍,善于罗织罪名、陷害无辜。武则天就以这些酷吏作刀斧,先诛杀宗室数百人,又杀大臣数百家,刺史以下的军政官吏则不计其数,有力地打击了李唐宗室及旧朝廷的势力。

但是,酷吏的滥杀,也引起朝臣人人自危,造成了新的危机。这时,武则天就又反手委罪于这些酷吏,借用这些鹰犬的头颅,来缓解日趋紧张的矛盾。

酷吏索元礼,以告密起家,曾杀害数千人。他刑讯时,以木椽枷住被刑人的手足,反转用刑,痛楚难忍,名之曰“凤凰晒翅。”又有令被刑人双手捧枷,枷上层层累砖,名之曰“仙人献果”。更有甚者,悬人脚于梁上,头垂于下,坠巨石于头发;还有以铁笼(圈)套在被刑人头上,四周打入木楔,常致骨裂脑崩。索元礼以酷刑杀人,终于激起民愤,武则天遂将他也收入狱中。受理索元礼案的法官,原是索元礼的部下。起初,索元礼多方抵赖,不肯服罪。那法官遂厉声说:“请把索公用的铁笼取来!”只此一句话,索元礼立即顿首认罪了。后死狱中。

酷吏周兴,是以制造“谋反”冤狱而臭名昭著的,亦曾杀害数千人。周兴终也被人告发“谋反”。武则天令另一酷吏来俊臣审理此案。来俊臣受命后即邀周兴宴饮,时周兴还蒙在鼓里。酒宴间,来俊臣说:“弟有一案,罪犯不肯认罪,为之奈何?”

周兴随口便说：“这事还不容易吗？取一大瓮来，四周架上木炭，点起火来，将罪犯置于瓮中，还怕他不认罪吗？”来俊臣连连称周兄高见，立即命人抬来大瓮，点起火。他站起来向周兴一拜，从容说道：“弟承密旨，人告兄谋反，请君入瓮吧！”周兴一听，立刻汗流浹背，叩头认罪了。

六、则天皇帝

武则天利用酷吏苛刑，大开杀戒，有部署地翦除李唐宗室，准备最后登上皇位，垂拱四年四月，武承嗣暗中指使人在一块白石上凿了“圣母临人，永为帝业”八个字，又指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贡献，说是在洛水中得到的。武则天大喜，把这块白石命名为“宝图”。五月，她亲拜洛水，接受“宝图”。又在南郊告谢昊天、登明堂，受百官朝贺，自称“圣母神皇”。七月，更名“宝图”为“天授圣图”，洛水为永昌洛水，洛水神为显圣侯。吹吹打打，兴致勃勃，要做她的“真命天子”。

唐宗室诸王对此很不安，感到武则天要尽诛宗室，要把李家社稷移授武氏，都内怀匡复之志。八月，琅邪王冲起兵。原来约定同时响应，结果只有冲父越王贞响应，其余诸王不敢发动。武则天派左金吾将军丘神勣率兵征讨。不过七日，消灭李冲。接着，平定越王，李贞自杀。武则天命周兴逮捕了韩王、鲁王、常乐公主等，逼他们自杀，还牵连了许多大臣遭贬，连魏元忠也被流放。

永昌元年（689年）十一月，武则天下诏改用周历，就是以十一月为正月。十一月八日，自名为曌，改诏为制。一月，升武

承嗣为文昌左相，武攸宁为纳言。通向皇位的道路已经铺平，一个武氏皇朝呼之欲出。

八月，又大杀唐宗室，连两个亲孙子也没放过，诛杀他们的亲党数百家，把宗室几乎全部杀光，幼弱的流放岭南。

同时，武则天组织朝野，为她制造登基舆论。和尚法明等编了一部《大云经疏》，宣称太后是弥勒佛下世，应该替代唐朝做人主。武则天下令全国各州都要建立大云寺，藏一部《大云经》，由高僧向百姓宣讲，为她夺取皇位大造舆论。酷吏傅游艺承旨纠合关中 900 多人，请愿“劝进”，改国号，赐皇帝姓武。武则天假意不许，但提升傅游艺为给事中。于是，太后之意，路人皆知。文武百官、远近百姓、和尚、道士等 6 万多人按傅游艺请愿内容上书。声势浩大，连皇帝李旦也吃不住压力，上表自请赐姓武。喧嚷嚷嚷，闹了一个多月。

九月九日，武则天登则天楼，宣布大赦天下，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自称圣神皇帝，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

七、武则天时期的经济和政治

武则天执政以来，继续推行唐初的基本国策：坚持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压抑部分士族，扶助新兴庶族；反对民族压迫，保卫边防安全。她虽然没有重大建树，但并没有把唐朝引向衰败。

武德年间颁布的均田制度，在天授以后继续推行。从现存的敦煌吐鲁番户籍残卷中属于武则天时期的资料看来，仍然记载着“应受田”、“已受田”、“未受田”及“口分田”“永业田”

等。这说明武则天执政时期，均田制度还继续实施。当然，农民受田数量已越来越少，均田制的作用已很有限。

武则天很重视农业。她责成北门学士编写《臣轨》，亲自作序，并下令把《臣轨》作为举人考试科目，和九品官员必读之书。这本书很重视农业，在《利人章》中写道：“然俱王天下者，必国富而粟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劝农之急，必先禁末作。末作禁则无游食，人无游食则务农，务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人富。”“故建国之本，必在于农，忠臣之思利人者，务在劝导。家足人民，则国自安焉”。她经常发布诏令劝课农桑，规定州县官的统治区，如果“田畴垦辟，家有余粮”者即可升官；反之“为政苛滥，户口流移”者要被降级。垂拱二年（686年），她当了皇帝以后，更加抓农业。她还敕令大臣编一本《兆人本业》，颁发给朝集使，要求地方官搞好农业生产。这些政策对农业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农业生产发展的具体表现，首先是粮食产量提高和储备增加。我国考古学者于1971年在洛阳发现了唐代的含嘉仓，这个仓包括290个仓窖，每窖藏谷50万斤，仓储总额是580.34万余石。含嘉仓还发现登记粮食的铭砖，年代可考者有天授、长寿、万岁通天、圣历等。长安四年（704年），大臣杨齐哲说：“神都帑藏储粟，积年充实，淮海漕运，日夕流行。”可见武则天执政时期粮食储备是相当丰富的。

兴修水利是农业发达的另一标志。例如光宅元年（684年），于朗州武陵开永泰渠。垂拱四年（688年），在巴西利用旧渠道开广济陂，灌田万余亩。于涟水开新弯渠，通海州、沂州、密州。证圣年间，在宝应开白水塘、羨塘。圣历初年，于湖州安

吉建石鼓堰，引天目山水灌田。

在政治上压抑贵戚和部分老士族，提高庶族地主的政治地位。武则天上台不久，便令许敬宗、李义府改修《氏族志》为《姓氏录》，规定凡是在唐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于是兵卒以军功致五品者，尽入书限。”（《旧唐书》82《李义府传》）这个做法，就是将参与唐朝政权的庶族都提升为士族，以压抑旧士族地位。

武则天继续发展科举制度，广泛罗致人才。隋和唐初举人答卷，没有糊名制度，评卷时容易营私舞弊。武则天上台后，改革科举中试卷管理办法，采用糊名制度，使评卷人不能了解答卷者的姓名，有利于人才的选拔。天授元年（690年），她“策问贡人于洛城殿，数日方了，殿前试人自此始。”长安三年（703年），又创武举，以后“每岁如明经、进士之法，行乡饮酒礼，送于兵部”，进行考试。在辅佐高宗时，已开“南选”，她称帝以后，“南选”更盛，从而使岭南、福建等边远地区的人才，得到当官的机会。

为了广揽人才，她创立“自荐”和“试官”制度，在各阶层中广泛罗致人才，结果使“天下残明经、进士，及下村教童蒙博士，皆被搜扬，不曾试练，并与美职。”（《朝野僉载》卷一）未经考试“起家至御史、评事、拾遗、补阙者，不可胜数”。在乾封以前吏部选人每年不越数千，垂拱以后，每岁常至5万。这种做法的目的是要以新官僚代替被罢黜的老官僚，尤其要以官位收买天下人心，寻找自己的支持者。武则天发现、提拔了一批贤能俊杰之士。如文臣之中富有才干的狄仁杰、姚崇、魏元忠、杜景俭、郝处俊等；武将中有善于统军御敌足智多谋的娄师

德、裴行俭、王孝杰、唐休景等；还有能急言直谏的李昭德、王及善、徐有功等。

由于武则天进行的一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士族势力，使庶族等阶层进一步上升，扩大了政权基础，又注意发展农业并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加之发展科举制度、选拔人才，从而在武则天统治时期，社会生产力继续发展。全国户口从永徽时的 380 万户，到她临终时增至 610 万户。

第六节 武周统治的 结束与宫廷政变的继续

一、中宗复位

长安四年(704 年)十二月，武则天生了一场病，几天不见大臣，只有张易之、张昌宗在旁侍候。凤阁侍郎崔玄晖上疏说：“太子、相王足可侍奉汤药，禁宫重地，不可让异姓人随便出入。”武则天在奏疏上批道：“感卿厚意。”二张见了批语，怕武则天对他们日渐疏远，一旦病危，将大祸临头，便在宫廷内外私结党羽，暗作准备。

神龙元年(705 年)一月，武则天病重，秋官侍郎、同平章事张柬之，天官侍郎、同平章事崔玄晖，中台御史敬晖，司刑少卿桓彦范，相王府司马袁恕己五人合谋，决定诛灭二张。张柬

之召见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问他：“将军今日富贵，是谁所赐？”李多祚说：“大帝（高宗）啊。”又问：“今二张危害大帝之子，将军不思报大帝之恩么？”李多祚说：“只要有利于国家，惟相公之命是从。”并对天发誓，以表忠心。于是张柬之调荆州长史杨元琰，以及桓彦范、敬晖及右散骑侍郎李湛为左、右羽林将军，掌管羽林军。不久，灵武道按抚使姚元之（本名元崇，改名元之，后又改名为崇）回京，张柬之、桓彦范立刻去见他，同他商议讨逆之计，姚元之满口赞成。于是张柬之便派桓彦范和敬晖去见太子李哲，把商定的计划告诉他。李哲也同意了。

农历正月二十二日，张柬之、崔玄晖、桓彦范与左威卫将军薛思行等率左右羽林军五百余人至玄武门，遣李多祚、李湛及内直郎、驸马都尉王同皎至东宫迎李哲。李哲起初吓得不肯出来。后经王同皎、李湛以利害相劝，方始应允。王同皎马上把他扶抱上马，一同赶到武则天居住的迎仙宫。

这时，张柬之等已经将张易之、张昌宗捉住杀了。见李哲到来，便簇拥着武则天寝所，武则天问：“哪个作乱？”张柬之答：“张易之、张昌宗谋反，臣等已奉太子之命将二人杀了。因恐泄露机密，没有敢奏闻陛下。”武则天看了李哲一眼，恨恨地说：“原来是你呀，二张既诛，你可便还东宫。”桓彦范奏道：“太子不可再回东宫！过去天皇（高宗）以爱子托陛下，今年齿已长，天意人心，久思李氏，愿陛下传位太子，上顺天心，下副民望。”武则天环视众人，看见李湛（李义府之子），便说：“你也是诛易之的将军么？我对你父子不薄，不想乃有今日！”李湛羞愧得低了头不敢回答。武则天又看着崔玄晖说：“别人都是因人荐用，只有你是我一手提拔的，想不到你也来了？”崔玄晖

说：“这正是为了报答陛下啊！”武则天无可奈何，只得下诏传位太子。

中宗即位，大赦天下，只有二张的党羽不赦。相王李旦加号安国相王，拜太尉、同凤阁鸾台三品；太平公主加号镇国太平公主。授张柬之为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崔玄暐为内史；袁恕己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敬晖、桓彦范为纳言，并赐爵郡公。李多祚赐爵辽阳郡王，王同皎为驸马都尉、并右千牛卫将军，赐爵琅琊郡公。李湛为右羽林大将军赵国公，其余有功人员，各有封赏。复国号为唐。隔了两天，迁武则天居上阳宫，留李湛宿卫。次日，中宗率百官至上阳宫，上武则天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

二、武韦结党

中宗神龙元年（705年）二月十四日，立妃韦氏为皇后，追赠后父韦玄贞为上洛王、母崔氏为妃。左拾遗贾虚己上疏，认为“异姓不封王，古今通例，今唐室初复，就封后族为王，决非明智之举。”中宗不听。谁知韦氏做了皇后，就效仿武则天在高宗时的故事，每当中宗坐朝，她便坐在帷幔后听政。桓彦范劝中宗不能这样做，中宗竟不采纳。

这时二张余党虽已诛灭，武氏宗族仍居要职。洛州长史薛季昶对张柬之、敬晖说：“二凶虽除，余党犹在，去草不去根，终当复生。”二人笑笑说：“大局已定，他们犹如案上之肉，还有什么作为！”朝邑尉刘幽求也劝桓彦范、敬晖：“武三思尚居高位，公等若不早除，恐将来死无葬身之地。”两人听了，付之一笑，

仍不放在心上。

武氏之势复振，张柬之等着了慌，数次劝中宗诛戮诸武，中宗不但没有接受，反而把他们的话泄露给武三思。敬晖曾叫考功员外郎崔湜做耳目，嘱他暗中探听武三思等的动静。不料崔湜是个小人，他见中宗正信任武三思，竟把敬晖等的打算全部告诉了武三思，作为投靠武三思的晋见礼。武三思果然没有亏待他，引荐他做了中书舍人。又有郑愔求见武三思，说道：“庆贺大王幸而遇到我郑愔。大王虽得天子宠信，但张柬之等五人出将入相，而且胆略过人，逼太后传位，犹如反掌。他五人日夜切齿，想食大王之肉，大王不除去此五人，真是危如朝露。”武三思听他说得有理，不禁大喜，便引他上楼，促膝谈心，请教自安之策。郑愔娓娓而谈，给武三思出了不少主意，很合武三思的心意。不久，武三思便推荐郑愔为中书舍人，与崔湜两人，成为给武三思筹谋划策的智囊人物。

三、太子政变

太子李重俊，不是韦后所生，所以不受韦后喜爱。武三思尤为忌畏太子，怕对他不利。上官婉儿因武三思的缘故，每下制敕，总是推尊武氏。安乐公主与驸马左卫将军武崇训根本不把太子放在眼里，而且常常欺侮他，甚至呼他为奴。武崇训又教安乐公主要求中宗废弃太子，立自己为皇太女，中宗没有同意。

李重俊积愤难平，景龙元年（707年）一月初六，他与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将军李思冲、李承况、独孤祎、沙吒忠义等

伪造制敕发羽林千骑兵 300 余人，冲进武三思府第，把武三思、武崇训及亲党 10 余人都杀了。李重俊又命左金吾大将军成王李千里及子天水王李禧分兵把守宫城各门，自己与李多祚引兵自肃章门斩关而入，陈兵宫门外，要中宗交出上官婉儿。上官婉儿挑拨说：“看他们的意思，是先索婉儿，次索皇后，再索大家（唐宫内称皇帝为大家。）”中宗听信了，便带了韦后、安乐公主和上官婉儿逃到玄武门楼，命令右羽林大将军刘景仁率飞骑百余人屯于楼下护驾。杨再思、苏环、李峤与兵部尚书宗楚客、左卫将军纪处讷统兵 2000 余人屯于太极殿前，闭门自守。

这时李多祚与李重俊已领兵赶到玄武门楼下，李多祚要想登楼，守卫的将士不让他上去。李多祚与李重俊犹豫了，没有命令士兵攻进城，希望中宗亲自来问他们。宫闱令杨思勳立在中宗一旁，请求出击，中宗应允。李多祚的女婿羽林中郎将野呼利统率前锋，没有提防杨思勳突然冲出来，被杨思勳一刀劈死。李多祚军见野呼利被斩，顿时气馁。这时，中宗依着门楼栏杆俯身对千骑说：“你们都是我的禁卫，为何跟着李多祚造反！若能立刻反正，不仅不加罪，且有重赏。”于是千骑纷纷倒戈，杀了李多祚、李承况、独孤祹、沙吒忠义，余众溃散。

成王李千里、天水王李禧领兵攻打右廷明门，想杀掉宗楚客和纪处讷，结果不克战死。太子李重俊见势不妙，带了百余骑逃进终南山，走到郾西，跟随的只有数人，坐在树下休息时，被跟随的部下所杀，将他的尸体献给中宗请赏。

在审理李重俊同党时，犯人中有扳引相王的，中宗不准追问。自此安乐公主及兵部尚书宗楚客日夜谋害相王，指使侍御

史冉祖雍诬告相王及太平公主，说他们都是李重俊的同谋，请逮捕治罪。中宗令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肖至忠审理，肖至忠哭道：“陛下富有四海，不能容纳一弟一妹，而要使人罗织罪状害他们么！从前相王为太子时，为了要把天下让给陛下，再三坚请太后，不达目的，许多天不进饮食，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奈何因冉祖雍一言而猜疑相王呢！”中宗与相王素来友爱，听了肖至忠一番话，便不再提这件事情。

右仆射、中书令魏元忠因武三思擅权，又气愤又忧郁。太子李重俊起兵时，在永安门遇到魏元忠的儿子太仆少卿魏升，胁迫他跟随同去，后来魏升被乱兵所杀。中宗因魏元忠是高宗、武后所倚重的老臣，所以没有追查此事。兵部尚书宗楚客、太府卿纪处讷等共证魏元忠与重俊同谋，请诛灭三族。中宗不许。魏元忠害怕了，上表辞官爵，中宗手书免去仆射，以特进、齐公致仕。宗楚客等又指令御史中丞姚廷筠弹劾魏元忠，说他与李多祚等谋反，宜灭族，中宗看了奏章，贬魏元忠为渠州（今四川渠县）司马。宗楚客仍不罢休，又令给事中冉祖雍奏：“元忠既犯大逆，不应出任渠州。”杨再思、李峤也同声附和。中宗不高兴了，说：“元忠驱使日久，朕特别顾惜宽容，制令已下，岂能一再更改！轻重之权，应自朕出，卿等一再反对，实在不体察朕意了！”杨再思等惶恐谢罪，不敢再说。宗楚客又令监察御史袁守一上表说：“重俊乃陛下之子，尚明正典法，元忠非勋非戚，怎得独漏严刑！”于是又贬魏元忠为务川（今贵州务川县）尉。魏元忠行至涪陵，忧愤而卒。

四、中宗之死

武崇训被杀，安乐公主新寡，神龙二年（708年）十一月，中宗又把安乐公主嫁给武承嗣的儿子武延秀。武延秀是武崇训的堂兄弟，仪表秀美，善于歌舞，公主早就喜爱他，及武崇训死，便招了武延秀做驸马。自此武延秀经常出入宫廷，又和韦后、上官婉儿、安乐公主结成一伙。韦后还和宗楚客、韦巨源等内外勾结，把持朝政，引起了朝野普遍不满。

散骑常侍马秦客以医术，光禄少卿杨均以善于烹调，得以经常出入宫廷，结识了韦后，受到格外的宠爱。二人做贼心虚，怕一旦事情败露，遭到杀身之祸；安乐公主一直想做皇太女，希望韦后和武则天一样临朝称制；他们几人都怀着同样的鬼胎，沆瀣一气，阴谋暗害中宗。一天，中宗正在神龙殿批阅奏章，宫女送来一盘馅饼。中宗平时很爱吃饼，拿来便吃，结果，毒发身死。

中宗死后，韦后秘不发丧，自己总理一切。景云元年（公元710年）六月初三，召诸宰相入禁中，征调诸府兵5万人屯驻京城，使驸马都尉韦捷、韦灌、卫尉卿韦璵、左千牛中郎将韦锜、长安令韦播、郎将高嵩分别统领，中书舍人韦元巡逻六街。又命右监门大将军兼内侍薛思简等带兵500人驰往均州戍守，以防谗王重福。以刑部尚书裴谈、工部尚书张锡仍为东都留守。吏部尚书张嘉福、中书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湜并同平章事。

太平公主与上官婉儿商议起草遗制，立温王李重茂为皇

太子、韦后摄政、相王李旦参谋政事。宗楚客私下对韦后的堂兄、同中书门下三品韦温说：“相王辅政，恐不适宜；自古叔嫂不通问，皇后临朝之际，将何以为礼！”遂率诸宰相上表请皇后临朝，罢相王辅政之事。

布置停当，韦后才命将中宗灵柩搬到太极殿，宣布发丧，皇后临朝摄政，进相王李旦为太尉，命韦温总管内外兵马。过了几天，命16岁的李重茂即位，尊韦后为皇太后，立妃陆氏为皇后。

五、共诛诸韦

宗楚客与太常卿武延秀、司农卿赵履温、国子祭酒叶静能及诸韦商议，共劝韦后效仿武则天，把南北卫军、内阁要职都交给韦氏子弟担任，广结党羽、内勾外连。宗楚客又秘密上书，称根据图讖，韦氏应革唐命。宗楚客仍想谋害嗣皇帝李重茂，但畏惧相王和太平公主，暗中与韦温和安乐公主商议，阴谋除掉二人。兵部侍郎崔日用一向依附韦、武，与宗楚客也有往来，知道他们的阴谋。他怕事情不成功，连累自己，便将此事密告了相王第三子、临淄王李隆基。李隆基英武多谋，对韦党专权深为忧虑，暗中招集智勇之士、广结左右羽林军将士，图谋除韦、振兴唐室。他得悉宗楚客等阴谋后，就与太平公主及公主的儿子卫尉卿薛崇简、苑总监钟绍京、尚衣奉御王崇晔、前朝邑尉刘幽求等计议，准备先发制人，一网打尽。恰巧长安令韦播、郎将高嵩受命掌管羽林军，为了立威，动辄鞭撻士兵，羽林军都很怨恨他们。果毅校尉葛福顺、陈元礼向李隆基哭诉，李

隆基暗示他们谋杀诸韦，二人大喜，愿以死相随。果毅校尉李仙凫也参与商议，要李隆基稟明相王，李隆基说：“我等举兵讨逆，为了社稷，事成福归于王，不成以身殉国，免得父王受累。今若稟明，倘不依从，反致败事，不如不说为宜。”李仙凫等都以为有理。

六月二十日黄昏，隆基改扮成平民，与刘幽求等进入内苑，跟钟绍京会合。到夜深，葛福顺、李仙凫都来了，隆基一声令下，葛福顺便拔剑直入羽林营，斩了韦播、韦璵、高嵩，大声对羽林兵说：“韦后毒死先帝，危害社稷，今夜当共诛诸韦，另立相王以安天下。倘有心怀异端，甘心助逆者，罪及三族。”羽林兵本来就恨诸韦，都欣然从命。

葛福顺把韦璵等首级送与李隆基。李隆基于是与刘幽求等出禁苑南山，派葛福顺率左羽林营攻击玄德门，李仙凫率右羽林营攻白兽门，约在凌烟阁前会齐。李隆基勒兵于玄武门外，三更，即与刘幽求、钟绍京率兵斩关而入，直奔太极殿。守卫中宗灵柩的卫兵都披甲响应。韦后惊惶失措，逃入飞骑营，被飞骑手手起一刀，剁作两段，割下首级，向李隆基报功。安乐公主正在对镜画眉，也被军士一刀，砍下头来。驸马武延秀被斩于肃章门外。上官婉儿听到有变，随即带着自己起草的立温王、以相王辅政的遗制出来，正好碰到刘幽求进来，便把遗制给他看，表明自己心向帝室。刘幽求便代她向李隆基求情，免她一死，李隆基不许，下令立即斩首。

内外平定，李隆基去见相王，叩头谢不先告之罪，相王抱住哭道：“社稷宗庙赖你可存，还有何罪？”于是相王入辅少帝，紧闭宫门和京城城门，分遣羽林军搜捕韦氏亲党。先捉住韦

温，斩于东市；中书令宗楚客身穿孝服，骑青驴逃到通化门，守门军士看见，说：“你是宗尚书！”扯下驴来，摘去帽子，一刀斩了。宗楚客的弟弟宗晋卿也冒冒失失走来，被守门守士杀了。其余马秦客、杨均、纪处讷等党羽，全都斩首。废韦后为庶人，陈尸市曹。以临淄王李隆基为平王并统率左右羽林军，钟绍京为中书侍郎，刘幽求为中书舍人。

六月二十三日，太平公主传少帝诏命，要让位给相王，相王坚辞不受。刘幽求对宋王成器、平王隆基说：“相王前已成帝位，众望所归。今人心未定，国家事重，相王岂可再拘于小节，望能早日即位，以安定天下。”李隆基说：“父王生性恬淡，不惯世事缠身。虽有天下，犹让于人，况亲兄之子，岂肯取代！”刘幽求说：“众心不可违！”成器、隆基入见相王，极言人心所向，相王方才应允。次日，少帝传位相王。

相王即位，史称睿宗，大赦天下，改元景云。仍封重茂为温王，追削武三思、武崇训爵谥，斫棺暴尸。追谥雍王李贤为章怀太子，封李贤子李守礼为幽王，恢复故太子李重俊位号，谥为节愍太子。昭雪张柬之、敬晖、桓彦范、崔玄暉、袁恕己、成王李千里、李多祚等，恢复他们的官爵。所有得罪韦、武，被杀或被流放而死的官吏，统统赐还官阶。进平王李隆基为殿中监、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侍郎钟绍京、黄门侍郎李日知并同中书门下三品。召还姚元之为兵部尚书、宋璟为礼部尚书。贬肖至忠为许州刺史，窦从一（后改名窦怀贞）为濠州司马，崔湜为华州刺史，郑愔为汴州刺史。

六、宋王让储

睿宗即位后，诸事还称顺利，只有立太子一事，颇费筹思。他有 6 个儿子，按常例，该立嫡长子成器，而且在则天后光宅元年（684 年）那一年他做半年多的傀儡皇帝时，已立过成器为太子；但三子平王隆基有讨平韦氏之功，因此到底立长还是立功，睿宗一直犹豫，拿不定主意。

宋王成器知道了父皇的心事，就主动去推辞储位，连续几天，流着泪，恳切要把储位让给隆基。

睿宗征询诸王及公卿们的意见，大家都说平王功大，理应成于储位，守中书舍人、参知机务刘幽求说得很干脆：“能除天下之祸的，应当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亲之难，论功，没有人比他更大，论德最贤，这事没什么可犹豫的了。”

于是，睿宗立隆基为太子。授宋王成器为雍州牧、扬州大都督、太子太师。又封其他几个儿女，成义为申王、隆范为岐王、隆业为薛王、加太平公主实封万户。

七、玄宗登基

太平公主与睿宗同是武则天所生。她长得方额广颐，沉敏多权略。武则天以为她很像自己，从小就对她特别宠爱，常让她参与机密。太平公主确实像她母亲一样，是个有野心的女人。武则天统治的年代里，太平公主因知道母后厉害，还不敢招权揽势。

后来，在诛灭张易之、张昌宗时，太平公主出了力。在诛韦后时，她拥戴相王为帝，又立了大功，这一切使她对政治的兴趣更大了。睿宗因为太平公主屡立大功，对她更加尊重，常与她坐着商量国家大事，谈得忘了时间。太平公主几天不入朝，宰相们就要到公主府上门请示。宰相奏事时睿宗总要问：“与太平商议过吗？”再问：“与三郎（隆基）商量过吗？”然后才批示。太平公主只要有请求，睿宗无不听从。宰相以下，要升要降，只要太平公主一句话。经太平公主引荐而任用的达官贵人，不可胜数。一些钻营之徒，都趋附其门，一时门庭若市，权势显赫无比。太平公主的权势欲和野心也愈来愈大。起初，太平公主以为李隆基年纪轻，对他当太子，并不在意。后来感到太子英武，怕他将来对自己不利，便想另立一个懦弱的王子为太子，以便能常保自己的权势。于是，她唆使人散布流言，说太子不是长子，按理不该册立。睿宗听到后，下令不准再议论此事。太平公主又在太子左右安置了许多耳目，窥视太子的行动，哪怕芝麻、绿豆般的小事，太平公主都知道。这使太子深感不安。

景云二年（711年），太平公主与益州长史窦怀贞结为朋党，想害太子。太平公主还想拉拢侍中韦安石，派女婿唐暖去邀请他过府议事，被韦安石拒绝了。太平公主又唆使党羽，散布朝廷内外都心向东宫的流言，企图挑起睿宗对太子猜忌。睿宗秘密召见韦安石，要他查访此事。韦安石正色道：“陛下何来此亡国之言！此必是太平计谋。太子有功于社稷，仁明孝友，天下共和，愿陛下不要听信这类谗言。”睿宗吃惊地说：“朕知道了，卿不要再说。”当时太平公主正好在帘外听到了，把韦安

石恨得咬牙切齿，马上唆使人陷害韦安石。幸亏宰相郭元振鼎力相救，韦安石才免遭迫害。

太平公主又在光范门内邀集宰相，暗示要他们改立太子。宰相们听了，不觉失色。

过了几天，睿宗对近臣说：“今有术士说，五日内当有急兵入宫。卿等须加意防范。”中书侍郎张说估计又是太平公主搞的鬼，便说：“这必是有人想离间太子，陛下使太子监国，流言就自然平息。”姚元之立即附和：“张说的话，是安定社稷的大计，请陛下准行。”睿宗同意，以宋王成器为同州刺史，幽王守礼为幽州刺史，左羽林大将军岐王隆范为左卫率，右羽林大将军薛王隆业为右卫率；太平公主与武攸暨安置到蒲州；命太子监国，六品以下官员的任命及徒罪以下的刑政，全由太子处置。

太平公主接到去蒲州安置的制敕，十分懊丧。她探知是姚元之和宋璟的主意，不禁大怒，气势汹汹地责问太子。太子害怕了，奏说姚元之、宋璟离间姑侄，该从重惩办。于是贬姚元之为申州刺史，宋璟为楚州刺史。宋王、幽王暂不出任刺史，仍留居京都，但太平公主夫妇，仍须去蒲州。

四月，睿宗召集三品以上大臣，说：“朕天性恬淡，不以万乘为贵，昔为皇太子，又为皇太弟，都坚辞不受，如今想传位太子，众卿以为如何？”群臣都不回答。殿中侍御史和逢尧向来附和太平公主，说：“陛下春秋未高，方为四海景仰，岂可急于传位！”睿宗没有坚持，但下制，令今后一切政事都由太子处分。凡军旅死刑及五品官以上官吏的任命，先与太子商议定后，再奏闻皇上。五月，太子上表，请让位于宋王成器，睿宗不许。请

召太平公主还京，睿宗应允了。

先天元年（712年），七月，西方出现了一颗彗星，光芒数丈，经轩辕位进入太微星座。太平公主又利用这件事，派术士去对睿宗说：“彗星是除旧布新的征兆，皇太子当为天子。”太平公主的本意是要激怒睿宗，使他憎恨太子。不料睿宗听了，正合心意，毅然说：“朕早想传位，今天象如此，传德避灾，朕志已决。”太平公主慌了，忙同她的党羽入朝，竭力阻挠禅位。太子听到此事，急忙赶来，跪在地上，连连叩头说：“臣不过因为微功，被破例立为皇嗣，心中常常不安，今陛下急着要传位，不知何意？”睿宗道：“朕所以能得天下，都是你的功劳。今帝座有灾，所以传位，转祸为福，你不必多疑。”太子再三辞让，睿宗变色道：“你要做孝子，何必定要在我枢前继位！”太子泪流满面，只好退出。

七月二十五日，睿宗下旨传位太子，太子上表再辞，睿宗不许。太平公主弄巧成拙、追悔莫及，无可奈何地对睿宗说：“皇兄虽已传位，但太子毕竟年轻，阅历尚浅，国家大政，还须皇兄兼理。”睿宗觉得有理，召嘱太子：“你以天下事重，一再辞让，朕虽传位，岂能忘记国家，凡军国大事，我自当兼理。”八月初三，隆基即位，史称玄宗，改元先天。尊睿宗为太上皇。太上皇自称为“朕”，所下的命令为“诰”，每隔五日受大臣朝见一次，地点在太极殿。皇帝自称为“予”，下达的命令叫“制”、“敕”，每日在武德殿受大臣朝见。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命以及重大的刑政由太上皇决定，其余都由皇帝决定。

当时的宰相，多数是太平公主的党羽，刘幽求与右羽林将军张玘商议发羽林兵将他们一网打尽。商定后，刘幽求叫张

晁秘密去见玄宗,说:“窦怀贞、崔湜、岑羲,都是太平引荐得做宰相的,日夜谋逆,若不早图,一旦事发,何以得安!请速诛了他们。臣已与幽求商定一计,只等主上下令。”玄宗深以为然。

张晁出来,把此事告诉了侍御史邓光宾。邓光宾又泄露给别人,辗转传到窦怀贞的耳朵里,不由大吃一惊,急忙约了崔湜去见太平公主。太平公主听了,气得暴跳如雷,立即进宫见睿宗,一口咬定玄宗要无端加害于她。睿宗马上叫来玄宗,责问此事。玄宗一时无法解释,只好推到刘幽求和张晁身上。睿宗命玄宗惩办二人,玄宗不得已,只好将刘幽求、张晁、邓光宾拘捕入狱。窦怀贞、崔湜等接连上疏,说刘幽求、张晁离间骨肉,罪当处死。玄宗坚决不答应,说刘幽求有大功于国家,功过相抵,不应处死。结果流放刘幽求到封州(今广东封开县)、张晁到峰州(治所在今越南河西省山西西北)、邓光宾到绣州(今广西桂平)。

自刘幽求、张晁流放,太平公主依恃太上皇睿宗,气焰格外嚣张。朝廷七相,五出其门,文武大臣,大半依附于她。

王琚看到事态越来越严重,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多次请玄宗赶快采取断然行动。玄宗鉴于刘幽求、张晁前辙,犹豫不决,恰好张说从东都派人进呈玄宗佩刀一把,玄宗不解其意,王琚说:“左丞是借刀示意,要陛下‘快刀斩乱麻’呀!请陛下断绝疑虑,从速行动。”

这时,荆州长史崔日用进京奏事,玄宗征求他意见,崔日用奏说:“太平谋逆,已非一日。过去陛下在东宫,犹为臣子,若要诛讨,尚须用谋。如今陛下身登大位,只要一道制命,谁敢不

从？”玄宗沉吟道：“卿言虽是，只恐惊动太上皇，有所不便。”崔日用道：“天子之孝，在于安定四海，若奸人得志，社稷宗庙夷为废墟，还谈得上孝吗！如怕惊动太上皇，请先定北军，后收逆党。”玄宗以为有理，便把崔日用留在京师，任为吏部侍郎，加强自己的力量。

第七节 开元盛世局面的形成

一、平定太平公主叛乱

太平公主见玄宗重用王琚和崔日用等，知道玄宗有所准备，而元氏下毒又无隙可乘，因此召集私党，再次商议。决议由常元楷、李慈统率羽林军突入武德殿，窦怀贞、萧至忠、岑羲等于南牙举兵响应，定在开元元年（713年）七月初四日举事。哪知事有不密，左散骑常侍魏知古听到消息，慌忙奏报玄宗。玄宗马上和王琚召集岐王李隆范、薛王李承业、太仆卿、同平章事郭元振及龙武将军王毛仲、殿中少监姜皎、太仆少卿李令问、尚乘奉御王守一、内给事高力士、果毅校尉李守德等定计、先发制人。七月初三日，玄宗命王毛仲率禁兵300人埋伏在武德殿虔化门，然后命人去召常元楷、李慈二将来见。常、李尚不知密谋败露，放胆而入。王毛仲麾兵齐起，将常、李捉住，一刀杀死。接着又在内客省捉住贾膺福和李猷，在朝廷上捉了萧至

忠和岑羲，一律斩首。窦怀贞逃入护城河中，自缢而死，玄宗命戮其尸，改姓为毒。

太上皇睿宗听到有变，急忙登承天门楼，郭元振随驾登楼，奏称窦怀贞等联结太平公主，阴谋危害皇上，所以奉皇帝制命，诛捕逆党，余无他事。一会儿，玄宗也来承天门楼，禀明事由。于是睿宗下诏数窦怀贞罪，大赦天下，但谋逆者的亲党不赦。七月初四日，太上皇下诏：“自今往后，军国大事，都听皇帝处分。”当日便迁居百福殿。

太平公主听到事情发生变化，急忙离家出逃，到山寺避难，3日后才敢出来，被赐死在家中。公主的几个儿子和亲党数十人，一起被杀。薛崇简因多次劝谏母亲，受母鞭挞，特旨免死，赐姓李，官爵照旧。查抄公主府第时，财物堆积如山，珍珠宝贝比皇宫里还要多。

太平公主失败后，崔湜被判流放窦州。新兴王李晋临刑时叹道：“此事本崔湜为谋，今我死而崔湜不死，岂不太冤枉了吗？”恰好刑部审问宫人元氏，元氏招供崔湜同谋进毒。玄宗立刻遣使追赶崔湜，赐死于荆州。玄宗登承天门楼，大赦天下，赏赐功臣郭元振等官爵，又特地召见陆象先，安慰说：“卿能谏阻太平，可谓岁寒知松柏。”象先拜谢，后来他为太平党人辩护，遭到弹劾，贬为益州长史。接着，玄宗召还刘幽求、张说，授张说为中书令，刘幽求为左仆射，进高力士为右监门将军。一场宫廷争斗遂告平息。

二、安抚和控制王室 贵族,稳定封建社会秩序

唐玄宗统治的开元时期(713—741),史称“开元之治”,是封建史家和诗人长期称颂、讴歌的“太平盛世”,是继“贞观之治”之后,唐王朝出现的第二个盛世。

玄宗即帝位后立即提出了以武、韦为鉴戒,以贞观为榜样,作为为政的指导思想。在废杀韦后、诛太平公主几次事件中,又涌现了不少以后可以作为统治权力机构中的骨干人才的人物如姚崇、宋璟、苏颋、张说等,玄宗委以重任。从开元元年(713)十月到八年(720)正月,姚崇、宋璟相继为相,在七八年时间内基本上保证了大政方针的实施,扭转了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唐王朝从此进入了第二个“盛世”。

三、用贤纳谏

为了造成一个安定的政治局面,以“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玄宗采取了安抚和控制王室、贵族,任贤纳谏,澄清吏治,加强法制等一系列措施,从上而下地改革吏治。

安抚和控制王室贵族,稳定封建社会秩序。高宗晚年以来,唐代政治的特点是统治上层的权力之争日益激化,宫廷政变层出不穷。高宗八子,四人为武后所杀。从中宗复位到睿宗让权,8年多的时间内出现了7次宫廷政变,四易皇帝。玄宗有鉴于此,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在对诸王恩宠有加

的同时,对他们又加意防范。从开元二年(714)起便把这些兄弟派往外州任刺史,并把州务交给长史、司马,下令禁止外人与诸王交往:“宗室、外戚、附马,非至亲勿得往还”,对于胆敢违犯的官吏,即予贬黜(《旧唐书·惠太子范传》)。对诸王则不加谴责,恩礼如初。玄宗用这样一些手段堵塞了他们发动政变的借口和可能。

同时,他严格执法,抑制权贵,对于皇亲国戚有罪的,往往绳之以法,很少宽假。开元二年(714),玄宗幼弟薛王业的舅父以残暴百姓受到御史纠弹。虽薛王求情,亦不宽假,“由是贵戚束手”(《资治通鉴》卷211,开元二年)。开元四年(716),皇后妹夫长孙昕在大街上殴打了御史大夫李杰。玄宗闻知,立命将昕处斩。在玄宗示范行动的鼓舞下,一些州县长官也和权贵的不法行为进行了斗争。李朝隐任河南尹时,太子的舅父仗势凌压平民,李朝隐把他捉来,处以杖刑(《新唐书·李朝隐传》)。李元纁为京兆尹时捣毁了王公贵族沿河设置的水碾,使农民得到水利(《旧唐书·李元纁传》)。玄宗及其臣下抑制权贵的行动对于稳定社会秩序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姚崇熟练吏治,且有识见,对于边防事务也极其关心,他在武则天、睿宗、玄宗朝“三朝宰相,皆兼兵部尚书,缘边屯戍斥候,干马储械,无不墨记”(《资治通鉴》卷210,开元元年),宋璟为相,不但“赏刑无私”,还能“犯颜直谏”。在玄宗用贤纳谏、克己虚怀的影响下,匡辅玄宗的卿相大臣,在国家大政上多能做到捐弃成见,“相让为国”;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不同,然协力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

得比焉”。苏迺被当时人称为“燕许大手笔”(《新唐书·苏迺传》)。张说“善用人之长”(《新唐书·张说传》)。这几位宰相,对当时朝政的兴革,都起过一定作用。姚宋二人互相尊重,互相配合,姚崇辞相时举宋璟自代。卢怀慎与姚崇同为宰相,怀慎觉得自己的政治才能不及姚崇,事事让与姚崇决断;他临终时又上表推荐宋璟等人,请予重用(《旧唐书·卢怀慎传》)。大文豪苏迺与宋璟同时为相,甘居辅佐地位,听璟主政(《新唐书·苏迺传》)。由于卿相们同心协力,和衷共济,保证了以玄宗为首的统治核心能够上下一心,励精求治。

另外,对于“元从功臣”之中几个“可与履危,不可得意”(《旧唐书·王琚传》)的小人和一生行各“皆临时制变,不必专重始谋”(《旧唐书·崔日用传》)的朝三暮四的政客,玄宗采取了把他们遣到较远的州郡做官或放归田园,让他们衣食租税的办法,从而避免了历史上杀戮功臣可能引起的祸乱。

四、裁汰冗官,改革吏治

在武则天时代,官吏之多,已经有“车载”、“斗量”之谣,而且由于“诸色入流,年以千计”(《通典·选举典》引魏玄同垂拱中奏疏),造成官僚机构膨胀的严重情况。玄宗采取了两项措施来清除武则天放手招官“不问贤愚”政策的流弊。一是裁汰冗官,精简机构,把武周中宗以来所置的员外官、试官、斜封官数千人,一律撤销,以便节约开支,解决国家的财政困难。二是恢复谏官、史官参加宰相议事的制度。唐太宗时期,皇帝与宰相议事,允许谏官、史官参加,“有失则匡正,美恶必记之”,可

以减少朝政之弊。自从武则天参与朝政之后,许敬宗、李义府担任宰相,“政多私僻”,不敢把朝政公开,取消了谏官、史官参加君臣议事的制度。这样一来,谏官无法直接了解皇帝与宰相活动的内幕,只能听宰相一面之辞,很难及时提出中肯意见。但是,到了开元五年(717),唐玄宗下令恢复贞观年间的制度,除了朝内特殊机密以外,允许谏官、史官参加皇帝与宰相议事会议(《新唐书·百官志》)。这对改善朝政起了一定的作用。

与此同时,玄宗十分重视地方官吏的选拔。他说:“郡县者国之本,牧宰者政之先,朕每属意此官,有殊余职”(《全唐文·戒牧宰敕》)。他重视县令的选择,有时还亲自出题考试,了解县令是否通晓治国之道。开元四年(716),召集新任职的县令于朝堂,亲自考试,将不合格的45人放逐回去,并处分了主管官员(《资治通鉴》卷211,开元四年)。在县令赴任之前,玄宗还亲自召见,面授机宜。

改革吏治的另一措施,是循名责实,比较严格地考核刺史县令,作为黜陟的根据。这一措施实行之后,减少了地方官贪赃枉法的现象,促进了吏治的进步。要澄清吏治,就必须加强法治。自高祖武德以来,唐代的律令格式已较齐全。开元间,又根据当时情况制定了《开元格》、《开元后格》、《开元新格》等,编纂了系统完整的行政法典——《大唐六典》。这些法典在惩治贪官暴吏,稳定社会秩序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经过10来年的努力,玄宗朝廷终于遏止了宫廷政变的阴谋,打击了政治上的反对势力,整顿了吏治,缓和了社会矛盾。

五、打击豪门士族

开元初年虽然制裁了一些豪门、大族，但打击的对象很少，收效甚微。从全国范围看，仍然有大量土地和劳力被豪门大族霸占。豪族侵占农民土地谓之“籍外占田”，这本是犯法行为，政府有权依法没收。更严重的是还有人把逃户变成“私属”。朝廷的纳税户变成“私属”以后，国税必然减缩，造成唐政府的财政危机。唐玄宗要解决财政危机，安抚流民，维护均田制，必须和豪门大族争夺劳力和土地。于是，唐政府从开元九年到十二年，利用4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检田括户运动。具体的步骤是任命宇文融为全国覆田劝农使，下设十道劝农使和劝农判官，分头到全国各地检查黑地和豪门荫庇的客户，把检括的土地全部没收，按均田制分给无地之客户使用。对于“帐外”人口，一律登记注册，就地入籍，免去六年租庸调，只交户税。通过括户运动，朝廷增产80余万，“田亦称是”，“岁终征得客户钱数百万”（旧唐书·宇文融传）。这便使国家具有一定能力执行其经济职能，并借此缓和了社会矛盾。

改革食实封制度，也是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减轻人民负担的重要措施。另外，打击佛教势力，裁汰僧尼，也扩大了中央政府的税源。武周、中宗以来，积极利用佛教，当时全国各州都设置大云寺，使佛教恶性发展。唐中宗复位以后，寺院僧侣不仅兼并土地，而且逃避税役。唐玄宗执政以后，于开元二年（714），下诏裁汰天下僧尼，各地还俗者1.2万余人（《旧唐书·姚崇宋璟列传》）。同年八月，唐玄宗还下令严禁新造佛寺，

并禁铸佛像,禁抄佛经。同时又禁止贵族官员与僧尼交往,使佛教势力受到很大打击。

六、兴修农田水利

玄宗不仅采取与民休息的措施,同时还迅速展开了大规模的发展农业生产的工作。初唐以来,王朝政府常通过开山洞、迁移边疆民族、就逃户集中地区设置州县等方式,开发荒地,扩大耕地。开元天宝时期这样设置的州县为数更多。贞观十三年(639)全国共有151县,到开元二十八年(740)增为1573县(《旧唐书·地理志》)。当然历代均有设置,但以玄宗所设为多。通过新置州县,开拓了耕地,增加了粮食产量和社会财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在水利方面,修筑河渠、坡塘和堤堰,玄宗一朝做了不少工作。另外,唐初即比较重视在边境营田、屯田,并曾移民殖边;还订有周密的管理考课制度,加以督促。开元初,营州都督宋庆礼于柳城筑营州城,开屯田80余所,并从幽州、渔阳、淄青移民户定居,数年之间,“营州仓廩颇实,居人渐殷”(《旧唐书》本传)。在西边,凉州敦煌郡每年屯田收获除供军食外还有富余。

七、改善民族关系,维护国家统一

唐玄宗即位初年,听取姚崇、宋璟等的意见,改善和缓和了唐和四邻兄弟民族之间的关系。唐对吐蕃的关系,在唐中宗时代,就已经把宗室女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为妻,到唐玄宗

初年,又尽量避免开启边衅。对东突厥的关系,如在开元十九年(731),唐在边境上设立互市,加强了唐和突厥两族之间的经济联系。对奚、契丹的关系把两个宗室的外甥女封为公主,嫁给奚族首领李大酺、契丹族首领李失活,比起武则天时代来,关系也大大地好转了。开元初年的宰相姚崇,熟谙军务,因此边防充实,边疆少数民族的贵族不敢轻易进犯。另一宰相宋璟主张安境息民,为防止边将邀功,轻启边衅,搞坏民族关系,给沿边人民带来灾祸,破坏和平生活,他痛抑边功,防止穷兵黩武,白居易诗中说:“君不见开元宰相宋开府(宋璟),不赏边功防黩武”(白居易《白香山集·新丰折臂翁》)。这样,一方面,唐三边边防巩固,有备无患;另一方面又主动地改善了与兄弟民族之间的关系,这对于当时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八、开元盛世局面的出现

由于上述种种积极的政治经济措施,才导致了开元之治的繁荣局面。唐玄宗统治时期(713—755),是唐王朝国力鼎盛的时期。首先表现为人口的大量增长。天宝十四年(755),全国有890余万户,5290余万口。《新唐书·食货志》称:“是时海内富实”,“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缗,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万匹,绵(丝绵)百八十余万屯(六两为一屯),布千三十五万余端”(《通典·食货典》)。天下诸郡,每年常贡的土物,尚不统计在内。以上只是百姓缴纳给政府绢布粟米两项的统计数字,全国人口5300万的每年绢布粟米消

耗总数,为数更多,尚不计算在内。

边荒脊地的开拓,农田水利的发达,屯田的经营,大大推动了农业生产的繁荣,出现了“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较量”(《元次山集》卷7)的景象。大诗人杜甫歌颂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禀俱丰实”(《杜少陵集》卷13)。柳芳《唐历》称:当时“天下雄富”,“东由汴、宋,西经歧、凤,夹路列店,陈酒饌待客,行人万里,不持寸刃”。不仅中原地区和江淮地区以及成都平原繁富如此,就是陇右河西地区,所谓“秦陇之西,户口渐少,凉州已往,沙碛悠然”(《资治通鉴》卷211,开元三年韦凑上疏语)的,这时也逐渐出现“阗阗相望,桑麻翳野”(《明皇杂录》)的繁荣景象来了。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官、私手工业普遍蒸蒸日上。官营的“少府”拥有工匠多达1.9万余人,定州何明远,“资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朝野僉载》)。主要手工业部门的纺织业,分工细致,工艺精巧,花色、品种繁多,远销域外。其他如瓷器、漆器、造纸等业,各有特色,均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商品流通也日益活跃。国内交通四通八达,商业城市极为繁华。对外贸易不断增长,亚洲各地,特别是波斯、大食等国商人纷至沓来。开元中开大庾岭路(《全唐文·开大庾岭路记》),大大便利了内外贸易。市舶使也已设立(《旧唐书·玄宗本纪上》),可见海上贸易发达到了一定程度。

开元之治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继武、韦统治时期的动乱之后,民心思治,以玄宗为首的统治集团适应时代的

需要,推行安定政局,休养生息和发展生产的方针,调整了生产关系,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推动中华文明登上了又一个高峰。

第三章 唐代封建 经济的高度繁荣

第一节 农业的发展

农业是唐代基本的生产部门。农业的发展,首先体现在生产工具的改进和使用上。唐朝以前的犁,主要是笨重的直辕犁,回转困难,耕地费力。唐代的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不断对直辕犁进行改进,创造出一种短而轻便的曲犁。这种犁在唐人陆蒙龟的《耒耜经》中叫做江东犁,在结构上比较复杂,由犁铧、犁壁、犁箭、犁评等十一个部位组成。操纵灵活,轻便省力。犁铧锐利,犁壁呈弧形,耕地时可以减少阻力,提高耕地的速度,同时能把土有规律的翻在一旁,使土表面的杂草埋在下面,“以绝其根本”。这种犁的犁评可以进退活动,“进之则箭下,入土也深;退之则箭上,入土也浅”,可以调节耕地的深浅。直辕犁需用二牛牵引,江东犁只用一牛即可,而且工作效率大为提高。敦煌莫高窟壁画,绘有唐朝用牛耕曲辕犁的图画,生动地说明北方地区曲辕犁的普遍使用。唐时还有用于破碎土块,压平垄面,芟除杂草的耙,礮碓、砺碓等农具。耙,就是镶有

成排铁齿的木柄耙,用于破碎土块,平整土地。磙,用于压碎土块和压实稻场的。砺碛,是牛拉的耙,木架下有铁制的利齿,用以芟除杂草破除板结,碾碎土块。水利灌溉工具,除传统的桔槔、辘轳、戽斗外,当时还创造了桶车、筒车和水轮等新工具。桶车是“以木桶相连吸于井中”。筒车形似纺车,其周围缚上竹筒,利用水力旋转,把水提到高处,而且能昼夜不停地吸水灌田。水轮即水转翻车,用水的冲力代替人力,提高功效。

唐政府很重视兴修水利。在中央工部特设水部郎中和员外郎专管全国水利和航运。据统计,从秦到隋兴修大型水利工程共 158 项,而唐代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多达 254 项,遍及全国,超过了历史上所有朝代的总和。当时北方着重开渠引水,南方着重排水和蓄水,出现许多堤堰陂塘等工程。如武德年间,从龙门开渠引黄河水,灌溉城县农田 6000 顷。开元年间,在山西文水县引文谷水开甘、荡沙、灵长、千亩四渠,也能溉田数千顷。这些较大的水利工程的兴建和疏浚,对农业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唐代农业的和发展,还体现在户口和垦田面积的增长上。唐初,由于生产持续的发展,人口增长较快。武德年间,全国“不满三百万户”,755 年(天宝十四年),全国户数增至 8914709 户,人数达到 52919309 口。封建国家的户口统计往往比实际的户口数要低,因为许多人为逃避赋税、徭役往往隐蔽户口。据杜佑估计,当时实有户数为一千三、四百万户。人口的增长,又促进了垦田面积的增加。到开元、天宝年间,“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唐代总的耕地面积没有确切的统计。据近代人研究估计,天宝年间的面积约有 800 万顷至 850 万顷(唐亩)之间。

农业技术已有显著提高,耕作中已有了一整套碎土块、除草和碾平整田的工序。同时,唐代十分重视改良品种,繁殖良种,水稻的新品种有红莲、罢亚、黄稻、金钗、箭子等。双季稻的种植也较普遍,713年(开元十九年),仅扬州一地就种植“再熟稻”1800顷,粮充足,《唐书·食货》说:“洛、相、幽、徐、齐、并、秦、蒲州又置常平仓,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显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至749年(天宝八年),全国各地粮仓储藏食126566200石,其中以洛阳含嘉仓最多,有58566400石。

另外,唐政府重视畜牧业的发展,由于军事上的需要特别重视畜养马匹,陇右和关中设两大牧区,各辖四十八监,上监养马5000匹以上,中监3000匹以上,下监1000匹以上。玄宗时,设中央内外闲廐使专门负责监牧,754年(天宝十三年),仅陇右监牧所养马、牛、驼、羊就达605600匹,而王侯、将相、外戚设置的私家畜牧场,所养的马、牛、驼、羊则又远远超过官营牧业。

第二节 发达的手工业

一、唐朝的官府手工业

与汉代相比,唐代官府手工业的组织显得庞大而整齐,各部门的划分也十分精密和细致。中央设置四监来加强管理:(1)少府监,掌百工技巧之政。监下设中尚署(礼器制造)、左尚

署(车伞制造)、右尚署(马辔皮等工)、织染署(丝织印染)、掌冶署(冶铸),还管理各地的盐监和铸钱监。(2)将作监,掌土木工匠之政。监下设左校署(梓匠)、右校署(土工)、中校署(舟车等工)、甄官署(石工、陶工)。(3)军器监,掌缮甲弩。监下设左校署(弓矢刀矛制造)、甲坊署(戎衣制造)。(4)都水监,掌川泽津梁渠堰陂池之政。监下设河渠署、河堤谒者、诸津令。这四监,都是唐代官府手工业的专设机构。其中仅少府监织染署就包含有 25 作,而织纴之作有布、绢、纱、綾、罗、锦、绮、纁、绢、褐等十项,组绶之作有组、绶、绦、绳、纓等五项,绌、线、弦、网等四项,练染之作有青、绛、黄、白、皂、紫等六项,分工之精细可想而知。此外,内侍省下有掖廷局,尚官有尚宫局,司农寺下有诸盐池监,这些都是有关官府手工业的附属机构。

尽管有如此庞大的组织,唐代的官府手工业从其性质看仍是一如既往,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官府手工业的原料主要有三种来源:第一种来源是由官府直接经营而获得的。这是最广阔的来源,盐、金属、竹木、柴炭等都属于此类。官府手工业中的两个重要部门——煮盐、坑冶就是依靠这些原料资源建立起来的。第二种来源是土贡、或称岁贡、岁课、岁办。全国各地的土特产、官府手工业所需的原料或半成品、皇家及官府所需要的供应,“任所出州土以时而供送”(《唐六典》卷二二)。第三种来源是和市,或称和买、科买、科市。从表面看,这种办法是由政府出钱甚至不给钱。官府手工业的这三种原料来源,无一不打上了行政强制的烙印。官府手工业的生产者有三类:一是官奴婢和刑徒。这些人都属于罪犯。唐制规定,罪犯在服刑期间,在京城的需求送往将作监,妇女送少府监。犯了叛逆罪

的,全家男女及奴婢都要没官,而成为官奴婢,终身从事劳作。官奴婢与刑徒的劳动没有任何报酬,只由政府供给衣服和粮食,有病时则由太常给予医药。与官奴婢相类似的蕃户和杂户,所不同的只是他们可以轮番服役,而官奴婢必须“长役无蕃”。这一类生产者,虽说奴役程度略有不同,却与奴隶无多大差别。不过,他们在唐代官府手工业中并不占重要地位。二是短蕃匠。唐政府把全国的专业工匠都组织起来:“凡工匠,以州县为团,五人为火,五火置长。”被组织起来的工匠,政府选择其中“材力强壮,技能工巧者”,每年到官府手工业中去服役20日。这些工匠的劳动,都得不到任何报酬,并且不允许逃跑,否则会受到严厉惩处。三是和雇匠。这是由政府雇募而来的,给予一定的报酬。和雇匠也不是自由地出卖劳动力,他们的应雇实际上仍是对唐政府所尽的一种义务。除了上述三种之外,还有不少军匠(官健)接近第一类;巧儿匠和绦匠接近第二类;长土匠则性质多变,不可概而论之,唐代在玄宗开元、天宝以前,官府手工业中的工匠,是以短蕃匠为主的;而在天宝以后,和雇匠有很大的发展,并真正有了根据“诸色丁匠”自己情愿而纳资课代役的办法。从总体上看,无论是何种生产者,都是在政府徭役制度下尽义务于国家,官府手工业是这种徭役制度的重要部分。即使是和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带上了货币支付的形式,实际上仍然是一种反映国家政权至高无上的强制性募集。官府手工业的产品,一般都是由政府或统治者直接消费,而不是当作商品投入市场出售的。官府手工业是唐政府维持其统治必不可少的部分。官府手工业的收益在政府财政收入中占有不可忽视的比重;官府手工业中有许多部门是

用来制造各种兵器,这也是维护古代政权的重要条件;官府手工业还在灌溉、治水、交通等许多公共工程的经营中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可见,唐代官府手工业无论在财政方面、军事方面、还是在公共工程方面,都对国家政权起着稳定、巩固和支持的作用。

综上所述,官府手工业庞大的组织、细密的分工、精美的产品,不仅不能瓦解当时占绝对优势的自然经济,相反,它正是适应着自然经济的需求而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国家如此雄厚的技术力量和高标准的生产力用于不投入市场的手工业生产,无疑会对整个工业水平的发展产生消极的作用。而且,官府工业还垄断了某些工业生产部门的产销,这就十分明显地阻碍了相应部门民间工业的发展。当然,正因为官府工业中生产力水平及生产技术均较民间工业高一筹,它也能通过各种形式影响着民间工业,从而对民间工业生产与技术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二、民间作坊的兴盛

与官府手工业并驾齐驱的是民间手工业,从规模和性质来看,它可以划分为家庭手工业和手工作坊两类。

家庭手工业是最古老的手工业组织形式,也是最基本的一种手工业生产方式,尤其是在“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长期支配的条件下,家庭手工业更是农民经济的重要的支柱,它几乎与古代中国社会的存在相始终,唐代仍不例外。在家庭手工业中,农民从自己种植的作物中获取原料,用于生产自己必需

的消费品,从而力求避免与以钱易物的市场相接触。不过,由于唐代商业极其繁荣,为市场需求而生产的家庭手工业也兴盛起来,这是民间作坊的初级形式。从唐代的全部手工业生产来看,除了一些规模大小不等的作坊工业外,绝大部分的日用手工业制品来自家庭手工业。尽管从形式上看,唐代的家庭手工业与传统的家庭手工业没有什么区别,如组织上以家族为单位,家庭既是工作场所,也是销售地点;技术上主要是家族内传,力防外泄,即谓“家专其业”。但它与传统的家庭手工业仍存在很大的不同,传统的产品是自给的,而它不仅是用于自给,而且更主要的是为了给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民间手工作坊初级形式。

在唐代民间手工业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民间作坊与家庭手工业的区别,主要是它的生产目的完全是为着他给的,而且从规模上讲,民间作坊一般都雇佣了家庭成员以外的其他人做帮工。民间作坊在唐代商品经济的结构中占着主导地位。唐代的大城市中,存在着大量的手工业作坊。这些作坊,有的称为“铺”或“作铺”,有的称为“行”,如织行、金银行等。它们一般都是自产自销,即一幢房内,前边销售,后边制造。即使是中小城市,也有各种小作坊工业,依类别聚于各坊,这在《太平广记》、《清异录》等笔记、小说中有着大量的记载和描述。作坊的营业主称为“长老”或“师”,他们与眷属、徒弟、帮工等一起劳动,是向市场提供商品的小生产者。唐代也出现了规模较大的民间手工业作坊,广泛地为人们引证的是定州的何名远,他资财巨万,不仅在各驿站经营邸店,而且还经营一个拥有绫机 500 张的手工业作坊。

三、异彩纷呈的手工业成就

作为古代中国最为强盛的朝代之一，唐代几乎在手工业的各个领域中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矿冶工业方面，产品主要有金、银、铁、锡、铅、矾、水银、丹砂等，分布在今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等地。而且，除开采金属矿以外，还开始了非金属矿的开采，如广东的石炭矿（煤矿）、甘肃玉门油矿，都是从唐代开始见于记载的。在纺织业方面，无论是官府、民间作坊，还是家庭纺织业最为突出。比如，武后时期，仅其中的绫锦坊，就有巧儿匠 365 人，内作使绫匠 83 人，掖庭 150 人。随着城市的繁荣和商品流通的扩大，民间纺织作坊大为增多，当时已有织锦坊、毯坊、毡坊、染坊等等，受纺织工业的直接影响，唐代的印染业也有飞速发展，仅就官府印染工业而言，内部分工精细，共有青、绛、黄、白、皂、紫六色，同时能染出各种绚丽多彩的颜色。尤其突出的成就是唐代发展了汉代的印染加工技术，除夹纈外，还出现了绞纈、腊纈等染色印花方法。

在唐代手工业成就中，最为人称道、后世受益甚深的是雕版印刷术的出现。诗人元稹为白居易《长庆集》作序时（824 年）就提到，当时扬州和越州一带，到处有人将白居易和他自己的诗“缮写、模勒”，在街头售卖，或用以交换茶酒。所谓“模勒”，一般人都认为就是刊刻。这可说是现存文献中最早提到印刷术的。由此可知，9 世纪初的中国，在今江浙境内，已有印刷出售的文集了。雕版印刷术之所以在唐代出现，是与当时技术条件的成熟、物质的具备、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事业的发

达分不开的。

四、主要手工业部门的发展

采矿业和铸造业

唐代的采矿业相当发达,据不完全统计,金、银、铜、铁、锡、铅各矿,共计 168 处,大约年产银 1.2 万斤,铜 26 万余斤。唐政府直接掌握着这些矿业,但也在一定限度内允许民间自由开采,只须根据产量多寡,向国家缴纳一定比例的货币或实物税。尤其是在唐代后期,采矿业无论在坑冶的数量和产量方面都有增加。唐宣宗时,银矿增加了 2 处。产量方面,饶州银矿年产 10 万两,足以说明银产量的增加,铁矿增加了 71 处,当时宣州的冶铁也很著名,产量也十分可观。上述这些矿产的分布也是极为广泛的,以金和铁为例,据《唐六典》列举的纳贡金州有 19 个,《通典》则列举了 14 州,《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唐代产金之地有 73 府州,其中以岑南道有 29 州为最多。唐代的产铁之地,大多在南方,较之汉代及魏晋南北朝时代已有很大的变化,随着南方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冶铁工业已从中原扩展到长江以南,而且这种趋势越来越浓。有人曾根据《唐六典》、《元和郡县志》、《新唐书·地理志》等书的记载作了统计,唐时属北方诸道的产铁之地只有 34 处,而属南方诸道的产铁之地共有 61 处。

除上述金属矿产外,唐代还对矿物燃料进行了开采。在广东有石炭矿(煤矿)的开采。刘恂在《岭表录异》中即记录了康

州悦城县人们普遍使用了“樵石”的情况，诗人李峤还有“长安分石炭，上党结松心”的诗句。另一种燃料是石油。《酉阳杂俎》记载了高奴县有“据以膏车及燃灯极明”的石脂水。《元和郡县志》也记载了延州肤施县有可以燃烧的“去斤水”，更首次记载了如今已是著名石油产区的甘肃玉门县出产石脂水的情况。此外，称作“火井”的天然气矿井，在四川临邛（今邛崃县）被开发而用来煮盐。

金属铸造业 除了金银等少数贵金属外，一般坑冶所产的金属矿产实际上都是为金属铸造业提供原料。根据大连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唐代金属器物陈列品，可以推定当时使用的金属用具质料，有生铁、熟铁、铅、铜、金、银等。用这些原料制成的金属器物，种类甚多，并且都有著名的产地，如金银器产于绵州，银器产于宣州、桂州，铜器产于扬、越、润、宣、桂诸州，青铜镜产于并、扬、桂三州，铁镜产于并州，铁器产于舒州，文铁刀产于黔、忠、涪三州，刀产于伊州、邢州、剪刀产于邠州，铅器产于贵州。

研究现存的唐代金属器物，可以发现唐代金属铸造业的技术进步：唐代金属用具制造的方法和工序都是很精密的，每件器物，除了铸造和锻炼外，或用手打制或加工磨制，或镀金银。在使用带刃工具中，可以看到钻和括刻的明显痕迹。不仅如此，早在唐初就基本解决了汉代以来一直存在的“合铸金银”的难题，这无疑是唐代金银铸造技术的重大成就。在唐代金属制品工艺技术方面的改进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它受到了外来文化的浸润与熏陶。如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的一次唐代窖藏大发现中，光金银器就达216件，从造型和花纹方面

来看,有许多是受到了波斯萨珊王朝金银器的影响。

在金属铸造业中,占据特殊地位的两个重要部门是铸钱业和兵器制造业。由于唐初武德四年(621)铸造钱全国统一的币制“开元通宝”,随着货币需要量的增加,冶铜及铸钱业也日渐发展。开元时仅铸钱70余炉,到天宝年间铸钱增至9炉。但由于铜的产量有限,铸钱业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唐代流通领域中“钱重物轻”现象的出现与此是大有关系的。与隋唐时期国力强盛不称的是这一时期的兵器制造业,它与南北朝相比,似乎毫无进步可言,仍分作长兵器、射运器、短兵器、防御武器四类,值得重视的是唐代末年已开始将“火药”用于军事目的了。唐哀宗天佑初(904)郑璠攻豫章时,就使用了“飞火”,即火炮、火箭之类的武器。这不仅是火药史上新的一页,同样也是人类文明史上新的一页。

陶瓷业

中国陶瓷工业发展史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陶器阶段、陶瓷阶段和瓷器阶段,最后一个阶段的开始,则在隋唐时代,这表现在三个方面:(1)中国瓷器在隋唐时代始用高温烧成,从而使瓷器的质地相当坚固;(2)瓷器到了隋唐时代,始在社会上普遍使用;(3)制瓷业到唐代才有“窑”的专称。由陶器向瓷器的这一突变,之所以在隋唐时代完成,与隋唐时代陶瓷工业的技术发展密不可分。隋代的何稠对于瓷器烧制技术的改进,更是后世有口皆碑的,瓷器烧制技术的改进,使瓷器的质量大为提高,成为耐用的器物,得以在社会上普遍使用。

隋代的瓷器一般都施半截釉,装饰较少,颇为朴素,但精

美制品并不匮乏。唐代由于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陶瓷业在隋代的基础上,又向前跃进一步。更由于铜器被禁用,瓷器的使用也就更加普及了。另外,唐代饮茶之风大盛,对瓷茶具的需要量也就随之大增,成为唐代制瓷业发达的又一刺激因素。在唐代,制瓷业已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唐代制瓷的名窑很多,有越窑、邢窑、鼎窑、婺窑、岳窑、寿窑、洪窑、蜀窑及今江西新平县的霍窑等。其中越窑和邢窑是当时南方和北方的制瓷业中心,越窑系在越州烧造,以青瓷为佳,其器明澈如冰,莹润如玉,釉色达到纯洁温润的地步。邢窑系在邢州(今邢台)烧造。所制瓷器,土质细润,其色尚素;所产白釉瓷器,在唐代风靡全国,为当世所称重。从制瓷业的分布来看,具有南盛于北的特点。名瓷所出,北至邢州,西达蜀地,再由中部长江流域及于东南的闽越,并不限于东南一隅。而且从总体上看,越州的青瓷似乎更合乎当时的风俗,所以能得到更为迅速的发展。

隋唐时代工业中最为光彩夺目的是标志中国制陶技术新发展的“唐三彩”。它是铅釉陶制技术达到娴熟后,在铅釉内掺和少量铁和钴的氧化物,掌握一定的烧造气氛后才烧制出来的。所谓“三彩”是指三色釉,以青、绿、铅黄为主。在“唐三彩”中有蓝色的,世称“蓝三彩”,又叫“三彩加蓝”,最为名贵。唐三彩的制作过程是:先和色料于釉内,然后用笔拓于器胎上,或浇在上面,再装入匣(笼),满窑烧成。这种制品,胎骨坚致,或作白垩状。釉色鲜艳,花纹美丽。制品之中,高足盘、碗、角式杯、天鸡壶、扁瓶等物,可能是受了西方的影响。唐三彩陶器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俑,一类是器物,内容十分丰富。就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唐三彩陶器,发现于1973年发掘的,葬于

唐高宗时的陕西富平县李凤墓(高祖第15子)内。综合其他一些资料,我们知道,唐三彩的最早制作时期是唐高宗统治(650—683)中期或稍早。而且它一经出现,很快就为当时的贵族官吏所喜爱,不论数量、质量,在盛唐时期都达到了顶峰,安史之乱后,唐三彩陶器逐渐走向衰落。

制瓷业发展到五代十国时期,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即由民间转向官方化了。唐以前的制瓷业,属于民间的工业,其产品不仅满足民间需要,也进贡给皇室和官府享受。至五代时,各割据势力开始创设御窑,专门烧造供皇室和官府使用的瓷器。在北方有后唐、后周的御窑,在南方有吴越的秘色窑,在西南有蜀国的官窑。从此,制瓷业顺着官方和民间两条线索往前发展了。民间制瓷业方面,仍保持着优良的传统。于是,从五代到元代,官窑与民窑分道扬镳,争奇斗艳,成为一色釉瓷器盛行的时期。尤其是吴越国的越器,就其烧制技术特点来看,具有卓越的成就,体现在如下几方面:(1)从色釉来说,从初期青中带有微黄的一种不成熟的还原色调,改进为春水般的湖绿色,釉色很薄,而且非常匀净,比之唐代的表釉有了很大的进步,也为后来宋代的青瓷打下了基础;(2)就器物纹样来说,唐代越器的纹样草率而简单,五代越器的纹样则多种多样;(3)就器物形制和装饰来说,越器至五代而有雕器、镂空、开光的手法。总之,五代时期是瓷器制造史上向前演进中极为重要的一章。

纺织印染业

在隋唐时代租庸调制的背景下,户调主要征收丝织品,而

且丝绢等常常作为交换手段——货币来使用，又是对外贸易的主要输出物品，这些都促成了纺织业在隋唐手工业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且也是纺织业进一步向前发展的驱动力。

唐代的纺织品主要是丝织品，另外还有麻织品、毛织品，四川甚至还有少量的棉织品。从市场交换中可知有如下一些纺织品的种类：丝织品有绢、绡、绌、绫、罗、缎、锦、纹、丝布等；麻织品有葛麻布、女毳布、胡女布、白苧布、紫苧布、苧练布、细青苧布、青苧货布、楚布、直布、竹布、弥布、斑布、高苧衫段、连头獠布等；毛织品有毛氍、绯毡、毛袴等。此外，还有各种各称的丝麻毛的交织品。

从产地分布来看，麻织品、毛织品一般是原料与成品产地合一。丝织器由于是各道向中央缴纳的重要贡物，产地分布十分广泛，大抵天宝以前，丝织业以河南为最盛，河北次之，淮南只有寿州，江南地区则在偏南和偏西。天宝以后，由于中原动荡，技工多向南流移，加上藩镇割据，中央服御无所给，只好转而依靠江南。于是，淮南、浙江及江西的丝织业开始兴起，并凌驾于北方之上。至唐代后期及五代时期，南方的丝织业已超越北方。

唐代印染业在纺织业的直接带动下，有了飞速的发展。官府印染业中，精细的内部分工即反映了这种发展。尤其突出的是唐代发展了汉代的印染加工技术，除夹缬外，还采用了腊缬、绞缬等染色印花方法。其中，夹缬是最普遍的染色工业：它系用两块木板，雕镂同样的图案花纹，夹帛染色，染过之后，解开木板，花纹相对，左右匀整，色彩喜人。夹缬是一种化学的、物理的、美术的综合性科学印染技术，据吐鲁番出土的夹缬印

花标本,已知的夹纈至少包括三种印花工艺:直接印花、防染(印)印花、碱剂印花。为适应夹纈的生产需要,早在盛唐时期,就将镂空花版改革为筛罗花版,这在印染史上是了不起的突破,比起20世纪初兴起的筛网印花技术来毫不逊色。

唐代的刺绣有锁绣、平针绣两种。前者从汉代直到中唐,一直流行不衰,并具有较高的水平。后者是较为复杂,在针法上有严格的要求,大致在隋代及唐初,平针绣的技术才逐渐普及。

造纸业与印刷业

隋代的统一为造纸业选用各地优良的造纸原料,创造了便利的条件;加上造纸技术也有提高,出现了加工加料染色的纸张,使造纸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如隋开皇十三年(593)的写经卷子,是用麻与楮皮混合制成的,为竖帘密罗纹,纸面纯洁细致,略带黄色。到唐代,官府设置了许多造纸作坊,造纸业盛极一时。当时在今四川、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等地,就有纸坊90余处。此时的纸,在制法、种类、品质等方面,也远远超过了前代,并产生了一大批名纸,隋唐时代的名纸主要有:浙江的剡藤纸,宣州泾县的宣纸,蜀郡的双流纸、鱼子笺、十色笺、薛涛笺等。从地域分布来看,隋唐的造纸业比以前要开阔得多,除了造纸业中心的四川,唐代南方的一些边远地区也盛产纸。如南海多产谷纸,罗州(今广东廉江县北)产香皮纸。北方也不乏产纸之处,如河东蒲州以产纸而著名,即使在河北寻常县份里,也有产纸的,如巨鹿南和县街头就有纸坊。总之,唐代造纸业在地域分布上更为广泛,纸的种类、名目和用途也增多了,

染色纸更是讲究,所有这些都是与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和文化的高度繁荣,与唐代雕版印刷术的兴起息息相关的。

印刷术有活字和雕版的分别,但雕版印刷术发明在先,活字印刷术则是在雕版印刷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所谓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印刷术,实际上是指雕版印刷术:即将文字反刻在一块整的木板上(或其他质料的版),再在这块整版上加墨印刷。唐穆宗时元稹即提到“模勒”了,这可能是现存文献中最早提到“印刷”的,十年后的太和九年(835),唐文宗下诏禁止各道百姓私置日历版,这又从反面说明,此时民间已有雕版印刷日历的了。处于唐代这样一个文化事业高度发达的朝代,雕版印刷一经发明,其传播就十分迅速。据明代史学家邵经邦所记,中国最早的刻本书是唐太宗时刻印的长孙皇后的遗著《女则》,刻印的年代大约在贞观十年(636)左右。此后,用雕版来刊印书籍、佛经、佛像,日益普及开来,唐代著名法师玄奘就曾大量印制普贤菩萨像,散施四方。唐代的刻本直到今天仍有实物可作见证。发现于敦煌的《金刚经》是唐懿宗咸通九年(868)的雕版刻本,是世界上现存刻本中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雕版印刷书。就分布来看,唐代印刷业主要在今陕西、河南、江西、四川、江浙等地,长安和成都则是当时的印刷业中心。

雕版印刷最初是在民间流行的,至五代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在宰相冯道的倡议下,官府也开始采用雕版印刷,计划刻印九种经书。22年后,这一计划始告完成。自此以后,政府刊刻书籍的业务日渐增多,为此,政府命令国子监主持书籍刊刻工作,书版也藏于国子监,称为“监本”。这样,大批课本、

佛经、文集等分别从官私两个印刷渠道刊印出来，在社会上广为散发和传播。

造船业、漆器和食品业

中国的造船业发展到隋唐时代，更趋发达。隋炀帝游江都、伐高丽，无一不需要大量的船只，而两者的品种则不同。一是航行于内陆河胡的，一是海洋船只。这样规模巨大的行动如果没有相应的造船业作后盾是难以完成的。唐代由于水上交通发达，促进了造船业的进一步发展。造船材料大多采用坚硬耐久的楠木制造，其次则是樟木，也有用木兰、杉树、柯树的。由于这些木料集中产于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所以隋唐五代的造船业绝大部分集中在江南。大约在开元天宝之际，造船业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地上，都取得了相当的进步。刘晏在扬子县（今江苏仪征）设置的10个官府造船工场，造船达2000艘，专供内河运输之用。内河船按其大小和式样，可以分平底船、座船、浅底层子船、杂般座船、海鸥船、网船、车船、马船、腾浅船、铁头船、万石船等，种类十分繁多。唐代所造的远洋海船，也驰名世界，大的长20余丈，能载客600—700人。因此，各国商人都愿乘中国船只从事远洋贸易。唐贞观时，阎立德在洪州造“浮海大船五百艘”，航行于东海及黄海一线，以通高丽。由中国至红海一段航程中，商运多赖中国船舶。按照载重的大小，唐代海洋船只可以分为五千料船、二千料船、一千料船、钻风船等几种。

在漆器方面，唐代除盛行前代的干漆工艺外，还有“剔红”法，用印版刻于平锦，雕法古朴，成为宋代剔红器物的先驱。在

唐代漆器中,最为人品味的是“平脱器”。日本正仓院所藏的金银平脱器物,种类繁多,保存完整,可见平脱漆器在唐代十分流行。

隋唐时代的食品业主要有制盐业、酿酒业、制粮业、焙茶业等。此一时期中,传统的海盐、池盐、井盐三种盐业都很发达。如唐代盐池已达 18 所,盐井有 640 处。唐代盐区区域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区:两淮盐区、两浙盐区、福建盐区、两广盐区和长芦盐区。隋唐盐业大体说来是由官府经营的,隶属于尚书省,安史之乱后,由于国用匮乏,于是创设盐法,开始了政府对盐业的专卖制,终唐之世未变。

酿酒业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葡萄酒的酿造有了发展。这是由于直接吸取了西域的酿酒法,技术上有了改进。中国古代酿酒,最善于用曲,葡萄酒的酿造却不必糖化,而采用无曲发酵法。唐代酿酒业中已出现了“烧酒”的名称,但是否就是元代以后的烧酒却尚无定论,一般认为唐代的烧酒并非是今天的蒸馏酒。

中国蔗糖制造始于唐代。唐太宗于贞观二十一年(647)遣使从摩揭陀国(今在印度)取熬糖法,这是唐代创制蔗糖的有力证明。大体主来,唐代出产蔗糖的地区与现在的产糖地区基本相同,这大约是与气候,环境有极大的关系。现在产糖的广东、四川、福建、台湾等地,在唐代史籍中已有产糖的记载。

南朝时已有制茶业,但还处在萌芽阶段。唐代由于茶风大盛,茶不仅成为政府重要的税源之一,而且也成为当时对外贸易的主要输出品之一,于是制茶业迅速发展。唐代西起四川,东至湖南、江西、浙江、安徽、福建、苏南,都有产茶地区,尤以

皖南及浙东为主。在某些地区,甚至出现了一些大型的茶园和制茶作坊,如四川九陇人张守珪,每年都要召募百余人在茶园中采摘,其规模之大可想而知。唐代还诞生了我国第一部关于茶叶知识的专著:陆羽的《茶经》。

第三节 商业飞速发展

一、商业都市与乡村集市

商业都市的繁荣

早在隋代,商业已空前繁荣,繁华的大都市遍布全国。《隋书·地理志》和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中有许多有反映这方面情况的材料。如四川的蜀郡,“水陆所凑,货殖所萃”;江南的宣城、毗陵(江苏常州)、吴郡、会稽、余杭、东阳等郡,也是“商贾并凑”之地;另外,南海(今广州)、荆州、歧州(今陕西凤翔)、蔡州等都是商旅殷繁的都市。特别是东西两京,是全国最大的商业都市。西京长安有东西二市,东市名都会,西市名利人。东京洛阳有三市,东市名丰都,南市名大同,北市名通远。市内有120行,3000余肆,4000余店。以通远市而言,它北监通济渠,渠上有通济桥,天下舟船,集于桥东,常有万余艘,填满河路;商贾贸易,车马填塞于市,一派繁荣景象。

唐代继承了隋代繁荣的商业,并继续向前发展。唐都长安仍设东西两市,市内货铺行肆林立,商贾辐辏,繁华程度远远超过隋代的东京。东市市内货财有 220 行,四面设立邸店;西市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市署前有大衣行,杂糅货卖之所”(韦述《两京新记》卷三)。会昌三年(843)的一场火灾,一下子便烧毁了东市曹门以西的 12 行 4000 余家,店肆数量与规模之巨可想而知。不过,唐代最为繁华的商业都市,莫过于扬州,时人有“扬一益二”之俗谚,意思是说扬州的商业在唐帝国中最为发达,四川成都名列第二。扬州是东南名城,唐代文献中对扬州的富庶曾从多方面进行过描述,尤其是唐代诗歌中,对于扬州的繁华更多有盛赞。扬州之所以如此繁荣,在于它不仅是东南重镇,而且是一个巨大的国际商埠,是交、广之外又一大外商聚集寄居的地点。扬州是全国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一个橱窗,从这里可以看到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被认为天下第二的益州(成都),其商业的繁华程度也不亚于扬州,故有人认为益州“江山之艤,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多,……扬州不足以侔其半”(《全唐文》卷七七四)。此外,江南的苏州和杭州,也是中唐以后新兴的大都市。宋代朱长文的《吴郡图经续记》就称苏州到唐代就号称“雄郡”了。作为东南名郡的杭州,中唐时商业很发达,时人有“骈橈二十里,开肆三万室”的记载,诗人杜牧曾提到杭州有“户十万,税钱五十二万”,俨然是个大都市(引文分见《全唐文》卷三一六、卷七五三)。洪洲是广州和扬州之间的一个商业都市,海外和岭南的货物大都从广州越大庾岭,取水道到洪州,再由洪州沿江而东,因此洪州也是江淮之间的一大都会。荆州也是长江中游的

一个繁华都市,据称有 30 万人户(《通鉴》卷二五三)广州是岭南最大的都市,且为著名的国际商港。另外,钱塘江流域的越州、明州,也都是国际商埠。

隋唐时的都市,到五代时仍继续存在着。有的渐趋衰落,如东西两京;有的则继续发展,汴梁即属于此类,它在隋唐时期开始兴盛,由于梁、唐、晋、汉、周都定都于此,遂发展成为最大的商业都市。此外,吴越、南唐等据江南,前、后蜀据四川,都着力于发展地方经济,使得江南、四川的商业都市更趋繁荣了。

总之,隋唐五代时期,由于各种条件的成熟,一大批商业都市脱颖而出,走向繁荣,形成了一个都市群,并由这些都市群,构成一个四通八达的商业网。当然,由于经济重心的转移,这一时期商业都市的发展趋势也深受影响。纵观整个时期,不难发现,隋唐五代都市的繁荣,有一个从西向东,由北向南的趋势,即东南方的都市越来越多越发展,而西北方面的都市渐趋衰落。显然,这种趋势的出现,还与外族入侵、南方经济的发展、东南交通的开发以及国内外海上贸易的刺激有关。

乡村集市的普及

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就已出现了一种自发形成的初级市场——草市,到唐代时则普及化了。草市大多设在城郊附近、交通要道、驿站或大的村镇地方,是农村市场中的一种大型市场。赤壁的草市、德州境内灌家口草市及汴州城郊的汴水渡口草市都是十分著名的。诗人王建的诗名“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全唐诗》卷一一),说明当时草市已广泛存在。

草市虽不如都市市场那样高级,不像京师两市那样“甍宇齐平,重楼延阁,牙相临映,招致商族,珍奇山积”,但市中也或多或少地有货肆店铺,如酒肆、药肆及经营各类日常用品的店铺等。由于草市多设于乡村,市上所出售的也就以农产品和林牧产品居多了。李嘉祐的《中兴间气集》中诗句“草市多樵客,渔家足水禽”(卷上)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记载了荆州庐山人在白湫南草市上贩卖石炭的情形。但在一些大的草市中,所售之物品类繁多,甚至连名人诗句也成为市中交易的商品,例如白居易和元稹的诗,经缮写模勒,出售于市井,甚至用于交换酒茗。随着繁荣程度的增加,草市出现了向都市转换的迹象,一些草市被改为县治,成为当地的政治中心。如上述的灌家口草市在开元年间被提升为归化县的县治。再如,宣州的永济县治,就是由张桥行市(即草市)改置而来的,当然,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草市的繁荣并不一定会导致都市的建立,它还必须与当地的地理位置是否重要、人口是否众多等诸多因素结合在一起,才能成为都市设立的必要条件。

草市之外,还有定时的集市,岭南人称为“虚”,蜀人称为“核”,江南人称为“亥”,北方人称为“集”,都是隔日一会,或三、五日一会,是一种初级的农贸市场。来赶集或趁虚的人,大多是附近一带的农民,买卖的物品主要是农林牧副渔业的生产剩余作品。这种集市不仅与城市市场不同,与常设店铺的草市也有明显的区别。虽然也有集市的固定地点,实际上只有临时一聚,保持着日中为市的原始状态。钱易《南部新书》就指出“端州已南,三日一市,谓之趁虚”;白居易诗句“亥日饶是蟹,

寅斗足虎豕”指的就是这种乡村集市。

还有一种与草市、墟市都不同的集市，它也是定期一聚，但间隔时间很长，一般为1个月，或每年举行1—2次，类似于后世的庙会，这种集市除作为附近农民的农贸市场外，更多的是作为外地、远地乃至外国商贩购销品类繁多的远方及异域物产的场所。这种市场是一种较高级的形式，当时许多大宗交易，就是在这类市场上进行的。而且配合集市，还举行竞技、比赛等各种娱乐活动。蜀中的蚕市便是这样的集市：“蜀中每春三月为蚕市，至时贸易毕集，阡陌填委，蜀人称其繁盛。”（《五国故事》卷上）

二、开元宝通的创制

适应国家一统、经济发展的需要，早在隋王朝建立之初，便着手整顿钱币制度，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统一的五铢钱的流通。开皇元年（581）九月，隋文帝下令铸行五铢钱，每千钱重四斤二两，1枚重约3克。到开皇五年（585），隋五铢钱终于成为境内流通的统一货币，使魏晋南北朝以来相对衰退的货币经济重又复兴起来。但是，隋炀帝统治后期，政局动荡，私铸盛行，导致货币混乱，物价上涨，出现“斗料千钱”的现象。最初，千钱就重2斤，以后渐渐降到1斤，甚至出现了剪铢镈、裁皮、糊纸以为钱的现象。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隋亡。

唐王朝建立之初，仍沿用隋代的五铢钱制，但流通中劣币充斥，亟待整顿。武德四年（621），唐高祖宣布废除五铢钱，开始铸行“开元通宝”钱。这种新币制推行得较成功，史书称赞

说：“轻重大小最为折衷，远近甚便之。”《旧唐书·食货志》从此，终唐之世，除高宗及肃宗时偶尔铸造以年号为名的“乾封泉宝”、“乾元重宝”钱外，钱文均以“开元通宝”为定制。唐代对于铜钱的成色有严格的规定，如天宝年间规定铜钱的成分为铜 83.32%，白镴 14.56%，黑锡 2.12%，这是铸钱制度的明显进步。当时，全国共设置 99 炉铸钱，每年铸钱额达 32.7 万余贯，流通甚广。1964 年，河北邯郸峰峰矿区留旺发现一陶缸古钱，重约 83 斤，其中绝大多数是开元通宝，约达 1.8 万余枚。另外，在今新疆地区的唐代遗址中，也时常发现开元通宝。

开元通宝的创制，在我国货币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后，历代的铜钱都不再以重量为名，而称为“通宝”“元宝”等，金属便全然脱离了量名钱体系，发展为更高一级的铸币形式；开元钱大小轻重，还往往成为后世制钱的模本。另外，开元通宝钱对我国的衡法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此前重量计数均以 24 铢为 1 两，自从 2 铢 4 铢的开元通宝钱流通以后，十进位的 1 两 10 钱制便逐渐形成了。最后，开元通宝的实行，还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以通宝来命名，反映了人们对货币作用的进一步认识，也反映了货币地位在社会经济中的增强。

三、邸店、柜坊和飞钱

隋唐时期商业的发达，不仅体现在行、肆、店等直接经营兴贩货鬻业务的繁荣上，而且还在于兴起了对商业发展起很大促进作用的、为商业服务的辅助性组织，主要有两种：邸店和柜坊。

邸店在南朝时就已存在，唐初更在法律上作了阐明：“邸店者，居物之处为邸，沽卖之所为店。”（《唐律疏议》卷四）。但是，邸店的这一定义显然不久就成为古文了。实际生活中的邸店并没有法律上规定的那样严格区分，而往往是兼营堆货、交易和商旅住宿等业务。于是邸店一面联系着贩运商，一面联系着零售商，成为批发商和零售商之间的中介人之一。它除了收储、寄存客商货以进行货栈业务外，还代客经营批发与销售。邸店经手进出的货物数目很大，营业额很高，生意十分兴隆，这就必然有大量的款项需要收储拨兑，于是这类金融业务也成了邸店的营业项目之一，而且经手的数目动辄千万，因此，邸店又成为最早的钱庄了。正因为邸店既经营直接交易，又经营居间交易，还经营储货、住客业务，所获利润就相当丰厚，一般富商大贾也就在京师和各重要通商口岸以及商业发达的州府城市纷纷设立邸店。如大商人窦乂在长安西市秤行之南造店 20 余间，每日收取数千文利钱；定州何名远“每于驿边，起店停商”；西京富商邹凤炽更是“邸店园宅，遍布海内，四方物尽为所收”。（以上征引分见于《太平广记》卷 243、卷 242、卷 495）有权有势的官吏，特别是各地藩镇，对于这种一本万利的生意也纷纷插手，与民争利。唐政府为限制此风的蔓延，树立官府清廉的形象，不得不再再颁诏予以禁止。《新唐书》《旧唐书》就留下了开元、大历年间的三次禁诏。此外，许多寄居内地的外国商人特别是波斯商人，也在各大城市开设邸店，经营银钱业务，兼营收购珠宝。这在唐代的文献中，特别是笔记小说中留有许多记载。

邸店之外，唐代城市中还设有纯粹的金融机构——柜坊。

柜坊出现的具体年代,尚不能确定,但德宗初年,唐政府就曾向敝柜或柜窖借四分之一的钱以供军用。可见,在此之前柜坊就已经存在了。柜坊一方面吸收存款,一方面经营贷放,已具有后世钱庄的性质,是现代银行的雏形。不过,柜坊与当今银行的最大区别是,银行在吸收存款时,必须付出一定的利息,而柜坊是接收存款后,凭一定的信物,替存钱者支付款项,并收取一定的柜租。唐代文献中,关于在柜坊中“鏐钱”的事情屡见不鲜。商民在柜坊或某些大商号“鏐钱”的数目,往往多至百、千贯,甚至达到十万贯以上,而且存户还可以凭类似支票的“帖”或其他信物支钱。另外,还有一种寄附铺,大概也与柜坊类似,办理保管寄户出售寄存的物品。长安西市的“景先宅”就是一家寄附铺。除去这些以存款为业的商店,有些大商店,如药店,外国商人的“波斯店”等,也往往因商业往来关系,寄存人们的钱财。

随着唐代商业及货币经济的发展,中国最早的汇兑事业——飞钱,也应运而生了。查考《新唐书》、《旧唐书》等文献的有关记载,飞钱可能首先在民间使用。到唐玄宗时,政府开始干预,可见已是相当普及了。飞钱又称便换,类似于现代的汇票,可以避免长途携运钱币的麻烦及途中可能发生的危险。正像《因话录》卷三所记的那样:“有土鬻产于外,得钱数百缗,惧川途之难赍也,祈所知纳于公藏,而持牒以归,世所谓便换者。”飞钱产生后,唐政府曾于元和六年(811)企图予以禁止。这大约是当时正值钱荒严重,现钱缺少,主观上认为飞钱办法会促成商人、富户们更多地积敛铜钱的缘故,然而,禁止飞钱后,反而引起大量现钱被携出京外,人们更加藏钱不出,物价

更趋跌落，于是只好在次年解除了禁令。政府还开始兴办官营汇兑事业，由户部、度支、盐铁三司专门办理飞钱事宜。最初每100钱要收汇费100文，由于商人都不汇，就改为“敌量”与商人便换，即实行平价汇兑办法，这种官营汇兑事业一直保持到唐代晚期。不过，到后来，如懿宗时（860—870）商人持券赴各州府兑钱时，常常有留难兑付的事发生。

四、富商大贾的活跃

在古代中国，商业属于末业，因此商人在士农工商的社会职业划分中，总是位居最后，尽管如此，汉代以来，“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观念，总是驱使社会的一大批人舍本而逐末，以获取能左右一切的金钱。隋唐五代时期，商人在社会职业中的地位无疑比以前提高了一大步，而且富商大贾的商业活动也空前地活跃。

唐代社会中，经商被看作是一个重要职业，甚至是主要职业，因而从事商业经营的人非常多，稍有一点资力和才能的人，大多去服牛络马，周游四方，贩运远方甚至是异域的特殊物品，从而使“奇怪时来，珍异物聚”，诗人姚合曾描写过这种现象：“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姚少监诗集》卷六）诗人张籍《贾客乐》一诗更有“金多众中为上客，夜夜算缗眠独迟”的诗句，实在是商人唯利是图性格维妙维肖的刻画。同时说明，当时的社会观念有了明显的变迁，财富的多少成为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准，于是这些贾客或估客，成为社会上有钱有势的活跃人物，也是社会经

济生活中的一股支配力量。

唐代商人的活跃情形是异乎寻常的，如扬州“富商大贾，动逾百数”。其中有个叫王四舅的，竟然可以对扬州的富商们颐指气使。由于商人在社会中的活跃，反映时代特征的文学作品常常把他们作为描绘的对象，对唐诗而言，许多诗人都留下了此类作品，如刘禹锡、白居易、元稹、张籍等。其中，以元稹《估客乐》一诗对于商人经营、贩运、弄虚作假、牟取暴利的情形更有纤细入微的描写。如“估客无住处，有利身即行”，“求名有所避，求利无不营”等，都是当时世风真实而生动的写照。必须着重指出的是，当时商人活动有两个特点。一是商人在全国各地贩运时，必须结伴同行，形成了一种临时性的商帮。这种商帮决不是中世纪行会式的集体经营，甚至连几个人联合的合伙经营也算不上。这种商帮之所以形成，完全是出于安全上的考虑：在当时交通不方便、道路不安全的情况下，如果一人携带贵重物品进行长途贩运，遭受祸害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因此，商人在整装待发之前，首先要与同行之人结成伙伴，即结成临时性的商帮。二是商人与官府勾结，这是中国一贯存在的现象。在旧中国这样的特权、等级社会里如能与官府相结托，处处有官府势力作自己的后盾，不仅自己变成了特权阶层中的一员，可以免受种种盘剥劳役之苦，而且还能为自己的商业经营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所以，一般的富商大贾都不惜以重资兴行贿赂，打点权贵豪门，以利于进行不等价的，甚至是不合法的贸易，从而获取暴利。元稹在《估客乐》中便说：“先问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与主第，点缀无不精。”商人这种上达宫廷、出入内殿的情形，与西汉晁错所言“交通王侯，力过

吏势”并无二般。在“利之所在，虽死不辞”的营利精神支配下，许多官吏并不满足于仅仅收受贿赂，而且直接参与经商活动。他们或与商人合伙，或在商人帮助下自行经营。官吏经商之风刮遍了全国，从朝廷中的公卿百官，到地方上的藩镇州府，都争先恐后地设置行铺邸店，贩鬻求利。唐政府为了刹住此风，曾三令五申地严加禁止，但成效甚微。最后只好承认现实，变更法令，改为所有官吏在乡村及坊市开设邸店，经营求利，一律按照百姓例科差，不得有特殊待遇。这无疑等于取消了以前的禁令，默许了官吏的经商。

五、互市及对外贸易

隋代统一全国后，便留意于对外贸易。特别是隋炀帝试图借对外贸易谋求隋帝国的膨胀，因而一方面竭力招徕外国商贾，借以炫耀中国的富裕昌盛，另一方面，想通过与外商的互市，了解各国，尤其是周边地区的情况，为其进一步扩张作准备。他委派裴矩出入西域一带，就明显带有这种政治目的。这种纯粹为着政治目的的活动，对于隋王朝来说，没有多少经济效益可言，因而算不上是真正的贸易，仅仅是一种具有变相贸易性质的贡使关系。

入唐以后，对周边地区及对外的贸易才开始纳入正规。唐王朝对陆上和海上两方面的贸易均极为重视，而对周边诸少数民族的互市尤为关注，其目的也在于政治、军事方面，即通过互市，可以得到内地十分匮乏的马匹。马是重要的军用物资，直接与国防有关，马匹的多少反映着国防力量的强弱。通

过互市,也可以获取农业中主要耕田动力——耕牛。出于这种战略重要性,唐王朝特设专官“互市监”管理此事。由于唐初最高层即锐意开发与西域诸国之间的往来贸易,故西域贾商络绎不绝东来,内地商人也络绎西去,丝绸古道重又熙熙攘攘,呈现出兴旺的景象。唐代著名高僧玄奘的西行求法便是随商贾而去的。贞观年间,位于丝绸之路要枢上的高昌国成为阻塞东西交通的障碍。唐廷派兵将高昌并入版图,降为州县,通往西域的门户大开,西域商贾蜂拥而来,在唐朝各个角落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唐王朝在与其他沿边诸少数民族如突厥、吐谷浑、回纥、党项、吐蕃等的关系上,尽管时战时和,但通商互市一直比较频繁。这些民族大多位于高原和或高山地带,其物产主要是牲畜和畜产品。它们常以牲畜——特别是马来交换内地的物品,其中主要是丝绸和茶叶。唐王朝的这种贸易既满足了国防需要,又刺激了生产,是极为有利的。

唐代的对外贸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与南海诸国的海上贸易。从唐代开始,海上贸易也逐渐发展经常性的大宗贩运。当时由海道来华贸易的国家或地区很多,互市较频繁的有日本、新罗、南海诸岛国、印度、斯里兰卡、波斯、大食(阿拉伯)等,其中以大食最为重要。南海及西亚各国来华贸易都是航海而来,由波斯湾经印度,绕马来群岛,抵达今天的广州,然后再从这里分散到岭南的交州、江南的扬州、福建的泉州以及福州、明州、温州等通商口岸。由于海上贸易的发达,唐玄宗时特设“市舶使”一官,以专其事。从此以后,直到元末的700年内,一代胜过一代的对外贸易,一直都是在“市舶使”或“市舶司”

的管理、监督下进行的。

由于丝绸之路的兴盛和海上贸易的发达,许多外国商贾不远万里前来中国通商。尽管受到了种种勒索和敲榨,他们还是得到唐政府异乎寻常的厚遇,在生活上和经营上都获得前所未有的方便。他们在中国诸通商口岸和内陆城镇自由定居,自由营业,不受任何歧视和限制。唐政府为了适应他们的需要,还在城市内划出一个特殊的居留区——蕃坊,使他们能够按照本国的习俗生活,信仰本国的宗教。因此,在外国商贾聚居的地区,不仅建造了许多异国风情的殿堂栋宇,而且建造了不同宗教的庙宇教堂。外国商贾是唐代商业中不可忽视的十分活跃的力量。

第四节 交通的 发达与交通制度

一、大运河的疏浚整治和漕运

隋代最高层在灭陈统一全国之前,就已着手开凿运河。开皇四年(584),文帝命宇文恺带领水工凿渠,引渭水从大兴城到达潼关,长300余里名叫广通渠。炀帝即位后,对运河的开凿倍加关注,终于使大运河臻于完工。他所开的运河可以分为三段。一是通济渠。大业元年(605)所开,自洛阳西苑引谷、洛

二水达于黄河，又自板渚引黄河水，疏通茆荡渠故道，入于淮河，到达山阳（今江苏淮安）。从山阳起，再疏导吴王夫差所开的邗沟，引淮河水经扬子（今江苏仪征县东南）达于长江。这个工程在当年秋天就完了。二是永济渠。大业四年（608）所开，引沁水南通黄河，北至涿郡，全长 2000 余里，可以直通龙舟。三是江南河。大业六年（610）所开，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引长江水直达余杭（今杭州），入于钱塘江，全长 800 余里。大运河开通后，南起余杭，中经江都、洛阳，北到涿郡，将南北联在一起，成为贯通南北的大动脉。

大运河的开通，为隋王朝南粮北运提供了方便。继起的唐王朝对运河的利用大大超过了隋代。隋都洛阳，地滨黄河，又开渠引谷、洛水直入西苑，江淮漕船只需由运河转入黄河，即可直达京师。唐都长安，远在关中，运船须由黄河越三门之险，上溯渭水，若改由陆运，不仅耗费巨大，而且容易发生危险，成为全程运输中最艰难的一段。要保持运河全线的畅通无阻，必须经常加以修整疏浚，这成为沿海各道州府地方官吏的重要职责。全线有三个重点：运河与长江汇流处的瓜步扬州段；运河中段的汴河及其支流段；底柱三门段。据文献记载，唐代曾四疏汴渠，五浚山阳渎，三治江南运河和开凿三门运渠。

唐王朝仰赖漕运，而漕运又如此艰难，自然就成为举朝上下十分关注的中心问题。高宗以前，漕事较为简便。高宗以后，政府机构日益膨胀，用度日益浩繁，转漕东南之粮越来越多，漕运负担大大加重。开元二年（714），唐玄宗任命陕州刺史李杰为陕州水陆运史，开始设立专官管理漕务。不久，宣州刺史裴耀卿条呈便宜，详细陈述了漕运的现状和解决困难的办法，

终被朝廷采纳。玄宗立即委任他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转运使，专门治理漕事。裴耀卿上任后便开始实施自己早就设想好的“节级取便”运输法：以江淮，汴水为一段，江淮漕船运到河汴相交的河口，便建仓贮纳；河口至洛口为一段，运往东都的物资在洛口建仓贮纳，河船不入洛水；由黄河运往长安的物资，也根据水情，利用沿河仓库节级贮运。这一运输法成为唐代中后期漕运的基本程式。

安史之乱时，中原为乱兵盘踞，淮汴断绝，江淮财赋难以再沿淮、汴、河、渭故道送京师，必须改溯汉水运抵商州，然后再陆运到京师，因而京师常有断粮之警。此时，刘晏出掌漕政。在中原安定、淮汴复通之后，他经过实地考察，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开始大力整顿漕运。其方案是：“浮于淮泗，达于汴，入于河，西循底柱、硖石、少华，楚帆越客，直抵建章、长乐。”（《全唐文》卷370）刘晏之后的运使大多萧规曹随，“遵大历故事”，但亦人才辈出，如李巽、裴休等都成绩斐然。

二、国内交通

隋唐疆域辽阔，但交通十分便利。就官道来看，秦汉以来的驰道不仅仍在沿用，到隋代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增修扩展。隋炀帝继秦皇、汉武之后，又一次大规模修建驰道，使官方的大道浮河达海，纵横交错，遍布各地。所有州府郡县的城邑大多位于交通要道或大道不远的地方。大业九年（613），炀帝进一步规定，所有的距大路稍远的郡县城，都必须迁徙到要道上。唐代所有贯通全国的重要道路，都是沿用前代而略加维修保养，没有再进行全国性的大规模修建。不过，各道州府对于本

地区道路的修整,扩建,仍有许多建树,他们除保持旧路畅通外,还根据本地区的交通需要,不断地增辟新路,改建旧路。就整个唐代来看,以京师长安为中心的驿道主要有:一是由长安西至凤翔,南下入蜀;二是由长安越商於至荆襄;三是由长安东至洛阳,经汴州至山东;四是由长安东渡河至太原,再东北至范阳,或由洛东至郑,北达范阳。

隋唐两代都十分重视对外贸易,尤其是唐代的对外贸易,可谓盛况空前,域外交通路线也比以前便利得多。

三、交通制度的严密化

交通制度主要包括关津、桥梁、驿传等制度,起源十分古老。隋唐两代沿用了这些古制,并进行了必要的修正和补充,使之更为严密。

关津制度是在道路河川的咽喉要地设卡,稽查来往的旅行,检验商货,并征收商税。隋唐两代都有专门的官吏管理关津。本来,设立关卡的目的,在于稽查过往行人是否携带违禁物品,特别是兵器。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关津制度成为政府科敛赋税、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

桥梁是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对桥梁的建设维修极为重视,特设专官管其事。据唐代的主管部门统计,“凡天下造舟之梁四(河则蒲津、太阳、河阳,洛则孝义也),石柱之梁四(洛则天津、永济、中桥、灞则灞桥),木柱之梁三(皆渭川之便桥、中渭桥、东渭桥也),巨梁十有一,皆国工修之,其余皆所管州县随时营葺。其大津无梁,皆给船人;量其大小难易,以定其差”(《旧唐书·职官志》)。从造桥技术看,除前代已有各种类

型外,唐代出现了竹索桥,宣、常、洪三州有善造竹索桥的工匠,这三州除提供工役外,还须上贡一定数量的竹索,供造桥之用,可见竹索桥在唐代已相当普及。

驿传制度即政府在水陆交通要道上设立的招待所或转运站,由官家按路程远近划分,在必经之路的适宜地点建立馆舍,供行旅食宿休憩之用,并由官家备马匹或舟船,凡属公职人员,按其官阶大小和爵位高低供给不同数目的马匹或舟船,使其在两站之间乘用替换,如此逐站转递,直到目的地为止。唐代对驿传制度规定得非常周详,管理也十分严格,这在法律上有明文可依。据《唐六典》卷五记载,驿站每30里一设,全国共有1643所,其中水驿260所,陆驿1297所,水陆相兼的86所。驿设驿长一人,并根据驿站的重要程度,给予不同数量的马匹和舟船。政府还不时根据需要增添新的驿站。必须注意的是,唐代的驿站是集馆驿和邮驿于一身的。

第五节 唐朝的 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一、亚非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

7至8世纪的唐朝,由于国家的统一、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物质基础的雄厚,已成为亚洲甚至是世界的头等强国。当时在唐周围的亚非国家,有的刚进入阶级社会,有的仍处于奴隶制阶段,都比较落后。它们被中国先进的政治、经济和丰富

多彩的文化所吸引，纷纷和唐建交。唐朝的统治者为了发展自己的经济文化和进一步提高唐朝在国际上的威望，也需要和亚非各国交往。这样就促进了唐和亚非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

唐朝前期，一直执行贞观时期友好开放的政策，对来自亚非各国的使者和商人都以宾客相待，回赠礼物，并采取“听其商贾往来”的经济贸易政策。唐政府也经常派使者、僧侣出访亚非诸国，中国到外国经商的商人，也不绝于途，那时和唐通使交往的主要国家有 70 多个。

长安是唐的首都，又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世界和亚非各国向往的城市。以长安为中心，有通往亚非各国的陆路和海路的国际交通线，使唐朝和亚非各国的交往畅通无阻。亚非许多国家，不断派使节、学者、留学生和商贾到长安来。唐政府在长安设置鸿胪寺招待各国使节和宾客，设商馆接待各国商人，设太学接收各国的留学生，有的留学生还参加科举考试，及第后就留居中国做官。世界各国的商人，来长安的很多，唐政府允许他们在长安西市开店铺经商，长期居住，并与汉人通婚。另外，外国的宗教纷纷传入唐朝，在长安有佛教，景教，祆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传教士们在长安建筑寺院，宣传教义。同时，亚非各国的音乐家、舞蹈家和画师也经由不同的途径来到中国，传播交流各自的民族艺术。所以，长安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国际城市。

唐代对外贸易的中心除长安外，还有洛阳、扬州和广州等城市。广州已发展成为世界闻名的港口，那里停泊着来自世界各国的商船，亚非许多国家的商品都在这里汇集，对外贸易十分繁荣。为适应对外贸易的需要，唐朝在广州和沿海的港口，

专门设置“市舶使”，管理对外贸易事务。当时，外国输入的商品主要有马匹，毛皮，香料和珠宝等，输出品主要有丝绸、瓷器、茶叶、铜器、铁器和土特产等。近年来在西安何家村出土文物中，有日本的“和同开珎”银币、波斯银币、东罗马金币及宝玉珍饰等文物，就是当时频繁贸易活动的历史见证。

二、唐与亚非各国的交流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极盛时期，当时中国与世界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较之前朝更加频繁。唐朝不仅吸收了外国的文化，同时中国的经济文化也远播各国，促进了其他国家的繁荣和进步，加强了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中朝两国唇齿相依，早在公元前 10 余世纪，中朝人民的交往就非常频繁，后来中国的文化典籍如五经、四史、玉篇等，在古朝鲜曾广泛流传。到了唐朝，两国的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双方贸易非常发达，北起登州，南达楚州、泗州，西至长安，都有新罗（朝鲜古国）商人的足迹。当时从新罗输入的商品有牛、马、苧麻、布匹、纸、墨、笔、折扇等。唐朝输出的主要是丝绸、茶叶、绣物、陶瓷、药材、书籍等。由于贸易的频繁，唐政府在长安设立新罗馆，专门接待新罗商人。唐代宗初年，归崇敬出使新罗，在途中，新罗人民携带资帛抢购唐朝货物，这充分说明中朝两国经济关系的密切。

一方面，在唐朝的外国留学生中，新罗人最多，他们回国以后，对传播文化起了巨大作用。留学生归国以后，多任高官显职，他们仿照唐朝法制改革了本国的礼仪和法律，摹仿唐制

划分全国行政区为 12 道,设立科举制,通过考试选拔官员。他们还设置了医官、律令、算学、通文、刻漏博士,广泛研究中国的天文、历法、医学、文史典籍等。上元二年(675 年),唐历在新罗全国推广应用。当时新罗所学的文化,基本上是中国五经、四史、《文选》之类。新罗人特别爱好唐诗,对白居易的诗和张鷟的文章尤其喜爱。7 世纪中叶,留唐学生薛聪,根据汉字音创造了新罗文字“吏读”,对于文化普及起了一定作用。在服饰方面,从 7 世纪以来,新罗人都穿唐服。

另一方面,新罗文化对唐朝也有一定影响。“高丽乐”传到内地以后,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后来成了唐朝国定的“十部乐”之一。

唐代的扶南,后被真腊统一,所以又称真腊,就是今天的柬埔寨。公元 3 世纪,吴国曾派康泰、朱应到达扶南,由于他们二人的建议,改革了扶南的风俗,腰间围“横幅”的习惯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南梁时期,从扶南来了几位高僧,其中著名的是伽婆罗,他通晓多种语言,在中国译了 11 部佛经。贞观六年(632 年),真腊派使者到唐,唐太宗很高兴,回赐了大量礼品。唐中宗以后,真腊划分南北两部,北部称陆真腊,又叫文单,开元时期,其王子带使者至长安,玄宗封他为果毅都尉。代宗时期,真腊送来驯象 11 只。唐政府封其使者为试殿中监,赐名宾汉。真腊南部称水真腊,宪宗时曾派使者来唐送犀象等物,唐以锦绢等物回赠。

越南(林邑)是我国南方的邻邦,早在数千年前,两国人民已在友好往来。东汉时期,中国的铁器、铜器和陶器就传到越南。他们的著名学者士燮,曾留学洛阳,研究《尚书》、《左传》,

后来任交趾太守 40 多年。越文《四字经》说：“三国吴时，土王为政，教以诗书，薰陶美俗。”越南学者姜公辅，曾在唐朝考中进士，并在长安担任高官显职。总之，中越人民自古以来就是友好的。

西南方面的印度、巴基斯坦，唐朝称为天竺，早在两汉时期，两国就存在着贸易关系。到了唐朝，印度半岛沿岸，常有唐朝商船往来。当时从天竺输入的，主要是胡椒、宝石、珍珠、棉布、椰子等。唐朝输出的，有丝织品、麝香、青瓷、铜钺、樟脑等。

公元 7 世纪，我国发明的纸，经中亚传到天竺，后来造纸技术也传到那里。由于天竺人学会了中国造纸法，所以从八九世纪以后，天竺便结束了用贝叶和桦树皮写字的时代。

天竺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他们的先进文化，也传入唐朝。太宗时期派人向天竺学习用甘蔗熬糖法，从此我国学会制造砂糖。到了代宗时期，又学会制冰糖。

另一方面，天竺的数学、天文学也传到唐朝。当时著名学者有迦叶、瞿昙、拘摩罗三个家族。瞿昙曾编制《经纬历》，高宗时期，李淳风的《经麟历》和《经纬历》并行于世。武周时期，瞿昙悉达编译了《九执历》，这是一部影响较大的历法，当时曾被民间采用。著名天文学家张遂编《大衍历》时，曾参考过《九执历》。天竺的拘摩罗，曾为《大衍历》提供一个推算日蚀的计算方法。由于天竺历法曾吸取希腊历法的理论和方法，张遂通过学习天竺历法，也间接吸取了希腊的历法知识。

天竺国的数学也传入内地，因为瞿昙悉达编的《开元占经》保留了天竺数学的数码和圆弧的画法、弧的正弦等知识，

从而使唐朝数学家学习了天竺的大数记法。此外，佛经里关于度量衡的细微单位（如尘、埃、渺等），也被引入中国数学记数法。

在医学方面，天竺的外科手术、整骨科，以及眼科，对唐朝都产生一定的影响。

至于文学艺术，由于佛经的译述和宣传，唐朝出现一种新文体——变文。变文就是俗称的话本，这是一种夹叙夹唱的文体。由于它是以广大人民作为对象，日益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所以其内容逐渐脱离佛教而更多反映现实生活。

此外，天竺音乐也被唐人吸收，成为国家“十部乐”之一。同时天竺的琵琶七调也传入内地，对我国古代音乐产生一定影响。

在中印、中巴的友谊史上，双方高僧的来往，起了桥梁作用，其中贡献最大的有玄奘和义净等。

义净（635年—713年）姓张，字子明，河北范阳（今河南省怀来、永清、北京市房山东和长城以南地）人。8岁入齐州（山东济南市、历城、章丘等县）土窟寺为僧，勤学好问，孜孜不倦。咸亨二年（671年），他率领弟子善行等，乘波斯商船，由广州出发，从海路西行。这年冬天他到了室利佛逝（苏门答腊）。义净在这里学习梵文和经论，准备到天竺。第二年，他得到室利佛逝王的资助，在六月下旬到了马来半岛南端的末罗瑜国。

咸亨三年（672年）十二月，义净从末罗瑜国西行，10余天后达裸人国（今孟加拉湾的尼哥巴群岛）。第二年二月八日至印度半岛东海岸的耽摩立底国，义净在这里住了1年。上元元年（674年），从这里西行，访问摩揭陀国的著名寺院——那烂

陀寺和莫诃菩提寺。

义净在那烂陀寺住了 10 年，向著名高僧宝师子和智月等人请教。当时除了求法以外，还进行翻译工作，《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颂》和《一百五十赞佛颂》6 卷经，都是在这里翻译的。义净的工作对沟通中印文化，有很大的贡献。

垂拱元年（685 年），义净离开那烂陀寺回国，途中他在室利佛逝期间，写了《南海寄归内法传》和《西域求法高僧传》，记录他在海外各国的见闻和海外高僧事迹。这两本书和《大唐西域记》相似，都是研究古代印度和东南亚历史的宝贵史料，至今仍被各国历史学家所珍视。

在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里，有两章介绍天竺医学知识，提到患者常用少食的方法来治疗，这和现代的医疗原理是相符合的。同时他在书中还提到天竺僧人的卫生习惯，如散步、淋浴、疏牙、活舌、食前洗手等，这些习惯一直被印度僧侣所保持。

西南亚另一友好国家尼泊尔，早在公元 5 世纪，东晋高僧法显就到过那里，他是外国人访问尼泊尔而留有真实记录的第一个人。到了唐朝，双方关系更加密切。住在加德满都谷地的尼瓦尔族，在 8 世纪下半期，便通过印度输入中国纸和造纸技术。现在尼泊尔造纸的原料，还是用瑞香科植物的纤维，和 8 世纪吐蕃人所用的造纸原料是相同的。

贞观十八年（644 年），卫尉丞李义表奉命出使印度，途经加德满都谷地，曾受国王那陵提婆的热烈欢迎和殷勤款待。贞观二十一年（647 年），那陵提婆遣使到达长安，带来菠棱、酢菜、浑提葱等礼品。菠棱就是菠菜，是远在公元 7 世纪中叶从

邻邦尼泊尔输入的。高宗永徽二年(651年),那陵提婆的儿子尼利那连陀罗继位以后,又遣使入唐,赠送土特产品。

洛阳人王玄策,曾三次出使尼泊尔和印度。李义表和王玄策出使后,中国高僧到尼泊尔的人数更多了。

波斯就是今天的伊朗。早在西汉时期,中国的使者就到过安息(即波斯)。唐高宗在位时,大食进攻波斯,唐政府曾发兵声援,波斯暂时失败,其王子俾路斯投奔唐朝,唐政府留他住在长安,并授以官爵。当时两国贸易关系也很密切,波斯港口经常有唐朝商船停泊,同时波斯商船也常到广州。当时我国用丝织品、纸、大黄、黄连等换取波斯的宝石、珊瑚、香料、药品等。长安、扬州、广州、楚州、交州、泉州等地,都有波斯人居住,他们开设“波斯店”,经营各种商业,有一些人长期在唐朝生活。

另一方面,波斯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而且南北两路在此会合,现在伊朗的伊斯法罕,就是唐朝丝绸路上一个重要的转运站。中国的丝绸、工艺品、文物输入波斯以后,再向西方转运。

大食,也称哈利发帝国,是回教教主穆罕默德创建的。在唐朝时期,大食的国势甚强,他们北占中亚、南侵天竺、西据北非,并屡次打败拜占廷。永徽二年(651年),开始与唐通使。唐玄宗时期,又派使者送良马宝钿带等。由于大食的势力已经侵入中亚,昭武诸国受其压迫,当时石国(故地在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塔什干一带)请求唐军支援,派往支援石国的唐将高仙芝反倒掠夺石国。石国王子和大食在怛尼斯(今吉尔吉斯伏龙芝州)联合打败高仙芝,俘虏部分唐军,其中有造纸工人,大食利

用他们在撒马尔罕设立了造纸厂。后来,又在班达(今巴格达)、大马士革等地设立造纸厂。中国的造纸术又从大食传入埃及和欧洲,推动了世界文化的发展。

随着两国商人的往来,大食的药材也输入中国,主要有乳香、没药、血竭、真珠、木香、苏合、香油等。与此同时,大食医生也来内地,其中著名者有李摩珂、李珣等人。

中国医药学对大食的贡献,主要有炼丹术、脉学和药材。欧洲炼丹史家詹生大卫士说:“在公元八九世纪,中国的炼丹术传入大食,12世纪再从大食传入欧洲。”中国的脉学也是唐代传入大食的,10世纪末年被阿维森纳的《医典》采用。他在诊脉方面列出48种脉法,其中有35种是从中国传入的。中国的药材也传到大食,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牛黄和麻沸散。

拜占廷也叫拂菻,又称东罗马。过去中国的丝织品,曾通过波斯传到拜占廷。贞观十七年(643年),拜占廷遣使来唐,送来赤玻璃、石绿、金精等物。唐太宗回信答聘,并回赐缯绮。唐玄宗时期,他们多次派使者到长安,并且赠送狮子和羚羊。同时拜占廷的杂技和医学也传入中国。

总而言之,唐代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文明的国家,它和世界各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是非常广泛而深入的。这种频繁的交流 and 友好往来,大大加强了各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和深厚友谊,促进了各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丰富了各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唐朝对世界文化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玄奘法师西天取经

说起唐代中外文化交流，人们总是首先要想起玄奘法师。他是虔诚的佛教徒，杰出的翻译家，享有世界声誉的旅行家。他西行取经的事迹，在民间广泛传说，变成了神话，后来经明代作家吴承恩写成小说《西游记》。唐僧和弟子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学形象。玄奘实在是我国历史上有多方面声誉的人物。

玄奘俗称陈，名祿，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附近）人，13岁出家做和尚，对佛学钻研很深。他越学越觉得疑难很多，决心到佛教的发源地天竺去学习。

这时唐代开国不久，西突厥强盛，高昌王曲文泰割据自雄，交通阻塞。唐对西部关隘戒备森严，轻易不许人出境。而且路程遥远、情况不明，除马匹以外，别无其他交通工具，困难实在太太。玄奘没有被吓倒，他向政府申请被拒绝，便跟着商人，毅然踏上了西行的征途。

贞观元年（627年）八月，他从长安出发，经凉州（今甘肃武威）、瓜州（今安西），出了玉门关（在安西境内）。安西和新疆之间有片大沙漠，当时叫做莫贺延碛，极其难走。玄奘只带了一匹在这路上走过10多次的老马，就闯进了沙漠。

沙漠中间上不见飞鸟，下不见走兽，阵阵热风，卷起漫天的沙土。沿途常有人马遗骨。有时因为气流变化剧烈，会看到远处景物的幻影，明明望见胡骑成群，走近了却化为乌有，使旅行者疑为鬼怪。

玄奘毫无惧色地走进了沙漠深处。不料在喝水时一失手，一皮囊水完全泼翻在地。他打算折回取水，走了10多里，想到自己所立“不到目的地，决不东归一步”的誓言，便掉转马头、继续西进。走到第五天傍晚，终因连日没有滴水沾喉，昏倒在沙漠中。幸而这地点离绿洲不远，半夜里凉风习习，老马识途，奔向水源，才脱出困境。

他在高昌得曲文泰的资助，制备御寒服装，带了马匹挑夫，行色为之一壮。曲文泰是佛教徒，所以对玄奘很是尊敬。

玄奘在凌山越过葱岭的北隅。凌山又叫拔达岭，就是现在新疆西北别迭里山口，高7000米，终年积雪，上有亘古不化的冰河，有时暴风雪崩，行人碰上了绝难幸免。玄奘一行人走了7天，从人冻死了三四成。

玄奘再向西经过烟波浩渺的大清池（即热海，今伊塞克湖），到碎叶城，受到了西突厥叶护可汗的招待。此后途中的困难就较少了。他在亚洲腹地渡过叶河（今锡尔河）和乌浒水（即妫水，今阿姆河），通过当时中亚南北交通的要道铁门关（今阿富汗巴达克山），穿行吐火罗等国（在今阿富汗境），越大雪山（今兴都库什山），逐渐走出了西突厥的控制范围。

玄奘约于贞观二年（628年）的夏末进入南亚次大陆。他先在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住了很久，以后屡渡恒河，遍访佛教史上的古迹。摩揭陀是他居留最久的地方。摩揭陀是次大陆古国，这时已经衰落，境内最多佛教遗迹。伽耶城（今印度比哈尔邦加雅城）东北的那烂陀寺是佛教的最高学府。贞观五年，他进寺学习。

那烂陀寺僧徒常有万人左右，其中有许多学者，所学包括

佛教和婆罗门教经典、因明(逻辑)、声明(文法)、医药、天文等科。住持戒贤是最著名的佛学家,因年老久不讲学,这时为了玄奘,破例连续讲了15个月。玄奘在这里学了5年,成为第一流的佛教学者。

玄奘为了精益求精,又出门旅行数年,到处寻师访友,学到了不少东西,到贞观十五年(641年)重回那烂陀寺。

当时乌苻王朝的雄主戒日王建都曲女城(今印度北方邦坎诺吉城),玄奘前去见他。戒日王早已听说东北方有个摩诃支那国,国中有位异常英武的秦王,并有颂扬他的秦王破阵乐。玄奘告诉他,摩诃支那就是大唐,秦王就是当今的皇帝,又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情形,细细讲给他听。

戒日王曾为玄奘举行大会,请他讲学,到会的僧俗有六七千人。当时据说没有人敢对玄奘的论点提出异议,玄奘学问的造诣是一个原因,但主要还是靠护法的戒日王的威风。

贞观十七年(643年)的春天,玄奘辞别了戒日王,带了657部经论,走上了回国的道路。

这时西域的形势和玄奘出国时已经大不相同。高昌已被唐所灭,于阗(今新疆和田)也归附了唐朝。玄奘不必向西绕个圈子,只要从葱岭南隅越过大山,就可以到于阗了。他在于阗休息了几个月,一面托人到长安上表,向政府报告前后情况。唐太宗得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表示欢迎。

贞观十九年正月,他回到长安,受到热烈欢迎。这时他已经50岁了。接着,他到洛阳见到太宗,把旅行经过和沿途各地的政教风俗,讲了个大概。太宗对西域情形极感兴趣,听得津津有味,还嘱咐他写一本旅行记。

此后他孜孜不倦地翻译佛经，每日定有功课，非完成不可。他还要写旅行记，为弟子讲经、答疑，工作非常忙碌，经常三更就寝、五更起身。他不怕苦、不怕累，只觉得工作量大、寿命有限，非抓紧不可。这种精神是很值得学习的。

玄奘译经 19 年，共译出 74 部、1335 卷、1300 多万字，直到 69 岁时，实在没有精力了，才停止工作。过了 1 个多月，即高宗永淳元年二月初五日，玄奘死于玉华寺。四月十四日，安葬在终南山下。

玄奘作的旅行记《大唐西域记》是一部极有价值的著作。

四、遣唐使来唐

公元 630 年，日本舒明天皇派出以犬上三田耜为首的第一批遣唐使，他们于舒明 4 年（632 年）循北线（从山东启航，途经朝鲜半岛）返回日本，唐使高表仁随船同行去日本。

孝德天皇于白雉 4 年（653 年）组织遣唐使团，以吉士长丹为大使，吉士驹为副使。使团还有入唐学生、学问僧以及船员、工匠、射手等 121 人，同乘一条船赴唐。同行的还有以高田根磨为大使的 120 人遣唐使团，他们所乘之船在海上遇难，未能到达中国。吉士长丹等于第二年返回日本。继第一批两个使团之后，孝德天皇紧接着于白雉 5 年又任命高向玄理为押使，河边麻吕为大使，药师惠日为副使，组成遣唐使团，分乘两只大船赴唐，使团第二年返回日本。

齐明天皇时派遣过一次遣唐使，齐明 5 年（659 年）出发，坂合部石布、津守吉祥分任大使、副使、分乘两船赴唐，其中一

艘漂流失航遇难，另一艘沿北线到达，两年后返回日本。

天智天皇时期曾三次遣使来唐，但都不是正式的遣唐使团，其目的是为了礼送唐朝使节回国。

日本文武天皇及至孝谦天皇时期，正值唐王朝中宗、睿宗、玄宗极盛之时，日本为了学习、借鉴中国的文化、典章制度，扩大遣唐使团的规模，其组织也更严整有序，一般在押使或执节使下设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等。使团人员包括有知乘船事、造船都匠、译语、主神、医师、阴阳师、画师、史生、射生、船匠、挟抄等等，并有相当数量的留学生、学问僧同行。

文武天皇于大宝元年（701 年）正式组建遣唐使团，任命粟田真人为执节使，天皇举行仪式授其节刀、颁布诏书。又任命了大使、副使、判官等。大宝 2 年使团从日本筑紫出发，循南线（在我国长江入海口附近的苏州、明州登陆）来唐，随行有学问僧道慈等。庆云元年（704 年）执节使返回日本，大使、副使因故数年后才返回日本。道慈在中国求法 17 年，回日后成为日本三论宗第三代祖师，他按照唐长安西明寺的规模，在日本平城京修建了大安寺。

元正天皇于灵龟 2 年（716 年）组建起庞大的遣唐使团，任命多治比县守为押使，颁赐节刀。另任命大使、副使、大小判官、大小录事等，一行有 557 人之众，分乘 4 条大船，于养老元年（717 年）从日本难波出发，沿南线来唐，使节于第二年返回日本。同行的学生吉备真备在长安学习经史达 18 年之久，返日时带去《唐礼》130 卷，《大衍历经》1 卷，还有测影铁尺、铜律管、射甲箭等。他与同行来唐的大和长冈在日本共同删定律令，并使我国僧一行创立的新历于淳仁天皇天平宝字 7 年

(763年)在日本实行。随使团来唐的学问僧玄昉,在唐研习法相宗18年,返日时带走经论5000余卷,他后来成为日本法相宗第四代祖师。

圣武天皇于天平4年(732年)组织了594人的遣唐使团,任命多治比广成为大使,造船4艘,次年从难波出发来唐。天平6年(734年),使团的第一船返回日本,天平8年(736年),第二船到达日本。另外两艘船在中途遇难。随此团来唐的僧人茶睿、普照欲迎接鉴真大师到日本,5次渡海未成,茶睿死于端州(今广东肇庆),普照在中国先后待了21年,天平胜宝5年与鉴真大师乘遣唐使船返回日本。

孝谦天皇于天平胜宝2年(750年)任命藤原清河为大使,大伴古麻吕、吉备真备为副使。天平胜宝4年举行了朝拜仪式,天皇授大使节刀并赐宴饯行,还为其赋诗。使团成员分乘4艘大船从难波出发。大使藤原清河所乘第一船漂流到安南(今越南),历尽艰辛才到达长安,后在唐朝任官。第二船于天平胜宝6年(754年)返回日本,随行的有鉴真大师及24名弟子。第三、四船也分别于天平胜宝5年、6年返回日本。吉备真备曾在唐留学多年,他取楷体汉字偏旁制定了片假名。

淳仁天皇时期,曾于天平宝字3年(759年)派遣判官、录事等99人乘船来唐迎接藤原清河返日。天平宝字5年、6年(761年、762年)又曾两度任命遣唐大使,但均未成行。

日本光仁天皇至仁明天皇时期,正是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的后期,日本仍组织大规模的遣唐使团,不过随行来唐的留学生、学问僧在唐的时间大大缩短了,一般为1至2年。

光仁天皇于宝龟6年(775年)任命佐伯今毛人为大使,

同时建造大船 4 艘。第二年，遣唐使团出发，因未赶上信风，中途而返。宝龟 8 年，天皇以节刀授副使小野石根，授权其行大使事。使团乘船沿南线至扬州。第二年启航回国，在途中，第一船遇难，小野石根及唐使赵宝英等 63 人溺死。这一年，光仁天皇为送唐使孙兴进回国，任命了送唐客使，宝龟十年从难波出发，2 年后返日。

桓武天皇于延历 20 年（801 年）任命藤原葛野麻吕为大使，并为其赋诗预祝平安，赏赐御被、御衣及黄金 200 两。由于风暴，遣唐使团的 4 艘大船耽搁至延历 23 年（804 年）才从筑紫启航。大使藤原葛野麻吕所乘第一船到达福州，副使石川道益的第二船到达明州。第三、四船遇到风暴，漂流失航，不知去向。延历 24 年（805 年），遣唐使团的第一、二船自明州出发返回日本。随使团来唐的学问僧最澄，雇用经生数十人抄写经论，他带回日本 460 卷经书及大量佛画、佛具。最澄死后被日本天皇追谥为传教大师，他的弟子义真成为日本天台宗第一代座主。随使团来唐的还有学问僧空海，他在长安青龙寺学习密教，返日时带走大量经卷、佛像等，在日本创立真宫宗。他还仿照草体汉字创造了平假名。

仁明天皇承和元年（834 年）任命藤原常嗣为大使、小野篁为副使，组建了 651 人的遣唐使团。天皇赐宴，并赏赐衣绢、黄金等物，又亲临神社为使团祈祷平安。由于风暴，承和 3 年、4 年两次启航均未成行，第三船还被风暴摧毁，直到承和 5 年（838 年）其余的 3 艘船才出发来唐。第二年，遣唐使团原乘第一、四船的人员，因船有损破，于是在楚州分乘新罗船 9 只返回日本。第二船在返回途中遇到风暴，漂流到南海，幸存者几

经艰难于承和 7 年返回日本。随此团来唐的有学问僧圆仁，他在中国求法 9 年，先后在扬州、五台山、长安等地研习天台法华显教和真宫密教，后携佛经论、章记 794 卷以及法门道具返日，著有《入唐求法巡礼记》。

宇多天皇于宽平 6 年（894 年）组织了最后一次遣唐使团，任命菅原道真为大使，后因得知唐朝国内动乱而未成行。

日本前后共派遣遣唐使 19 次，但其中有的未成行，有的是为了迎送唐使，实际上以遣唐使名义出使唐朝并成行的只有 13 次。日本派遣唐使来唐意在观摩汲取中国的典章制度、科技文化。日本天皇亲自任命押使、大使、副使，举行隆重的送行仪式。遣唐使到达长安，一般将受到唐王朝的优礼，大唐天子将在延英殿或麟德殿召见他们，设宴款待并颁赐赏品，有的还被授予唐朝的官职。遣唐使一般逗留数月即回国，随行的留学生、学问僧则一般要停留相当长的时间，少则一二年，多则二三十年。遣唐使回到日本，将举行上还节刀的仪式，天皇对其论功行赏，不少遣唐使回国后位列公卿，如吉备真备、粟田真人、多治比县守、多治比广成、藤原葛麻吕等。他们参与国政，使唐朝的文化制度在日本得到传播推广。

五、鉴真东渡

754 年农历正月，唐代律宗大师鉴真（688—763）和他的弟子思托、法进、昙静、义静、法载一行搭乘第 11 次遣唐使船到达日本，实现了他多年来赴日传戒的心愿。鉴真东渡，前后费时十二载。742 年日僧荣睿、普照到扬州大明寺，恳请鉴真

到日本传律授戒,以巩固日本的佛教,鉴真随即应允。自此以后,经过五次航海,荣睿、普归和思托等人随同鉴真出生入死,鉴真因此双目失明,最后才在 754 年第六次东渡时得达目的地。

鉴真经第 11 次遣唐副使吉备真备迎往奈良后,受到孝谦女皇赋予授戒传律的大权。754 年,在东大寺修筑戒坛,鉴真亲自为太上皇、皇太后、皇太子授菩萨戒,并为沙弥澄修等 440 多人授戒。755 年东大寺戒坛院落成。之后又在东大寺内兴建唐禅院,按照唐代建筑式样修造,由鉴真主持僧侣的修道。鉴真赴日,改变了有僧无法,盛行自度、私度的日本佛教现状,从此日本僧尼必须经过大寺戒坛院和它所属下寺受戒,方能取得度牒,具有正式资格,享受豁免课役的特权。鉴真被尊为大和尚。在淳仁天皇(758—764)继位后,鉴真的权力虽然小了,但他仍继续传扬戒律,在 759 年建成了“唐招提寺”,称为唐招提寺,从东大寺移居这里,从此唐招提寺发展成日本律宗的总本寺。

淳仁天皇时代,东大戒坛院和下野药师寺、筑紫观音寺,成为日本的三大戒坛。鉴真弟子法进更著有《东大寺授戒方轨》等律宗经疏规则,鉴真和他的门徒传授戒律,使日本律仪逐渐严整,世代相传,遍及全国。鉴真在东大寺校过一切经,在唐招提寺不但讲解四分律,而且还有天台宗的章疏,如《摩诃止观》、《法华玄义》等,使天台宗在日本初播种苗。

鉴真和他东渡的弟子也是建筑、美术的能手,并精通药理。唐招提寺按唐式建筑,金堂单层七间四面,内部用金柱一周,单檐四注顶,正面一间开放,下置石坛,式样为其他时代所

无。寺内佛像、彩画具庄严、厚重、瑰丽的风格，在佛像雕塑上用干漆夹纆法，自成一派，后世称为唐招提寺派。金堂主像丈六金色卢舍那佛坐像，用竹笼作成，外包布涂漆，达 13 层，是思托、义静、昙静合作的杰作。左胁侍药师像、右胁侍千手观音像，成于如宝、法力之手。鉴真由唐带来的不空绢索像特安置在绢索堂，另一由鉴真带来的赤旃檀文殊像安置在文殊堂中。卢舍那佛像被日本推许为天平时代末期最伟大最巧妙的雕像，殆非过誉。

鉴真善辨药物，双目失明的鉴真曾将淳仁天皇命令鉴别真伪的药物，一一以鼻别之，全无错失。鉴真所进药物治好了光明皇太后的病。这两件事传遍了日本。鉴真一生为人治病，日本曾传有《鉴上人秘方》。

鉴真带到日本的王右军行书、丝绣佛画，对日本书法、刺绣也起了推动作用。

六、阿倍仲麻吕

阿倍仲麻吕，于公元 689 年生于日本本州大和。他父亲名叫阿倍船守，在日本中央政府担任中务大辅（相当五品官）。阿倍仲麻吕“性聪敏，好读书”，他的少年时代是在本国度过的。早在他诞生前 50 多年，日本便开始进行“大化革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全面摹仿唐朝。当时设立了大学寮，教授《春秋》、《尚书》、《礼记》等典籍。大学寮定员 400 人，招收正五品以上子弟入学。根据阿倍仲麻吕的家世，他本来应当在国入大学寮学习，但因为他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基础，因此被选拔

入唐朝留学。

开元五年十月，阿倍仲麻吕随日本遣唐使到达长安。与阿倍同时入唐的，还有著名学者吉备真备等人。

阿倍到长安后，唐政府分配他到太学学习，这里的学生都是五品以上官员子弟。太学的教师主要是各种经典的博士，是全国的知名学者。太学的课程有《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等必修课，另外还有《孝经》、《说文》和时务策等。由于唐朝科举考试要考诗赋，太学中也学作诗赋。太学的修业时间是9年，在9年期间，学生至少要精通2种以上经典，经考试合格以后，由太学推荐，参加礼部举办的科举考试。

阿倍仲麻吕在著名专家指导之下，经过9年的勤奋学习，他不仅精通几种经典，而且善作诗赋。这期间由于热爱中国，他改姓名叫“朝衡”（或晁衡）。

大约在开元十六年（728年），他担任了左右春坊司经局的校书郎（从九品），专门校理图书。从这时候开始，阿倍仲麻吕便正式参加了唐朝政府工作，长达40年之久。

早在太学学习时期，他便结识了储光羲。储光羲是唐代山水田园诗人，阿倍仲麻吕经常和他一起唱和，感情十分融洽。日本第十次派遣唐使到达长安时，储光羲风闻阿倍仲麻吕准备回国，特为他写了《洛中贻朝校书衡》一诗，表达对朝衡惜别之情。但是这一年他并未能成行。

开元十七年（729年）阿倍仲麻吕转任“补阙”（从七品），属于门下省。“补阙”是皇帝侍从，对皇帝和中央政府工作中的问题，有权提出批评和建议。地位虽不甚高，但接触中央高级

官员的机会较多,所以职务相当重要,是中央政府内的清贵官职。在这一时期,阿倍仲麻吕结识了赵骅、魏万等人。魏万号称“王屋山人”,是唐朝进士,和阿倍仲麻吕的关系非常密切,他有一件衣服就是用仲麻吕送的日本衣料做的。魏万很喜欢这件衣服,经常穿着。

4年以后,阿倍仲麻吕离开门下省,担任仪王“友”。这个仪王就是唐玄宗第十一子李璿。“友”是一种官职,据《唐六典》记载,亲王府设置“友”一名,从五品下。“友”的职务是陪伴亲王,和亲王共同学习、游乐,并以封建道德教育亲王。从此阿倍仲麻吕可以在贵族和高级官员中活动,是唐政府信任的官员。

正在这个时候,大诗人李白应唐玄宗的邀请来到长安,担任“翰林供奉”,是皇帝文学词章顾问侍从。李白在长安居住的2年多时间里,除结识了贺知章等人以外,还结识了阿倍仲麻吕。两人经常在一起痛饮酣歌,高谈阔论。正因为他和李白结有深厚的情谊,天宝年间,传说阿倍仲麻吕归国途中在海上遇难,李白听到这个噩耗极为伤感,以十分悲痛的心情,写诗悼念他的挚友:“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李白以明月殉海喻人之遭劫难,足见诗人对晁衡的高度赞美。至今在日本史籍中仍然记载着这首诗。

阿倍仲麻吕在海上遇救,天宝十二年(753年)从交趾辗转回到长安,任秘书监(国家图书馆馆长),从三品。这一时期,他除了和魏万、赵骅交游以外,又和诗人王维、包佶等人结成亲密朋友。阿倍仲麻吕回国时,王维送他到海边,写了《送秘书

晁监还日本》的五言诗，抒发惜别之情。

“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乡村扶桑外，主人孤舟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

从这首诗可以看出王维与晁衡的深厚友谊，在“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的诗句里，王维心随神往地写出对阿倍仲麻吕东渡的艰险具有安危与共和患难相关的至诚情感。

阿倍仲麻吕在担任唐政府官职以及和中国文人交游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中日两国友谊的桥梁。他虽然是唐朝官员，实际执行日本大使的任务。每当日本遣唐使到达长安，他都主动协助使团，与唐政府接洽有关事务。例如：天宝十二年，日本第十一次遣唐使到达长安以后，阿倍仲麻吕即引领日本使团拜见唐玄宗。会见以后，唐玄宗令阿倍仲麻吕介绍使团参观唐中央政府的府库和三教殿等。由于阿倍仲麻吕的疏通，唐玄宗授与日本大使藤原清河以“特进”（正二品散官），授副使大伴古麻吕以银青光禄大夫卫尉卿（从三品），从而加深了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

大历五年（770年），阿倍仲麻吕在中国与世长辞，终年72岁。

七、畅通无阻的唐代“丝绸之路”

从太宗晚年到高宗初年，唐朝解决了西突厥问题，丝绸之路畅通了。从长安安远门（西门）往西，穿过河西走廊和新疆，直抵中亚和西亚的路线，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大道，也是商旅贸易的通路。

在唐朝极盛时期，我国几千年积累下来的由千百万人民艰辛劳动缔造的文明，在世界上居于先进地位，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国家富强、文化昌明，略可与唐朝匹敌的，只有阿拉伯人在亚洲西部建立的大食，波斯的萨珊王朝（226—642年）亦被其所灭。印度的乌荼王朝，在玄奘访问后不久便衰落了。极目西方，东南欧的拜占廷是古代罗马帝国残留的部分，声教文明还比较可观；至于崛起于西欧的法兰克王国（建立于公元486年），经济文化都很落后，与东方相比差得很远。

当时中亚、西亚的商人、僧侣、贵族，纷纷经由丝绸之路来到中原。他们的服饰、饮食、游艺、学术，都为唐朝人所喜爱。

许多从西域来的音乐家做了唐朝的乐府伶工。龟兹是我国领土，但龟兹乐则源出印度，又深受西域影响。它在中原极为流行，琵琶横笛的名师，都出于这个流派。

波斯（即现在的伊朗）和中国文化关系很密切。

波斯的名酒三勒浆，由波斯商人在长安和扬州两地酿造发售。菠菜在唐代从波斯引进。从唐朝起，波斯送狮子给中国。“狮”字也来自波斯语。唐朝人爱打马球，马球也是从波斯引进的。章怀太子李贤墓的壁画，就有打马球的图。

中国的丝绸在中亚、西亚是极贵重的商品。在丝绸之路上出土的丝织物,采用了中亚、西亚流行的纹样,如联珠对鸟对狮“同”字纹绵,正是波斯萨珊王朝的图案。从天宝十年(751年)到宝应初年(元年为762年)到过太食都城亚俱罗(即苦法,今伊拉克 Meshrd—Ali)的杜环的记载,那边不但有中国丝织品,而且还有中国织工用中国工具在工作。

怛罗斯之战在东西交通史中常常被人提起,因为被俘的唐兵中有会造纸的,他们在撒马尔罕替大食人造纸。于是中国的造纸术经阿拉伯人的媒介西传欧洲,在世界文化上产生很大的影响。

纸在国外也是极受人们艳羡欢迎的物品。玄宗时在苏门答腊岛的唐僧义净,为了抄写佛经,千里迢迢地托商人带信到广州讨取纸墨。

印度的音乐、美术和医学,也传入中国。唐朝的雕塑壁画,都受到印度的影响,有些印度眼科医生的本领,很受唐朝士大夫的称赞。印度精制蔗糖的方法,在贞观末年,从摩揭陀传入中国。用蔗汁制糖的方法,中国早已有了,这次可能是吸取印度人民的经验,改进了生产技术。

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交往情况是非常丰富的。近年西安何家村出土的窖藏文物,也提供了许多材料。金银器的造型、花纹和工艺,有萨珊王朝金银器的影响。货币不仅有萨珊王朝的银币,还有拜占廷的金币。器物中的水晶杯、玻璃碗、镶金玛瑙牛首杯、药物中的珊毛瑚、琥珀等等,显然是波斯、大食的商人运入中国的。这是一个事例。在丝绸之路沿线和从长安往东的各地,萨珊王朝银币的发现,为数不少。又如唐代诗人杜

甫的《大食宝刀歌》，盛赞阿拉伯劳动人民高超的造刀技术，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佳话。

波斯人传来的还有祆教和摩尼教，其中摩尼教后来还被农民起义所利用。

第四章

唐朝的衰落与灭亡

第一节 安史之乱

一、天宝末年的社会危机

均田制和府兵制的衰败

府兵制在贞观时发展到鼎盛,而后即走向衰落。高宗时,府兵已不能按期番上,番上者逃跑的现象也日益严重,但尚能维持局面。到唐玄宗天宝八年(749)时,折冲府已无兵可交,朝廷只好停止上下鱼符,府兵制已名存实亡。唐朝廷不得不改弦更张,另找出路。

府兵制衰败的主要原因是,府兵制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均田制一旦遭到破坏,府兵制就成了无皮之毛。中晚唐时,官僚地主兼并土地之风不可遏制,府兵得不到应有的土

地,家庭生活无法保障,当然也就不能自备资粮和武器到军中服役。另外,均田令规定的给予士兵的优待也逐渐变得有名无实。如均田令规定,战士授勋者可以多得数倍的土地。一个普通卫士按规定只授田一顷,一旦为上骑都尉,就可得勋田六顷(《唐六典》卷3《户部尚书》)。没有官田的卫士,想在一顷之外多占土地,就只有立功获取官品和勋阶。这对吸引地主及一般农民当兵有一定的作用,这是唐初府兵兵源充足的一个根本性原因。但在高宗咸亨之后,授勋过滥,“战士授勋者,动盈万数”,而全国的土地有限,加之被权贵肆意兼并,以致卫士授勋者不能按规定授田,规定变成了一纸空文。

其次,从府兵制本身看,它虽有兵民结合、可防将帅擅权等优点,但也有自身的弊端。如番上过于繁扰,人力、物力都造成很大的浪费;士兵经济负担过重,富户率先规避,广大贫苦农民不得不以逃亡等方式反抗,造成番上和回归都不能按时,番番恶性循环,多有“壮龄应募,华首未归”者,这就更令人把当兵视为畏途;军队编组复杂,军府分散,致使将不知兵、指挥不灵、反应迟钝等。

再次,府兵社会地位降低,有的实际上成了达官贵人家的奴仆,人以做卫士为耻,有的甚至自残身体以避其役。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府兵制不可避免地逐渐衰败下去。

唐玄宗对外发动不义战争

玄宗后期,为了提高统治的声威,发动了一些不义战争。边将权奸为了升官加爵,也不惜推波助澜,挑起冲突。这些战争杀伤大量的各族人口,严重地增加了农民的兵役负担,消耗

了社会财富,带来了许多灾害。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唐政府迫使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在青海西袭击吐蕃,是这一系列战争的开端。崔希逸曾与吐蕃将领乞力徐相约,撤除守备,让汉藏两族人民随便耕种放牧,安享和平之福。这年,有个河西的官员入朝奏事,鼓动玄宗发兵袭击。玄宗派人去视察,使者诈称有诏,逼崔希逸出兵。这一仗打破了唐蕃和好的局面,引起许多冲突。

天宝初年,名将王承嗣兼任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节度使,威望极高。玄宗使他攻吐蕃石堡城(在今青海西宁西南),他不肯,说:“石堡城险固,不牺牲大量士兵的性命,拿不下来。”他不肯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结果是丢了官。继任的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攻下石堡城,城中守兵只有几百人,唐兵却损失了数万之众。

唐蕃失和,其咎多在吐蕃贵族,然而这次的责任明显属于唐朝。冲突频繁的第一个结果,便是加重兵役劳役。杜甫《兵车行》说“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防河营田,都是为了对付吐蕃。于是“汉家山东二百州”,到处都由妇女把着锄犁;而青海湖畔,“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汉藏两族人民都为不义战争流了大量的鲜血。

西南也在流血。南诏王阁罗凤带着妻子参见唐官,边将张虔陀乘机侮辱,并勒索财物。阁罗凤愤恨起兵,杀死张虔陀。这是正义的反抗,而且是局部问题,不难解决。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却立即发兵进攻,阁罗凤派人解释,要求停战,仲通不听。阁罗凤没法,击破唐军,与吐蕃结成联盟。他本不愿与唐为敌,立了一块碑,说明发生战争的原因,希望到将来重归于好的时

候，指给唐朝使者看，让唐政府明了真相。

鲜于仲通与杨国忠素有勾结，因此杨国忠为他掩饰，并在两京、河南北征发军队，大举进攻南诏。唐军连战连败，从天宝十年到十三年（751—754年），战死和不服水土患流行病死的，前后有20多万人。这时的征发，根本不照任何制度，人民不肯当兵，杨国忠便派官抓人，连枷送到军队里去。白居易《新丰折臂翁》说“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写的就是这个情形。当时“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这个老翁“偷将大石锤折臂”，才得免为云南“望乡之鬼”。

天宝十年，唐军还有两次大败，都是将领求得“高勋”而造成的灾难。一是安禄山领兵6万攻契丹，所部死伤大半。安禄山屡次引诱奚、契丹部落宴会，用毒酒灌醉后进行屠杀，拿酋长首级报功，算是平定叛乱得胜。这次想立“大功”，反得大败。

一是高仙芝恒罗斯城之败。高仙芝先在上一年背信袭击石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抢了巨额金宝，又把国王送到长安杀死。中亚各国本来都依附唐朝，受了这番刺激，都十分愤慨。石国王子向大食求救。高仙芝听见大食兵动，便引兵3万人进攻，在恒罗斯城（今江布尔）大败，逃回的只有几千人。

这些不义战争大大加深了阶级矛盾，不仅受到当时各族人民的反对，就是在我国古代的史籍上，也是为正直的史家们所谴责的。

李林甫专权

爬上相位

姚崇、宋璟罢相后，张嘉贞、张说、李元绹、杜暹等相继为相。这些人虽不及姚、宋，但也各有所长，都能直言谏诤、补救缺政。吏部侍郎李林甫早就觊觎相位。李林甫原是唐廷宗室。他表面上柔和谦恭，内里却奸刁狡诈，阴险毒辣。他为了要做宰相，广泛结交妃嫔宦官，探听玄宗的动静，所以每次奏对，都能迎合玄宗的心思，很讨玄宗的欢喜。

李林甫知道玄宗的宠妃武惠妃想为自己的亲生儿子寿王李瑁谋夺太子的地位，就向高力士表示自己愿意出力。高力士告诉了武惠妃，武惠妃十分感激，就经常在玄宗面前替李林甫说好话。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三月，侍中裴光庭逝世，相位出缺，李林甫加紧了谋取相位的活动，哪知玄宗已与中书令肖嵩商量好了，决定任命右丞韩休为相。高力士把这消息透露给李林甫，李林甫很失望，但他马上强抑住内心的不满，高高兴兴地去拜访韩休，满脸笑容地向韩休道贺。过了几天，玄宗果然宣布韩休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韩休虽然为人峭直，也不由对李林甫十分领情。

韩休是肖嵩荐举的。肖嵩原来认为韩休恬静温和，容易听话，哪知韩休做了宰相，办事认真，刚正不阿，遇事不肯苟且，常常在朝会上，与肖嵩，甚至与玄宗争辩，肖嵩见他如此，逐渐讨厌他了。玄宗对韩休的认真作风，甚是敬畏，或在宫中宴乐，

或于后苑游猎。小有过失，便问左右：“韩休知道吗？”话刚说完，韩休的谏疏已送来了。李林甫知道后，便买通太监在玄宗前进谗，要玄宗罢免韩休，以便自己取而代之。

这年十月，玄宗因肖嵩和韩休经常争论不休，失了和气，罢免了二人的相职，改任裴耀卿为黄门侍郎，张九龄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玄宗还想召李林甫入相，征询张九龄的意见。张九龄说：“宰相关系着国家的安危，陛下若拜李林甫为相，臣恐他日必为社稷之忧。”玄宗却认为李林甫柔顺、奏对称旨，耳朵里又早灌满了武惠妃等夸奖李林甫的言语，执意起用李林甫，先擢升他为黄门侍郎。

开元二十年（公元734年）五月，玄宗任命裴耀卿为侍中，张九龄为中书令，李林甫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李林甫终于爬上了相位。

排挤裴张

李林甫探悉张九龄曾向玄宗谏阻他入相，心里非常嫉恨。侍中裴耀卿与张九龄关系极好，李林甫也就很恨他。但张九龄正为玄宗所倚重，心里虽恨，面上却很恭敬。

严挺之有个离婚的妻子，嫁给蔚州（今山西灵丘）刺史王元琰。王元琰因贪赃被捕，关押在京城监狱里，严挺之替他托情营救。李林甫觉得这是一个报复严挺之的机会，便把这事报告了玄宗。

第二天，玄宗召宰相们问道：“王元琰贪赃，严挺之为罪人请托，一定是出于私情。”张九龄说：“王妻是严挺之离婚的妻子，不应该有情。”玄宗笑笑说：“你不知道，虽然离了，但仍有

私情。”于是，玄宗联系以前所听到的李林甫一系列谗言，认为张九龄和裴耀卿等是朋党，罢了两人的相位，贬严挺之为洺州（今河北永年东南）刺史，王元琰流配岭南。任命李林甫兼中书令，牛仙客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仍为朔方节度使。

自从张九龄得罪李林甫被罢相以后，满朝文武，只想保持自己的禄位，都不敢讲真话。李林甫堵塞言路，不让玄宗知道真实情况，以便大权独揽。

李林甫做了宰相，凡才能、声望、功劳超过他的，或者被玄宗器重，有可能入相的，他也必定要千方百计排挤。

制造冤狱

兵部尚书李适之、兵部侍郎驸马张珣，不愿巴结李林甫，有时还要跟他争个长短。李林甫把二人当作仇敌，唆使亲信告发兵部选举武官时有不法行为，逮捕了兵部官吏 60 余人，交京兆尹和御史台审问。审讯了几天，没有一点结果。李林甫想找一个得力的人来审问此案，京兆尹肖灵便向他推荐了法曹吉温，李林甫大喜。

吉温是著名的酷吏，他接受了此案，布置一番，先开审另一个案件的两名重犯。吉温并不多问，只是一个劲地下令用严刑拷打，打得两个犯人杀猪似地惨叫，疾呼哀号：“只求活命，情愿全部招供。”押在厅外的 60 余名兵部官吏，听到一声接着一声的惨不忍闻的叫声，早吓得魂灵出窍、手脚酥软，他们早听说吉温的残酷，等到把他们带到堂上，不待用刑，一个一个都按照吉温的意思，自我诬供、表示认罪。

李适之明知这是一个冤狱，但检查 60 余名被捕的兵部官

吏，身上却没有一点伤痕，晓得李林甫手段高明，不免胆寒，从此以后，再也不敢与李林甫争长短了。

陕郡太守、江淮租庸转运使韦坚，是李林甫的母舅的儿子，又是太子妃的哥哥。李林甫本来与韦坚很亲密，称兄道弟，过从甚密。但当韦坚办漕运受到玄宗的器重，有可能做宰相时，李林甫又开始忌妒他了。

天宝四年（公元745年）九月，韦坚被调任刑部尚书，他的转运使职务由李林甫的亲信御史中丞杨慎矜接替。韦坚被明升暗降，夺走了经济大权后，想到李林甫对他这个表兄弟也要暗算，又气又恨，就经常跑到李适之家里去发牢骚。李林甫知道后，恨得心痒难熬，但在公开场合反而对李适之变得客气热情起来。

一天，李林甫装得十分知心的样子，对李适之说：“华山有金矿，开采后可以富国，主上还不知道呢！”李适之生来粗心，也没有仔细考虑，宰相奏事时，就建议玄宗开采华山金矿。玄宗转身问李林甫，李林甫回答说：“臣早已知道华山有金矿，但华山王气所在，不可开凿，所以没有敢提。”玄宗以为李林甫真的爱护自己，责怪李适之奏事没有深思熟虑，叫他以后要与李林甫多商议，不要太轻率。李适之被弄得目瞪口呆，手足无措，心里连说：“上当！上当！”

李适之失宠、韦坚失权，两人更加亲密，李林甫也更加仇恨两人。

暗算太子

太子李亨之立，本来不是李林甫所希望的。他怕将来太子

登位对自己不利，常想改立太子。韦坚是太子妃的哥哥；还有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是太子的老朋友，当时因击败吐蕃而入朝献捷，他看到李林甫专权，很是气愤，趁朝见玄宗的机会，秘密地劝玄宗免去李林甫的相位。

当皇甫惟明拜辞玄宗回到官邸时，就有李林甫安置在玄宗左右的太监来到李府，把皇甫惟明的话告诉了李林甫。李林甫指使杨慎矜暗中监视韦坚、皇甫惟明等人的行动。

天宝五年（公元746年）正月十五日晚上，太子李亨出宫游赏灯会，途中碰着韦坚，郎舅相遇，免不了寒暄一番。这情形被躲在阴影里的杨慎矜看见了。

韦坚辞别太子后，一路游玩，来到崇仁坊的景龙道观。却好皇甫惟明也在观里游玩，两人便在道室品茶闲谈。这情形又被跟踪在后的杨慎矜看见。

第二天，杨慎矜根据李林甫的意思，写奏本告发此事，说韦坚是太子的至戚，不该与边将游乐欢昵。李林甫还嫌杨慎矜说得不够重，干脆说韦坚与皇甫惟明结党，阴谋共立太子。

玄宗一听自己还没有死，就有人要立新皇帝，也不辨真伪，下令把韦坚、皇甫惟明逮捕入狱。李林甫派杨慎矜与御史中丞王钁、吉温共审此案。酷吏们雷厉风行，按李林甫的意思，胡乱定了案，奏报玄宗。这时玄宗稍为冷静了些，不愿株连太子，下诏指责韦坚官瘾太重，贬为缙云（今浙江缙云）太守；皇甫惟明离间君臣，贬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太守；另外又下一道圣旨，告诫百官，今后不要随便议论朝政。

李适之看到韦坚等被贬，心里害怕了，自请免职，被罢为太子少保。他的儿子卫尉少卿李霁备了盛宴请客，客人们因惧

怕李林甫，竟没有一个人敢去赴宴。

天宝五年七月，将作少匠韦兰、兵部员外郎韦芝为其兄韦坚辩冤，并且请太子帮助讲话。玄宗大怒，再贬韦坚为江夏别驾，韦兰、韦芝均被贬往岭南。太子害怕了，上表请与韦妃离婚，玄宗没有同意。李林甫又说韦坚与李适之等为朋党，过了几天，流放韦坚于临封（今广东封川），李适之贬宜春（今江西宜春）太守，太常少卿韦斌贬巴陵（今湖南岳阳）太守，嗣薛王李琚贬夷陵（今湖北宜昌）别驾，睢阳太守裴宽贬安陆（今湖北安陆）别驾，邕郡太守王琚贬江华（今湖南江华西北）司马。韦坚亲党被流放、贬官者共有数十人。

天宝六年（747年）正月，李林甫再奏玄宗，分遣御史出京赐皇甫惟明、韦坚兄弟等人死。罗希夷从青州到岭南，一路上屠杀迁官谪吏，肃杀恐怖的气氛弥漫天下。

李杨反目

天宝六年十二月，玄宗命百官把各地交来的贡品都送到尚书省，既而又命都赐给李林甫。

在李林甫以前，宰相都注重自己的品德，进进出出，随从不过几人，不摆威风，士民路上碰见，也用不着回避。李林甫深知自己结怨甚多，常常担心别人行刺，出门则有步骑百余人为左右翼，经过的地方都要戒严，公卿都要避道。居住的地方则是重关复壁，用大石块铺地，墙壁里也要夹一层木板，如防大敌，睡觉一夜要换几个地方，就是家里人也不知他睡在哪里。

天宝九年（公元750年）四月，杨国忠已官至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恩遇渐深、权势日重。原来靠李林甫提拔起来的吉

温,转而投靠了杨国忠。杨国忠想取代李林甫做宰相,吉温就给他出谋划策,要他先除去李林甫的心腹。杨国忠依计行事,搜集了李林甫心腹肖灵和御史大夫宋浑的罪状,秘密奏告玄宗,把肖、宋逐出京城。等到李林甫知道此事,要想挽救也来不及了。从此,李、杨反目成仇。

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五月,杨国忠又告发李林甫的亲信党羽王铁和弟弟户部侍郎王铎谋逆,玄宗赐王铁自尽,王铎杖死朝堂,由杨国忠接替王铁为京兆尹加御史大夫、京畿、关内采访等使。杨国忠又说李林甫与王铁兄弟关系密切,曾为王铁罪行辩护。于是玄宗开始疏远李林甫。

李林甫自从被玄宗疏远后,一直担惊受怕,郁郁不乐,终于忧闷成病。他想见一面玄宗,玄宗答应了,李林甫由人搀扶着到华清宫中,玄宗登上降圣阁遥望,挥着红巾向他打招呼。李林甫看见了,可是腰板僵硬,跪不下去,只好叫人代拜谢恩。

玄宗知道李林甫活不长了,速遣太监去追杨国忠回京。杨国忠接到诏书,马不停蹄,星夜回京。他回到长安,立刻去拜见李林甫。李林甫流着眼泪说:“林甫就要死了!我死之后,公必为相,往后的事就拜托你了!”杨国忠连称:“不敢当。”

十一月二十四日,就在杨国忠拜访后的几天,这个做了19年宰相,口蜜腹剑、阴险狡猾、心狠手辣的李林甫,双脚一伸,终于死了。他死后不久,棺槨被斫、官爵被削、财产没收、子孙流配。李林甫一生害人,死后还害子孙,只留下个千古骂名。

杨贵妃专宠

736年，正是李林甫开始专权的那年，玄宗所宠爱的武惠妃死去，玄宗为此郁郁寡欢，后宫的美女充盈，却无一当意者。这时，闻说寿王妃杨玉环体态丰艳，绝世无双，即令太监将其接来侍酒。寿王妃性聪颖、晓音律、长歌舞，尤善逢迎。玄宗以自己谱写的《霓裳羽衣曲》示妃。妃略看则已通晓，且歌且舞，有如仙女临凡，无与伦比。玄宗如获瑰宝，愁怀顿开，遂借酒寻欢，无所顾忌。从此，开始了他们的浪漫史。

寿王李瑁，是玄宗的儿子，武惠妃的亲生子。56岁的皇帝同22岁的儿媳的这种私衷，显然悖于伦理，是一大丑闻。玄宗遂让寿王妃自请为女官，入居南宫，赐号太真，南宫改名为太真宫。玄宗夺了儿媳，又给儿子娶了个韦姓的姑娘作妃子，以示慰藉。

杨太真入得宫来，恩宠与日俱增，不到一岁，仪体已比之于皇后。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曾生动地描写了她初时得到的宠遇：

“承欢侍宴无闲暇，
春从春游夜专夜。
后宫佳丽三千人，
三千宠爱在一身。

这一对老翁少妇，春夜漫漫，仍苦其短；日上三竿，犹恋床第。这个曾在兴庆宫中盖起了勤政楼借以自勉的风流皇帝，从

此再也不去上早朝了。有了这一背景，就不难理解何以玄宗愿委政于奸相，竟连心腹的忠告也听不进去了。

六年后，杨太真被册封为贵妃。贵妃在宫中的地位仅次于皇后。可这时并没有皇后，她就是实际上的皇后了。玄宗视贵妃为心肝。她的家族都得到了封赏，宠爱得无以复加了。

有年深秋，大明宫中太液池的千叶白莲，居然有数枝在肃杀的秋景中异时独放，洁白晶莹、宛若玉成。京师中一时传为奇闻。玄宗携贵妃也来临池观赏。左右称誉白莲的娇美，赞赏不已。玄宗爱这白莲，更爱贵妃，遂指贵妃说：“莲花虽美，有形无神，又怎比得上吾这解语之花啊！”“解语花”遂成为后世赞美佳丽的成语了。

贵妃生长在南国，喜食鲜荔枝。荔枝易坏，离枝四五日则色味俱变。为快速贡奉新鲜荔枝，特开辟了从岭南（一说川南）通往长安的数千里贡道，沿途设有驿站，备有快马，荔枝运到长安而色味不变。

君王宠幸，朝臣官吏也无不倍加逢迎，争献奇珍异味、器物珍玩。岭南军政长官的贡献得到贵妃的欢心，遂连升三级。广陵的长官起而仿效，也被擢拔为朝廷大臣。由是，文臣武将瞩目后宫，全国风靡。

皇帝每临幸骊山华清宫，贵妃的三位姐姐与三个哥哥也必车骑从幸。大姐封韩国夫人，二姐封虢国夫人，三姐封秦国夫人。从兄杨钊被封为位当四品的朝中高官；杨锜娶了公主，封为驸马；杨国忠后官至宰相，领 40 余职，权倾天下。杨家兄弟姐妹的车骑，每家一队、各衣一色，逶迤数十里，到了骊山，诸家合欢，往来穿梭，犹如万花竞放、遍山锦绣。

从开元二十四年(736),到天宝年间,奸相专权、贵妃专宠,玄宗日益昏聩,政治愈加腐败,繁荣背后的危机也就加剧了。

天宝末年间镇尾大不掉局面的形成

唐初沿北周及隋旧制,于沿边及重要地区的州治设置总管府,以州刺史兼任,总揽周围数州军事。武德七年(624年)改称都督府。贞观中,有征伐行军则置大总管。督统所征道的军事,戍守本州则仍称都督。节度使本为都督带使持节之意,睿宗景云中,以薛讷为幽州镇守经略大使,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始有正式的经略使及节度使称号。节度使有一定辖区。并“得以军事专杀,行则建节,府树六纛”,成为常设的地方军事长官。开元中,唐边烽日警。为了镇戍边防、对外作战及抚绥周边少数民族的需要,遂遍设节度使于边区。至天宝初,沿边共设九节度使、一经略使,合称为十节度使或十节度。其名称、布防及兵力设置如下:

安西节度使,又称四镇节度使,安西四镇节度使。开元六年(718年)始设。职务是抚宁西域。治龟兹城(今新疆库车)。统辖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统兵2.4万人。天宝时节度使为夫蒙灵察、高仙芝、王正见、封常清。

北庭节度使,开元十五年(727年)自伊西节度使分置,或合称伊西、北庭节度使。职务是防御游牧在北方的突骑施和坚昆。治北庭都护府(治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统辖瀚海军、天山军、伊吾军,屯伊州(今新疆哈密)、西州(今新疆吐鲁番东南),统兵2万人。天宝时节度使为来曜、王安见、程

千里、封长清。

以上两镇内外相连，主要防御对象是西域天山南北两路的诸国。

河西节度使，景云二年（771 年）始设，是设立最早的节度使。职务是隔绝吐蕃与突厥的交通。治凉州（武威郡，今甘肃武威）。统辖赤水军、大斗军、建康军、宁寇军、玉门军、墨离军、豆贞军、新泉军（后改守捉）、张掖守捉、交城守捉、白亭守捉（后改为军）统兵 7.3 万人。天宝时节度使为王缙、皇甫惟明、王忠嗣、安思顺、哥舒翰。

以上一镇兼顾西方与北方两强敌，主要是防御吐蕃，守护河西走廊。

朔方节度使，开元九年（721 年）始改朔方行军大总管为之。职务是防御突厥。治灵州（灵武郡，今宁夏灵武西南）。统辖经略军、定远军、丰安军、东中西三受降城、安北单于两都护府，乃至丰、胜、灵、夏、银、匡、长等州均受其节度。统兵 6.4 万人。天宝时节度使为王忠嗣、张齐邱、安思顺。

河东节度使，开元十一年（723 年）以前称天兵军节并使，其年改为太原已北诸军节度使，开元十八年，又改称河东节度使。职务是防御突厥。治太原府（今山西太原西南晋源镇）。统辖天兵军、大同军、横野军、苛岚军、清塞军及忻、代、岚 3 州郡兵，管兵 5.5 万人。天宝时节度使为田仁琬、王忠嗣、韩休琳、安禄山。

以上两镇相互应援，专备突厥。

范阳节度使，先天二年（713 年）始置，称幽州节度经略镇守使。天宝元年（742 年）改名范阳节度使。主要是压制奚、契

丹。治幽州(范阳郡,今北京)。统辖经略军、静塞军、威武军、清贻军、横海军、高阳军、北平军、唐兴军、怀柔军、恒阳军、怀远军、镇安军,统兵 9.14 万人。天宝时节度使为裴宽、安禄山。

平贞节度使,开元七年(719 年)始置。职务是招抚室韦、靺鞨,治营州(柳城郡,今辽宁朝阳),统辖平卢军、卢龙军、榆关守捉、安东都护府,统兵 3.75 万人。天宝时节度使为安禄山。

以上两镇专门备御、镇抚东北诸国,主要是对付奚、契丹。

陇右节度使,开元元年(713 年)始置。职务是防御吐蕃。治鄯州(西平郡,今青海东都)。统辖临洮军、河源军、白水军、安人军、积石军、英门军、振武军(后改神武军)、威戎军、镇西军、绥和守捉、合川守捉、平夷守捉,管兵 7.5 万人。天宝十三载(754 年)又于鄯、廓、洮河四州两境增置宁边、神策等八军。天宝时节度使为皇甫惟明、王忠嗣、哥舒翰。

剑南节度使,开元五年(717 年)始置,职务为西备吐蕃,南抚蛮僚。治益州(蜀郡,今四川成都)。统辖天宝军、昆明军、洪源军、宁远军、南江军、澄川守捉及翼、茂、维、柘、松、当、雅、黎、姚、悉等州郡兵,统兵 3.09 万人,天宝时节度使为章仇兼琼、郭虚已、鲜于仲通、杨国忠。

以上两镇主要为备御吐蕃,防范西南。

岭南五府经略使。开元中置,以兼领广、桂、容邕、镇南(亦称安南)五管经略府而得名。职务为抚绥境内各少数民族。治广州(南海郡,今广东广州)。统辖经略军、清海军、直辖广管诸州,并兼其余四管诸州郡兵,统兵 1.54 万人。天宝时裴敦复为五府经略使。至德元年(756 年),改为节度使。

十节度相继设立之后，统领常驻边军，对外作战，对内镇抚，代替以前的府兵，成为主要的军事力量。与此同时作为坐镇边陲的统兵官，他们的权力也日益扩大。开元天宝时期，节度使往往不仅拥有军权，亦且兼及统辖区内的民政、财政。如幽州（后称范阳）节度使于开元十五年（727年）兼河北支度营田使，二十年兼河北采访处置使，二十七年又增领河北海运使。河西节度使开元二年兼陇右群牧都使、赤水九隆本道支度营田等使，十二年又加长行转运使。朔方节度使的职务中也有“兼关内道支度兼管内营田、盐池、押诸蕃部落副大使、兼采访处置使”等众多名目，至天宝年间，节度使已大都完全兼领边州军、政、财及监察大权。不仅如此，节度使由于联防的需要，还常常一人兼摄数镇。如天宝中王忠嗣兼领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节度事，“控制万里，天下劲兵重镇，皆在掌握。”天宝末安禄山也以身兼范阳、卢龙、河东三镇节度使而起兵反唐。

唐代在最初任命节度使时，多用名臣，而且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功名卓著者往往入知政事，升任宰相。开元中，张嘉贞、王峻、张说、萧嵩、杜暹都以节度使而入朝为宰相，但天宝以后，一方面由于科举制兴盛，宰相逐渐多用进士出身的文臣，而将帅中，勇敢善战的胡族武人愈来愈多；另一方面，朝廷出于蕃族内附、羁縻统治的需要，兼之李林甫为宰相，欲巩固自己的地位，“志欲杜出将入相之源”，奏言“文臣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为玄宗所接受，故节度使多用胡人，安禄山、史思明、哥舒翰、高仙芝等人，都以胡人相继任节度使。由于节度使的权势日重，而中央军备空虚，故逐渐形成外重内轻、尾大不掉之势。

至德以后(756年),天下用兵,故内地也逐渐遍设节度使,他们往往拥兵自重,不奉朝命,成为与中央相抗衡的藩镇。

二、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

安禄山是柳城(今辽宁朝阳)“胡”人,本姓康,叫轧荦山。后因母亲改嫁突厥人安延偃,他才改姓安,叫做安禄山。他原是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帐下捉生将,骁勇好战、屡立战功。开元末,他巴结御史中丞张守贞,被破格升为营州都督、充平卢军史。

天宝三年(744年)又任安禄山兼范阳节度使,天宝九年(750年)爵东平郡王,天宝十年(751年)兼领河东节度使,拥兵18.3万,超过中央禁卫军(12万),超过全国镇兵(45.1万)的1/3。一人兼领三镇,有军政、有财政、能行政,赏罚自专、威权日重,声势显赫、实力雄厚,逐渐滋生了取唐朝而代之的政治野心。安禄山有同乡史宰干,从小要好,也是张守珪麾下,以骁勇闻名,以功累迁将军,玄宗赐名思明。安禄山为三镇节度使,史思明也升为平卢兵马使兼北平太守、充卢龙军使。两人狼狈为奸,终于酿成了延续八年的“安史之乱”。

安禄山在朝中耳闻目睹,知玄宗年老昏庸、朝政腐败、军备松弛,就有轻视中原之心。孔目官严庄、掌书记高尚,多次怂恿他造反。于是安禄山便以高尚、严庄、张通儒及孙孝哲为腹心,史思明、安守忠、李归仁、崔乾佑、尹子奇、田承嗣、阿史那

承庆为爪牙，秣马厉兵、积聚力量，伺机叛乱。

李林甫活着时，安禄山以为李林甫狡猾胜过自己，尚有畏惧。杨国忠继任宰相，安禄山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杨国忠因此怀恨在心，屡次奏请玄宗要提防安禄山，玄宗正宠着安禄山，哪里听得进去。

杨国忠为了排挤安禄山，便拉拢哥舒翰，奏请任哥舒翰为河西节度使，进爵西平郡王，并拉哥舒翰一同向玄宗进言：“安禄山必反，陛下如果不相信，不妨试召安禄山入朝，看他来与不来？”玄宗果然下敕，征安禄山入朝。

杨国忠为了要取信玄宗，证实安禄山必反，日夜收集安禄山谋反的事实，指使京兆尹围住安禄山在京城府第，逮捕了安禄山的门客李超等，交御史台审讯，接着又把他们都秘密处死。安禄山的儿子安庆宗娶的是唐宗室女荣义郡主，一直住在京师，马上把这消息密报给安禄山。安禄山虽野心勃勃，因玄宗待他甚厚，本打算等玄宗死后再举反旗，现在被杨国忠一逼，便顾不得这许多了，立即与严庄、高尚、阿史那承庆密谋起兵。

洛阳陷落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初九，安禄山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等部兵15万，号称20万，以讨杨国忠为名，引兵南下，浩浩荡荡地杀向京城。

当时，天下太平日久、武备松弛，百姓都不懂战争，突然听到范阳起兵，远近震惊。河北原是安禄山统治的地方，安军所过，势如破竹，各地官吏望风瓦解，不是开门迎接，就是弃城逃

窜。

安禄山渡过黄河长驱直入，连陷灵昌（今河南开封以北）、陈留（开封以南）、荥阳，其前锋田承嗣、安忠志、张孝忠等已领兵到武牢，与封常清率领的官军对垒。封常清部下多是新募士卒，未经战阵，被叛军骑兵一冲即溃，逃进洛阳。封常清收拾残部，连战皆败，最后只好凿坏城墙，逃往陕州。于是，洛阳陷落。

高仙芝急忙率所部兵西退潼关，据险固守。

高仙芝领军出镇陕州时，监军边令诚有事请托，高仙芝没有给他办。边令诚一直记恨在心，趁入朝奏事，便加油添醋地奏说高仙芝、封常清撤离陕州时的狼狈情状，又说：“常清以贼势动摇军心，而仙芝无故弃地数百里，又剋扣军士口粮和赏赐给他们的东西。”玄宗听了一面之词，也不调查，立即写了一道手敕，命边令诚往军中将封常清、高仙芝就地正法。

边令诚到了潼关，先向封常清宣敕，将他斩首。接着向高仙芝说：“大夫也有恩命。”宣敕已罢，高仙芝说：“我遇敌而退，该当死罪！但说我剋扣军粮，上有天、下有地，这是毫无根据的事情！”一旁的将士们也帮着高仙芝喊冤，边令诚只当没有听见，命刀斧手将高仙芝斩了。

玄宗杀了封、高二将，但派谁代替他们领兵守潼关呢？恰好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因病在京休养，玄宗想借重他的威名，且他一向与安禄山不和，便拜他为副元帅，领兵征讨安禄山。哥舒翰因病固辞，不肯受职，玄宗不许。以田良丘为御史中丞、充行司马，起居郎肖昕为判官，蕃将火拔归仁等部兵 8 万，加上高仙芝的兵马，号称 20 万，出镇潼关。一面传檄四方，命各道进兵，会攻洛阳。

哥舒翰到了潼关，因病不能理事，把军政大事都委托给田良丘。田良丘一个人不敢作主，便请王思礼主管骑兵，李承光主管步兵。王、李二人又互不服气，争长论短，内部不能统一，士卒懈怠、纪律松弛、缺乏斗志。幸亏安禄山进洛阳，忙着筹备称帝，而且他的后方河北，常山太守颜杲卿和平原太守颜真卿联兵讨伐安禄山，诸郡纷纷响应，拖住了安禄山，使他不能乘势西进，潼关暂无激烈的战斗。

常山太守颜杲卿，当安禄山引兵南下抵达蒿城时，估计自己无力抵拒，便与长史袁履谦出城迎接，安禄山很高兴，仍命他守常山，只派了一个部将李钦凑领兵数千守井陘口，以防河东。

颜杲卿回到城中，便与长史袁履谦、参军冯虔、前真定令贾深、藁城尉崔安石、内丘丞张通幽等密谋起兵，以拒安军，并遣人与太原尹王承业联系，要他接应。正在这时，杲卿族弟、平原太守颜真卿派外甥卢逖来常山，说真卿在平原联络附近州郡，招募勇士，修城浚濠，积草屯粮，杀了安禄山的海运使刘道玄，夺得甲仗 50 余船，要与杲卿联兵合力断安禄山的归路，拖住安军，阻止他西进。

至德元年（756 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以达奚珣为侍中，张通儒为中书令，严庄、高尚为中书侍郎，其余文武都有升赏。颜杲卿就以安禄山的名义，召驻守井陘的安将李钦凑领兵来常山领赏。第二天黄昏时分，李钦凑带了人冒冒失失地来了，杲卿派袁履谦、冯虔等带了酒肉妓乐去慰劳，把他们灌醉了，杀了李钦凑，遣散了守井陘的安军。

次日，有探马来报：安禄山派往幽州征兵的金吾将军高

邈，从幽州回洛阳，快要到藁城了。杲卿立刻叫冯虔带兵去捉了高邈。接着，南边又来探报，安禄山的大将何千年从东京去范阳，已经入境。杲卿派崔安石和翟万德赶往醴泉驿，装作迎接，把何千年也捉了。

崔安石、翟万德押何千年到常山，何千年向杲卿献计说：“太守欲为朝廷出力，只宜深沟高垒，坚守城池，待等朔方军到，方可合力齐进。今应传檄赵、魏，只说李光弼引步骑 1 万，已出井陉，以解饶阳之围。”杲卿试用其计，围困饶阳的安禄山部将张献诚果然解围而去。

颜杲卿派人入饶阳，慰劳将士，又命崔安石等到各郡宣传，说官军已经攻克井陉，朝夕将至，号召河北诸郡驱杀安禄山派来的官吏，举郡反正。诸郡纷纷响应，河北 24 郡，有 17 郡宣布效忠朝廷，只有范阳、卢龙、密云、渔阳、汲、邺 6 郡仍依附于安禄山。

颜杲卿又派人去范阳，招降范阳节度副使贾循。贾循犹疑不决，郾城（今河南郾县）人马燧劝贾循说：“禄山负恩悖逆，必然失败，公若以范阳归国，倾其巢穴，此不世之大功！”贾循心里活动了，便与马燧商议具体行动，不料被安禄山亲信将领牛润容听到了，急忙报告安禄山。安禄山立刻派他的亲信党羽韩朝阳去范阳杀了范循，一面命史思明、蔡希德领兵袭击博陵、常山。

颜杲卿昼夜守城，粮尽矢竭，终于被敌攻破。史思明、蔡希德挥兵入城，捉住了颜杲卿和袁履谦等，把他们押送洛阳，交安禄山发落。

颜杲卿被解了洛阳，安禄山见了，大骂颜杲卿：“你本是范

阳户曹，我保荐你为判官，不过几年，便升任太守，我有什么地方亏待了你，你竟敢反对我？”杲卿瞪着双眼大骂：“你本是营州牧羊羯奴，天子任你为三镇节度使，恩幸无比，何负于你，而你竟反！我世为唐臣，虽经你保举，岂肯跟你造反！我为国讨贼，恨不能斩了你，臊羯狗，要杀便杀，不必多言！”安禄山大怒，命人将颜杲卿、袁履谦等绑在洛阳中桥柱上，一同刎死。杲卿、履谦一直到死，骂不绝口。颜氏一门死难的，有 30 余人。

郭李出兵

史思明攻下常山，复引兵进击诸郡，诸郡都不能守，独有饶阳太守卢全诚据城固守，屡挫叛军。史思明见一时难破饶阳，便将饶阳团团围困，只待饶阳粮尽矢绝再一举破城。河间司法李免领 7000 人、景城（今河北沧州市以西）长史李晔派儿子领兵 8000 人往救，都被史思明杀败。

这时，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正围攻云中，玄宗命他进军东京，并选一良将，分兵出井陉，略定河北。郭子仪荐举李光弼有大将之才，于是玄宗授李光弼为河东节度使，加魏郡太守、河北道采访使，率蕃、汉步骑万余，太原弩手 3000 人出井陉，进军河北。

李光弼兵到常山，常山团练兵捉了安军守将安思义出降。李光弼向安思义问计，安思义说：“大夫远来，兵马疲劳，不如趁早入城，据城固守。安军虽锐，但不能持久，稍一失利，就气馁心离，那时便可图了。思明在饶阳，距此不过二百里，明晨其前锋必到，不可大意。”李光弼听他说得有理，亲解其缚，随即移军入城。

史思明听到常山失守，立刻放弃围困饶阳，亲率 2 万余骑，果然于第二天早上到达常山，马上指挥攻城。李光弼据城拒敌，待敌军少懈，遣兵出击，屡有斩获。过了几天，有村民来报告，说有贼兵 5000 人，自饶阳来到九门（今河北藁城以西），光弼即遣步骑各 2000 人，偃旗息鼓，趁敌不备掩杀过去，杀得贼兵一个不留。史思明闻讯失色，退入九门。

李光弼与史思明在常山相拒 40 余日，城中粮食渐乏，遣人向郭子仪告急。郭子仪引兵出井陘至常山与李光弼合兵，蕃、汉步骑共 10 余万，会攻九门。史思明出城迎战，被郭、李军杀得大败，大将李立节也被官军中郎将浑瑊射死。史思明收拾余众，逃往赵郡，蔡希德奔钜鹿。于是河北各郡纷纷杀了安军守将向官军投诚。

潼关失守

正当安禄山处境困难的时候，朝廷内部将相间又发生了新的摩擦，使安禄山摆脱了困境。原来对于安禄山的叛乱，朝廷内外都一致认为是杨国忠一手造成的。而安禄山又是打着清除杨国忠的旗号，潼关守将王思礼，秘密建议哥舒翰，请他上表玄宗，请诛杨国忠，哥舒翰没有回答。王思礼又请哥舒翰准许他带 30 骑到长安，把杨国忠捉来潼关除掉，哥舒翰连忙摇头：“这样做，倒不是安禄山造反，而是我哥舒翰造反了！”

这次密议，不久便传到杨国忠的耳中，他又怕又恨。恰巧有探马来报，说叛将崔乾佑在陕州兵不满 4000 人，而且都是老弱残兵，杨国忠趁机奏请玄宗，下令促哥舒翰速进兵恢复陕州和洛阳。哥舒翰上表奏称：“安禄山久习用兵，岂肯无备！他

这是诱兵之计，如果前往，必落入他的圈套。况贼军远来，利在速战；官军据险，利在固守。且贼兵残虐，已失人心，兵势日衰，将有内变；那时乘机出击，可不战而擒。只要灭贼有期，何必急于求成！”郭子仪、李光弼也送来奏表：“请引兵北取范阳，直捣贼巢，捉住贼党妻子，招降叛将，贼必内乱。潼关大军，只宜固守，不可轻出。”杨国忠怀疑是哥舒翰要谋害自己，又奏玄宗，说什么贼军现在无备，正是机会，哥舒翰逗留不进，坐失良机。于是玄宗便一个接一个派中使去潼关，促哥舒翰急速出兵，不得有误。哥舒翰迫不得已，只好领兵出关。

至德元年（756年）六月初七，官军于灵宝西原与崔乾佑军相遇。崔乾佑据险以待，南依山、北控河，道路狭窄，绵延70里。哥舒翰不敢轻进，下令部队暂停前进。初八，哥舒翰与田良丘登舟至中流观察敌阵，见崔乾佑兵少，急令诸军进兵。王思礼等领精兵5万在前，庞忠等将领兵10万随后，哥舒翰亲自领兵3万登河北岸观阵，擂鼓助威。

不一会，崔乾佑领兵出来，大约不过万人。敌兵东一群，西一伙，零零落落，忽前忽后，毫无纪律。官军看了，不禁发笑。既交兵，叛军便偃旗息鼓，望后便退，官军更无戒备，随后紧追。忽听一声炮响，两边山上，擂木滚石，从空而下，官军一下子被打死打伤了许多。道路又狭，士卒拥挤着，刀枪施展不开。哥舒翰用毡车驾马为前驱，企图冲开敌阵。崔乾佑用数十乘草车来堵毡车，纵火焚烧，顷刻间浓烟滚滚、烈焰腾腾。官军被烟焰迷住眼睛而自相厮杀，只道贼军在烟中，又聚集弓弩手来射，直到黄昏矢尽，方才知道里面根本没有敌军。

这时，崔乾佑遣同罗精骑绕过南山，来到官军背后，出其

不意地发起攻击，官军首尾不能相顾，于是大败，有的弃甲丢盔逃进山谷躲藏，有的被挤入河中淹死，哭喊声震天动地。

后军见前军已败，不战自溃，驻在河北的官军看见了，也望风而逃。哥舒翰只带了麾下数百骑，自首阳山渡过黄河，逃进潼关，检点士卒，十七八万大军，只有 8000 余人逃进关来，不禁仰天大哭。

六月初九，崔乾佑率军进攻潼关，官军已亡魂丧胆，哪里还有斗志，潼关很快就被攻破了。

哥舒翰逃到关西驿，招集逃散的士卒，想要收复潼关。蕃将火拔归仁等百余骑围住关西驿，对哥舒翰说：“贼兵到了，请公快上马。”哥舒翰出驿上马，火拔归仁领着众人跪在地下叩头说：“公率 20 万众出征，一战覆没，还有什么面目去见天子！且公不见高仙芝、封常清吗？为今之计，只有东投安禄山，尚可自全。”哥舒翰不答应，要想下马，火拔归仁忙用绳索把哥舒翰的两只脚绑在马腹上，簇拥着往东而去。

哥舒翰被押送到洛阳，安禄山说：“你平时一直看不起我，如今怎样？”哥舒翰拜伏在地上说：“臣肉眼不识圣人。天下未定，李光弼在常山，李祇在东平，鲁昊在南阳，陛下留臣性命，臣即写信去招降他们，不日便可来归。”安禄山大喜，授哥舒翰为司空、同平章事。又对火拔归仁说：“你卖主求荣，不忠不义。”叫左右绑出去杀了。

哥舒翰果然写了几封信招降诸将，诸将复信都斥责他投降叛军。安禄山知道不会有什么效果，便把哥舒翰囚禁在洛阳内苑中，后来被安庆绪杀害。

玄宗西逃

潼关失守，京城内外，一片惊惶。六月初十，玄宗召宰相议事。杨国忠因兼领剑南节度使，当安禄山起兵时，便命副使崔圆做好准备，一旦危急便可以奔蜀，当下便建议玄宗暂往蜀中避难。玄宗认为是个办法。

六月十二日，玄宗登勤政楼，声言要御驾亲征，听到的人都不大相信。果然到了这天晚上，玄宗便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整顿大军，挑选良马 900 匹，待到十三日黎明，便带了贵妃姐妹、皇子、皇孙、公主、妃嫔、以及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和亲信宦官、宫人，偷偷地出了禁苑西门，逃出长安。匆忙中连住在宫外的诸王、公主都没有去通知。

玄宗一行餐风宿露、忍饥挨饿，一路西行。六月十四日，队伍到马嵬坡，暂息在马嵬驿（在今陕西兴平西）。这时，将士们都憋着一肚子火，陈玄礼认为，这次祸乱都是杨国忠造成的，要想杀了他出气，便叫东宫宦官李辅国去请示太子李亨，李亨不敢作主。刚巧有吐蕃使者 20 余人拦住杨国忠的马头，向他要饮食，杨国忠还来不及回答，军士们忽然大叫起来：“杨国忠与胡虏谋反！”一箭向杨国忠射去，没有射中。

杨国忠一看苗头不对，急忙拍马逃进西门，军士们追上去把他杀了，屠割支解了他的尸体，把他的头挑在枪尖上，来到驿门外，又杀了他的儿子户部侍郎杨暄及韩国、秦国二夫人。

玄宗听到驿外喧哗，问发生了什么事，左右说是杨国忠谋反。玄宗拄杖走到驿门外，慰劳军士，叫大家散开，军士不睬。玄宗叫高力士去问，陈玄礼说：“杨国忠谋反，贵妃不宜再留，

请陛下割恩正法。”玄宗听说，退入驿门，倚杖低头，暗暗流泪。京兆司录韦谔提醒玄宗：“众怒难犯，安危就在顷刻，愿陛下从速决断！”说罢，叩头不止。玄宗说：“贵妃住在深宫，怎么会知道杨国忠谋反？”高力士从旁劝道：“贵妃果真无罪，但将士们已杀了杨国忠，而贵妃仍在陛下左右，叫他们怎么能安心呢？请陛下仔细想想这个道理，目前只有使将士安心，陛下才可没有危险。”于是，玄宗命高力士把贵妃带进佛堂，用帛勒死。

高力士把贵妃尸体抬到庭院中，叫陈玄礼等进来验看。陈玄礼等一看贵妃真的死了，这才脱去甲冑，向玄宗叩头请罪，玄宗抚慰了几句，叫他们晓谕军士。陈玄礼等高呼万岁，再拜而去，整顿队伍，准备出发。

六月十五日，玄宗将从马嵬驿出发，将士们都说：“杨国忠的将吏都在蜀，不可去蜀。”玄宗本意想入蜀，但恐违众心，不敢说出来，只好问众人去哪里是好？韦谔说：“不如先去扶风，慢慢再商议去处。”众人以为有理。

安禄山没有料到玄宗会急急忙忙西逃，派人叫崔乾佑暂住潼关，不要前进。过了10多天，才遣孙孝哲领兵进驻长安，以张通儒为西京留守，崔光远为京兆尹；命安守忠领兵进驻苑中、镇守长安。

孙孝哲是安禄山的亲信爪牙，常与严庄争权，安禄山命他监督关中诸将。他骄横跋扈、嗜杀成性，他到长安后，一面纵兵烧杀抢掠，一面屠杀唐朝宗室，凡王侯、将、相跟了玄宗跑的，在长安的家属都被杀尽，连怀里的婴儿也不放过。

安禄山下令搜捕百官、太监、宫女，每捉到几百人，便押送洛阳。陈希烈因晚年失宠而怨恨玄宗，便与张珀、张均等都投

降了安祿山。安祿山封陈希烈、张洎为宰相,其余唐朝官吏都授原职。于是安祿山的势焰更盛,西面威胁汧、陇,南侵江、汉、北割河东之半。不过安祿山部下的将领虽然勇猛,但都是些没有远见的粗人,自从进入长安,只知掳掠财宝美女、日夜纵酒,再没有西进的心思,所以使玄宗得以从从容容去成都,太子李亨也能在没有追兵的情况下从容北上。

肃宗灵武即位

太子李亨被留下以后,想到自己名义上曾担任过朔方节度使,也知道几个朔方将士的姓名,便决定去朔方节度使的治所灵武(今宁夏灵武以西)。他们经由新平(今陕西彬县)、安定(今陕西宁县)、平凉(今甘肃平凉),七月初九,到达灵武。河西行军司马裴冕、朔方留后杜鸿渐上书太子,请即皇帝位,太子起先不同意,后经一再劝说,方才应允。

七月十二日,太子在灵武城南楼即位,史称肃宗。尊玄宗为上皇天帝,改这一年为至德元年。以杜鸿渐、崔漪为中书舍人,裴冕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一面遣使入蜀,向玄宗报告即位经过,一面派人去召请故人李泌入朝辅政。

肃宗即位的消息传到敌后,颜真卿写了一份祝贺的奏表,藏在蜡丸内,派人送到灵武。肃宗大喜,授颜真卿为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仍为河北招讨使并致敕书,也藏在蜡丸中带去。颜真卿将敕书颁发河北、河南、江淮各郡,各道都知道肃宗即位,大受鼓舞。

郭子仪留河东节度使李光弼守井陉,自己领兵5万,赶往灵武,于是灵武军威稍振,大家对恢复唐室有了信心。八月初

一，肃宗以郭子仪为兵部尚书、灵武长史，以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北都（太原）留守，并同平章事。

肃宗听了李泌的意见，任命广平王李俣为天下兵马元帅；又委任李泌为元帅府行军长史，李泌固辞，肃宗说：“朕本不敢相屈，只因天下艰难，全仗大才匡济，一待乱事平定，当听从尊便。”李泌无奈，只得接受任命。

九月二十五日，玄宗从成都派了韦见素、房琯等来到灵武，奉上宝册，正式传位。肃宗久闻房琯之名，对他特别器重。房琯专好清谈、言词慷慨，自以为除他以外，没人能担当平定天下的重任，因此上疏肃宗，愿领兵恢复两京。肃宗同意了，房琯自选将佐，以户部侍郎李揖为行军司马，给事中刘秩为参谋。李揖、刘秩都是书生，不懂军事，房琯却把军务都委托二人。

十月二十一日，中军、北军到达咸阳以东的陈涛斜，与叛将安守忠的部队相遇。房琯要效法古代的车战，以牛车 2000 乘，两旁配以步骑，一声令下，驱车冲向敌阵。哪知这些牛没有经过训练，叛军顺风鼓噪、纵火焚烧，牛群便四散奔逃，反而冲倒了步军，一霎时，人喊马嘶、乱作一团。叛军趁机掩杀过来，官军大败，死伤十之八九。杨希文、刘贵哲都投降了叛军。

肃宗听到房琯败报，不禁大怒，要惩处他，亏得李泌一力营救，才赦免了他。

这时，河北也传来败报，河间、景城、平原、饶阳诸郡都相继陷落。肃宗急坏了，对李泌说：“今敌强如此，何时可定！”李泌设想了一个避其锋、乘其疲，不攻城、不遏路，分三路轮番出击，拖垮敌人的战斗计划。肃宗转忧为喜，立即任命建宁王李

侓为范阳节度使，只待来春与郭子仪、李光弼分三路东征范阳。

安庆绪弑父

新春到来之际，意外的事变打乱了肃宗与李泌商定的东征计划。原来安禄山盘踞洛阳以后，纵情酒色、荒淫无度，弄得满身病痛、双目失明，性情更加暴戾，大臣、侍从稍不如意，重则杀头、轻则鞭打。侍监李猪儿经常被打得死去活来。

安禄山的宠妾段氏，估计安禄山活不长了，要想让自己的亲生儿子安庆恩代安庆绪为嗣。安庆绪听到风声后惊恐万状，求严庄给他想个办法。严庄也受过安禄山的鞭打，一直怀恨在心，便劝安庆绪杀了安禄山自立，并要他赶快行动，免得错过时机。安庆绪欣然同意，只是派谁去行刺呢，严庄说可以找李猪儿。

安庆绪马上把李猪儿秘密叫来，严庄先问：“你前后挨打，还记得清次数吗？”李猪儿回答：“已记不清了。”严庄又说：“照你这么说，不死还是侥幸的。”李猪儿连连点头。严庄见火候已到，便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他，并说：“不行大事，死期就不远了！”李猪儿满口应承。

这一天夜里，严庄和安庆绪手执刀剑来到安禄山的寝所，侍卫见安庆绪、严庄满脸杀气，不敢阻挡。李猪儿手持利刃，直入帐中，先把安禄山枕边的宝刀抽出来，狠命朝安禄山肚皮上砍去。安禄山伸手摸枕边的宝刀，没有摸到，摇着帐竿说：“一定是家贼谋逆！”话刚说完，肚肠已经流出来，只在床上滚了几滚便气绝身亡。严庄命左右抬开卧床，掘地数尺，用氈把安禄

山的尸体裹好后埋在床下，告诫宫中不准泄漏。

次日早晨，严庄向百官宣布，安禄山病危，立安庆绪为太子；隔了几天，又宣布安禄山把帝位传给安庆绪，自己做了太上皇；再过几天，又宣布安禄山死了，然后发丧。从地下掘出来的尸体已经腐烂，只好草草成殓了事。

血战睢阳

至德二年（757年）正月二十五日，尹子奇率勑、檀及同罗、奚兵 13 万攻睢阳（今河南商丘），以便南取江、淮。睢阳太守许远向河南节度副使张巡告急，张巡自宁陵引兵入睢阳。

张巡，进士出身，博览群书、精通战阵，在守雍丘时，以千余兵力与敌数万作战，常常出其不意袭击敌人，几个月中歼敌万余，因功授为河南节度副使。

张巡带到睢阳的兵马，只有 3000 人，与睢阳原有守军加在一起，也不过 6800 人。这一点人马要敌 13 万叛军，在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但因他指挥得当，经过 16 昼夜苦战，擒敌将 60 余人，杀敌 2 万余。许远对张巡的指挥才能非常钦佩，便请张巡负责指挥作战，自己愿作后备，张巡爽快地答应了。

三月，尹子奇又调集大军再攻睢阳。张巡激励将士们说：“我受国恩，为国守城，是完全应该的。但诸君为国捐躯，我却不能加赏你们，深感痛心。”将士们很受感动，纷纷请求出战。张巡便杀牛宰羊，大飨士卒，食毕尽数出城作战。张巡亲执大旗，身先士卒，直冲敌阵。敌军毫无准备，往后溃退，官军奋勇厮杀，斩将 30 余，杀敌 3000 余，叛军溃退数十里。

张巡守睢阳，将近 10 个月，城中食尽，众议弃城东走，张

巡与许远商议，以为睢阳是江淮保障，若弃之而去，贼必乘胜而进，且士卒都饥疲羸弱，也冲不出去，不如坐守待援。这时，城里连茶纸也吃尽了，便杀马吃；马吃尽了，又捉鸟雀和老鼠吃；鼠雀没有了，张巡将爱妾杀了给士卒吃，许远也杀了家奴给士卒吃。城中人自知必死，但没有一个叛变投降的。

至德二年十月初九，贼军登城，将士们都饥饿病弱得动也不能动了，张巡与许远等都被叛军捉住。尹子奇问张巡：“听说你每战皆裂齿碎，是什么原因？”张巡说：“我志吞逆贼，但恨力不从心！”尹子奇被张巡的气节所感动，不想杀他，部下都说：“他是个守节之士，终不为我用。且他深得人心，还是杀了的好，免得后患。”于是把张巡与南霁云、雷万春等 36 人都杀害了。张巡临刑时，颜色不变、神情如常。

收复两京

在张巡苦战的同时，肃宗接受李泌的意见，在至德二年（757 年）二月，移驾凤翔（旧址在今陕西雍县），以示进取。肃宗到了凤翔，果然前方士气大振，陇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都陆续到达凤翔，江淮漕运也经汉水通到洋州（今陕西西乡）、汉中（今汉中），长安人听说肃宗到凤翔，纷纷逃来，昼夜不绝。

李泌请派安西及西域之兵按原定计划取范阳，肃宗坚持要先收复两京。于是各路兵马奉命进战，结果几路人马出战都不顺利，郭子仪派子郭旰攻潼关，得而复失，败退河东；王思礼出战不利，退守扶风（今陕西扶风），叛军乘胜追击，前锋抵达太和关（今陕西岐山西北），离凤翔只有 50 里。

败报一日三传，凤翔震骇、全城戒严。肃宗传令，命郭子仪

速来凤翔护驾。郭子仪一到凤翔，肃宗任命他为副元帅，令兵再攻长安。郭子仪请向回纥借兵，肃宗同意，一面命元帅广平王李俶调集朔方、西域等军，一面遣使去回纥。

回纥怀仁可汗有心与唐和好，立刻遣子叶护率精兵 4000 余至凤翔，肃宗当即召见并以厚礼相待，并当面与叶护约定：“克城之日，土地人民归唐，金帛子女归回纥。”又令广平王李俶与叶护结为兄弟。

至德二年（757 年）九月十二日，李俶率朔方军及回纥、西域等军 15 万，号称 20 万，从凤翔出发，十七日，至长安西香积寺北泔水东摆开阵势：李嗣业为前锋，郭子仪为中军，王思礼为后军。叛军 10 万布阵于泔水之北，叛将李归仁出阵挑战，李嗣业执长刀，身先士卒，大呼奋击，杀敌数十人。于是诸军齐进，奋勇杀贼。

李归仁事先在阵东埋伏一支精骑，准备袭击官军后背，被朔方左厢兵马使仆固怀恩发觉，引回纥精骑出击消灭，叛军因此气馁。李嗣业又要回纥骑兵会合，出敌阵后与大军夹击，自午时战到酉时，斩敌 6 万余，叛军大败，逃进城去。

到了夜里，只听城内喧嚣之声不绝，仆固怀恩马上去见李俶，说：“贼必弃城走了，请允许我率 200 骑追击，必能捉住安守忠、李归仁等。”李俶说：“将军疲劳了，先休息，等明天再说。”怀恩说：“战事贵在神速，何必等到明天。”李俶不听，叫怀恩回营。待到天明，有探马来报，安守忠、李归仁与张通儒、田乾真都连夜逃走了。怀恩听说后叹息不已。

九月二十八日，官军进入长安。回纥叶护来见李俶，请履行前约，准予掳掠金帛子女。李俶跪在叶护马前，再拜说：“今

刚克西京，便行掳掠，则东京人民必助贼死战，请到东京后再遵前约。”叶护爽快地同意了，即与怀恩引回纥、西域之兵绕城而过，扎营 浚水之东。李 俶整军入城，百姓携老扶幼，夹道欢呼。李 俶留长安三日，引大军东进，留太子少傅虢王李巨为西京留守。

三十日，捷报传到凤翔，百官向肃宗祝贺。肃宗一面遣人入蜀奏禀玄宗，请他回京；一面命左仆射裴冕去京师祭祀宗庙和安抚百姓。

东进官军，在郭子仪率领下，追击叛军到潼关，宰敌 5000 余，连克华阴、弘农 2 郡，兵锋所向直指陕州。盘踞在洛阳的安庆绪，尽发洛阳兵 15 万，由严庄率领着往救陕州，与张通儒等共拒官军。十月十五日，郭子仪等抵达新店，遇叛军依山布阵，郭子仪等初战不利，正危急时，回纥精骑突然从南山击敌后背，叛军大惊，高呼：“回纥兵来了！”立即溃退。官军与回纥兵两面夹击，叛军大败。严庄、张通儒连陕州也不敢进，逃回洛阳。

安庆绪见严庄败回，惊惶不安，十六日夜，杀唐将哥舒翰、程千里等 30 余人，率领党徒，偷偷地出了苑门，逃往河北。

回纥兵争先拥进洛阳大肆抢掠，洛阳百姓，前番已遭叛军蹂躏，这次又遇回纥兵逞凶，家家儿啼女哭、家财尽空。回纥兵足足骚扰了两昼夜还不满足，后来由城中父老募集了罗锦万匹送给他们方才罢休。

洛阳既复，李泌再次请求回山。在收复长安后，李泌就请求回山，肃宗问他为什么要走，李泌说：“臣遇陛下太早，陛下宠臣太深，臣权太重、功太高、迹太奇，所以不可留。”肃宗说：

“夜深了，先睡觉，以后再商量。”李泌说：“今陛下与臣同榻而眠，臣尚不敢尽言，何况他日宠衰。”肃宗问他还有什么话不敢说，李泌就说是关于建宁王李倓的事情。原来李倓因得罪了肃宗宠妃张良娣，被张良娣和宦官李辅国进谗，肃宗一怒，命李倓自裁。李泌说了李倓冤死的真相后，又举武则天杀太子李弘和雍王李贤的故事，劝肃宗不可再犯这样的错误。李泌说这番话的用意，是因为广平王李俦功高，引起张良娣的妒恨，暗中散布流言，又想暗害李俦，所以特意提醒肃宗。李泌坚决要求归山，肃宗也没有办法，只好让他回衡山。

胶战邺城

十月二十一日，郭子仪遣左兵马使张用济等率兵取河阳及河内。严庄走投无路，向官军投诚。陈留人杀了尹子奇，举郡出降。安庆绪败走邺郡，兵马不过1300人。过了几天，阿史那承庆、蔡希德、田承嗣等将各率所部来归，又聚众至6万。安庆绪忌史思明势强，遣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率劲骑5000，以征兵为名，企图杀了史思明。

史思明得到消息后连忙召部将商议，好几个人都劝他率兵投唐，史思明觉得有理，设计捉了安守忠和阿史那承庆，遣使奉表降唐。肃宗大喜，封史思明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遣内侍李思敬与乌承恩前往慰抚，命他领所部兵讨安庆绪。

乾元元年（758年）六月，李光弼上表肃宗，认为史思明降唐只是迫于形势，终将为乱，劝肃宗授乌承恩为范阳节度使，叫他与阿史那承庆共图史思明，肃宗同意了。

乌承恩接到密令，多次穿了女人的衣服到诸将营中游说，

赂以金帛、收买诸将。有人把这事告诉了史思明，史思明便捉了乌承恩，搜他的行李，查到了授予阿史那承庆的铁券和李光弼的信。史思明责问乌承恩：“我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你要害我？”乌承恩无言答对，只说是李光弼指使他做的。史思明马上召集将佐吏民西向而哭：“臣以 13 万之众降朝廷，何负陛下，而要杀我。”将乌承恩杀了，牵连被杀的有 200 余人。

史思明又捉了李思敬，上表要求肃宗诛李光弼。肃宗遣使抚慰，把事情都推在乌承恩身上，说都是他自作主张，不是朝廷和李光弼的意思。史思明当然不会相信，于是举旗复叛。

九月二十一日，肃宗命郭子仪、李光弼、李嗣业、王思礼等九节度使各统所部大军共 20 万，征讨盘踞在邺城（今河南安阳）的安庆绪。肃宗因郭子仪、李光弼都是元勋，不宜互相统属，因此没有任命元帅，却叫一个毫不知军事的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以协调各军。

郭子仪引兵自杏园渡过黄河，在获嘉（今河南获嘉）击败安太清。安太清退保卫州（今河南汲县），郭子仪进兵包围了卫州。接着，鲁灵、崔光远与李嗣业等各领所部来会。

安庆绪发邺郡兵 7 万来救卫州，以崔乾祐领上军，田承嗣率下军，安庆绪自统中军。郭子仪集射手 3000 人，埋伏在军营四周的矮墙内，下令说：“我退，贼必追我，你们便登墙鼓噪而射。”说罢，率军纵马来战安庆绪。战不多时，子仪佯退，安军便追，追至矮墙下，伏兵齐起，矢如雨滴、喊杀连天，安军急退，子仪紧追，安军大败而逃往邺郡。

郭子仪率军追到邺郡，这时，许叔冀、董秦、王思礼等相继引兵而来。安庆绪收拾余军与官军战于愁思冈（安阳西）又大

败，损失兵马 3 万余，只好退入邺城，据城固守。郭子仪等领兵围住邺城，安庆绪窘急无计，只好遣薛嵩向史思明求救，并请将皇位让给他。史思明答应了，便发范阳兵 13 万救邺，但到了魏州（今河北大名）便观望不再前进，只遣李归仁领步骑 1 万屯于滏阳（今河北磁县），与安庆绪遥相呼应，自己于乾元二年正月初一，于城北筑坛，自称大燕皇帝。

在邺城的官军得悉史思明称帝，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李光弼建议分兵进迫魏州，牵制住史思明，使官军有较充裕的时间攻邺城，先解决邺城的安庆绪，然后再解决史思明。因鱼朝恩坚决反对，只好罢休。

郭子仪等围攻邺城，筑堤两重，引漳河水灌入城中，城中井泉皆溢，安军只好构栈而居。史思明见邺城危急，令诸将各至离邺城 50 里扎营，鸣锣擂鼓来威胁官军，命每营各选精骑 500 骑，去城下骚扰，官军一出击便四散奔回；官军回营后又聚集前来，闹得官军日夜不宁。史思明还选了几队精兵扮作官军，四出拦截官军粮运，看到运粮的车船，纵火便烧，官军粮食渐乏、人心浮动，都想撤军回去。

史思明看时机已到，引大军直抵城下。当时官军步骑 60 万列阵于安阳河北，史思明亲率精骑 5 万来战，李光弼、王思礼等先与交战，杀伤各半。郭子仪领军继进，还没来得及布阵，忽然乌云四合、狂飙骤起，拔木吹沙、天昏地暗，咫尺不能相辨。两军大惊，官军南逃、史军北奔，丢弃的甲仗辎重塞满道路。郭子仪以朔方军断河阳桥（今河南孟县境）保东京，东京士民因惊骇而散奔山谷；各镇节度使率军各归本镇。败兵过处，沿途抢掠，将士无法禁止，只有李光弼、王思礼的部队仍整齐

严明，全军而归。郭子仪退到河阳，诸将陆续赶来，合兵数万，一面布置守城，一面上表朝廷请罪，肃宗还要用他，因此没有加罪。

河阳之战

史思明探知官军溃走，没有追击，屯兵邺城。安庆绪见官军败退了，又得了官军遗弃的六七万粮食，便与孙孝哲、崔乾祐商议，撕毁前约，拒绝史军入城。史思明派人来责问，安庆绪只好遣安太清上表称臣。史思明表示不必如此，愿与安庆绪约为兄弟，互相援应，与唐鼎足而立。安庆绪大喜，请与史思明歃血为盟，史思明同意了。

安庆绪率 300 骑到史思明营中，向史思明说：“我失两京，久陷重围，幸亏大王来救，才得复生。”史思明忽然变了脸，说：“你失两京，还是小事。你杀父夺位，天地不容。我为太上皇讨贼，难道是要你奉承吗？”即命左右把安庆绪并其四弟，还有高尚、孙孝哲、崔祐乾等都杀了。史思明本想西进，因顾虑根本不牢，便留儿子史朝义守相州，自己引兵回范阳。

观军容使鱼朝恩借邺城失利，屡进谗言，诋毁郭子仪，肃宗召郭子仪回来，以李光弼代为朔方节度使、兵马元帅。李光弼刚到范阳，就接到史思明大军分四路南下的消息，便急忙赶往汴州，要汴滑节度使许叔冀守住汴，他即刻回东京发兵来救，许叔冀一口答应。哪知史思明兵到，许叔冀便与濮州刺史董秦及部将刘从谏等投降了史思明，史思明以许叔冀为中书令，仍守汴州。

史思明乘胜西攻郑州。李光弼与洛阳留守韦陟商议，决定

放弃洛阳，移军河阳，命韦涉率百官退入潼关，河南尹李若幽率吏民出城避敌。

李光弼到了河阳，不久，史思明也引兵到了，令骁将刘龙仙到城下挑战。刘龙仙自恃勇悍，谩骂光弼。李光弼问诸将：“谁敢出马？”仆固怀恩愿往，光弼说：“此非大将所为。”裨将白孝德请去，光弼问他要带多少人？白孝德说一个也不要，手持两支长矛，跃马出城，从容向刘龙仙驰去。刘龙仙见只有一个人出城，毫不在意，依旧谩骂，等白孝德走近了，正要动手，只见白孝德向他摇了摇手，刘龙仙不知是什么意思，不敢动手。白孝德走到离刘龙仙还有 10 步，睁眼问道：“贼将认得我吗？”刘龙仙说：“什么狗彘！”白孝德大吼一声，举矛把刘龙仙挑下马来，割了首级回城。

史思明有良马千匹，每日放在河南岸洗刷，光弼命索军中牝马 500 匹，将马驹留在城中，待思明马到水边，都赶出城。母马离开马驹，嘶叫不已，史军牡马看见母马，立即蜂拥渡过河来，官军将它们尽数赶入城中。

史思明大怒，派了一支部队到河清，要想阻绝官军粮道，光弼屯军于野水渡防他。到天黑，光弼回河阳，留兵千人，派部将雍希颢守栅，吩咐说：“贼将高庭晖、李日越，都有万夫不当之勇，今夜必来劫寨，他若投降，你便引他来河阳。”果然到天近黎明，李日越领 500 骑来劫寨，见雍希颢整军站在栅门前，便问：“司空(李光弼)在吗？”雍希颢说：“昨夜已经走了。”李日越默然良久，对部下说：“今失李光弼，我必死了，不如投降吧！”雍希颢便领他去见李光弼，李光弼厚礼相待，当作心腹。高庭晖听到后，也来向李光弼请降。

诸将问李光弼：“降两将为何这样容易？”李光弼说：“史思明常恨不得野战，听说我在外，必以为可取。日越捉不到我，必不敢回。庭晖才勇胜过日越，听到日越被宠任，也就来归了。”众人都叹服。

史思明领军再攻河阳，李光弼登城观敌，对左右说：“贼兵虽众，但部伍不整，不足畏。不过日中，保证破贼。”命诸将出战。

到了日中，双方仍杀得难解难分，光弼召诸将来问：“敌阵何处最坚？”答：“西北方。”又问：“其次何处？”答：“东南隅。”光弼遂命部将郝廷玉率精骑 300 攻敌西北隅，又命论惟贞率精骑 200 攻敌东南方，并对诸将说：“你们看我令旗而战，我挥旗缓，任你们择利而战；我挥旗急，则万众一心，杀入敌阵，有进无退，违者立斩！”于是挥动令旗，命诸将出城再战。

战不多时，忽见郝廷玉回马奔逃，李光弼大怒，急遣人去取他首级。郝廷玉报告说因马中箭，否则怎敢后退，李光弼命回马再战。又过了一会，大将仆固怀恩父子倒退下来，光弼又遣人去取他父子首级，怀恩看到使者提刀奔来，慌忙和儿子拨转马头，硬着头皮冲向敌阵。李光弼连连挥动令旗，诸将一齐拼死向前，喊杀声震天动地。叛军支持不住，向后溃退。这一仗斩首千余级，俘虏 500 人，溺死者千余人，擒敌大将徐璜玉、李秦授，董秦率部投降官军。

史思明河阳兵败后退守洛阳，此后双方相持，互有胜负。史思明残忍好杀，部下稍不如意便命族诛，人人不能自保。史朝义是史思明的长子，常跟史思明在外打仗，很谦恭、爱士卒，将士多愿依附于他。但史思明不喜欢朝义，而爱小儿子朝清，

留他守范阳，并且常想杀了朝义，立朝清为太子。左右将士知道了他的心思，暗中告诉了史朝义。

有天晚上，史思明宿于鹿桥驿，令心腹曹将军领兵宿卫。史朝义住在旅店里，其部将骆悦、蔡文景对朝义说：“悦等与王死日快到了！请召曹将军来商议行大事。王若不许，悦等即刻投唐，王亦不能保全自己。”史朝义只是不响。

骆悦等把曹将军召来，与他商议行刺史思明。曹将军知道诸将都怨恨史思明，由不得他不答应。当天夜里，骆悦等带了300人到鹿桥驿，宿卫兵士虽感到奇怪，但害怕曹将军，都不敢阻挡。骆悦等进入史思明卧室，却不见史思明，喝问左右，左右早吓呆了，骆悦挥刀砍了几个，才有人说到厕所去了。骆悦等赶到厕所，仍找不到史思明，忽听墙外有马铃声，登墙一看，见史思明正要骑马逃走，忙一箭射去，正中思明，翻身落马，把他捆绑了，带到柳泉驿，用绳子勒死。

骆悦等返报史朝义，用毡裹了史思明尸体，送归洛阳。史朝义即皇帝位，秘密派人去范阳，命张通儒等杀了史朝清及朝清母辛氏，以自己的部将李怀仙为范阳尹、燕京留守。

史朝义自杀

宝应元年（762年）四月初五，太上皇玄宗病死，享年78岁。当时肃宗也患了重病，到了十八日，也两脚一伸，跟着玄宗走了。

四月二十日，广平王李俶即位，是为代宗。九月，代宗因仆固怀恩之女是回纥登里可汗的可敦，便遣怀恩出使回纥，重修旧好，并向回纥征兵讨史朝义。登里可汗开始时不答应，经

怀恩再三劝说，才同意派兵。

十月，以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约期诸道兵及回纥兵马在陕州会合，进讨史朝义。代宗想命郭子仪为副元帅，宦官鱼朝恩和程元振坚决反对，只好任命仆固怀恩为副元帅。

战事告捷，怀恩进克东京和河阳城，捉住史朝义的中书令许叔冀、王 伾等。怀恩留回纥军于河阳，遣子仆固瑒及朔方兵马使高辅成率步骑万余乘胜追击史朝义，到郑州，两战皆捷。史朝义逃到汴州，其陈留节度使关了城门不让他进去；朝义自濮州北渡黄河，其睢阳节度使田承嗣等领兵 4 万来与他会合，又被仆固瑒击败了，长驱进到昌乐（今河南南乐）东，朝义又率魏州兵来战，又被仆固瑒击败。于是敌邺节度使薛嵩向唐泽潞节度使李抱玉投降，敌恒阳节度使张忠老投降了唐河东节度使辛云京。

史朝义逃到莫州（治所在今河北文安县以西的鄆州），官军很快赶到。史朝义屡次出战，都吃了败仗，田承嗣要史朝义亲往范阳发兵来救，哪知史朝义前脚刚走，田承嗣便开门投降了官军。

这时史朝义的范阳节度使李怀仙也已投降了朝廷，并遣兵马使李抱忠领兵 3000 人镇守。史朝义逃到范阳，李抱忠关了城门不让他进城。史朝义派人去责问李抱忠，李抱忠说：“天不保佑燕，今既归唐，岂可反复。”史朝义要求让他饱餐一顿。李抱忠答应了，命人在城东设食供应，结果家在范阳的将士都要求回家，史朝义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让他们走了。史朝义吃饱了，带着数百胡骑东奔广阳（今北京市杨柳青），走到温泉栅，李怀仙派兵追来了，史朝义穷蹙无计，在树林中自缢而死，

被李怀仙取了首级献给朝廷。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到这时总算结束了。

第二节 唐朝的衰落

一、藩镇割据局面的出现

“安史之乱”后，河北诸镇多是安、史降将。代宗广德元年（762年），授张忠志为成德军节度使，赐姓名为李宝臣；薛嵩为昭义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李怀仙仍守故地，为幽州、卢龙节度使。他们收集安史余党，各拥劲兵数万，自任文武将吏，不向朝廷缴纳赋税。他们又与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平卢、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结成姻亲，互为援应，对付朝廷。代宗只求无事，一味笼络，但愿他们不生异心，不打算制裁他们。

代宗大历三年（768年）六月二十日，幽州兵马使朱希彩、经略副使朱泚与弟朱滔共谋杀了节度使李怀仙，朱希彩自称留后；不久，朱希彩又为部下所杀，代宗正式任命朱泚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大历八年（773年）正月，昭义节度使薛嵩病死，弟薛萼继任留后。九月，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公然为安禄山、史思明父子立祠，名为“四圣祠”，并上表求为宰相；代宗遣使命田承嗣拆毁“四圣祠”，同意加田承嗣同平章事。大历十年（775年）十月，田承嗣诱使昭义兵马使裴志清作乱，田承嗣佯

称救援，引兵袭取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阳），薛萼逃往京师。代宗派内侍到魏博晓谕田承嗣。要他各守封疆，田承嗣根本不睬，又派大将卢子期等攻占了洺州（治所在今河北邯郸东北）和卫州（今河南汲县）。

李宝臣和李正己一向被田承嗣看不起，便趁机上表请讨田承嗣；朱泚这时领兵到洺州保卫秋收，弟朱滔为留后，为了表示对唐室的忠贞，也奏请征讨田承嗣。于是代宗下令贬田承嗣为永州刺史，命李宝臣、朱滔与河东节度使薛兼训攻田承嗣的北面；李正己与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原名董秦）攻田承嗣的南面，从两面夹击魏博。

田承嗣虽然强悍，究竟寡不敌众，部下将士渐生异心，裨将霍荣国与裴志清先后投降朝廷；侄儿田悦领兵攻陈留，大败而回；骁将卢子期攻磁州，被李宝臣捉住，解送京师，枭首毙命。田承嗣惶急万分，便想了一条计策，派人带了魏博的户口、甲兵、谷物等簿册，送给李正己说：“承嗣已经八十六岁，就要死了，几个儿子都没有出息，侄儿田悦也是个无用之辈，今日魏博所有，还不是为你守着，你何必出兵来攻打我呢！”李正己中了计，便按兵不动。于是河南各道都不敢进兵魏博。

田承嗣消除了南顾之忧，专心对付北方。这时，代宗为了表彰李宝臣，派中使马承倩到成德慰劳，回京时，李宝臣到馆驿送行，赠给他 100 匹绢，马承倩嫌少，当着李宝臣部下的面，将绢丢在路旁，大骂而去。李宝臣又羞又气，兵马使王武俊就说：“今日大帅立了功，这小子还敢如此无礼，将来寇平之后，还不知怎样对待你呢！倒不如放了田承嗣，使朝廷还有所倚重。”于是李宝臣也引军而回。

田承嗣得到消息，又使一计，暗中派人到李宝臣的家乡范阳境内埋了一块石头，上面刻了“二帝同功势万全，将田为侣入幽燕”几个字，接着指使一个术士去向李宝臣说范阳有天子气，并装着望气，带了人到范阳把石头挖来送给李宝臣。李宝臣看了石头上的字，正不知是什么意思，恰巧田承嗣派人送信来，约他一同取范阳。李宝臣以为正应了石上的谶语，欣然同意。于是田承嗣陈兵边境，叫李宝臣先引精兵 2000 人袭取范阳。

朱滔因诸道退兵，也回军瓦桥，不防李宝臣引军袭来，仓促应战，以致大败，急忙令雄武军使刘怦往守范阳。李宝臣听到范阳有备，不敢轻进。田承嗣得悉李宝臣已与朱滔交兵，便引军南回，并派人去对李宝臣说：“魏州有惊报来，我不能跟你去取范阳了，石头上的谶文是我跟你开玩笑的。”李宝臣又羞又恼，无奈也只好回军。

大历十一年（776 年）二月，田承嗣上表请入朝谢罪。代宗下诏赦田承嗣罪，官复原职，准予他和家属一起入朝。五月，汴宋都虞侯李灵耀勾结田承嗣，杀了兵马使、濮州刺史孟鉴，自称留后，并效仿河北各镇，任命自己亲党为辖境内八州的刺史和县令。八月，代宗命淮西节度使李忠臣、永平节度使李勉、河阳三城使马燧、淮南节度使陈少游、淄青节度使李正己讨李灵耀。十月，李忠臣、马燧、陈少游与李灵耀大战于汴州城西，李灵耀军败，入城固守；田承嗣遣侄田悦领兵救灵耀，被李忠臣、马燧杀得大败，李灵耀连夜逃出汴州，在韦城被永平军将士杜如江捉住，解送京师处斩。

田承嗣看到汴州平定，怕朝廷派兵征讨，又上表朝廷，表

示悔改，代宗又赦免了他，并叫他不必要入朝了，李忠臣、李宝臣、李正己等看到田承嗣出尔反尔，狂悖无礼，朝廷也不能奈何他，便争相仿效。从此各镇割地自据，名为朝廷守土，实际上各自为政，朝廷再也无法对他们行使命令。

二、德宗平定藩镇叛乱的斗争

四王作乱

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二十一日，代宗病故；二十三日，德宗李适即位。

这时，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已死，侄田悦继任留后。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因贪财好色，被族侄李希烈和将军丁嵩等逐出淮西，逃往长安，李希烈便做了淮西节度使。接着，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病死，子李惟岳上表朝廷，请求袭职，德宗想要改革过去的弊政，没有同意。魏博节度使田悦上表为李惟岳说情，德宗仍旧不答应。田悦一怒，就与平卢节度使李正己一同连兵抗拒朝廷。李正己出兵8万屯曹州（治所在今山东菏泽以南）；田悦自己派兵马使康愔率兵8000人围困邢州（治所在今河北邢台），自己领兵攻临洺（今河北永年）；一面又联络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作为呼应，一同联兵发难。

惊报传到长安，德宗加封李希烈为南平郡王，兼汉南、汉北兵马招讨使，督兵讨梁崇义；令昭义节度使李抱真、河东节度使马燧、神策都将李晟率所部讨田悦。三路官军到了临洺，夹击田悦，田悦率军力战，终被击败，逃回魏博，邢州康愔也

解围而回。田悦遣使分头求救，恰巧李正己病死，子李纳擅领军务，遣兵万人援田悦，李惟岳也发成德兵 8000 人往援。田悦收集余众，又有兵 2 万，驻扎洹水。淄青兵在东，成德兵在西，首尾相应，军势复振。

马燧恐兵力不足，奏调河阳军相助，德宗命河阳节度使李芑率兵往会。马燧等屯军漳滨，不多几天，李芑领兵也到，马燧命诸军各带 10 天粮食，乘锐疾进，大破田悦军于恒水，田悦逃往魏州（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以北）。

这时，朱滔奉命进讨李惟岳，他先使人劝说易州（治所在今河北易县）刺史张孝忠归唐，联兵包围束鹿。李惟岳令兵马使王武俊为前锋，自督大军为后应，去救束鹿。王武俊本为李惟岳所不信任，到了束鹿，未战先退，等到李惟岳兵到，被朱滔、张孝忠杀得大败。李惟岳因此恼恨王武俊，要想杀了他，不料王武俊先发制人，与步军尉常宁抢先杀了李惟岳，向朝廷投降。德宗论功行赏，将成德军辖地一分为三，命张孝忠为易、定、沧州节度使，王武俊为恒、冀州都团练观察使，康日知为深、赵州都团练观察使，还有德、棣 2 州划给朱滔，并令朱滔仍回范阳。

王武俊自认功劳在张孝忠之上，而官职反不如张孝忠，心里很不高兴；朱滔因求深州（治所在今河北深县）没有得到，心里也不高兴，田悦知道了这事，便派人去诱说朱滔和王武俊，彼此定了密约，互相联络，反抗朝廷。接着，田悦又拉拢了李纳参加。于是朱滔即率步骑 2.5 万进军深州，王武俊率步骑 1.5 万取元氏（今河北元氏），然后两路会师，同援田悦。

德宗得到朱滔、王武俊叛变的消息，授郭子仪部将李怀光

为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已病死),命他率领朔方军往河北讨田悦、朱滔。李怀光领兵到了河北,正好碰到朱滔、王武俊联兵救魏,列营愜山,便想趁他营垒未就冲杀过去,马燧劝他暂且休息,待敌营成之后,寻他的破绽再行攻击。李怀光不听,麾兵掩杀过去,杀毙敌军千余人,朱滔军溃散,士卒争入敌营抢夺东西。正在这时,王武俊引 2000 骑横冲过来,将李怀光军冲成二截;朱滔又引兵杀了回来,官军大败,被逼跳进永济渠中溺死的不计胜数。马燧等急忙收军,坚守营垒,才压住了阵脚。

当天夜里,朱滔等引永济渠水来淹官军,截断官军的粮道和归路。马燧害怕了,只好派人去向朱滔说好话,请让他和诸道节度使回本道,然后奏请皇上将河北诸事都委任他处置,朱滔答应了。马燧等领兵渡过河西,退保魏县再拒朱滔,朱滔知道上了当,只得与王武俊也领兵屯于魏县东南,与官军隔水相拒。

田悦为了感谢朱滔救援,与王武俊商议,要奉朱滔为主,朱滔不同意,说:“愜水之捷,都是王大夫之力,朱滔怎敢独居尊位!”于是幽州叛官李子干、恒冀叛官郑儒等一同商议,要三人与李纳(李正己已死,子李纳擅自袭位)一同称王而不改年号,如列国时诸侯奉周王一样。朱滔等认为有理,当下筑坛告天,歃血为盟,朱滔为盟主,自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李纳称齐王。

这时李希烈已破襄城,梁崇义投井自杀,德宗命李希烈兼任平卢、淄青节度使,专讨李纳。哪知李希烈早有野心,他把节度使治所迁许州(治所在今河南许昌)后,就派亲信去见李纳,约他一同偷袭汴州;一面遣人通知河南都统李勉,说自己已兼

领淄青，要借道赴镇。李勉知道他不怀好意，表面上修桥铺路，准备迎接，暗中却加强戒备，以防不测。李希烈探知李勉有备，便不敢去袭汴州，秘密派人与朱滔等联系。朱滔等知李希烈军势很盛，遣使去许州，上表称臣，劝李希烈称帝。李希烈虽然没有称帝，但自封为天下都元帅，公开叛变了朝廷。

朱泚称帝

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八月，李希烈领兵3万围襄城，德宗征发泾原诸道兵救襄城。十月初二，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泾卒5000冒雨赶到长安。当时军士出征，朝廷都有赏赐，所以泾原将士多带了子弟到京，希望得到厚赏，以便带回家去。哪知到京城后，竟一无所赐，京兆尹王翊前来犒军，也只有些粗劣的饭食，军士气得把饭菜泼在地上，用脚乱踩，大骂说：“我们冒死去打仗，连饭都不让吃饱，怎么去跟敌人拚搏！听说琼林、大盈二库内金帛多得放不下，不如我们一同去取。”当下一呼百应，一同向城里拥去。

德宗闻讯，慌忙命普王李谊和翰林学士姜公辅去安抚乱军；一面令神策军使白志贞速带禁兵来防御。哪知乱军根本不听劝说，而白志贞所招募的禁兵，多是虚名，到要紧关头竟没有一个人应召前来。德宗吓慌了，急忙带了王贵妃、韦淑妃、太子、诸王及唐安公主等，从后苑北门逃出京城，连后宫、诸王、公主也来不及通知，竟有十分之六七没有逃出来。

途中，姜公辅对德宗说：“朱泚因弟朱滔谋逆，一直闲废在京城居住，他曾做过泾原节度使，今乱兵如奉他为主，事情就更复杂了。请快召他同行，或者派人将他杀了，以防后患。”

德宗心慌意乱，也不加考虑，说：“现在来不及顾他了！”说罢，挥鞭策马逃往奉天去了。

这时，乱军已进了丹凤门，一拥登上含元殿，大掠府库。附近百姓也乘乱进宫，窃取财物，数里外都听得见喧哗吵嚷的声浪。姚令言见自己弹压不住，想到朱泚住在长安，就和泾原将士商议，要请他出来维持局势，将士都同意了。

这天半夜，朱泚来到含元殿，自称暂领大军。次日一早，贴出告示，百官方知德宗已逃出京师，由朱泚出来维持，他们有的去追踪德宗，有的便来见朱泚。光禄卿源休因怨恨德宗，便劝朱泚称帝，朱泚虽然愿意，但一时还有点犹豫不定。源休知道检校司空李忠臣、太仆卿张光晟、工部侍郎蒋镇、太常卿敬钊等都怨恨德宗，便去诱说他们一同劝朱泚称帝。这些人都想攀龙附凤，想做个开国功臣，一拍即合。

朱泚知道司农卿段秀实威望很高，但一直得不到德宗的信用，估计他一定能拥戴自己，便派人去请他。段秀实来后，朱泚很高兴，便问他眼前该怎么办？段秀实说：“你素有忠义之名，当前应说服军士，迎还皇上，这是莫大的功劳！”朱泚听了，心里虽然不高兴，但因段秀实一直是为德宗不信任的，还是把他当成了自己人。

左骁卫将军刘海宾、泾原都虞侯何明礼、孔目官岐灵岳，都是段秀实的好朋友，段秀实表面上与朱泚周旋，暗中与刘海宾等商量谋除朱泚，迎德宗回京。

十月初七，朱泚派泾原兵马使韩旻领精兵 3000 人，扬言去接德宗回京，实际上想偷袭奉天，除掉德宗，以便自己篡位。段秀实知道了这情况，马上与岐灵岳商议，要他偷了姚令言的

兵符，派人追上韩旻，命令他领兵回长安。韩旻回到长安，朱泚、姚令言吃了一惊，查问原因，知道是岐灵岳所为，便把他杀了。岐灵岳一直到死，痛骂朱泚不绝于口，但绝不提到段秀实。

当天，朱泚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段秀实等商议称帝之事。段秀实再也按捺不住一腔怒火，勃然而起，夺过源休手中朝笏，唾了朱泚一口，大骂道：“狂贼，我恨不得把你碎尸万段，岂能跟你造反！”举笏就向朱泚头上砸去，朱泚急忙用手来挡，额上已被砸了一下，打得鲜血直流。紧接着，段秀实一把揪住朱泚，举笏乱打。左右的人一时都惊得呆了，不知道怎么办，还是李忠臣先醒悟过来，慌忙上前帮助朱泚，拉住段秀实，朱泚才得脱身。段秀实知事不成，便大声向朱泚党羽说：“我不跟着你们造反，为什么不早杀我！”众侍从这才一拥而上，举刀乱砍。朱泚一手按住额上伤口，一面摇手制止说：“这是义士！不可杀他。”其实段秀实早已死了。朱泚哭得很伤心，用三品官的礼义安葬了段秀实。后来刘海宾、何明礼也因谋杀朱泚不成，都被朱泚杀害了。

十月初八，朱泚自称大秦皇帝，以姚令言为侍中、关内元帅，李忠臣为司空兼侍中，源休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蒋镇为吏部侍郎，立弟朱温为皇太弟。源休劝朱泚剪除唐王朝在京宗室，于是杀唐宗室郡王、王子、王孙、公主等 77 人。

困守奉天

德宗到了奉天，百官陆续到来。十月初五，左金吾大将军浑瑊抵达奉天。浑瑊素有威望，他的到来，使大家心里安定了。

不少。德宗任浑瑊为京畿、渭北节度使，白志贞为都知兵马使，一面颁诏征发就近各道兵来奉天勤王。泾原留后冯河清和判官姚况得悉劲卒作乱，德宗逃往奉天，召集将士，激以忠义，发甲兵、器械百余车，连夜运往奉天。这时德宗已派人在奉天招募了兵卒 5000 余，正苦于没有兵器，一下子运来了这许多军械，士气为之大振。德宗任命冯河清为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姚况为行军司马；同时派人去河北行营，命李怀光领兵回长安，马燧、李芄各引兵归镇。

十月十三日，朱泚以姚令言为元帅，张光晟为副元帅，以李忠臣为京兆尹、皇城留守，自统大军进逼奉天。邠宁留后韩游环，庆州刺史论惟明接到诏书，立即引兵 3000 到奉天。韩游环等前脚刚到，朱泚随后便至。浑瑊、韩游环与叛军血战了一天，朱泚兵不退，并且来夺城门，恰巧城内有几辆草车，浑瑊命将草车塞住城门，纵火焚烧，又命军士都用长刀，乘火击贼，叛军才退走。

朱泚围困奉天，已将近一月，城中粮食已尽，每到夜里，便用绳索把人缒到城外去挖一些芜菁和萝卜来充饥。德宗看到这情形，伤心地对公卿和将吏说：“朕无能，自陷危亡，这是我自作自受。你们无罪，还是早点投降了吧。”郡臣都叩头流涕，愿尽死力，所以将士虽困苦危急，而锐气不减。

这时，各路勤王兵相继西来，神策行营节度使李晟从蒲津渡过黄河，屯兵于东渭桥，开始时只有士卒 4000 人，因他善于抚御，与士卒同甘苦，不多几天，就增至万人；神策兵马使尚可孤领兵 3000 人，自武关入援，屯于蓝田；镇国军节度使骆元光领兵 2000 人，屯于昭应；马燧遣行军司马王权领兵 5000 人屯

于中渭桥，几路官军都已逼近长安，李忠臣等屡次出战，都被官军杀败，只好向朱泚求救。

朱泚因担心长安，一面派兵支援，一面争攻奉天，他叫和尚法坚设计制造了一架又高又大的云梯，用兕皮裹了，下面装上大轮子，上面可以载 500 人，城中人看到了，都非常恐惧。代宗问郡臣以何计可破？浑瑊说：“臣看云梯很重，重则容易陷，臣请凿地道，积薪蓄火以待。”就估计云梯将要经过的路，便在城东北隅，挖了一条长 30 步的地道，堆放了许多膏油松脂芦苇，专等云梯前来。

十一月十四日，朱泚派大军攻南门，攻城的叛军大喊大叫，声势很大，但并不真正拚命。韩游环说：“此乃声东击西之术。”引兵严防东北。十五日，北风呼啸，气候寒冷，叛军推着云梯果然来攻城东北了，云梯上铺着湿氈，挂着水囊，载着军士；云梯前又有攻城的战车，军士藏在车下，抱薪负土填平堑壕前来。那云梯高 90 尺，比城墙高了许多，云梯上的军士踞高临下，矢石如雨向守城官军射来，官军死伤不计其数。德宗看到这种形势，急得和浑瑊相对而哭，群臣也只有对天祈祷，请求皇天保佑。

当时官军又冷又饿，又缺乏甲冑，浑瑊以忠义激励大家，将士们都视死如归，拚死血战。浑瑊身上中了流矢，他无暇裹伤，仍坚守岗位，奋战不退。正苦战时，敌军云梯的一个轮子陷进地道里，既不能进，也不能退，官军从地道中放火烧云梯，城上的官军欢声震地，纷纷将干柴、松脂、油膏投向云梯，熊熊烈火，越烧越旺，须臾之间，云梯上的军士都被烧成灰烬，焦臭之气，几里路外就能闻到。于是东、南、北三面官军一齐杀出城

来，太子李颂亲自领兵督战，叛军大败，死伤数千人，官军将士有受伤的，太子亲自给他裹伤。

这时，李怀光已从蒲城引兵到泾阳，先派兵马使张韶化装成老百姓来奉天。张韶到达奉天时，正值叛军攻城，被叛军抓去和老百姓一起填堑壕，等到叛军退走后，张韶跳过堑壕直到城下大喊：“我是朔方军使者，快缒我进城。”城上急忙放下绳子将张韶缒上城时，身上已经中了数十箭。张韶从内衣中取出表文交给德宗，德宗大喜，派人抬着张韶，绕城一周，告诉大家，李怀光的军队快到了。城中欢声雷动。

十一月二十日，李怀光军在泂泉击败叛军，朱泚闻讯大惊，急忙引兵逃回长安。当时，大家认为，如果李怀光军再有3天不到，奉天必被攻破。朱泚既退兵，百官都向德宗祝贺。泂滑行营兵马使贾隐林竟批评起德宗来，说陛下性子太急，不能容人，如果不改，必定还有忧患，德宗也不怪罪他。

今年年底，德宗听从了陆贽的意见，下诏谴责自己，说国家的祸乱都因自己缺德少才，领导无方，致使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疑惧。正月初一，大赦天下，改元兴元。除朱泚外，一律既往不究，赦免无罪。于是王武俊、田悦、李纳等皆去王号，上表谢罪。只有李希烈自恃兵强财富，不肯归顺；朱温因朱泚缘故，也没有归顺。

梁州避难

李怀光生性精鲁，从河北来奉天途中，几次对人说起宰相卢杞、赵赞、白志贞都是奸佞，天下的祸乱，都是这几个家伙造成的，准备见了皇上，一定要请皇上诛戮此三人。奉天之围

既解，李怀光自恃功高，皇上必然厚礼相待，不料卢杞早就想好对策，建议德宗：“怀光勋臣，社稷栋梁，今贼徒新败，惊心未定，一举可以收复长安。如果让李怀光来天朝见，皇上必当赐宴，有几日耽搁，使贼得以从容戒备，那时便难取了。”德宗以为有理，颁诏令李怀光引军屯便桥，与李建徽、李晟及神策兵马使杨惠元立刻进取长安。

李怀光认为自己赶了数千里来勤王，破朱泚，解重围，而在咫尺间不能得见天子一面，心里气愤得不得了，对人说：“我今被奸臣排挤，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便引军回咸阳，不再前进。他在咸阳几次上表德宗，历数卢杞等人罪恶，要德宗处分卢杞。在朝群臣也都议论纷纷，揭发卢杞嫉贤忌才，误国害人。德宗不得已，只好贬卢杞为新州司马，白志贞为恩州司马，赵赞为播州司马。

李怀光胁迫德宗驱逐了卢杞等，内心很不安，怕将来德宗治他的罪，便心生异志。他见李晟独当一面，怕他成功，就奏请德宗与李晟合军，有心要吃掉李晟，德宗怕得罪李怀光，竟然也同意了。

当李晟引军来到咸阳西陈涛斜与李怀光会师时，忽然叛军大队人马叫喊着杀了过来，李晟见了，对李怀光说：“如果贼兵固守，我们不易攻打；今贼离开巢穴，敢来求战，真是天赐我军成功，机不可失，请明公速作决定，趁机歼敌。”李怀光心存异端，不愿歼敌，说：“我军刚到，马未喂，军士也没有吃饭，怎么可以急急忙忙出兵，宜赶快树栅扎营。”李晟不得已，只好扎营坚守。

李怀光屯军咸阳，一晃就是1个多月过去了，德宗几次派

人来催促他进军，李怀光总是推托军士疲劳，须要好好休息，暂时不宜出战，其实他暗地里已经派人去与朱泚联系，讲好两人平分关中，互作援应。

这时，吐蕃军应唐廷的征召，屯军邠州，德宗派崔汉衡去与吐蕃军联系，要他发兵助攻朱泚，吐蕃丞相尚结赞说：“按照吐蕃的规矩，要他们发兵，必须有主兵大臣签署为信，今制书没有李怀光的署名，他们不敢发兵。”德宗命陆贽去见李怀光，要他签署，李怀光坚决不同意，说吐蕃出兵有许多患害。陆贽一再劝说，李怀光只是不肯签署。

李晟几次劝李怀光攻长安，李怀光不同意，李晟担心被他吞并，屡次奏请移军东渭桥，德宗怕触怒李怀光，迟迟没有批准，经陆贽一再陈以利害，方才批准。

兴元元年（784）二月二十日，德宗想亲领禁兵去咸阳，促诸将进攻长安。消息一传开，就有人对李怀光说：“这是汉高祖游云梦擒韩信之策啊！”李怀光听了很害怕，加速了谋反的步骤。二十三日，德宗加李怀光为太尉、赐铁券，遣使向李怀光宣旨。李怀光当着使者的面，把铁券丢在地上，说：“皇上猜疑怀光呀？人臣反，赐铁券；怀光不反，今赐铁券，是逼我反呀！”朔方左兵马使张名振看到这情形，气愤得在军门前大叫：“太尉放着叛贼不击，待天使不敬，果欲反呀！我今日必以命相拚！”李怀光竟命左右拉去杀了。

使者回到奉天，把怀光傲慢行为奏闻德宗，德宗这才惊慌起来。正在这时，又传来急报，李怀光杀了与他联营的杨惠元，吞并了他的军队，声称已与朱泚连和，叫皇上快点远避。正说时，韩游环来见德宗，呈上李怀光约他作内应的密信。并要德

宗赶快下诏夺李怀光的兵权，同时传檄各道兵马，不要再遵李怀光的调动指挥。

二月二十六日，李怀光遣部将赵升鸾潜入奉天，要他联络原来的朔方将士在当天晚上烧乾陵，并作为内应，活捉德宗。赵升鸾到了奉天，就向浑瑊自首了。浑瑊急忙奏闻德宗，并劝德宗移驾梁州。德宗同意去梁州（今陕西汉中），命浑瑊发布戒严令。浑瑊出来传布德宗命令，命戴休颜守奉天，随后整顿部众，带领文武百官，簇拥着德宗，出了奉天城西门，向梁州进发。

李怀光听到德宗逃走，急派部将孟保、惠静寿、孙福达率精骑赴南山拦截，走到盩厔，遇到运粮使张增，四将一同商量，决定拖延时间，让德宗从从容容逃出了骆谷关（在今陕西周至南），回去以追不上回报了李怀光，李怀光无可奈何，只好将四人撤职。

收复长安

当时李晟处在李怀光和朱泚两个强寇之间，内无资粮、外无救援，他以忠义激励将士，因此虽然军势单薄，但锐气不减。李晟一面写信给李怀光，劝他立功补过。李晟又任命判官张戣为京兆尹，选择了40多人，督收渭北赋敛，不到10日，就收到许多粮草。于是李晟慷慨誓众，决心扫平叛乱，收复长安。

兴元元年（784年）四月初四，德宗加职李晟为鄜坊、京畿、渭北、商华副元帅。李晟和神策军的家属都在长安，朱泚很照顾他们，还派了李晟的亲信家人送信给李晟，说家里人都很好。李晟大怒，说：“你敢替逆贼来做间谍！”立刻将他斩首。

四月初十，浑瑊率诸军出斜谷，崔汉衡劝吐蕃出兵相助，尚结赞推托邠军没有出战，韩游环听说，便遣将曹子达领兵3000人去会浑瑊，尚结赞也遣将论莽罗依领兵2万相随。

曹子达和吐蕃军赶到武功，正逢浑瑊与朱泚大将韩旻交兵，便纵兵大杀，斩敌万余，韩旻大败而逃。浑瑊进军奉天，与李晟东西相应，进逼长安。

五月二十日，李晟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接着便引兵到长安的通化门外。李晟召集诸将商议作战计划，诸将都说：“先取外城，抢占坊市，然后进攻宫阙。”李晟摇头说：“坊市狭隘，如果发生巷战，居民惊慌，必定混乱，于官军不利。现在叛军重兵屯驻苑中，若从苑北进兵，捣贼心脏，贼必崩溃。如此则宫阙不遭破坏，居民不受惊扰，这才是上策！”诸将都极口称好。于是李晟便遣使告知浑瑊、骆元光、尚可孤，约期在长安城下会合。

五月二十五日，李晟移军于光泰门外米仓村，次日，朱泚骁将张庭芝、李希倩引大军到来，李晟对诸将说：“我本来担心叛贼躲在城里不出来，今自来送死，机不可失！”命兵马使马洗等纵兵迎击，大败叛军，乘胜进光泰门，叛军退入光华门。二十八日，李晟遣牙前将李演及牙前兵马使王佖领骑兵，牙前将史万倾领步兵，直抵苑墙神麋村。李晟于隔夜已派人挖开苑墙200步，等到李演等带兵到时，叛军已树木立栅堵住了，并从木栅间刺射官军，官军不敢前进。李晟大怒，斥责将士不敢战斗，于是史万倾先进，拔去木栅，冲入苑内，王佖、李演带领骑兵继进，叛军大溃。

姚令言等还负隅顽抗，李晟命决胜军使唐良臣等步骑一

齐向前，叛军支持不住，姚令言保着朱泚率领余众万余，向西奔逃。当天，浑瑊、戴休颜、韩游环等也攻克咸阳，听到朱泚西逃，分兵截击。

朱泚逃到泾州，随从只有 100 余骑，泾州节度使田希鉴闭门不让他们进城。朱泚说：“你是我任命的节度使，为什么在我危难的时候忘恩负义？”田希鉴把节度使的印符丢进火中说：“我还给你！”朱泚的随从看见，都伤心得哭了，就有人杀了姚令言，向田希鉴投降。朱泚与亲兵、宗族和宾客继续向北逃窜，逃到彭原西城屯，部将梁庭芬射杀朱泚，韩旻等割了他的首级，到泾州投降了。

六月初四，李晟遣掌书记于公异赶往梁州向德宗报捷：“臣已肃清宫禁，拜谒陵庙，一切如旧，并无损坏。”德宗听说，感动得哭了：“天生李晟，是为了社稷，不是为了我呀！”六月初十，德宗授李晟为司徒、中书令，浑瑊为侍中，韩游环、戴休颜、骆元光、尚可孤等都升了官。当天，德宗下诏改梁州为兴元府，并准备动身回长安。

七月十三日，德宗回到长安，浑瑊、韩游环、戴休颜率众从凤翔一直护送到长安；李晟、骆元光、尚可孤率众出城迎接，步骑共 10 余万，旌旗数十里。李晟谒见德宗于三桥，先贺平贼，后谢收复之晚，伏在路旁请罪。德宗勒住马安慰了一番，命左右把李晟扶上马，一同进城。

第二年就是贞元元年（785 年），这年的八月十二日，李怀光终因众叛亲离，走投无路，在河中自缢而死。在他死后不久，李希烈也被部将陈仙奇毒死，举众向朝廷投降。朱温也向朝廷投降了。这一场藩镇叛乱虽然平定了，但割据的局面仍未彻底

解决,甚至愈演愈烈,直到唐王朝的灭亡。

三、宦官专政

永贞革新

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的形势和中晚唐的历史相终始。割据状态的存在,造成国家的分裂,阻碍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给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劳动人民反对割据;地主阶级的多数人士和商人也反对割据。从这点来看,唐朝政府要发愤图强,恢复统一,是符合人心所向的,并非没有可能。问题是朝廷内部积弊太深,宦官专权,大臣朋党纷争,成为不治之症。它们又与藩镇割据交织在一起,更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混乱。

中国古代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宦官专权的问题,唐代也很严重。专制君主最相信亲近的奴才,这是宦官掌权的根本原因。唐德宗即位之初,很想有番作为,曾经疏斥宦官。但是经历了几次变乱之后,对文臣武将,都丧失了信心,结果仍然走进了与宦官共治天下的死胡同,愈陷愈深。兴元元年(784年)以宦官窦文场、王希迁为监神策军左、右厢兵马使。贞元十二年(796年),又以窦文场、霍仙鸣为左右神策护军中尉。宦官领兵,成为制度。军队是国家机器中最强有力的部分。宦官掌握了兵权,慢慢地连皇帝本人的生死废立,也操在手中了。

宦官的专横带给人民的灾难,是异常沉重的。德宗时,宦官广占长安的“甲舍名园,上腴之田”,掌握了京畿一半的土地。“宫市”是最能说明宦官残酷地掠夺人民的事情。所谓“宫

市”就是宦官出外采购宫中用物。开头还只低价强买，后来索性派一批人，叫做“白望”，看中什么，便要什么。他们有时付1/10的代价；有时还要向货主勒索什么“进奉门户”和“脚价银”。

这时地方藩镇拥兵割据，中枢宦官弄权自恣。政治腐败、民怨沸腾，阶级矛盾越来越严重。地主阶级中比较有见识的一部分人士，希望改变这个局面，挽救唐王朝的统治，于是有了王叔文改革的运动。

王叔文(753—806年)，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出身寒门。旧史说他以棋艺进身，侍读东宫，成为太子李诵(顺宗)的心腹。

王叔文结纳了许多人才。与他同时伴读东宫的有王伾，此外以韩泰、韩晔、柳宗元、刘禹锡、陈谏、凌准、程异、韦执谊八人，最为有名。改革失败后，八人都被贬为边远地方的司马，后人叫做八司马。此外还有吕温、陆质、李景俭、房启、李谅等，也和叔文志同道合。这些人各有所长。后人最熟悉的柳宗元、刘禹锡两人不仅长于诗文，而且都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叔文认为这两个人的才力都可以做宰相。程异善于理财，他管江淮赋税，着重整顿工作，避免多增加人民负担。八司马后来只有他再受重用，就因为宪宗要借重他理财的本领。吕温识见颇高，他写过一篇《诸葛武侯庙记》，认为自汉末以来，人心厌恶汉朝，诸葛亮兴复汉室的口号，不受群众欢迎。

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德宗去世，太子继位，王叔文领导的改革开始了。

这次改革，从一开始就显得软弱无力。顺宗不能打破传统

势力的束缚，因二王资历太浅，只能任资格较老、出身名门的韦执谊做宰相。王叔文以翰林学士的名义，负实际的领导责任。翰林学士要为皇帝起草文件，可起“内相”的作用。但是这种做法，毕竟削弱了运动的声势。

新朝廷采取了一些措施。

京兆尹李实是个民愤极大的酷吏。顺宗下诏把他革职贬逐。长安人民听见这消息，顿时轰动开了，大家高兴得欢呼赞叹。许多人拾了砖头石子，候他出衙，想给他吃点苦头，出口恶气。这个家伙知道了，只得偷偷地从小路溜走。

政府下诏宣布停止宫市，长安人民又高兴了一阵。

政府还把禁闭在深宫里的宫人和教坊女妓 600 人，释放回家。下令免除欠税，禁止官吏在正税以外的额外进献。这些措施都受到人民的欢迎。但是它们只是些枝节问题，真正要改革朝政，就必须把兵权和财权接收过来。

财权不难解决。王叔文解除李锜诸道盐铁转运使的职务，请宰相杜佑兼领，自任副使，掌握实权。

争夺兵权是成败的关键。当时宦官的首领是俱文珍，做中尉统兵的是杨志廉、孙荣义。王叔文用移花接木之计，任命老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军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韩泰为副使。这道命令不涉宦官一字，而使神策军脱离中尉管辖，改归范、韩二人统率。这着走通了，对付俱文珍之流便易如反掌了。可是那些宦官门下走狗的将领，纷纷向中尉投状，说要改受范希朝的管辖了。宦官大怒，密令诸将拒绝服从政府命令。范希朝到了行营，诸将不来参见。王叔文知道了，无法可施，只有叹息而已。

同年七月，俱文珍等勾结看不起王叔文等的大官僚，以顺宗久病为理由，宣布由太子李纯监国。八月下诏禅位，诏书上必须用顺宗的年号，不好再用贞元，才改元永贞。这幕政变完全是宦官制造的。

接着，王叔文、王伾和他们的同道纷纷被贬。王叔文被降为渝州司户，在第二年处死。改革运动完全失败了。

元和中兴

安史之乱平定后，中央权力日益衰落，形成藩镇与中央抗衡的局面，一些强大的藩镇拥有重兵，自署将吏，不输贡赋。肃、代两朝的姑息，造成严重的后果，德宗时的四王二帝之乱，充分显示了藩镇的跋扈，顺宗时曾利用王叔文等人锐意改革，以图振作，亦未成功。宪宗即位之初，面临的是各种矛盾交错发展的、危机严重的局面，宪宗注意吸取前代的经验教训，抓住有利条件，立志削藩，于是出现了一段中兴局面。

元和元年（806年），针对方镇帅守除授不由中央及不入谢、不朝觐的现象重申法令，令诸镇入阁拜谢。与此同时，乘机更换方镇帅守，以防帅守久居一地，发展地方势力，当时被更换的帅守30镇，不仅有东、西南地区的帅守，也有西北及中原的方镇，从而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朝廷的易镇措施遭到了一些方镇的抵制，西川刘辟拒不受征入朝，并出兵侵扰它镇。夏绥节度使韩全义入朝后，其甥杨惠琳自为帅守，拒绝朝廷任命的节度使入境。浙西的李锜起初佯求入朝，既而又拒绝入觐。在方镇帅守纷纷入朝易镇的形势下，昭义的卢从史、忠武的刘昌裔、宣武的弘等中原方镇却保持静默观望态度，而河南、河

北的强藩更倚仗地理、军事和财政的优势，维持割据状态，不为朝廷法令所动。所以中央要想重振朝廷威望，必须改变贞元以来害怕藩镇生事而一味姑息的态度，实行武力削藩。宪宗根据各方镇与中央政治、军事、经济关系以及势力对比优劣的差异采取了不同的对策。

永贞元年（805年）八月，西川节帅韦皋死，留后刘辟使诸将表求节钺，朝廷不许，派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袁滋为西川节度使，征辟为给事中，刘辟拒不受征；阻兵自守，朝廷不得已，想用妥协的办法换取暂时的安定，遂以刘辟为西川节度使，知节度事。刘辟并不满足，在要求兼领三川遭到拒绝以后，发兵围攻东川节度使李康，企图以武力达到割据三川的目的。在宰相杜黄裳的坚持和策划下，宪宗下诏讨辟，以崇宗文领兵。伐蜀战争进行了8个月，刘辟兵败被俘。在刘辟发动叛乱的时候，夏绥节度使韩全义以出征无功、骄蹇不逊被责令入朝，以李演为夏绥节度使。杨惠琳据城对抗，请继其舅韩全义为节度使。朝廷诏发河东、天德兵平定叛乱，不久，杨惠琳为夏州兵马使张承金所杀。

西川、夏绥两镇是关系边镇安危，以至长安安危的重要军事重地，西川一向担负着“抚蛮夷”、“殿邦国”的重任，是“宰相回翔之地”，夏绥也是防范西北边镇的要镇。在贞元朝的姑息下，西北边镇兵士动乱擅自废立节帅的事屡有发生，说明对西北控制的松弛。宪宗首先对西川、夏绥用兵，正是考虑到两镇的军事地位和作用，同时也考虑到西北边镇上有神策军监制，西川也非反侧之地，对两镇反叛的兵力中央有胜利的把握，所以，首战两镇并大告成功。

朝廷平定夏、蜀之后，藩镇气焰开始收敛，纷纷要求入朝。元和二年（807年），镇海节帅李锜亦不自安，迫于形势要求入朝，但并无诚意，不久阴谋败露，遂发生叛乱。宪宗以淮南节度使王锬为诸道行营兵马招讨处置使统领淮南、宣歙等道之兵进讨。李锜以宣州富饶，想首先攻取，派兵马使张子良、李奉仙、田少卿将兵 3000 袭击。三人与牙将裴行立同谋倒戈，李锜被解送长安处死。李锜的平定，使东南财赋重地获得安定，中央的财赋来源得到了保证，在以后平定淮西的战争中，浙西殷富的财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淮西是浙西平定后的下一个讨伐目标，虽然有一些方镇入朝，受制于中央，但河南、河北诸镇以及宣武、昭义、忠武等少数帅守仍保持独立的状态，削藩如不指向这些强藩，势必无法解除朝廷的腹心之疾。为了对付强藩，宪宗决意讨伐淮西。淮西与中央的对抗在李希烈时已然开始，李希烈参与卢龙、成德、魏博、淄青四镇叛乱，自称禁帝。李希烈死后，吴少诚继为节度使，派兵袭击唐州、许州，德宗合兵进讨，屡为所败。元和 4 年（809 年）吴少诚死，吴少阳自为留后，后受命为节度使。九年，少阳卒，其子吴元济自总兵柄，不迎敕使，发兵四出侵掠。朝廷以淮西擅自继袭，肆行寇掠之故下令征讨。以严绶为申、光、蔡招抚使，督诸道兵进讨。平淮西是元和中兴大业中关键性的一战，从元和九年到十二年，战争进行了四年，中央调动了全部人力和物力，战争比以往艰巨得多，淮西经过李希烈以后 30 多年的经营，形成了一个拥有相当战斗力的武装集团。吴元济的叛乱，得到了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的支持，为了共同的利益他们南北呼应，极力破坏并阻止朝廷

的平乱。李师道在元和元年为节度使以后，表面归顺唐王朝，暗中却和河北诸镇相勾结，和王承宗上表请求赦免吴元济，遭到宪宗的拒绝以后，就发兵遣将，以助官军讨吴为名，派人在各地进行扰乱破坏活动，以行援助吴元济之实，如焚河阳转运院仓库，入京刺宰相武元衡，砍伤裴度，企图打击主战派。宪宗支持以裴度、武元衡主持讨伐事宜。元和十二年（817年）夏，裴度自请督师，时值淮西连年交战，粮食缺乏，军心动摇，降唐者多为唐军效力。十月，唐、邓节度使李愬在降将李祐的引导下，雪夜奇袭蔡州（今河南汝南），李愬将 9000 士兵分为 3 队，以训练有素的士兵 3000 为前锋，以 3000 人殿后，急行军 130 里，到达州城，大破吴元济，元济被俘获，淮西遂定。对淮西用兵的胜利提高了唐廷的威望，淄青李师道、横海程权、成德王承宗、幽州刘总相继归服，李师道也被部下所杀。至此，长期割据的藩镇表示服从中央，使自广德以来 60 年间藩镇跋扈 30 余州的局面有了很大的转变。

为了武力削藩，保证军费开支的供给，宪宗着手在财政上进行一些改革。首先是改革了榷盐法。元和初年，李巽为盐铁转运使，将隶属于浙西观察使的堰埭收归盐铁转运使，罢除江淮因循权置的公私堰埭，这是维护国家专利的重要措施。此外，以实估计算盐利，并进而强调除盐本外所得之利悉归度支，将东南盐铁财赋计入国家岁收，统一支配。李巽又整顿了漕运，以便将所征财赋顺利运往中央。为了改变方镇利用实估、虚估的差价进行盘剥、聚敛，以至对所属州税外加征的现象，宪宗采纳了裴埴的建议，对现行的赋税政策进行改革。元和三年（808年）宣布：天下留州、送使物一切按省估折纳赋

税,不能随意征纳现钱和贱价折纳匹缎。其次,规定节度使、观察地所治州征税,不足时方可征所属的其余州。为了贯彻改革税法的方案,中央派两税使到江淮以南财赋之地监督执行。又采纳李绛等人建议,在振武军、天德军开营田,以资军费。出宫人,绝地奉,禁南方掠卖奴婢,以及并省内外官,节省开支,等等。宪宗在政治、经济几方面的改革,使唐后期形成的藩镇跋扈,全国分裂,中央政权衰微的政治局面出现了转机,元和朝统治出现的新局面,被史家誉为“元和中兴”。

从元和到长庆

宪宗(李纯)即位以后,用亲信宦官吐突承璀做左神策中尉,对他特别信任。臣僚们讲宦官坏话,他总是不听。监察御史元稹,在驿站中与宦官刘士元冲突,被他用马鞭打伤了脸,事后反被贬官。这说明朝政依旧,并没有什么改变。但是宪宗对于藩镇,却不愿姑息,很想用武力削平。这在元和年间(806—820年)是有些成效的,使得藩镇割据的局面基本上结束了。

然而唐朝的天下并没有太平,藩镇只换了几个大头子,各镇的武装集团,依然如故。将校是当地的地主,世代以军官为职业。兵士都是当地的土著,其中一部分的亲兵受到优厚的待遇,成为将校的心腹爪牙。他们也每以当兵为世业,与将校有深厚关系,不肯随便更动隶属关系。军阀割据的社会根源仍旧存在。从行政制度来说,节度使掌握政、军、财的全部权力,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所以藩镇割据的局面随时都有重新出现的可能。

唐政府的内部情况毫无起色,这是谈不到什么“中兴”的主要原因。宪宗取得了一些胜利,便飘飘然了。他不改善政治,却一味骄傲奢侈。度支、盐铁和地方官揣摩帝意,加紧剥削,呈献赋税定额以外的进奉,用兵时叫“助军”,平定了叫“贺礼”,过些时再献,仍叫“贺礼”。人民经不起搜括,只好逃亡流散。渭南长源乡本有 400 户,逃剩 100 多户;阌乡县 3000 户只剩 1/3。这是衰世,决不是什么“中兴盛世”!

这个皇帝实际上连自己的命运也掌握不了。当时宦官的上层分子分为两派。梁守谦拥护太子李恒,吐突承璀主张改立李恠做太子。元和十年(820 年),梁守谦、王守澄、陈弘志等谋杀了宪宗,并杀掉吐突承璀和李恠,拥太子登位,是为穆宗。长庆(821—824 年)就是穆宗的年号。他登位以后,推说宪宗服金丹中毒,打死了一个方士、一个和尚,含糊了事。

朝政混乱腐败,使唐朝不可能有对付军阀叛乱的力量。长庆元年,卢龙、成德相继发生兵变,河朔三镇很快又恢复了割据。

当时,王承宗于上年病死,唐政府把田弘正从魏博调成德,使李恠继任魏博节度使。又因卢龙节度使刘总病死,结束了刘家三世统治幽州 36 年的局面,朝廷趁此机会,调大官僚张弘靖到幽州上任。

唐政府信任田弘正的忠顺,而不知换了个地方,他根本没有控制将士的力量。他带 2000 名魏博兵做卫队。朝廷不准,硬是逼着他把魏博兵遣返。他们派了一个大官僚到幽州去,而不知他根本不能适应“河朔风俗”。

所谓的“河朔风俗”,是指节度使注意收买士卒,军队中的

上下关系比较融洽的风气。从安禄山以来,六七十年间,河朔的野心家都是这样做的。张弘靖不了解这一套,在万众之中,坐着轿子,傲然自得,对将士不瞅不睬。他10来天坐一次堂,处理些公务,同将校们毫无接触。他的幕僚韦雍等,生活习惯都是长安等大城市中的达官贵人那一套,经常纵酒宴会,从人满街,在当地显得很刺眼。韦雍等轻视下级军官和兵士,有时骂他们“反贼”,还说:“如今天下太平,你们那怕能拉两石的硬弓,也不及识一个‘丁’字!”这种作风激起了将士们强烈的反感。

七月中,有个小将冲了韦雍的仪仗,韦雍要责打他,闹了起来。张弘靖偏袒韦雍,命将小将扣留。当夜,兵士哗变,杀死韦雍等人,扣押张弘靖,推将领朱克融(以前割据幽州的朱滔的孙子)为首。这是卢龙的事变。

卢龙变后,成德也接着发生兵变。将领王庭凑杀田弘正,夺得兵权。政府派魏博兵讨伐成德,因李愬病重,用田弘正子田布做节度使。魏博将士不服从政府命令,要求田布“行河朔旧事”。田布自杀,兵权落入部将史宪诚之手。这是长庆二年正月里的事情。

河朔三镇变了。别地方的军队也常有驱逐主帅、自立统将的情形。元和时期用了许多力气取得的一点成就,完全付之东流了。

甘露之变

宦官专政有一个历史过程。早在唐初,不许宦官参与政事。唐中宗时期,宦官人数增至千人,大宦官开始干政。开元

末期，宦官人数达 3000 余名，其中五品以上者有 1000 余人，有些人并取得三品将军的职位，其中高力士和杨思勰最受重用。杨思勰多次奉命出征南方少数民族，加骠骑大将军（从一品），封虢国公，打破了唐初以来宦官不得登三品的惯例。高力士亲侍皇帝，更受宠信。开元末年凡大臣奏疏，须经高力士过目，朝中小事皆由高力士处理，只有大事才奏请玄宗。李林甫、安禄山、高仙芝等人取得将相地位，都是高力士的引拔。除了高力士以外，另有一些宦官还担任监军，他们的权力很大，所到之处，任意勒索。所有宦官都听高力士的指挥。高力士就是唐玄宗权力的化身，太子称他为“二兄”，诸王公主呼他为“阿翁”，驸马呼他“阿爷”。高力士资产殷富，甚至超过王侯。京城内外良田甲第，几乎有一半是宦官所有。

唐玄宗怕宗室诸王夺他的皇位，因此他派宦官监视诸王，甚至皇孙也有人监视。由于宦官是诸王的监视者和保护者，所以诸王的命运，决定于宦官的爱憎。后来，皇帝的废立和生命也都操在宦官手中。

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唐玄宗和太子及百官仓惶出逃。到马嵬时，杨国忠、杨贵妃被杀。宦官李辅国给太子李亨献计，请分玄宗之兵以趋朔方，准备反击叛军收复两京。李亨接受了李辅国和建宁王李倓的建议到达灵武（宁夏青铜峡县东北）。不久，李辅国又劝太子即位，以收揽人心。至德元载（756 年），李亨即皇帝位，即唐肃宗。他更加信任宦官，这就使宦官权势进一步扩大。当九节度使讨伐安庆绪时，朝廷不设置统帅，而以大宦官鱼朝恩为天下观军容使，九个节度使受他节制，结果打了大败仗。唐肃宗是李辅国拥立的。这个大宦官内掌玉玺符

命，外管禁军，朝廷所有制敕都须经他押署，然后实行。宰相和各部尚书有事陈请，定要先告李辅国而然后才能上报皇帝。李辅国骄横专恣，没有人敢公开反对他。宰相李麟、苗晋卿，都因为不能逢迎李辅国，相继去职。李岷、李揆当宰相时，见到李辅国时行弟子礼，尊李辅国为五父。李岷弹劾李辅国专权乱政须加裁抑，肃宗疑信参半，他只下令制敕归中书掌管。李岷因为得罪了李辅国，只当了一个月宰相，就被李辅国诬陷，贬为蜀州刺史。

李辅国不仅废立宰相，还逼死皇帝，杀戮皇后，宝应元年（762年），唐肃宗重病，正在弥留之际，张皇后和越王系密谋除掉宦官。李辅国先发制人，逮捕了太子和越王系。皇后闻变，跑到肃宗寝室避难。李辅国竟带领从人，闯进皇帝寝室，逼皇后出门。皇后哀求肃宗救命。这时肃宗已危在旦夕，在李辅国的逼迫下，喘息得说不出话来。李辅国亲手把张皇后拖出寝室，同时逮捕皇后的亲信数十人，分别囚禁。肃宗死后，他们勒死张皇后，杀了越王系和段恒俊等数十人。

由于李辅国极端猖狂，直接威胁唐代宗的安全，于是他利用另一大宦官程元振杀了李辅国。程元振任骠骑大将军（从一品），宦官仍然独揽大权。

到唐德宗时期，由于德宗刚愎自用，猜忌大臣、宿将。特别是经过“奉天之难”以后，更加相信自己的家奴。任命大宦官霍仙鸣、窦文场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从此 10 余万禁军由宦官指挥，他们的权力更加强大，为唐后期宦官挟兵权把持废立大权的局面开了方便之门。德宗以后，顺宗、宪宗和敬宗，都是死于宦官之手。

在唐文宗时期，大宦官王守澄掌权，他目无天子、为所欲为。文宗曾与宰相宋申锡密谋，设法铲除他们。宋申锡引用吏部尚书王璠为京兆尹，授以密旨。王璠把这一消息传给郑注。郑注是宦官王守澄提拔的佞臣，他把宋申锡的计划报告了王守澄。王守澄设计陷害宋申锡，诬陷宋申锡阴谋拥立漳王，并唆使神策军都虞侯豆卢革先行揭发，然后王守澄秘密报告唐文宗。由于漳王湊是文宗之弟，并且素负众望。唐文宗听了王守澄的密报，不免疑惧交加，于是命令王守澄侦察。王守澄立即召集党羽，准备派 200 骑兵屠杀宋申锡全家。飞龙厩使马存亮虽然也是宦官，但比较正派，他义正辞严地反对说：“宋申锡罪状不明，无故杀他全家，岂不要引起众怒吗？万一首都乱起，我们将怎样对付呢？最好先召集几位宰相了解一下真实情况，然后再采取行动。”于是王守澄派人把几个宰相找来，到了中书省的东门，牛僧孺等鱼贯而入，唯独宋申锡被阻止。宋申锡质问何故。答复是：“传召时没有你的名字。”宋申锡自知得罪了宦官，眼望延英门，手拿笏板叩头而退。牛僧孺等进了延英殿以后，知道了此事，几位宰相互相看看，都表示惊讶。等了很长时间，他们说：“应当查明情况，然后再根据情节定罪。”王守澄派人逮捕漳王内史晏敬则和朱训，以及宋申锡的录事王师文等。王师文闻讯脱逃，晏敬则、牛训被捕下狱。在严刑逼供下，他们承认谋逆，王守澄准备以谋逆罪杀漳王和宋申锡。消息传出以后，谏议大夫王质、给事中李固言以及补阙卢钧、蒋系、裴休等，跪在殿前为谏，主张把全案人犯移交外廷复审。唐文宗说：“我已经和宰相决定了。”崔玄亮叩头流涕说：“杀一个普通百姓还应慎重，何况要杀宰相呢！”唐文宗重新召集宰相

们研究对策。牛僧孺说：“宰相是人臣最高的职位，宋申锡既然当上宰相，他还有什么野心呢？我看他不会反对陛下。”唐文宗点了点头。奸党郑注怕复审有变，叫宦官王守澄建议皇帝宽大处理、减免死刑。结果贬漳王 湊为巢县公，宋申锡为开州司马，把晏敬则、牛训判处死刑。飞龙厩使马存亮认为这是冤狱，他非常愤慨，即日请求辞职，表示抗议。后来宋申锡病死在开州，漳王 湊也夭亡。

宋申锡事件以后，王守澄威震朝廷，大臣的任免和生死，都掌握在王守澄的手里，所以多数大臣都反对宦官专政。另一方面，皇帝自己也不甘心充当傀儡，也想削弱宦官势力。有些大臣向唐文宗建议，提拔五坊使宫官仇士良当神策军中尉，分割大宦官王守澄的权势。仇士良本来和王守澄有矛盾，就和大臣李训、舒元舆等合谋，提出一个消灭王守澄集团的计划。为了取得唐文宗的支持，就从追究唐宪宗的死因开始。当时宫廷内外都怀疑唐宪宗是王守澄和陈弘志谋害的，这件事经宦官仇士良证明，更确信无疑。李训通过仇士良派人诱令陈弘志进京，以便在途中杀掉他。几天以后，从兴元府传来消息，说陈弘志在青泥驿被杀。另一方面，唐文宗又任命王守澄为左右神策军观军容使，叫他离开首都，表面上提高他的政治地位，实际是削弱他在内廷的权力。同时，并流放宦官王践言、韦元素，处死宋若宪。这样一来，宦官势力已消灭一半。

在王守澄离开首都前夕，朝臣和宦官给他践行，席间给他喝了毒酒，然后宣布他暴病身亡，追赠他为扬州大都督，同时并把宪宗时期参加王守澄逆党的宦官梁守谦、杨承和等诛杀殆尽。

唐文宗认为李训有功，任命他和舒元舆、王涯为宰相。

李训、舒元舆等取得胜利以后，拟定一个彻底消灭宦官的计划。太和九年（835年），任命大理卿郭行余为邠宁节度使，户部尚书王璠为河东节度使，部署他们大量招兵，壮大自己的力量。又任命刑部侍郎李孝本为御史中丞，以太府卿韩约为金吾大将军，直接掌握首都及宫廷防卫权力。这些人都是李训的亲信，分别安置在要害部门和地区，为内外夹击，一举消灭宦官集团做好准备工作。

这年十一月的一天，唐文宗在紫宸殿上朝，百官鱼贯入宫，依班序而立。金吾大将军韩约匆匆入奏说：“在左金吾厅后面的石榴树上出现了甘露，这是天降吉祥的征兆。如果不是陛下圣明感动上天，不能得见甘露”，说完以后，韩约手舞足蹈给皇帝叩头。宰相李训、舒元舆也率百官拜贺，并且请皇帝立即亲自观赏。文宗欣然同意，于是坐上龙辇出紫宸门，升含元殿。先叫李训去看看，他很长时间才回来。李训说：“甘露已经看不清了，但暂时不必宣扬出去。”唐文宗说：“有这样的事吗？”他示意叫宦官仇士良、鱼弘志等率领宦官前去探视。李训召集郭行余、王璠等，入殿受诏。王璠吓得全身哆嗦，不敢前去。只有郭行余受命诏募的亲兵数百人，携带武器等候在丹阳门外。李训召集这些亲兵，部署杀宦官的计划。河东兵陆续进京，唯独邠宁军却观望不前。仇士良等进入金吾厅，正好遇见韩约，并发现韩约神情紧张。仇士良惊讶地问道：“将军为什么这样紧张？”话还没有说完，忽然看见金吾厅里风吹幕起，里面藏着甲兵，于是仇士良慌忙往回跑，进了含元殿，他气喘嘘嘘对皇帝说：“宫里要发生暴乱了！”李训等看到仇士良向含元殿方向跑

去，急忙招呼金吾卫士，对他们说：“赶快到含元殿保卫皇帝陛下，进去以后，每人赏钱一百缗。”金吾卫士刚要登含元殿，大宦官仇士良眼明手快，急忙令宦官抬着皇帝从殿后出去。李训上前拦住轿子，对文宗说：“臣奏事未毕，请陛下暂时留步。”仇士良怒气冲冲地说：“你们在宫里布置武装，要谋反吗？”文宗说：“这不可能。”仇士良根本不听，抢步向前来打李训，被李训推倒。随后李训从靴子里拔出匕首，要刺杀仇士良，被宦官拦住。仇士良被抢走。这时，罗立言率京兆逻卒 300 余名从东面赶到。李孝本率御史台从人 200 余名从西面赶来，并会同金吾卫士，登殿杀宦官 10 余人。仇士良令宦官在外面抵挡，自己引文宗走向宣政门。李训在后面追赶，宦官郝至荣截住，把李训打倒。宦官把文宗抬到宣政门。等李训挣扎着站起来，宣政门已紧闭。李训知道镇压宦官的计划已经失败，急忙换上从吏的绿衫，化装出宫，郭行余、罗立言、王璠也各自寻找藏身之处。

宰相王涯、贾餗并没有参加李训消灭宦官的计划。他们看到殿中发生变乱，不知是怎么一回事，仓猝之间回中书省，听候消息。宰相舒元舆因参与密谋，闻报先逃，王涯、贾餗也跟着走出中书省。中书门下省的金吾卫吏卒千余人，也都向外跑。此时禁军赶到，被砍死六七百人。大宦官仇士良，又分兵掩闭宫门，横加屠戮。所有诸司吏卒，及附近商贩，都惨死在宦官刀下，尸体狼藉、遍地朱紫。同时，大宦官又派骑兵千余人，追捕逃人。宰相舒元舆、王涯都被禁军捕获，各加镣拷，施以酷刑。

禁军大兴打伐之际，坊中地痞流氓伪托禁军，乘势骚扰，杀人越货、互相攻劫，扰乱了一夜。第二天清晨，百官上朝，日

出以后才打开建福门。宫城内外戒备森严，禁军全副武装如临大敌，朝官只许带一名随从。文武百官屏住呼吸慢慢前进，走到宣政门，只见大门禁闭。等到开了宣政门，进了大殿，唐文宗坐在紫宸殿。唐文宗见没有一个宰相上朝，便对宦官说：“宰相王涯等为什么不上朝？”宦官仇士良说：“王涯等谋反，已逮捕下狱。”说到这里，把控告王涯谋反的状子及有关“罪证”呈上。文宗接过来略看一下，敕令郑覃、令狐楚等上殿，把仇士良诬告王涯的状子给他们看，并且流着眼泪说着：“这是王涯的手笔吗？他如果真要谋反，定要正法。”于是敕令令狐楚、郑覃为代理宰相，并且叫他们起草诏令，宣告李训等罪状，但用语模棱两可，仇士良看了，很不满意。

仇士良讨厌令狐楚，于是提拔李石任宰相，和郑覃共同辅政。当时中央各部门主要官员已安排就绪，但是长安城内的秩序仍然混乱，流氓打手夜间继续劫掠。神策军将杨镇等各率500人，分屯通衢、打鼓警众，严禁抢劫，并杀戮首犯10余人，从而使首都社会秩序暂时安定下来。

过了几天，仇士良令禁军300余人，挑起李训的人头，押着舒元舆、王涯、郭行余、罗立言、李孝本等，游街示众，然后把他们推到独柳树下，全部斩首。他们的亲属，无论远近，也一律处斩。

这就是“甘露之变”。从此以后，大宦官仇士良等气焰益盛。上胁天子、下凌宰相，唐朝政治更加腐败。

朝臣所在的衙署均在皇城。皇城在宫城之南，通称“南衙”或“南司”。故而“南衙”或“南司”就常用以代指朝臣势力。内侍省设在宫城之北，相对而言，被称为“北司”，北司主掌宫

廷事务，职司均任用宦官。故“北司”又被用以代称宦官集团。所以，朝臣与宦官的斗争，史称“南衙北司之争”。

“甘露之变”，就是南衙北司斗争中的一幕。从此之后，朝臣与宦官的斗争愈演愈烈、势同水火，直到同归于尽。这种历史现象，说明唐王朝的统治阶级已从根本上腐朽，再也无力继续统治下去了。

唐朝中后期，宦官掌握兵权，并逐渐形成制度，这是唐朝宦官专权的一个重要特点。宦官掌握兵权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个监军，二为专典禁军。宦官集团在政治上结党营私，贪污受贿，卖官鬻爵，无恶不作。宦官缺乏政治才能，他们一旦专权，便使国家的政治生活遭到野蛮破坏，所有政治文明发展的成就亦荡然无存。宦官监军危害犹大。监军使受皇帝派遣监督将帅，使将帅在作战中不能发挥主动性，凡事都要向监军使请示，而宦官一般缺乏军事指挥才能，因此往往打败仗。宦官在处理藩镇和朝廷的关系上，也是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的。至于宦官在残害百姓方面的罪行，更是不胜枚举。唐中后期宦官专权对中华文明是一种很大的破坏力量。

牛李党争

牛李党争也是唐末政治史的重要内容。“牛李”是指党争中的两大派别——牛党和李党，其中李党的首脑人物为李德裕、郑覃、陈夷行、李绅等，牛党则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他们之间存在着政见分歧，而一旦构成党争，积怨渐深，又不免掺杂着许多派别之间的意气之争。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四月，宪宗诏开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制科，伊阙尉牛僧孺、陆浑尉皇

甫湜、前进士李宗闵在策试中指陈当时政治的缺失。李吉甫泣诉于宪宗，许多考官和参预制科的官员，都因此贬官。翰林学士白居易上疏，认为牛僧孺等直言时事，吏部侍郎杨于陵等以考策敢于直言，不应受到谴谪。不久，李吉甫出为淮南节度使。后来牛僧孺和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都做到宰相，牛李两派之间逐渐形成无法消除的嫌隙，酿成了势不两立的朋党之争，史称“牛李党争”。

李德裕以宰相子任官，不是由进士科第出身。当时科场风气浮薄，故李德裕对进士科多有批评，还协助武宗对进士科进行改革，整顿科场风气，任用精鉴徇公的人负责贡举，从而使科举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健全。他在协助武宗改革方面也起过积极作用，是唐朝末期比较重要的改革家。牛僧孺出镇襄樊时，“汉水溢”（《新唐书·武帝纪》），李德裕便归罪于牛僧孺，免除了他的山南东道节度使职务，迁为太子少师，分司东都。李德裕还抓住各种机会打击牛党，或借武宗贬斥牛僧孺。他自己也以平泽潞功，进官太尉，封卫国公，达到他政治生涯的顶峰，而牛党则遭到了沉重打击。

武宗病死后，宣宗继位，即位听政第二天就罢免了李德裕。宣宗素恶李德裕专权。李德裕的贬黜，主要罪状有两条，第一条是“擅改”《宪宗实录》，凡是不利于乃父李吉甫的，他都加以削改。第二条是参与制造吴湘冤案。牛僧孺一派王相也久遭贬逐。

李德裕罢相，李党完全失势，牛党却大大抬头了，白敏中、令狐绹相继为相，牛党的后一代都冠冕蝉联，如牛僧孺子牛蔚，唐懿宗咸通末年官至山南西道节度使；僧孺次子牛勣，僖

宗乾符中，官至剑南西川节度使，等等。李德裕一派的子弟及高位者很少。

牛李党争是唐王朝政治衰微的一个重大表现。唐王朝的中枢统治集团早已失去了贞观时期那种融洽的君臣关系和臣僚关系，派别之间的争夺也给王朝政治统治造成了极大的内耗，使朝廷不能够最大限度地集中统治阶级内部的各种力量来对付各种社会矛盾。派别之争也使统治集团遗漏了许多有才有识有志之士，如李商隐、白居易等皆以党争而不得仕进，寂寞终身，只得退而与裴度等一同“为文章，把酒，穷昼夜相欢，不问人间事”（《旧唐书·裴度传》）。牛李党争既是唐王朝政治衰微的结果，反过来，也加速了唐王朝的灭亡。

四、均田制的破坏 和地主田庄的发展

唐初地广人稀，土地兼并的现象并不明显，又由于认真推行了均田制，使自耕农有所增长，农业生产得以发展。但是，均田制并不触动封建土地私有制，并且还给贵族、官僚等上层地主以种种优厚待遇，特别是唐的均田令允许土地买卖，这就给官僚地主兼并土地提供了合法的依据。高宗、武后时期，一大批庶族地主，进入了各级政权机构，成为新的官僚。他们开始利用政治特权，以各种手段兼并土地。这时随着土地的兼并和人口的增长，唐政府控制的公有土地逐渐减少，均田制的推行已发生困难。开元、天宝年间，封建官僚机构急剧膨胀，官更多达 36 万余人。社会经济繁荣，又极大地刺激了贵族、官僚地主

的贪婪欲望。王公百官及豪富之家,对土地的贪欲越来越大,都热衷于兼并土地,他们凭借特权,以“乞赐”“借荒”和“置牧”等名目侵占公田和农民的土地。如李林甫、杨国忠等贵族官僚都利用特权疯狂兼并土地,在京畿附近广占良田沃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富商大贾和豪强地主普遍以放高利贷和买卖的方式兼并土地,他们占有的土地也多不胜数。另外,当时佛教盛行,寺院林立,僧侣地主也恣行兼并土地。杜佑说:“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由于贵族官僚,地主富商和寺院僧侣竞相兼并,使大量农民失地破产四散逃亡,一部分逃到封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边远地区垦荒、开矿,抵抗官府的追捕。多数沦为地主豪强的客户(佃户)。据统计,天宝年间沦为客户的农民,至少有四五百万户,约占当时全国总户数的三分之一。他们不向封建政府申报户口,也不交纳赋税,成为地主豪强的隐蔽人口。

由于土地兼并日益强烈,客户不断增加,土地逐渐转为各类地主私有,唐政府几乎没有可供收授的土地。这样,推行均田制的前提已不具备了。安史之乱后,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户籍混乱,人口散亡,加之土地买卖更加盛行,土地私有制日益发展,导致均田制的彻底瓦解。

地主田庄的发展 在均田制破坏过程中,以大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地主田庄发展起来,并且成为中唐以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主要形式,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所谓“田庄”,就是大地主雇佣客户耕种大片土地而组成的一个生产单位。田庄里农业生产占主要地位,此外还从事菜圃、果园、茶园、榨油、酿酒、纺织等农副业和手工业生产。有些官僚大地主田庄,还

修筑风景和楼台亭阁，供田庄主玩赏和住宿。

唐代的地主田庄经过了长期的发展过程。这种土地占有形式早在南北朝时已有出现，唐初已有缓慢发展。如武德年间，长安的清禅寺就有田庄存在。贞观初，蒲州（山西永济县西南）的普济寺曾置田庄三所。高、武以后，随着土地兼并日益加剧，地主田庄经济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如高宗时，王方翼的“凤泉别业”，“有田数十顷，列植竹木”是一个初具规模的地主田庄。但当时尚非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主要形式，在社会上不占主导地位。安史之乱以后，由于商品经济水平的提高，土地买卖盛行，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大地主田庄才普遍发展起来，成为封建土地占有制的主要形式。大地主田庄经济是唐后期封建经济的主要特点。

唐代的田庄，大致分为官庄、皇庄、官僚田庄，一般地主豪富田庄和寺院田庄等。官庄归封建国家所有，是均田制瓦解后，国家占有土地的一种新形式。皇庄归皇帝私有。它们的土地来源除国家原有的土地外，还有臣下纳献的土地、没收罪犯的土地或购买的土地。唐中期以后，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为了和贵族官僚争夺土地和劳动力，官庄、皇庄遍及京畿各州县。此时，官僚田庄也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著名的如裴度的午桥庄，李德裕的平泉庄，韦宙的江陵庄，司空图的王官谷庄等。这些田庄往往是山水田园相连，里面有农田，还有风景区和楼阁，成为官僚地主养尊处优的别墅。司空图在中条山的王官谷庄，“周围十余里，泉石之美冠于一山。北岩之上有瀑泉流注谷中，溉良田数十顷”。韦宙的江陵庄“良田美产，最号膏腴”，积谷达 7000 堆，时人称之为“足谷翁”。代宗时，宰相元载

有“膏腴别墅，连疆接畛，凡数十所”。由此可见，当时王公百官都“比置庄田，恣行吞并”，拥有田庄已是一种普遍现象。一般地主豪富的田庄，规模也很大。如邺城王叟，“住宅尤广，客二百余户”“积粟近至万斛”。唐时佛教流行，寺院拥有极多的田庄。如嵩山少林寺的柏谷坞庄，占地达 40 顷。山东长白山醴泉寺，有庄田 15 所之多。长安大象寺，经营庄田 7 所。可见，当时寺院也占有大量土地，经济力量很是雄厚。

唐代，地主田庄里的生产者主要是庄客和雇农。他们主要来源于破产的均田农民。田庄主和生产者是租佃契约的关系，双方订立契约文书，明确各种要求和规定。生产者按照契约定期向庄主交纳庄租。这种方式称为租佃制。

唐代的田庄制和南朝的田庄制有着明显的区别。南北朝田庄里的生产者主要是世袭的部曲和佃客，他们没有人身自由，身份相当于农奴。唐代田庄里的庄客和雇农是以契约文书形式为庄主劳动，身份并不世袭，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减轻。超经济强制有所削弱，南北朝的田庄是封闭的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拥有私人武装，独立性很强。唐代田庄自然经济的程度降低，不再拥有私人武装，庄田的私有财产受国家法律保护，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和社会商品经济有一定联系。所以，唐后期的地主田庄和南北朝世族庄园相比有一些明显的进步。

五、两税法的实行和最终流产

1. 刘晏的财政改革 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和地主田庄的

发展,建筑在均田制基础上按丁征取的租庸调制也就行不通。其时“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社会上出现丁去田亡而税籍犹存的现象。安史乱后,情况更有发展,“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唐朝财政陷入极端困窘的境地。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唐政府曾想通过整顿均田制来解决,但是收效甚微。因此,唐政府便横征暴敛来搜刮民财,例如增加盐价、酒税、间架税(房屋税)、茶税等,并令江淮人民补交安史之乱 8 年以来的租调,不问是否欠户,凡有粟帛之家,少者掠取一半,多者十取八、九,名为“白著”。有不服者,严刑拷打。这种没有限制的榨取勒索,激起贫苦农民的激烈反抗。从肃宗到德宗的 40 余年间,远至江南近至京畿,到处都有农民起义,特别是江淮一带就爆发了十余起农民起义,人数达几十万。其中规模较大的有袁晁领导的浙东农民起义,方清领导的皖西农民起义,前后持续了 10 多年。社会危机日趋严重,唐政府财政面临崩溃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唐统治者不得不整顿财政和改革赋税制度。

唐朝后期,出现了一个著名的理财家刘晏。他先后担任过度支、铸钱、盐铁使等职,后来又兼转运、常平等使,先后执政理财近 20 年(760—780 年)。在安史之乱以后社会危机的时代,他目睹朝廷府库耗竭,农民起义不断发生。为了挽救唐王朝的困境,他决心整顿财政。刘晏理财的指导思想是“理财以爱民为先”,认为“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把理财的中心放在广开税源上面,在不增加人民负担的限度内,扩大税源。他集中力量于改革盐政,改革漕运和常平物价三个方面。

第一,改革盐政。唐后期,在国家税收中盐税占重要地位。

肃宗时，曾采纳盐铁使第五琦之议，统购亭户所煮的盐，由国家专卖，并把盐价从 10 文提高到 111 文，唐政府每年得钱 60 万缗。但由于各地盐官营私舞弊，使盐价日益上涨，人民负担加重，政府获利反逐渐减少。刘晏担任盐铁使后，针对此弊端，把盐由官购官销改为官营商销，取消了各州县盐官，调整专卖制度，规定只在产盐地置盐官，统一收购亭户所产之盐，然后加价专卖给商人，任盐商运销各地。一旦商盐脱销，盐价昂贵，则由政府平价出售当地贮藏的官盐。这样，精简了盐务机构，节省了政府的开支，又控制了盐政。刘晏改进盐政后，到代宗大历末年，政府每年收入的盐税从 60 万缗增加到 600 万缗。

第二，整顿漕运。安史乱后，汴河日见淤塞，漕运阻滞，长安经常缺粮，斗米价至上千。为了解脱由江南向关中转运粮食及物资的困境，刘晏实行分段运输的办法。他亲自视察运道、“因淤塞不便航运”的运河，使“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并制造了坚固的漕船，不再征发沿河壮丁，而改由经过专门训练的漕卒运粮。这样提高了运输效率，减少了损耗，降低了运费，每年运粮百余万斛而无斗升沉没，从而解决了关中和长安缺粮的问题。

第三，实行常平法。刘晏为了平抑物价，很重视掌握各地的经济情报。他在全国主要城市设 13 个巡院，选择勤廉干练的人做知院官，管理巡院。由知院官每旬每月上报当地的雨雪，丰欠及物价涨落情况，遇到丰年则以高于市价籴入谷物，在歉收地区用平价粜出，或用谷物换进杂粮供应官用。这样既保持社会供求和物价的稳定，又使政府保证了税收。

刘晏的理财活动，暂时解决了唐王朝的财政危机。同时，

在客观上安定了人民生活,使政府控制的户口有所增加。8世纪60年代初,刘晏开始整顿财政时,天下户口不过200万户,到70年代末天下户口已300万有余。当时人称他可比管仲、萧何。但是,刘晏的理财,只着眼于开辟税源,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唐后期赋税征收中的混乱现象,没有建立新的赋税制度代替已经崩溃了的租庸调制。全面进行赋役制度的改革是在唐德宗建中元年进行的。

2. 两税法的推行 唐前期的赋役制,主要是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制,是唐政府主要的财政来源。此外,与租庸调制同时存在的有按亩征收的地税和按户征收的户税,两者税额较小,在国家财政收入中不占重要地位。随着均田制的破坏,租庸调的收入显著减少。唐王朝为了弥补亏空,逐渐加重了地税和户税的税额。安史乱后,随着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崩溃,户税和地税就成为唐王朝的重要税收,税额日益增多。

780年(建中元年),唐德宗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颁行了两税法。该法实质上就是以户税和地税来代替租庸调的新税制。它的主要内容是:

(一)“租庸杂徭悉省”,只保留户税和地税。

(二)“量出以制入”,政府先预算开支,而后确定赋税总额。实际上,中央是以779年(大历十四年)的各项税收总额为准,分摊到全国各州征收。

(三)“户无土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即不分主户、客户,一律在现居地立户籍纳税;不以丁男、中男作为征税依据,而是以资产多少定成等级,为纳税依据。

(四)户税以资产多少,定出户等纳税。地税以田亩多少,

按亩征税。不定居的商贾于所在地三十税一（后改为十税一）。

（五）两税规定，政府以钱计算税额，百姓可以物折缴。

（六）无论地税户税，每年分夏秋两季交纳，夏税不过六月，秋税不过十一月。两税之名，由此而来。

两税法是对我国古代赋税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其意义在于：第一，两税法把过去以丁为本的征税制度改变为按土地、财产征税的赋税制度。土地是当时财产的主要部分，所以主要还是依据土地征税。这种变化，具有明显的舍人税地的趋势，意味着封建政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松弛。第二，两税法按土地、财产而不按丁口纳税。这样，“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其税多”，没有土地而租种地主土地的人，就只交户税，不交地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贫富负担不均的现象。第三，两税法是由户税、地税发展而来的，只要略有资产都得纳税，于是商人、客户和官僚都要纳税。这就极大地扩大了纳税面，即使国家不增税，政府财政收入也可大为增加。两税法推行前，地方上交中央的税收，每年为1200万贯，而盐税占一半，两税法推行后，“赋入一千三百五万六千七十贯，盐利不在此限”，较前增加了一倍以上，加强了唐中央的经济力量。第四，两税法将租庸调和各种苛捐杂税合并归总，简化了收税手续，建立了统一的新税制，使国家的赋税收入在短期内相对稳定，有利于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总之，两税法是符合当时社会实际情况的赋税制度。这一税制是以后中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演变的起点。

两税法实行了一段时期后，腐朽的统治者又想方设法把赋税转嫁到农民身上，增添了许多苛捐杂税，再加上钱重物轻

的情况,即使原有的税额不变,农民负担也成倍增加,弄得两税法名存实亡。

第三节 唐末 农民起义和唐朝灭亡

一、袁晁、方清起义

天宝末年,唐朝社会各种矛盾互相交织,全面爆发,原来一片升平景象的唐帝国,骤然变成了血和火的世界。地主集团的内部矛盾,更激化了阶级矛盾,当时很多地方出现了农民暴动,其中规模最大的,是袁晁、方清起义。

安史叛乱以后,北方多数地方沦为战场,各地租调不能上供,因此长江以南变成朝廷税收的基本来源。

至德元年(756年)八月,唐肃宗任命善于聚敛的第五琦为江淮租庸使,在常赋以外额外搜刮,并且实行食盐专卖政策,把盐价提高10倍以上,残酷剥削广大群众。

在唐政府残酷剥削之下,江南人民又连续遭遇特大灾荒。乾元二年(759年),久旱不雨,斗米1500文,比贞观时期增加数百倍。到了第二年,情况继续恶化,四五月间,霖雨连绵,足足有1个月,米价高涨以致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宝应元年(762

年)，两浙在大旱以后又遭水灾，接着发生瘟疫，死者十之七八，闾里萧条、人烟稀少。

对于这种严重的自然灾害，唐政府不仅毫不过问，反而继续加重人民的负担。这时元载任江淮五道租庸使，把京城征收富商的“率贷”法在社会各阶层普遍推行，向人民征收 8 年以前已经放免的租调。在具体执行时，实际并不是按定额征收，而是直接掠夺民财，当时叫做“白著”。

除了中央政府征收统一的租调以外，各道节度使又在征收租调以后额外加征，使江南人民无法生存。

战乱、灾荒和残酷剥削，迫使人民大量逃亡，唐政府又把逃户原来应纳的租调，勒令邻里分摊，从而使更多的农民流散死亡。这样，走投无路的农民不得不起而反抗了。

早在至德元年（756 年），长江下游即有些农民屯聚于海岛上，抗租抗税。余姚（今浙江余姚）一带有“草贼”龚历活动。据权德舆记述：当时江南“山洞海岛，往往结聚，睦州草窃，为蠹尤深”。（《权载之集》卷 12）宣州、广德一带，又有陈庄、陈伍奢率众保据山洞反抗唐政府。到了宝应元年（762 年），在大饥大疫以后，再加上政府苛政迫害，农民起义像燎原大火爆发了。仅见于记载的农民暴动，就有 10 余支，总人数达数十万。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浙东被称为“海寇”的袁晁起义，以及宣歙一带被称“山贼”、“洞寇”的方清、陈庄起义。

袁晁本来是管鞭背之刑的小吏，在地方上有一定威望，唐政府最初叫他镇压农民起义。当时，大起义的时机已成熟，他没有执行唐政府交给他的罪恶任务，反而置酒宰牛，在明州翁山县（今舟山群岛）聚众起义。宝应元年（762 年）八月，袁晁攻

克台州(今浙江临海),赶走刺史史叙,建立农民政权,改年号为宝胜。十月,他们占领了温州(今浙江温州市)、明州(今浙江宁波市),同时,这支农民军有时也到杭州、婺州(今浙江金华)活动。总之,当时浙东 10 州之地,都被袁晁控制。这支农民军最盛时期扩充到 20 余万人,是代宗时期全国最大的一支农民军。

方清是歙州土著,宝应元年(762 年),在江南大灾荒以后,他领导数万农民在歙黟起义。第二年,他们化整为零四出活动,并且和广德(今安徽广德)方面的陈庄合作,屯兵于秋浦的乌石山,打击富商大贾,接连攻下几个城邑。永泰元年(765 年),这支农民军的活动发展到高潮,他们以大批山洞为基地,向周围扩展革命阵地。方清除了占据石埭城以外,不久又攻克歙州(今安徽歙县),杀了刺史庞濬,并在形势险要的古阊门,设置阊门县,“据险作固,以为守备”。

另一方面,陈庄领导的农民军,占领江南西道一些州县,并且北渡长江,攻占舒州(今安徽潜山)。从此以后,在北起舒州、东到衢越、西至洪饶的广大地区,农民军攻城略地,处决地主官僚,“吏不敢问”。

众所周知,江南是唐朝后期赋税的主要来源,袁晁、方清等人起义以后,占领两浙,威胁东南各州,直接影响唐王朝的财政。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江南向来没有重兵驻守,30 多州只部署了 2 万武装。这一地区的军队不仅人数少,而且缺乏训练。在刘展之乱爆发时,江南军队望风披靡。因此唐代宗不得不调平卢兵马使田神功离开中原战场,来到江南。袁晁、方清起义以后,唐政府更加紧张,又把李光弼从中原调到两浙,集

中了几镇兵力围剿农民军。他们发觉袁晁等人的势力甚强，暂时无力消灭，于是又使出招降的策略。当时唐代宗下诏宣称：“天下草寇，能悔过自陈，各归生业，一切并舍其罪。其中有头首能劝率束手来归者，并加官赏。”这种欺骗手段，对农民军起了一定的瓦解作用。

与此同时，在这年的九月，唐将张镐又大举围攻袁晁，夺回信州（今江西上饶），农民军伤亡 2000 余人。十二月，袁晁 2 次进攻衢州，结果失败，被迫退向浙东。第二年二月，又在婺州（今浙江金华）遭唐军拦截。三月中旬，农民军在台州北部与唐军大战，战斗十分激烈，连日交锋达 10 余次。由于农民军组织涣散、缺乏训练、装备不良，终于失败，袁晁被唐将王栖珣俘虏。他弟弟袁瑛率余部 500 余人，退入宁海县北 40 里的紫溪洞。唐军封锁了洞口，切断农民军的粮源。袁瑛及部下坚贞不屈，最后竟一同饿死。直到宋朝，洞里还残留着农民军遗留的鼎铛刀剑。（《嘉定赤城志》卷 21）广德二年（764 年）十一月，袁晁起义宣告失败。

当袁晁起义被镇压以后，唐将袁 傒率兵打出浙西，围剿方清和陈庄。当时全国唐军正与安史叛军作战，他们部署在两浙的部队不多，为了彻底镇压江南农民起义，他们不得不依靠南方地主武装。例如：归德土豪把自己的庄客武装起来，占据八乡、保山据险，抗拒农民军；阊门土豪吴仁欢率领乡人数千，围攻方清于阊门县。永泰元年（765 年）五月，方清在石埭城被唐将陆消打败，壮烈牺牲。唐军平定江南农民起义后，唐政府改阊门为祁门县，任吴仁欢为县令，利用南方土豪的兵力，维持江南的统治。

唐政府为了防止江南农民起义东山再起，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以及胜利以后，又重新建立一批地方政权机构，以便加强控制。例如：针对乌石山起义军的活动情况，将歙、宣、饶3州各分出一部分地区，新设池州，切断方清和陈庄的联系。除了池州以外，当时还设置了石埭、归德、旌德、绩溪、贵溪等县。

除了袁晁、方清两支大规模起义军以外，在肃代时期，还有以下几支农民起义军。

浙西方面：

广德元年（763年），沈皓、朱泚在武康起义，响应袁晁，攻克武康县城，后来被辛敬顺镇压。

朱覃、姚廷在湖州、德清起义，被李光弼的偏将辛牧镇压。

宣歙方面：

宝应元年（762年），舒城杨昭杀死刺史后组织农民军进入江西，被江西观察使张镐镇压。

宝应元年（762年），新安（今安徽休宁）沈千载聚众反唐，“郡国不能禁”，后来被张镐平定，沈千载及其部众全部牺牲。

同年，王万敌在宣州太平县（今安徽太平）起义，被唐将袁傒镇压。唐政府因此从太平县分出一部分地区，增设旌德县（今安徽旌德），对这一地区加强了控制。

此后，江南仍有小股农民军坚持斗争达三四十年之久。

二、裘甫起义

唐朝末期，政治腐败。中央政府和地方军阀之间矛盾重

重,常处于战争状态,黄河南北的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人民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

皇帝、贵族、官僚为了满足他们穷奢极欲的生活享受,加紧抢夺土地和剥削人民。

由于唐末土地高度集中,迫使成千上万的农民破产失业,到处流亡。如元和十四年(819年),虢州阌乡县从原来的3000户减少到1000户。渭南县长源乡,其户口从原来的400户下降到100多户。上述情况在唐末各地相当普遍。

唐末社会另一问题是封建剥削特别繁重。建中元年(780年)实施两税法以后,流弊丛生,人民的负担逐渐加重。建中三年(782年),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增加两税20%。当时唐德宗立刻诏令全国各地,依据淮南税率加征。另一方面,两税法是以钱计税钱物并收,而农民手中无钱,交税时通常是以物折钱。唐朝后期缺铜,市场通货不足,绢绫价格变动的幅度很大。例如在建中元年初定两税时,一匹绢值钱3200文,到贞元十年(794年),降到1600文。这样一来,建中元年纳1万钱的税户,只交三匹绢就够了,但在十四年以后,必须提交六匹绢。到唐穆宗时期,绢价继续下降,等于建中年间的 $\frac{1}{3}$,因此纳税者的负担要增加3倍。

不仅如此,两税法实施几年以后,又加征竹、木、茶、漆之税,十取其一。当时住房征“间架税”,经商收“阡陌钱”,地里生长的青苗也收税,杂税既多,广大人民群众实在无力负担。

劳动人民用血汗换来的钱物,却被统治阶级任意挥霍浪费。唐懿宗喜好音乐游宴,殿前侍奉他的乐工就有500余人,

每月大宴 10 余次，水陆山珍无所不备。“听乐观优，不知厌倦，赐与动及千缗。”皇帝每逢出游，护从 10 余万人，所费不可胜计。他女儿同昌公主出嫁时，也极端奢侈，“窗户饰以杂宝。井栏、药臼、槽匱，亦以金银为之。编金银以为箕筐，赐钱 500 万缗。”相当于大中十年（856 年）全国两税总数。

唐末统治阶级的贪残腐朽，繁重的赋役剥削，以及频年灾荒的袭击，使广大农民无法生存，纷纷起义。

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 年）十二月，裘甫领导浙东农民暴动。十二月中旬，他们占领了象山（今浙江象山）。义军所到之处，开府库，分粮食，附近农民参加起义者数千人。

第二年正月，浙东观察使郑祗德派兵镇压，结果连遭失败。农民军进驻剡县（今浙江嵊县）。郑祗德为了援救剡县，又派讨击使刘勍、副将范居植等配合台州兵围困农民军，双方大战于唐兴（今浙江天台）桐柏观。结果，唐将范居植败死，刘勍仅以身免，农民军一举攻克了剡县，开府库，招壮丁，发展到 1 万余人。

郑祗德虽然失败，仍然不肯罢休，于是又募集壮勇，派沈君纵、张公署等组织反击。这年二月，双方大战于剡县之西。剡县城西有三条溪水，裘甫在三溪之北布阵，却在三溪之南暗设伏兵，并在溪水上游加以壅塞，使溪流浅可涉渡。双方开战不久，农民军便佯败引唐军追击。等唐军渡到一半时，裘甫挖断壅塞，于是上游溪水涌来，甲兵漂没。唐将急忙后撤，溪南埋伏的农民军边时出动，出其不意，拦住唐军去路，使唐军进退维谷，结果大部被歼。

三溪大捷以后，农民军威风大震，附近的流民和小股农民

军,纷纷参加裘甫领导的义军,达3万余人,划分32队。当时裘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建年号罗平,以刘晔为谋主,刘庆、刘从简为副帅,积极屯储粮食、制造器械,准备夺取两浙。

浙东、浙西是唐政府两税的主要来源,假若裘甫长期占领这一地区,必然会影响朝廷的财政。两个月以来,浙东观察使郑祗德武力镇压起义的失败,引起朝廷的不安。咸通元年(860年)二月,宰相夏侯孜推荐前安南都护王式主持这场战争。王式出身书香门第,曾在安南威服华夷,事务处理得非常得体。唐懿宗调王式为浙东观察使,同时征发忠武、义成、淮南三道兵,配合王式镇压裘甫起义。

正在唐政府调兵遣将的时候,裘甫在浙东发起大规模攻势。先克衢州(今浙江衢县)、婺州(今浙江金华),后来又攻取唐兴(今浙江天台),并占领了余姚(今浙江余姚)、慈溪(今宁波市西北)、奉化(今浙江奉化)、宁海(今浙江宁海)。农民军所到之处,杀守令、惩贪暴,为民除害,给唐政府以沉重的打击。

不久,王式统率下的官军进逼浙东,农民军副帅刘晔主张先发制人,立即引兵攻取越州(今浙江绍兴市),控制府库,建立巩固的基地。为了保全基地,必须派几千人固守越州的门户西陵(今浙江肖山),并沿浙江筑垒拒守,然后兵分两路:一路进取浙西;另一路渡长江取扬州财货,作为军饷;最后再整修石头城(今南京市),作为首都。如果能占领石头城,则宣歙流民必然有人望风响应。至于南路方面,可派副将刘从简领万人循海南行,袭取福建。这样做,便可以控制东南各道,朝廷的贡赋尽归我有。

从当时的政局看来,刘晔方略是可行的,有其正确的一

面,但缺点是没有提出推翻唐王朝的远大目标。

在这时,混入农民军的进士王辂反对刘巨住提出的方略,连忙对裘甫说:“刘副使的计策是效孙权偏安江东的作法,这种作法只有在汉末天下大乱时才能办到。现在天下一统,割据一方是不可能的。不如拥众据险固守,必要时耕田打鱼自给自足。一旦官军来攻,便潜入海岛,等敌人走了,再回来。”

裘甫听了双方的意见,拿不定主意,把这件大事搁置下来,从而使农民军的处境更加困难。

王式是一个老奸巨猾阴险毒辣的家伙,他到了浙东以后,一面用釜底抽薪的手段,先打开各县府库,大规模赈济贫民,用以缓和群众的反唐情绪,从根本上减少农民起义的后备力量。另一方面,王式发现过去农民军的谍报人员经常混进唐军内部侦察,或策动唐军反正。针对这个问题,他立即惩处一批有关人员,并且发给唐军定期出入证,无证者严禁出入军门。到了夜间,则分段巡逻,从而给农民军造成极大障碍,难于掌握敌人活动规律。与此同时,王式自己却派出不少策反人员,钻到农民军内部,进行瓦解诱降活动。农民军头领洪师简、许会能等率众叛变投敌。在作战过程中,王式常利用农民军叛徒当先锋,凡可擒杀数百农民军者,便升官一级,农民军的伤亡因此越来越大。

咸通元年(860年)五月,王式积极整顿军旅,准备彻底围剿农民军。首先,他增加骑兵,把江淮一带的吐蕃、回纥兵集中到浙东战场,给以优厚待遇,令骑将石宗本统率。然后,再分兵两路:东路除了石宗本的骑兵以外,又增加了宣歙镇将白琮、浙西镇将凌茂和北方将领韩宗政等共数千人。他们从上虞直

奔奉化，以解象山之围。北路军是以义成镇将白宗建、忠武镇将游仙楚、淮南镇将万璘等，各率本镇兵，并与台州（今浙江临海）唐兴兵会合。全军出发前，王式宣布作战方针：“全歼渠魁，协从不问。勿争险地，勿焚庐舍，勿杀平民。得贼金帛，官无所问。俘掳越人，立即释放。”王式的政策起了一定的欺骗作用，不少农民军被分化瓦解。

南路唐军，占领沃州寨和新昌寨，大破刘晔。农民军的另一首领毛应天，当场牺牲。

与此同时，唐军在作战中，伤亡也很大。于是王式又奏报朝廷，继续调忠武、义成、昭义镇军队，齐集越州。当时忠武镇将张茵率 300 人屯唐兴，堵截义军南下之路。镇将高罗锐率 300 人，配合台州土匪直奔宁海（今浙江宁海），准备攻义军的大本营。而昭义镇将跌跌戮率 400 人增援东路军，切断农民军入明州的后路，迫使农民军陷入重重包围之中。农民军集中兵力出海游镇（今浙江三门），与唐军决一死战，结果，被唐军的南路军打败，不得已逃进甬溪洞。这时唐军集中各路人马紧紧围住洞口。农民军出洞再战，又受挫折。另一路唐军在高罗锐率领下攻下了宁海，俘掳 7000 余人。农民军准备分散入海。王式令高罗锐到海口拦截，同时派遣望海镇将云思益、浙西镇将王克容率水军巡逻海滨，防止农民军潜入海岛。副将刘从简正从宁海东奔，准备潜入海岛，不料唐军袭来，农民军急忙弃船登陆，逃进山谷，17 支大船都被唐军烧毁，损失惨重。

这年六月，裘甫最后带领残部回到剡城。这时王式从东南两路包围剡城，妄图一举消灭农民军。

剡城之战是裘甫起义最后的一次重要战役。裘甫为了打

破被围困的局面，主动出击，3天之间“凡八十三战”，虽然没有取得胜利，但也重创了唐军。王式发现剡县“城坚卒锐，不可遽拔”，乃“约降”裘甫，许其当官，被裘甫拒绝。但是，在众寡悬殊的形势之下，裘甫、刘晔等100余人，于六月二十一日深夜突围，不幸中伏被擒，全部壮烈牺牲。

刘从简撤出剡城以后，逃到大兰山（今浙江奉化西）继续坚持斗争，到七月间也失败了。

三、桂林戍兵起义

裘甫起义失败8年以后，徐州一带爆发了一次规模更大、影响更深远的斗争。这便是著名的桂林戍兵起义。宋祁在《新唐书》上说：“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这次起义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早在咸通四年（863年）的时候，唐政府派一批徐州、泗州的兵士到南方去防御南诏。其中800人驻防桂林，约定3年为期。期满后，延长了3年。到了咸通九年，戍兵眼看年限又满，可以还乡与家人团聚了。不料上司决定再延期1年。这些上司平日作威作福，兵士本已恨极，到这时候，更加怒不可遏了。

徐州风俗尚武，一向多慷慨悲歌的壮士。戍兵之中，都虞候许佶、军校赵可立、姚周、张行实曾经参加过农民起义，有斗争经验。他们带头起义，杀死都将王仲甫，推粮料判官庞勋做首领，北上还乡。这是咸通九年七月里的事情。

戍兵出湖南，沿长江东下，过浙西，进淮南，一路上无人敢于拦阻。九月向尽时，戍兵已经到了徐州境内。唐政府表面上

派人抚慰,并进行欺骗,说赦免戍兵的罪,实则暗暗地调动军队,阴谋镇压。庞勋、许佶等了解这情况,向部下宣言道:“大丈夫与其自投罗网,为天下所笑,何如戮力同心,赴汤蹈火!”众人踊跃欢呼,从此正式开展了武装斗争。

庞勋先乘虚攻占宿州,散发城中库藏,号召百姓领取,把健壮的吸收入伍,1天之中,发展了好几千人。庞勋带着这支队伍,打败徐州的追兵,从降兵口中了解城中兵力单薄,才决定进攻徐州。起义军到了城下,安抚城外居民,绝不侵扰。居民也纷纷起来助战,把草车推到城门洞里放火,很快就攻破了城池。庞勋招募兵士,群众争先应募,父亲令儿子从军,妻子劝丈夫当兵,没有武器,便把锄头磨尖,权当刀枪。一时徐州附近,义兵云集,达五六万人,连同以后陆续参加的,总计不下20万人。

义军以徐州为中心,攻占今山东南部、江苏、安徽北部的广大地区,据有淮口(泗水入淮之口,在今淮阴北),截断运河交通,威胁唐朝的生命线,造成极大的声势。义军虽没有攻下淮河北岸的泗州(在今盱眙对岸水下),而兵锋曾达淮南的滁州、和州。唐政府江淮间的交通,先取道寿州(今寿县),不久又为庞勋所围,交通线再次断绝。这大约是在九年十二月里。几个月中,打出了那么大的局面,确实不易的。

但是在发展顺利的时刻,义军内部却孕育着失败的因素。庞勋打了几个胜仗,便骄傲自满。他对唐朝抱有幻想,以为占了点地盘,不怕政府不给他个节度使,因此没有及时自树旗帜,提出鲜明的斗争目标。他明明有力量席卷淮南,尽占长江以北的土地。淮南节度使令狐绹不会打仗,却会使缓兵计,只

说愿为庞勋奏请朝廷，给他节度使的官职，庞勋就信以为真，不向淮南进兵。

唐政府得了这个机会，从容集中兵力。都招讨使康承训以宋州（今河南商丘）为基地，集结各路兵马 7 万余人，其中沙陀首领朱邪赤心的 3000 骑兵，尤为精锐。唐政府又以马举为南面招讨使，从淮南北上；曹翔为北面招讨使，驻扎在滕县、沛县；另外有一支魏博兵，屯在丰县、萧县一带，虽不受曹翔节制，实际上也是北路军的一部分。咸通十年（869 年）初，唐三路兵马发动攻势。康承训的主力先破王弘立，又破姚周，屠杀义军数万人，进占宿州以西 80 里的要地柳子。

到了这时庞勋才决心和唐朝决裂，于四月中称天册将军，号召所部，戮力同心，转败为功。然而时机已逝，再也无法挽回了。

唐南路军举解泗州之围，进围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又分兵打败淮河北岸的援军。庞勋北救丰县，打败了魏博兵，掉过头，乘胜去打柳子，想一举打破康承训军，不料被叛徒泄密，反而被康承训用埋伏计打败，受了很大的损失。

九月，康承训陷宿州，进围徐州。庞勋率部西进，想攻击唐军后方的宋州、亳州（今安徽亳县），而徐州先失，许佶等被杀，康承训以沙陀兵为前锋，进行追击。义军在蕲县（属宿州，在今宿县南）西面的涣水沿岸被困，庞勋力战而死。

庞勋从起事到失败，共经 1 年零 2 个月，部将吴迥坚守濠州，从夏至冬，到十月里城破，吴迥突围战死。

唐军杀害了起义军的首领，屠杀了许多起义军将士和依附起义军的人民，然而他们不可能杀完一切要反抗的人民。起

义军的余众散在山东各地，伺机再起。这对于王仙芝、黄巢的大起义，是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

四、黄巢起义

天补平均大将军

唐朝镇压了裘甫、庞勋起义，并没能缓和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反而埋下了更大的不稳定。懿宗又不思励精图治，而是骄奢荒政，宠信谀臣、贬窜忠良。咸通十一年（870年），庞勋起义的余部就相聚闾里，散在兖、郛、青、徐之间，进行反对朝廷的活动。这个地区成了唐末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的热点，终懿宗朝，都没能消除这个热点。咸通十四年（873年）七月十八日，懿宗死，时年41岁。大宦官刘行深、韩文约杀长立幼，立懿宗第五子普王李俨即位，改名僖，是为僖宗，时年12岁。这个小皇帝专事游戏，斗鸡打毬，把政事全委托给从普王府带进宫来的左神策中尉田令孜。

这年秋，自虢州（今河南灵宝）直到海边，发生了大旱灾，小麦只收了一半，秋粮几乎颗粒不收，老百姓只能以草为面，磨叶成粉充饥，无数百姓饿死。官府还要催缴钱粮，逼得百姓撤屋伐木、卖妻鬻子。整个关东地区燃烧起来了，一股一股贫民揭竿而起。僖宗乾符元年（874年）十一月，濮州（今河南范县）盐贩子王仙芝率众数千，在长垣（今河南长垣）起义。乾符二年（875年）正月三日，他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传檄诸道，挟击唐朝廷官吏同裘甫起义一样，要建立一个

以公平为原则的社会。六月，王仙芝与大将尚君长一起攻克濮州、曹州（今山东曹县），队伍迅速壮大到数万人。

王仙芝贩私盐有个老搭档，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黄巢。黄巢是曹州冤句（今曹县西北）人，能文能武、善骑能射、任侠好义，曾经多次考科举落第。王仙芝起义，黄巢毅然投笔，与弟黄揆等聚众数千响应。

七月，关东又发生大蝗灾，赤地千里、民不聊生、饿殍遍野。于是更多的农民纷纷聚义，多的千余人，少的数百人，投入王仙芝、黄巢起义。数月之间，黄巢所部也发展到数万，攻州略县，横行山东。

唐朝廷诏调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五镇军急速集结曹濮地区镇压。十二月，以平卢节度使宋威为诸道行营招讨草贼使，统一指挥各道。乾符三年（876年）七月，宋威率军在沂州城下，与王仙芝大战，获胜。王仙芝、黄巢突然踪迹全无。宋威表奏王仙芝、黄巢已被消灭，就遣散诸道兵，自己也回青州（治所今山东益都）去了。百官入朝晋见僖宗，庆贺天下太平。

谁知过了三日，各州县纷纷上表报告说发现了王仙芝。朝廷只得又诏调诸道兵，惹得被征调兵士怨怒思乱，战斗力大为削弱。八月，王仙芝、黄巢乘虚挥师西进，攻克阳翟（今河南禹县）、郟城（今河南郟县）。九月，攻克汝州（今河南临汝）、阳武（今河南登封东南），兵锋直逼洛阳，东都大震。朝廷急命宋威统率本镇及平卢、宣武等四镇兵进驻亳州（今安徽亳县），诏忠武节度使崔安潜发兵迎击，又调昭义节度使曹翔率步骑5000守卫东都，任命左散骑常侍曾元裕为招讨副使守卫东都，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扼守汝、邓（今河南邓县）要路，邠宁节度使

李侃、凤翔节度使令孤绹守陕州、潼关以防义军入关。

王仙芝西攻郑州、中牟后，突然翻过伏牛山，疾驱五六百里，攻打唐、邓 2 州。再长驱南下 600 多里，攻克郢（今湖北钟祥）、复（今湖北天门县西北）2 州。十二月，回师攻申（今河南信阳）、光（今河南潢川）、庐、寿（今安徽寿县）、舒（今安徽潜山）州，又南攻蕲（今湖北蕲州）等州。黄巢也率部穿过山渣岬山（今河南遂平县西），与王仙芝部平行南下，在蕲州会合。

这时两支义军只剩下 5000 人马，王仙芝想受朝廷招安求官，派降官王镣送书信给蕲州刺史裴偃。裴偃正中下怀，与王仙芝约定，双方收兵不战，由他向朝廷为王仙芝求官。裴偃是宰相王铎的门生，他开城门延纳王仙芝、黄巢等义军将领 30 多人，设宴置酒，还送了义军很多财货，当场具表给朝廷为王仙芝请求委任状。

不久，宦官专程从长安到蕲州，送来告身，委任王仙芝为左神策押牙兼监察御史。王仙芝拿到告身很高兴，王镣、裴偃等人都去向他祝贺。黄巢闻讯赶来反对，大发雷霆，大骂王仙芝：“当初大家共立大誓，横行天下，如今你一人想去左军当官，叫 5000 弟兄到哪里去！”说完，痛打王仙芝，义军将领齐声反对不已。

王仙芝怕触犯众怒，就没有受命，烧了官舍，在城中驱杀，裴偃逃奔鄂州去了。但黄巢与王仙芝从此分裂，王仙芝与尚君长带了 3000 余人，黄巢带了 2000 余人，在蕲州分道而去。

黄巢率部北上，行军 1500 里，乾符四年（877 年）春攻克郢州（今山东郢城）、沂州，杀天平节度使薛崇。然后突然再下山渣岬山，与据山留守的尚让会合，休整。七月，回兵中原，进攻

宋州，与宋威所率忠武、平卢、宣武三镇兵大战，打得宋威躲进城中不敢出战。朝廷派左威卫大将军张自勉率兵 7000 赶来增援，黄巢怕受夹击，避其锋芒，不得不撤围，南下攻克安州，略地蕲、黄（今湖北黄冈北），又突然北上，攻克匡城（今河南扶沟西南）、濮州，打得唐朝廷晕头转向。

与此同时，长江以南也活跃着一支由柳彦章率领的起义军，他们攻占江州（今江西九江）。俘虏刺史陶祥，在江州建立水寨水军，拥有 100 余艘战船。

王仙芝与黄巢分裂后，一直在湖北辗转作战。八月，攻克随州（今湖北随县），活捉刺史崔休征，略地复、郢，连续打了几次胜仗。但唐朝廷已知王仙芝有投降之心，十一月，招讨副使、都监杨复光派判官吴彦宏招降王仙芝。王仙芝回派尚君长等 3 员大将去见杨复光议降，3 人在途中被宋威劫取。宋威上奏冒功，说他在战斗中俘获了尚君长等。杨复光得知后，上表揭露说尚君长是主动来投降的。朝廷派侍御史来审讯，审不明白，结果宋威杀了尚君长等 3 人。王仙芝白白牺牲了 3 员大将。

消息传到王仙芝军中，王仙芝大怒，率军自郢州直扑江陵（今湖北江陵）。荆南节度使杨知温不懂军事，不设防备。乾符五年（878 年）元旦，大雪纷飞，王仙芝渡过汉水，攻陷罗（大）城。城中将士退守子（小）城。杨知温若无其事，穿戴着文官袍帽上城抚慰士卒，还在城上赋诗给幕僚们看。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和驻扎襄阳的沙陀骑兵闻讯连夜赶来援救，在荆门（今湖北荆门）与义军遭遇，沙陀骑兵横冲直撞，义军战败。王仙芝得报，焚掠了江陵大城，往北向申州转移。

正月初五，王仙芝在申州遭到唐招讨副使曾元裕的袭击，死、降、散 2 万人。王仙芝被迫南返，穿过大别山区。二月，进入黄梅（今湖北黄梅）。不料曾元裕在此布置了伏兵，当王仙芝退入黄梅山时，官兵四起，王仙芝牺牲，5 万余义军大部战死，鲜血飞溅，染红了黄梅山峦。

黄巢挺进江南——攻克广州

唐朝统治集团内部，固然矛盾重重，极度腐败，但在对待农民起义这一点上，统治者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会暂时联合起来，动员一切力量，扑灭农民的反抗。当时，财政收入的主要地区——江南还控制在唐朝手中，那里的赋税不绝供应。这就使得统治阶级可以用搜刮来的财物“养兵”，增强军事力量。黄巢统率的农民军在山东、河南的活动中，到处受到唐朝官军的堵截。878 年 3 月，黄巢攻破沂州、濮州，遭到曾元裕所部的阻遏。起义军转攻河南的襄邑（今河南睢县西）、雍丘（今河南杞县），又受到唐军的阻拦。于是，起义军西击叶（今河南叶县）、阳翟，再度威胁到东都洛阳。

唐朝统治集团又慌慌忙忙地作了一番军事布署：急调屯在荆门（今湖北荆门）、襄州一带的曾元裕军队回洛阳，担任正面防务；增调河阳（今河南孟县西）、宣武、昭义兵 2000 多名守卫东都皇宫；又调义成军 3000 人扼守轘辕（今河南偃师东南）、伊阙（今河南龙门）、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等洛阳外围的军事据点，迅速地组成了对起义军的包围圈。在这种形势下，起义军是不宜于进攻洛阳的。于是，黄巢采取了长途急进、挺进江南的战略方针。一方面，江南是唐朝财政收入的主要来

源地,进军江南,就可以切断它的经济命脉;另一方面,江南唐军兵力薄弱,后防空虚;那时候,王仙芝的余部王重隐、曹师雄等已经攻占洪州(今江西南昌),在湖南、安徽、苏北一带活动,进军江南,就可以联合江南各地的反抗力量,壮大起义军的队伍。因此,向江南挺进,就意味着在经济和军事两方面给唐朝政府以有力的打击。实施这个战略方针是极为重要的。

878年(乾符五年)4月,黄巢率领起义军横渡淮河、长江,乘虚南下,进入江西,接连攻下了虔州(今江西赣州)、吉州(今江西吉安)、饶州(今江西波阳)、信州(今江西上饶),转战在浙江西部天目山区。起义军关心百姓疾苦,黄巢亲自为贫苦农民分盐,这对偏远山区的人民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农民踊跃参军,壮大了起义队伍。

唐政府急调高骈担任镇海节度使(驻杭州,今浙江杭州)。高骈以暴虐闻名,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大刽子手。他一到任,就分兵袭击起义军。起义军屡战不利。黄巢就采取机动灵活、避实就虚的战略,继续率军南进,攻入浙东。那年8月,起义军一度攻占浙东首府越州,浙东观察使崔璆投降。黄巢决定继续南下。本来打算从海路进入福建,但一时无法弄到供10万人远渡的船只。于是,起义军以顽强的意志和惊人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开辟了一条从衢州(今浙江衢县)到建州(今福建建瓯)长达700多里的山路,胜利地进军到福建。879年初(乾符五年十二月),起义军攻下了福州(今福建福州)。黄巢进城以后,一方面镇压了一批仇视农民起义的反动分子,另一方面对一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则采取了宽大政策。这对分化一部分阶级敌人,起到了良好的作用。起义军打击了福建大部分州县

的贪官污吏，大长广大群众的威风，革命力量有了较大的发展。8月，斗志昂扬的起义军战士，冒着酷暑，浩浩荡荡地通过潮州、梅岭山区，向南方重镇——广州（今广东广州）进军。岭南节度使（驻广州）李迢，在大军压境、兵临城下的紧急形势下，又唱起“招降”的老调，声称给黄巢“广州节度使”的官位，企图以此为诱饵来缓和农民军对广州的进攻。但是，黄巢不同于王仙芝，李迢也没有逃脱被俘的下场。

广州是唐朝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各国的珠宝、玉器、香料等奢侈品都由那里进口，我国的丝织品、瓷器等也由那里运往亚洲和欧洲各地。广州是唐政府主要的财赋供应地之一。那里聚集着许多豪商、恶霸，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掠夺和奴役。10月，起义军攻下了广州，这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给了唐政府严重的打击。一大批贪官污吏、豪商恶霸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起义军又分兵西取桂州（今广西桂林）等州县。到此，东起广东、福建，西至广西、海岭以南的东西千里之地，都在起义军的控制之下，农民军挺进江南获得了完全的胜利。从878年春起义军渡过长江起，到879年秋起义军攻下广州、控制岭南大片土地止，历时约1年半。黄巢率领农民军战士，顶风冒雨、披荆斩棘，始终以坚定的革命意志、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进行着武装斗争。在南下过程中，起义军先后途经今河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8个省区，沿途会合了在江南坚持斗争的王仙芝的余部，吸收了广大的贫苦农民，队伍迅速发展到了几十万人。农民起义军之所以得到发展和壮大，其重要的原因是紧密联系广大贫苦农民，关心他们的疾苦。起义军

所到之处，都采取了焚烧反动官府、处死贪暴官吏、救济贫苦人民等符合广大劳动群众愿望的革命行动。所以，群众拥护起义军、参加起义军，是理所当然的。

大举北伐克长安

黄巢在岭南积极准备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把矛头直接指向唐朝的中央政府。他发表文告，自称义军百万都统兼韶广等州观察处置使，历数宦官专权、官吏贪污残暴、考选不公、埋没人才等弊病；宣称禁止刺史添置私产，县令贪赃者灭族；明白表示引军北上，入潼关克长安的决心。这篇文告得到了人民的欢迎，把斗争引向一个更高的阶段。

这年十月，黄巢大军从桂州（今广西桂林）出发，编了几千只大木排，乘着水涨之势，浩浩荡荡，沿湘江而下，经永、衡 2 州（今湖南零陵、衡阳），直抵潭州（今长沙），猛攻 1 天，便打下了这座 10 万大军防守的城市。

这时担负镇压义军任务的是荆南节度使、南面行营招讨都统王铎。他原任宰相，是个典型的老官僚。他带着一批“旧族子弟”的幕僚，在江陵纵情声色、逍遥自在，把前方的军事交给部将李系负责。李系是名将李晟的曾孙，其实不懂军事。只会在没事时说大话。王铎却以为李氏家世代良将，必然可用，派他去守潭州。不料黄巢兵临城下，他便急急忙忙地溜掉，把城池丢了。

尚让率领得胜之师，进逼江陵。尚让还没有到，王铎已逃往 440 里以北的襄阳去了。

十一月初六，黄巢大军进入江陵。这时江陵已被王铎的部

将大肆焚掠，变为一座空城了。

从当时的交通线来看，由江陵出襄阳，北入河南，距离最近，取径最直。黄巢本来也准备走这条路，但是到了距襄阳270余里的荆门时，中了唐将刘巨容、曹全晷的埋伏，前队败了一阵。黄巢一向惯用避实击虚的战法，他见正面唐军力量较强，便改变方向，于十二月初七放弃江陵，由水路沿江东下，攻破鄂州的外郭。在广明元年（880年）的上半年中，转战江南，先后攻下过饶、信、池（今安徽贵池）、歙、衢、婺（今浙江金华）、睦（今浙江建德）等州，西起江西、东至浙东，声势非常浩大。

唐政府用淮南节度使高骈做诸道行营都统，对付义军。高骈是个老军阀，颇有作战经验，当时驻屯扬州，兵精粮广，都统有调动各处兵马的权力，力量更是雄厚。他确是义军最强大的敌人。他不仅守淮南，而且派部将张璘深入江南，进攻义军。五月间，黄巢在信州一战歼灭张璘全军，大大地打击了高骈的气焰。这一仗为渡江北上打开了道路。

六月底边，起义大军攻克宣州。七月间，从采石（今安徽当涂西北）渡江，攻下和、滁2州（今和县、滁县），挥戈东指，直逼天长、六合，进至离扬州50里的地方。

自命为一世之雄的高骈，只想保全实力，不敢出战，诈称得了疯瘫病，躲在扬州城里不动。黄巢知道后顾之忧，在天长屯驻扎了40多天，在九月间全军渡淮，进驻今皖北豫东一带。

于是黄巢自称天补大将军（一作率土大将军），向各地唐军将领发出通牒，叫他们各守本境，不要听从政府调遣，前来抗拒；又声明吊民伐罪的宗旨，表示入京问罪，与众人无干。这样一来，唐军士气更加低落，藩镇只图自保，观望形势，因而朝

廷陷于孤立，河南郡县纷纷陷落。只有泰宁节度使齐克让一军，勉强抵敌，然而兵不满万，节节败退，连招架之功也没有了。

十一月十七日，黄巢率领 60 万大军，不战而下东都洛阳。留守刘允章与百官迎降。黄巢入城，慰问居民，秩序井然。

唐政府手里的武力只有神策军了。这支队伍多年来粮饷优厚，是宦官用以专制朝政、废立君主的工具。说起战斗力来，却是一点都没有。军士多半是富家子弟，出了贿赂取得军籍，仗这身份横行市井。一旦听说要打仗，连忙雇些病坊里的穷人做替身。这些人连兵器也不晓得怎么拿，哪里会打仗，何况他们哪里肯打，自然一接触便溃散了。

十二月初一（881 年 1 月 4 日），义军进至潼关，黄巢亲临前线，全军欢呼，声威之盛，真是惊人。唐军都是惊弓之鸟，那里见得这般阵势。齐克让军队在关外抵挡了一下，便烧营溃退。潼关旁边有个山谷，平日防商贩逃税，禁止通行，叫做“禁阨”，里面灌木寿藤长得异常茂密。溃兵夺路乱奔的时候，往“禁阨”里钻，一夜工夫居然踏成了一条平坦的道路。

初二，义军填平关外的天堑，进兵攻关。尚让和黄巢的外甥林言，分兵从“禁阨”绕到关后，前后夹攻，于初三天明时完全攻克潼关。

长安得讯，顿时大乱。十二月初五，僖宗和宦官田令孜带了几个亲王、妃嫔，率神策军 500 人，偷偷出金光门，昼夜不停地飞跑，逃往西川。百官没有预料到局势变得这样快，早晨还去上朝，退朝之后，听得败兵进城，才惊慌逃窜。

溃兵、恶少乘机打劫，长安城中闹得乱糟糟的，幸而义军

赶到，很快制止了这场扰乱。

当天午后，前锋将柴存进入长安。唐朝金吾大将军张直方带了数十名文武官员，到霸上迎接黄巢。黄巢乘一辆金装肩舆，左右随从，披着长发，发上扎了红绸，手执兵刃，身披锦绣，团团簇拥着他。军队人强马壮，轻重车辆充塞道路，千里不绝，浩浩荡荡地进入京城。

长安一带的老百姓扶老携幼，潮水般涌去夹道迎接和观看义军的队伍。尚让沿路向人民说明义军宗旨：“黄王起兵，本为百姓，不像李家虐待你们，你们只顾安居乐业好了！”义军将士又将钱帛散发给穷苦百姓。这就是义军初入长安时的景象，也是唐末农民起义发展的顶点。

大齐金统皇帝

广明元年十二月十三日（881年一月十六日），含元殿上战鼓咚咚，这是黄巢即位的乐声。接着，他登丹凤楼，宣布赦书。新政权国号大齐，改元金统，任尚让为太尉兼中书令，赵璋为侍中，孟楷、盖洪为左右仆射兼知左右军事，崔璆、杨希古为同平章事。

新政府严厉地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唐朝皇族和大官僚地主，及一些顽固的反动分子。宰相豆卢瑑、崔沆等隐匿不出，被义军搜获杀死。张直方表面上带头迎降，实则包庇亡命之徒，阴谋复辟，也被查出处死。对长安一般朝官，规定三品以上停职，四品以下留任，参加义军的诗人皮日休也充当了翰林学士的职务。

金统二年（唐中和元年，881年），凤翔节度使郑畋纠合西

北各镇，反攻长安。四月初五，义军主动退出长安，宿营霸上。唐军先头部队进了城，大肆掳掠。城中的反动分子也活跃起来，有的帮唐军作战，有的混水摸鱼，跟着官兵抢劫。义军乘此机会，由孟楷统兵，重入长安，杀死唐将程宗楚、唐弘夫等，把入城部队消灭了八九成。四月初十，黄巢回到长安，对城里的反动分子进行了一次镇压。

大齐金统政权建立了，郑畋指挥的反攻被击退了。黄巢领导的义军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然而他没有料到，胜利正在偷偷地从他手里溜走。

黄巢进了首都，没有乘胜追击，彻底消灭唐朝中央政府；组织新政府以后，又没有进一步考虑应该实行哪些措施，来巩固斗争的成果，实现原先的远大意图。从当时的情况看，他是把攻占长安、组织政权看做大功告成，可以坐待各方面的归顺。在巨大的胜利面前，他眼花缭乱了，有些陶醉了。

反动势力乘此机会整顿改组了它的阵线。唐僖宗到了兴元（今陕西汉中），便发布诏令，号召天下藩镇出兵镇压义军。他到了成都，情势安稳了，更可以在那儿发号施令。这个政府尽管腐朽，它的存在总表明唐朝并没有被消灭，使一切反动力量有重新组合的核心。

长安刚陷落的时候，许多地方军政长官惊慌失措，确有一些人表示愿意降齐，连那个郑畋也用诈降为缓兵之计。黄巢真的缓了兵。过了3个多月，形势大变，郑畋便联合各镇，反扑过来了。各地方的节度使，由于阶级的对立，在反黄巢这一点上，态度一致。分散的反动力逐渐联合起来，向长安采取围攻的姿态。

在义军这一面，军事地位由主动变成被动了。这是“流寇主义”造成的恶果。

多年以来，黄巢转战南北、避实击虚，使唐军防不胜防，取得辉煌的胜利。天下各地，多的是受苦难的农民阶级兄弟，义军不愁兵力得不到补充。地主阶级中一些找不到出路的人才，见义军强大了，也会前来投靠。流动作战正像滚雪球，愈滚愈大。在这个地区因“气候”不利而缩小了，滚到另一个地区去，又会迅速地扩大。至于给养粮饷，因为到处都有府库仓廩和豪富的资产可以没收，加上人民的输纳，决不会感到匮乏。这些是流动作战的好处，应该承认。但是进入长安以后，情况变了，这些有利条件统统消失了。

起义军一向没有注意巩固占领的地区，军队前进，就把占领的城市乡村都放弃了。这在初期力量不足无法固守，是不足为奇的。到了南方，由于要北上推翻唐政府，势难留兵岭南，这也合情合理。但是到渡江北上之后，取而代之的时机已经成熟，还不考虑这个问题，实在是个致命的错误。黄巢进了长安，所有不过关中的小部分，连东都洛阳也不在手里。于是一系列的问题都出现了。

首先是变成了挨打的目标。以前唐军处处设防，黄巢以全军击其一点，常占优势。如今坐守长安，遭受围攻，陷入了被动地位。

其次，兵源、饷银都没有了来源，出现了严重的粮荒。义军守着长安，失掉了与广大农民群众的联系，不要说没有土地来满足士兵和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连兵源也丧失了。关中地区，由于长期受唐朝统治者残酷的压榨和剥削，生产凋敝，向来苦

于粮食不足。义军数十万之众云集于此，粮食问题实难解决。加上唐朝军队在长安外围肆行掳掠，使这一带人口流散，土地荒芜。长安孤城，益发难以维持，粮价曾涨到3万文一斗，数百倍于晚唐的正常价格。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义军的力量就大大地削弱了。

另外，情况困难了，义军内部的裂痕也出现了。黄巢部下将领，能够不屈不挠坚持斗争到底的，很难举出什么人来；反之，在危急之际投到敌人阵营中去的，却很不少。这很可能是因为闯荡江湖的人多，真正从贫苦农民出身的少；顺利时一同打天下容易一致，艰难时肯力战牺牲的就不多了。但是朱温可以算做一个代表人物。他出身贫苦家庭，却从小不肯劳动，游手好闲，是个泼皮无赖。他会有一定的反抗性，但更富于投机冒险的习性。以参加起义始，以叛变投降终。

金统三年（唐中和二年，882年）九月，朱温叛变，在军事上给敌人打开了缺口。当时朱温驻兵同州（今陕西大荔），独当一面，负屏障长安的重责。不料他见义军声势渐衰，又与孟楷有点矛盾，竟降了唐朝。唐僖宗知道了，喜出望外，赐了一个名字，从此改叫朱全忠。

此后，唐军加紧了围攻，并调沙陀贵族李克用统领的4万名穿黑衣的“鹞军”，投入战斗。李克用本姓朱邪，李是赐姓。他是镇压庞勋的朱邪赤心的儿子，父子两代都是农民起义军的死敌。

金统四年（唐中和三年，883年）的春天，义军陷入了苦战的局面。同州梁田坡一役，伤亡数万，大将赵璋战死。接着华州等据点失守，长安屏障尽失，坐守危城，势必覆没。黄巢不得

已于四月初八晚上，撤出长安，由蓝田关入商山，望东而去，沿路边撤边故意把金银财宝丢撒在路上，追赶的官兵见了，争先恐后抢拾，无心紧追。于是黄巢摆脱了追军，平安退入河南。

黄巢进长安、弃长安，都没有什么破坏行动。唐军进了长安，烧杀抢劫、无所不为，宫室民居，绝大部分都遭破坏，壮丽的长安城几乎变成了一片瓦砾场。后来唐僖宗虽力加修缮，然而旧日的面目，一直没有完全恢复。

狼虎谷的悲剧

黄巢退出长安时，有兵 18 万人，战斗力仍很强劲。如果他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用己之长，击敌之短，仍旧可以大有作为。可惜他到了河南，又犯了一个战略错误，硬打陈州（今河南淮阳）300 天之久，结果遭到重大挫折，并且导致了失败的结局。

孟楷率领先头部队遭陈州刺史赵犇袭击，被俘牺牲。黄巢大怒，集结主力，围攻陈州。在感情冲动之下，他忘了利害，犯兵家大忌，屯兵坚城之下，不顾一切地猛攻。

日子一久，兵力疲乏，河南连年饥荒，粮食也非常缺乏。唐乘机集结援军，准备在陈州附近打一次歼灭战。金统五年（唐中和四年，884 年）五月初，黄巢被迫解围，引兵北上，在中牟（今属河南，在郑州、开封间）被李克用袭败。尚让带了一部分队伍，投到徐州节度使时溥那里；另外一些旧将，逃往汴州（今河南开封），投奔朱温，后来都成为朱温部下的大将。这些人都是农民起义军中的败类。

黄巢率余部东走，连遭追兵掩击。六月十七日，黄巢和兄

弟黄邝、黄揆、外甥林言等，退到泰山狼虎谷（在今山东莱芜境），力竭自杀。林言持黄巢弟兄的首级，带了黄巢的家属，投往时溥，也为追兵所杀。轰轰烈烈的持续 11 年之久的农民大起义至此结束了。

五、唐朝灭亡

朱温篡唐

吞灭秦宗权

镇压了黄巢起义，并没有能挽转唐朝急剧衰落的命运。在镇压黄巢起义中，各路诸侯都乘机拥兵自重、割据称雄，不受朝廷制命，相互攻并。汴州刺史朱温与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的战争刚刚停下来，朱温又同蔡州节度使秦宗权打了起来；沧德节度使王铎在漳南高鸡泊被魏博节度使子乐从训杀了，淮南、江南军将也在相互攻打，混战、军乱此起彼伏。

光启元年（885 年）正月，在这一片纷扰混乱中，僖宗从成都出发，三月十一日，返回长安。只见城中建筑十焚六七，宫阙破残、荆棘满城、狐兔纵横，破败不堪。十三日，僖宗御宣政殿，宣布大赦，改元光启。可这时李昌符割据凤翔，王重荣割据蒲、陕，诸葛爽割据河阳、洛阳，孟方立割据邢、洛，李克用割据太原、上党，朱温割据汴、滑，秦宗权割据许、蔡，时溥割据徐、泗，朱瑄割据郓、齐、曹、濮，王敬武割据淄、青，高骈割据淮南八州，刘汉宏割据浙东，都自擅兵赋、迭相吞噬，废置不由朝廷。

江淮转运路绝，两河、江淮赋税都不输供长安。朝廷号令，只行于河西、山南、剑南、岭南数十州，“王业于是荡然”。

起初，最厉害的是秦宗权。黄巢起义被镇压不久，他就称帝，设官分署，派部将四出攻略，秦彦掠江淮，秦贤掠江南，秦诰攻陷襄阳，孙儒攻陷孟、洛、陕、虢，张璠攻陷汝、郑，卢塘攻打汴州，攻陷附近 20 余州。所过屠残人物、燔烧城邑，使得西至关内，东到青、齐，南至江淮，北至卫、滑，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榛蔽野。光启元年六月，孙儒攻占东都，烧杀抢掠，东都变成一片废墟、鸡犬不留。

秦宗权的凶势在汴州、陈州遭到了阻遏。陈州刺史赵犇和朱温是儿女亲家，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顶住秦宗权的进攻。秦宗权越过陈州，把战场推进到汴州大梁城（今河南开封）城外，与朱温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兼并战争。光启元年十月，在城外八角镇，秦宗权大败朱温。光启二年（886 年）五月，朱温在尉氏（今河南尉氏）南战败秦将秦贤。秦宗权自以为兵力是朱温的 10 倍，竟然被他战败，就在光启三年（888 年）正月，倾全力来攻汴州。秦宗权部署张璠屯兵汴州北郊，秦贤屯兵城西板桥，各有兵力数万，列 36 寨，连绵 20 余里；卢塘屯兵万胜（今河南中牟县境），夹汴水筑营，断绝汴州粮路，要一举吞灭朱温。

朱温因汴州兵少，派大将诸军都指挥使朱珍为淄州刺史，去淄青招兵万余，买马千匹。四月，朱珍还大梁，朱温大喜说：“吾事成功了！”他召集诸将说：“敌人不知朱珍已到，一定还以为我们兵少畏敌。我们正好出其不意，先发制人。”于是他亲自引兵攻袭秦贤寨，士兵们鼓勇而进、踊跃争先，连拔 4 寨，斩万

余级，秦兵大惊。这时，朱温派遣到河阳、陕、虢的部将郭言也募兵万余赶到。朱温兵力大增，乘着漫天大雾，挟胜袭击万胜秦兵，掩杀殆尽。秦兵都徙到张晊的营寨，朱温乘胜追击，斩杀2万余。五月，再次出击，大败张晊。

听说围城秦兵大败，秦宗权率精兵从郑州赶回，会合张晊，进攻汴州。朱温不敌，向朱瑄求救，朱瑄、朱瑾弟兄率兖、郓兵赴救，义成军也同时赶到。朱温合4镇兵反攻，在汴州北郊边孝村大败秦宗权，斩首2万余级，一直追击秦宗权到汴州西北90里的郑州阳武桥才奏凯还师。秦宗权弃了郑州，逃回蔡州。其余占据东都、河阳、许、汝、怀、虢的秦将也弃城焚舍而去。朝廷任命扈驾都头杨守宗为许州事，朱温以其将孙从益知郑州事。

从此，秦宗权势力日益衰落，朱温崛起中原，举足轻重。他野心勃勃，常想外掠，扩展地盘、吞并邻道，因感兵力不足，而四境又都是割据的藩镇，时常郁然不快。馆驿巡官敬翔探知他的心事，向他献计说：“明公想图大事，可一有举动必为四境乘机入侵。如今只要指使麾下将士假叛逃到邻道，然后明公奏告朝廷，传告四邻，以自伐叛徒为名就可出兵并吞邻道了。”朱温大喜说：“真是天降奇人来帮助我了。”从此，他就依计而行，不断攻袭邻道、攻城夺池，在兼并战争中，朱温势力日益发展。

僖宗文德元年(888年)二月，僖宗封朱温为蔡州四面行营都统，诸镇兵都受他节度，实际上赋予了朱温征伐吞并邻道的合法权力。三月六日，僖宗暴死，时年27岁。大宦官杨复恭拥立皇太弟寿王杰即皇帝位，改名敏，是为昭宗。五月，昭宗加封朱温兼侍中。这时襄阳守将赵德湮估计秦宗权必败，举山南

东道投降了朱温。朱温大举进攻蔡州，在城南大败秦宗权，又攻克北关门。秦宗权退守蔡州中城。朱温部署诸将环城筑 28 寨，围困蔡州。八月，攻克蔡州南城。九月，朱温因粮草没有及时运到，又见秦宗权已是强弩之末，引兵还汴州。十二月，蔡州将领申丛砍了秦宗权的脚，把他囚禁起来，投降朱温。昭宗龙纪元年（889 年）正月，蔡州将领郭璠又杀了申丛，槛送秦宗权到汴州。二月，朱温献秦宗权到长安处斩。三月，昭宗加封朱温兼中书令，进爵东平郡王。朱温军势大盛，取代了秦宗权而成为中原最大的割据势力、唐朝廷最大的威胁。

昭宗在位期间，朱温在朝廷中有奸相崔胤做他的内应，专事东吞西并。到乾宁四年（897 年）二月，朱温灭朱瑄，于是天平（郓、齐、曹、棣）、秦宁（兗、沂、密）、感化（徐、宿）、忠武（陈、许）、宣义（郑、滑、濮）5 镇 14 州全归朱温。到昭宗光化三年（900 年）十月，朱温率军攻打定州（今河北定县），于是河北诸镇都表示服从朱温。举目天下，已无人能独力抗衡朱温了。

进封梁王

乾宁四年十一月六日，长安发生宫廷政变。神策军左右中尉刘季述、王仲先等率禁兵千人把昭宗禁闭在少阳院，矫诏称昭宗为上皇。十日，拥立太子。宰相崔胤向在定州行营的朱温告难，要他发兵问罪。朱温还师大梁，正好刘季述派养子希度和供奉官李奉先送到矫诏，还许诺把大唐社稷送给朱温。朱温犹豫不决，召将佐商议。有人认为：“朝廷大事，不是藩镇所应当参预的。”天平节度副使李振主张出兵靖难，说：“王室有难，这实在是建立霸业的最好机会。一个宦官小子敢废天子，公不

能讨伐，怎么还能号令诸侯。而且幼主位定，天下之权就尽归宦官了。不靖王室，是把太阿之柄授于他人。”朱温正想挟天子以令诸侯，于是大悟，囚禁了使者，派亲吏蒋玄晖到长安与崔胤共谋平乱。

右神策中尉王仲先治军很严，查出贪污舞弊的军校都痛打不恕，还要追出赃款，禁兵一向对他不满。昭宗被禁，左神策指挥使孙德昭尤愤愤不平。崔胤侦知，命判官石戡笼络孙德昭，传示崔胤的衣带书，要他杀刘季述、王仲先二人，迎上皇复位。孙德昭一口答应，又去联络了禁兵将领董彦弼、周承海。十二月二十五日，孙德昭伏兵安福门，杀了王仲先。天复元年（901年）正月初一，昭宗复位，在长乐门楼接受百官朝贺，董彦弼、周承海捉了刘季先等大宦官，押到楼前受审，乱仗打死。昭宗论功行赏，任孙德昭同平章事、充静海节度使，崔胤进司徒，进封朱温东平王。

朱温野心更大了，存心要篡代唐室，积极谋划。他收服了河北，命大将张存敬率兵3万进军河中，剪除最大的敌手李克用的羽翼。河中节度使王珂是李克用的女婿，遣书向李克用告急。李克用还书说他众寡不敌，不如弃城举族归太原。王珂又遣书向凤翔、昭义节度使李茂贞求救，李茂贞连回音也不给。二月，张存敬兵围河中，城中守兵都无斗志，于是王珂请降。朱温得报，从洛阳赶到河中受降，将王珂举族迁往大梁，派人在途中杀王珂。

李克用派使者送重金给朱温修好，朱温怪李写的信言辞不逊，派大将氏叔琮统兵5万合魏博等镇兵大举进攻河东。氏叔琮连克泌州、泽州、潞州，直抵晋阳。李克用日夜抵御，挡住

了氏叔琮的攻势。后因粮草供应不上，又逢连日大雨滂沱，士卒疟疾痢泻不止，朱温才命氏叔琮撤围还兵。但在篡唐的道路上，已不必再担心李克用与他角逐了。昭宗又封朱温为宣武、宣义、天平、护国(河中)4镇节度使。于是，自蒲、陕东到海滨，南起淮水直到黄河诸镇都为朱温所有。

当时凤翔、昭义节度使李茂贞也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意。李茂贞镇处关中，侧近长安，又和左神策中尉韩全海勾结，政治地理形势较为有利。宰相崔胤是朱温的死党，建议昭宗尽诛宦官。韩全海侦知了崔胤的密谋，指使禁兵对昭宗喧闹控诉崔胤减损禁兵冬衣。昭宗不得已，解除了崔胤的盐铁使，夺了崔的财政大权。这时，李茂贞又请求昭宗迁居凤翔。崔胤自知密谋泄露，急忙报告朱温，伪称昭宗诏他以兵来迎驾。

朱温得书，于十月二十日率4镇兵7万清君侧。二十九日，兵到河中，上表请昭宗迁东都。京城大恐，士民逃窜山谷，百官都不入朝，阙前寂无一人。

四日冬至，韩全海与凤翔护驾都将李继海陈兵殿前，纵火烧了后宫院，挟持昭宗与皇后、妃嫔、诸王百余人，直趋凤翔。朱温南渡渭水，直抵长安。崔胤率文武百官迎接，劝促朱温西迎昭宗。朱温挥师西进，直抵凤翔，屯兵城东。李茂贞挟天子命朱温还镇。又诏河东李克用发兵进攻河中。朱温移兵邠州(治所今陕西彬县)。十二月，攻克盩厔，令崔胤率百官及长安居民迁往华州。天复二年(902年)，朱温移军武功。二月初一，李克用在平阳(今山西临汾)取胜的消息报到，朱温还军河中，调兵遣将迎击李克用，取慈、隰、汾3州。从此，李克用连续多年不敢与朱温相争。

四月，崔胤怕李茂贞劫持昭宗到四川，从华州赶到河中，泣诉朱温，力劝他及时迎接昭宗。五月，朱温自率精兵 5 万从河中进军凤翔。凤翔人畏之如虎，都逃入城中。朱温在虢县大败李茂贞，重抵凤翔城下。九月，因为久雨不止，士卒多病，朱温又召诸将商议还兵河中。部将高季昌、刘知俊说：“天下英雄，观战已有一年了。如今茂贞已困，为什么要舍此而去！”朱温担心李茂贞坚壁不出，高季昌献了诱兵计。

秣马饱士后，朱温按计命一支骑队诈逃。李茂贞果然中计，倾巢而出，攻击朱温大营。朱温在中军擂鼓，鼓声一作，百营俱出，纵兵大杀，凤翔兵被杀伤殆尽。朱温又遣轻骑数百占据凤翔城门，断了李茂贞退路。李茂贞进退无路，被迫与朱温议和，答应送昭宗还京。

可李茂贞进城就反悔。十一月，保大节度使李茂勋率兵万余来救凤翔，被朱温击退，遣使投降。到十二月，关中州镇都被朱温占领，凤翔成了孤城，城中又粮食缺乏，连诸王妃嫔也只能一日食粥一日食汤饼。李茂贞只好谋诛宦官，以向朱温求和。

光复三年（903 年）正月，李茂贞请昭宗诛宦官。昭宗听从，部署凤翔兵捕杀了韩全海等 20 余首谋西迁的宦官，把他们的首级送到朱温营中。二十二日，昭宗亲自到朱温大营，朱温素服待罪，顿首流涕。昭宗也不禁哭泣，说：“宗庙社稷，赖卿再安；朕与宗族，赖卿再生。”昭宗解下玉节带赐予朱温。二十七日，朱温杀了数百宦官，只留下 30 名小黄门在宫中服杂役，并以崔胤兼判六军十二卫事，典掌禁军。二月，以昭宗幼子辉王祚为诸道兵马元帅，加封朱温守太尉、充副元帅，升爵梁王，

进崔胤为司徒兼侍中。从此唐朝的军政大权全归朱温掌握，昭宗成了朱温手中的傀儡。

追弑昭宗

朱温并吞关中，威震天下。这年，西川王建遣使与朱温修好，平卢节度使王师范举青州投降朱温。朱温加快了篡夺唐室的步伐。他想让昭宗到洛阳，怕崔胤持异议，元祐元年（904年）正月，上表密奏崔胤专权敌国、离间君臣。九日，昭宗贬崔胤为太子少傅，次日下诏数崔胤罪状。十二日，朱温密令他安插在京师的宿卫都指挥使朱友谅包围崔府，杀了这个多年与他狼狈为奸的老伙计崔胤及其亲信数人。接着，挟余威请昭宗迁都洛阳。

正月二十一日，朱温荐任的宰相裴枢收到朱温的信，催促百官东行。第二天，长安士民被驱赶上路，一路哭号不止。边哭边骂：“都是贼臣崔胤召朱温来倾复社稷，害得我们流离失所！”二十六日，昭宗离开长安。朱温命亲将宫苑使张廷范毁坏长安宫室百司及百姓庐舍，拆取了木材，在渭河上搭浮桥而下。长安从此成了一片废墟。

闰四月，朱温尽杀宦官，把内廷的小黄门200多人也全杀了，统统用汴州兵代替。于是，昭宗左右都是朱温的人。十日，昭宗被强迁入洛阳。

昭宗被朱温劫持，天下大惊。李克用、李茂贞等天下藩镇相互移檄联络，要兴复唐室。朱温认为昭宗有英气，担心朝中生变，谋划另立幼君，以便禅位给自己。他派遣判官李振到洛阳，与枢密使蒋玄晖、左龙武统军朱友恭、右龙武统军氏叔琮

商议，伺机下手。

天祐元年(904年)八月十日夜，昭宗酒后就寝于皇后的椒殿。蒋玄晖派龙武牙官史太等百人叩宫，称有急事要面奏。夫人裴贞一开门见黑压压兵临宫门，大惊说：“急奏为什么要带兵？”史太二话不说挥刀杀了她。蒋玄晖带兵冲入，大声问：“至尊在哪里？”昭仪李渐荣临轩高呼：“宁杀我们，勿伤大家(皇帝)！”昭宗闻声急起，披了件单衣，绕柱而逃。史太紧追不放。李昭仪以身掩护昭宗，也被史太一刀杀了。昭宗终于被史太追上，杀害，时年38岁。

第二天一早，蒋玄晖矫诏，声称李渐荣、裴贞弑逆，被诛，立辉王祚为皇太子，更名柷。李柷在枢前即位，年13，改元天祐，是为昭宣帝，又称哀帝。

白马驿之祸

朱温于天复三年(902年)引兵入关，并打败了李茂贞，抢到昭宗，迁至洛阳。随后又在天祐元年(904年)，杀了昭宗，立昭宣帝，并控制了唐朝政权。自此后，唐室衰微，朝臣官僚仅备员而已。同时，一些旧臣百官见所倚之主倍受凌辱，因而阴私悲愤之志，又对那些新发迹的官僚看不起。朱温为了打击旧日的高门望族，扫清妨碍他篡唐称帝的社会势力，一方面培养自己的心腹，另一方面也想要清除朝内旧臣。

旧臣柳璨，进士及第后4年不到便官至宰相，他性格倾巧轻佻，竭力曲意奉承，是朱温的心腹要人。当时，同为宰相的裴枢、崔远、独孤损自命朝廷宿望、清流高族，有意轻慢他，使柳璨感到不快。当时有个名叫张廷范的，原来是戏子，因为受到

朱温的宠幸而提升为太常卿。裴枢以为廷范是有个有功之臣，既然得到了方镇，就不应再授以掌礼乐的太常卿的官职，朱温听了后很不高兴，说：“我常常以为裴枢器识真纯，不会加入到浮藻的党争之中，听到他这番议论，可知道他的本性了！”柳璨趁机到朱温处污蔑裴枢，以致使裴枢、崔远、独孤损被贬除宰相之职。当时正好有天空星变，占卜的人以为“君臣俱灾，宜诛杀以应之”。柳璨又列出他平时不满意的旧臣，到朱温那里谄告，说：“这些人聚众议论时事，满心的怨望，可以用他们来预防突变。”朱温的谋臣李振，因为屡屡考进士不中，因此对那些高门学士们非常嫉妒。他只要一到洛阳，就必然会有些人被他赶下官位，时人称他为“鸱鸟”。他遇见那些朝廷人士总是颐指气使，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这时，他也在朱温面前进言说：“朝廷长期得不到治理，是由于这些衣冠浮薄之徒紊乱纲纪，大王你如果想图大事，这群人都属于朝中难以制服的人，不如将他们彻底清除。”于是，朱温将独孤损、裴枢、崔远 3 人贬为地方刺史，不久又将他们贬为地方司户。

李振等对此还不甘心，又进言说：“这帮人常自谓清流，宜投入黄河，使为浊流！”朱温笑着答应了他的建议。天祐二年（905 年）六月，朱温假敕赐裴枢、独孤损、崔远、陆扈、王溥、赵崇、王赞等自尽，将这些朝中官员 30 余人集中在滑州白马驿，在晚上将他们全部杀死，并把尸体抛入黄河。当时，朱温与僚佐、游客们一同坐在大柳树下，朱温一人独自言语道：“这株柳树适宜于做车毂。”众人没有响应的，只有几个游客起身说：“适宜做车毂。”朱温勃然大怒，严厉地说：“书生之辈喜好顺口附和以玩弄人，都像这样。车毂必须用榆木制作，柳木岂能制

作！”让左右人将那些说话的游客全拉去打死。柳璨还想进一步迫害旧臣文士，直到张文蔚力解才止。

白马驿之祸是对唐廷旧臣的一次较彻底的清除，也以此而结束了绵延多年的唐朝官僚集团的党争。

梁王受禅

朱温弑了昭宗，为了推卸罪名，掩人耳目，塞天下人之口，贬死李彦威、氏叔琮。天祐二年（905年）二月，朱温又指使蒋玄晖缢杀了昭宗诸王子，投尸池中。六月，朱温又聚杀了裴枢等朝士30多人，投尸黄河。他为所欲为，百官都俯首听命，唐朝廷实际上已成了梁王朝廷。

到了秋天，朱温又收了唐、邓、复、郢、均、房、荆、襄州。他取代唐室的心更迫切了，日夜在大梁修建宫阙，并密嘱右谏议大夫、同平章事柳璨与蒋玄晖等密议传禅事。柳、蒋等议：魏晋以来，都是先封大国，加九锡、殊礼，然后受禅，梁王受禅也应按这次序进行。他们把议定的程序报告了朱温。朱温急着要当皇帝，一听还要有这么多的程序，不由大怒。王殷等原本妒嫉蒋玄晖权宠，这时乘机谗言，说蒋、柳等人想延长唐朝寿命。

消息传到蒋玄晖的耳中，他吓得急忙去见朱温，说明详情。朱温不悦，说：“你们讲这些闲事来阻我大事，假使我不接受九锡，难道就不能作天子了吗？”蒋玄晖忙辩白说：“唐祚已尽，天命归王，这是愚人智者都知道的。玄晖与柳璨不敢违背王德，但因如今晋李克用、燕刘仁恭、岐李茂贞、蜀王建都是我们的劲敌，王受禅过快，他们不服。所以不得不一步一步来，这是为王创万代之业呵。”朱温大声怒斥说：“奴才果然反了！”玄

晖吓得诚惶诚恐，急忙辞别，与柳璨加速进行。

半个月后，哀帝按柳璨、蒋玄晖议，以朱温为相国，总百揆；以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天雄、武顺、佑国、河阳、义武、昭义、保义、戎昭、武定、泰宁、平卢、忠武、匡国、镇国、武宁、荆南等 21 道 69 州为魏国，进封朱温为魏王，加九锡。十二月四日，蒋玄晖传带哀帝手诏去大梁见朱温，朱温怪事情办得迟了，怒不接受。九日，蒋玄晖还报哀帝，说梁王怒不消解。次日，柳璨奏称：“人望归梁王，陛下释重负，如今真是时候。”促哀帝速速禅让。当天哀帝就派柳璨到大梁传谕禅让之意，朱温假作姿态，不接受。

这时，何太后哭着差遣宫人去请求蒋玄晖，皇帝让位以后，能保全她和皇帝的性命。这事又被王殷等侦知，王殷再次向朱温进谗言，说柳璨、蒋玄晖、张廷范夜赴何太后积善堂宴会，对太后焚香发誓，要兴复唐宗。朱温大怒，密杀何太后；斩了蒋玄晖，焚尸都门；车裂张廷范，斩了柳璨。柳璨临刑前高呼：“负国贼柳璨，死得应该！”

元祐三年（906 年）秋，朱温在平定贝、博、澶、相、卫 5 州后，大举进攻幽州、沧州、久攻不下。这时潞州守将昭义节度使丁会闻昭宗被弑凶讯，倒戈，举军投降了李克用。朱温烧营而还，休兵贝州。他自感威望受挫，深恐内外离心，决意迅速受禅。

决年（907 年）正月十七日，哀帝派御史大夫薛贻矩到大梁慰劳朱温。薛贻矩见了朱温说：“殿下功德在人，天、地、人心都已去唐室，皇帝要行禅让之事，做臣子的哪敢违背。”说完，就行君臣大礼。薛贻矩还洛阳，报告哀帝说：“梁王有受禅之意

了!”于是哀帝下诏,在二月禅位给梁王。

二月,唐大臣们共奏请哀帝退位,宰相又率领百官到元帅府劝进,朝臣、藩镇也相继向朱温劝进。

三月十七日,唐哀帝降御札禅位给朱温,大唐自公元 618 年李渊建国至今,走完了 290 年的历程,宣告灭亡。

四月,朱温改名晃,正式即皇帝位,改元开平,梁朝建立。

开平二年(908 年)二月二十一日,唐末代皇帝李柷被朱温所害,年仅 17,谥曰哀皇帝。

第五章 五代十国

第一节 五代的更替

一、梁唐春秋

柏乡之战

朱温称帝后，其最大的威胁是河东的李克用。李克用原是西北沙陀族的首领。李克用父子以拥有一支剽悍善战的沙陀骑兵而著称。因助唐镇压黄巢起义军有功，唐僖宗中和二年（882年），被任为河东节度使，封为晋王。从此李克用以河东为基地，经营扩展，逐步占有山西大部地区，成为割据势力中又一个实力最强的集团，朱温称帝后，李克用打着“匡复唐室”的旗号，联络其他割据势力反对朱温，成为后梁的劲敌。

其子李存勖亦颇有才略。他继承王位后，采取了“举贤才，

黜贪残，宽租赋，抚孤穷，申宽滥，禁奸盗”等一系列稳定社会的措施，并着力整饬军纪、练兵备战。在短短的几年内，使晋“境内大治”、“士卒精整”，为以后“兼山东，取河南”奠定了基础。

河北西倚太行，东临大海，南襟黄河，北接大漠，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对梁、晋双方来说，谁控制并占有了河北，就可以形成钳击对方的极为有利的态势。于是河北就成为梁晋拉锯争夺的一个重要地带。

当时，河北有成德节度使（治所镇州，今河北正定）、赵王王镒，义武（治所定州，今河北定县）节度使王处直，卢龙（治所蓟县，今北京西南）节度使、燕王刘守光三种割据势力。其中，刘守光的力量最强。开平四年（910年）十一月，刘守光出兵屯于涞水（今河北涞水），企图南下进攻镇、定2州。朱温早就觊觎镇、定2州，闻讯，便以帮助赵王王镒抗刘守光为名，遣其供奉官杜廷隐、丁廷微率兵3000分别进驻深州（今河北深县）、冀州（今河北冀县），妄图以此为借口吞并镇、定2州。赵深州守将石公立识破了朱温的野心，请求拒绝梁军进入深州。但王镒却命石公立退出城外以避之。结果杜廷隐入城后立即“尽杀赵戍兵，乘城拒守”。王镒悔之已晚，复攻不克，于是遣使赴晋向李存勖求援。

这时，义武节度使王处直也遣使者来晋。成德、义武两镇经过协商，想共推李存勖为盟主，合兵攻梁。李存勖召集众将商议。许多将领认为，“镒久臣朱温，岁输重赂，结以婚姻，其交深矣，此必诈也，宜徐观之。”但李存勖认为，王氏在唐朝还或臣或叛，归服朱温岂能长久？他判断王镒“必择利害而为

之”。如怀疑不救，坐视朱温吞灭王镕，则于晋大为不利。于是，李存勖作出了与王镕、王处直结成反梁联盟的决策，遣周德威率兵出井陘（今河北井陘），屯于赵州（今河北赵县），以助王镕抗梁。至此，以李存勖为主的反梁联盟与朱温形成了对抗的态势。

开平四年十二月初四，朱温命王景仁、韩勣等率兵自河阳（今河南孟县南）渡河北进，与罗周翰合兵4万，经邢（今河北邢台）、洛（今河北永丰东南），于二十一日进至柏乡。王镕慌忙告急于晋。李存勖亦感到形势急迫，留蕃汉副总管李存审守晋阳，亲率主力出赞皇（今河北赞皇）东进，于二十五日至赵州，与周德威所部会合，迎击梁军。与此同时，定州王处直也派兵5000南下助战。

李存勖从俘虏口中得知，朱温在梁军出发前，曾对其前线指挥王景仁面授机宜，说王镕反复无常，终是梁的后患。此战务必为我攻而取之，将其翦灭。李存勖立即将这一情报送到镇州。进一步坚定了王镕附晋抗梁的决心。

十二月二十六日，李存勖兵进至柏乡以北30里处，以周德威为前锋率骑兵逼近梁营挑战，梁军坚壁不出。二十七日，李存勖军继续南下，驻扎于野河北岸，距柏乡仅5里。又派骑兵逼近梁营挑战，梁将韩勣率步骑3万，分兵3路迎击。晋军士卒见梁军衣甲鲜美，阵势堂堂，有些气馁。周德威及时鼓动说，这些兵都是汴州卫兵，外强中干，“十不能敌我一”，于是，身先士卒，亲率千余精骑突击梁军两翼，左冲右杀。经过4次冲击，虽俘获梁兵百余人，但终未动摇梁军阵势，遂且战且退，与梁军对峙于野河两岸。

面对这种局面，李存勖有些急躁。他认为，晋“孤军远来，救人之急，三镇乌合（指镇、定、河东三镇的联合并不巩固），利于速战。”令周德威迅速寻机与敌决战。但周德威认为，梁军军势尚盛，尚须“按兵以待其衰”。他分析说：“镇、定之兵，长于守城，短于野战。且吾所恃者骑兵，利于平原广野，可以驰突，如同梁对垒阵战，难以发挥骑兵的作用，势必寡不敌众，不如退守高邑（今河北高邑），诱贼出营，彼出则归，彼归则出，别以轻骑掠其馈饷，不过逾月，破之必矣。”李存勖求胜心切，对周的话根本听不进去。退卧帐中，诸将皆缄口不敢复言。这时，周德威又往见重臣张承业，请其出面再次进谏李存勖。张对李存勖说：“周德威老将知兵，其言不可忽也。”这样，李存勖才采纳了周德威的建议。于是，晋军改变与梁军在野河的对峙态势，主动拔营退至高邑。退至高邑后，每日派少量骑兵对梁营周围实行袭扰。梁军不敢出城割草饲马，到最后只得拆茅屋、坐席喂马，马匹饿毙者甚多。

乾化元年（911年）正月初二，周德威见梁军人马困顿，战斗力已大大减弱，遂与别将史建塘、李嗣源率 3000 精骑到梁军营前挑战，梁将王景仁、韩勍率兵出战。周德威且战且退诱敌北进。李存璋率步兵依托野河列阵。梁军“横亘数里”，向北推进至高邑以南地区，竞相夺桥，企图渡过野河。李存勖见镇、定 2 镇守军面临梁军强大攻势难以支持，急命部将李建及率兵 200 增援，才打退了梁军的进攻，双方激战一上午，互有伤亡，难分胜负。此时，李存勖认为梁军既被诱出，又被阻于野河之南，事不宜迟，应立即把主力投入决战。但周德威认为梁军之势尚盛，“可以劳逸制之，未易以力胜”，还不到决战时机。他

建议再坚持到日落之后，待梁军饥渴劳倦退兵之时，再“以精骑乘之，必大捷”。李存勖经过考虑采纳了周的建议。两军战至黄昏，梁军尚未进食，士卒饥疲不堪，梁将王景仁便引军稍向后退。周德威见战机已到。立即命令精锐骑兵向东、西两阵之梁军发起猛烈攻击。梁军遭到突袭，顿时阵脚大乱。东阵之兵先退。晋将李嗣源率军直捣梁军西阵，并令士卒大声宣扬已夺取了东阵，以扰乱梁军军心。于是西阵梁军开始溃逃。晋将李存璋率骑兵乘势追击，边追边喊不杀降者，梁军士卒纷纷解甲投兵而弃之。晋、赵军挥军追击，梁军溃散奔逃，死伤甚众，“自野河至柏乡，僵尸蔽地”。梁将王景仁、韩勣、李思安等人仅率数十随从逃走。

晋军占领柏乡后，直追梁军于邢州城下，尔后屯于赵州。屯深、冀 2 州的梁将杜廷隐听到柏乡战败，也弃城逃走。此战，梁军除解甲弃兵投降溃散者外，共被歼 2 万余人，损失粮食、器械不计其数。梁军 4 万人仅剩数千人逃往河南。由于柏乡之战的胜利，晋军控制了镇、定等州及河北广大地区，为以后夺取全部河北，进一步灭梁建唐（后唐）奠定了重要基础。

魏州之战

晋军打败梁军向河北的进攻以后，李存勖为了消除来自幽州燕王刘守光的威胁，采取了“先取（刘）守光，然后可以专意南讨”进攻后梁的用兵方略。乾化元年（911 年）八月，燕王刘守光称帝，国号大燕。同年十一月，刘守光出兵 2 万南下进攻定州的容城（今河北容县），企图兼并镇、定 2 州。为了对付幽州兵的进攻，王处直再次向晋求援。李存勖即乘机派周德威

率兵 3 万攻燕,经过两年的争战,消灭了大燕,不仅解除了后顾之忧,而且扩大了统治地盘,在晋军攻燕期间,朱温曾率梁军进攻枣强(今河北枣强东)、蓼县(今河北景县),企图牵制晋军。枣强城小而坚,守兵数千人,梁军屡攻不下,死伤以万计。梁军昼夜连续猛攻,城破后无论老弱,全部屠杀。梁军的残暴行径,激起了河北人民的仇恨和反对。梁军占领枣强后,又由杨师厚率兵 5 万与贺德伦合兵攻蓼县,刚到蓼县,就遭到晋军 600 骑兵的袭击。梁军由于柏乡遭到惨败,惧怕晋军,于是数万梁军在遭到晋的游骑袭击后,立即撤退。朱温在逃跑途中迷失道路,竟遭到蓼县农民“荷锄奋梃(棍棒)逐之”。李存勖在击退梁军,消灭了大燕之后,便转兵南下,与后梁展开了争夺魏州之战。

乾化二年(912 年)六月,朱友珪杀其父朱温自立为帝。此时,掌握重兵的梁将杨师厚乘机攫取了魏博镇(治魏州,辖今山东西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地区)。朱友珪只好下诏承认他为天雄节度使,坐镇魏博。八月,冀王朱友谦(朱温义子)以河中(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归附于晋。乾化三年(913 年)二月,朱友贞发动兵变,杀其兄朱友珪,夺得帝位。贞明元年(915 年)三月,朱友贞乘杨师厚病死,为削弱魏博镇势力,将该镇分为 2 镇,以平卢节度使贺德伦为天雄节度使,治魏州;以宣徽使张筠为昭德节度使,治相州(今河南安阳)。又另派开封尹刘鄩率兵 6 万自白马(今河南滑县东南)渡河,屯于魏州南的南乐,声言攻镇、定 2 州,实则助贺、张 2 人赴镇。魏州兵“父子相承数百年”拒绝分镇,发生兵变,并挟持贺德伦向晋求援。

乾化五年三月,李存勖抓住这个良机,令马步副总管李存

审率兵自赵州(今河北赵县)进屯临清(今河北临西),以策应魏州。五月,后梁刘郢率兵进屯洹水(今魏县西南),后又遣精骑万余趋魏州西南三魏县。贺德伦再次告急于晋,李存勖亲率大军自黄泽岭(今山西古权东南黄泽关)东进至临清。五月,与李存审所部会师后,转兵南下,经永济(今河北馆陶东北)入魏州。晋军这一行动为朱友贞所未料,因而未能事先采取防范措施。梁将刘郢在出乎意外的情况下,只好抽调兵力万余自洹水(今河北魏县西南)移军至魏县(今河北魏县东南)境,与晋军隔漳河相峙。

六月初一,晋王李存勖在梁降将贺德伦的迎接下进入魏州,并兼领天雄军。朱友贞得知魏博叛梁附晋后,十分恐惧。但未及时组织兵力乘晋军刚到魏州,尚未整顿就绪的时机,夺回魏州,仅派遣天平节度使牛存节(牛不久病死,又以匡国节度使王檀代之)率兵屯下于杨刘(黄河渡口,位于今山东东阿西)以声援刘郢。这就失去了夺回魏州重镇的机会。魏博归晋,贝州刺史张源德不从。他北结沧、德(治所安德,今山东陵县)守兵,南连刘郢以阻遏晋军继续前进。李存勖为打破贝、沧等地的联兵抗晋,派出骑兵一部昼夜兼行,袭占了德州;不久,又派兵袭占澶州(今河南内黄东南)。

七月,刘郢以为晋兵主力在魏州,晋阳(今太原南晋源镇)必然空虚,“欲以奇兵捣其腹心,还取镇、定,期以旬时(10天时间)再清河朔”,于是,便缚草为人,执旗乘驴循城墙往来活动,以欺骗晋军;暗中主力越黄泽岭西去欲奇袭晋阳。李存勖知道刘郢用兵“一步百计”,见其数日不出,侦知刘郢军已西行2日。李存勖又根据刘郢“长于袭人,短于决战”的弱点,

急令骑兵追击；另遣李嗣恩率兵倍道兼程先入晋阳，预作防备。

刘郃军途中遇霖雨旬日，泥深路艰，行进迟缓，士卒患腹疾足肿而病死者十分之二三。进至乐平（今山西昔阳），干粮已尽，马死殆半，闻知晋阳已有戒备，后又有追兵，士气非常低落。在此情况下，刘郃不得不放弃奇袭晋阳的计划，转兵东向，经邢州陈宋口东渡漳河，进屯宗城（今河北威县东），企图进占临清，依托贝州，切断魏州晋军的后方供应线，继续同晋军在河北周旋。

晋侍中周德威得知刘郃将西袭晋阳之后，即自幽州率千骑驰援晋阳。及至土门（今河北获鹿西南）时，刘郃已转兵出太行山东向。于是，周德威立即回军向东急追，经过两夜追至南宫（今河北南宫西北），发觉刘郃有进占临清以断晋军粮道的企图，立即率兵绕刘郃军而过，抢先进入临清，与李存审所部会合。此时，李存勖已率兵进屯博州，打算切断刘郃与杨刘的王檀军的联系。刘郃在晋军的逼迫之下，见处境不利，又南下经堂邑（今山东冠县东）进据莘县（今山东莘县），筑垒固守，并在莘县与黄河渡口之间构筑甬道以通粮运。针对这种情况，李存勖即转移兵力于莘县西30里设营，与博州的晋军形成对刘郃军东西夹击之势。

八月，朱友贞派杨延直率兵1万进屯澶州，策应刘郃军作战。此时晋军虽然对刘郃军形成了夹击之势，但贝州的梁军张源德所部仍威胁着晋军侧后。为此，李存勖部李存审率兵5000围攻贝州；又遣兵到刘郃寨下不断挑战，企图诱刘郃军出战。但刘郃闭垒不出。李存勖又派兵攻其甬道，袭扰其营寨

以疲困刘军。

朱友贞见刘郛袭击晋阳不成，又守在莘县不战，屡次下诏斥责，催促其出兵速战。但刘郛认为晋军甚众，且善于骑射，不宜速战，必须休整部队、待机而动；并请求朱友贞供给足够的军粮，以实现其持久制晋的计划。当时，贝、沧、邢、洛等州还在梁军控制之中，朱友贞如能供应粮食，支援刘郛作战，夺回魏州是有可能的。但是，他不但不采纳刘郛休整部队，伺机进取的建议，反而指责刘郛：“将军蓄米”，意在“疗饥”，非为待机破敌，并派宦官前往，督促刘郛出战。

朱友贞虽一再催战，但刘郛仍闭垒不出。至贞明二年（916年）二月，刘郛军固守莘县已达半年之久。李存勖为了诱出刘郛军，乃留副总管李存审守莘西之营，自去贝州借劳军之名进行视察，并扬言回归晋阳。刘以为晋军主帅离营是可乘之机。于是，奏请朱友贞同意，决定袭击魏州。同年三月，刘郛命令澶州刺史杨延直率兵万人前往会攻魏州，以策应刘郛军作战。但晋守军已有准备，当杨延直军于夜半进至魏州城南时，城内晋将李嗣源挑选500壮士潜出袭击之。杨延直军措手不及，大部溃散。待至天明，刘郛始率部自莘县进至魏州城东，与杨延直残部会合。这时，李存勖从贝州赶回魏州，与李嗣源所部会合截击梁军的前锋，李存审引瞳莘西之兵尾追梁军之后，迫使刘郛退至魏州东北的元城。李存勖列方阵于西北，李存审列方阵于东南。刘郛列圆阵于中间，受到晋军夹攻。双方交战良久，7万梁军大部被歼，刘郛仅率数十骑兵突围逃走，随后收拢散卒，经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过黄河，退守滑州（今河南滑县东南）。

朱友贞在决定袭击魏州的同时，又命令匡国（治所在今河南许昌）节度使王檀率关西兵 3 万出阴地关（今山西灵石西南）北进袭击晋阳。当时，晋将张承业守晋阳，由于城内空虚无备，几乎被攻陷。后得退居太原的代北故将安金全数百名家兵的助守，又得昭义节度使李嗣昭自潞州派 500 骑兵驰援，才迫使梁军王檀烧营而遁。在刘郢军败于魏州，王檀军又撤围晋阳之后，朱友贞已感到无能为力，发出“吾事去矣”的哀叹。

贞明二年（916 年）三月至九月，李存勖乘胜督军先后攻占卫（今河南汲县）、磁（今河北磁县）、洺、邢、沧、贝等州。至此，河北除黎阳外，均为晋所占有。

胡柳陂之战

晋夺取河北之后，晋王李存勖一面遣使与楚（辖今湖南中、南部地区）通好，一面派人联吴（辖今安徽淮南、江苏南部部分地区），企图“会兵以击梁”，实现其南下灭梁的战略计划。但由于契丹于贞明三年（917 年）三月，出兵 30 万进围幽州，严重威胁晋的后方安全，李存勖不得不转兵北向。同年八月李存勖击败契丹的进攻，解了幽州之围，消除了后顾之忧，然后便调兵南下，与后梁展开了黄河沿岸要点的激烈争夺战。

贞明三年（917 年）十一月，晋王李存勖乘黄河结冰之际，遣军夺取黄河重要渡口杨刘（今山东东阿东北杨刘镇），梁军反攻不克，乃筑垒自困、阻遏晋军。贞明四年（918 年）七月，李存勖调集兵力，企图南下一举灭梁。八月，李存勖集幽州（今北京）、沧景（今河北沧州南、东光）、邢（今邢台、永年东南）、镇定（今正定、定州）等镇并河东（治太原府，今太原南晋源镇）、魏

博(治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之师,共计10万余人,会于魏州,欲与梁军决战。不久,李存勖自魏州引兵经杨刘,攻掠郛(治所在今山东东平西北)、濮(治所在今河南鄄城北)而还,破坏这些地区对梁守河军的人力、物力支援;然后循河而上,屯于濮州(今山东鄄城北)东北的麻家渡。后梁北面行营招讨使贺环、排阵使谢彦章率步骑数万屯于行台村,阻遏晋军西进,坚壁不战。此时,李存勖产生轻敌思想,“自引轻骑迫敌营挑战”,数次被围,均赖部下力战护卫才得脱险。双方相持百余日。

十二月初一,李存勖率兵自麻家渡进逼行台村,并发筑营栅的魏博丁夫3万从军,距梁军10里设营。此时,梁军将领发生争权斗争,步兵将领贺环忌恨谢彦章与己齐名,以谋叛罪上奏将其杀害。李存勖欲乘梁军混乱之机亲率万骑直趋大梁。但周德威认为,梁军上将谢彦章虽然被杀,但其兵力尚存,建议慎重从事,不可轻行徼利,但李不听。十二月十九日,李存勖令军中老弱皆回魏州;二十一日,亲率大军毁营而进,决心南下汴州,一举灭梁。梁将贺环得知晋军企图,遂弃营跟踪追击牵制。二十三日,晋军至胡柳陂(位于今山东鄄城西北),立栅为营;翌日凌晨,贺环果率军尾追而至,横亘结阵数十里。当时,周德威根据梁军刚到营垒不固,以及晋军距大梁甚近等情况,认为晋军悬军深入“不可轻发”,应“以方略制之”。他建议利用营栅之固以逸待劳,先吸引梁军进攻,然后乘其疲惫而攻之,可一举灭也。但李存勖急于与梁军决战,反驳说:“前在河上恨不见贼(梁军),今贼至不击,尚复何待,公何怯也!”拒不采纳周德威的建议,命李存审遣辎重部队先行西进,以周德威幽州

之师阵于西，镇定之师阵于东，自率河东、魏博之兵居于中，向梁军发起进攻。梁将贺环军列阵而至，李存勖也列横阵对峙。交战开始后，李存勖引亲兵率先冲击梁营。梁军行营左厢马军都指挥使王彦章部先败，向西退往濮阳。当时位于阵西前进的晋军辎重部队见梁军旗帜，误以为梁军来袭，惊慌溃乱，冲入周德威阵内，立即引起周部阵势混乱，自相践踏；梁军乘势冲杀，周德威父子战死，部众伤亡甚重。李存勖力挽败局，收集散卒，至中午时候，方集结成军。时梁军已占陂中土山。李存勖乘梁军立足未稳，亲率骑兵与李从珂、王建及一举攻占土山。傍晚，梁军布阵于土山之后。李存勖和诸将主张收兵回营，待次日诸军尽集后再战。但天平节度使阎宝、昭义节度使李嗣昭等认为，今已深入梁境，交战不利，如再引退，必不战自溃，主张用骑兵攻梁军立营未固之步兵。并分析情况说：“王彦章骑兵已逃往濮阳，山下只有梁军步兵，如以精骑袭扰，使之无法吃晚饭，乘其后退之机，进行追击，可破梁军。”李存勖从其计，遂命李嗣昭、王建及等率骑兵先冲入梁阵，晋军大部队继后；又以元城令吴琼、贵乡令胡装各率壮丁万人在山下鼓噪助战。梁军在晋骑兵的突然攻击下，阵势大乱、溃败，自相践踏，死亡多达3万人。晋军亦因伤亡惨重，无力攻打汴州，而还军魏州。

大梁之战

后梁龙德元年至二年（921—922年），镇、定二州割据集团连续发生争夺统治权的内乱。即后梁龙德元年（921年）二月，王镕养子张文礼（亦名王德明）发动政变，杀死王镕，自为留后，并与后梁暗通。李存勖派兵攻之。王处直恐唇亡齿寒，

使其子王郁招契丹兵入境，以牵制晋军。李存勖便亲率晋军攻镇、定，再度转兵北向。在南线，晋军已夺占了一些黄河渡口，但无力南进，与梁军保持对峙状态。直到龙德二年（922年）九月，李存勖才兼并了镇、定，摆脱了两面作战的不利形势。第二年（923年）四月，李存勖于魏州称帝（即庄宗），建立后唐，改元同光。继而又乘梁将卢顺密投降的机会，夺取了黄河南岸的重要据点郢州城（今山东东平西北）。五月，梁军为了夺回德胜（今河南濮阳北）和杨刘的黄河渡口，曾对后唐军发动进攻。一场激烈的沿河争夺战，使双方都遭到相当大的损失。但后唐军终于巩固了黄河的主要渡口杨刘、德胜及黄河南岸的郢州城，保持随时可以渡河南进的有利形势。在此期间也出现了一些不利于后唐的情况，如昭义节度使李嗣昭死后（在攻镇州时战死），其子李继韬据潞州叛后唐附梁；契丹仍不时袭扰后唐北部；加之由于连年南北转战，军队亦较疲惫，财力、物力消耗较大，以致出现了“仓廩之积不支半岁”，难以支持长期战争的局面。

后梁丧失河北后，人心动摇，士气更加沮丧，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日益严重。朱友能（朱温侄子）据陈州（州治在今河南淮阳）反对朱友贞，将领之间也相互排斥、倾轧和互不信任。

当李存勖转兵北向之际，朱友贞曾出兵企图收复魏博。但结果仅收复澶州以西、相州以南靠黄河北岸的局部地区，却丧失了士卒3万之众。在黄河渡口争夺战中，又损失士卒万人。至此，梁已处于精疲力竭的境地。但朱友贞仍企图收复河北，以王彦章、张汉杰率梁军万人攻郢州；以段凝率主力5万屯黄河北岸以对付后唐军主力。此外，还准备以陕虢（今河南西

部)、泽潞(今山西东南部)之兵进攻太原,以汝洛(今河南中部)之兵自相、卫、邢、洺北取镇、定;并预定于十月各路同时行动。

后唐同光元年(923年)六月,梁军将领康延寿秘密请降了唐军。八月二十七日,李存勖于朝城(今山东莘县朝城)接见康延寿,任其为南面招讨都指挥使、领博州刺史,并得悉梁军将于十月大举进攻的计划。康延寿分析说梁朝地不为狭、兵不为少,但是,朱友贞谄懦,吏治混乱、贿赂公行,用将不择才德、不校勋劳,出军征战,不能专任将帅,常以近臣监之,军队行动将帅不能自主,故终必败亡。康延寿还陈述了他所听到的梁军准备大举北进的计划:以董璋率军自石会关进攻太原,以霍彦威率军自相卫、邢、洺北取镇、定,以王彦章、张汉杰率禁军进攻郢州,以段凝主力屯黄河北岸对付唐军主力,并预定在十月各路人同时发起进攻。针对梁军的北进计划,康延寿向李存勖建议:梁兵聚则不少,分则不多。愿陛下养勇蓄力以待其分兵,帅精骑 5000 自郢州直抵大梁,擒其伪主,旬月之间,天下定矣。康延寿的建议和李嗣源、郭崇韬所见略同,为李存勖制定袭汴灭梁的战略决策,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情报。因此,李存勖对康延寿的建议十分赞赏。

九月,梁军分兵北进的计划开始实施。段凝率兵 5 万进至临河(今河南濮阳西 60 里)之南,活动于澶州以西、相州以南地区;王彦章率禁军万人屯于兖州(今山东兖州)境内。此时,又传闻契丹军将于冬后南下。李存勖急忙召集诸将研究形势和对策。宣徽使李绍宏等人认为,郢州孤远难守,不如以此城与梁交换河北为梁所占的卫州和黎阳,缔结和约、划河为界、

休兵息民，待财力稍集，再图后举。李存勖不同意此方案；枢密使郭崇韬也反对，认为李绍宏等人的意见是导致将士解体、食尽众散的失败之策。郭崇韬根据康延寿提供的情况，认为成败之机决在今岁。他进一步分析说：“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据我南鄙（界），又决河自固（段凝自酸枣决黄河水灌郢州以困唐兵），谓我猝不能渡，恃此不复为备。”“段凝本非将材，不能临机决策，无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无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杨刘，自以精兵与郢州合势，长驱入汴，彼城中既空虚，必望风自溃。苟伪主（朱友贞）授首（被杀），则诸将自降矣”。郭崇韬这一主张的要点是，乘梁军北上之势，将其主力牵制于河北，然后以精兵出杨刘、郢州，乘虚袭汴，一举灭梁。这一主张，看来非常冒险，弄不好不仅河北失陷，且太原亦将有失落之虞。但它却是在康延寿提供的可靠情报的基础上，经过度己料彼的综合分析判断而做出的决策。李存勖在此成败的紧要关头，当机立断地采纳了郭崇韬的主张，定下了奇袭大梁的决心。九月二十八日，李存勖命令将士把随军家属全部从朝城送回魏州；又命李绍宏、豆卢革、张宪、王正言等⁴将同守魏州，以牵制北上梁军，然后自率精兵南下向大梁进攻。

后唐同光元年（923年）十月初二，李存勖亲率唐军精锐自杨刘过河南下；初三，进至郢州城，当天午夜越过汶水后，并以李嗣源为前锋继续南进。初四晨，与梁军王彦章部相遇，一战而胜，并攻克梁中都（今山东汶上），俘获梁名将王彦章（号王铁枪）及都监张汉杰等200余人，击杀数千人，但同时也暴露了奇袭大梁的企图。此时，梁军主力段凝所部尚屯黄河北岸。李存勖顾虑段军如先期赶回大梁，将会出现不利局势，便

召集诸将商议下一步作战行动。有些将领以“传者虽云大梁无备，未吞虚实”为由，主张先向东扩展地盘，然后再伺隙而动，但康延寿则力主迅速攻取大梁。李嗣源也认为：“兵贵神速。今彦章就擒，段凝必未知之；就使有人走告，疑信之间尚须三日。设若知吾所向，即发救兵，直路则阻决河（段凝为其所决黄河水所阻），须自白马南渡，数万之众，舟楫亦难猝办。此去大梁至近，前无山险，方阵横行，昼夜兼程，信宿（两昼夜）可至。段凝未离河上，友贞已为吾擒矣。”李存勖听了李嗣源的分析后，更坚定了奇袭大梁的决心，立即命令部队向大梁进发。当时，唐军士气高涨，踊跃愿行。十月初四傍晚，李嗣源率领前军倍道兼程，奔袭大梁。初五，李存勖率后军从中都出发继进。初七，唐军进抵曹州（今山东定陶西），梁守将遭不意袭击被迫出降。

唐军占领曹州后，不停顿地长驱向西急进，直逼大梁。此时，朱友贞得悉王彦章被擒，非常恐慌，急忙召群臣问策，比莫能对，无奈之下，派遣张汉伦驰骑北上召段凝迅急回救，同时又令开封尹王瓚强征民众为其守城。但张汉伦行至滑州被段凝所决之黄河水所阻，不能继续前进。大梁此时已陷于极度混乱之中，朱友贞“日夜涕泣，不知所为”。十月初八，朱友贞得知唐军已逼近大梁后，在绝望中自杀身亡。初九晨，李嗣源所部进至大梁城下，急攻封丘门（北门），梁将王瓚开门出降。是日，李存勖亦率后军赶到，从大梁西门入城，后梁百官列队迎谒。李存勖进行安抚，使各复其位。

十月十二日，段凝得知大梁危急，率领5万主力自滑州回救，行至封丘（今河南封丘）时，得知大梁失陷，也投降了唐军。

至此，后唐灭了统治中原 17 年的后梁，战争也随之结束。

后唐灭亡

后唐建立之初，疆域辽阔，它拥有的土地，等于后梁和晋的总和。如果把同光三年（925 年）灭掉的前蜀算进去，比五代的其他四代，都要大得多。以现在的行政区划看，后唐的辖境大体相当于河北（缺一小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缺一小块）六省加甘肃、宁夏各一部和江苏、安徽的淮北部分以及湖北的北部。

南方割据各国的君臣开头都很恐慌，纷纷派使者朝贡，打听中原的情形。荆南高季兴还亲自到洛阳，以前朝地方官的身分朝见庄宗，表示拥护新王朝。

但是，后唐根本没有考虑过恢复生产的措施。租庸使孔谦一味横征暴敛，满足宫廷挥霍的需要。政府发出一些减免赋税的官样文章，实际行动却和它完全相反。人民觉得新王朝的赋税比旧王朝更重，孔谦却得了“丰财赡国功臣”的称号。

后梁政府开的黄河决口，继续排出滔滔浊流，淹没下游的广大田亩。这个人为的自然灾害，使人民更加忘不了梁、唐统治下混战的罪行。

李存勖靠武力取得了天下。开国以后，士兵很快便滋长了怨望。原来当时储藏财物的库有内府、外府的区别，外府收藏经常性的财政收入，供给军政费用；内府收藏各项献贡，专供皇帝挥霍之用。外府经常极为空虚，内府却极为充实。政府要发犒军饷，数目不够，皇帝也不肯拿出钱来。

同光三年（925 年），灾荒严重，政府根本发不出军粮。孔

谦每天到上东门外等候粮船，到一点发一点。军士没有饭吃，弄得卖妻鬻子、骨肉分离。老弱家口成群结队，到野外寻点野菜充饥，往往冻饿而死。情况这样严重，庄宗仍不以为意，自顾自地打猎游戏。

庄宗生平最喜爱 3 件事，一是打仗，二是打猎，三是唱曲演戏。灭梁以后，不打仗了，就把大部分的精力用在后面两件事上。他出外打猎，常常踏坏大批庄稼，把洛阳附近的农田糟蹋得不成样子。他豢养了许多猎狗。有时他坐在殿上，那些猎狗便满殿乱跑，横七竖八地或蹲或卧。金碧辉煌的宫殿简直变成了恶狗村。

李存勖唱曲演戏的声名很大。他曾经编了军歌，命将士在冲锋陷阵时高歌猛进，用以激励士气。皇帝和将军擅长音乐，并不是坏事，编军歌还有实用价值。李存勖的问题在于因喜爱唱曲演戏而放纵伶官，让他们干预政治，做出许多坏事。

李存勖用伶官景进等做耳目，到外面采访消息。每逢景进上殿奏事，左右侍从都须回避。景进实际上是个特务头子。内外官员畏惧伶官，争相依附，连孔谦那样的人，见了景进，也恭而敬之地叫声“八哥”。庄宗初到洛阳，住在唐朝的故宫里，屋多人少。他听宦官的主意，命景进等在邺城选美女千人，充实后宫。他们借此胡作非为，活像一群土匪，军士的妻女纷纷逃走，以免遭殃。这些人是艺人的败类，他们把后唐的政治搞得更加乌烟瘴气，加速了它的崩溃。

庄宗建国，任用宰相，以“前朝士族”为必要的条件。他选中了豆卢革、贞程两人。灭梁以后，豆卢革又推荐了一个韦说。这 3 个人都是昏庸无能之辈，处理日常行政事务，也不免要闹

笑话。那个卢程，说是名族，其实连家世也不大清楚，却偏要以门阀妄自尊大。他做宰相之前，有一次，庄宗叫他起草文件，他不会做。后来，庄宗提拔冯道做掌书记。冯道的官原来比卢程小，这样一来，就比他大了。卢程大为不满，背地里抱怨说：“用人怎能不论门阀而提拔一个乡巴佬呢！”后来他当上了宰相，更是架子十足，出门办事，到处责令州县供给役夫，官吏迎接拜见，他坐在肩舆上面，傲然不理，谁敢违背了他的片言只语，立即鞭打辱骂。另外一个豆卢革，也没有什么学问。庄宗问起国家大政，他只会说几句空话，搪塞一番。

庄宗手下的谋略之士，首屈一指的是郭崇韬，夹河苦战之时，全靠他临机决策。他原籍代州雁门，生长边地，家世显然没有可以自夸之处。后唐建国后，豆卢革、韦说问他，同唐朝名将汾阳王郭子仪有没有瓜葛。他便瞎认郭子仪做四世祖，从此装腔做势，到处讲究门第。有人提出升官的要求，他酸溜溜地回绝道：“深知你颇有功勋，可惜门第寒微，不敢相用，否则恐怕要被名流所笑！”

究之实际，在唐末农民大起义之后，谱牒散亡，家世门第早已弄不清楚了。加之时势动荡，战乱频繁，旧时高门大官的“告身”之类的文件，往往因生活贫困，卖给了亲友。郭崇韬自己冒充高门，偏要整顿别人的身份，命令吏部严格审查文件，发现假冒情事，轻则斥革，重则办罪。许多想做官的人走投无路，流离失所。大家都怨这个身兼将相的侍中、枢密使。

做不到官的人怨郭崇韬，有权有势的宦官、伶官也怨郭崇韬。郭崇韬毕竟是个想把国事办好的人，势必要同这些人发生矛盾。其结果，他在政治上陷于孤立。同光三年灭蜀之役，皇

子魏王继岌做元帅，真正的指挥官是郭崇韬，从出兵到成功，一共只用了70天时间。功劳大极了，宦官们却说他有割据巴蜀的野心，害了他的性命。

同光四年(926年)，魏州爆发了一次兵变。李克用的干儿子李嗣源本受庄宗猜忌，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他借此机会，联合变兵，南下夺取了政权。庄宗众叛亲离，被乱兵所杀。乱兵的首脑是伶人出身的将领郭从谦(郭从谦)。欧阳修在《伶官传序》中说：“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根据的就是这个事实。

李嗣源即位，改元天成，他就是后唐明宗。明宗原名邕，字继业，是一员战将，即位时已60岁了。他鉴于庄宗的失败，减轻了一些赋税，中原人民稍得休息。因此他统治的8年可以算是小康的局面。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变兵叛将时有出现，内部滋生着祸乱的根苗；外面孟知祥割据两川，重建蜀国，明宗也毫无应付的办法。

明宗是个文盲，他的主要助手安重诲做过枢密使，又做侍中兼中书令，看四方奏章，也不能完全通晓。他们尽管设置端明殿学士，用冯道等文学之士任职，作用不过是解决文字问题，方针政策，这些人是管不到也不敢管的。这是个文化修养很低的政府。明宗初年，任圜做宰相，选拔贤能，颇有气像一新的样子。他曾在明宗面前与安重诲争辩，口气颇为强硬。明宗心里已不大愉快，到了后宫，有个宫人奏道：“妾在长安，看见宰相奏事，从来没有这种模样的，他实在是藐视陛下啊！”明宗没有文化，不知道前朝直臣的故事，听了这些话，深信不疑。任圜从此失势，后来被安重诲杀死，明宗不加追究，而且宣布任

圖对皇帝“怨望”的“罪状”，表示支持安重诲的行动。

这样一个朝廷，当然没有解决当时各种困难的能力。相传明宗常在宫中祝告上天，说：“某胡人，因乱为众所推，愿天早生圣人，为生民主！”他的愿望大致不坏，然而光有良好的愿望是无济于事的。

明宗死后，儿子从厚即位，干儿子从珂起兵争位，杀从厚自立。公元963年，明宗的女婿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以“愿为臣子”的无耻许诺，得到契丹的援助，契丹太宗耶律德光率军攻入山西，第二年于晋城立石敬瑭为帝，国号晋，作为其从属政机的儿皇帝。后唐便灭亡了。

二、后晋和后汉的兴亡

契丹统治者把石敬瑭摆在皇帝的位子上以后，就把他当作警卫、门岗，把守燕、云粮仓，也通过他向中原百姓进行勒索。

石敬瑭当了皇帝，不得不用傀儡政府的名义，竭尽一切力量，搜刮民脂民膏；再以儿皇帝的身份，奉献给契丹主子。石敬瑭的年龄，比德光要大好多岁，但是他毕恭毕敬拜倒在德光面前，规规矩矩地称儿子、称臣。石敬瑭就是这样地屈辱供奉，一直到死。

石敬瑭死了，新皇帝（出帝石重贵）接位，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主张：一派以李崧为代表，主张遵循石敬瑭的道路走下去，这反映了一部分毫无气节、苟安享受的地主阶级上层分子的要求；一派以景延广为代表，主张采取强硬政策，

调整对契丹的关系,把国家和皇帝分开。皇帝个人任随他去称孙子,代表国家民众的政府不再向契丹称臣。这反映了绝大多数人不甘屈辱的愿望,包括了广大人民群众和部分稍有民族气节的上层官僚分子。由于景延广是政府里的实力派,立过大功,握有兵权,出帝石重贵只好跟着他的强硬政策走。

强硬派得势,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广大人民反抗压迫、不甘屈辱的一种胜利。

不过,在契丹统治者的眼里,后晋政权只是一个把管汉地的汉儿,只是一个可以任意摆弄的傀儡。现在,后晋政权既然拒绝称臣,破裂便是不能避免的了。

当(后)晋出帝石重贵对契丹称孙不称臣以后,德光立刻派了客省使(又作回图使)乔荣到后晋政府来责问。这个乔荣,一向往来南北做买卖,并在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设有货栈。不料这次以使臣身份前来,后晋政府竟派人把他看管起来,没收了他存在货栈的货物,还杀了其他所有的契丹奸商。后来有人说,契丹援助过后晋政权,这样做未免太过分,才释放了乔荣。临走,乔荣去向景延广告辞,景延广对他说:“回去对你的主子讲,先帝(指石敬瑭)是北朝所立,所以奉表称臣;今上(指石重贵)是中国所立,我们南北两朝是邻国。因为有先帝的盟约,我们对北朝仍然很尊重。皇帝个人由他叙辈份称孙子,政府没有称臣的道理。希望北朝皇帝不要听信赵延寿的诱骗,估计错误。中原的兵马,你是亲眼看到的,不信可以来试试,这里有10万横磨剑,正在等人送头颅,以后战败了取笑天下,可不要后悔。”乔荣一听,心想货物已经被没收,回去也不好交代,就说:“您这些话,我怕记不全,恐有遗忘,希望能记在纸上。”

景延广就叫人把话写下来给了他。乔荣回去以后，如实地报告了德光，德光大怒，决意对后晋用兵。

从公元 943 年到 945 年（辽会同六年至八年），契丹政府 3 次进兵，都遇到了中原士兵和人民的奋勇抵抗。战争中双方互有胜负，有时（后）晋兵还打进北界，形势对中原十分有利。但是，后来的形势没能朝着顺利的方向发展。驻守在太原的晋将刘知远观望不前，只求自保；前方大将杜重威、李守贞等，竟以 20 万大军向契丹投降；这样便造成了后晋的失败，晋出帝石重贵被捉。

契丹兵乘机抢掠杀戮，十分残酷。一个做过几朝元老的冯道，对德光说，这时候苦难的老百姓，连菩萨也救不了，只有您可汗能够救他们。德光才算下令禁止杀人。天福三年（公元 938 年）冯道北使时，德光曾打算留下他，被冯道婉言辞谢。当时德光赐给他貂袄貂裘等物，冯道有诗云：“朝披四袄深藏手，夜覆三衾怕露头。”既不出头又藏手，正是他左右应付圆滑处世的自白。

契丹统治者的野蛮屠杀，虽然获得了战场上的胜利，但是没有能征服中原的民心。尽管德光和颜悦色地对百姓说过：“我也是人，大家不必害怕。”

大同元年（公元 947 年）正月初一，德光用中原皇帝的仪仗进驻汴梁，坐在崇元殿上接受百官的朝贺。同时宣布封（后）晋出帝石重贵为负义侯，安排后晋旧臣张砺为平章事，李崧为枢密使，冯道为太傅，和凝为翰林学士；又分别位置安排了赵莹、刘昫、冯玉等人。随即派赵莹、冯玉、李彦韬押送负义侯和他一家眷属（母亲李氏、太妃安氏、妻冯氏、弟重睿、子延

煦、延保等)到黄龙府囚禁(后经后晋太后请求被安置在建州附近),并且把(后)晋的官吏、妃嫔、方技、百工以及图书、石经、乐谱、铠仗等等全部集中,运送上京。

同时,正式宣布改国号为大辽,改年号为大同,把镇州(现在河北省正定县)升格为中京,以赵延寿为大丞相兼政事令枢密使中京留守。

德光按照草地上的习惯,以战胜者的姿态,在中原纵情抢掠,激起了中原人民更大的愤怒和反抗。很多人上山结寨自保,多的数万人,少的千百人,不时出兵打游击,契丹军队吃了不少亏。

晋将刘知远拥军5万,镇守河东。当契丹与晋相争时,他据守本境,坐观静变。契丹攻陷开封,他派部将王峻以贺胜为名,去京城观察形势。王峻回报说:“契丹贪暴,志在掳掠,中原怨怒,其势必不得久。”有人劝刘知远出兵抗辽,刘知远却认为辽势正炽,尚需待机而动。

辽主眼见人民奋起,深为惶惧,遂率百官北撤,行至栾城(今属河北)死去。契丹内部为抢权而纷争,无暇南顾。刘知远乘机发兵晋阳,21天后进入洛阳,又8天进入开封,大兵所向,如入无人之境。黄河以南的后晋州镇,遂尽为其所有。

当辽主称帝于开封时,刘知远已在晋阳自立为皇帝,定都洛阳,建国号汉,史称后汉(947—950年)。刘知远称帝后10个月就死去了。儿子刘承祐继位,是为隐帝。

隐帝继位后,长安、凤翔(在关中)与河中(在晋西南)3镇同时发生叛乱。最后,老将郭威率兵往讨才平定下去。隐帝重赏郭威,郭威不受,而推功于在朝诸大臣和将士们,深得朝廷

内外敬重。可是，年轻的汉隐帝却对老臣左右朝廷不满，欲用亲信执政。他先设谋杀死了在朝的几位重臣，后又派人到魏州企图杀害郭威，从而激起兵变。

郭威率兵从魏州（今河北大名）出发，7天就进抵开封城下。隐帝出城督师，后为溃军所杀。郭威以拥汉除奸的名义进入开封城收拾残局，以天子的葬仪为隐帝举丧。

当其时，开封西北有晋阳刘崇（刘知远弟弟），东有徐州刘赟（刘崇的儿子），南有许州刘信（刘知远弟弟），皆为节度使，手握重兵，若联兵问罪开封，郭威的处境就岌岌可危了。

郭威持重，以李太后之命，宣告将立刘赟为帝，并派出一位深孚众望的使臣冯道去徐州奉迎。

冯道诱刘赟离开徐州，行至宋州（今河南商丘市南），郭威已在澶州（今河南清丰西）被将士们拥立为皇帝，回开封建国号大周，史称后周（951—960年）。刘赟得知澶州事变时，已被软禁在宋州的驿馆中。后来，刘赟终于被杀，徐州投降，刘信自杀，许州归顺。晋阳刘崇这时只有遥望顿足，尔后在晋阳称帝，仍以汉为国号，史称北汉。

后汉历二帝，4年，是五代中寿命最短的政权。

三、后周的改革与统一战争

郭威和柴荣改革

郭威在位三年零半个多月，柴荣在位五年零五个月，合起来不满九年，事功却很可观。政治、经济的改革，多半前后相

继；独有军事的改革和南征北伐的成就，完全是柴荣手里的事情。后人特别推崇柴荣，原因就在这里。

第一是郭威、柴荣都比较注意节约。

郭威即位后下令：乘舆服饰，不得过于华丽；宫中应用的器物，力求朴素；各地不准贡献珍巧纤华的物品以及奇禽异兽鹰犬之类。他把宫中原有的玉器和用金银珠宝装饰的饮食起居用具数十件，在殿庭上当众打碎，告诫群臣，说：“听说汉隐帝天天和嬖宠游戏，珍玩不离身边，此事不远，应当引为前车之鉴！”接着就下令禁止送这类物品入宫。

他在关中打仗时，见唐朝各帝坟墓，都曾被人盗掘，深知厚葬有害无益。后来做了皇帝，便叮嘱柴荣，身后只要薄葬，陵前不要用石羊、石虎、石人、石马，只要在碑上刻一行文字：“周天子平生好俭约，遗令用纸衣、瓦棺，嗣天子不敢违也。”

柴荣继承郭威的作风，重申禁止贡献珍奇食品和不用珠宝珍玩等命令。

后周宫廷节约俭朴的风尚，和后蜀、南唐、南汉等国奢华糜烂的气息，形成鲜明的对照。前者表现出蒸蒸日上的势头；后者呈现了江河日下的倾向。

第二是减轻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

郭威刚即位，就下令废除后汉窃盗一钱以上处死的苛法，照后晋天福元年以前的法律办事；规定除谋反叛逆以外，不得屠戮亲族。后汉管仓库的官吏，照例要收高额的“斗余”、“称耗”，使人民的实际负担，比税额规定的斗石斤两，超过很多，郭威也下令废止，不准再收。

有一项叫“牛租”的税，是朱温统治时开始征收的。当初朱

温在淮南抢到大批耕牛，他把牛发给河南一带的农民使用，每年缴纳牛租。事情过了十几年，牛早已死了，牛租却每年还要照缴不误。郭威做了皇帝，才把这项租税取消。

盐和牛皮是五代统治者控制极严的两种物资。自中唐以来，盐税一直是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官煮官卖、禁令森严。后晋以前，犯禁的还分斤两多少定罪，后晋改为不分多少一律处死。郭威恢复分斤两多少定罪的办法，总算缓和了一点。牛皮一物，后周以前，不准民间买卖。开头是由政府收买；后唐明宗时收牛皮只给盐，不给钱；后晋连盐也不给，干脆没收；后汉法律，私贩牛皮一寸的，就处死刑。郭威改为每十顷田地捐一张牛皮，其余归百姓自用，不禁买卖。这比过去有很大的改进。

唐末以来，有一种“营田务”的制度，把官有的土地交给佃户耕种。这些佃户的户籍不属州县，由户部另外设官管辖。他们的身份实际上是国家的农奴。郭威取消营田务，把户籍划归州县管辖，房屋、田地、农具、耕牛归佃户私有。这些农奴变成了自耕农，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修房子、种树木，收成也提高了很多。

郭威和柴荣都屡次下令减免租税。显德五年（958年）均定田赋的措施，尤其是五代末年的一项重大改革。

均定田赋简称均田，是按照实际的田亩数字收税。这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长期以来就是不用这个办法。

这也是中唐以来长期存在的问题。地方官只知道必须收满当地租税的总额。有钱有势的人隐匿土地、交通官府，广有田地而不纳租税。这部分土地的租税没有着落，官府就把它转嫁到贫苦农民的身上去。农民自有的土地，有时卖掉了，或者

被河水冲坏了，有地变成无地，租税却得照缴。政府提倡垦荒，允许暂不纳税，地方官阳奉阴违，地还没有垦熟，已经要农民纳税。唐诗人元稹在同州（今陕西大荔）做刺史时，深知这些积弊。他定出办法，查明当地实有田亩数字，分配税额，使富有的不能逃避负担，贫穷的不致流离失所。《元氏长庆集》中的《同州奏均田伏》就是他向朝廷打的报告。

柴荣读了元稹的文章，觉得这是当务之急，便根据原文，制成《均田图》，发给地方官，再派出大批人员，到各地均田，查出了许多隐匿的土地。柴荣的均田对于约束豪强、减轻剥削、发展生产，自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

第三是惩治贪污的官吏。

郭威和柴荣都能毫不留情地严惩贪污的官吏。莱州刺史叶仁鲁是郭威的老部下，因贪赃 1.5 万匹绢、1000 缗钱，被处死刑。郭威派人告诉他：“你触犯国法，我没有办法救你，只能抚恤你的母亲。”柴荣时，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主管收税，因场官在正额之外，多收耗余，也被处死。有人说孟汉卿罪不至死，柴荣说：“我也知道，但不能不以此警戒别人。”

他们肯这样雷厉风行地办几个人，当然会对政治风气起良好的影响。

但是郭威和柴荣对于最高级的官员，特别是对于各地的方镇，尽管明知他们贪污不法，也没有办法处理。邺都留守、天雄节度使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同平章事王殷，向民间诈取了很多钱财。他实际上是个河北王，郭威无法办他，也无法制止，只得派人告诉他：“邺都仓库储藏很丰，卿家要用，要多少拿多少，何必怕没有钱！”这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郭威最后还是乘他

入朝的时候抓起来杀了，不过原因不在贪污，而在威势太大，威胁到最高统治者的地位了。

第四是招抚流散的农民，发展农业生产。

后周初年，幽州饥荒，难民纷纷流入后周的沧州等地。南唐发生旱灾，饥民步涉淮河，来到后周境内。郭威命令各地官吏，妥善安置难民，分发口粮、分配荒地，一共得到了几十万个劳动力。柴荣即位后，也注意招集从南唐、后蜀、北汉等国流入的饥民。这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很大的好处。

五代时因民户逃亡而出现了许多无主的土地。怎样使这些土地不致荒芜？怎样使逃户回乡时不致失业？两面不易兼顾，是很复杂的问题。

显德二年(955年)，柴荣作出兼顾两面的规定。首先，准许农民向政府承佃耕种、缴纳租税。这样，土地不致荒芜，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有着落。其次，他设法照顾逃户的利益，凡3周年以内回来的，可以收回一半土地；5周年以内回来的，可以收回 $\frac{1}{3}$ ；5周年以上的，除坟地外，一律不能收回。这个规定，注意到逃户与承佃户的利益，确实是比较好的。同时，他又对因被契丹掳去而离开土地的农户，特别放宽年限，5年内可以收回 $\frac{2}{3}$ ，10年内可以收回一半，15年以内的还可以收回 $\frac{1}{3}$ 。

此外，柴荣还准许年老疾病的兵士退伍还乡。这样，国家节省了兵饷开支，农村中增加了一份劳动力(至少是半劳动力)，对生产也有一点好影响。

第五是治理河患、兴修水利。

自从后梁君臣用决河作为防御手段以后，黄河溃决的次

数越来越多，滑、澶 2 州在晋、汉、周三朝 20 多年间，决了 6 次；同期间，怀州决了 2 次，郑州决了 5 次。此外零零碎碎发生溃决的地方还有不少。滑州是朱梁决口的地方，由此向东，水害尤其严重。下游（今豫东、鲁西）各地，动辄大水弥漫数百里，原来的大野泽（在今山东巨野北）水面向北扩大，把梁山包围起来，开始形成了梁山泊。洪水还继续东流，冲决古堤，直到海边，淹没田地、漂失人畜，损失异常重大。唐、晋、汉三代政府对此熟视无睹，没有采取任何积极措施，河患变得更加严重了。

显德元年（954 年）周世宗柴荣即位后，便派李穀到澶、郛、齐一带，征发民工 6 万人，堵塞决口。六年（959 年）因黄河在原武（今河南原阳）决口，又派吴廷祚前去修堤，征发民工 2 万余人，把决口堵住。这些工程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但终究减少了灾害，也说明柴荣是五代时唯一的认真修治黄河的皇帝。

修治以汴水为主的航道，是柴荣在水利史上的大贡献。

显德四年（957 年），柴荣命令疏浚汴水，向北流入五丈河。六年，再加了一番疏通的工夫。这条航道，河宽 5 丈，从大梁向东，渐折向东北，注入梁山泊，下接济水。这入济以后的一段，大体上与现在的黄河相仿。这是从汴梁到相当于今山东省各地的航运路线。

黄河和淮河之间的水道交通线，本是唐朝中央政府取得东南财赋的生命线。南北分裂以后，这条航路完全淤塞。柴荣有统一的雄心，要用兵东南，从显德二年起，便命武宁节度使武行德，初步加以疏通。显德五年，又疏浚汴口，沟通黄、淮间的全部航线。六年，又在大梁城外，引汴水通蔡水，沟通京城与

陈(今河南淮阳)、颍(今安徽阜阳)之间的水道交通。这是汴水以西、大体上与汴水平行的一条水道。以后北宋靠汴水为立国之本,每年从东南运来大量粮食,靠的就是柴荣建设的成绩。

此外,柴荣还派何幼冲疏通泾水,灌溉农田。关中自经朱温的大破坏以后,简直没有人做过建设工作,柴荣在这方面的努力,尽管不大,也很值得称道。

第六是开封城市的建设。

北宋的东京是气象宏伟、市容华美的城市。它的基础也在后周时奠定。

开封本来城郭不大,街道狭隘,完全不像首都的样子。五代时,开封做了梁、晋、汉、周四代的都城,官衙商旅越来越多,这座城市便显得格外狭小了。

显德二年,世宗决定修筑外城,先立下标志,等冬天农闲时兴筑、农忙停工,秋后再继续进行。这座新城周围48里233步。政府先划定官衙、仓库、街道的范围,其余让人民自由建造房屋。大梁城中许多旧街,本来并不宽广,又被居民造房屋时占用了一部分,以致能通行大车的不多。改建时都拉直加宽,最宽的有30步阔。

这个改建的工程前后进行了3年,完工以后,面貌完全改观。有些工于心计的人,看到改建京城、疏浚汴渠等大工程的开展,预料日后航运畅通、商货云集,必有一番空前繁盛的局面,就动起脑筋来了。有个叫周景的官员,请世宗准许人民沿汴渠种植榆柳、兴建楼阁,以壮观瞻。世宗答应了。他首先在渠口重要地点,造起12间高楼。后来各地商船来得多了,周家的楼房正当停泊的地点,客商留宿、堆放货物,都极方便,因而

获得巨大的利益。从这个事例来看，后周末、北宋初开封的商业，显然有很大的发展。

这个开封城与隋唐的长安城是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产物。隋唐长安城坊市衙置各有固定的位置，商业区域限于东西两市，坊和市都是封闭性的，住宅和商店的门都在坊、市里面，没有向大街开的。唐代中叶以后，情况逐渐有了改变，据唐人诗歌反映的南方扬州等城市，市容繁盛，已经看不出封闭性的特点。然而建设首都，对开店造屋，除特定宫殿官衙区域外，不加限制，实以后周大梁为最早的实例。五代以后的封建社会，其面貌与五代以前显有不同，在这里是表现得非常明显的。

以上六项是后周在政治经济上比较突出的改革。其他如重视官吏的选择；废去大批寺院（共废 30,336 所，保留 2,694 所），鼓励僧尼还俗参加生产，或用其所长，参加别的工作；大量铸造钱币，解除钱荒，都是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积极作用的措施。

郭威和柴荣可以说是五代时期统治阶级中的杰出人物，柴荣尤其是五代时期最英明的君主。

后周高平之战

后周的统一战争始于后周显德元年（954 年）正月，止于后周显德六年（959 年）六月，前后历时 6 年多时间。后周世宗柴荣显德元年（954 年）正月，北汉主刘崇乘周太祖郭威死、周世宗柴荣年少之机，联合契丹，欲一举灭后周。二月，辽派大将杨兗率马步军 5 万，号称 10 万，来到太原。北汉主亲帅骑兵 3 万，以张元徽为先锋，与契丹杨兗数万兵进逼潞州（今山西长

治)。大军南出团柏谷之后，张元徽斩周潞州节度使李筠的部将穆会均，击败李筠。李筠逃归潞州，汉兵旗开得胜，乘势向南挺进。

显德元年三月，周世宗命郑仁海留守东京开封，命符彦卿、郭崇威从磁州出兵赴潞州，命王彦超从晋州出兵，命樊爱能、何徽等领兵自开封先行北进。让反对迎敌的冯道去当山陵使为郭威修坟墓去了。

周世宗柴荣看到宋、唐、晋、汉四朝朝令夕改，都无力统一天下，致使天下战乱连年，便抱定大志，要统一天下、结束战乱。他不顾群臣反对，挂帅亲征。为了麻痹刘崇，周世宗故意要求部下不要打出龙旗，以骄刘崇之兵。五代史上著名的后周统一战争的序幕打开了。

北汉主扎营于高平（治今山西晋城东北）之南，列阵巴公原（今山西晋城北 30 里），因见周军人数不多，便命张元徽率千骑逆风攻击周右军，两军刚一交战，周将樊爱能、何徽引骑兵先逃，千余（一说数千）步卒解甲降敌，呼万岁声震动川谷。戎服督战的周世宗却临危不惧，跃马入阵，引 50 名亲军直冲北汉主牙帐。宿卫将赵匡胤等也率兵猛击，张元徽马倒被杀。此时，南风呼啸，周军乘风势向前推进，北汉兵败如山倒，溃不成军。契丹杨兗既害怕周军，又恨北汉主的骄狂自大，遂引军退走。

周世宗柴荣在巴公原大胜，挥军追赶刘崇。刘崇一路逃，一路收集溃兵，又聚合了万余人，退到一个山涧，越过山涧时，周兵已追到。刘崇令人马踞涧列阵，想抵挡一下。周世宗郭荣下令人马越涧杀敌。这时，刘词的后军赶到，周军声威更壮，喊

声震荡山后谷，汉兵见周兵骤然增多，掉头就跑。周军杀过山涧，只杀得汉兵尸横遍野。周世宗攻杀了北汉大将张晖、枢密使王延嗣，并一路追击北汉主至高平，俘数千人，被杀者尸横遍野，所获辎重、兵器、驼马、乘舆、器服等不可胜数，北汉主化装后率百余骑逃回晋阳。

为整肃军纪，周世宗休兵于潞州（治今山西长治），大宴群臣，奖赏有功将士，有的士卒从行伍中被提升为军、厢的首领。又将临阵脱逃、剽掠辎重、骚扰百姓、不奉诏令、擅杀使臣和扰乱军心的樊爱能、何徽及麾下军使以上 70 余人全部斩首，“由是骄将堕兵，无不知惧”，军威大振。于是，周世宗便想乘胜攻取晋阳、灭亡北汉。

北汉主逃回晋阳后，收罗残部、修缮器甲、加固城池，并且乞援于契丹，以抵御周军。

周世宗决定乘胜向晋阳进军，其军事部署是：任符彦卿为河东行营都部署兼知太原行府事，与镇宁节度使郭崇、宣徽节度使向训、侍卫马步都虞侯李重进等一起，率步骑 2 万人从潞州出发北攻晋阳，命王彦超等自阴地关（今山西灵石西南）出发北上，自率大军继后。合军而进，其目的在于北控忻口（今山西忻县之北 55 里），切断契丹的援路，任刘词为随驾部署，进击河东。

显德元年四月，周军发起进攻。符彦卿等攻占孟县（今山西省太原市东北），进抵晋阳城下。王彦超攻打汾州（治今山西汾阳），迫降北汉防御使黄希颜，莱州防御使康延沼攻打辽州（治今山西左权），密州防御使田琼攻打沁州（治今山西沁源），周世宗亲攻辽（治今山西晋阳）、沁（治今山西沁县）2 州未下，

后劝降北汉辽州刺史张汉超。数路人马构成一个分进合击的战势,向北汉境内推进。周军所到之处,州县纷纷投降,百姓亦箪食壶浆慰问将士。在一片凯歌声中,周世宗盲目地认为晋阳唾手可得,灭亡北汉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不顾诸将提出班师回朝、准备刍粮,待一切就绪后再图的建议,留几十万军人聚于太原城下,由于粮草供应不济,剽掠百姓之事时有发生,百姓失望。

五月,周世宗亲至太原城下督战。当时,北汉代州防御使郑从谦已投降后周,晋阳以及顿驻于代、忻之间的数千名契丹骑兵已处于周军的夹击之下。周世宗命符彦卿等率步骑万余人先去攻打契丹,契丹退保忻口。由于周将史彦超恃勇轻进,战败被杀,周兵伤亡惨重。

周军几十万大军屯于坚城之下达2个多月,后方给养已成问题,加上秋雨连绵导致士卒疲病,周世宗被迫宣布班师。由于周军撤退仓促、队伍混乱,北汉兵又从后面抄袭,因而辎重的损失难以统计。已占据的州县又被北汉夺回。

后周西取四州

显德二年(955年)三月,秦(治今甘肃天水市)、凤(治今陕西凤县)2州的百姓,因不堪忍受后蜀的苛政,纷纷要求周派兵收复失地。于是,夺回后蜀占领的秦、凤、阶(治今甘肃武都)、成(治今甘肃成县)4州便成为后周统一大业的第一步。

周世宗命凤翔节度使和宣徽南院使向训率军击后蜀,决定先取陇右。五月初一,王景自散关(今陕西宝鸡县西南)挺进秦州。后蜀主先是命客省使赵季礼按察边防,以御周师,但赵

临阵脱逃，被后蜀主斩首。后又任命李延为北路行营都统率兵驰援。

六月初五，王景在威武城（今陕西凤县东北）东被李廷珪击败，这时，后蜀国主孟昶遣使至北汉和南唐，相约共同出兵制服后周，北汉国主刘钧和南唐国主李均答应出兵援蜀。六月中旬，柴荣命彰信节度使韩通率军增援王景，鉴于形势不利，后周宰相以王景久战无功、粮运艰难为由，固请罢兵。但周世宗派赵匡胤到前线了解军情后确认秦、凤 2 州可以攻取，于是，命令部队继续向前推进。八月，王景与韩通会合击败蜀兵，俘将领 300 余人，后蜀主派武泰节度使伊审征至行营慰抚将士、进行督战。

九月，蜀将李廷珪命先锋都指挥使李进占据马岭寨，派奇兵屯于白涧，同时分兵唐仓镇、黄花谷以继绝周的粮道。闰九月，王景派部将分别打败唐仓镇、黄花谷的蜀兵，俘获染院使王峦等 3000 人，接着马岭、白涧的蜀兵也溃散而逃。李廷珪留兵屯守凤州自率主力退保青泥岭（今甘肃徽县之南），准备由此入蜀。雄武节度使韩继勋丢弃秦州退还成都，观察判官赵比举城投降，斜谷的后蜀援兵亦溃退，成、阶 2 州降周，蜀人大为惶恐。后蜀主连忙在剑门（今四川剑阁东北 60 里）、白帝城（今四川奉节之东的白帝山上）聚兵积粮，防备后周军深入蜀腹地。

十一月，王景等包围凤州，凤州节度使王环坚守城池 100 多天，周世宗屡次招降都被他拒绝，后力竭被俘。擒获后蜀军 5000 余人。至此，秦、凤、阶、成 4 州全部被后周攻取。后周伐后蜀之战亦告结束。

后周第一次征南唐

周世宗取秦、成、阶 3 州已成定局后，便把兵锋指南唐的江北地区。早在显德二年（955 年）十月，他即任命李谷为淮南道前军行营部署知庐寿等州行府事，率 12 员大将南征。同时又大造舆论，向淮南发布招谕，声称南唐“僭称伪号”、“与我为仇，罪恶难名”，并命吴越王出兵助战。

南唐风闻周师将至，朝野震惊。南唐主李璟以刘彦真为北面行营都部署，率兵 2 万趋寿州（治今安徽寿县），奉化节度使皇甫晖、常州团练使姚凤将兵 3 万屯于定远（今安徽定远），以御周师。

十二月，李谷等率军沿颍水南下至正阳（今河南颍上东南），造浮桥渡淮进攻寿州，连败南唐军于寿州城下。由于南唐名将刘仁贍坚守不屈，城久攻不克。这时，吴越国主钱淑向后周入贡，柴荣命钱淑出兵夹击南唐。显德三年（956 年）正月，钱淑及楚王马希崇均发兵协助后周讨伐南唐，吴越军进攻常州（今江苏省武进县），楚军进攻鄂州（今湖北省武汉市）。与此同时，李谷又败南唐军于上窑（今安徽省怀远县南）。但仍未攻下寿州。南唐军由水陆两路增援寿州，欲断后周军的归路，李谷深感畏惧，退保正阳。不久周世宗亲征。此时，刘彦真的救兵已至来远镇（今安徽寿县西南），寿州城东 200 里处的几百艘南唐战船正溯淮西向，大有切断周军归路的势头。于是，李谷主动撤兵退保浮桥，以待主力部队。刘彦真追至正阳，周世宗急遣李重进疾趋淮水，迎头痛击，唐兵 2 万余人战亡，“伏尸三十里，（周军）收军资器械三十余万”。南唐滁州刺史王绍颜

见前方兵败如崩，弃城逃走。周世宗到正阳后，以李重进替代李谷，率诸军围攻寿州，又征调宋、亳等州数十万丁夫昼夜参加攻城。南唐水军进援寿州，被后周殿前都虞侯赵匡胤大败于涡口（涡水入淮口）。二月，周将司超在盛唐（今安徽六安）败唐兵，王逵拔鄂州长山寨，赵匡胤占滁州（治今安徽滁县）。

南唐主派泗州牙将王知朗至徐州，愿与周世宗结为兄弟、息兵修好。周世宗不答应，命韩令坤等袭取扬、泰（治今江苏泰县）2州，南唐主又派户部侍郎钟谔等人至寿州奉表称臣，献御服等败物，遭到拒绝后，遂围而求助于契丹。吴越丞相吴程督军攻常（治今江苏武进）、宣（治今安徽宣城）2州。三月，吴程破常州外部，但不久便被南唐援兵击败。同时，周将何超率兵4万攻下光州（治今河南潢川），郭令图攻占舒州（治今安徽潜山），蕲州（治今湖北蕲春）投降后周。此时，后周一面加紧进攻寿州，一面派兵深入，夺占南唐江北之地。南唐主见形势危急，再一次派李德明等人求和，以去帝号，割寿、濠、泗、楚、光、海6州，每年输金帛百万为代价，但仍遭到拒绝。

求和不成，南唐主决心反击周军的进攻，命诸道兵马元帅齐王景达率兵抵御。四月，右卫将军陆孟俊将兵万人夺回泰州，一度收复扬州。周守将韩令坤弃城而走，在得到救援后反攻扬州，俘陆孟俊等人。周世宗为迎击南唐军反攻，亦调整部署，命赵匡胤屯兵六合（今江苏省六合县）。南唐军自瓜步（今江苏省六合县东南）向赵匡胤猛扑，遭到重创，赵匡胤在六合大败齐王景达，杀俘将近5000人，余众争舟溺死者不可胜数。与此同时，南唐军在湾头堰（今扬州市东北运河分流处）和曲堰（今江苏省盱眙县）亦各损兵万人。

周军围攻寿州的战斗异常艰难，从正月至四月一直没有停息，但城池始终未克。周世宗亲临城下督战，箭矢在身边飞落，仍然命令部队继续前行。同时招谕刘仁贍，刘不予理睬。由于城坚久攻不破、又逢大雨，周军营中水深数尺，攻具损耗及士兵逃亡现象十分严重，粮食供应也出现困难。五月，周世宗留李重进等人继续攻城，自率大军返回大梁。后周大军撤走后，南唐军立即全面发动进攻。在寿州城南歼灭后周军数百人，焚毁其攻城器具，并收复舒州、蕲州、和州（今安徽省和县）。

当初，周师征南唐时得到了当地百姓的欢迎和支持，但周师不恤民情，大肆俘掠淮南，引起民众的激烈反抗。他们聚集山泽、组织武装，屡次打败周军，原先被周攻占的州县，又回到南唐手中。

鉴于当时的战局，分散兵力已不利于进取，尤其是寿州如梗芥在喉，随时威胁着周军。因此，周世宗决定放弃扬、滁等州，集中兵力加紧围攻寿州，同时在下蔡、盛唐打败南唐援兵，并挫败南唐主企图分裂、拉拢周军高级将领的阴谋。翌年正月，寿州城已被围将近一年，城中粮食奇缺，齐王景达率数万人援救，挖甬道准备接济城中粮食，将抵寿州城下时被李重进打败。

后周第二次征南唐

第一次亲征使周世宗痛感没有水军的配合，步、骑兵在淮南沼泽湖泊地带所受的限制极大，难以向纵深发展。因此，返回大梁后，便在大梁城西的汴水上建造几百艘战舰，命南唐降

卒教习水战。数月后，周军水师已具规模，能够出没于水上进行战斗。

显德四年(957年)正月，李重进围攻寿州虽连年未下，但寿州城内亦告粮尽。南唐永安节度使许文积等率兵数万往救，被李重进击退，撤往紫金山(今安徽省凤台县东南八公山)。周世宗闻讯，不顾臣下请求罢兵的建议，于二月第二次亲征，后周水军至寿州城下，歼灭来援的南唐军3000余人，并将南唐军主力分割，使其首尾不能相顾。三月，世宗亲自指挥攻打寿州，迫使南唐将领朱元、朱仁裕率万人投降。接着又破紫金山(或曰八公山，今安徽省凤台县东南)寨，杀俘万余人，败卒沿淮水东逃，周世宗亲帅数百骑沿北岸，诸军循南岸，水军自中流并进追击，南唐兵残废投降者大约4万人，损失兵舰粮10余万计。齐王景达逃回金陵，寿州监军使周廷构等乘刘仁贍病笃，诈称其名，奉表投降，周世宗部署好下一步攻势后，又返回大梁。

后周第三次征南唐

寿州的陷落并未使南唐屈服。周世宗返回大梁后，将南唐降卒编成6军，号怀德军，又将在讨伐后蜀时擒获的后蜀降卒数千人遣回后蜀，借以显示威德，并使其报告孟昶后周已荡平淮南数千里之地，不使后蜀捣乱。显德四年(957年)十一月，周世宗因冬天淮水水位下降，周世宗第三次亲征。周兵首先攻打濠州(治今安徽凤阳东北)，骑兵与水师共进，破其外围立栅和水寨，并焚毁城北70余艘战船，被杀和投降的唐兵不下万人。周军继续东进，直抵泗州城下，攻占其城门、水寨、却月城，

泗州被迫投降。停泊于洞口(在濠州东的浮山下)的唐数百艘战船也退保清口(今江苏淮阴西南泗水入淮处)。

周军兵分三路,继续追击溃逃唐军。十二月八日追上唐军,九日,在楚州(治今江苏淮安)西北展开大战,擒唐保义节度使濠泗、楚、海都应援使陈承昭,获战船 3000 多艘,俘虏 7000 余人,其余南唐战舰全部被烧沉、士卒全被杀溺。守卫濠州的唐滁州团练使郭廷谓,见大势已去便举城投降。十二月中旬以后,周军破楚州月城、取泰州、克扬州,全歼南唐在淮河上的战船。南唐在淮水的水军丧失殆尽。

显德五年正月,周世宗在攻拔泰州、海州(今江苏省东海县)之后,率舰队自淮水入长江,攻占静海军(治今江苏南通)和楚州。此时,荆南主派指挥使魏璘带 100 余艘战舰至鄂州参战,更增强了周军的实力。二月,周师再次攻取舒、海、泰、扬等州,进逼庐州(治今安徽合肥),唐雄州刺史易文斌欠投降。三月上旬,周世宗至銓镇(今江苏省仪征县境),大破南唐水军于东沛州(今江苏省崇明县),并遣李重进率军西趋庐州(今安徽省合肥市)。李景恐周世宗渡江南侵,派兵部侍郎陈觉到迎鸾镇(今江苏仪征)谒见周世宗,献江北尚在南唐控制下的庐、舒、蕲、黄 4 州,划江为境,岁输贡物 10 万,以求息兵。周世宗答应其请求,决定罢兵。至此,周世宗三征南唐以胜利告终,共获得 14 个州,60 个县。南唐主去帝号,称国主,用周年号。

后周北取三关

契丹自晋、汉之际被中原各族人民赶走后,仍经常南下抢掠。周太祖时,北汉勾结契丹两次攻打晋州(治今山西临汾)。

契丹也派兵进扰冀、定、镇州及乐寿等地。高平之役后，契丹虽然南下减少，但隐患始终存在。攻取淮南后，周世宗为巩固北部国防，决心着手收复幽蓟之地，完成统一大业。

显德六年（959年）二月，周世宗命侍卫亲军都虞侯韩通率水陆军从大梁先行，自率大军继后，北伐辽国。同时派诸军赴沧州（今河北沧州），义武节度使孙行友守定州西山路（即北汉越太行山东出的要道）以防北汉援助契丹。四月，又修自沧州至泚（治今河北河间县）、莫（治今河北任丘县）水道，以利进军。周将韩通率水陆军先入契丹境，筑栅乾宁军南，契丹宁州刺史王洪举城投降。周世宗命诸将水陆俱进，自御龙舟沿流北上，舳舻相连数十里。二十六日至益津关（在今河北霸县东），契丹守将终廷辉投降。此时，水路都部署赵匡胤先抵达瓦桥关（在今河北涿县南），契丹守将姚内斌和莫州刺史刘楚先后投降。五月初，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天平节度使李重进等人率主力赶到，契丹瀛州刺史高彦晖投降，淤口关亦被周军夺占。周世宗离京42天内不损一兵一卒，便收复了契丹统治的边界州县20余个，得1.836万户。燕南平定。

周世宗欲乘胜进取幽州，诸将认为契丹骑兵均聚集于幽州之北，不宜深入。但周世宗不听，督促先锋都指挥使李重进先行发兵，定州节度使孙行友攻克易州，擒契丹刺史李在钦。当周世宗北征时，契丹主命北汉发兵袭扰周的边境，以牵制周军，集结在幽州以北的契丹军也大肆南下。五月初六，李重进在百井（今山西太原东北）大败北汉兵，杀2000余人。张藏英在瓦桥关之北破契丹数百骑兵，拔固安县，昭义节度使李筠则攻拔辽州（今山西省左权县）。几天后，周世宗突患重病，被迫

南还，征契丹及北汉的大军随其返回大梁。契丹帝见周世宗罢兵，求之不得，亦同时罢兵。周世宗因病还京后，六月病亡，时年 39 岁。

第二节 十国的政治经济

一、杨行密“发迹变泰”

唐朝末年，江淮两浙的社会经济，受过严重的破坏。藩镇、将领、变兵和一些流窜的武装集团，争城夺地，在大江南北进行混乱的战争。

扬州，这个唐代有名的繁华城市，从唐僖宗光启三年（887 年）到昭宗景福元年（892 年），5 年有余，先经淮南节度使高骈部下诸将间的混战，后遭从北方南下的秦宗权部将孙儒的破坏，变成了一片废墟。

孙儒的流窜武装，到处烧毁房屋，掳掠丁壮妇女，以至杀人当粮，对于社会生产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他在长江以北攻陷扬州、庐州（今安徽合肥），劫掠淮南各地，在江南又把润州（今江苏镇江）、常州、苏州烧抢一空，影响的范围很大。

到了 9 世纪 90 年代的初年，大江南北的局势逐渐安定，杨行密占有江淮、钱鏐占有两浙，形成十国中的吴与吴越。他们推行了一些有利于生产的措施，促进了东南经济的恢复发

展。吴越钱氏于公元 978 年纳土降宋,实际上存在了 80 多年。吴后为南唐取代,中间没有经过战乱,到公元 975 年被宋所灭,实际上也达 80 年以上。五代号为乱世,东南却比较安定,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与唐代后期相比,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杨行密是庐州合肥人,早年参加过地方上的农民起义,曾被官兵俘获,侥幸没有被杀;后来应募当兵,做了队长,因受上官欺压,带头起事,占了庐州,自称八营都知兵马使。这年,黄巢兵进关中,唐朝政府哪里管得了淮南地方上的事情,只得承认既成事实,拜杨行密做庐州刺史。

杨行密他初起兵时,与田頔、陶雅、刘威、刘金、徐温等心腹弟兄,号称 36 英雄,这些人颇有草莽豪杰的气息,与世代厕身军伍的藩镇旧将,出身和经历都有区别。

淮南节度使高骈是唐末大军阀,早年颇有英名,后来畏惧黄巢,不敢出扬州一步,声望顿减。他又迷信神仙、宠信方士,闹得与部下离心离德,被秦彦、毕师铎等囚禁起来,不久,被他们杀掉。杨行密以讨伐秦彦为名,进攻扬州,实际上是借此夺取地盘。

这次扬州争夺战造成极大的兵祸。杨行密围城半年。城中无粮,米价每斗卖到四五十千钱,居民大半饿死。军士抓了人卖给肉店,屠户就把活人权充猪羊,宰割出售。破城的时候,城中只有遗民几百户,都饿得不像人了。杨行密一生事迹大体上都可以肯定,惟独这件事情,却应加以谴责。

杨行密进扬州,是光启三年冬天的事情。孙儒的军队就在这时候渡过淮河,前来争夺扬州。第二年,杨行密被迫放弃扬

州，退回庐州，接着又弃了庐州，渡江取宣州（今皖南的宣城）为家。数年之间，他和孙儒，为了争夺大江南北的土地，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孙儒部队的战斗力很是顽强。他在淮南强迫丁壮当兵，声势浩大，最盛时号称有 50 多万人，在江南行军，旌旗輜重，连绵 100 多里。杨行密同他交战，经常打败仗，最严重的时候，连宣州也差一点丢掉。但是在几年的冲突中，杨行密终于找到了孙儒的弱点：第一，淮南人不愿意跟孙儒，希望散伙还家；第二，孙儒部队没有后方，他攻打任何一个地方，如果城池坚固，一时打不下来，附近又没有粮草可抢，就没有办法坚持下去。

杨行密针对这两点做工作，终于彻底打败了这个魔王。唐昭宗大顺二年（891 年），孙儒放火烧毁扬州，驱迫丁壮妇女过江。杨行密派兵进城，扑灭余火，搜寻藏粮，散给饥民。孙儒部下的淮南人，不论是投降杨氏的，或是临阵被俘的，杨行密都派人护送回乡，让他们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一边杀人、一边救人，淮南的民心归于杨行密、孙儒的军队逐渐瓦解，都是必然的趋势。

孙儒根本不懂得这一点，他依然耀武扬威地去打宣州。杨行密用坚壁清野的策略，和他相持。景福元年（892 年）的夏天，终于一战擒获孙儒，把他杀掉。从此以后，杨行密以扬州为中心，据有江淮地区。唐政府任他做淮南节度使。尽管这时距离他受唐朝封吴王还有 10 年之久，十国的吴在事实上已经出现了。

这个出身低微的割据者，亲眼看到粮草不足、民心不附就无法持久的事实，吸取了一点教训。他便以招集流亡、与民休

息,作为主要的政策。不出几年工夫,江淮地区的农业生产就逐渐恢复了。

从另一方面看来,杨行密在世的时候,情形仍很紧张,打过不少仗。其中最重要的是乾宁四年(897年)的清口之役。

孙儒本是秦宗权的部将,孙、杨相斗,朱温当然希望杨行密得胜。孙儒死后,特别是朱温消灭了徐州的时溥以后,形势改变,朱、杨变成南北对峙的两股势力。乾宁四年,朱温并吞了兖、郓,只过了几个月,就大举进攻杨行密。他派庞师古屯于清口,准备直取扬州;葛从周屯于安丰(今安徽寿县南),以寿州为目标;朱温本人驻在宿州,策应两路人马。这个架势颇有灭此而朝食的样子,朱温显然认为灭淮南并非难事。

吴国尽管地跨长江两岸,但重心在江北,枢纽是扬州。清口在今江苏淮阴以西,是泗水(清水)入淮之口,南北交通咽喉。由此而南,直趋扬州,地处运河沿岸,没有什么险阻。庞师古这支军队担任的是主攻方向,如果一战而胜,淮南势将为朱家所有。但是杨行密以寡击众(3万人对7万人),彻底击溃汴军,斩庞师古和将士1万多级,获得决定性的胜利。葛从周部先已受到小挫折,得了师古败讯,仓皇北撤。淮南兵乘胜追击,又获大胜。朱温并吞南方的幻想从此破灭。

吴国的情况,到徐知诰执政的时候,才真正地好起来。

唐天祐二年(902年),杨行密去世(852年),儿子杨渥继位,军权掌握在张顓、徐温的手中。梁开平二年(908年),两人杀死杨渥,立行密的次子隆演。徐又杀掉张顓,把杀杨渥的责任推到他的身上。于是吴国大权完全落到了徐温的手里。

这时候杨行密的旧将还多,徐温要独揽大权,必须限制军

人、收取民心。于是这个不通文墨的私盐贩出身的将领发出了动听的宣言，他说要实行良好的政治，让老百姓每天晚上都可以脱掉衣服安心睡觉。他禁止军士欺压百姓。他用心审讯案件，自己不识字，便令人念诵词状，用心思索，力求判得公平合理。杨家旧将，公然抗命的，他毅然出兵讨伐；畏惧来见的，他以礼相待。这样，内部逐渐稳定了。

杨行密的吴王，是唐朝的藩王，后嗣继承爵位，名义上不是独立的王国。公元919年，徐温作主，使杨隆演称吴国王，把唐天祐十五年改做吴武义元年。这个独立建国的举动，作用在于加强扬州所发号令的威信，也就是要所属州县向徐氏俯首贴耳的意思。

为了同样的目的，徐温竭力避免战争，借以防止武将扩大权力。吴与吴越，本来常在苏、常一带发生冲突。苏州一城，10多年中几次易手，争夺战打得相当激烈。武义元年，吴军在无锡大破吴越军，众将主张乘胜进取苏州。徐温却说：“战乱不息，百姓困苦已极。若能使两地人民各安生业，君臣高枕无忧，岂不好呢？”于是他释放战俘，与吴越讲和。从此双方保持了20多年的和平关系。

徐知诰是徐温的干儿子，从武义元年的前一年起，就奉徐温之命，在扬州执掌吴的国政。相传他本姓潘，后来把吴改做南唐，自己做皇帝，改叫李昇，自称是唐玄宗的子孙。这是乱认祖宗，事实上他是战乱时期的一个孤儿，出身低微，亲身体味到战时流亡的痛苦。他曾经对手下人说：“我生长在军旅之中，看到人民受到的兵灾，实在是可怕，所以再不忍谈到打仗！”这一席话，看来是由衷之言，而且确实反映了当时人民的心声。

他谴责的战争，也确实是非正义的军阀混战。

他在吴国执政近 20 年（前 10 年徐温在世），加上做了皇帝的 5 年，共达 25 年（918—943 年）。他的心腹谋士豫章人宋齐丘，早先是个落魄秀才，穷得连纸笔都买不起。知诰有事，都和他商量。吴国开头订定的制度，田赋都收铜钱，另外还有丁口钱，也收现钱。宋齐丘认为农民从事耕织，纳税要付现钱，就是叫农民弃农经商（实际上是叫农民卖掉农产品换钱，必然是农民吃亏，商人占便宜）。他主张取消丁口钱，田税改收谷帛实物。当时每匹绢的市价值 500 文，他建议把一匹绢抵原来 1700 文的税额。这个条陈一出，朝臣议论纷纷，都认为政府的损失太重。齐丘却说：“哪里有百姓富庶而国家贫穷的道理！”徐知诰考虑了他的建议，赞叹道：“这真是劝农的上策啊！”他坚决执行这项政策，鼓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江淮一带的荒地，很快都长满了庄稼，蚕桑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以后，他又禁止把良人子女买做奴婢。

从上面所说的来看，吴和南唐初年的政策无疑是对农业生产极为有利的。

二、前蜀经济的发展

四川是五代时另一个经济上有所发展的地区。它的地位可以和东南的江淮两浙并驾齐驱。

唐朝末年，四川境内的战乱不多。大顺二年（891 年）王建攻占成都后，巴蜀经济基本上是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发展。

王建，同杨行密、钱鏐一样，也是出身低微的新兴藩镇。他

原是许州舞阳(今属河南)一个饼师的儿子,年轻时精习拳脚,干些屠牛、偷驴、贩私盐的勾当,乡里中替他起个外号,叫做“贼王八”。后来投入蔡州忠武军,从士兵升做队长,又升到都头,指挥 1000 人马。他跟着蔡州的军队,镇压过黄巢起义,后被调到西川(今四川西部),逐渐纠合破产农民和少数民族人民,扩大军事力量。光启 3 年(887 年)末,他开始进攻成都,与西川节度使陈敬瑄争夺地盘。

陈敬瑄是宦官田令孜的兄长。唐僖宗叫田令孜做“阿父”,派他的兄长做了西川节度使(陈是本姓)。光启年间,田令孜在朝中成为众矢之的,只得逃到西川。这对弟兄是唐末腐朽势力的代表。王建攻灭陈氏,是消灭了一股腐朽势力。但成都攻围连续三年,居民饥困,也死了许多人。

以后,王建又兼并东川(今四川中部、东部),割据整个巴蜀地区。天复三年(903 年),唐封王建为蜀王。

王建从社会的底层上来,识得创业的艰难,懂得一点人民的疾苦。他要在巴蜀立业,便留心刘备、诸葛亮建立蜀汉的史事,要模仿他们的作为。

他要做刘备,就不能放纵将士破坏成都。进城以前,他先派以严厉闻名的张勛做斩斫使,先行入城。然后对将士们宣布:“得了城池,不愁不富贵,切勿放火抢劫。我已经派张勛维持秩序。谁犯了法,他先向我禀报的话,我还来得及赦免;如果他先斩后报,我也没法相救!”后来张勛果然杀了 100 多个犯法掳掠的将士,把尸体堆在街上,警戒众人,使军队保持了较好的纪律。

王建有了地盘,便注意约束那些干儿子,凡是不守法纪或

有跋扈嫌疑的，都加以严厉的制裁。王宗裕是建的同族，从小跟他打仗，态度极为忠顺。有一次，他的手下人为点小过失，被成都尹崔隐惩罚。宗裕大怒，到建面前告状。建支持执法的地方官，把宗裕责备了一番。王宗涤本名华洪，是建手下最得力的将官，只因态度傲慢，便被杀掉。

建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便乘朱温代唐的机会，宣布不承认梁朝，在成都称帝。前蜀武成三年（910年），他下诏劝课农桑，引蜀汉诸葛亮“闭关息民，十年而后举兵”的事例，令地方官关心农业生产，减轻人民负担。他有一篇告诫太子的文字，列举应该注意的事项。这类事项是：亲自审判案件，不让任何人受冤屈，也不让任何人逃脱应受的刑罚；不可骄傲自满；不要相信小人的说话；不要贪图声色游猎的享受；安抚百姓，厚待士卒。这几条显然是他总结的政治经验。

他嘱咐太子，必须经常阅读这篇文章，不可遗忘，并且说只有做到这几条，才保得住社稷。

宋朝熟悉巴蜀情形的人，发表评论，认为建确实可以和刘备相比，是个好的政治领袖。有人说他对人民的剥削并不算轻，但也承认前蜀的仓库很充实，可见农业生产确有发展，经济情况是良好的。

成都这座锦城，在建围城时，居民不免困顿，不久以后，仍旧恢复了繁荣的面貌。著名的蜀锦，也仍旧是当地的特产。

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重视文士，厚待唐朝的名臣世族。巴蜀一向是唐朝中原士大夫避乱的地方，唐末投靠前蜀的“衣冠之绪”很是不少。他们与西晋末年南迁的士族不同，只能寄人篱下，依靠地方势力的保护。原因很简单，西晋末年的

士族带有大批宗族、部曲、佃客，到了南方，可以凭着实力，占有土地、山林、川泽，形成特殊的势力，夸耀门阀世族的威风。唐末的名门大族，手下早已没有爪牙，只带点眷属奴婢，像丧家之犬一样，本身是没有什么力量的。地方军阀重用，他们就是显贵的高官；不重用，就漂泊异乡，至多做个普通的地主而已。

后梁贞明四年（918年），王建去世（847—918年）。太子王衍继位，他根本不接受父亲的遗训，荒淫奢侈，前蜀的国势很快便衰落了。

三、孟知祥父子统治后蜀

孟知祥是李克用的侄女婿。后唐庄宗灭前蜀后，派他去镇守蜀地，亲戚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灭蜀的主将郭崇韬早年受过孟知祥的推荐，这时就举他为镇蜀的最佳人选，也起了促成的作用。他在同光三年（925年）受到委派，次年正月到差。当年后唐发生政变，庄宗被杀，明宗即位。此后，孟知祥便和后唐政府若即若离，俨然是割据一方的霸主了。

孟知祥所有本只西川，东川（治梓州、今四川三台）另有节度使董璋。孟知祥先和董璋合作抗拒后唐，再击破董璋，兼并东川。他在蜀九年（926—934年），到最后一年才即位称帝，做了几个月皇帝便死了。他的儿子后主孟昶在位30年，在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正月兵败降宋。

后蜀的经济方面有些发展。但它只能做到在中原混乱的时候闭关自守而已。

孟知祥和他手下的大臣将相，都是后唐的官僚，其中还有从后梁降唐的人员。这批人一般都没有卓越的见识和魄力，不可能创建一个有新气象的政权。孟知祥能够做的，不过是收拾王氏前蜀的残局，使蜀中恢复小康粗安的状态。

他初到成都的时候，蜀中农民正因苦于前蜀的暴政，群起反抗。孟知祥是个干练的封建统治者，他一面派兵镇压，一方选用比较廉明的人员做地方官，免除苛捐杂税，招集流散的人口，使社会形势逐渐稳定下来。他任用的人，如武璋，在褒中兴建水利工程，灌溉田地数千顷，确有可以称道之处。经过了这一番经营，后蜀逐渐稳定了。

孟昶与王衍都是蜀国亡国之君，然而孟昶其人，既有奢华荒淫的一面，也有精明干练、力谋改善政事的一面。

孟昶即位时才 16 岁，将相大臣都是孟知祥的老部下，不把这个小孩子放在眼里。五代十国时期，老皇帝死了，将相大臣欺负孤儿寡妇，取而代之，是极其常见的事情。孟昶要防止这类事变，显然并不容易。

孟昶刚即帝位，大将李仁罕便提出主管六军的要求。他不但派人到枢密院提要求，还到学士院看是不是照他的要求起草命令。这个举动很咄咄逼人。孟昶居然不动声色，先接受条件，任命李仁罕做中书令、判六军事，然后等他进宫朝见，令武士捉住，当场杀死。另一员大将李肇，到成都朝见新君，一路上拖拖拉拉，与亲戚宴会，到了成都，又假装脚上有病而拄着拐杖，见了孟昶也不肯跪拜。李仁罕一死，他吓得魂不附体，顿时丢掉拐杖跪下去了。

李仁罕的外甥张业执掌禁兵，孟昶怕他反叛，千方百计加

以笼络,甚至用他做宰相,又兼判度支(财政)。张业在家里私设监牢,监押欠债的人。他创立“盗税法”,规定税官吞没赋税的,照吞没的数目罚款10倍。税官受了罚,根据“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法则,仍向百姓勒索,结果最吃亏的是下级官员和百姓。孟昶废除10倍罚款的办法,最后在后蜀广政十一年(948年),用收拾李仁罕的老办法,把张业杀掉。

孟昶在朝堂上设匭,鼓励臣下陈说国事。有人上书论事,孟昶看了,认为说得不对,左右请求把上书的人喊来诘责,他引唐太宗纳谏的故事,拒绝了左右的主张。他曾经亲笔撰述箴戒,发给地方官,晓谕他们不要过分剥削人民。他还表示应把前蜀王衍看做前车之鉴,说要吸取王衍因骄奢淫逸亡国的教训。

从这些地方来看,孟昶可以说是一个颇有才识的君主,有可以肯定的地方。但是他的认识和实践很不一致,以骄奢淫逸为戒,但有许多骄奢淫逸的事迹;铲除了一些不可靠的旧人,同时又扶植了一批腐朽的新贵。因此,他又有阴暗的一面。这一面,越到后来,越是占着主导地位。这就是孟氏蜀国的悲剧。

这个悲剧是难以避免的。孟氏君臣不是从下层崛起的新统治者,是从后唐统治集团中分裂出来的。骄奢淫逸原是他们的根性。知祥父子最亲信的将领赵廷隐是后蜀的开国功臣,他家中金帛如山,不断兴筑亭台楼阁,每天要征用几千个劳动力。

后蜀的政治不算好,但也不太恶劣;环境安定,割据的形势使中原朝廷榨取不到蜀中的一丝一粒,经济发展有较好的

条件；文化上继承唐和前蜀的情况，与南唐、吴越同为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

广政十三年（950年），蜀中1斗米只卖3文钱，人民赋役的负担很轻，府库里储藏的粮食金帛却很丰富。成都城上遍种芙蓉，九月里花开的时候，望去好像一片锦绣。城外江边，处处亭榭，游人云集，十分热闹。这时的中原正在后汉末年，混乱黑暗，比起蜀中来，颇有天壤之别！

但是这终究只是官僚、地主、富商的乐园，广大农民群众至多暂时得到赋役较轻的好处。当地统治集团的舒服日子也不可能长久，因为在这个安乐窝里只会产生腐朽的新贵，一旦中原王朝的实力强大起来了，这些新贵的末日就到了。

孟昶的亲信大臣王昭远就是这些新贵的典型。他13岁做孟昶的侍从，是个贴身小使。后来做通奏使、知枢密事，执掌军国大事。孟昶要对付旧将，就必须提拔自己信得过的新人。在他的心目中，王昭远是绝对可靠的人物，府库财帛，可以任他随便支取，没有任何监督。王昭远跟着权力和财富的膨胀，对自己的才干也估计得越来越高。他身居蜀中、执掌蜀政，便自命为诸葛亮。诸葛亮北伐中原也没有成功，王昭远竟自夸取中原易如反掌，到了被宋军打垮以后，又羞又急，哭了出来，被人叫做“带汁诸葛亮”，成为一个笑柄。

在这批人的统治下，后蜀晚年的政治，一天比一天腐败。后周、北宋不动则已，一动，后蜀的偏安就保不住了。在这一点上，前、后周的情况几尽相同。后唐出兵70天而灭前蜀，北宋出兵66天而灭后蜀，所费时间相差无几，看来像是巧合，实则并非偶然。

四、长江中游的荆南和楚

长江中游的两湖一带，五代时出现了两个国——荆南和楚。他们的统治者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都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

荆南是十国中最小的一个，辖地不过荆州一带，而且在后梁时，实际上还不成其为“国”。

荆南的建国者高季兴幼时在汴州富人李让家中做家童。后来李让认朱温做干爸爸，又奉朱温的命令，收高季兴做干儿子，两人都改姓朱氏。高季兴积了许多军功，做了大官，才复姓归宗。开平元年（907年），朱温任高季兴为荆南节度使。历史上通常以此为荆南的开始，其实他只是后梁的地方军政长官，与钱鏐等的地位不同。朱温死后，高季兴见梁朝衰乱，才作割据的打算，然而地小力弱，终五代之世，不过勉强维持而已。

江陵在古代一向是南北交通中枢，唐末屡遭兵祸，破坏得极其厉害。唐僖宗文德元年（888年），小军阀成汭占领江陵时，居民只有17户。他招抚流亡，奖励农桑，10多年后，才增加到将近1万户。此人在唐末军人中，是一个难得的人物。

成汭后与淮南兵冲突战死。江陵几经争夺，最后为朱温所得，也就是为高氏所有。成汭死后，江陵又遭破坏，季兴刚到任时，“兵火之后，井邑凋零”，境况很是不好。他又用了一番心思，招抚流亡，地方逐渐恢复了生气。

高季兴的心腹谋士叫梁震。他原是蜀人，登第后流寓江陵。高季兴请他出山，他不肯任职，只以宾客身分，参与谋议。

他的主张只有保境安民、善事朝廷一条。但是这一条确是荆南的上策。

梁亡以后，高季兴又臣服后唐，受封为南平王，因此荆南又叫南平。高季兴本来叫季昌，后唐时避李克用父国昌讳，才改为季兴。这个国的附庸地位，在这上面也表现得很清楚。

楚是从孙儒的流窜武装集团中蜕变出来的地方势力。它的建立者是马殷。

马殷少年时是许州鄢陵的一个木匠，后来应募从军，跟孙儒的军队南下，地位逐渐上升。孙儒死后，大部分军队投降杨行密，剩下的一部分推刘建锋做首领，向西进入江西、湖南。马殷就是这支兵的先锋将。

刘建锋得了潭州（今湖南长沙），才算有了固定的地盘，停止流窜。不久，刘建锋被部下所杀，众将推马殷为首。这时是唐乾宁三年（896年）。马氏割据湖南，就从这时开始。马殷在唐末是武安军节度使。后梁建国，封马殷做楚王，才有楚的名称。马殷在位35年，名义上先后做过唐、后梁、后唐的藩臣，事实上是独立的割据者。

唐末的湖南，小军阀纷起，各据一州。马殷开头只有潭、邵（今邵阳）两州，湘南的衡（今衡阳）、永（今零陵）、道（今道县西）、郴（今郴州）、连（今连县）以及西部的朗（今常德）、澧（今澧县东南）等州，都有人各占一方。9世纪末、10世纪初，马殷攻灭群雄，才全有湖南。此外，他还攻占过岭南的几个州（今广西北部）。

马殷得了湖南，与谋臣高郁商议立国的方针。高郁劝他尊重中原的朝廷，取得封爵；休兵息民、发展生产，积蓄力量。

马殷接受他的主张，提倡造茶、种桑、养蚕，使人民纳税时用帛代钱，大大地促进了农民的家庭纺织业。这与吴国徐知诰、宋齐丘的办法相同，都以休养生息为着眼点。马殷特别注意发展商业，收取商税。他同中原王朝保持了朝贡关系，便可以在京师以及襄（今河北襄阳）、唐（今河南唐河）、郢（今湖北钟祥）、复（今湖北天门）等州，设立邸务卖茶，获得巨额的收益。在这一方面吴与中原对立，就无法办到。这是官营的商业。马氏也提倡民间自己造茶，让商人贩运销售，向政府纳税。史籍说马氏“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辐凑。”大约除税茶以外，其他货物都不收税。马氏境内行使用铅铁铸造的钱，客商带出境外，没有用处，都换了土产而去。

湖南境内的产品，特别值得提一下的是瓷器。湖南长沙窑首创多彩瓷器。晚唐、五代时，长沙、衡阳一带的制瓷工业仍继续发展。五代的墓葬中出土很多碗、碟等器皿，多系白瓷，釉色白中泛青，胎薄质精。长沙窑的产品在国内外多有出土，客商们买的土产，瓷器显然是不少的。

这样，湖南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发展，人们的生计，政府的财政收入，都比较充裕。

五、南方沿海的闽和南汉

闽的建立与农民起义有直接的关系。唐末农民大起义期间，河南有个屠夫王绪，他聚众起兵，攻占固始。固始县吏王潮出身农家，智勇双全。他与兄弟王审知投入王绪军中，做了军校。王审知便是日后闽国的创建人。

王绪怕被秦宗权并吞，引兵南下，流动作战，经江西进入福建。从他们活动的情形和史籍上所记王潮“吾属弃坟墓、妻子而为盗”的话来看，这支军队是一支农民起义军。

王绪不善用人，对于有才能的将校，怕他们反对自己，常常借故杀害。光启元年（885年），王潮利用众心不服的机会，设计把王绪擒住，夺得了部队的领导权。王绪被禁闭了一阵，便羞愤自杀。

王潮带兵，纪律极为严明，不但深得兵心，也受到福建人民的拥护。泉州刺史廖彦若贪暴，居民听到王潮的军纪严明，便要求他前去讨伐。光启二年，王潮攻克泉州，就把那里做根据地。他招合流散的农民，减轻赋税，一面整军经武，形成了一支新的地方势力。

景福元年（892年），范晖做了福建留后，暴虐无道。王潮乘机进攻福州。泉州人民自愿捐献粮食，补助军费，可见他确实受到人民的拥护。第二年，王审知攻破福州，从此王氏占有福建全部，闽国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但是王潮的身分只是唐朝的福建观察使、威武军节度使。乾宁四年底（898年初），王潮去世，审知接替了他的官职。后梁开平三年（909年），朱温封审知闽王，才有闽国的名称。

王审知统治28年，至后唐同光三年（925年）去世。王氏弟兄崛起于起义军之中，对民间疾苦比较了解，自己的生活较为俭朴。他们注意选择地方官，减轻赋役、与民休息。在他们两人在位的30多年中，福建境内始终保持着适于发展生产的条件。

王氏兄弟特别重视沿海的商业。他们免除繁重的商税，鼓

励海上贸易。福州、泉州两地，船舶出入频繁，从此成为东南沿海重要的商港。古代海外进口商品，很多是香料珍宝等贵重货物。王审知的侄儿延彬，在泉州 30 年，发展海上贸易。人们都把他叫做“招宝侍郎”。

王审知还厚待流寓福建的士大夫，设立学校，对福建文化的发展，也起了有益的作用。

从福建往南，广东和广西的一部分，有刘氏的南汉。南汉与吴、吴越、楚、闽、前蜀不同，建国的首脑不是草莽英豪，而是上层的地方长官。

南汉建国者刘隐的祖上，因经营商业，从北方（刘氏祖籍有上蔡、彭城两说）迁居泉州。刘隐的父亲刘谦弃商而官，到广州做牙将，向社会的上层爬去。他娶节度使韦宙的侄女做妻子。韦氏是名门大族，韦宙本人做过宰相。刘谦配了这门高亲，社会地位又上升了一步。韦氏愿与一员牙将通婚，显然是受了南海富商财产的吸引。然“婚姻不问阀阅”，毕竟透露了时代变迁的消息。

刘谦后来做了封州（今广东德庆）刺史，死后，刘隐继承了他的官职。乾宁三年（896 年），唐宗室薛王李知柔到广州做清海军节度使，被叛将所拒。刘隐镇压了叛将，保护李知柔进广州。从这时候起，刘隐事实上已经是“南霸天”了。但历史上或以刘隐做节度使，或以刘隐的兄弟刘龚称帝，作为南汉的始年。前者是唐天祐元年（904 年），后者是后梁贞明三年（917 年）。

从上面所叙的事实来看，南汉的统治是从富商、名门、官僚地主的结合中产生的地方势力。

刘隐曾被朱温封做南海王。死后，兄弟刘陟继位，他见中原多事，就自己做起皇帝来了。他造了一个字，上“龙”下“天”，读“俨”，做自己的名字，国号先叫大越，后改为汉。

南汉的统治并没有什么兴革。这原因很简单：唐末农民起义军虽曾进入广东，但很快就撤走，影响不大。唐军也没有与起义军在这个地区打过大仗，战争的破坏也不显著。这个从统治阶级上层产生的地方势力完全照老规矩办事，根本想不到有兴革的必要。

反之，从唐朝统治阶级的上层分子看来，在四海鼎沸的时候，岭南却是一块安全的“乐土”，南迁避难的为数不少，原在岭南做官的，也都在此落户。这对传播中原文化，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却使岭南成为旧的传统势力最浓厚的地区。王定保和赵光允的故事很能够说明这个问题。

刘龚其人，极为残酷，把用毒刑杀人当作戏乐。但是他对“清流”、“甲族”，偏偏极为迁就。他要做皇帝，怕王定保反对，故意把他派到荆南去。定保回来时，刘龚已经登位，还怕定保有看法，派人探他的口气。定保却说：“建国当有制度，我看见城门上还挂着‘清海军’的匾额，岂不要被人耻笑！”刘龚听了，方才放心。赵光允在南汉建国后，觉得自己当了个“伪国”的大臣，一直闷闷不乐。刘龚知道了这情况，特地派人到中原，把住在洛阳的赵氏家属，全部接到南方。赵光允因此感激涕零，才死心塌地做南汉的大官。

刘龚对王、赵二人的态度颇为宽厚，目的在于争取“清流”、“甲族”的拥护，也就是尊重传统势力的表示。刘龚的毒刑名目繁多，或把人投入汤镬，或把人放在烧红的铁床上烤

炙，或把人开膛破肚、支解屠割。但是对于这些人，他却并没有甚至没有想到用这些东西来进行威吓。

南汉政权的措施，促进了海上贸易。

刘家原是南海富商，刘隐弟兄称王称帝后，贪欲更加发展，竭力搜罗南海珍宝。这种商业纯粹是为统治者的奢华生活服务，但广州这个港口日益繁华，毕竟是一件好事情。

交州（今越南北部）本来是南汉静海军。937年，节度使杨廷艺被牙将矫公羨杀死。次年，牙将吴权攻杀矫公羨。南汉主以助矫氏为名，想打败吴权，派自己的儿子做节度使。939年，吴权打败南汉军，称王。这是越南吴朝的开始。

南方七国，是唐末和后梁时秦岭淮河以南的主要割据势力。实际上这几十年的情形非常复杂，许多地方出现过大大小小的割据者，时起时灭。

六、闽、楚灭亡 和留、周二氏的兴起

闽的王审知、楚的马殷，出身的低微、施政的清明，都相仿佛。两人的后嗣，一反先人之道，荒淫暴虐、自相残杀，走的道路也完全一样。这两个割据国家，都被南唐灭掉，又都不是南唐消化得了的。留从效占有漳、泉，周行逢重占湖南，两家都是五代后期的新割据者。

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5年）王审知死后，20年间，闽国换了5个国主，其中延翰、延钧、延羲、延政，都是审知的儿子，只有延钧由儿子王昶继位，这5个人，除延政投降南唐外，又都

死于宫廷事变之中。

延钧杀死兄长延翰，自立为国主。他迷信鬼神，想先做 60 年皇帝，再升级当“大罗仙人”。他用薛文杰做国计使。薛文杰专门打听民间阴私的事情，罗织成罪，没收财产，塞饱私囊，并供应延钧挥霍的需要。这个国主在位 9 年，便给儿子谋杀了。

延羲夺了侄儿的位子，又与兄弟建州节度使延政，发生混战。这对弟兄都是福建人民的死敌。

延羲曾想惩办泉州刺史余廷英。余廷英送“买宴钱”1000 万赎罪。延羲嫌少，问：“皇后的土贡何在？”余廷英马上再送 1000 万。延羲满意了，就不治他的罪。国计使陈匡范增加商税几倍，每天献上大量现金，供延羲挥霍，延羲竟称赞他是人中之宝。

延政在建州称富沙王，改国号叫殷。他最信任的杨思恭，专门想办法盘剥百姓，山泽田亩、鱼盐蔬果，没有一样不加税。人民替他起个外号，叫做“杨剥皮”。延政和延羲混战，福州与建州之间受到的破坏很严重。后来，延羲被部将所杀，延政似乎可以据有福建全部了，这时，南唐开始进攻福建，闽国终于灭亡。

南唐军队初到福建时，人民很是欢迎。这就是王氏暴君统治的结果。

南唐军队的所作所为，使福建人民大失所望。于是降唐的闽国将领留从效占有漳、泉，通知南唐守将：“泉州租税不多，只够自给，不烦大军久驻于此！”接着，不管他是否同意，便在郊外设宴饯行。唐将兵力单薄，只得撤走。

留从效出身士兵，了解民间疾苦，又是泉州本地人。他生

活朴素，与民休息，因此漳泉一隅，在五代末年，情况较好。他在公元 947 年送走南唐驻军，到 962 年（宋太祖建隆二年）病死，踞有漳、泉 15 年。部将陈洪进继任，到南唐亡后，把辖境献给宋朝。留、陈两人在名义上都是南唐的清源军节度使，历史上也不算在十国之内。

留从效很注意发展海外贸易。《留氏族谱》说他“平市价，陶器铜铁，泛于番国，取金贝而还。”输出手工业品，换回来的东西有贵金属在内，这是对国内经济有利的贸易。泉州被后来的外国旅行家叫做“刺桐”。泉州城郊遍植刺桐，就是留从效时做的事情。从晚唐五代直到元末，泉州港一直兴旺发达，留从效起了促进作用。

楚的马殷死于后唐长兴元年（930 年），活了 79 岁。他晚年衰老不能理事，儿子希声掌权。希声中了荆南的反间计，剥夺高郁的权力，又把他杀掉。马殷知道了，号啕大哭，不久便死了。希声在位 2 年而死，兄弟希范继位。

希范在位 15 年（932—947 年）。他大兴土木，造会春园、嘉宴堂、九龙殿、天策府，珠帘绣幕，墙壁轩楹都用金银妆饰。经费不够用，便大增赋税、出卖官爵。人民犯了罪，富人罚钱，强壮的当兵，只有穷而且弱的人受刑。马殷时政治比较清明的状况完全改变了。

希范死后，希广继位。兄长希萼和他冲突，从朗州进攻潭州，希广被俘而死。朗州兵破潭州时，杀人放火，大抢 3 天。潭州的公私财物不变成盗赃，便化为烟尘。希萼与希崇又互相攻击，湖南越来越乱。两人都想依靠南唐的援助，南唐军便乘机灭楚了。

后周广顺二年(952年),湖南将领刘言等赶走唐军。不久,众将争夺权力,连续演出几幕互相残杀的惨剧。刘言、王逵相继被杀后,周行逢掌握大权、杀戮异己,才恢复了平静的状态。

周行逢出身低微,注意选择廉明的官吏,执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他的女婿想做官,行逢不肯给他做,说:“你的才干不能称职,还是回家种田的好!”他自奉很朴素,有人批评他过于俭省,他说:“马家穷奢极欲,得到这样下场,难道可以效法吗?”湖南在他的统治下,逐渐恢复了元气。

周行逢在后周显德三年(956年)取得湖南,名义是受后周任命的武平节度使,实际上割据一方,但历史上并不算入十国之内。他死于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儿子保权继位,不久即并入宋朝。

七、南汉张遇贤起义

南汉这个国家,从始至终,暴君苛政,史不绝书,在五代也算是奢靡腐败之至的政权。

刘龚在位31年(其中称帝26年),在后晋天福七年(942年)死掉。儿子刘玢即位,当年就改元光天。刘玢也荒淫无道,丧事没有办完,便同伶人作乐饮酒,尽做些荒唐的事情。

多年以来,岭南人民忍受不了刘家的虐政,反抗的情绪日益高涨,几百人一股的武装,此起彼伏,在山林之中活动的,早就有了。暴君的死亡给农民以可乘之机,于是许多小溪汇成了洪流,爆发了以张遇贤为首的农民起义。除中原人民反契丹掠

夺的斗争之外，这是五代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

张遇贤本来是博罗县的小吏。他在刻衫镇一个巫师的家里，装神弄鬼，说是第十六罗汉下凡，应做群众的领袖。这是封建时代农民起义首领惯用的手法，易于把群众组织起来。博罗是循州（治今广东龙川）属县，循州一带的小股武装便集结起来，推张遇贤做中天八国王，年号永乐。黄伯雄做了他的副手，景全和尚当了军师。起义军身穿红衣，打开循州，杀死刺史刘传，声势很是浩大。

刘玢派兄弟刘洪昌、刘洪杲领兵去镇压。洪杲在刘家兄弟中，有好勇斗狠、知兵善战的名气。这次他出兵不利，险些儿送掉性命。二刘的军队进到钱帛馆，被起义军围住，发生了一场恶战。刘洪杲手下大半折损，箭射得一支不剩。他自己挺剑步战，血流满袖，如果不是裨将万景折、陈道庠用大楯掩护，奋勇杀出重围，刘家兄弟势必都要丧命。

起义军活动的地区出现在广东省东北部，越过北面的南岭山脉，便是属于南唐的江西。第二年，张遇贤在循州境内失利，便掉过头来，越过南岭，进入虔州（治今江西赣州）境内。南唐的地方军事长官没有防这一着，乱了手脚，只得关上城门，守住一座州城。起义军打破了一些县城，挑选一个险要的地点——白云洞（在今于都县西）安营扎寨。白云洞有三个洞，上称白云嶂，中名太虚岩，下面的叫龙岩。三洞互相联络，溪流贯注，水源也不愁枯竭。张遇贤在这里建造宫室营房，分兵四出活动，与南唐政府俨然成为敌国。

这时南唐庄宗即位不久，国力强盛，比起张遇贤的起义军，当然占着绝对的优势。不久，边镐、严恩率领大队人马，开

到虔州。当地的地主白昌裕向边镐献计，从白云洞后面的小路进兵偷袭。边镐用这计策，果然打败了起义军。张遇贤、黄雄、景全 3 个首领，被叛徒李台台捉住，交给唐军。3 个人后来都在金陵就义。起义一共持续了 1 年零 3 个月，震动南方两国，在历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南汉统治者并没有从农民起义中吸取任何教训。

刘玢做了 1 年左右皇帝，便被兄弟刘晟谋杀。刘晟的奢靡残暴，同刘龚不相上下。他造了个“生地狱”，设有汤镬、铁床之类，把迷信传说中的阴曹地狱，搬到人间来。他建造大量离宫别馆，游猎饮酒，恣意行乐。有一天晚上，大醉之后，把瓜放在伶人尚玉楼的头上，拔剑切瓜，试试剑刃是否锋利，结果把人头也斫了下来。他杀了人，醉昏昏的，自己竟没有意识到有这么回事。

后周显德四年（957 年），周兵取了南唐江北，刘晟才觉得沉迷昏醉的日子很难混下去，心中焦急，又没有办法，更是不分日夜地喝酒，到下一年便死了。

刘晟的儿子刘铎是南汉的末代君主，他比父亲更糟，连北方的威胁有多么严重也不晓得。南汉一向重用宦官，刘铎更是厉害。他认为百官都有家庭，有子孙，不肯一心向着自己，只有宦官才会一心事主。他把政事都交给宦官龚澄枢等管理，有时他想重用某一个官员，也要阉割了再用，考取进士第一名的也不免要经过这番手术。

刘铎生活的奢侈，比上两代也是过之而无不及。宫中的珍宝堆积如山，单单珍珠一项，便有 46 斛之多。南汉的租税特别重，征粮用大斗，农民缴 1 石粮，实际要缴 1 石 8 斗。南汉的

水军专门从事海盗活动，在南海上抢劫船舶。刘铤挑选精通水性的兵士，编成“媚川都”，叫他们潜入海里，采集珍珠，每年都要淹死许多人。在脑满肠肥之余，刘铤还想尽法儿，作践穷人，满足自己，强迫囚徒和虎、象搏斗，就是一个例子。

这是个腐朽已极的国家，也是个毫无力量的国家。它没有良将、没有精兵，士卒穷苦，兵刃不很锋利，弓弩的射程不远。有个宦官被宋兵俘获，送到东京，自供身分是扈驾弓官。宋太祖命他拉弓。宋朝初年的卫士，挑选训练，都极严格，人人能拉开很硬的弓。那个南汉宦官从来没有拉过这种弓，用尽力气，还是拉不开来。南汉的政治这样腐败，兵力又极薄弱，宋兵一到，就灭亡了。

第六章 隋唐统一 局面下的民族大融合

第一节 突厥及西域 各族与隋唐王朝的关系

一、突厥的强大及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突厥于 6 世纪中叶至 8 世纪中叶活跃在金山(今阿尔泰山)南麓、漠北高原,还曾活跃于中亚,是对我国的历史有过重要影响的古代少数民族。自西魏(535—556)起,突厥就与我国中原皇朝发生了多渠道、多层次的联系。突厥的大多数人,后来都与汉族相融合,成为中华民族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据《周书·突厥传》记载,突厥是匈奴的别种。秦汉时,居于今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匈奴灭亡后,南迁至高昌附近的北山(今博格达山),以后再迁至金山南麓,大约在今新疆准噶

尔盆地北部或东部某地。5世纪中叶前后,突厥被柔然征服,世代给柔然当锻奴。金山形似兜鍪(古代战盔),其族人“俗呼兜鍪为突厥”,因金山山形而得名,所以称突厥。

阿史那氏和阿史德氏是一对婚姻氏族。这一对婚姻氏族在突厥各部落中处于领导地位。《周书》、《隋书》等史书中记载了有关阿史那氏起源的传说,其内容大同小异。从中可知阿史那氏是一个以狼为图腾的氏族。所以,突厥一直保留着在部落首领牙帐的门前挂有以金色狼头为标志的大旗的习俗。

6世纪中叶前后,柔然在与高车的战争中屡遭失败,因而东徙,放松了对突厥的控制,在客观上为突厥的独立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541年柔然灭高车之后,又将全力倾注于漠南,利用东西魏的对立,从中渔利。突厥遂乘机南下,将其势力伸展到河套地区,开始寇掠西魏的绥州连谷(今陕西神木县北)。544年突厥酋长阿史那土门(?—553)率部南下至西魏边塞“市缯帛”,并与西魏通使。545年,西魏丞相宇文泰派遣酒泉昭武九姓胡安诺槃陀出使突厥。突厥人认为“大国使至,我国将兴也”。第二年阿史那土门遂派遣使臣向西魏献方物。

刚刚崛起的突厥,开始对相邻的民族进行征服、兼并。546年,阿史那土门率部打败了铁勒,将其部众5万余落全部兼并,实力大大增强。551年,阿史那土门“自恃其强盛”,向柔然可汗求婚。柔然可汗阿那瓌竟然派使臣辱骂说,你本是我的锻奴,怎么敢提出这样的请求。阿史那土门对柔然的拒绝很是恼怒,杀掉了来使,转而向西魏求婚,西魏将长乐公主嫁给了他,从此突厥断绝了同柔然的隶属关系,开始反抗统治着漠北高原的柔然。552年,阿史那土率军深入漠北,在怀荒镇(今河北

省张北县北)北大破柔然军,柔然可汗阿那瓌自杀。这一年阿史那土门自立为伊利可汗,建立突厥汗国,汗庭设在漠北高原鄂尔浑河流域的郁督军山(亦作于都斤山,乌德鞬山,即今杭爱山北山)。

建立汗国时,突厥人以畜牧狩猎为主,过着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生活。居穹庐毡帐,食肉饮酪,身衣裘褐,被发左衽,其习俗与匈奴大体相同。突厥人当时掌握了较高冶铁技术,冶铁业也已有一定规模。用于作战和狩猎的兵器有角弓、矢、鸣镝、甲、和、稍、刀、剑等。突厥人善于骑射,在战争中亦颇勇敢善战。

突厥人敬鬼神、祖先,信巫覡。有敬日的习俗,庐帐的门都向东开,以表示对太阳升起方向的崇敬。五月中旬,要举行集会,杀羊马祭拜天神。还以郁督军山西四五百里处的高山为勃登疑黎,即汉语地神。传说其祖先发祥于高昌西北山岩洞穴中,所以突厥可汗每年都要率诸贵人祭其先窟。佗钵可汗时,即信佛教。其俗贵壮贱老,重兵死而耻于病终。人死后,停尸于庐帐中,子孙及诸亲友男女各杀羊、马陈列在帐前,子孙及吊祭的人要骑马绕帐七圈,一至帐门,便以刀斫面,边斫边哭,血泪俱流,这样做七次,才算尽礼。春夏死的人要等秋后草木黄落时,秋冬死的人要等到盛夏枝繁叶茂时再挖坑埋葬。葬后于墓侧立石建标,立石的数目按死者平生杀人的数字来定,杀多少人就立多少根标石。并且将祭祀时用过的羊头,马头都挂在标石顶上。可汗和上层贵族中还有殉人、殉马的习俗。如室点密死时,以他生前所乘的马4匹及俘虏4人为殉。埋葬这一天,男女亲朋都着意修饰,穿带整齐聚集到葬地,设祭、走马斫

面等仪式和初死时相同。回去后,男人们可以请人到在葬地相中的姑娘家去提亲,姑娘的父母大都能满足求婚者的请求。突厥人的父、伯、叔、兄死者,其子、侄、弟等要以其后母、伯叔母或寡嫂为妻。但这一继婚权只适用于下对上,父兄等对下则没有这种权利。突厥男人喜欢玩樗蒲博戏,女子则喜欢“踏鞠”球戏。还常常饮马酪致醉,酒醉放歌不止。

突厥还保有一些原始社会时选举酋长的遗风。可汗新立时,近侍和重臣要用毛毡抬着他绕太阳转九圈,每转一圈,臣下都要下拜。之后将可汗扶上马,“以帛绞颈,才不致绝”,然后松开,急问他能作几年可汗。

汗国中当时已有牧主、族长等占有奴婢的现象。在汗国中可汗的地位最高、权力最大,虽迁徙无常,但诸部各有“地分”,总属于可汗。其下所设官职,据说开初时有10等,建国发展为28等。有小可汗、叶护、设(亦作察、杀、煞)、特勤、俟利发、俟斤、吐屯发等官职。大小官职都由氏族酋长、部落首领等贵族统治阶层世袭。

汗国的刑罚颇为简略,主要有如下规定:(1)反叛、杀人、奸人妇及盗马绊者皆处死;(2)奸人女者多罚财物,准以所奸女为妻;(3)斗伤人者,随致伤轻重决定赔偿财物的多少;(4)偷窃马和杂物者,按赃物10倍赔偿。

突厥以杂畜充税。初无文字,征发兵马和收税时,“刻木为数”,将刻木与一金镞箭“蜡封印之,以为信契”。后来创造了突厥文,盛行于突厥、回鹘等族和前苏联、东欧多瑙河流域。19世纪末及20世纪初,在蒙古和我国新疆、甘肃多次发现刻有突厥文的文物以及突厥文手写本文献。

建国一年后，阿史那土门死，子科罗立，号乙息记可汗。不久亦死，由其弟俟斤（又名燕都，《隋书》作俟斗）立，号木杆可汗（553—572 在位）。阿史那俟斤性情刚暴，勇而多智，“务于征伐”。555 年击灭柔然。556 年破吐谷浑。他还西破𐱃𐰽，东逐契丹，北并仆骨，“威服塞外诸国”，统治区域东至辽海以西，西到西海（今里海）万里，南至大漠以北，北达北海五六千里。开创了突厥汗国强盛的局面。阿史那俟斤死，弟佗钵可汗（572—581 在位）立。佗钵可汗以兄子摄图为尔伏可汗统领东面，弟子步离可汗统其西面。在位时，控弦数十万，更为强盛。中原的北齐和北周，对强大的突厥则是争着与之和亲结盟。北周每年给突厥的缯絮锦采达到 10 万緡。北齐惧怕突厥寇掠，也是“倾府藏以给之”。突厥对于北齐、北周开始是平等对待，以后则厚周薄齐，与北周联合灭齐。567 年，阿史那俟斤将女儿嫁给周武帝宇文邕，580 年，周宣帝宇文赟将千金公主嫁给了佗钵可汗。突厥的统治者把从北周、北齐获得的大量丝织品运销到中亚，远至罗马，获得厚利。

突厥的强盛主要是靠军事力量征服来实现的，其内部各族成份比较复杂，极不稳定，加上在王位继承和权力分配上还没有形成定型的制度。所以，581 年佗钵可汗死后，内部就开始出现了分裂的迹象。佗钵可汗之子菴罗被迫让位给乙记可汗阿史那科罗之子摄图，号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又作沙钵略可汗），建牙帐于郁督军山。此外，在突厥诸部中势力强大的还有四个：一是菴罗号第二可汗，驻牧在独洛水（今土拉河）流域；二是阿史那俟斤子大逻便号阿波可汗，驻牧在今阿尔泰山之东；三是室点密之子玷厥，号达头可汗，驻牧在今伊

犁河上游；四是沙钵略可汗阿史那摄图之弟处罗侯，号突利可汗，驻牧在大漠南北之东，管辖奚、霫、契丹各族。这就是隋文帝杨坚所说的“且彼渠帅，其数凡五”。沙钵略可汗阿史那摄图是其中最大的可汗，稍能号令各汗。

正是在突厥统治阶级内部潜伏的分裂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581年，原北周相国杨坚废周静帝，建立隋朝。由于突厥上层统治者和北周本有非常亲密的关系，感到隋“待突厥礼薄”，特别想乘隋立足未稳之机抄掠财物。582年沙钵略可汗阿史那摄图率40万骑南下，开始入掠。隋文帝杨坚对突厥采取了离强合弱、远交近攻的方针，从政治上和军事上同突厥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政治上隋派遣使者出伊吾道至达头可汗阿史那玷厥牙帐（今新疆哈密），赐狼头纛通好，使玷厥表示愿意与隋交好；出黄龙（今辽宁省朝阳）至突利可汗阿史那处罗侯帐，申明结好，促使他归附。同时还遣使分别至处罗侯子阿史那染干和阿波可汗阿史那大逻便处申好结盟，都收到了颇为满意的效果，达到了孤立阿史那摄图，削弱他的实力的目的。在军事上，583年隋分兵八道，主动出击，在白道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北）大败阿史那摄图率领的突厥军。

在隋朝的坚决抗击下，突厥内部潜伏的分裂危机迅速爆发了。先是阿波可汗阿史那大逻便进攻阿史那摄图，失败后依附于达头可汗阿史那玷厥。583年玷厥又联合大逻便、贪汗、地勤察等突厥西部势力一起进攻阿史那摄图，并正式脱离了阿史那摄图的控制，突厥汗国开始分裂为东西两部。沙钵略可汗阿史那摄图遂转而对隋采取和好的态度。584年，摄图遣使致书，请求和亲归附，表示和好的情义要保持到“子子孙孙，乃

至万世不断”。随后摄图又派第七子库含真入朝上表称臣，表示对隋朝“屈膝稽颡，永为藩附”，“朝夕恭承，唯命是视”。隋则将摄图妻原北周千金公主改封为隋大义公主，赐姓杨。从此，突厥所辖各族各部，也都随之归附。突厥与隋的关系，进入了以和好为主的新阶段。

征得隋皇朝的准许，摄图所部由郁督军山南迁至白道川驻牧，建牙帐于紫河镇（今内蒙托克托县北）。隋朝还派晋王杨广“以兵援之，给以衣食”。587年，摄图死，其弟处罗侯即位，号莫何可汗。在位一年，死于西征。摄图子雍虞闾立，号颉伽施多那都兰可汗。这期间突厥和隋的关系又有新的发展。突厥各部相率遣使朝隋，献马1万匹，羊2万只，驼、牛各500头，隋文帝还准许他们在“缘边置市，与中国贸易”。中原人以粮食、布帛、瓷器等交换突厥的马、羊、牛、皮毛等。593年，因大义公主与流人杨钦的破坏，关系曾一度紧张，后都兰可汗经隋朝劝说，执杀大义公主，平息了这场风波。594年，东西突厥互相攻杀，都兰和达兰两可汗都向隋朝求援，经隋文帝遣使调解，双方才撤兵言和。

处罗侯之子突利可汗统领突厥东北部，和隋朝一直保持非常友好的关系。都兰可汗向隋朝请婚，突利可汗也多次请婚。隋文帝准许了突利可汗的请求，将宗女封为安义公主，与突利可汗阿史那染干和亲。597年，染干遣使至大兴迎亲，隋文帝厚礼陪送。不久染干率部南迁度斤旧镇驻牧，为隋朝守边。都兰、达头两可汗联合进攻染干，染干大败，部落散亡，兄弟子侄被杀。599年，隋出兵援救染干，大败达头可汗。隋封染干为意利豆珍启民可汗。染干收集亡散部众数万，被安置在白

道川。不久，安义公主卒，隋又封宗女为义成公主，嫁给启民可汗。隋还在白道川筑大利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北 10 公里），供启民可汗居住。602 年、608 年，隋又先后为启民可汗建了金河（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北、大黑河边）、万寿（在上述两城之间）两城镇。为避开都兰可汗的侵掠，启民可汗将牧地扩展到夏、胜二州之间（今鄂尔多斯南）。在隋朝与启民可汗的多次打击下，达头可汗与都兰可汗先后败亡，白道川及其周边地区获得了相对安定，各族人民得以休养生息，生产得到迅速和发展，出现了“人民羊马、遍满山谷”的繁荣兴旺景象。607 年启民可汗一年就向隋朝贡献良马 3000 匹。居住在大利、金河等地的汉人，大都从事农业生产，白道川一带的农业相应地得到发展。

隋朝的强盛和北疆的稳定繁荣，对北方的游牧民族有很强的吸引力。601 年，突厥 9 万口内附。602 年思结、伏利具、浑、斜萨、阿拔、仆骨等 10 余部内附，隋朝将这些内附的突厥语族部众均置于启民可汗的直接管辖之下。同时，奚、契丹、室韦、霫等族众也都由启民可汗兼管。终启民可汗之世，突厥与隋的和好关系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609 年，启民可汗病死，子咄吉立，号始毕可汗，与隋朝继续保持和好关系。后来，隋炀帝宠臣裴矩诱杀了前来贸易的始毕可汗亲信史蜀胡悉，双方关系急遽恶化。619 年，始毕可汗死，弟俟利弗设立，号处罗可汗。处罗可汗曾留太原三日，“城中美妇人多为所掠”。不久，处罗可汗死，弟咄苾立，号颉利可汗。颉利可汗以始毕可汗子什钵苾为突利可汗（袭其祖父启民可汗染干原号）。

隋末中原丧乱，突厥再度崛起，东、西厥曾联合起来，“控弦百万”，成为雄据漠北，控制西域，指点中原的强大力量。中国北方的“割据群雄”，“虽僭尊号”，为求得突厥的支持，纷纷献上子女金帛，向突厥纳贡称臣。突厥统治者为了从“割据群雄”中获得贡物，就成了各种割据势力的积极支持者。唐统一后，对突厥的“赐予”虽“不可胜计”，但已满足不了突厥统治者“求请无厌”的贪欲，为了攫取更多的人口和各种财物，突厥加紧了对唐的武力侵扰。唐武德至贞观初年（618—629）宥于国力，对突厥的进扰，一直是采取以战求和的积极防御政策。

颉利可汗加紧了对唐的侵扰，621年，率骑万余帮助北境的割据者苑君璋进攻雁门，被击退。自此以后，年年入寇。611—623年，颉利可汗曾亲率15万大军，自雁门入攻并州，又分兵进扰汾、潞（山西长治市）诸州，虏获男子5000余口。624年颉利、突利二可汗联兵进攻原州（今甘肃固原县），又一起南下，进扰朔州（今山西朔县）、忻州（今山西忻县）等地，进逼幽州城西，唐李世民率军抵御，设法离间颉利、突利，突厥才解兵退走。625年，颉利可汗又率骑兵10余万寇掠朔州，进袭太原，唐守军全军覆没，守将只身逃脱。626年颉利可汗再率骑兵10余万进扰武功（今陕西武功县），使唐京城长安受到严重威胁。

突厥的频繁侵掠，不仅使唐北边人民深受其害，已成为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极大障碍，甚至影响到唐政权的巩固。因此，彻底排除突厥的侵扰，就成为广大人民和唐朝统治阶级的共同愿望。为了解除突厥的侵扰，从624—629年，唐政府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作了充分的准备。恰在这时突厥内部的固有

矛盾也进一步加剧了。突厥可汗对内部各族的奴役和榨取激起他们不断的反抗。如 627 年,阴山以北的薛延陀、回纥、拔也古和东部的奚、契丹等相率起而反抗,赶走了突厥派驻的欲谷设。629 年,薛延陀的首领自称可汗。颉利可汗令突利可汗率军征讨,突利大败而归,颉利可汗因而拘禁了突利。这就加深了他与突利的矛盾,使突利转向唐皇朝。颉利可汗又亲近信任西域胡商,疏远本族贵族、官员,引起本族贵族的不满和反对,加之连年大雪,六畜多冻死,人民无法生活,颉利可汗非但不予以抚恤,反而加重了剥削,又激起了本族部众的反对,使颉利可汗的实力大为削弱。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629 年唐太宗李世民令兵部尚书李靖等率 10 余万兵马,分六道大举出击。630 年正月,李靖等在定襄(今内蒙古清水河县)大败突厥军,颉利可汗率残部北撤,又遭李靖伏兵堵截,全军覆没。颉利可汗当时虽独骑逃脱,同年三月又被唐军生俘。东突厥灭亡。唐皇朝把西起阴山,东至大漠的广阔区域纳入了版图,解除了北部边境 30 余年的动乱,恢复了和平安定的局面。

在如何安置东突厥降部的问题上,唐太宗李世民采取了“全其部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的政策。这样就表现了唐皇朝对突厥降部持真诚、平等的态度,容易得到降部的拥护,既充实了边境空虚之地,又可以用他们作边境的屏蔽,是一个正确的决策。归附的突厥部众约 10 余万户,其中有 1 万户被安排定居在长安,委任其中部分首领作京官武职,光是任五品以上官职的就有 100 余人,约近朝中武官的半数。对内迁的一般部众与汉人同等对待,使其农业生产水平迅速提高。对仍留原处的部众,唐在突利可汗辖地设顺、祐、化、长 4 州都督

府；在原颉利可汗辖地置 6 州，设定襄、云中两都督府统辖。任命本族首领为都督、刺史来管辖部众。就连生俘的颉利可汗咄苾也被封为右卫大将军，634 年，咄苾病死后，还追封为归义王。对归附的突利可汗，则封作北平郡王、右卫大将军、顺州都督。唐太宗对内徙和归附突厥人的妥善安置，加强了中原地区人民和边疆各族人民的联系，极大地提高了唐朝的威望和边疆各族人民的向心力。“西北诸蕃”共认唐太宗为本民族的最高首领，“咸请上尊号为天可汗”。630 年唐太宗规定以后赐西域北荒的玺书册命，“皆称皇帝可汗”，诸蕃渠帅有死亡者，必下诏册立其后嗣继位。确立了对边疆各族首领的册封制度。650 年，阿尔泰山北部的车鼻可汗被高侃击擒归附，唐朝安置其部驻牧于郁督军山，设狼牙都督府统领。于是，所余突厥等族陆续归附，唐高宗李治置燕然都都护府领瀚海、金微、新黎等七都督府，仙萼、嵯落等八州，统铁勒之众；置瀚海都护府领狼山、云中、桑乾三都督府，苏农等 14 州，统突厥之众。663 年，徙燕然都护府于漠北，改称瀚海都护府，统领漠北诸羁縻府、州；迁原瀚海都护府于云中古城，更名云中都护府（664 年改为单于大都护府），统领漠南诸羁縻府、州。从此大漠南北全归唐帝国版图。

二、西突厥的兴亡 与唐对西域的行政管辖

隋唐时，辽阔的西域地区，有许多民族以及他们所建立的

政权，像党项羌、高昌、吐谷浑、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等，此外还有一些域外的民族和政权。而在“西域诸国”中，最强盛的是西突厥。西突厥的始祖是室点密，早在土门称汗时，就派室点密作西部可汗，统西方的十姓部落，驻牧于伊犁河流域，当时只是突厥汗国内的一个封国。576年，室点密死，子玷厥立，号达头（步迦）可汗（576—603在位）。583年，东突厥的阿波可汗大逻便西投达头可汗，突厥汗国正式分裂的东西两部。585年，东突厥沙钵略可汗臣服于隋，达头可汗联合阿波可汗称雄于西域。以后，阿波可汗大逻便被沙钵略可汗弟叶护可汗擒获后，达头可汗与涨利可汗共同称雄西域。600—603年，西突厥治下的思结、伏利具、浑、斛萨、阿拔、仆骨等10余铁勒部落起而反抗突厥统治者的统治，隋与东突厥又联兵对西突厥发起进攻。泥利可汗被杀，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达头可汗“众大溃，西奔吐谷浑”。反抗西突厥的铁勒各部多附启民可汗。泥利可汗之子达漫成了西突厥可汗，称泥撅处罗可汗（603—609在位）。达头可汗之孙射匮可汗与泥撅处罗可汗争位，遣使至隋，请和亲，求支持。在隋支持下，射匮可汗击溃达漫军队。达漫投隋，颇受礼遇。射匮可汗成为西突厥大可汗。615年，射匮遣侄率诸部首领入隋朝贡。龟兹、疏勒、于阗、安国、康国等亦遣使入隋朝见。

隋末唐初，西突厥正是射匮可汗（611—619在位）和统叶护可汗（619—628在位）统治期间。射匮可汗建王庭在龟兹（今新疆库车）北三弥山，玉门以西“诸国”多受其控制。619年射匮死，其弟统叶护可汗继立。统叶护可汗有勇有谋，善于作战。他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控弦数十万，霸有西

域”。初驻牧于乌孙故地，后移王庭至石国北之千泉（今中亚楚河西岸）。他授给西域“诸国王”颉利发的职衔，同时又派吐屯一人驻各国，监统征赋。唐僧玄奘西行取经，经统叶护可汗王庭，受到热情款待。

统叶护可汗于 618 年就遣使朝唐内附，以后与唐一直保持着正常的朝贡关系。622 年他又向唐请婚，唐高祖李渊已决定允婚，626 年派高平王李道立至突厥报聘。627 年，统叶护可汗遣真珠统俟斤同李道立一同入朝，献万余宝钿金带、马 5000 匹。同年冬，统叶护可汗被其伯父杀害，未来得及成婚。

莫贺咄本为小可汗，杀统叶护可汗自立，秒侯屈利俟毗可汗。弩失毕诸部不服，拥立统叶护可汗之子匐力特勤乙毗钵罗肆叶护可汗，与莫贺咄对抗。西突厥实际上分为二部。莫贺咄统治东厢咄陆五部，匐力特勤统治西厢弩失毕五部。双方都争认唐中央的宗主地位，向唐朝贡、请婚。唐支持匐力特勤战败莫贺咄，成为西突厥的大可汗。东突厥的阿史那杜尔，乘他们相争之机，率众西迁，占据西突厥部分地域，自号都布可汗。

630 年唐灭东突厥，对突厥降众妥为安置并规定了对“诸蕃君长”的“册授”制度。这些措施对西域诸族震动很大。同年，西域胡人七姓部落以其所居七城归唐。632 年游牧于热海（伊克塞湖）附近的契苾部 6000 余家。在首领契苾何力率领下归唐，东迁内地。633 年，阿史那杜尔也率众东迁，臣属于唐。632 年前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康国、安国、石国等国王或亲赴、或遣使朝唐，表示愿意作唐的臣属。

630 年，莫贺咄被杀，诸部推肆叶护为大可汗。632 年，肆

叶护可汗为部下所逐，走死康居。其侄泥孰（阿史那弥射）被拥立为咄陆可汗。嗣位后，遣使至唐“请降”。唐太宗遣使至西安，册授泥孰为吞阿娄拔奚利邲咄陆可汗。此后，西突厥除例行朝贡外，遇有大事均向唐朝廷“表奏”，并听受诏命。新可汗即位，需经唐朝“册授”才为合法。

634年，泥孰死，其弟同俄设继立，唐册授为沙钵罗可汗。637年，弩失毕部首领拥众自立为汗，号乙毗咄陆可汗，西突厥以伊犁河为界，分成南庭与北庭，河东和天山以南的高昌地区属乙毗咄陆可汗，为北庭；河西属可汗及其后继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其弟之子薄布特勤），为南庭。龟兹、鄯善、且末、吐火罗、焉耆、石国、史国、何国、穆国、康国都归它“节度”。南庭与唐和好，受唐朝廷支持，但实力比北庭小。西域诸国渐附于北庭。641年，北庭擒杀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专擅西域。乙毗咄陆可汗还挟持高昌与唐为敌，切断西域与内地的通道。

640年，唐派军灭高昌，以其地为西州，并置安西都护府于西州城（今吐鲁番东高昌故城）。乙毗咄陆可汗驻在可汗浮图地（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的军队也投降唐军。唐在可汗浮图城设庭州。在唐军的打击下，乙毗咄陆可汗“众多亡逸，其国大乱”。其部下请求另立可汗，唐太宗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遣使册授侯屈利失乙毗可汗莫贺咄之子为乙毗射匮可汗。乙毗咄陆可汗西奔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同时，唐在军事上不断扩大战果。647—648年，唐军进攻龟兹获胜，擒其王白诃黎布失毕，册授其弟叶护为龟兹王，有力地打击了与唐敌对的势和。642—648年，唐军先后占领天山南北广大地域，设置了龟

兹(今库车)、疏勒(今喀什)、于阗(今和田)、碎叶(今吉尔吉斯托克马克城附近),史称“安西四镇”。649年唐设瑶池都督府,属安西都护府,以阿史那贺鲁为瑶池都督,成为西突厥内部与乙毗射匮可汗对立的又一派势力。至此,唐朝廷已统一了西域诸国,只是对西突厥诸部尚未实现直接统治。

阿史那贺鲁原为乙毗咄陆可汗的下属,任瑶池都督后,利用唐的声威发展自己势力,收集因受乙毗射匮可汗攻击而四散的部众。651年,阿史那贺鲁西击乙毗射匮可汗叛唐,自号沙钵罗可汗,夺取原乙毗咄陆可汗故地,总有西域诸郡,统摄咄陆、弩失毕十姓,成为西突的最高统治者。他出兵攻庭州,威胁西州,危及东西商路的畅通。自663年起,唐军连续征讨阿史那贺鲁,至657年,唐将苏定方、回纥婆闰从北道,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从南道两路突击,俘阿史那贺鲁父子,西突厥诸部纷纷归降。西突厥汗国灭亡。

唐灭西突厥后,在那里以原来的种姓部落为单位建州设府。在左厢五部即碎叶水以东五咄陆部,设昆陵都护府,以西突厥王裔阿史那弥射为兴昔亡可汗兼右卫大将军、昆陵都护;在右厢五部,即碎叶水以西五弩失毕部,设濛池都护府,也以王裔阿史那步真为继往绝可汗兼右卫大将军、濛池都护。这两人既是唐朝的行政长官,又是西突厥的可汗。对原附属于西突厥的别部,如葛逻禄、处月、处密、姑苏等也都设置了州府。唐在西突厥所设州、府都归北庭都护府管辖。天山北路的北庭都护府下统2州、2都护和23个都督府;661年,在天山南路分置16个都督府及州80,县110,军府126,皆属安西都护府管辖。以后,虽因吐蕃的强盛和后突厥的干扰,曾罢、复安西四

镇,但总的来看,唐在西域的统治,还是稳固的。

唐在西域设置的府、州、县等行政机构,有效地行使了行政管辖权力,使唐中央的政令和唐的政治、经济制度得以在这一地区实行。通过唐中央政府的遣军屯戍和中原汉族与西域诸族的交往迁居,把汉族地区的先进的生产技术、传统文化和科学技术传播到西域,推动了西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西域诸族的文化繁荣,同时西域的文化对隋唐时期文化的繁荣也有很大影响。

三、后突厥的建立及其与唐的关系

630年唐灭东突厥后,东突厥部众不断由塞北南迁,唐中央政府将其安置在黄河南岸,主要集中在丰、胜、灵、夏、朔、代诸州,称为降户,在河西的甘、凉二州之间,也聚居一些突厥部众。这些突厥人和汉人交往频繁,接受了汉人的农耕和纺织等先进技术,生产结构和经济生产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从单一的畜牧经济逐渐向牧农结合的方向转化,生产得到迅速发展,人民生活也比较安定。但一部分突厥贵族,对东突厥的灭亡是不甘心的,时刻都在想恢复汗国的旧业,只是由于唐初的国力强盛未能得逞。武则天临朝以后,中原内部多事又加吐蕃连年侵扰,并陷安西四镇,为突厥贵族的复国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

679—681年,曾有东突厥的余众阿史那河孰匐和阿史那伏先后起事,自称可汗,均告失败。682年颉利可汗的疏族阿史那骨咄禄(682—691在位)集众入总材山据黑沙城(今内蒙

古呼和浩特市北),称吉跌利施可汗。建牙于乌德鞑山(即郁督军山、今杭爱山之北),又在黑沙城建南牙,由其弟默啜驻守。在侵扰唐朝同时,他们还东击契丹,鞑鞑,北掠九姓铁勒,得羊马甚多。骨咄禄的政权刚刚建立,正值大漠南北连年大旱,“野皆赤地,少有生草”,羊、马死耗“十至七八”,人民不得不掘野鼠,食草根为生,甚至“或自相食”。684—687年,骨咄禄连年率部南下,抢掠粮食、牲畜。大批突厥饥民,纷纷南下投唐。为了解救这些饥民,武则天下令将安北都护府移到同城,专门负责安置,仅同城一地就安置了“五千余帐”。

691年骨咄禄病死,其弟默啜继承汗位。默啜(691—716在位)及其后毗伽可汗(716—734在位)时,是后突厥的兴盛时期。默啜虽然有骄志,有“负胜,轻中国”的一面,但也颇有自知之明,深知无力与唐抗衡。他改变了骨咄禄的僵持、敌对政策,对唐采取了以和为主的方针。693年,他遣使向唐请和,武则天册授默啜为左卫大将军,封归国公,次年又加授迁善可汗。696年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反叛”。默啜提出如果唐放还河西的突厥降户,他将率部落兵马为唐讨伐契丹,得到武则天的准许。默啜击败契丹军,虜尽忠、万荣妻子。武则天进拜默啜为特进、颉跌利施大单于、立功报国可汗。默啜遣使谢恩,愿为武则天之子,请以女与唐和亲,并请还丰、胜、灵、夏、朔、代等六州突厥降户及单于都护府辖地,还要农具和种子。武则天“惧其兵势”许和亲,归六州降户数千帐,给种子4万余硕、农器3000事。这对后突厥的经济发展和国力的增强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默啜盛时,士兵有40多万,辖地东西万余里,我国北方各族大都受其控制。在提出愿作唐臣属、与唐和亲同时又

进行侵掠，曾俘虜赵、定二州男女八九万人，陇右监马万余匹。但靠军事力量建立起来的政权并不稳固。默啜晚年“自恃兵威，虐用其众”，引起内部离心，部落外逃。回纥、思结、浑等逃入甘、凉二州。714年，他的妹婿火拔颉利发石阿失毕携妻投唐。715年，西突厥十姓部落的“左厢咄禄啜、右厢五弩失毕、五俟斤及子婿高丽莫离支高文简、跌跌都督思太”等万余帐降唐。716年，默啜讨九姓拔曳固，负胜轻归被杀。骨咄禄子阙特勤杀默啜众子、诸弟及亲信，立兄默棘连为毗伽可汗。

默棘连接受了瞰欲谷的忠告，对唐采取和好政策，着力于征服默啜晚年“叛逃”的旧部。718—724年中，多次遣使至唐言和。724年一年中就四次遣使求和亲、请和。唐朝廷担心默棘连的和亲请求不是出于诚意，始终不作明确答复。727年，吐蕃想与突厥联兵进犯中原，默棘连派梅录啜以献波斯锦和名马的名义入唐报信，使唐早作准备。唐玄宗李隆基为此准许突厥在西受降城与汉人互市。731年，阙特勤病死。唐遣使吊唁，唐玄宗亲撰碑文，派工匠为阙特勤立碑、建庙、雕石像。734年，默棘连为梅录啜毒死。在他执政的19年里，与唐朝廷的关系很是融洽，使大漠南北出现相对稳定的局势，“蕃汉百姓，皆作一处”，养畜资生，种田耕作，社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毗伽可汗默棘连死后，统治集团上层为争夺汗位自相残杀，内乱不绝。伊然、登利、骨咄叶护、乌苏米施等可汗相继执政。此时拔悉密、回纥、葛逻禄乘机独立。在唐的支持下，拔悉密等三部联兵攻乌苏米施可汗，其西部诸叶护、设及可汗眷属，相继降唐。744年，拔悉密击斩乌苏米施可汗，余众立其弟

鹈隗纥特勤为白眉可汗。745 年回纥怀仁可汗骨力裴罗击杀白眉可汗,后突厥汗国亡。突厥大部归附回纥,一部分南迁灵武(今宁夏灵武)、丰州(今内蒙古临河县),另一部分迁往中亚。

后突厥汗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与唐中央政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在它存在的 60 多年里,与唐的对立、战争只是暂时的、次要的,与唐和好、作唐的附属才是主要方面。60 余年里,向唐朝贡次数,据不完全统计有 59 次之多,各部落首领中接受唐封爵的就有 200 多人,而且还承认自己处于唐附属地位,实质上是在唐中央统辖下的少数民族地方割据政权。

第二节 回鹘经济文化的发展

一、回鹘的兴起

回鹘原叫做回纥,是团结、联合、互助的意思。788 年回纥的合骨咄禄可汗在给唐德宗李适上表中,请求改为回鹘,取“回旋轻捷如鹘”之意。

回鹘是汉魏时丁零的后裔,北魏时敕勒各部中的袁纥氏,也就是隋代铁勒中的韦纥氏,是回鹘的前身。袁纥氏早年活动在贝加尔湖以南的娑陵水(今色楞格河)、鹿浑海(今鄂尔浑河)、和独乐河(今土拉河)流域,当时共由九个部落组成,就是

回纥、仆骨、浑、拔野古、同罗、思结、契苾、拔悉密、葛逻禄。由这九姓构成的部落联盟，史称“外九部”，又称“九姓回纥”或“九姓铁勒”。在回纥部落内部又有九个氏族，就是药罗葛、胡咄葛、咄罗勿、貊歌息讫、阿勿唃、葛萨、斛嗢素、药勿葛、奚邪勿，总称回纥九姓或“内九族”。其中以药罗葛为核心，回纥的首领和后来的可汗都是由这个氏族的人充任。

回鹘的先世曾先后受鲜卑、柔然的控制，6世纪中叶，又受突厥贵族的统治、奴役。突厥不但“厚敛其物”，还驱使他们去东征西讨“以制北荒”。605年，西突厥的泥撅处罗可汗攻掠铁勒诸部，又坑杀“渠豪数百”。回鹘联合仆骨、同罗、拔野古等奋起反抗，摆脱了西突厥的控制，“自为俟斤，称回纥”。

隋末，回纥部众推选时健为“君长”。唐初，时健死，子菩萨（约627—646在位）继立。菩萨“力勇有谋”，善于作战，其母乌罗浑“能决平部事”，使“内部齐肃”，自此以后，回鹘日渐强盛。菩萨率部与薛延陀攻打突厥北边，在马鬣山以5000骑兵击败了突厥10万骑，因而声威大振。当时，铁勒中的另一大部落薛延陀在以鄂尔浑河为中心的地区建立汗国。菩萨附属于薛延陀，在其南面的独乐水畔建立起自己的牙帐。630年，回纥配合薛延陀和唐军攻灭了东突厥。646年，菩萨死，子吐迷度（646—648在位）继立，同年助唐灭薛延陀汗国，占有其部众和地区。656年，回纥又以5万骑助唐灭西突厥。此后回纥就控制了原来东、西突厥据有的广大地域。

早在回纥诸部还附属于薛延陀汗国时，就已和唐建立了从属关系。629年，回纥就曾遣使至唐朝贡、献方物。灭薛延陀后，又马上遣使告唐，“愿归命天子，请置唐官”。唐太宗依请，

亲至灵武会见回纥诸首领。回纥又当面请求“愿得天至尊为奴等天可汗”。唐对回纥首领大加封赏，“以唐官官之”的有数千人。647年，唐于回纥驻牧地置六府七州。置都督府的有回纥部为瀚海，多滥葛部为燕然，仆骨为金微，拔野古为幽陵，同罗为龟林，思结为卢山。置州的有浑为皋兰，斛薛为高阙，阿跌为鸡田，契苾为榆溪，奚结为鸡鹿，思结为蹄林，白霫为真颜州。后又以回纥西北结骨部为坚昆府，其北的骨利干为玄阙州，东北的俱罗勃为烛龙州，总为七府九州。这些府、州的都督、刺史，都是在其本族中“选有人望者为之”，长史、司马等也是由本族的“酋领”充任。这些羁縻府、州，都受燕然都护府管辖。

回纥首领吐迷度接受朝廷授予的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的封号，承认自己是唐的地方官员。但在回纥内部，他自称可汗，有一套完整的、独立的统治机构。这套机构和突厥基本一样，只是又兼采了一些唐的官制。领兵的官员称“设”，可汗子弟称“特勤”，大臣称“叶护”、“屈律啜”、“阿波”、“俟利发”、“吐屯”、“俟斤”等，共28等，都是世袭。另外有宰相6人，内宰相3人，还有都督、将军、司马等官名。

应回纥的请求，唐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设一条叫“参天至尊道”的大驿道，沿途设过邮（驿站）68所，过邮有马、酒、肉等供往来使者之用。漠北诸部每年用貂皮等物向唐朝廷进贡，唐朝廷则负责调节、平息各部的纷争和救灾济困。

648年吐迷度为其侄乌纥杀害，唐朝廷擒杀了乌纥，助回纥平定了叛乱，并扣留乌纥的同党俱罗勃，立吐迷度子婆闰为左骁卫大将军、大俟利发、使持节回纥部落诸军事、瀚海都督，保护了由药罗葛部酋长世袭的回纥可汗世袭制。此后，在回纥

可汗的继承上,唐朝廷始终是支持药罗葛家族充任。663年,唐迁原瀚海8都护府于云中,改名为云中都护府;将原燕然都护府迁至回纥,改名为瀚海都护府,漠北诸府、州统归瀚海管理。这是唐加强对漠北统治的措施,同时也是帮助药罗葛家族,加强其在回纥中的统治地位。回纥可汗则多次派军队助唐军定边陲,征讨反叛。651年,婆闰派5万骑助唐军击败西突厥阿史那贺鲁,收复北庭。656年,再次协助唐军征西突厥于阴山、金牙山、碎叶水利邪罗斯山等,尽收西突厥所居之地。679年,突厥贵族阿史那温傅等叛唐,回纥又配合唐军夹击叛乱军。

7世纪后期,后突厥汗国兴起,回纥和其他铁勒各部又被后突厥汗国所征服。回纥中的一些部众挣脱了奴役,南迁到甘、凉二州,唐朝廷常常让他们中的“壮骑”协助赤水军。以后,又有一些回纥部众南迁,唐朝廷把他们安置在大武军北(今山西繁峙县东北一带)。

二、回鹘汗国的 建立及其与唐朝的关系

自吐迷度接受唐的地方官名号以后,历经五世,一直得到唐朝廷的支持,但唐对这些药罗葛家族出身的回纥统治者的支持,只是从他们是唐的世袭地方官的身份出发的。到了骨力裴罗(744—747在位)时,才正式建立了回鹘汗国,并得到唐中央政府的册封和支持。

8世纪40年代,后突厥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自相残

杀。时回纥正是骨力裴罗为君长，他联合葛逻禄等于742年和744年先后击杀突厥乌苏米施可汗和拔悉密部颉跌伊施可汗，自立为骨咄禄阙毗伽可汗，建牙于乌德鞬山和昆河之间（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拉和林北），正式建立了回鹘汗国。745年击杀突厥白眉可汗，灭后突厥汗国，控制了突厥原有地域。其地“东极室韦，西至金山，南控大漠，尽得古匈奴地”。除九姓回纥外，又收拔悉密、葛逻禄二部，共十一部，每姓置一都督，统号十一部落。

骨力裴罗的建国活动是在接受唐中央政府领导的前提下进行的。出兵后他曾二次派遣使者至唐朝廷奏告原委。击杀突厥的白眉可汗后，还送其首级至长安，向唐中央政府报功。唐玄宗李隆基先是封骨力裴罗为奉义王，接着又专门举行了册封盛典，拜他为骨咄禄阙毗伽怀仁可汗（简称怀仁可汗），正式承认了他的可汗地位。其后凡新可汗继立，都要求得唐的册封。自骨力裴罗立国至回鹘汗国灭亡，历经13名可汗，其中有12名可汗接受了唐的册封，只有最末一名廋驳可汗未来得及册封汗国就灭亡了。其中的第四位可汗顿莫贺还受唐二次册封。唐肃宗李亨在册封葛勒可汗（747—759在位）的《册文》中写道：“北土不宁，有唐封而固之；中原多难，可汗义而赴之。”唐的册封对回鹘起安定内部局势，巩固可汗统治地位的作用，而通过册封也进一步密切了回鹘对唐的从属关系，为唐请调回鹘军队平叛拓疆创造了有利条件，所以“册封”对于双方统治者都是需要的。

755年，唐发生了安史之乱，两京相继失陷，玄宗逃奔四川，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756年回鹘葛勒可汗磨延啜遣使至

灵武,主动请求出兵平叛。肃宗李亨派敦煌郡王李承寀、大将朴固怀恩为使前往请兵。葛勒可汗将可敦妹以义女名义嫁给承寀,并封承寀为回鹘的一等大臣“叶护”、持 4 节。肃宗也相应地提升李承寀为宗正卿,封可敦妹为毗伽公主、王妃。葛勒可汗遣太子叶护率兵入援,回鹘骑兵与唐将郭子仪会合,大败叛军。葛勒可汗还率精骑 4000,会同唐师收复唐的东西两京。唐为酬谢叶护的功绩,封他为司空、忠义王,并决定每年送给回鹘绢 2 万匹。762 年,回鹘牟羽可汗(759—780 年在位)又应约率军队助唐讨平安史余党史朝义,再次收复东京洛阳。唐代宗李豫为酬射回鹘助战平叛之功,除大加封赏外,还规定唐与回鹘进行绢马贸易,每年最高额为 10 万匹,每匹马换绢 40 匹。

唐自安史之乱后,国力日衰,吐蕃乘机侵掠河湟,寇扰甘、凉,切断中原与安西四镇的联系,致使安西、北庭两都护孤悬西陲。回鹘曾扶助两府,共同抵御吐蕃,还派兵护送使差和商旅,沟通了与中原的联系,为维护唐边境地区的安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和亲,在回鹘和唐的关系中占有颇为重要的地位。对回鹘可汗来说,通过和亲既可增加本人的政治威望,有利于统治地位的进一步巩固,又可在经济等方面获得许多好处,所以在这方面回鹘更为主动,要求更为迫切。回鹘与唐的和亲是从葛勒可汗磨延啜开始的。756 年,首先是回鹘葛勒可汗磨延啜将自己的妻妹收为义女,嫁给唐敦煌郡王李承寀。唐肃宗李亨先后封这位可汗义女为毗伽公主和王妃,成为双方和亲的前奏。接着磨延啜又为自己和少子移地健请求和亲。758 年,唐肃宗将

次女宁国公主嫁给了磨延啜，并且将大将仆固怀恩之女许给移地健和亲。过去中央皇朝都是将宗女封为公主，嫁给少数民族首领和亲，皇帝以自己的亲生女儿和亲，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也是唐皇朝“蕃汉一家”思想的一个具体体现。759年，磨延啜死，少子移地健继立，为牟羽可汗。宁国公主一返回唐宫，陪嫁的荣王女被尊为小宁国公主，从回鹘俗，继为移地健妻，被封为可敦。唐还封原与移地健和亲的仆固氏为婆墨光亲丽华毗伽可敦。768年，仆固氏死，唐又封仆固怀恩幼女为崇徽公主，再嫁移地健。

780年，顿莫贺（780—789在位）击杀移地健，嗣为可汗后，向唐请求和亲。唐提出了五项先决条件：（1）回鹘向唐称臣；（2）回鹘可汗为唐皇帝子侄；（3）每次遣唐不可超过200人；（4）市马不能超过1000匹；（5）不能携汉人和胡商出塞。顿莫贺遣使上表称儿及臣，表示“与约五事，一皆听命”。788年唐德宗李适将第八女咸安公主嫁给了顿莫贺。咸安公主在回鹘21年，从回鹘俗，历嫁天亲可汗顿莫贺、忠贞可汗多逻斯（789—790在位）、奉诚可汗阿啜（790—795在位）、怀信可汗骨咄禄（795—805在位）。

回鹘保义可汗（808—821在位）继立后，也迫切请求与唐和亲。唐宪宗李纯已经决定将第十五女永安公主与他 and 亲，但未及实行，李纯与保义可汗双双死去，因而作罢。崇德可汗（821—825在位）嗣立后，唐穆宗将其妹（宪宗李纯的第17女）封为太和公主嫁给了崇德可汗。

和亲是唐羁縻政策的重要内容，是唐安边拓疆的一项政治措施。正如唐诏令中所说，公主出降蕃王是用以来安养部

落，资辅佐之功，广怀柔之道的，所以不只是回鹘需要，唐皇朝更为需要。通过和亲，使双方更加亲近、更加信任，对促进经济、文化的交流，巩固中央皇朝的统治和维护回鹘内部的安定，都起着重要的积极的作用。

回鹘与唐的关系中上述的和好方面是长期的主导方面，也出现过短暂的矛盾、冲突。765年，唐叛将仆固怀恩引回鹘、吐蕃等部数十万人入寇，合围泾阳，进逼长安。唐对回鹘采取维护友好，消化干戈的审慎政策。唐主帅郭子仪解甲免胄亲至回鹘军营，见回鹘大帅合胡禄都督药葛罗，晓以利害。回鹘将士被说服，药葛罗表示受了仆固怀恩的欺骗，“今请为公尽力，击吐蕃以谢过”。并共同盟誓：“大唐天子万万岁！回纥可汗亦万岁！两国将相亦万岁！若起负心违背盟约者，身死阵前，家口屠戮”。是为“泾阳之盟”，这是唐朝和回鹘关系融洽的壮丽一幕。“泾阳之盟”使回鹘与唐的和好更加深入人心。回鹘与唐联军大败吐蕃。唐中央还赠缯帛10万匹给回鹘作酬谢。

778年，牟羽可汗为掠夺财物，违背“泾阳之盟”，出兵攻掠太原，“取羊弓数万”，唐待之如旧。779年，唐代宗李豫逝世，在九姓胡（粟特人）煽动下，牟羽可汗又想乘机发兵寇掠。宰相顿莫贺深知回鹘人民不愿意南寇，遂劝说可汗不要出兵，可是牟羽可汗移地健不听劝告。顿莫贺遂顺应人民愿意和好反对南寇的心理，起兵杀移地健及九姓胡等追随者2000人，自立为合骨咄毗伽可汗，遣使至唐报奏。唐立即遣使册封他为武义成功可汗，消弭了一场迫在眉睫的冲突，使双方和好关系得以继续维持下来。

三、回鹘经济文化的发展

据史书记载,唐以前回鹘尚“无君长”、“逐水草转移”,处于原始社会的末期。大约隋唐之际,才选举时健为酋长,并实现了酋长世袭制。可是到了唐中叶,回鹘人已从游牧发展为游牧兼定居,出现了相当规模的商业和农业。到了晚唐时期,他们的农业、商业、手工业和畜牧业都有很大的发展,成为西域、河西地区的定居者,封建制度已在回鹘社会发展起来了。唐初回鹘的社会发展水平与柔然等当年的情况比较虽然还不高,但它的发展速度和达到的水平却是匈奴、柔然等无法比拟的,就是发展较快的突厥也较之逊色。回鹘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一条是由于得到唐的长期的支持和援助。特别是回鹘与唐的马绢贸易。

回鹘的经济发展自安史之乱后发生了巨大变化。唐肃宗为酬谢回鹘在平叛中的战功,遂与约定马绢互市。即唐用绢交换回鹘的马匹。按当时正常的比价每匹马应换绢 20—30 匹,但肃宗为了“酬功”,却定到每匹马换绢 40—50 匹,而且数量没有严格的限制。回鹘人还用马交换茶叶粮食。不等价的交换,促进了回鹘畜牧业的迅速发展。回鹘每年售马数很快达到 10 万匹,以至使唐朝廷无力承担。808 年,限定数量后,每年来售的马匹仍然以万计。除官方贸易外,双方官员、商人的私人贸易也非常活跃。此外,回鹘还通过军功赏赐、册封馈赠、公主陪嫁等途径获得唐的大量财物。以 773 年为例,这一年回鹘一次从唐带回装载马价绢和赏赐财物的车辆,就有 1000 多辆。

据粗略统计,回鹘每年从唐得到的丝织品,不少于 50 万匹。这么多的东西,除一部分自己消费外,更为可观的部分用于商业贸易,商业的发展也对回鹘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唐首都长安长住的回鹘人多达千人,其中以使者和商贾居多,而使者中更有兼为商贾的。这些人“殖货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除通常商业活动外,有的还放高利贷,致使唐文宗不得不明令禁止。回鹘商人不只限于长安,还遍及中原,西域和汗国境内。随着经济的发展,回鹘人在草原上建造了一批城镇。最著名的是回纥城哈喇巴喇哈逊(黑虎城)。它是汗国的首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建在鄂尔浑河左畔,据遗址可知,城址面积有 25 平方公里,包括城区、堡垒城堡和农业郊区。遗址出土的瓦当、铺首等物都具有晚唐的风格。其他还有富贵城、公主城、眉间城等。尽管回鹘已有很多贵族和商人住在城镇过定居或半定居生活,但广大牧民仍然过着以游牧为主的生活。

回鹘具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文化传统。又深受突厥、汉文化的影响。与突厥同俗,逢大庆典,拜狼头纛。原信萨满教。762 年,牟羽可汗移地健在洛阳接触到摩尼教,开始信服,并于第二年将摩尼僧人睿息等 4 人带回汗国。在移地健倡导下,回鹘人很快改信摩尼教。摩尼教被尊为回鹘的国教,摩尼师、摩尼僧在回鹘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有些僧人直接参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活动。其首领常常参预管理回鹘国家大事。在回鹘的支持下,摩尼教不但传遍漠北,西达天山、而且在唐内地也不断扩大影响。768 年,唐在长安建立摩尼教的大云光明

寺后，又依回鹘请求在洛阳、太原和荆、扬、洪、越等州先后建寺，摩尼教传入了黄河流域，江淮地带和中国北方许多地区。

回鹘人主要使用突厥文，也用粟特文和汉文，大约在西迁后，采用粟特文字母创制了古回鹘文。立于814年的“九姓回鹘可汗碑”的形制是汉式的，碑文却是用突厥、粟特、汉文三种文字镌刻的。

回鹘人乘高轮毡车，穿窄袖衣，带胡帽。其衣着对唐颇有影响，《全唐诗》载花蕊夫人《宫词》有“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之句。白居易诗记天宝年间装束也说时人穿着“小头鞋履窄衣裳”。在婚姻上还保留有子妻后母的继婚制。初时尚保留有用生人殉葬的习俗，磨延啜死后，回鹘“牙官、都督”曾想让宁国公主殉葬，遭到拒绝，以后，不见有殉葬的记载，只保有劈面器哭的习俗。

四、回鹘的南下与西迁

9世纪30年代，回鹘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益加剧，不断发生内乱。832年，昭礼可汗曷萨特勒死于内乱，彰信可汗胡特勒继立。宰相掘罗勿引沙陀兵攻胡特勒，胡特勒兵败自杀。掘罗勿立廝𠵿为可汗。与内乱同时，又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时疫、雪灾造成马、羊大批死亡，使社会经济遭到巨大破坏，国力更加衰弱。840年回鹘“渠长”句𠵿莫贺又引黠戛斯率10万骑破回鹘都城哈喇巴喇哈逊（今鄂尔浑河上游河畔，又名黑虎城），杀廝𠵿、掘罗勿等，烧掠摧毁了都城。回鹘汗国瓦解。回鹘诸部遂南下西迁寻找生计。

一支以可汗兄弟乌介为首率亲信大臣共 27 部约 30 万人，至振武军（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及天德军（今内蒙古乌拉特旗西北）一带。这支部众以后大部内附于唐，小部先附于奚，后依室韦，及至室韦为黠戛斯所败，又附于黠戛斯。内附的又大部被安置在唐的沿边州县，经长期与汉人错居杂处，渐趋汉化。

一支奔河西，居住在以甘州（今甘肃张掖）为中心的河西、陇右一带。史称甘州回鹘或河西回鹘。开始他们依附于吐蕃，842 年张义潮起兵逐吐蕃归唐，回鹘人附张义潮直属于唐。872 年，回鹘人攻据甘州，自立可汗，请唐册封。874 年，唐遣使往册，因战乱未能抵达甘州。875 年，回鹘使至唐朝贡，唐给救济绢 1 万匹。由于唐在政治，经济上的支持，河西回鹘日益强盛。他们和中原皇朝以甥舅相称，关系很是亲密，经五代至北宋一直如此。901 年，唐昭宗被宦官劫持到凤翔，甘州回鹘还曾请求“率兵赴难”。

一支迁至西州，史称西州回鹘或阿萨兰回鹘，又称高昌国。控制地域西接葱岭，东达甘、肃二州，北界天山，南临于阗，建都高昌。开初，西州也受吐蕃统领。866 年，回鹘首领仆固俊率众击败了吐蕃，“尽收西州、轮台等城”，遣使入唐朝贡、献俘，请求承认，唐懿宗准其所请。从此至宋，与中原皇朝保持和好关系，并一直以甥舅相称。

另一支由宰相驸职拥庞特勤西奔葛逻禄，葛逻禄原是回鹘属部。以庞特勤为首的十五部是西迁人数最多的一支，迁至葱岭以西楚河一带，史称岭西回鹘。

第三节 吐蕃与唐的关系

一、吐蕃的兴起

当唐朝的国势蒸蒸日上的时候，在西南隅的西藏高原上，也勃起了一个新兴的藏族王朝——吐蕃。

藏族的祖先是羌人的一支。赞普的家族传说祖上从天神下凡，做六犛牛部的王。羌族中有一支越嶲羌，也叫犛牛种。蜀汉时有旄牛夷，住在今四川雅安一带，受“旄牛王”统治。犛牛就是旄牛。藏族祖先从川西向西迁移的时间虽可能在蜀汉以前，出于这一支却是无疑的。

他们逐步西迁，到了西藏高原，但和东方各族没有断绝过交往。他们到了西藏南部，征服原来住在这一带的孟族。那些被征服的人便当了奴隶。吐蕃人在冈底斯山以南的雅鲁藏布江南岸逐渐发展起来。他们在柳林茂密的泽当，建立碉堡。赞普和父王六臣、母后三臣等9个氏族就住在这里。吐蕃人慢慢地发展了农业，又从移入西藏较晚的羌人接受汉族的农业技术，使用铁犁、铁锄，兴修水利，开沟挖渠，战胜了高山和风雪，种植青稞、荞麦，畜养犛牛、羊、马。

大约在公元620年，松赞干布的父王论赞弄囊统一了西藏各部，成为专制的国王。这在当时是历史的进步，对中小贵

族和自由民有利；但是保守的氏族贵族要保持特权，不愿受赞普的控制，就要设法反抗。公元629年，论赞弄囊中毒身亡，父王六臣和母后三臣一齐发动了叛变。

当时松赞干布年仅13岁，他精通骑射、角力、击剑等武艺，熟悉赞普的世系和英雄的传说，爱好民歌，善于吟诗，是个文武全才的王子。他经受了严酷的考验，依靠中小贵族和自由民的拥护，建立精锐的军队，在公元632年削平叛乱，严厉地打击反动的大贵族，巩固了吐蕃王朝的统一。这是打破氏族贵族的阻力、巩固奴隶制王国的一场严重的斗争。

他迁都逻些（今拉萨），在布达拉山修建宫室。逻些位于西藏高原的中心，比僻处南方的泽当，形势对统治有利得多。当时吐蕃的奴隶，数量并不太多，主要人口是自由民的小生产者。这些小生产者要负担兵役，奴隶劳动在农业和畜牧业上，地位都很重要。

松赞干布对奴隶的统治极为残酷。他制定的法律，有剜眼、割鼻、砍手、断膝、斩首、以至全家诛灭等酷刑。但是，在他统治的时候，奴隶制度在西藏是一种新制度；而且受到南面的泥婆罗（今尼泊尔）和北方的唐朝的封建制度的影响，封建制的因素也在西藏滋生。总的来说，这是西藏历史上兴旺发达的时期。

松赞干布热心接受周围各族的先进文化。他巩固了吐蕃的统一之后，就派贵族子弟到天竺留学。他们回到吐蕃，参考梵文和古和阗文等，制定藏文字母。藏族从此有了文字。

松赞干布招致了天竺的学者、泥婆罗的手工业技师、大食的医生，但他最倾心的毕竟是中原的唐朝。他决心要跟唐朝建

立友好关系。公元634年,即唐太宗贞观八年,第一批吐蕃使臣便开始来到了长安。

二、唐蕃联姻

唐朝很快派使臣到吐蕃答聘。松赞干布从唐朝使节和带来的礼物受到启发,对中原文化无限向往。这是汉藏两族友好关系的良好开端。

贞观十四年(640年),吐蕃使臣禄东赞率领一队骑士,携带大批珍宝,到长安请求通婚。唐太宗答应把宗室女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第二年正月,江夏王李道宗奉命送公主入藏。文成公主大概就是道宗的女儿。禄东赞是吐蕃大相,坚决支持增强唐蕃联系的政策,对汉藏两族的友好关系,是作出了贡献的。

公主带着乳娘、宫女、乐队、工匠、官属,加上江夏王率领的卫士,组成一支不小的队伍。他们带着华贵而丰富的妆奁。其中有金银、珍宝、绸帛,显示了唐朝国力的充沛;有经史、诗文、佛经、佛像以及种树、工艺、医药、历法等书籍,送去了中原文化的精英;他们还带着种子、工具等物,成为传播中原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的队伍。

一行人浩浩荡荡,出了长安,由西而南,穿过青海到西藏。青海的吐谷浑首领早已受了唐朝河源郡王的封号,娶了弘化公主为妻。他们热烈欢迎江夏王和文成公主。队伍继续前进,到吐谷浑与吐蕃交界的地方,和在此迎亲的松赞干布相见。

松赞干布看到唐朝士女的俊爽风流,中原文物的典雅华

美,以及财富的众多,仪仗的鲜明,十分欢喜。他穿上汉族的袍带,打扮成唐朝的驸马,以子婿礼谒见江夏王,送他回朝复命;再使汉族工匠先到逻些,指导吐蕃人民修筑道路、建造唐式房屋,然后迎接公主入藏。

公主入城的一天,逻些城内城外,到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氛,万人夹道欢迎,争看大唐公主,歌舞游宴,十分热闹。

公主没有辜负唐朝的期望,为汉藏两族的团结做了许多工作。公主在经过的地方,使汉族工匠装置碾磙,利用水力来磨青稞,使藏人开始学得使用水力的技术。有些地方流传着公主指导改进种植方法的说法,在百南巴(今青海玉树县南)还有公主的石刻像。公主后来常住泽当,相传山南的藏族农民在公主的影响下,学会了汉人平整田地、筑田塍、挖畦沟、除杂草等技术,提高了耕作水平。藏族人民还传说,公主曾在那里教导藏族妇女纺织、刺绣。当然,真正做藏族人民的教师的人,总是跟公主入藏的工匠、侍女等人。但是假使没有唐蕃联姻之举,汉族文化的传播,规模不会这样大,那是非常明显的。

1300 多年的岁月过去了。至今藏族人民还在赞美文成公主;并且连带赞美求亲的使臣禄东赞,说他以无比的智慧,通过许多难关,最后从 300 名美女中认出了文成公主,亲事才得成功。这些传说证明人民赞成各族平等的联合,反对民族压迫。

公主带去的文物、人才,都在西藏开花结果。吐蕃贵族热心学习汉族传统文化,许多贵族子弟到长安求学。赞普聘用唐朝文士做文书工作,还不断地向唐朝要书籍、技工和蚕种。藏医吸收汉医的知识,诊脉用“寸、关、尺”等名称,与汉医完全相

同。藏族人民本来有一套与疾病斗争的经验，藏族医生把它同汉医结合起来，建立了藏医的体系。8世纪中，宇陀·元丹贡布等编的《四部医典》，是藏医的重要著作，也可以说是汉藏文化交流的结晶。唐朝的乐队杂伎也在吐蕃生了根。唐朝使者到吐蕃，常常看到这种情形。

公元650年，松赞干布在34岁的盛年死了，文成公主又活了30年。他们的陵墓巍然尚存，松赞干布墓上的寺中还有他和两位王后的像，留供后人瞻仰。

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共同生活不过10年。汉藏两族的联系也决不会全靠他们两个人。但是他们毕竟对两族的团结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使两族人民的亲密关系有一个良好的开始。

三、唐蕃会盟

松赞干布统一吐蕃后，通过与唐和亲，双方建立了友好关系。但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这种关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和好的同时，伴以矛盾，冲突、常以兵戎相见。除小的磨擦外，还多次发生大的军事冲突。双方冲突的焦点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争夺在吐谷浑的控制权，二是争夺安西四镇，三是争夺唐的河陇地区（今甘肃和新疆东部），四是争夺对南诏的控制权。在唐高宗和武则天执政时期，双方战事频繁，吐蕃灭了吐谷浑，但在争夺安西四镇中，吐蕃并没有占到多大便宜，双方互有胜负。在吐蕃墀德祖丹时期，由于连年的战争，唐蕃双方都希望摆脱困境，恢复稳定和发展发展的环境。中宗即位以后，吐蕃

便遣使请盟，随后又再度提出通婚，中宗许以金城公主出嫁。神龙三年（707年），唐九征在取得对姚州（今云南楚雄县）地区吐蕃大将与姚州蛮联合进攻蜀汉的胜利之后，双方进行了第一次划界会盟。吐蕃承认唐朝在姚州蛮地区划分的唐蕃守界，双方以唐九征所立的滇池铁碑为分界，这次会盟史称“神龙盟誓”。

唐玄宗时期，吐蕃通过贿赂鄯州都督杨矩将河西九曲（今青海黄河河曲之地）以作为金城公主汤沐住地的借口据为己有，由此在这里屯兵畜牧，建桥筑城，与唐对峙。开元二年（714年），吐蕃派岔达延赞松献书于唐，要求在河源定界立盟。唐以解琬持“神龙盟誓”赴河源与之协商，在唐蕃双方尚未决定之时，玄宗下诏以吐蕃野心窥边犯塞之由欲派兵驱逐。吐蕃遂以唐不愿划界盟誓为理由发动战争，进攻唐临洮军。双方经过洮河之战与小勃律争夺战，在开元十六年至十七年（728—729年）之间，唐先后攻破了吐蕃九曲的大莫门城和石堡城。吐蕃连续遣使请和，加之金城公主的努力，双方约定会盟。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唐以李佺等人为使与吐蕃在赤岭（今青海湟源日月山）会盟，分界立碑，在碑文中回顾了双方的舅甥关系，肯定了赤岭以外边境地区的界线。唐还同意与吐蕃在赤岭交马、甘松岭互市。

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乘唐西北边备空虚占领了焉州、河州等重要军镇。至德二年（757年）又在“助国讨逆”的口号下请求与唐会盟，通过盟约确定已经占领地区的合法化。肃宗不得已，命郭子仪等人与吐蕃命名者在鸿胪寺会盟，与此同时，吐蕃又攻陷西平、岷州、剑南等地，随后一举控制了陇右。代宗

时期,双方又曾在永泰元年(765年)与大历二年(767年)两次会盟于唐长安兴唐寺,迫使唐承认吐蕃占领的土地。

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德宗即位,以太常少卿韦伦为使,护送俘获的吐蕃士兵还蕃,墀松德赞也遣使来唐贡献,互表和意。建中二年(781年)唐殿中少监崔汉衡等人携书赴蕃,协商会盟,最后,双方于建中四年(783年)会盟于清水。清水会盟后,双方分别在长安西郊和邈些再次定盟。清水盟约中划定了唐蕃的界线,唐界自泾州至弹箜峡西口(今平凉西100里),陇州(今陕西陇县)西至清水县,凤州(今陕西凤县)西至同谷县(今甘肃成县)及剑南西山大渡河之东为汉界。吐蕃界自兰、渭、原、会等州西至临洮,东至成州,抵剑南西界磨些诸蛮,大渡河之西南为吐蕃界。同时规定双方守界之间为缓冲地带。

在清水会盟后的第四年(贞元三年,787年)又发生了吐蕃平凉劫盟事件。其年五月,双方会盟于平凉川,尚结赞将3万精骑埋伏于盟坛西部,一举捕获唐使唐将,浑瑊混乱中逃出,其余60余人及游骑全部被扣压,军士被杀者达500余人,被俘千余人。这次劫盟使双方关系再度恶化,经几度战争与议和,直至长庆元年(821年)的长庆会盟。

长庆元年,吐蕃以论纳罗等人携带盟文来唐请盟,穆宗同意。十月十日,令宰相崔植、王播、杜元颖等17人与吐蕃使者会盟于长安西郊王会寺(碑文中记载为兴唐寺),定盟立约。次年,唐又以大理卿兼御史大夫刘元鼎为赴蕃会盟使,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刘师老为副使,一行人与吐蕃赴唐会盟使论纳罗等人赴吐蕃再盟。长庆三年(823年)刻石立碑,当时共立三

碑，一碑立于唐都长安，一碑立逻些，一碑立于唐蕃交界处。唐蕃会盟碑至今尚存于拉萨大昭寺。碑文中再次肯定了清水会盟划定的唐蕃的守界，商定了有关通传驿骑、交马互市及捉拿俘虏等事。规定双方按原有的交通驿道来往；交马定在将军谷；双方使差往来的供应，在绥戎栅以东为唐朝供应，清水县以西为吐蕃供给；今后不再捉拿“生口”，对所遇到的“生口”应给予衣食放回原地。盟文还回顾了唐蕃关系发展的历史，重申了永敦和好的愿望，规定了违约的处理办法。唐蕃长庆会盟是唐蕃之间最后一次会盟，基本上结束了双方长期对峙与战争的局面，为汉藏人民的和平友好往来创造了条件。

四、河西归唐

唐蕃长庆会盟时约定“各守现管本界”一条，实际上是使唐朝承认吐蕃永占河陇。这是违反了河陇居民的意志的。唐宣宗大中年间，吐蕃贵族发生混战，于是沙州（今甘肃敦煌西）人张议潮（议一作义）领导沙州汉、蕃人民起义，驱逐了吐蕃守将，出兵收复了河西各州。“赖得将军开旧路，一振雄名天下知。”这句诗便是唐朝河西人民对张议潮英雄业绩的颂扬。

河西，指的是现在甘肃省黄河以西地区，又称河西走廊，这个地方是中原和西域之间的交通要冲。河西走廊西端的沙州（今敦煌），是从西域进入中原的咽喉，地位极其重要。当时从西域的沙州有三条道路：一是从沙州往北达伊吾（今新疆哈密）；二是从沙州往北达高昌（今吐鲁番一带）；三是从沙州往西南至于阗（今新疆和田）。从西汉以来，长安到西域的交通就

是以这条道路为主。

从军事方面看，河西走廊是唐政府经营西域的基地。早在武德二年（619年）李世民打败薛仁杲以后，便在秦州（今甘肃秦安）设置总管府，辖秦、渭（今甘肃平凉）、岷（今甘肃岷县）、洮（今甘肃临潭县西）、兰（今兰州市）等13州。贞观元年（627年）在这个地区建立陇右道，把管辖范围扩大到瓜州以西。河西走廊周围是民族杂居之地，它的北面最初是突厥，后来又是回纥。这些游牧民族经常驰骋在今甘肃和宁夏的沙碛地带。河西走廊的南面，是吐蕃活动区域，他们盘据在青海西藏高原。这南北两大势力，都垂涎于狭窄的河西走廊，经常骚扰这一地区。他们骚扰河西走廊的原因，就是因为祁连山麓农业发达，牧业繁盛。不仅如此，而且这个地区位于中原和西域贸易的中枢地点，城乡殷实，因此变成吐蕃和回纥掠夺的目标。唐政府也总设法保住河西走廊，以便维持东西方的贸易和交通。

安史之乱以后，河西陇右的军队调到内地平叛。吐蕃奴隶主乘机蚕食陇右河西，妄图攫为己有。广德二年（764），他们攻陷了凉州（今甘肃武威），河西节度使逃往沙州，在沙州设立节度使府。当时沙州附近各州，都被吐蕃占领，只有沙州军民仍然英勇抵抗，不肯投降。后来吐蕃奴隶主尚奇心儿包围了沙州，沙州刺史周鼎求援于回纥，援兵不至，周鼎打算焚城东逃，部众不从。都知兵马使阎朝杀周鼎代之，坚持守城11年，终因粮尽，自己和沙州同陷于吐蕃。沙州沦陷的时间是在唐德宗建中年间，最晚也不能晚于贞元初年。

吐蕃对占领区人民极端残暴，凡是吐蕃军队所到之处，焚烧庐舍、蹂躏禾稼、驱掠人畜，无恶不做。同时因为吐蕃“重壮

贱老”，唐人被他们俘虏以后，老弱全部杀光，少壮充当奴隶。据《旧唐书·吐蕃传》说：“用刑严峻，小罪剜眼或皮鞭鞭之，但随喜怒而无常科。囚人于地牢，深数丈，二三年方出之。”

不仅如此，而且吐蕃奴隶主还严禁唐人穿汉族服装，只许他们每年元旦着自己衣服祭祀祖先，祭完便收藏起来。每逢到了这一天，唐人无不向东方遥拜，痛哭流涕，怀念久别的家乡。

德宗时期，唐朝使臣韦伦从吐蕃回长安途中经过河陇，一路上看到被俘的唐人都是毛裘蓬头。这些人在墙缝里偷看唐使，有些人捶胸流涕，并向东方拜舞，盼望唐军早日收复失地。

公元9世纪40年代，河西一带的回纥四散，吐蕃也日渐衰弱。武宗会昌二年（842年），达磨赞普死，由于他没有后人，于是王后缙氏立内侄乞离为赞普（国王）。大相结都那因反对立异姓为赞普，被后党杀害。另一派大臣又立老赞普的支属俄松为赞普，从此吐蕃统治集团内部开始分裂，两个赞普互相争夺王位。吐蕃吐门川讨击使论恐热，起兵攻打渭州（今甘肃平凉），大相尚思罗战败，西逃松州（今四川松潘）。论恐热追至松州，杀了尚思罗，他自称大相，后来又出兵20万攻打鄯州（今青海乐都）节度使尚婢婢，所过之处掠夺以外，逢人便杀，积尸狼藉。鄯、廓、瓜、肃、伊、西等州都遭兵燹。唐政府利用吐蕃内乱，策划收复失地。宣宗大中三年（849年），首先光复了秦、原（今宁夏固原县）、威（今甘肃中卫）3州，以及石门木峡七关，但这些地区都在河西走廊的东部。

河西走廊西部的收复，是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的：第一阶段是大中二年（848年）。这年三月，沙州张议潮领导人民起义，大举进攻沙州城。城里唐人响应，协助张议潮赶走了吐蕃的镇

将，光复了沙州。不久，又夺回瓜州（今甘肃疏勒河以东安县）。在沙、瓜两州光复以后，张议潮立即派人到长安报告唐宣宗。张议潮唯恐表文送不到长安，他分遣 10 队使者，带着同样的表文，分 10 队出发，其中一队顺利到达天德军（今包头市西）。第二年二月，天德军的报告送到长安，并得到中央政府的回信。于是张议潮的使者带着唐宣宗任命张议潮为沙州防御使的敕令返回了沙州。

第二阶段是在大中四五年间。张议潮率领着河西人民扩大战果，又收复了伊州（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河州（今甘肃临夏）、甘州（今甘肃张掖）、鄯州、岷州、廓州、兰州等地。大中五年（851 年），张议潮又派其兄张议潭携带河西 10 州地图和户籍到达首都。十一月，唐政府决定，在沙州恢复河西节度使，号称“归义军”，并任命张议潮为检校吏部尚书兼金吾大将军归义军节度使和 11 州营田处置观察使。

河西道虽然被张议潮收复，吐蕃军暂时撤退，但河西走廊并不安宁。因为吐蕃奴隶主贵族时刻想卷土重来，不断侵犯瓜、沙。而回纥当时又正向甘州及安西迁移，时刻威胁着河西走廊的安全，这使张议潮面临严峻的考验。大中十二年（858 年）八月，吐蕃组织反攻，在沙碛地带被张议潮军打退。唐懿宗咸通四年（863 年），张议潮率领汉蕃兵 7000 余人，克服凉州（今甘肃武威）。咸通七年（866 年），又光复了西州（今吐鲁番）。

从上述情况可知，张议潮不仅光复河西 11 州，而且向西域进军，收复安西部分州县。

张议潮光复河西走廊以后，接着要做的，是巩固胜利成果

和建设河西的问题。

当时河西陇右的经济,主要是农牧业。但是这些地区雨量不足,必须靠人工灌溉来促进农业的发展。张议潮当了河西节度使以后,积极开发河西陇右的水利事业。他除了兴工开渠以外,并且专门设置“渠人”这一官职,几个“渠人”以一条渠为中心组织起来,专门监督管理渠道事务。由于水利事业的兴修,所以河西走廊的农业也得到发展,从而使这一地区的经济逐渐繁荣,沙州成为东西贸易和交通的中枢。当时于阗的玉、回纥的马、高昌的棉布、龟兹的殄,都是经沙州运到中原。同时内地的茶叶、陶瓷、丝织品等,也是通过沙州运往亚欧各地。唐朝后期的沙州城,国内外商旅川流不息,贸易十分繁盛。我们从鸣沙山石窟的艺术品,以及佛教发展的盛况便可以了解,河西走廊社会的繁荣,决不仅是依靠沙州、瓜州农牧业的微薄收获所支持的,当主要依靠国内外贸易。

另一方面,中原文化在光复以后的河西陇右也大放异彩,沙州人民特别喜爱中原文化上的新成就。例如在敦煌发现的文献中,有一页背面写着两首词:一首的调是《望江南》,另一首调是《菩萨蛮》,后面标的年代是咸通十年(869年)。《望江南》是唐文宗时期李德裕镇浙西时所创的调,《菩萨蛮》是唐宣宗自制的谱调。在一般情况之下,创调以后须要较长时间才能流行。然而上面两个调创作以后不过一二十年,就流行于沙州,并且沙州还有人用这两个调填词,可见河西走廊吸收中原文化的迅速,以及河西和中原文化关系的密切。

总之,张议潮领导的沙州起义,是在沙州沦陷 60 年以后出现的。通过这次起义,一方面使河西 10 余州人民脱离奴隶

生活,同时也促进了这一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四节 南诏与唐王朝的关系

一、南诏统一“六诏”

唐代居住在今云南省的乌蛮人皮逻阁以西洱河(洱海)为基地,以乌蛮奴隶主为核心,联合白蛮等其他少数民族奴隶主,建立了附属于唐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南诏国。

隋至唐初,滇池地区分布有西爨、东爨。西爨又称白蛮,因接受汉文化的影响很深,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水平很高。东爨又称乌蛮,亦受西爨的爨氏家族统治,以畜牧业为主,经济文化较为落后。西洱河地区主要居住着河蛮和乌蛮的蒙姓部落。河蛮只有五六百户,互不统属,举乌蛮蒙姓为酋长。经过长期的融合和发展,逐渐形成了六个以乌蛮奴隶主为首的政权,“夷语王为‘诏’”,所以称这个六个奴隶制政权为“六诏”。六诏的名称和属地分别是:“蒙录诏,在今云南巍山腴北部至漾濞县一带,又称样备诏;越析诏,又称磨些诏,在今宾川县;浪穹诏,在今洱源县一带;濞贓诏,在今邓川县一带;施浪诏,在今洱源与濞贓之间;蒙舍诏,在今巍山县,因在诸诏之南,又称南诏。浪穹、濞贓、施浪又总称三浪。六诏之间互有联姻,兵力大致相等,彼此间时有争斗。

南诏王姓蒙，始祖名舍龙，自哀牢（云南保山县）迁居蒙舍川（今云南西部），世为唐官吏。唐高宗、武后时，南诏首领细奴逻、逻盛、盛罗皮时遣使至唐，唐经常赐给锦袍、缯彩等物。吐蕃势力进入洱海地区后，其他五诏与河蛮部落都弃唐附吐蕃以自保，唯南诏仍与唐和好如初。为遏制吐蕃在洱海地区的发展，唐采取了支持南诏的政策。713年，唐玄宗封皮逻阁为台登郡王。737年，皮逻阁在唐支持下战胜河蛮。738年，唐封皮逻阁为云南王，赐名蒙归义。皮逻阁先灭越析，次并三浪，再灭蒙杂，统一了洱海地区。739年，皮逻阁徙居大和城（今大理县），定为国都，相继建立了各种制度，建立了南诏政权。南诏的统治中心在今云南西部大理白族自治州一带，统治范围达到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与四川南部。全盛时的疆域东到今云南东部，东南至今越南北部，西接摩伽陀（今印缅交界处），西北接吐蕃，南至女王国（今老挝川圹桑怒地区），西南接骠国（今缅甸中部），北到益州（今四川省地，以大渡河为界），东北接黔巫（今黔西地区）。

南诏建立的是一个奴隶制政权。南诏社会里基本阶级是奴隶主（王室、贵族，一般奴隶主），奴隶，还有平民和部落百姓。奴隶的一个重要来源是战俘。如史书所记，被俘的汉人郭仲翔给南诏人作奴隶，白天服苦役，晚上被囚锁起来，他曾被转卖三次。南诏的奴隶，多用于农业，称为“佃人”。

南诏在政治上有较为完整的制度，大抵仿唐制。王自称“元”，王母称“信么”或“九么”，王妃称“进武信么”。王位继承后，需经唐封。南诏王自细奴逻至舜化贞共13王，历247年，其中有10王是经过唐皇朝册封的。南诏王之下各种政府和职

官有清平官、酋望和大军将。清平官总揽国务，相当于唐的宰相。大军将与清平官等列，在中央参与议定国事，到地方治军为节度。其下有六曹（士、户、刑、兵、客、仓），设长、副、判官等。9世纪以后，由于生产的发展与经济的繁荣，南诏的政治制度也作了相应的变革，将“六曹”扩为“九爽”。“爽”是唐中央官署“省”的译音。九爽是：幕爽，管军队；琮爽，管户籍；慈爽，管礼仪；罚爽，管刑罚；劝爽，管人事；厥爽，管工程建设；万爽，管财政；引爽，管外交；禾爽管商业贸易。由于农业和畜牧业的进一步发展，又增设了三托：乞托，主马；禄托，主牛；巨托，主托廩。这些部门的首脑都由清平官、酋望或大军将兼任。九爽之上设有督爽总领，类似唐中央尚书省长官。

南诏政权对其管内各族人民实行军事统治。地方各府的主将同时也是地方行政长官和奴隶生产的总监督者。主、副将外有陀酋、陀西，陀酋，相当于内地管记，陀西，相当于阍官。对于自由民则实行军事编组，凡百家有一总佐，千家有一治民官，万家有都督一人。每个壮丁都要服兵役，称为“乡兵”。其中挑出勇敢善战的称“罗苴子”，从罗苴子中再挑选出“负排”，充当南诏王和大军将的卫队。每年农闲时乡兵要集中操练，根据所居远近分为四军，各守一方。每军设一将管500—1000人，四军置一军将统领。集训中试枪、剑、甲、胄、腰刀等，有一项不符合要求就要受惩罚。养马的丁壮定为“马军”。在所有城镇村邑设训练场地，立80尺高木柱，名为颇柱，用来训练骑兵。战时，下文书至村邑治民官，征集壮丁入伍。每人必须自带武器，有马的人为骑兵，还要自带粮米一斗五升和干鱼，必须按时报到，违者依军法惩处。无后勤供应，出境后靠掠夺粮

食、牲畜作军需。战斗时，派官在军前监视，身体前部负伤给医治，可休养，背部受伤、后退者处死。

南诏的刑大致分为三等：杖、徙和处死。杖刑自 50 直至杖死；徙刑则被押往“丽水瘴地”（伊洛瓦底江以西）；死刑可以用金钱赎死，改为徙刑。

二、南诏与唐的和战

南诏在唐的扶持之下建国立君。并接受了唐的册封，确立了对唐的藩属关系。这反映了南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内地汉族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为求得各方面的进一步发展，继续保持与唐的友好关系，取得唐的支持，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更为广泛的交流，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这样对双方都有益。南诏的统治者一方面有愿意保持和发展这种关系。但另一方面，立国后的南诏奴隶主政权要向外扩张自己的势力，又必然要侵犯唐的利益，南诏统治者又有力图摆脱唐的控制和干涉的一方面。除建国初期的友好关系外，南诏与唐的关系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时期：（1）750—779 年，南诏与唐兵戎相见，附吐蕃反唐；（2）780—828 年，南诏与唐重归于好，经济、文化获得迅猛发展时期；（3）829—902 年，以和为主，和战交替时期。

南诏建国后，统治者急于统一西爨统治的滇池地区，唐则不愿南诏统治势力向东发展到滇池地区，因而产生矛盾，但当时南诏无意与唐公开决裂，希望继续得到唐的支持，以抵御吐蕃的威胁。而唐中央执政杨国忠、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云南

郡太守张虔陀等人，不是采取缓和、解决矛盾的政策、措施，而是运用一系列激化矛盾的办法，并积极调集力量，准备用兵征服南诏，因而酿成了751年南诏与唐的战争。750年阁逻凤在屡遭张虔陀侮辱，并得知鲜于仲通已率军8万分三路进军云南、讨伐南诏的形势下，出兵攻下姚州，杀死张虔陀。751年鲜于仲通率军进抵曲靖，阁罗凤即遣使前往谢罪请和，表示愿赔偿一切损失，请求允许自新。而且恳切告诫说，吐蕃赞普大军屯驻浪穹（今云南洱源县），正虎视眈眈。“今吐蕃大军压境，若不许我，我将归命吐蕃，云南非唐有也”（《资治通鉴》卷216，天宝十载）。希望鲜于仲通能“居存见亡，在得思失”。但鲜于仲通自恃兵多，一意孤行，囚禁来使，进逼洱海。南诏“又切陈丹款，至于再三”。鲜于仲通还是不许，继续进军。于是阁逻凤一面召集卒伍，准备迎战，一面归附吐蕃，请求支援。吐蕃封阁逻凤为赞普钟，号东帝，给金印。在南诏与吐蕃联军合击下，唐军大败。而杨国忠等却谎称战胜，“仍叙其战功”，并积极准备新的进攻。754年，唐又命李宓率10万大军再征南诏。士兵不服水土，未及接战因瘴疫及饿死者就已过大半，南诏乘机追杀，唐军几乎全军覆没。南诏自己说：“我自古及今，为汉（指唐）不侵不叛之臣（《南诏德化碑》）”，是为唐节度使“背好贪功”逼反的。唐政治家李泌也指出，“云南自汉以来臣属中国（指内地皇朝），杨国忠无故扰之使叛”。这是天宝年间唐与南诏发生两次战争的主要原因。战争以唐惨败告终。唐损伤军队近20万，而且失去了对南诏的宗主国地位。战后不久，唐与吐蕃在河陇和四川地区展开了激烈争夺。阁逻凤一方面追随吐蕃派兵参预反唐争夺，另一方面以主要精力积极从事统一

云南的活动。

肃宗至德元年(756年),南诏攻入嵩州(今四川西昌)境内,掳获了大量人口。其中有一个西泸令郑回,胸中颇有才学,南诏王阁罗凤便请他做儿子凤迦异的老师。后来凤迦异早死,子异牟寻继祖父即位,又请郑回教其子弟,而且任命他做清平官(宰相)。南诏没有本族文字,学的是汉族传统文化,郑回颇起了倡导的作用。他们学的当然是儒家经籍,然而不管是哪一家,在当时都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文化,所以郑回起的作用,是促进加强中原与边疆联系的积极作用。

被俘的人口,以百工技巧为最多。南诏是奴隶制国家,非常需要具有较高的工农业生产技术的唐人。俘虏的身份虽是奴隶,他们所起的促进云南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却是巨大的。

南诏联蕃反唐,吐蕃时常要征用他的兵力财力,异牟寻甚以为苦。郑回乘机劝他联唐。恰好唐西川节度使韦皋想拆散吐蕃与南诏的联盟,孤立吐蕃,也努力争取与南诏和好。德宗贞元十年(794年),异牟寻与唐恢复和好关系,在点苍山会盟。此后南诏的贵族子弟纷纷到成都求学,唐文化对南诏的影响更加深了。南诏与唐联合,反击吐蕃,取得很大的胜利。南诏从此摆脱了吐蕃的控制。

9世纪初,南诏权臣蒙嵯巔专政。大和三年(829年),蒙嵯巔破坏盟好,乘唐无备,突袭成都,破外郭,掳去人口数万和大量财富。成都是手工业非常发达的地方,俘虏把刺绣纺织的技巧带往云南,从此南诏的手工技巧便与四川相仿了。但是这次掠夺战争造成的灾难是巨大的,被俘的人口跳水自杀的就有

几千人，数百里间，人畜都被抢光。

以后南诏贵族时而侵扰唐境，时而遣使通好。唐朝防范严密时便太平无事，松懈无备时便会受到攻击。大中十三年（859年），宣宗死，唐使者到南诏告哀。恰好丰祐亦死，嗣君酋龙，借口唐不吊丰祐之丧，与唐决裂，展开了大规模的冲突。以后的10多年中，南诏军陷播州（今贵州遵义），破邕州（今广西南宁），围成都，使唐朝不得不在西南屯驻重兵，消耗了很大的力量。从徐州运戍桂林的士兵，苦于兵役，愤而自行北归，发动起义，竟成为唐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南诏的进攻消耗了唐朝的力量，也消耗了南诏本身的力量，妨碍了经济文化的交流。咸通十至十一年（869—870年），酋龙大举攻蜀，男子15岁以上悉数从军，结果大败而归，引起人民极度的怨恨。乾符元至二年（874—875年），再攻西川，也没有得志。酋龙终于被迫停止战争，要求与唐和好。

南诏统治阶级在长期受到唐朝先进经济的影响下，逐渐采用封建的剥削办法，鼓励奴隶垦荒，征收租赋，奴隶逐渐转化为农奴。贵族们乘机占有土地和农奴，成为封建领主。

三、南诏对中原文化的吸收

在南诏统治区内，居住着许多部族和部落，各部族和部落之间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由于长期以来受内地汉族先进经济制度的影响，滇东的“西爨白蛮”生产力发展水平很高，经济、文化比较先进，与内地汉族极为接近。“东爨乌蛮”以畜牧业为主，比较落后，而处在边远地区和高寒山区的部落，如居

住在今云南德宏地区的“寻传蛮”、“裸蛮”等就更为落后，还处在原始社会阶段。但就南诏的社会经济来说，奴隶占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南诏统治者在其统治中心内实行奴隶制统治，对边远地区和高寒山区的各部落，则基本上保留着原有的社会组织 and 经济制度，只有征收其贡赋。

南诏政权在其统治区内实行了大规模的强力移民政策。在征服“西爨”后，阁逻凤将约 20 万户“白蛮”强行迁到滇西“永昌城”（今云南保山），随后又将约 20 万户“乌蛮”迁至西爨故地。794 年南诏统治者又迁弄栋白蛮于滇西。同时又将“河蛮”迁往“云南东北”及“拓东”。此外，又将滇西的大批“汉裳”、“施蛮”、“顺蛮”、“扑子蛮”等先后迁到滇池区域。被迁的人们进入新区后，被组织到奴隶制的生产之中，其中不少人沦为南诏政权的生 产 奴 隶——佃 人。南诏政权实行的大规模人口迁徙，直接目的是为了强化其统治，但生产比较先进的居民与比较落后的居民的交流，在客观上却起到了促进南诏经济、文化发展的作用。南诏统治中心区域的农业、手工业都很发达，商业也很繁盛，畜牧区的牧业亦相当发达。

在农业生产上，南诏统治者将被迁居民的土地收归南诏政权所有。把土地划为若干区域，每一区域“疆畛连延或三十里”，由所在城镇派田官管理，田官又指派监守蛮监督催促“佃人”进行生产，收获后，“官蛮据佃人家口数目支給禾稻”，其余全归奴隶主政权所有。南诏政权对奴隶主贵族、官员等施行“授田制度”，上官授田四十双，相当唐的二顷；上户授给三十双，相当唐一顷五十亩；中户、下户授给数量相应减少。这些土地自然也是强迫奴隶进行耕种。南诏统治者对自由民采取征

收赋税政策，“不徭役，人岁输米二斗”。但战时要自带武器、战马、给养，服兵役。

南诏很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如工程浩大的苍山高河蓄水及大理地区水利灌溉系统工程，可灌田数万顷。还修治了许多高山梯田。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兴建，促进了农业园艺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正如《南诏德化碑》所述，“厄塞流潦，高原为稻黍之田；疏决陂池，下隰树园林之业”。农作物除粳稻、大麦外，还有小麦、麻、豆、黍、稷等，另外还有各种蔬果。据樊绰《蛮书》记：曲靖州以南，滇池以西，主要的农业是种水稻，其他农作物如麻、豆、黍、稷，只在房前屋后的空地上种一点。水稻每年一熟，7月收获稻谷，到10—11月之交就在稻田地里种上大麦，2—3月时大麦就成熟了，收割后，再种上粳稻。小麦种到陵冈上，11月下旬已抽节，与大麦同时收割。耕田用三尺犁，架在牛颈上的格有1丈多长，两牛相距7—8尺宽，一“佃人”在前牵牛，一“佃人”持按犁辕，一“佃人”秉耒。种治的梯田非常精整良好。都有城镇蛮将派去的蛮官监守催促。浇田都用源泉水，遇有天旱，也能丰收。收割完毕，官蛮根据“佃人”的家中人数，留给一定数量的禾稻，其余全部归官府。同书还说，“南俗务田农菜圃”。从这些记载可知南诏的农业生产技术已相当高超了。

南诏的统治者将饲养柘蚕的柘林和主要矿产资源如食盐等都收为己有，由手工业奴隶生产。南诏的手工业如纺织、采矿、冶金铸造、采制盐茶、酿酒等都初具规模。如养蚕业，“二月初蚕已生，三月中茧出”，“为纺丝缕”“织为锦及绢”，“锦纹颇有密致奇采”。足见纺织技术相当进步。南诏的铸剑技术很高。“锻生铁，取并汁”，经多次“烹炼”，铸成后用犀角装头，并以黄

金、碧玉作装饰。浪人诏铸的剑更为精致锐利,其它部落都比不上,被称为“浪剑”。872年南诏建的铁柱,又名天尊柱,至今还耸立在云南省弥渡县城西南的铁柱庙中。柱高3.30米,圆周1.05米,柱身分五段衔接铸成。又云南大理崇圣寺曾有871年南诏所铸铜钟一口,钟高丈余,钟面上层铸有汉字佛经,下层铸各天王像。可见南诏的冶金铸造技艺的高超。南诏的畜牧业也很发达,设有专门管理牧业的官员群牧大使,后期还设有专管马牛的官员。据《蛮书》记载,马产在越赕东面一带,可日行数百里。藤充、申赕、次赕、滇池都产马,东爨乌蛮“土多牛马,”磨蛮“土多牛羊”,这些马、牛、羊大都散于林谷牧放,“牛马遍野”。南诏是以自然经济为主的,以缯帛及贝为货币进行贸易。贝大如指,16枚为一觅。立国后商业贸易亦有一定发展,不只限于内部管辖地区,与唐和吐蕃等亦有贸易往来。南诏还设有专管商业贸易的官员,称禾爽。

由于生产的发展,南诏4世纪初叶开始向外发动掠夺奴隶的战争,从成都、广西、黔中、骠国、弥诺国等地先后俘虏人口数十万。掠来的汉族百工伎艺掌握着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南诏通行汉文,流传至今的《南诏德化碑》、《崇圣封钟铭》、《石钟山石窟题记》、《南诏铁柱铭》、《洞云歌》等诗被誉为佳作,收入《全唐诗》中。南诏民间吹四管飘笙,《南诏奉圣乐》被列为唐宫廷音乐十四部之一。南诏的名舞《狮子舞》也传入唐内地。南诏的建筑和唐内地基本相同,剑川石钟山石窟的石刻图像中,有南诏的木结构建筑图像。有柱、梁和重檐出跳的斗檐、飞檐,以及鸳鸯交手和斗子蜀柱等结构,是唐代常见的

建筑风格。南诏修建了“方五里高百丈”的五华楼，“基方七里”的崇圣寺，更有流传至今的大理三塔，崇圣寺三塔中的千寻塔高 58 米，密檐式，分 16 级，和西安现存的小雁塔相似，反映了南诏高超的建筑技艺。剑川石钟山石窟造像、沙登村的石佛像，佛头都是螺状高髻，面部丰满，具有盛唐风格。石钟山石窟第一窟雕刻南诏王异牟寻等人物，二窟雕南诏王阁逻凤等 16 人，有大臣、侍从、武士等。场面宏大、布局合理、人物形象生动、姿态各异，器具、服饰雕刻细致入微，既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又可见受汉文化的强烈影响。王奉宗 899 年（南诏舜化贞中兴二年，唐昭宗光化二年）所绘《南诏中兴国史画卷》，把南诏建国的神话传说用连续短画的形式描绘出来，绘法与敦煌长卷基本相同。南诏有自己的历法，以十二月二十六日为星回节。

南诏早期信仰由五斗米教发展而来的天师道。794 年，南诏王异牟寻等与唐朝的西川节度巡官崔佐时会盟，请天、地、水三官与盟为监证，盟誓的誓词写法和作书三本，类似天师道的请祷之法。《蛮书》记载了云南的南北二路兼及诸族的信仰。北路的东爨乌蛮大部落有大鬼主，100—200 家小部落也有小鬼主，一切信使鬼巫。南路的勿邓部落亦有大鬼主，这些大小鬼主都是部落首领兼宗教领袖，与天师道的组织颇为符合。唐代晚期盛行佛教，最初传入的是“婆罗门”和瑜伽密宗，密宗僧人称“阿闍黎”，因而又名“阿闍黎（阿叱力）教。”

南诏的食物以稻米为主，也用大麦作麸（炒面）。还将鱼切成一寸长的细丝，拌上胡瓜和椒豉（又名越椒，即茱萸），名为鹅阙。据《蛮书》记载，东爨乌蛮、长辉蛮，男女都披牛羊皮为

衣；施蛮跣足挂羊皮；磨蛮亦披羊皮为衣。南诏建国后经济得到发展，衣着上有所改进。南诏王和清平官等人的礼服都是锦绣，其上缀有虎皮。官员们的官服如唐制，以绛紫为贵。得紫后再有功加锦；只有功加披虎皮。功小的人只胸前得披，大一等的前后身都披虎皮，再大一等才可连衣袖也用虎皮。自曹长以降都系金佉苴（腰带）。《蛮书·蛮夷风俗》又说：“丈夫一切披毡”，其余衣服与唐内地大体相同。子弟及四军罗且以下并披毡与皮。妇女不施粉黛，富贵人家穿绫锦做的衣裙，上披锦一幅，编两股辫挽成鬟髻，耳上带珠贝、瑟瑟琥珀等装饰品。这是指自由民以上阶级的装束，至于奴隶，凡是织出的丝绫、锦绢，“蛮及家口悉不许为衣服”。常是披毡用缯帛包裹其髻。“庶贱男女”，只准许披“制如衾被”那样的极粗的绢。南诏有父子连名的习俗，即子名的第一个字是父名的最末一个字，如皮逻阁之子名为阁逻风。

南诏妇女在未嫁以前，或寡妇人与人乱，不予禁止，但结婚后如有奸情，格杀奸夫，女方也要处死。如是强家富室，可用资财赎命，但只能免死罪，须迁徙到丽水瘴地。

第五节 靺鞨族与渤海国

唐初，在今东北地区各族分布的情况大致如下：高丽据有辽东、辽南和吉林省通化地区、粟末靺鞨和白山靺鞨生活在高丽的东部和北部，靺鞨的伯咄部、拂涅部、安车骨部、号室部和

黑水部则分布在松花江以北、牡丹江流域，俄罗斯沿海州以及黑龙江中下游一带；契丹各部活动在辽河上游一带；契丹的西面是奚、霫；室韦分布在西北部额尔古纳河、石勒喀河、嫩江、黑龙江上游及中游部分地区。

642年，高丽泉盖苏文杀其王，自称莫离支，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唐太宗遂于644年乘机进攻高丽，遭到坚决抵抗，被迫退兵。666年，唐高宗李治派李勣和薛仁贵再次进攻高丽。668年终于灭掉了高丽王朝。唐在高丽辖地区置都督府9个，州42个，县100个，并设安东都护府统领。

630年，唐又灭掉了东突厥，使契丹、奚摆脱了突厥的控制，皆附属于唐。唐于契丹地置松漠都督府，奚地置饶乐都督府册封其本族首领为都督，并以营州为统治东北的中心，设营州都督统治东北各族。

唐营州都督赵文翔对东北的少数民族进行残酷统治，视其酋长如奴仆，任意凌辱，激起了以契丹上层人物李尽忠、孙万荣为首的各族人民的反抗。靺鞨人大祚荣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建立了地方割据政权。后来又利用契丹和突厥联兵抗唐，隔断了其他各族与唐直接联系的通道，巩固和发展了自己的势力。

一、渤海的兴起

渤海是唐代以粟末靺鞨人为主体的，在我国东北建立起来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名，同时也是族名。靺鞨在西汉前称为肃慎，东汉时称挹娄，魏晋时肃慎与挹娄两个名称并用，南北朝

时称为勿吉。隋时勿吉虽改称靺鞨，但其七部的名称和区划，却与南北朝时完全相同。

隋开皇年间粟末靺鞨厥稽部渠帅突地稽为率其所属八部内附。隋文帝杨坚封突地稽右光禄大夫，处居柳城。唐初，突地稽遣使朝唐，唐以其部落置燕州，任命突地稽为总管。后举族内徙，突地稽以军功封蓍国公、右卫将军。其子李谨行为唐右卫大将军，封燕国公。

唐灭高丽后，一些粟末靺鞨和白山靺鞨人被移居至营州（今辽宁省朝阳）一带。这部份人，后来参加了李尽忠领导的反唐起义。起义失败后，武则天没有追究，并封他们的首领乞四比羽为许国公、乞乞仲象为震国公，但乞四比羽没有接受。这部分人乘唐的力量受到削弱而挹娄故地又空虚之机，离开营州，东渡辽水（辽河），奔向挹娄故地。武则天派遣大将李楷固率军追击。乞四比羽被击杀，乞乞仲象在途中死去，队伍由乞乞仲象之子大祚荣率领继续前进。大祚荣率靺鞨和高丽等组成的军队在天门岭大败唐军。此时正值契丹、奚降了突厥，与突厥联兵抗唐，阻塞了唐内地通往靺鞨的通道，使唐无法对靺鞨继续用兵，大祚荣率众到了太白山（长白山）东北奥娄河（牡丹江）上游一带的挹娄故地。698年，大祚荣沿袭了唐封乞乞仲象的震国公爵号，自称震（一作振）国王，在东牟山下建都城“旧国”（今吉林省敦化县城附近敖东城），建立了以靺鞨人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当时仍然称靺鞨。

713年，大祚荣归顺了唐皇朝，接受了唐册封的忽汗州都督、渤海郡王的官爵，才去掉了靺鞨的族名，专称渤海。

渤海自698年建国至926年灭亡，共传15王，历229年，

几乎与唐皇朝相始终。

渤海最初以旧国为中心,以后又以上京龙泉府(黑龙江省宁安县渤海镇)——东京龙原府(吉林省珲春县八连城)——中京显德府(吉林省和龙县西古城)为中心,不断向外扩展势力,形成了渤海强盛时的疆域。包括现在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大部分,辽宁省的小部分,俄罗斯滨海地区,朝鲜的咸镜南北两道、两江道、慈江道和安北道的一部分。

渤海王(713—761 为郡王,762 年后为国王),对唐来说是唐皇册封的爵位,渤海国是唐的忽汗州,国王同时是由唐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即忽汗州都督。在渤海内部,国王是最高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全国土地实行王有制度,王族、右姓望族和一般贵族构成了统治阶级,处于各种封建依附状态下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还有毫无人身自由的奴婢,构成了被统治阶级。

渤海建立初期,政治制度很不完备,统治机构比较简单,大钦茂(737—793 年)时,学习仿照唐中央和地方建制,建立和逐步完善了各种政治制度。

渤海仿效唐皇朝的政治组织和政治制度,在中央建立了三省六部一台七寺一署一院一监一局官僚体制和军事组织,即政堂、中台、宣诏三省,忠、仁、义、礼、智、信六部,中正台,殿中、宗属、太常、司宾、大农、司藏、司膳七寺,兵器署,文籍院,胄子监,巷伯局和左、右猛贲卫等 10 卫。每一机构各有僚属分掌其职。各机构的职掌与唐中央的相应机构大体相同。

渤海的地方也仿照唐的地方组织,在其内部实行京府辖州,州下设县的三级管理体制。全国分 5 京(京同时也是府)、

15 府、62 州，之外还有屯、铜、涑三个直属中央的独奏州。府置都督，州、县分别设刺史和县丞作为最高行政长官。

渤海还仿效唐朝在其内部建立了品阶勋爵章服制度。这些制度大体上和唐相同，只是根据渤海的具体情况，有些简化和变通。

在军事上除中央 10 卫之处，地方上也有仿效唐府兵制的地方武装。军队的总数初期约有 10 万人，最盛时可能达到 20 万人。

二、渤海的经济

从主导方面来看，渤海是一个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农业、手工业比较发达的早期封建社会。农业是其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果树、园艺也有相应的发展。从渤海遗址中出土了铍、铲、锄等大批铁制农业生产工具可知铁器在农业生产中已被广泛应用。其中铁铍的形体很大，长达 36 厘米，要用畜力牵引，可知渤海在农业上是使用畜耕的。渤海种植的主要作物品种有粟、麦、稷、豆、稻等。栅城（今珲春）以豆制品豆豉而闻名，卢城（今和龙一带）产的稻米、丸都产的李、乐游产的梨都是渤海的名贵产品。

渤海的纺织、陶瓷、矿冶、造船等手工业都较为发达。纺织业主要生产麻和柞蚕丝织品，麻布有粗细二种。显州（和龙一带）是麻布的主要产区，沃州（朝鲜咸镜南道）的绵，龙州（宁安）的绸很有名。但渤海自己生产的丝织品数量有限，所以还要由唐内地和日本输入。

在黑龙江省宁安杏山乡发现的渤海窑址在结构上与中原的同类窑址基本相同,生产的砖瓦等质地坚硬细密,瓦当纹样、种类繁多,瓦上还大都刻有大字,各种建筑构件与唐内地的产品在质量上没有多大区别。生活用的陶器种类更为繁多,中、晚期在技艺上有很大改进。在渤海遗址还发现有釉陶制品,生活用品有盘、盆、带耳罐、砚台等。釉陶的陶质坚硬,白胎,表面施单色,双色或三色陶釉。釉色有黄、褐、红、绿、紫等,被称为“渤海三彩”。还发现有绿釉瓦,鸱尾等建筑构件。渤海的制瓷业也有一定发展。据唐代苏鹗《杜阳杂编》记载,841年渤海向唐朝廷进贡的紫瓷罐等。在渤海瓷器中发现的弱釉瓷瓶颇有代表性。瓷瓶高24.5厘米,形如丝瓜,白胎,褐色绞釉,配有双耳鎏金同盖,瓶底有墨书的渤海“咸和”年款。

渤海的矿冶业有铁、铜、金银等,尤其长于冶铁。位城(朝鲜咸镜北道茂山一带)是著名的产铁地区。在技艺上已熟练地掌握了铸造锻冶等多种技术,铁不仅应用于农业和制造各种兵器,而且已深入到手工业、交通、建筑等各行各业和日常生产的各个领域。

渤海产的铜,不只用于内部制造生活用具、佛像和装饰品,而且还用以与唐贸易。

史书记载渤海曾向唐进献金银佛像,遗址中又出土了金制腰带、钏、耳珰、饰物、银钗和各种鎏金器物,可见渤海的金银采炼业也有一定发展。

渤海频繁地从水路至唐及去日本,使团人数少则数十,多至上千,庞大的船队,需要有较为发达的造船业提供船只。可见造船业在当时已颇具规模。

畜牧、渔猎业在渤海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颇为重要的地位。猪和马的饲养遍及全境，而以率宾府（今绥芬河流域）的马，郑颉府（今黑龙江阿地一带）的猪最为有名。牛羊的饲养也很普遍。渤海的兔、鹿、貂、豹、熊、银鼠、青鼠等是主要狩猎物，其中以长白山的兔、扶余府（今农安一带）的鹿尤为著名。水产品以湄沱湖（今兴凯湖）的鲫鱼，忽汗海（今镜泊湖）的鲤鱼享有盛名。

渤海的商业贸易亦有相应的发展，除内部的商业贸易外，还同唐内地和日本有经常的商业贸易往来。

三、渤海与唐的关系

渤海国既是以粟末靺鞨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又是唐在北东地区建立的一个政治军事机构——忽汗州都督府，又称渤海都督府。它与唐朝廷既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又是宗主与藩属关系。一方面，其首领在内部按本族的传统方式进行统治，唐朝廷不加干涉；另一方面，渤海又必须接受所在边州（先是平卢节度，后改由平卢淄青节度）的统领，忠于唐皇朝。唐还向渤海直接派驻“长史”。“长史”是中央政府派给渤海王和王储（副王）的助手，直接参预对这一地区的统治管理。从高王大祚荣接受唐册封后，这种关系就建立起来了，始终没有改变。渤海与唐的关系，除在武王大武艺时有过暂短的不睦外，一直保持着非常友好、非常亲密的关系，正如唐代诗人概括的那样：“疆里虽重海，车书本一家”。

在政治上渤海接受唐的册封和向唐朝贡。713年，唐派郎

将摄鸿胪卿崔忻册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其后，每当老王去世，新王嗣立时，后继者都及时遣使前往唐朝廷“告哀”并请求册封，而唐也都要派使携诏书至渤海进行吊祭和册立。在唐册前嗣立者只能是“权话国务”，只有经过唐朝廷的诏册之后，才算取得正式合法地位。在渤海的 15 王中，正式接受唐朝廷册封官爵的有 10 人。其他诸王或因失于记载，或因在位时间过短，未及诏册，而末王大鹘鹘即位时，唐朝临近灭亡，已经无暇顾及。

渤海与唐之间的使节往来非常频繁。自渤海建立起就向唐朝廷“职贡不绝”，见于记载的在渤海存在期间朝唐有 132 次；朝梁 5 次；朝后唐 6 次。渤海朝唐主要任务是朝贡、贺正旦、派王族入侍宿卫等。唐使则主要是册封、吊祭、抚慰等。渤海和唐的一些地方政府如幽州、淄青、平卢等，也有密切的交往。833 年唐安次县尉张建章就受幽州节度使府的派遣，以瀛州司马的职衔去渤海回访答聘。他在渤海受到渤海王大彝震的隆重迎送和热情款待。回来后，写成《渤海记》书，书中对渤海的风俗、宫殿、官品等情况，有详尽的记载。原书虽已失传，但一些内容，如渤海诸王的谥号、年号、地理、职官、物产等为《新唐书·北狄传·渤海》所采入。

渤海与唐的经济往来是多方面的，其中以朝贡形式同唐朝廷进行的贸易是一种主要形式。渤海主要贡献其土特产品，据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统计有兽类、禽类、水族、药类、金属类等 42 种，唐以赏赐形式回赠的主要是农产品、纺织品和金银器皿。此外，与唐也有地方和民间的经济往来，渤海的马和熟铜在地方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唐以登州（山东蓬莱）、青州

(山东益都)作为和渤海交往的重要口岸,还在青州城专门设立了渤海馆。

除与唐内地有非常密切的经济交往外,渤海与临近的诸族如契丹、室韦、突厥、回纥、新罗和隔洋相望的日本,也有不同程度的经济交流。

渤海非常重视学习唐的先进文化,其王多次派遣诸生至唐京师太学,攻读儒家经典,学习古今制度,还派人至唐求写《唐礼》、《三国志》、《晋书》、《十六国春秋》等。在长安的渤海学生还参加唐朝廷的科举考试,曾任渤海国相的乌炤度和其子曾先后考中进士。唐朝廷派往渤海的使臣,同时也是中原文化的传播者。经过热心的传授和学习,使唐灿烂的封建文化深入到渤海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盛唐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某些区域性民族文化特点的渤海文化。

渤海对外交往有五条主要通道,就是鸭绿朝贡道、长岭营州道、扶余契丹道、南海新罗道、龙原日本道,前三条均可通往唐内地。

四、渤海的文化

渤海的统治阶级十分重视汲取唐内地先进文化,输入宣传封建伦理道德的儒家思想。渤海王室尊孔崇儒,将儒家的政治思想作为经邦治国、立政施教的根本,忠、孝、仁、义、礼、智、信成为指导人们思想和行动的准则,儒家推崇的明君贤相成为渤海人学习的楷模。渤海中央官府机构和官吏、士人个人的命名,都直接取自儒家经典。

渤海十分重要教育事业,一方面积极选派学生到唐内地学习,学成归来后委以重任;另一方面在国内设文籍院收储图书,建国子监就地培养统治人才。李居正、高元固、乌炤度等人都是从唐内地学成后,归国任重要职务的。清人张贲《白云集》中记载,在渤海上京遗址曾发现石质残碑,刻有“下瞰台城”,“儒生盛于东观”等字,或许是立在国子监前的石碑。

萨满教是靺鞨人固有的原始宗教,随着渤海社会的逐步封建化和佛教的深入传播,其影响也逐渐缩小,在上京及其它经济发达地区基本上丧失了原有的吸引力。但在经济不够发达的边远地区,特别是黑水靺鞨中,还保持着原来的统治地位。

早在建国前,佛教就已在部分靺鞨人中流传,建国后,又为渤海上层统治阶级所崇信。所以,713年渤海王子一入长安,就请求“入寺礼拜”。渤海建国又正值武则天大力崇尚佛教之时,在唐内地的影响下,佛教在渤海成为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教派。渤海境内大修佛寺、佛塔,仅上京城遗址发现的佛寺就有9座以上,发现的多种质料制作的大小佛像不下1000件。渤海第三代王大钦茂尊号的“金轮圣法”,他的第四女贞孝公主葬用塔墓都表现渤海王室是笃信佛教的。渤海的官员也大都信仰佛教,出使日本,还要到日本的寺院礼佛。日本的《经国集》中就收有领客使安倍吉人《闻渤海客礼佛感而赋之》的诗作。渤海的佛教僧侣不仅从事佛事活动,还参预政治和外交活动,如释仁贞、释贞素等就曾作为使团的成员,出访日本。可见佛教在渤海很是兴盛,僧侣已成为社会的重要阶层。

汉字是渤海的通用文字。目前发现的二个公主墓志和砖

瓦上的文字都是汉字写成,可见汉字已为渤海的官方和民间所习用。从中国和日本古文献中保存下来的渤海贺正表、国书、笺牒和考古发现的两个墓志看,渤海的文学也很发达。传世的文章都是用唐初流行的骈体文写成,文笔流畅,对仗工整,与唐内地同类文章基本相同,两个墓志的文字也与唐内地的金石文字的风格极为一致。渤海的诗歌也有较高的成就。晚唐诗人温庭筠赠渤海王子诗中有“盛勋归旧国,佳句在中华”之句,可见这位王子很会作诗。杨泰师、王孝廉、释仁贞、释贞素等都有诗作传世。裴迥、裴璆父子,不只在国内颇有诗名,在日本更被赞为诗界“领袖”。

渤海的建筑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无论是城市,还是宫殿、官署、寺庙的建筑都很得体。如上京城有外郭城、宫城,“皇城”及坊市,是一座经过精心设计而建筑的封闭城市,整个城市的布局,与唐长安城极为相似。宫殿、官署、庙宇等建筑,也多是仿效唐内地的同类建筑。现存的渤海灵光塔是一座方形五层砖塔,通高 13 米,与陕西长安县玄奘塔也极为相似。

渤海的绘画在文献上虽有零星记载,但作品无存,无从考查。1980 年于贞孝公主墓中出土了壁画,才使人们对之有了具体的了解。墓室四壁绘有墓主人生前的侍从、门卫、乐伎等 12 个人物。人物体态丰颐,着色浓艳,线条遒劲。人物的形象、服饰等与唐永泰公主墓所绘壁画极为相似,所执器物也基本一样。

渤海的雕刻也有较大的成就,以石雕最为突出。现存于上京遗址的石灯幢颇具代表性。灯幢用玄武岩雕琢迭筑而成。造形古朴奇特、刀法娴熟、雕工精细、是不可多得的石雕珍品。贞

惠公主墓出土的石狮，造型逼真，古朴洗练，从造型和刀法上看和陕西省唐乾陵的石狮及为相似，表现出浓郁的盛唐风格。

渤海人能歌善舞，“渤海乐”在国内颇负盛名，流传久远，直到金代还在流行。而且传到了日本，对日本的音乐发展也有一定影响。贞孝公主墓壁画上绘有怀抱乐器的艺人，是渤海乐舞发展情况的形象资料。渤海盛行一种“踏铎”歌舞，岁时聚会作乐，以能歌善舞的数人作前导，其后士女相随，更相唱和，翩翩起舞。渤海亡后，这种集体歌舞还在其遗民中广为流行。

唐内地盛行的打马球（波罗球）在渤海也很流行。渤海访日本使团，在日本曾与日本的官员进行比赛。日本的《经国集》中收有记述这场比赛的诗歌。《辽史·萧孝忠传》中记有他反对禁止渤海人打马球的史料，可知打马球在渤海也很普及。

据《金史·世宗纪》记载，渤海旧俗对婚姻多不太讲求礼仪，往往是“先攘窃以奔”。但婚后却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松漠纪闻》记，渤海社会上没有娼妓，并绝对禁止男人有侧室、小妇或侍婢。

渤海的墓葬分土坑墓、石圪墓、石棺墓、石室墓、砖室石顶墓等类型，墓内皆有木制葬具，地面都有封土。一般墓葬，墓室平面为长方形，用石块垒砌四壁和盖顶。大型墓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构成，用石板或青砖砌成墓壁，再用石板盖顶。除一次葬外，还常在墓内一隅葬有数个或10数个二次葬的人骨。据《旧唐书·北狄传·靺鞨》记载，靺鞨旧俗没有棺敛之具，穿地埋葬，死者“以身衬土”，杀所乘马于尸前为祭。受中原汉族和高丽的影响，渤海在葬俗上已有很大改变。

渤海不只本身全面接受了唐内地先进的文化,而且还是向日本传播的使者。如渤海访日的大使乌孝慎就将唐的《长庆宣明历》传入日本,并为日本采用。李居正大使将“东胜咒”经文,释贞素将“新经二部”带进了日本。

五、渤海的灭亡

从9世纪后半叶起唐皇朝开始走上崩溃的道路,907年朱全忠(朱温)灭唐建梁,开始了五代十国时期。中原依然是战乱频繁,既无暇对渤海进行控制,也无支持和保护渤海的实力。与此同时渤海本身也开始逐渐走向衰落。大兴土木,修建城市,宫殿、官署、寺庙等虚耗了人力、物力、财力,贵族官僚集团处处效仿唐皇朝的统治者日益腐化,不恤民力,激起了人民普遍的不满,同时,民族矛盾也尖锐起来了。受渤海控制的黑水部,从815年开始恢复了向唐皇朝的直接朝贡。越喜部、铁利部和指涅部等也先后恢复了对唐皇朝的直接朝贡。渤海逐渐失去了对这些部落或地区的控制。

这一时期契丹却不断发展壮大,10世纪初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契丹诸部,并对邻近各部和中原地区发动了一系列战争,在较短的时间里,就占领了东北地区西部、西北部和内蒙大部分地区,从西南、正西和西北三个方面形成了对渤海的围攻之势。耶律阿保机不但要并吞渤海,而且要挥师南下、问鼎中原,君临全中国,做“为群方之父母”,东征渤海也是为了解除南下的后顾之忧。如《契丹国志》所记:契丹太祖耶律阿保机谋南征,“恐渤海掎其后”,遂先举兵击并渤海。契丹兴起之初,渤海

尚有一定实力,可以与之周旋,随着契丹的日益强大,而渤海国力却日益削弱,军队数量虽然多达数十万,但将帅无能,士兵的战斗力的比契丹弱。924年,渤海主动出击攻杀了契丹的辽州刺史张秀实,不但未能摆脱困境,反而处于更加被动的境地。

925年冬,耶律阿保机以“渤海世仇未雪”为藉口,举兵伐渤海,志在必得。皇后述律氏、皇太子倍、次子德光以及汉人韩知古、康默记、韩延徽等都随军出征。十二月,兵围扶余府(吉林农安境内)。926年,攻占府城,杀渤海守将。又命惕隐安端、北府宰相萧阿古只率万骑为先锋,途中打败渤海老相带领的3万军队。皇太子倍、次子德光等率军包围渤海首都忽汗城,渤海末王大谟迺等被迫“由降复叛”。契丹军队攻陷上京,大谟迺及族属被押至契丹的上京临潢府,安边等四府及诸道亦相继投降,渤海国被契丹灭亡。

耶律阿保机改渤海为东丹国(东契丹之意),忽汗城为天福城,以皇太子耶律倍为人皇王,统治渤海故地。为缓和渤海人民的反抗,开始时存其族帐,仍用渤海旧制,还在东丹的官僚机构中安排一些渤海的贵族官僚。遗民除小部被迁徙外,大部分仍居留原地。后来辽多次迁徙渤海居民,形成了渤海人与其他民族杂居的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渤海人逐渐地融合到契丹、女真、汉等民族之中,大部分直接或间接融入汉族之中。

第六节 南方 诸族经济文化的发展

南方诸族主要指生活在江汉间、岭南地区的诸多民族，其活动地域在今天的湖南、湖北、四川东部、贵州东北部、广西、广东、海南、还有台湾。这一地域里当时的民族分布情况极为复杂，岭北的江汉地区主要居住着蛮人，岭南古为百越活动区域，民族种系更为繁杂，分布极广，包括许多支系，主要的民族成分是俚、僚。

一、江汉地区的民族融合

江汉地区的蛮人主要指活动于今湖南、湖北南部、四川东部、贵州东北部的少数民族。主要有两支，一支是“盘瓠之后”，汉代称为长沙五陵蛮或五溪蛮的后裔；另一支是“廌君巴蛮”后代。魏晋南北朝时，随着这两支蛮人的向北、向东发展，更加接近和混处，而其邻近的汉人，为逃避战乱和不堪官府的课役之苦也纷纷迁入蛮人居住地区。

隋时，与汉人接触较多的蛮人，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遂与汉族相近，逐渐融合于汉族之中。但僻处山谷的蛮人还较为落后，仍然保持着原有的经济生活和风俗习惯，没有多大改变。唐五代与汉族接触的就是原来僻处山谷的这部分蛮人。唐朝

的蛮人居住地区先后置锦州(今湖南省麻阳至贵州省铜仁县东部)、溪州(今湖南省永顺、龙山一带)、巫州(今湖南省黔阳西南)、叙州(今湖南省溆浦一带),对蛮人进行直接统治。到了唐朝后期,蛮族首领分别“自署刺史”,与唐地方官相抗衡,更有聚众攻陷官府,驱赶唐皇朝所置地方官,取而代之的。如881年石门“峒酋”向瓌集僚人数千,“屠牛劳众”,以长刀拓弓为武器,攻陷澧州(今湖南省澧县),杀唐刺史吕自牧,自称刺史,又曾召梅山10峒僚人切断邵州(今湖南邵阳市)道路。又有“蛮酋”蔡结曾以峒僚为援,占据道州(今湖南道县)。

五代十国楚马希范时(932—946年),溪州刺史彭士愁等率所属溪、锦、蒋州归附马氏。但保有相对的独立性,所以“立铜柱为界”。

还有一部分散居在洞庭湖以南及湖南、贵州、广西、广东连接地带的蛮人,自称“莫徭”。他们除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之外,还兼营狩猎。莫徭男人不着巾、袴,只穿白布裋衫,妇子穿青布衫,斑布裙,“通无鞋屐。”

二、僚俚诸族对岭南地区的开发

岭南僚俚活动的地域主要在广东、广西、海南、越南北部和台湾等地。

东汉以来,在岭南形成了一些“雄据于乡曲”的大姓,有番禺的吕氏,高凉、合浦的洗氏,钦州的宁氏等,称为“百越大姓”。这些“大姓”在当地拥有雄厚的政治经济实力,各自称雄一方。

自南朝梁、陈以后，左右岭南的政治势力主要是洗冯氏家族和宁氏家族，特别是洗冯氏家族。洗冯氏家族的洗夫人是当时岭南的领袖人物。洗夫人是岭南高凉（今广东省阳江西）人，出身于俚人望族，她家“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洞，统领部落10余万家。南梁大同年间（535—546年）洗夫人嫁给高凉太守冯宝为妻。冯宝是北燕冯弘的后裔，是在岭南“三世为守牧”的罗州刺史冯融的儿子。洗夫人聪慧多智，“能行军用帅”。她凭藉冯氏家族的政治地位和自己在少数民族中的特殊地位，发挥自己的聪明才干，在岭南的政治舞台上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广东的西南部，雷州半岛和海南岛都在她的统领之下。她积极支持梁、陈对岭南的统一事业。陈末隋初她被数郡拥戴为领袖，号“圣母”。589年，她率所属归附隋朝，迎隋总管韦洸入广州，使隋得以顺利地统一岭南诸郡。591年她又助隋平定了番禺人王仲宣的反隋事变。她还上书隋文帝揭发隋番禺州总管赵讷贪污暴虐，使隋皇朝及时处死了赵讷，缓和了当地少数民族和中央政府的矛盾。她又受隋朝廷的委托，亲自出面安抚俚僚，历10余州，“所至皆降”，稳定了隋在岭南的统治。隋册封洗夫人为“谯国夫人”，给印信，允其开幕府，置长史以下官属，并有调动“部落六州兵马”，“便宜行事”的权力。洗冯家族成为岭南最高首领，也是地方上最有实力的大姓。隋在岭南先后设置了22个郡。洗夫人对海南岛恢复郡县制和整个岭南地区郡县制的巩固和加强起过积极的作用，对增进俚僚内部的团结及俚僚和汉族的团结友好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隋末唐初“岭越无所系属”，洗夫人之孙冯盎“克平二十州，地数千里”，成了岭南最大的地方首领。高祖五年（622年）

四月,岭南的另一大姓宁氏家族的宁长真遂先降唐,七月冯盎也率所属归附,岭南地域遂纳入唐的版图,而冯、宁等岭南望族亦成为唐皇朝的新贵。

唐在岭南设岭南、桂管、容管、邕管、安南五管,以广州刺史充岭南五管经略使。到唐懿宗李儼时(860—874年),又分岭南为东、西两道,以广东为岭南东道,邕州(治宣化,今文莱南宁市南)为岭南西道。在岭南五管之下,唐皇朝对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划州县、置官吏、征贡赋,实行直接统治;对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则设羁縻州、县、洞、由少数民族的“酋领”担任都督、刺史等,并且得以世袭。唐皇朝这种实行郡县制与设置羁縻州县并行的制度,对缓和民族矛盾、保持地方稳定、发展岭南的经济和文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岭南一向被封建王朝看作是“瘴疠之区”,生产水平比较落后、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尚处于“火耕水耨,昼乏暮饥”的生产和生活水准。唐皇朝还把它作为流放贬谪官员的地方,这些流放官员中不乏失势的“旧德重臣”,为了开发、抚慰南疆,同时也派一些名士、良吏到岭南任职。这些人到岭南后重视发展农业生产、推行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大力发展陆路、海上交通、大力传播中原文化,促进了岭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730年前后,张九龄在桂州刺史兼岭南道按察使任内曾主持修开大庾岭新路。816年,柳宗元任柳州刺史后,曾颁布债务人可以劳役偿还债务的政令,根据欠债的多少,规定相应的服役时间,到期就可解除债权关系。实行后,在一年的时间里,就有数以千计的奴婢因身赎身,获得自由。他还兴办学校,衡、

湘以南中进士的儒生有许多是经过柳宗元亲自“口讲指画”教授的。经过唐代的开发,岭南的经济发达地区,不只在生产水平上与内地比较接近,在文化上也出现了一批“文通经史,武便弓弩”的文武双全的人才和“婚嫁礼仪、颇同中夏”的地区。

唐代海南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汉族居民从原来只在岛北沿海地域与俚人杂居,向东部和东南部发展,形成了环岛外围俚人与汉人杂居,只在腹地保有俚人单独聚居的格局。在俚汉杂居地区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水平有很大提高。天宝年间,唐高僧鉴真大师漂流到岛南的振州(今崖县)和岛北的崖州(今文昌、澄迈),发现当地居民已是“一年养”蚕八次,收稻两次,十月种田,正月收粟”了。岛上出产的金、银、珍珠、玳瑁、香料、槟榔、荔枝、龙眼、高良姜、五色藤、盘斑布、益智子、名贵木材等土特产,都作为贡品或商品,输入中原地区。而且沿海地区还出现了专以经济人为业的商人阶层,可见商业也具有一定规模。据《太平广记》记载,唐德宗时(780—805年)琼州刺史韦公干的家庭手工业就有织花缣文纱、制角器、熔锻金银、用珍木制造家俱。他又驱使木工砍伐珍贵木材,并曾造大船两艘,满载用珍贵木材所制的器具和金、银运往广州。鉴真大师在海南岛时,曾主持重修当地的大云寺和开元寺,可知这里的造船和建筑业都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佛教在这里也得到了传播。

三、流求与内地的联系

东汉三国时,称台湾为夷洲。在夷洲生活着古越人的后代,称山夷人。山夷人当时处于原始社会母系氏族阶段,生产

工具是新石器和骨角器。尼干栏、髡头穿耳、集会敲木鼓、有猎人头的习俗风尚，实行族外婚制，人死后实行崖葬。东吴孙权曾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甲士 1 万人，乘船出海寻找夷洲，而且还带回夷洲数千人。

隋唐时，称台湾为流求，生活在岛上的主要是山夷人的后代流求人。当时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父系氏族部落联盟阶段，已有了私有制的萌芽。据《隋书·东夷传·流求国》记载，当时流求王（部落联盟长）已有国数代。王欢斯氏，名渴刺兜。王之下有帅四五人，统帅诸洞，诸洞有小王。洞之下往往还有村，村的首领叫鸟了帅。小王和鸟了帅都是由善于作战的人担任。此时的流求尚没有文字、定形法律和年历，也没有“君臣上下之节”和“拜伏之礼”。以月亮的盈亏和草本植物的荣枯来判断季节时日。流求人犯罪，由鸟了帅就事判处，如有不服，上诉至王。王则令“臣下”议决。轻罪只用杖责，死刑用铁锥钻脑处死。监狱没有枷锁，只用绳索捆缚犯人。没有固定的赋税，有需要则临时均摊。

流求人的经济生活是经营较为原始的农业和家庭养殖业。农作物有稻、粱、黍、麻、豆、赤豆、胡豆、黑豆等。畜产中设有牛、羊、驴、马，但猪、鸡却很多。农具主要是石器和木器，还保留着古老的刀耕火种耕作方法。种地时先用火烧除草木、引水灌溉，然后用插垦植。插头是石质的，长 1 尺多、宽数寸。岛上还盛产水果、名贵木材、药材等。

流求人的武器有刀、稍、箭、剑、铍等。虽大都用铁制。但铁不是由本地采矿冶炼的，数量很少，所以武器刃部都很薄小，并多用骨角辅助铁器的不足。并知用纒或熊、豹之类的皮为

甲。流求人善于奔跑，骁健好斗，但诸洞各为部队，“不相救助。”攻斗时，双方对阵实力相当，各推出勇敢善战的3—5人互相攻斗，战败一方自行撤回并派人赔礼和解。

流求人已有居室。其王居舍有16间。男女都留发，用白纁绳缠发，从项后盘绕到额头。男人戴形制不同的鸟羽冠，冠上用珠贝、赤毛作装饰。妇女戴方形的罗纹白布帽，穿用斗镂树皮、杂色纁和杂毛混织布作的衣服。还用毛串杂色螺下坠小贝为饰品，带耳珰、手镯和珠制项链。并能用藤织笠，笠上也插鸟羽为饰。流求男人的髭鬣和身上的毛都要除掉，女要以墨黥手为虫蛇文。

流求人用木槽晒海水为盐，取木汁为醋，用米面作薄酒，用手进食。得到异味，要先进尊者。遇有宴会，王与众人一样衔杯共饮。歌舞时，一人领唱，众人相和，扶妇女上膊摇手而舞。

流求人以山海为神，用酒肴祭祀，战斗杀人，也用所杀的人祭神。王居住的处所以多聚髑髅为佳。一般人家的门户上一定要安上兽头骨角。

流求人嫁娶时已流行以酒肴珠贝作聘礼了，但同时还保留有只要“男女相悦”，就可以相匹配的自由结合婚姻。妇女产后有食胞衣和用火自炙的习俗。

流求人的丧葬，在死者将要咽气时，抬放到庭院里，亲朋友们来哭泣吊唁。然后沐浴尸身用布帛缠好，外裹苇草，不用棺槨，不起坟垄，亲土埋葬。子为父丧，数月中不食肉。但南方比较落后的地区尚有食人的习俗，人死后，“邑里共食之”。

隋炀帝杨广曾两次派人到流求：一次是607年，派朱宽、

何蛮到流求，“求访异俗”；一次是在 610 年，派陈稜、张镇州率兵 1 万，从广东的潮州乘船舰到流求。流求人开始时认为他们是来进行贸易的。可见大陆上的人是经常到这里作生意互通有无的。隋军本来是想降服流求人的，但受到坚决反抗，只虏获数千人，“载军实而还”。

唐代大陆人民纷纷渡到台湾、澎湖，与当地人民一起开发宝岛。唐元和年间（806—820 年）进士施肩吾，无意作官，率领族人由浙江省分水县渡海去澎湖定居劳动。《全唐诗》载有他的《题澎湖屿》诗，诗中描写当时澎湖各族人民劳动生活的情景：“腥臊海边多鬼市，岛夷居处无乡里；黑皮少年学采珠，手把生犀照咸水。”

第七节 契丹的兴起

一、契丹部落的成长

契丹族的祖先就是东胡。他们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经历了毗邻各部的联合，结成了部落联盟，并且逐渐稳定下来，发展成为一个共同体。

契丹族逐渐成长壮大的过程，也就是和我国各民族、特别是汉族逐渐发生更多联系的过程。

契丹正式出现于历史记载，是公元 389 年（北魏道武帝拓

跋珪登基三年)。当时,他们正被拓跋魏打败,退到了潢河(现在内蒙古自治区西喇木伦河)以南、土河(现在内蒙古自治区老哈河)以北,按聚族分部的形式,过着游牧、渔猎的生活。

史书里记载的古代契丹,有8个部落,被称为“东北群狄”。他们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平真君年间(公元440—450年),常常赶着马匹来中原进行交换。以后,一面在边境地区交换,一面就派人向北魏政府贡献。不过,各部都是单独地进行联系,虽然属于同样的行动,当时他们自己还没有统一的管理。

有一次,北齐和契丹冲突,掳获了他们的“杂畜数十万头”,这是从侧面看到的契丹部落里人畜两旺的一个背影。

到隋代文帝杨坚开皇末年时,契丹部落已经发展成10个部落,每个部落“兵者多三千,少者千余”,估计有兵力2万多名,加上老幼妇女,约有10万人口。这时各部已经统一起来,进入了部落联盟,由部落酋长中推选1人作首领(联盟长),3年改选一次,轮流担任。唐代的契丹首领叫大贺氏,当时有胜兵(适龄的壮丁)4万人,分为8部,加上松漠府、玄州两地,实际上也是10部。他们打猎放牧,各行其事;对外战斗,共同行动。这时的契丹联盟已经是唐代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称为松漠府。契丹首领由唐代中央政府封为松漠府都督。联盟以内的各个部落改称为州,部落长(契丹人叫辱纥主,后来叫夷离董)为州刺史。组织形式完全是唐朝的编制。契丹是个牧区,它有自己的政治、经济上的特点,所以唐代中央政府只是委托营州都督就近监督节制,给了它很多的自主权。

武则天的时候,营州都督赵文翊没能做好应做的联系工

作，契丹部落首领李尽忠、孙万荣杀死了营州都督赵文翊，起兵反抗武则天朝廷，自称为“无上可汗”。当时西北各民族部落，都称唐朝皇帝为天可汗，现在李尽忠自称“无上可汗”，就意味着他们不再受天可汗的管辖了。武则天出动大批兵马进行讨伐，不但没有打胜，反击丢了瀛州（今河北省河间县）所属的各县，最后，还是靠奚兵袭击契丹后路，才把他们打退。

大贺联盟衰落后，又重新组成了遥辇联盟，他们按照古老的传统，把仅存的氏族部落，又分成 8 部。新的联盟依附了西北的突厥，和中原失掉了直接联系。突厥虽然也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在当时对于大唐政府却不是绝对服从的。契丹向突厥贡输，实际上就是对唐朝中央政权的疏远。特别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中原地区经过连年战乱，道路不通，他们到内地的机会就会更少了。后来突厥衰落了，回鹘代之而起，契丹、奚、室韦等部落，遭到回鹘的残酷压榨。在他们的部落里，回鹘设了类似监护使等官职，负责征收贡赋。契丹首领也被迫使用回鹘发给他们的图记。当时的回鹘也像突厥那样，上层权势集团对于大唐朝廷是不大听从的。

公元 842 年（唐武宗会昌二年）回鹘凋败，由幽州节度使张仲武奏请唐中央政府，正式给契丹换发了中央颁赐的印鉴，同时也解脱了回鹘对于他们的剥削。

契丹部落“起于汉末，盛于隋唐之间”，经历了古代 8 部、大贺 8 部到遥辇 8 部，几次的改编。各部落从联合到联盟；联盟也是从不固定到固定；首领也由不定选举到权贵家族世选。家庭私有财产的出现，造成了贫富差别，再加上权贵家族的出现，形成了对于契丹氏族制度的强烈冲击力。古老的氏族组

织,逐渐出现了较大的缺口。也由于部落公务的增加,专靠部长、首领的联系,已经远远显得不够,他们继承草原部落的传统,逐渐设置了自己的管理体系。

早在大贺联盟时期,契丹已经设有 2 个衙官,分别掌管兵马。两衙是继承回鹘的两相、突厥的两厢和匈奴的左右贤王来的。遥辇联盟期间,阻午可汗更“立二府以总之”。二府就是两衙的继续,也就是建国以后的左、右宰相府。

阶级统治的国家改变了部落结构的内容,但是他们仍然沿用了部落的形式。贫富不均使契丹民众向两端分化,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大批的“流人”、“俘奴”也和氏族组织不能相容;于是,氏族组织终于变成了阶级统治的国家。

二、流人和俘奴

唐代,特别是在开元、天宝以后,黄河以北的地区一直由地方藩镇控制,在繁重的兵役差赋和地主的勒索压榨下,农村破产的农民、手工艺人,三教九流的人们,包括那些不能满足个人愿望的知识分子,零零星星地逃到长城以北,被称为“流人”。他们沿着山岭坡峦,穿过大凌河河谷,进入辽河流域,依附在契丹部落里,作些零碎活儿,或者在草地边缘、河沿上,种些谷类蔬菜,技艺人和知识分子围绕着部落首领们的帐篷,制作奢侈用品或者帮助出谋划策。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汉名亿)出身的迭刺部,是一个具有较好的耕种条件的部落,收揽的汉人也最多。在阿保机的祖父匀德实的时期(大约相当于 9 世纪初),迭刺部里已经有了农

业耕种,过去主要靠抢掠农业区才能吃点粮食,这时有了汉人替他们耕种收获,这在草原上是多么令人兴奋的苗头啊,新的苗头吸引着他们向南看。到了阿保机的父亲撒刺的,又开始提倡冶铁,铸造各种工具,这在部落组织里,显然也是件了不起的事。由于有了汉人定居的据点,耕种、纺织发展起来了,这就使迭刺部落的首领贵族耶律氏,一天比一天富裕起来。

阿保机担任了迭刺部的夷离董(部落首领)以后,利用本部落的经济优势和政治条件,取得了契丹联盟的领导地位,进一步又联合了邻接的奚、室韦各部,实力一天比一天雄厚,声望也一天比一天得到提高。

公元902年(唐昭宗李杰天复二年)七月,阿保机率领了骑兵40万闯进长城以南,在河北、山西一带,掠获了9.5万多名汉人,驼、马、牛、羊更是不计其数,都被赶到潢水(今西喇木伦河)南岸,建城围起来。这些被俘虏来的人口和牲畜,都成了耶律氏的财富。以后,阿保机和他的部下,又屡次进入长城,掳掠人畜财物,“所得汉人,以长绳连头系之于木。”

阿保机的眼睛,看惯了成群的马牛羊,也看惯了过去从战斗中掠来的东西。现在摆在他眼前的,既不是马、牛、羊,也不是可吃可用的物资,而是一群一群的活人。他知道活人有用才掳回来,但是眼看着这些掳来的男男女女,如何处理还是没经验。这一大批劳力,心灵手巧、女织男耕,真是一批活“财富”。阿保机不断地考虑:怎么才能把这批“财富”安顿住,使他们稳定下来当奴隶呢?

阿保机采取了三项主要措施,也就是运用了三种方法来处理这批“俘虏”。

第一，先用城栅围起来，实行严格管制；第二，根据俘虏们的技艺、能力，基本上是让原来干什么的还干什么；第三，通过汉人管汉人，也就是通过奴隶来管奴隶，稳定情绪。当时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叫“汉儿司”，派早先掳来的汉人韩知古来管理汉人事务。这个“汉儿司”，后来发展成了汉人枢密院，也就是南枢密院（简称南院）的前身。在契丹 200 年间的统治中，一直实行南面和北面的双轨官制。官僚编制谈起来话长，这里暂且先说阿保机对俘虏的管理。

阿保机明白，要使俘虏成为顺驯的奴隶，光在手脚上限制是不够的，于是他在俘虏的围墙里建佛寺，把俘虏来的和尚、尼姑挑出来，通过他们对俘虏作些精神上的麻醉工作。

阿保机还叫原来是夫妻的住在一起，把单身的男女也结为夫妻，尽管俘虏们过着这样牢狱式的生活，但比起被掳掠以前的生活来，相对来说还较安定。现在外有大墙围着，逃也逃不脱；内有和尚、尼姑们念经，超渡来生。那就只好住下来！

“流人”和“俘奴”使契丹部落联盟有了更加强大的经济基础，使它得以向前发展。

三、耶律阿保机称帝

耶律阿保机的部落，既有大量的奴隶生产，又不断地进行战争掳掠，这使迭刺部的财富迅速增加，实力异常雄厚，在契丹各个部落中居于领袖的地位。这时，靠近长城边缘的大唐将领，山西方面有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河北方面有幽州节度使刘仁恭，他们都想扩充自己的势力和地盘，彼此有矛盾。由于阿

保机和刘仁恭的直接毗邻,不免常常有些冲突,形势导致他和李克用联合,并且结成了同盟,这就不能不增加阿保机的声势,甚至在汴梁的唐代将领宣武节度使朱全忠,也常派人到草地来和他联系。

公元 907 年阿保机正式代替了以前的部落联盟首领痕德堇可汗,做了皇帝,历史上称为辽太祖。他结束了契丹族遥辇氏一家的世选首领,开始了耶律氏的辽代统治。阿保机的部下,上尊号称他为天皇帝,皇后为地皇后。就在这一年,汴梁朱温(朱全忠)正式废了唐代哀帝李祚,自立称皇帝,改国号为(后)梁。

此后的几年间,阿保机接受唐沧州节度使刘守文的投降,帮助他打败了幽州卢龙节度使刘守光,又征服了一些长城北边的部落,如奚、习、室韦和阻卜等,平定了自己弟弟刺葛等所发动的争夺皇位的变乱。但是因为连续几年用兵,也大大损耗了部落的实力,士兵们有时不得不杀掉自己的马驹,或者采挖野菜来充饥,物价上涨了 10 倍。阿保机又经过一段努力,终于安定了内部,渐渐恢复了实力,这时中原的(后)梁、南方的吴越以及其他地方割据势力,都派代表来契丹联系。

公元 916 年,阿保机接受了部下和诸国使者献给他的尊号:大圣大明天皇帝,皇后也接受了应天明地皇后的尊号。同年,阿保机宣布大赦,建元神册,进一步按照中原规格正式建立朝廷,封长子倍为皇太子。阿保机出兵西征,接受了幽州节度使卢国用的投降,就任命他做幽州兵马留后的官。又领兵向西平服了吐厥、吐谷浑、党项、小蕃、沙陀等部落,掳来酋长和部民 1.56 万户,铠甲兵仗器服 90 余万件,宝货、驼、马、牛、羊

不计其数。回军途中，攻陷朔州，生擒节度使李嗣本；又攻陷蔚、新、武、妫、儒五州；自代北到河套，过阴山，所向无敌。阿保机把武州改为归化州。妫州改为可汗州，设置了西南面招讨司，开始建立草原本位的统治体系，为以后长驱直入长城以南作好了准备工作。接着，他又几次进攻幽州、云州和邻近的西南各部落。

神册四年（公元 919 年）二月，阿保机修补了辽阳旧城。让汉人、渤海人住进去，改称东平郡。冬天，又征服了乌古部，俘获人口 1.42 万多，牛马车乘庐帐器物 20 多万件。神册六年（公元 921 年），新州防御使王郁率领山北兵马向契丹投降，这些人被迁到潢水南岸。阿保机乘胜率兵进入居庸关，分兵连下檀、顺、安远、三河、良乡、望都、潞、满城、遂城等 10 多个城池，把当地人民俘虏到北边草地，其中檀、顺州的人们，被分配在东平沈州。

随着称帝、建元等活动，阿保机在这 10 余年中的“武功”已经初步奠定了汗国版图的基础，以后逐步拓展成半壁江山。早在神册五年（公元 920 年）就命令有关方面仿照汉字创制契丹文字，称契丹大字；稍后又参考回鹘文法则，制成契丹小字。契丹大、小字，由朝廷颁布使用。神册六年，进一步定法律，正班爵，更向统一国家前进。

契丹是沿用部落形式建立国家的，所以各个部落虽然已经统一，仍旧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独立性，至于邻接的奚、室韦和其他一些部落，仍旧是各沿各自的习惯，各过各自的生活。彼此间尽管有草地上共同遵守的惯例、传统，终究由于部落分立，彼此互有异同，也是各行其是，这显然不符合建国以后的

要求,“定法律”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巩固国家统一的。

契丹由氏族部落发展到国家,各部自己原有的首领,也都是实行的家族管理。现在已经有共同的政府,大家就要重新排排队,定个高低次序,“正班爵”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建立统治秩序的。

由于部落经济的发展,要求统一;部落统一,又要求建立统治的秩序;秩序安定以后,又要求扩展自己的实力;这样连锁反应地循环前进,形成了强盛的大辽政权。

阿保机在“定法律”、“正班爵”以后,接着规定了亲民官吏要在每年正月、四月、七月、十月这几个月深入民间,“询民利病”。公元 922 年又开始进攻幽州、蓟州,第二年,打下了平州。这时晋王李存勖正式代替了后梁称帝,改国号为(后)唐。阿保机乘机率兵直达涿州、幽州和安次、潞(今通县)、三河、渔阳(今蓟县)、怀柔、密云等县,全部攻陷,大批老百姓都被俘到草地上,分成部落圈起来,仍然是围上标志或圈起围墙,也就像县城那样的形式,这些部落的番号,也还沿用原来州、县的名称。

公元 926 年,阿保机又亲征渤海国(唐朝在东北沿海的一个地方封国),攻陷了首府扶余,改渤海国为东丹。封皇太子倍为人皇王,由他主持这一片新得的地区。阿保机又紧缩了渤海原来的编制机构,只设左、右丞相正副职共 4 人,并且安排了自己的弟弟任最高职位左丞相,任命渤海原来的丞相为右丞相;又差以渤海人为左次相、以契丹人为右次相。这种一面利用、一面监督的巧妙布置,表现出阿保机在政治上的统治才干。

后唐李存勖死后，明宗李嗣源接位时，特地派了一个使者姚坤去见阿保机。阿保机和夫人并坐在毡帐里接见了这位后唐的代表。阿保机问过情况后，首先表示对中原的关切，对已故皇帝的哀悼，然后提到和新皇帝友好相处的祝愿。接着就对姚坤说：“我要幽州令汉儿把住，便不再侵入汉界。”不久，这位开国创业的一代太祖，便与长辞了。

第七章 隋唐五代时期的思想和科技文化

第一节 隋唐时期著名的学术思想

一、隋和唐初“三教并用”的文化政策

隋文帝杨坚鉴于北周统治者严刑峻法的后果,认识到北周“上下愁怨”、“内外离心”,社会矛盾加剧,致使“寿亦不长”(《资治通鉴》卷173),最终被隋朝所更替。隋文帝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稳固政权,不能不改变统治方法,遂一改“法令烦苛”而为“法令清简”,“大崇惠政”(《隋书·高祖纪下》)。表现在文化政策方面,一是在北周武帝禁断佛、道之后,又重兴二教,下令禁止毁坏佛像和天尊像。二是提倡儒学,企图用儒家的忠孝伦理思想作为人们的行为规范,增强民众对封建王朝的向心力,以维护和巩固隋王朝的统治。

故而，隋文帝把儒家学说提到了治国不可脱离的重要地位。他说：“儒学之道，训教生人识父子君臣之义，知尊卑长幼之序，升之于朝、任之以职，故能赞理事务，弘益风范”（《隋书·高祖纪下》）。因之号如果天下“劝学行礼”，强调“建国重道，莫先于学；尊主庇民，莫先于礼”，“有礼则阴阳合德，无礼则禽兽其心，治国立身，非礼不可”（《隋书·柳机传附柳昂传》）。同时还提倡仁义孝悌，指出“行仁蹈义，名教所先”（《隋书·高丽传》）。“君子立身，虽云百行，惟诚与孝，最为善者。”（《隋书·高祖纪下》）而且对魏晋以来南北对立、战争不休、儒学衰微的情景十分伤感痛惜，认为已经严重到“长幼失序，尊卑错乱”（《隋书·高祖纪上》），“圣人遗训，扫地俱尽”（《隋书·高祖纪上》）的地步。因此，他要振兴儒学，重整礼治，以达到恢复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隋文帝首先“崇建庠序”，开办国学、太学、四门学和地方州县各级学校对儒学经典进行传习，其次则大力搜寻天下遗存的典籍。为了振兴儒学，提高儒学的地位，隋文帝还诏天下，召纳四方儒士，给予重用。“于是超擢奇隼，厚赏诸儒，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黉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隋书·儒林传》）但由于文帝急于求成，在贯彻振兴儒学的政策方面就出现了波动，不能首尾一贯。在他晚年，认为所设学校没有培养出他所需要的统治人才，曾于仁寿元年（601）下诏，指出当时习诵的生徒“徒有名录，空度岁时”，于是只留下国子（后改为太学）学生70人，“太学、四门及州县学并废”（《隋书·高祖纪下》）。炀帝即位，“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北史·儒林》），还搜

集、整理儒家和其他学派的经籍，并将书籍分为甲、乙、丙、丁四目，分统经、史、子、集四类。以后各朝，就沿用这种替代了七略分类的四部分类法。此外，还分设十科以拔举人才，设立的“文才秀美”一科、即进士科，以考试诗赋为主，从而开创了科举制度。隋炀帝虽重文教，却无德行，荒淫无度，苛政暴敛，“口诵尧舜之言，身为桀纣之行”（魏征语），因而“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其风渐坠，以至灭亡”（《北史·儒林》）。

唐太宗李世民是杰出的政治家，具有深远的战略眼光，当他还是秦王时，虽战争未息、天下未归于一，就已开始考虑由武功转向文治，“乃锐意经籍，于秦府开文学馆，广引文学之士，下诏以府属杜如晦等十八人为学士”（《旧唐书·儒林传》），留意儒学的发展。他即位之初，就制定了“偃武修文”的方针政策。而在思想文化上，则尊孔子为“先圣”、颜渊为“先师”，“又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之士虞世南、褚遂亮、姚思廉等，各以本官兼署学士，令更日宿直。听朝之暇，引入内殿，讲论经义、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同上）。他还说：“勘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资治通鉴·武德九年》，按：是年太宗即位而未改年号），足见唐太宗清醒地认识到文治的重要性。因此，他还下令加筑国子学舍，增置生员，就连守卫玄武门的屯营飞骑，也派博士教以经业，并规定，凡通儒经者，皆准予参加贡举。故“是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儒生多达 8000 余人，“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旧唐书·儒学传序》）。与此同时，唐太宗对于佛、道二教也很注意发挥其作用。但是他吸取了南北朝当权者信奉佛教而并未达到安定治理目的之教训，看到了佛教教义和君臣、

父子、夫妇的纲常伦理之间的矛盾，而且僧侣的特权制度发展到一定程度也会与国家利益——赋税、劳役、兵役等问题发生冲突。因此，他在尊重和利用佛教的同时，又抬高道教，以平衡佛道势力。而抬高道教，又借重老子李耳（道教奉为教主）以提高李姓的地位。李世民对能辅助王政的佛、道，均加以奖励，每逢国家大典，还常诏令儒学重臣和佛、道领袖在宫廷和公开集会上进行讨论。儒释道三教并立的局面，自南北朝以来已经开始出现，只是到了唐初，才实际形成。儒释道虽然并行，但在唐太宗的心目中，仍以儒学为重。他说：“朕今之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贞观政要》卷6），把儒家学说的有无，看作是与国家兴亡攸切相关的大事。

如上所述，就构成了唐太宗的三教并用、尤重儒学的文化政策。这一政策，为唐初经学的统一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二、王通和他的《中说》

王通，字仲淹，被弟子私谥为“文中子”。生于隋文帝开皇四年（584），卒于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绛州龙门（今山西稷山县西）人。仁寿三年（603），他曾上《太平十二策》，文帝因公卿反对而未采用。炀帝即位，屡次征召，不就，隐居河、汾之间，“以著书讲学为业”（《旧唐书·王勃传附》），“往来受业者，不可胜数，盖千余人”（杜淹《文中子世家》），为“隋末大儒”（《新唐书·王绩传》）。

王通所著书，多拟六经，著有《礼论》、《乐论》、《续书》、《续诗》、《元经》、《赞易》，世谓之“王氏六经”。又体仿《论语》，著有《中说》（又名《文中子》）10卷。故有僭经之讥，“不为诸儒称道，故书不显”（同上），多已失传，唯有《中说》、《元经》传之于今，而《中说》则集中体现了他的学术思想。

王通的《中说》，首先抨击以隋炀帝为首的穷奢极欲的残暴统治，指出“古之为政者，先德而后刑，故其人悦以恕；今之为政者，任刑而弃德，故其人怨以诈”，“古之从仕者养人，今之从仕者养己”（《中说·事君篇》）。因此，他十分推崇古代的民主，反对君主独裁。他说：“议其尽天下之心乎，昔黄帝有合宫之听，尧有衢室之问，舜有总章之访，皆议之谓也。大哉乎！并天下之谋，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问君篇》）他甚至赞同西汉霍光的“废帝举帝”，并认为这是“废昏举明，所以康天下”（《事君篇》）的正义行为。

王通还针对当时佛、道势力日渐兴盛而儒学相对削弱而面临危机的形势，提出了“三教可一”的思想。他的弟子问他：“三教何如？”他回答说：“政恶多门久矣”，认为三教的存在和互相攻讦，就如同政出多门那样，不利于封建统治。弟子又问：“废之何如？”他说，像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那样，用暴力手段取缔佛、道二教的办法是不足取的，因为其结果反而是推波助澜，纵风止燎”。所以他提出“三教于是乎可一矣”（均见《问易篇》）的思想主张。既然不能毁灭佛、道二教，则应如何处理？王通认为首先应该提倡儒学，并以“申周公”、“绍宣尼”的道统儒宗自命。他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周公所为乎！”（《天地篇》）他又说：“千载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见也；千

载而下，有绍宣尼之业者，吾不得而让也。”（《问易篇》）他对孔子赞扬备至，竭力推崇儒家的伦理思想：“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夫子之力也。”（《王道篇》）所以他很重视儒家伦理思想的建设，强调道德修养的必要性。他开始追溯善与恶的内心根源，认为“人心”的泛滥会影响“道心”的扩充和发挥。王通把人的善恶看成是“道心”和“人心”的问题，故而提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难进也。故君子思过而预防之，所以有诚也”（《问易篇》），也就是说，道德修养的任务就在于存“道心”而防“人心”。他又进一步提出，要“以性制情”（《立命篇》），他所倡之“性”，是指“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本”（《述史篇》），因此，他所要保存的“道心”，也就是他的“五常之本”的“性”，他力图以仁义礼智信为内容的“道心”来抑制“人心”之情恶的滋长。这就从理论上强调了加强伦理道德思想修养的重要性。可见，王通想通过兴儒学和增强人们对儒家道德伦理修养重要性的认识，来维护儒学的地位。此外，王通还提出“共言九流”、“共叙九畴”（《周公篇》）的观点，即不采取毁灭佛道二教的办法，而是通过吸取佛道二教之长以补儒学之所短，进一步充实儒学的内容，提高儒学地位，达到以儒学一统佛道二教的最终目的。

王通在哲学思想上，很重视“天人之事”（《王道篇》）。在天人关系问题上，他往往是将天、地、人并述：“天者，统元气焉，非止荡荡苍苍之谓也。地者，统元形焉，非止山川丘陵之谓也。人者，统元识焉，非止圆首方足之谓也。乾坤之蕴，汝知之乎？”（《立命篇》）王通认为，“乾坤之蕴”，就包括天地人在内的整个宇宙人类万物。具体来说，“天”不只是“荡荡苍苍”的元气，它

实际还指宇宙自然物质的统一存在；“地”也不只是“山川丘陵”，而是指大地自然万物的总和。“人”不仅是“圆首方足”的身体，还包括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在这里，王通比较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自然观是继承了《淮南子》、王充以来的“元气”自然论，并且还强调宇宙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和可知性，表明他在天人关系的认识上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基本倾向。

在天人关系的认识上，王通还强调天地人“三才不相离”（《立命篇》）并各有作用、相互不能替代的观点。他说：“天生之，地长之，圣人成之，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魏相篇》）即认为天的功能作用在于生化万物，地的功能作用在于使万物发育成长，圣人的作用在于成物、即利用天地万物。他们各自的功能作用是不能相互替代的。正如“天”有自己的规律，它不会由于人们怨恨寒暑而使冬夏中止；同样，人的作用天也无法替代。因而，王通强调“顺阴阳仁义，如斯而已”（《周易篇》），即要顺应自然之道和社会之道。他把“仁义”道德看作是治理好社会人事的关键，故而一贯提倡儒学、提倡儒学伦理道德思想。在这里，王通虽然强调天地人都各有作用、不能相互替代，但他仍把人的作用（虽然他说的只是“圣人”）叹曰：“乃今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王通认为，由于人具有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故在天地之中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能知“天地之理”。据此，他对传统的天命论作了攻击和批判，指出梁武帝时的文人刘孝标宣扬所谓“自天之命”“定于冥然，终然不变”的命定论观点的《辨命论》，是“人道为矣”（《王道篇》），完全废弃了人的作用。

王通在认识论方面也是有所贡献的。他否定有生而知之

者,强调“天下未有不学而成者”(《礼乐篇》)。在知行关系上,他更重视行,认为学问和事业成就的取得离不开行,“天下未有不劳而成者也”(《述史篇》)。而且,他强调学问的目的,不在于炫耀自己知识之丰富、或停留在书本的背诵,而在于付之行动,“知之者不如行之者,行之者不如安之者”(《礼乐篇》)。所谓“安之”,即要求把在知行中学得的知识学问,按客观规律去行事。他还认为,考察学问的真伪,也得通过行事效果来检验,故他肯定“尧舜三载考绩,仲尼三年有成”的作法。

总上所述,王通在隋代学术思想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他的兴儒学、提倡取佛、道以补儒的思想,对于唐代的儒学振兴有所影响。

三、隋代经学的成就

隋初,自文帝提倡儒学以来,虽然政策上有所波动,但总体来说,隋代的儒家经学还是有所发展的。特别是在综合南北经学方面,有一定的成就,对此后唐代经学的统一有所促进。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要推经学家刘焯、刘炫。史书赞曰:“二刘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古今,后生钻仰,莫之能测。所制诸经义疏,搢绅咸冠之。”(《隋书·儒林》)

刘焯,字元士,信都昌亭(今属河北)人。生于北魏孝明帝大同十年(544年),卒于隋炀帝大业六年(610年)。他是刘献之的三传弟子,少与河间刘炫结盟为友,同受《诗》于刘轨思,受《左传》于郭懋,并问《礼》于熊安生。后得悉刘知海家藏书甚多,二刘“就之读书问经十载,虽衣食不继,晏如也,遂以儒学

知名”(同上)。刘焯于开皇(581—600年)中举秀才,初为州博士,后入京,曾奉敕与刘炫考定洛阳石经,并与杨素、牛弘、苏威、元善、萧该、何妥、房晖远、崔崇德、崔颐等“于国子共论古今滞义、前贤所不通者,每升座,论难蜂起,皆不能屈,杨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同上)。后因被诸儒妒恨,“飞章”诽谤而“除名为民”。被贬后,回乡专以教学著述为务,对于前儒所传章句“多所是非”,又博览《九章算术》、《周髀》、《七曜历书》十余部,“推步日月之经,度量山海之术,莫不核其根本,穷其秘奥。著《稽极》十卷、《历书》十卷,《五经述义》并行于世”(同上)。可见,刘焯不仅是著名的经学家,还是位天文学家、历法家。在《隋书·律历志》中,载有他所作的《皇极历》,在历法中首次考虑太阳视运动的不均匀性,创立三次差内插法来计算日月视运动速度。因此,《隋书·儒林》记述说:“天下名儒后进质疑受业、不远千里而至者,不可胜数。论者以为数百年以来,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者”。

炀帝即位后,刘焯迁大学博士。刘焯所著《五经述义》及其他著作,今皆佚。但据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序》所述:“近代为义疏者,有全缓、何胤、舒瑗、刘轨思、刘丑、刘焯、刘炫等。然焯、炫并聪颖特达,文而又儒,擢秀干於一时,骋驰轡於千里;固诸儒之所揖让,日下之所无双。其於作疏内特为殊绝,今奉敕删定,故据以为本。”按此,可知孔颖达作《诗疏》实本二刘。又据孔颖达《尚书正义序》所述:“其为正义者,蔡大宝、巢猗、费昶、颐彪、刘焯、刘炫等。其诸公旨趣或多因循,帖释注文,义皆浅略。惟刘焯、刘炫最为详雅。……今奉明敕,考定是非,谨罄庸愚,竭所闻见。”按此,可知孔颖达作《书疏》,亦本二刘。

刘炫，字光伯，门人谥为宣德先生。河间景城（今河北献县东北）人。生于北周静帝大定元年（581），大约卒于隋末。少以聪敏见称，为刘献之的三传弟子。隋开皇中，奉敕修撰国史，后与诸儒修定五礼，授旅骑尉。《隋书·儒林》记述他自视颇高，时吏部尚书韦世康问其所能，刘炫答曰：“《周礼》、《礼记》、《毛诗》、《尚书》、《公羊》、《左传》、《孝经》、《论语》，孔、郑、王、向、服、杜等注，凡十三家，虽义有精粗，并堪讲授。《周易》、《仪礼》、《谷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美事，咸诵于心。天文律历，穷核微妙”。刘炫在隋代确是位学通南北、博极古今的大儒。开皇二十年（600），他上表抗争文帝废学之举。炀帝即位后，牛弘引刘炫修律令，遂任太学博士，岁余即去任归乡。隋末大乱，冻饿而死。《隋书》本传称“炫性躁竞，颇俳谐，多自矜伐，好轻侮当世，为执政所丑，由是官涂（途）不遂。著《论语述议》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经正名》十二卷，《孝经述义》五卷，《春秋述义》四十卷，《尚书述议》二十卷，《毛诗述议》四十卷，《注诗序》一卷，《算术》一卷，并行于世。”可惜刘炫著作皆佚，但遗文尚较刘焯为多。他的擅长，在于《春秋》学，孔颖达《正义》多所引证。从其遗文看，可知他好为新说，反对执文求义。如《左传·昭公七年》：“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刘炫疏云：“人之受生，形必有气，形气相合，义无先后，而以云始化曰魄、阳曰魂，既生魄，阳曰魂。”刘炫疏云：“人之受生，形必有气，形气相合，义无先后，而以云始化曰魄、阳曰魂，是先形而后气、先魄而后魂。魂魄之生有先后者，以形有质而气元质，寻形以知气，故先魄而后魂。其实并生，无先后也。”这种看法，较之《传》文更符合科学。孔颖达批评刘炫“意在矜伐，性好非

毁”，其指责并不恰当，从实考查，刘炫确有高于杜预的见解。如《经》：“（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杜注云：“凡人君即位，欲其体元以居正”，刘炫云：‘元’、‘正’，惟取始长之义，不为‘体元居正’。”其见解就比杜预平实而明白。

隋代二刘之学，本渊源于北学，但兼通南学，留意费彪《尚书义疏》，在隋代经师中，惟有刘焯系统地撰写了《五经述义》，刘炫分别撰写了《尚书述义》、《毛诗述义》、《论语述义》、《孝经述义》和《五经正名》等，集南北经学之大成，代表了隋代经学的最高成就，为唐代经学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四、孔颖达编撰的 《五经正义》和经学的统一

自从唐太宗李世民制定和推行他的三教并用、尤重儒学的文化政策之后，唐初的经学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唐太宗除了建立弘文馆、招纳天下名儒文士，兴办国子学、增加生员名额和抬高孔子的地位之外，还进行统一《五经》文字的工作，贞观四年（630）“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订《五经》文字，颁于天下，命学者习焉”（《旧唐书·儒学》）。自《五经》定本出，而后经籍无异文。此后，唐太宗又感于“儒学多门，章句繁杂”（同上），加之南北经学的不同，对科举取士有诸多不便，意将异说纷纭之经义统一起来，于是在贞观十四年（640）诏国子祭酒孔颖达等撰定五经义疏，凡180卷，名之曰《五经正义》。《五经正义》于高宗永徽四年（653）颁行全国。

孔颖达，字仲达，冀州衡水（今河北衡水市）人。生于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卒于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少时，曾问学于名儒刘焯。隋大业（605—616）初，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炀帝召天下儒官集东都洛阳，令国子秘书学士与论议，孔颖达为冠，又最年少，老师宿儒耻出其下，暗遣人刺之，孔因藏于杨玄感家而得免。到了唐代，他历任国子博士、国子司业、国子祭酒等职。卒谥曰“宪”。

孔颖达主持编撰的《五经正义》，所选注本以全国通行者为准，基本参照陆德明的《经典释文》的作法，《易》主王弼、韩康伯《注》，《尚书》主孔安国《传》，《诗》主毛亨《传》、郑玄《笺》，《礼记》主郑玄《注》，《春秋左传》主杜预《注》。《五经正义》的编撰，即依据所选定的注本而加以疏通解释，疏文的撰写，就继承了前代经学的成果。如《尚书正义》和《毛诗正义》就多本于隋代刘焯、刘炫之说，《仪礼疏》则依据北齐黄庆和隋代李孟哲二家之疏。而且，除了根据注本和义疏之外，《五经正义》还广为引证、综汇诸家经说。如，疏解《周易》，就引用了历代易学家数十家之多，有孟喜、马融、郑玄、董遇、王肃、荀爽、陆绩、虞翻、王弼、何妥等，以及《易纬》。又如疏解《礼记》，则引《易纬》、《礼纬》、郑玄、谯周、贺瑒等之说。所引诸说，虽亦有不合于所据注本的观点，但孔颖达注重学术价值，予以采纳，并不拘泥于所据注本和所据义疏，而是有所选择、有所补充。如对《周易》王弼《注》，就有所取舍，排除了南朝虚浮义疏和以佛释《易》的义疏。又如撰写《春秋左传正义》，他虽申杜（预）驳刘（炫），但若两义俱违，则“特申短见”（《春秋左传正义序》）。孔颖达治学态度严谨，又能融贯群言，这就丰富了《五经》的学术

内容。

《五经正义》是唐初诸儒协力合作而成的巨著，据孔颖达在《序》中的记载，参加编撰的，《易》有马嘉运、赵乾叶，《书》有王德韶、李子云，《诗》有王德韶、齐威，《礼记》有朱子奢、李善信、贾公彦、柳士宣、范义颙、张权，《春秋左传》有谷那律、杨士勋、朱长才等人。通过唐初一批名儒对《五经正义》的编撰，对汉以来的经学作了总结，结束了经学内部宗派的纷争，经学从此获得了空前的高度统一，这是适应唐代政治上全国统一的巨大事功，有助于儒家思想地位的提高，对于巩固唐初的封建秩序，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从另一方面说，由于经学的高度统一，士子习经应试皆墨守《正义》之定论，不敢另立新说，却又使经学凝固化，在一定程度上又束缚了经学的发展。

孔颖达在《五经正义》中，贯彻了儒家重“礼”的传统，提倡尊卑贵贱的区别。他说：“人之所生，礼为大也。非礼无以事天地之神、辨君臣长幼之位，是礼之时义大矣哉！”（《礼记正义序》）他又借贺瑒的《注》说：“礼体言圣人制法，体此万物，使高下贵贱各得其宜也。”（同上）他为了提高“礼”的地位，乃至把“礼”说成是起源于“天地未分之前”，并与“天地俱兴”（同上）。

在哲学思想上，孔颖达颇受曹魏著名玄学家王弼的影响，认为“虚无”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他说：“万物之本，有生于无”（《尚书正义·洪范》），“一阴一阳谓之道”（《周易正义·系辞》）。在解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时，又说：“道是无体之名，形是有质之称。凡有从无而生，形由道而立，是先道而后形。”（同上）这种“先道而后形”的思想，对宋代的程朱理学颇有影响。

继《五经正义》而作经疏的，还有贾公彦的《周礼疏》、《仪礼疏》，宗郑注；杨士勋的《谷梁传疏》，宗范宁注。这都是唐初之作。唐后期又有徐彦作《公羊传疏》，宗何休注。这样，十三经注疏中，唐疏中占其九，加上唐玄宗注《孝经》，共有十家，实可谓盛事。它们先后立于学官，为后儒所重，得以广泛流传。唐玄宗开元八年（公元720年），国子司业李元瓘上言，又以《易》、《书》、《诗》；《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合为九经，并以九经取士。九经之中，还依据经文字数的多寡，分成大中小三等：《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谷梁》为小经。这九经先后都作了疏文。这对于儒学的统一，比两汉立博士有更大的作用。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6年），又依国子祭酒郑覃等之议，将九经文字刻于石，立于长安国子监，谓之“开成石经”。（在唐以前所立之石经，有汉灵帝熹平四年所立的“熹平石经”和后魏正始年间所立的“正始石经”）

五、佛学思想的昌盛繁荣

佛教唯心主义思想，虽然受到南梁杰出的神灭论者范缜等的猛烈抨击，但佛教在社会上已形成一股强有力的势力，僧侣地主阶级在政治、经济上都有地位。而且，由于佛教的因果报应说欺骗性很大，在人民群众中也颇有市场。隋唐统治者为了巩固其政权、加强对人民的思想统治，以及作为加强中央集权提高统治者威信的一种手段，他们都积极提倡宗教。特别是

在隋末农民大起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唐王朝，慑于农民群众抗争的威力，更加需要佛教这一精神工具来麻痹人民的反抗意志。因此，佛教在唐代进入了全盛时期。

这时期的佛教，已由不同的学术流派形成了各大宗派，各有自己独立的寺院经济、独特的宗教理论体系和传法世系。当时，在宗教理论上影响的宗派主要有：以智顗为代表的“天台宗”，以玄奘、窥基为代表的“唯识宗”，以法藏为代表的“华严宗”，以及以惠能为代表的“禅宗”等。

天台宗的“止观”说

天台宗，是在隋代形成的我国最早、最重要的佛教宗派。由于这个宗派是隋代天台山（今浙江省天台县境）僧智顗所创，后世就称之为“天台宗”。因其主要经典为《法华经》，故又称“法华宗”。

智顗，俗姓陈，生于南朝梁武帝大同四年（538），卒于隋文帝开皇十七年（597）。祖籍颍川（今河南许昌市）人，后迁往荆州华容（今湖南华容县）。其父是梁朝官吏，他17岁时，值梁末兵乱、家庭分散，遂出家为僧。后受其师慧思禅师的赏识和栽培，又兼他本人的日夜勤习，佛学造诣甚深。他以《法华经》为宗要，以《大智度论》为指针，并参照诸经，构成了他的佛学体系。他的主要著作有《法华经玄义》、《法华经文句》、《摩诃止观》，世称天台三大部。

天台宗的教义，基本上以大乘般若空宗的理论为依据，企图彻底否定客观世界来宣扬其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它不直接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而在首先把客观世界归结为“名”

(指概念)、“色”(指现象)二法。但又说客观世界的“名”、“色”只是“虚幻不实”的假象;并且认为“心”是世界的本原,“一切诸法,皆由心生”(《法华玄义》)，“名”“色”二法,即是由“心”这一本体的幻化。这就是说,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由“心”派生出来的。因此,智颢为了进一步宣传天台宗的佛教教义,就在调和以往南北佛教学派的基础上,提出了止观并重、定慧双修的宗教学说。他指出:“泥洹(涅槃)。按:佛教用语,梵语译音,指所想象的超脱生死的境界)之法,入乃多途,论其急要,不出止、观二法。所以然者,止乃伏结之初门,观是断惑之正要。止则爱养心识之善资,观则策法神解之妙术。止是神定之胜因,观是智慧之由借。……若人成就定慧二法,当知此之二法,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若偏修习,即堕邪倒。”(《修习止观坐禅法要》)佛教所说的“止”,也叫做“禅”,也叫作“定”,即是通过坐禅入定的宗教修养方法来求得“心”的寂静;“观”是即是“般若”,也叫做“慧”,系指佛教所谓的智慧、义理。它是对“心”的反省观察,或称“观心”、“辨心相”。通俗地说,就是由人的主观精神进行自我认识的修养而求得“般若”智慧(即佛教的一种神秘的认识能力)。南北朝时期,南方佛教注重义理,北方佛教讲求禅定,而天台宗则把南北佛教各自所侧重的方面统一起来。天台宗认为,要使人们从苦难的尘俗中解脱出来,进入“涅槃、即成佛的理想境界,必须坚持止观并重、定慧双修,两者废一则不可。这是因为只有禅定才能“伏结”“心积善资”,使人内心具有的性善的本质(即佛性)显现出来;只有根据“慧”(“般若”)的神秘认识能力,才能对种种现象作出正确的解释而“断惑”,否则就不能成其“正果”(即“证果”,佛家语,言修道

而有所证语、即所修者已成功)。天台宗宣扬通过这样的宗教修养方法,就能探索到对“心”这个精神本体的认识,达到佛教最高的精神境界;即认识到客观物质世界是虚幻的,而真实的存在则“唯是一心”。它引导人们鄙弃现实世界而一味去追求精神世界的满足,说明天台宗的止观并重、定慧双修的学说,是完全建立在它对宇宙本体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基础之上的。其所以如此,就在于天台宗提出了所谓“圆融三谛”和“一念三千”的佛教哲学学说。

天台宗的“圆融三谛”说,是从僧肇等人所传的大乘中观学派发展而来的。它根据其《中论》所说的:“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名中道义”的观点,建立了空、假、中“三谛”的理论。大乘中观学派看来,现实世界的一切事物是由于具备相当条件而生的,即“因缘所生法”,因而没有自生的独立存在的本体,所以谓“空”,这就是“空谛”;现实世界的事物虽然是“空”的,但却以虚幻不实的假象而存在,这就是“假谛”;这种“因缘所生法”的本体理解为非空非有的,那就合乎了“中道”,达到了佛所谓的最高认识,这就是“中谛”。大乘中观学派的这种看法,实质上是把客观的现实世界说成是空无的。智顗正是吸取并发展了中观学派的这种观点,变成了天台宗的“圆融三谛”学说。即所谓“三谛具足,祇在一心。……若论道理,祇在一心,即空、即假、即中。……三谛不同,而只一念”(《摩诃止观》)。正因为空、假、中谛“祇在一心”,所以“一心”也包含“三谛”。故“三谛”可以互相融通,三者本是一体,故称之为“圆融三谛”。这正如智顗在《摩诃止观》中所说的:“若谓即空、即假、即中者,虽三而一,虽一而生,不相妨碍。三种皆

空者，言思道断故；三种皆假者，但有名字故；三种皆中者，即是实相故。但以空为名，即具假、中。悟空即悟假、中，余亦如是。”这也就是说，由于三者一体，因而一念便可以同时具有三者的含义。因此，所谓“圆融三谛”，只不过是為了否定客观的现实世界而搞的概念游戏。其目的，无非是强调现实世界是空、是假，故不必执着于现实世界，而应去追求“唯是一心”的精神世界，即“中道”的佛的最高境界。

天台宗在认识论上，也和他们在世界观上否定客观世界、夸大精神作用一样，以他们的观念和虚构的精神，作为他们认识世界的出发点，提出了所谓“一心三观”和“一念三千”的观点。何谓“一心三观”？智顗的得意弟子湛然曾一语说穿了“一心三观”的根本。他说：“夫三观者，……唯于万境观一（念）心。观境虽殊，妙观（即“三观”）理等。”（《止观义例》）可见，所谓“一心三观”，就是要“唯万境于一心”，要把万象森然的客观世界，纳入于“一心”之中，要以自己幻想出来的那颗奇妙的“心”，来吞没整个现实的大千世界。因此，天台宗的“三观”，绝非“观”世界、认识世界，而是要否定世界，企图使整个现实世界都淹没在佛教的抽象世界之中。

而所谓“一念三千”，则就是智顗所说的：“夫一心具十法界，一法界又具十法界、百法界。一法界具三十种世间，百法界即具三千种世间。此三千在一念心。若无心而已，介尔有心，即具三千。”（《摩诃止观》）这里所说的“法界”，是指各类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所以，由一法界到十法界以至百法界、“三千种世间”，都是用来表明世界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佛家语言。尽管世界如此复杂多样，但在天台宗看

来,只要“一念心”起,便会产生三千世界。相反,如若一念不起,整个现实世界便会空无消失。天台宗在认识论上颠倒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把客观世界说成纯粹是主观思维的产物,显示了天台宗佛学思想的主观唯心主义实质。

天台宗盛行于初唐,中唐以后趋于衰落。但它对后来宋明理学的形成有所影响,如宋代理学家邵雍所提倡的观心内省功夫,就与“天台宗”的“止观”学说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唯识宗的“万法唯识”“唯识无境”说

唯识宗又名法相宗,是唐代出现的第一个佛教宗派,创始人是唐初著名的佛经翻译家玄奘和他的大弟子窥基。该宗的代表作有玄奘编译的《成唯识论》和窥基所著的《成唯识论述论》。唯识宗是承继了印度无著、世亲一派的大乘有宗的佛教思想而在中国创立的一个佛教宗派。

玄奘,俗姓陈,本名 祿,河南洛州缑氏县(今河南偃师县南)人。生于隋开皇二十年(600),卒于唐高宗麟德元年(664)。13 岁时即在洛阳出家为僧。玄奘一生的宗教活动,主要是西去天竺(印度)求取佛经,曾在印度等地游学 17 年,对印度各派佛学均有深湛的研究和创见。回国后主持佛经翻译,译出佛典 75 部,共 1335 卷,在扩大中外文化学术交流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并撰写了有重大历史价值的《大唐西域记》一书。玄奘可谓是中国佛教史和中外学术交流史上的一代伟人。

唯识宗的教义,是一个相当完整而细密的主观唯心主义体系。其内容,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唯识宗是以阐明“万法唯识”、“唯识无境”为根本宗

旨的。它不满意于般若空宗把“心”或意识也看成是存在的假象,认为这样看便会从根本上动摇佛教的灵魂不死信仰和成佛的理论依据。因此,它提出了“万法唯识”、“一切唯识所现”和“唯识无境”的理论。

第二,认为世界万物,作为“色”或“外境”,都是虚假的现象,“但由假立,非实有性”。原因是它们都由“识”或“内识”(精神观念)变现出来的,即所谓“实无外色,唯有内识变似色生”,“实无外境,唯有内识似外境生”。也正如玄奘在他的《成唯识论》中所说:“彼相(指外界各种现象)皆依识所转变而假施設”。这就是说,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是由意识变出来的,所以是虚假的;把它们看成客观的存在,那只是一种假设而已,只是“识”的幻影。这是唯识宗理论的根本原理。

第三,唯识宗宣扬“识体转似二分”,即“识”的本体在显示自己的作用时:一方面表现出意识的认识作用,称之为“见分”;另一方面又派生出被认识的对象,称之为“相分”。因此,唯识宗认为,离开了“识体”的“见分”和“相分”就没有“我”(指生命的主体和自我意识)和“法”(指事物及其规律)的一切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所谓“依斯二分,施設我法。彼二离此,无所依依”(《成唯识论》)。它强调世界上的各种现象,从表面上看,好象在意识之外(“似外境现”),其实都在意识之中(“相在识内”)。

第四,唯识宗又进一步通过一套“八识”(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赖耶)的概念分析,来论证最高精神本体“识”的主观作用。它认为八识中的前六识具有见、闻、嗅、味、知的识别作用,第七识(末那识)的作用是思量,是一种内在的自我

意识。但是,所有这些知识都需要有一个认识的主体来认识它们,这个主体就是第八识阿赖耶识,“若无此识,谁识其他”。唯有第八识的作用是最绝对的,它是前七识的共同依据,因为它藏有精神性的“种子”,一切外界事物都是由藏在阿赖耶识中的“种子”变成的。这实质上就等于把阿赖耶识说成是永远不朽的灵魂,并且认为作为第八识的阿赖耶识还含有所谓“能藏”、“所藏”、“执藏”的三重涵义。“能藏”是指上面所述的它藏有精神性的“种子”;“所藏”是指它所藏“种子”的总体;“执藏”是指第七识执着它作为自我意识而存在。作为“种子”是意识的潜在状态,由“种子”的潜在状态转化为意识的显现状态(“现行”),是互为因果的。因为,当意识的潜在状态转化为意识的显现状态后,意识的显现状态即会把它的印象反映到潜在状态,使潜在的意识受到熏染,正如以香花熏油,使油也获得花香,这叫做“熏习”。被熏染的“种子”又将转化为新的“现行”。唯识宗企图以此来证明客观事物的变化、从潜在隐蔽的状态到公开显现的状态,都是“识”在那里起着支配的作用,是“识”自身变化的不同形式。

第五,唯识宗还认为,从山河大地的整个世界到个人的感官经验,都是自我意识在因果律支配下的必然显现。要从这个世界解脱出来,只有通过自我意识的修炼过程,这一过程又可分为若干阶段。只有当“识”逐渐转变成为“智”时,自我意识所变现出来的烦恼世界也就随之而变成为“周围无际、众宝庄严”的“纯净佛土”。按照它这种理论推定:既然每一个人的周围世界都是自我意识的必然显现、而为意识的因果规律所决定,所以,不论他受苦或享乐,一切都应该如此。这就可以看

出,它这一套主观主义的繁琐理论,归根到底,不过是企图从哲学理论上宣扬因果报应和宿命论的粗俗教义而已。

唯识宗的特点是,它的唯心主义理论体系要比其他各佛教宗派的理论更为精致,但也最为繁琐。由于它是生搬硬套印度大乘有宗的经院哲学,没有能进一步结合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现实需要,因此它在初唐流行几十年之后就消沉了。但这派理论中包含有一定的辩证法因素,它的因明(逻辑学)学说,迄今还是值得探讨的课题。

华严宗的“法界缘起”说

华严宗实际是由法藏创立的,以阐扬《华严经》而得名。

法藏,祖籍本是我国西域康居人,在他祖父时迁居于长安,因而以康为姓。生于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卒于唐玄宗先天元年(712)。他曾参加玄奘主持的译经工作,后与玄奘意见不合,自创华严宗。他曾为武则天讲《华严经》,受到武则天的宠信,并把《华严经》中贤首菩萨的名字赐给他作称号,称他为“贤首国师”。法藏之后的代表人物是澄观和宗密。法藏的佛学代表作有《华严经义海百门》、《华严金狮子章》等等。

华严宗的基本教义与天台宗、唯识宗并无多大区别,也是把客观物质世界说成是主观精神的产物,否认客观物质世界的真实性。它提出“尘无自性”、“尘是心自现”(《华严义海百门》)的观点,即认为客观世界的“尘”是没有它自己的独立存在的,它只是主观精神“心”的体现。法藏还以“金狮子”作比喻,他说狮子是金子做成的,但是“金无自性”,只是由工匠制成狮子就成为狮子,做成什么就是什么,因此,金子是虚假、不

真实的。他认为,世界万物也像金狮子那样,都不过是人的主观精神(“心”)所变化的幻想、幻影而已。(《华严金狮子章》)。

由于法藏认为事物没有“自性”,因此,法藏又进而认为事物之间都是相对的,没有性质的差异,据此来宣扬其相对主义。就空间而言,他举尘土之微粒与须弥山为例,认为“此尘与彼山大小相容,随心回转而不生灭。且如见高广之时,是自心现作大,非别有大;今见尘圆小之时,亦是自心现作小,非别有小。由人的主观意志确定,尘土与高山都没有区别。法藏又就事物的个体与全体来说,他强调“自一”与“多一”是互为条件存在的。但他却又说:“谓此诸缘要互相遍应,方成缘起。且如一缘遍应多缘,各与彼多全为一故,此一即具多个一也。”(《华严经探玄记》)按此说来,每一事物,它本身既是他物存在的条件(“缘”),同时它本身的存在又以他物的存在为条件,这其中确也包含有辩证法的因素。但是,他把这种依存关系归结为“一”具备“多”或部分容纳全体的关系,这就成了一种相对主义的诡辩。因为,某些依存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是包含的关系,但并不是所有依存关系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是包含的关系,亦并不是所有依存关系都无条件地是包含的关系。而其思想实质,则在于消融各种差别和对立,以达到美化现实社会的作用。

华严宗还以“法界缘起”论为中心,特别阐发所谓“由法界”的理论。所谓“法界缘起”,归根结底是指世界的物质(事)现象和精神(理)现象这两类根本现象谁为缘起的问题。具体来说,“法界缘起”论是讲理、事,理与事、事与理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由此,华严宗提出:“四法界”说:“事法界”,“理法界”、

“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华严法界玄镜》）。关于这四法界，法藏解释说：“理不碍事，纯恒杂也；事恒全理，杂恒纯也。由理事自在，纯杂无碍也。”（《华严经义海百门》）可见，华严密所谓的“事法界”，是指形形色色的物质现象世界（“杂”），所谓的“理法界”，是指清净的精神本体世界（“纯”）。这两个世界互相包容而无妨碍（“纯杂无碍”），可称谓“理事无碍法界”。各种事物之间都互相包容而无妨碍，可称谓“事事无碍法界”。他认为，这四种法界即体现和包容了世界万物万物的关系。华严宗把世界区分为“理”和“事”，即本体和现象两大法界，即理法界和事法界，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分析，对于人们区分现象和本质、存在和精神，这无疑是有启发作用的。但是，华严宗不仅把理法界和事法界并列，而且还在物质世界之外，又虚构出一个本体世界（即理法界），并进而把“四法界”都说成是“一真法界”的产物，所谓“统唯一块法界，谓总该万有，即是一心；然心融万有，便成四种法界”（《法界观门》注）。这就把产生“四法界”的“一法界，谓总该万有，即是一心；然心融万有，便成四种法界”（《法界观门》注）。这就把产生“四法界”的“一真法界”最后归结为“心”的精神世界。这说明华严宗的“法界缘起”论，完全是一种宗教唯心主义的世界观。

华严宗在“四法界”中，特别推崇“理事无碍法界”。这里所说的“无碍”，是指“统一”的意思。因为它所谓的“理”，是指佛教的最高精神本体（佛性、真如）；所谓的“事”，是指现实世界的万事万物。他们认为“事”是虚幻的，不能独立存在，它要依靠“理”才能存在，“理”是“事”的本体、本性，“事”是“理”这一本性这个最高精神本体的体现，这也决定了“理”与“事”之间

没有矛盾、互不妨碍，都融和在“理”这一精神世界之中。所以，华严宗还把这种“理事无碍”的关系，概括为“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以夸大事物的统一性来抹煞事物的差异性，为其宗教的宣传而服务。既然“理事无碍”，所以佛教的“天国”就不是不可逾越的彼岸，这就诱使人们去追求佛教世界的自我“解脱”。

华严宗的教义要比唯识宗更有欺骗性，这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所以很受统治的支持。从中唐到武宗（公元8世纪初到9世纪中）盛行了170多年之久。而且，华严宗的“理”、“事”关系的思想理论，对后来程朱理学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

禅宗的“顿悟”说

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它是中国独有的佛教宗派，盛行于唐代后期以至五代。晚唐以后，其它佛教宗派都逐渐衰亡，禅宗取得了佛教的垄断地位。

禅宗的兴盛，是和唐代社会的阶级斗争形势紧密联系的。从“安史之乱”到唐末农民大起义，唐代封建统治日趋腐朽崩溃，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又看不到出路。于是，禅宗应运而生，用“顿悟成佛”的思想，从精神上来麻醉痛苦的人民群众。

惠能是禅宗的创始人。他俗姓卢，祖籍河北范阳（今河北涿州市），后迁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县东）。生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卒于唐玄宗先天二年（713）。禅宗的主要经典是《坛经》。

禅宗的根本宗旨是强调主观精神的领悟，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惠能继承和发展了南朝竺道生的“顿悟成佛”学说，认为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所谓“一切众生，本来涅槃，无漏智性，本自具足”（《神会语录》），只要凭借人的主观信仰和觉悟，就能明心见性、顿悟成佛。惠能说：“自有本觉性”，“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是解脱”。（《坛经》）他指出，佛性就是本心，心性相通。人一旦认识本心，觉悟到佛理，即可解脱成佛。

惠能的师傅弘忍，有一天宣称要选择法嗣（继承他衣钵的人），令徒弟各写一偈（佛家所唱诗句），以阐明禅宗的根本教义。弘忍的大弟子神秀即在夜间于墙壁上书写一偈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坛经》）他用形象比喻的语言，以说明佛教徒要经常注意宗教的修养，要像菩提树、明镜台那样保持清洁干净，不受世俗杂念的影响。弘忍见偈，认为神秀阐述的禅宗教义还未真正入门，又令他再作一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弘忍认为此偈“悟其本性”，确是把握住了禅宗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机要”，显示出惠能确已“升堂入室”，就选定他为嗣法人，从而开创了在中国佛教史上别开生面的禅宗。

根据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根本宗旨，惠能在如何成佛问题上，进一步提出“无念”和“顿悟”之说。他说：“无念法者，见一切法，不着一切法。”（《坛经》）这里所说的“法”，系指外境。他认为，在人们与外境接触时，心不受外境的任何影响，就达到了“无念”。同时，还要有“顿悟空寂无知”（宗密《禅源诸诠集部序》），让人们认识到心本来就是空寂的，种种想法都是虚妄的，这样就会对一切事物和想法都不再执着，也就达到了“无念”、“觉之即无”。因此，禅宗把佛教修行，归之为修心，修心即可达到“无念”，显现出先天就具有的本性、即佛性，即可

“见性成佛”。可见，禅宗已经把成佛完全归之于自身内心的自觉，只要做到“无念”，尽管行住坐卧，都算是禅定，可以达到成佛。由于它一反其他佛教学派和宗派均强调坐禅的做法，就促使佛教进一步世俗化。

惠能的认识论，与他的宗教世界观和宗教修养方法是一致的。他否认客观事物的存在和变化，认为客观事物的存在和变化，都是人们的主观意识决定的。如“风吹幡动”，他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坛经》）他把“风吹幡动”说成是“心”的一种主观幻觉。因此，他认为认识不需外求，只需靠内心的反省自悟。他还认为，人们生来就有一种认识自己本性的能力——“灵知”，故说：“一刹那间，妄念俱灭，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也”（《坛经》），即只靠自己的“灵知”，“一刹那间”就可以“顿悟”成佛。

惠能提倡这种廉价的“顿悟”成佛学说，实际上无非是倾销进入“天国”的门票。对于灾难深重的人民群众，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和欺骗性；对于封建统治阶级，这种既省时又省力的、只要“放下屠刀”都可“立地成佛”的“顿悟”捷径，更是投合他们的需要，为他们穷奢极欲和残酷的剥削统治创造了解脱的理论。因此，禅宗受到社会各不同阶层的欢迎和支持，其流传时间之长、传播范围之广，为其它佛教宗派所不能及。而且，禅宗受到社会各不同阶层的欢迎和支持，其流传时间之长、传播范围之广，为其它佛教宗派所不能及。而且，禅宗讲究人人皆有佛性，不需外求，宣扬所谓有先验的觉悟和智慧，这和孟子的良知良能、天赋性善论都有共同之处。故而，佛教禅宗教义，对后来宋明理学中的陆（九渊）、王（阳明）心学的形成，有着直

接的影响。从宋明理学的形成和发展中,也可以窥见儒佛道融合为一体的脉络。

禅宗在其发展的进程中,不注意对佛经尊严的维护,甚至到后来公开提倡不尊佛、不念经,强调所谓“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坛经》)。这实际是否定了内心之外的佛的存在,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也在破除历来对佛祖、佛经的迷信。这说明,禅宗在彻底否定现象世界的同时,也就否定了外在的一切权威,从而也就破坏了佛教自身的神圣性。虽然,这并非是其本意,但在客观上还是有它一定的积极意义。

由上所述,可以看到隋唐佛学的发展过程,也是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而逐步中国化、世俗化的过程,遂使佛学成为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佛经的传播,给人民群众带来新的精神枷锁,起了消极作用;但它的唯心主义思辨,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理论思想的经验教训。

六、道教思想的义理化发展

南北朝以来,封建统治者虽然有时兴佛抑道或有时兴道抑佛,二教互有进展,但并未定于一尊,儒、道、佛基本上处于鼎峙的局面。封建统治阶级调剂佛、道、儒三大势力,维持它们的平衡,使之各有其用。因此,隋唐时期的佛教虽然十分盛行,而道教也很活跃。隋文帝曾尊著名道士焦子顺为天师,并特为他在皇宫附近建五通观。据说隋炀帝也曾拜茅山道士王远道为师。唐初,南北朝门阀士族讲求门第的传统势力不很强大,李唐统治者为了借助于神权以提高皇家的地位,自称为是

老子李耳的后裔(因道教徒把《道德经》的老子李耳奉为道教的始祖),故推崇道教。玄宗乾封年间,追号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又诏令“道士女冠隶宗正寺”。宗正寺是管理王室宗族事务的机构,说明唐统治者已把道士和女冠(女道士)当作本家看待。开元二十九年(741),又置崇玄馆,令士人凡习《老子》、《庄子》、《列子》、《文中子》的,可作为“明经科”应科举考试。于是,朝廷内外形成了崇奉道教的风气。

唐和五代的道教,由于受佛教和唐代灿烂辉煌的思想文化的影响,也进一步向义理化发展。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唐初的王玄览、唐睿宗、玄宗时的司马承祯和五代时期的杜光庭、谭峭。

王玄览的援佛入道

王玄览,原名晖,法号玄览,号洪元先生。生于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卒于武则天神功元年(697)。他的主要著作有《玄珠灵》。

王玄览是以神仙信仰来阐发老庄思想和以佛教唯心主义来充实道教理论的代表人物。他通过对“道”的神化和阐发,以论证神仙长生的道教信仰。他认为“道”是宇宙的本体、是永恒不变的存在,所谓“万物禀道生。万物有变异,其道无变异。”(《玄珠录》)在他看来,这个不生不灭、万物众生的本体——“道”,并不在人心之外,人心中就具有“道性”。因此,他强调修道不应外求而应内求。他说:“心生诸法生,心灭诸法灭,若证心无定,无生亦无灭。”(《玄珠录》)他认为,“心之与境,以心为

主”，“十方所有物，并是一识知。是故十万知，并在一识内”（同上）。他把一切事物都看作是人的内在意识所产生和决定的。故他进而认为，修道必须修得一个清净不变的“识体”，才能使“真体”不死而得道成仙。他说：“识体是常是清净”，“非是清净真体死”（同上）。可见，王玄览的道教教义明显地吸取了佛教唯识宗的“万法唯识”、“唯识无境”的思想。这种援佛入道以充实道教理论的现象，是唐代道教义理化发展的一种趋势。

司马承祯的 “主静”、“坐忘”的修持之道

司马承祯，字子微，自号“白云子”，河内温（今河南温县西南）人。生于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647），卒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他年少时就好学，鄙于仕途，年二十一，遂为道士，师事潘师正，为南朝道教茅山宗创始人陶弘景的三传弟子。他很受唐睿宗、玄宗的赏识和重视，赏赐甚厚。主要著作有《天隐子》和《坐忘论》。

司马承祯不注重炼丹、服食等道术，而注重以老庄思想为主体，吸取佛教的止观、禅定学说和传统的儒家关于内心修养方法，以阐发道教的静心坐忘的修真理论。

他认为，“道”是一种“神异之物，灵而有性，虚而无象，随迎莫测，影响莫求”（《坐忘论·得道》）的神妙莫测的东西。人如若能得到它，就可以长生不死，所谓“人怀道，形骸以之永固”，即为“得道”（同上）。而若要修真得道，在于“修心”，“修心”的关键又在于主静。他说：“心为道之器宇，虚静至极，则道居而契坐”（《坐忘论·泰定》），“夫心者，一身之主、百神之师。

静则生慧，动则成昏”(《坐忘论·收心》)。他认为，只有保持内心的绝对平静，才能得道而萌生智慧。而若要做到心静，得首先认识到客观世界是虚幻不实的，这样才能排除外界的种种诱惑，做到“虚心”、“安心”，从而达到心静而“道自来止”，即所谓“心不受外，名曰虚心；心不逐外，名曰安心。心安而虚，则道自来止”(《坐忘论·收心》)。

司马承祯为了修真得道，还有一套修心主静的修养方法。他说：“学道之初，要须安会，收心离境，住无所有，不著一物，自入虚无，心乃合道。”(同上)这就是教人们闭目静坐，与世相遗，心里要“不著一物”，连思维活动都不许产生，专心致志地向虚无里面去追求所谓“心乃合道”的精神状态。并且认为，人的修炼功夫一旦达到“无心不定而无所不定，故曰泰定”(《坐忘论·泰定》)的境界，就能“形如槁木，心若死灰，无感无求，寂泊之至”(同上)，以至“内不觉其一身，外不知乎宇宙，与道算一，万虑皆遗”(《坐忘论·信敬》)，做到“彼我两忘，了无所照”(《无隐子》)。可见，他的“主静”、“坐忘”说，实际是从佛教的止观、禅定的宗教修养方法脱化而来的，是幻想通过佛我两遗，以寻求精神上的自我解脱和麻醉。

司马承祯还竭力鼓吹这种静以坐忘、修真得道的理论，宣称一旦“得道”，就能实现“身与道同，则无时而不存；心与道同，则无法而不通。耳与道同，则无声而不闻；眼与道同，则无目而不见”(《坐忘论·收心》)，成为与世长存的神仙。他这种静心坐忘的修真理论，到五代时，即与模拟自然的金丹(外丹)理论相结合，遂演变成钟离权、吕洞宾的金丹(内丹)道，对后世道教的影响颇大。

司马承祯的修心、主静的道教理论，对后来的理学有一定影响，如周敦颐的“无欲故静”的“主静”学说，就是从这里发展而来的。

杜光庭的纳儒入道

杜光庭，字宾圣，号“东瀛子”。处州缙云（今浙江永康县）人。生于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卒于五代后唐长兴四年（933）。唐懿宗时入天台山（今浙江天台县境）为道士，僖宗时召充麟德殿文章应制。后随僖宗避难至蜀，遂留成都。他是陶弘景的八传弟子，著作甚多。著名的有：《道德真经广圣义》、《常清静经注》、《道教灵验记》、《录异记》、《天坛王屋山圣迹记》、《广成集》、《道门科范大全集》等等。

杜光庭的道教思想特征是以道为本、纳儒入道。他继承和发展了唐玄宗时道士吴筠的作法，在《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三第九中就这样说：“仲尼谓敬叔曰：吾闻老聃博古而达今，通礼乐之源、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表明了他的道儒相契合又高于儒的宗旨。同书卷五第二十，又对这一宗旨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仁以履虚一，礼以不恃不宰，义以柔弱和同，智以无识不肖，信以执契不争，其大旨亦以玄虚恢廓冲寂希微为宗。”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的目的在于以道为主、融合儒道。他这一宗旨，也曾为后世道教所沿袭。

此外，杜光庭还将茅山宗与天师道两派的斋醮仪式统一起来，并加以规制化和给予义理方面的说明，亦为后世道教所沿用。

七、韩愈的反佛斗争和道统论

随着唐代佛教的兴盛，反对佛教的斗争也在发展。唐初反佛斗争则以傅奕、吕才为代表，他们继承了魏晋南北朝以来反佛斗争的传统，高举反佛旗帜，同时还对术数迷信开展了批判。中唐以来，则以韩愈等人为代表，他们以儒家观点进行反佛斗争，这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世俗地主和僧侣地主之间矛盾的反映。此外，儒、佛、道合流的趋向，也是这一时期思想领域的重要动向，它为后来宋明理学的形成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韩愈，字退之，邓州南阳（今河南南阳）人，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卒于唐穆宗长庆四年（824）。他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也是宋明理学的先驱。他出身寒微，“家贫不足以自活”（《韩昌黎集·上兵部李侍郎书》），自称“布衣之士”，是一个庶族地主出身的新官僚。他通过科举途径而任监察御史、国子博士等职，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布衣之士，身居穷约，不借势于王公大人则无以成其志”（《与凤翔邢尚书书》）。由于他想依靠权贵的提携而跻身于官宦的上层，这就使得他在政治上倾向保守、反对王伾、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等的政治革新运动。他的著作收于《韩昌黎集》，其中《原道》、《原性》、《与孟尚书书》和《谏迎佛骨表》等文，阐述了他的哲学思想。

自唐初兴佛以来，佛教寺院经济获得很大的发展，它直接损害国家财政收入，甚至达到“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的严重程度。中唐以来，均田制破坏，藩镇割据势力十分强大，国

家财政收入更为减少，愈发加深了寺院经济与国家政权之间的矛盾。

韩愈从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出发，自觉地担当起排斥佛、道宗教的任务。他说：“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虽然，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与孟尚书书》）。他以孟子学说的继承者自居，要效法孟子当年批驳杨、墨的精神，与佛道宗教进行坚决斗争。于是，他勇敢地发动了一场反佛斗争。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陕西凤翔法门寺有一块所谓的佛骨，宪宗遣使迎到宫中供奉。当时，在皇帝和贵族们的倡导下，迎“佛骨”一事引起了朝廷内外的轰动，不少百姓“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到暮，转相仿效，唯恐后时”（《谏迎佛骨表》）。韩愈对这种残伤身体、浪费钱财的宗教活动竭力反对。他写了《谏迎佛骨表》劝宪宗把这块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还引证了大量史实，证明凡敬佛的皇帝，不是国家灭亡就是寿命不长、身死名裂，“事佛求福，反更得祸”。因此，触怒了宪宗，被贬到潮州。但韩愈却并未因此而放弃了自己的主张。他写诗言志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朝除弊事，岂将衰朽惜残年。”表明了他反佛的坚定态度。在佛教势力极盛的情况下，他这种坚持反佛斗争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韩愈继承了前人反佛的传统观点，从儒家正统观念出发，认为佛教为“夷狄之物”，与中国伦理道德不合；而且佛教徒又不从事生产，对国计民生都有害。寺院经济的发展，使逃避赋役的人口增加，则造成唐王朝更深的财政危机，加重对人民的压榨，势必引起农民的反抗。他主张严禁佛、道宗教，没收寺

观,烧毁佛、道经典、令僧尼、道士还俗,并用儒家学说对人民进行“教化”,今后“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谏迎佛骨表》)。

韩愈在反佛斗争中,还建立了一套儒家的“道统”说理论,与佛道宗教理论相对立,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思想的理论基础。

他在宇宙观上,基本坚持传统的天命论和天人感应之说,认为“天”是赏善罚恶的人格神,所谓“贵与贱、祸与福存在于天”(《与卫中行书》)，“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答刘秀才论史书》)等。但从韩愈的整个思想来看,他注重的并非“天道”而在“人道”,而且创造了一个“先王之道”的“道统”,强调“道”是最高范畴,它体现于天、地、人之中,又贯通于古往今来,它是称天的客体精神、永恒的存在。而作为“道”的体现者的“圣人”,则应该“先天不违之谓法天,道济天下之谓应道”(《贺册尊号表》),要求把顺应“天道”和尽“人道”结合起来,并以一种“为主之道”(《原人》)的自觉,来重整封建的伦理纲常。因此,韩愈的“道”,其内涵实际就是抽象化了的封建伦理道德规范。他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原道》)即认为按照仁义的道德规范去做,就是“道”。仁义与道德之间,只是虚与实、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道”就是“仁义”道德的抽象。

由此可以看出,韩愈的“道统”说的中心思想,就是他在《原道》篇中着重阐发的封建的仁义道德。他认为,“仁”就是要求自己“顺而祥”,待人“爱而共”,存心“和而平”;表现在行动上则是一切要遵行纲常秩序,即所谓“义”。在韩愈看来,他主

张的“道”与佛老所谓的“道”之间，有着原则的区别，用他的话说，就是：“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原道》），而佛之“道”，则是“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同上）。所以，韩愈认为佛、道之所以错误，就在于违背了仁义道德，因为它们一味追求“清净寂灭”，抛弃君臣父子的伦常，走上了不要天下国家、毁灭伦理纲常的道路。

韩愈为了反对佛道，他还运用和改造了儒家经典《礼记·大学》篇的理论，来与佛、道理论相抗衡。他认为，儒家《礼记·大学》篇所提供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原理，是把治国平天下与个人道德修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既讲“修身为本”，也讲“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且，治国平天下就是道德修养自我完善的体现。因此他说：“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原道》）。可见，韩愈所推崇的“道”，是为了一个“有为”的人间世界。而佛、道的宗教修养，却要求人们遁世无为，这既不符合先王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原理，也违背了君臣父子的伦常，甚至会导致“灭其天常”，这对封建制度的维护是十分不利的。韩愈强调儒家“先王之道”，除在理论上抨击佛、道之外，还具有反对当时藩镇割据的分裂局面，要求加强中央集权的积极意义。

韩愈为了与佛教的传法世系的法统论相对抗，他还杜撰了一套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孟的“道统”传授谱系。所谓“先王之道”，从尧开其端，代代相传，“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原道》）。他确定“先王之道”由尧舜而至孔孟，有一个传授的系统。而且这个“道统”之端，在时间上也早于佛、道，因

而比佛道更具有正统的权威性。虽然,从孟子之后,“道统”就中断了,但仍后继有人,韩愈就曾宣称自己便是得自孔孟心传的“道统”继承人,所谓“天……如使兹人有知乎,非吾其谁哉!其行道,其为书,其传后,必有在矣。”(《重答张尔书》)他的历史使命就在于恢复和发扬儒家的这个“道统”,加强和提高儒家思想统治地位。

韩愈的“道统”说,是一种“圣人”创世论的唯心主义观点,鼓吹英雄史观。他把人类社会的存在、物质财富的创造,以及社会生活的组成,统统归之于“圣人”,甚至宣称:“如古人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原道》),所以,人民必须绝对服从“圣人”的意志和统治。他把君主统治人民,人民服事君主,说成是天经地义、合乎自古以来的“道”。如若人民不把自己劳动所得来的粟、米、丝、麻、器皿去供奉统治者,则应受到诛戮的惩处。他说:“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则诛。”(同上)这一理论,充分暴露了韩愈的立场和“道统”说的实质。它很受宋明以来统治者的赞赏,成为为封建统治辩护的正统理论。同时,“道统”说还对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也产生过影响和消极作用。再从另一方面看,因为儒学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确实长期地居于主导地位,对于封建社会的政治、伦理、哲学、文学等方面,都具有重大影响。因而韩愈所说的“道统”,即代表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方面,其中虽有不少糟粕,但也包含有许多精华。“道统”说的提出,又是针对佛教在中国的盛行,因此,“道统”说还具有捍卫、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的意义和作用。

韩愈把他的“道统”说说成是“天”的体现，是受命于“天”的“圣人”的本性的体现，因而是不可动摇的、永世长存的。韩愈这一“道”体现“天”的观点，对宋代程朱理学的产生有着重大的影响，成为宋明理学的先驱。

八、柳宗元的 天人“各行不相预”学说

柳宗元继承和发展了汉初以来的“元气”论，以其哲学名篇《天说》，针对韩愈将“天”作为有意志、能赏罚的人格神，直接与之论辩。复以其哲学名篇《天对》，对战国时期大诗人屈原在《天问》中所提出的、有关宇宙和历史的诸多重大问题，作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答复。《天说》提出了概括的结论，而《天对》则比较全面的表述了他的唯物主义宇宙观。

柳宗元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无论其形态如何千差万别，其实质皆为自然物质“元气”。所说的“天”和“地”，也是“元气”的不同表现形态。他说：“本始之初，诞者传焉。鸿灵幽纷，曷可言焉！眇黑晰眇，往来屯屯；庞昧草化，惟元气存，而何为焉？！”这是他在《天说》中回答屈原《天问》开篇关于宇宙的生成问题。柳宗元批评了传说中荒诞的本始神秘和造物主之说，强调只有“元气”才是“本始之初”天地宇宙中唯一的物质存在，是世界统一的物质基础。

柳宗元又进而对“元气”自身的规律作了深入的探索和阐述，建立了他的“元气”自然运动的宇宙观。他说，在原始的混沌状态中，只有“元气”在自然运动发展，由此派生出了阴阳二

气和天,即所谓“合焉者三,一以统同,吁炎吹冷,交错而功”(《天对》)。阴、阳、天三者的结合点,是受“元气”所支配、“统同”。“元气”缓慢地吹动,造成寒冷的天气,冷热交错起着促进万物生长、变化和发展的作用。即造成了所谓“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是虽大,无异果蓏痲痺草木也。”(《天说》)毫无神秘可言的天地、阴阳、果蓏痲痺草木,这世界的多样的变化,柳宗元统统把它归结为“元气”本身的相互(“交错”)作用,也就是“元气”自然运动的结果。

柳宗元在《非国语》中,还运用了八个“自”来形象地描述“元气”自然运动的各种形态。他说:“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为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是恶乎为我设!”“元气”的动态和静止、停滞和流动,撞击和平息、爆裂和废止,并非是有高于宇宙的人格神在主宰(“谋”)和操纵(“设”),完全是作为物质的“元气”自身自然运动(“自”)的结果。由于“元气”本身所具有的矛盾对立、自然运动的“交错”形成了“元气”运动中的各种不同形式。柳宗元的“元气”自然运动的卓越见解,发展了王充“元气”唯物论的观点,不仅丰富了我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唯物主义内容,而且具有朴素的辩证因素。

柳宗元还阐述了宇宙的无限性的认识。在《天对》中,他指出,“天”无界限,“焉恃乎八柱”,否定了前人传说中所说的天由八柱支撑而存在;“天”亦无所“系维”,而是无边无际、无极无限,“无极之极,漭漭无垠”,无边际就是他的边际,故“天地之无倪(边际),阴阳之无穷”(《非国语》)。正因为“元气”无限、

阴阳无穷。故天地亦“无倪”。他对《天问》中“自明及晦，所行几里”的回答是：“当焉为明，不逮为晦。度引久穷。不可以里”（《天对》），正因无边无际，就无法以里为计，说明无论在时间空间上，“元气”都具有无限性，这一认识也是超越了前人的。而且，他还把我国古代早已有的地动说和地圆说结合起来，说明太阳的出没和昼夜交替的自然现象，是因为地对太阳天就明、地背太阳天就暗。这些见解，尽管只是一种直观的猜测，但也丰富了古代唯物主义的宇宙观。

针对韩愈的“天”有意志、赏善罚恶的错误理论，柳宗元在答刘禹锡《三论书》中，提出了天人“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预”的思想理论。他认为，天地、元气、阴阳同瓜果草木一样，都是没有意志的自然物质，因而人事的“存亡得丧”和“天”根本没有感应和赏罚的关系，故而“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天说》）他进而认为，年成的凶歉丰歉和社会的治乱，也是各不相干的两件事：“生植与灾荒，皆天（自然）也；法制与悖乱，皆人（社会）也”，肯定自然界和社会是互不相预的两个范畴，而“天”是物质的客观存在，人世间的“功”和“祸”，与所谓天意并无联系，故而“是非存亡，皆未见其可以喻乎天者”。柳宗元发展了荀子“天人相分”的观点，进一步否定了超自然的天命、神权的存在，这是他正确的认识。但是，他把天、人截然分开，没有认识到社会、人对于自然、天的能动作用，这一关于“天人之际”的理论问题就留给他的挚友刘禹锡来予以发展和阐述了。

柳宗元以其“元气”自然运动和天人“各行不相预”的唯物主义思想为理论武器，对历史上的以及当代的神学迷信进行

了无情的批判，较为系统地阐明了他的无神论思想。

对于上帝创世神创造九重圆天和世界的传说，柳宗元说九重圆天乃“无营以成”，是浑沌的“元气”运动而成，“无功无作”。传说中的女娲，一天变化七十次，他说这是“娲躯虺号，占以类之，胡曰化七十，工获诡之”（《天说》），是迷信而诡言之，并非实有。

对于神不灭论，他坚决反对，主张神灭。他说：“仙者幽幽，寿焉孰慕？短长不齐，咸各有止；胡纷华漫汗，而潜谓不死！”他认为人的寿命都有终极而各有长短，否认有不死之人。

对于传说中的“大电”、“大虹”、“玄鸟”、“巨迹”、“白狼”、“白鱼”、“流火之乌”以及秦汉以来的“虺蛇”、“天光”、“封禅”、“丹书”、“符命”等等，柳宗元认为这都是“后之妖淫嚚好怪之徒”“以为符”，“诡譎阔诞，甚可羞也，而莫知其本于厥贞”（《贞符》），这一切的基本点都出于占卜迷信。

对于董仲舒以来著名的儒学大师所宣扬的神学迷信，柳宗元也给予了严厉的批判。他指出，“董仲舒对三代受命之符”之“非”，而且“何独仲舒耳！自司马相如、刘向、扬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袭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类淫巫瞽史，诋乱后代，不足以知圣人立极之本”（《贞符》）。

柳宗元深刻地揭示了有神论者宣扬神学迷信乃至运用占卜的目的，都是欺骗和愚弄人民。他指出：“古之所以言天者，盖以愚蚩蚩者耳，非为聪明睿智者设也”（《断刑论》下）。他认为，圣人是不以“神”和“天”为根据的，就如孔子“不语怪与神”；君子是不以“诬”来欺骗君主的，应该以“道”来促使君主贤明。按照这个原则，他对《国语》一书中的神学迷信进行了批

判。同时,还提出了“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非国语》)的命题,说明神学迷信产生的根源。指出:正因为统治者无道,感到自己力量不足,所以要借助于天命鬼神。他从另一个角度,批判了神学迷信和推行神学迷信的愚民政策。

柳宗元针对中唐时期豪族地主享有各种特权的情况,以其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观点,贯穿于社会历史观,用以对封建豪门特权者所赖以维持其统治的理论——神学天命论,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的“生人之意”为历史前进动力的新学说,与刘禹锡的“法制”说,互相联系、互相补充,是唯物主义在社会史观上的首创性运用。

第一,以“人”与“神”对抗。柳宗元概括社会发展的规律,是“生人之意”原则决定一切,绝无“赏功罚祸”的天意存在。所谓“生人之意”,亦“即“生民之意”,就是使人民百姓能得到生存和发展。而人类的发展、历史的演化,一切都决定于“人”,并非决定于“天”。故他说:“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贞符》)在他的著作中,无论哲学、文学,都贯穿了这一思想。

第二,以“道”对抗神。柳宗元说:“圣人之为心也,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盖于人也。”(《褚说》)他提倡“道”,是为了“人”,是以“生人”为目标的“济世之道”。《荀子·礼论》云,“宇中万物,生人之属,待圣人然后分也”,而柳宗元则常提醒自己,虽然仕途未达,但决不能忘记“生人之患,则圣人之道幸甚”(《答周君巢馈药久寿书》)。他认为孔子对古圣人伊尹的肯定,是因为伊尹“以生人为己任”,故而,“君子为道,舍是宜无以为大者也”(《与杨诲之第二书》)。而“生人之意”的具体内

容,也就是柳宗元所提倡的“遂从之欲”、“厚人之生”,其实质就是使“民富”、“民安”,这才是所谓的“圣人之道”。在他的文学作品《种树郭橐驼传》中,提出以种树之“道”“移至官理”,就可以因养树而得“养人”术。在《捕蛇者说》等许多作品中,为人民的苦难不平、为人民的灾祸而呼号,要求给予人民安定的生活,并认为这才是“道”。所谓“力足”与“力不足”,是“足乎道之谓也”(《非国语》)。可见他的“道”的基础是反对批判神学迷信。而“一明大道,施于人事”则是他的“道”的最终目的,不仅以此“道”对抗神学迷信,而且要用于现实的人事、政治改革的实际。总之,在“生人之意”的“道”的理论中,柳宗元不仅否定了孟子的先验主义道德起源论,也否定了老庄消极无为的道德学说,而是继承并发展了《墨经》和韩非的进化观点、以及荀子的《礼论》思想。

第三,以“势”否定“意”。柳宗元对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自然发展规律的认识,基于他的无神论的自然观,也把它看作是自然地运动、发展的必然趋向,提出了“非圣人之意也,势也”的精辟论断。以“势”的必然,以“势”的客观存在,说明社会历史的发生、发展以及社会政治制度的变化和更替,从原始人类的生产斗争开始,到因物质欲望的发展而产生争斗、为制止争斗而建立法制。这一切,也是“势”所必然,是符合“生人之意”而决非少数“圣人”主观意愿所能创造的,从而批判了韩愈的“圣人”创建立法的英雄史观。柳宗元继承发展了荀子的“治乱非天”(《天论》)的思想,提出“势”的概念,用以解释历史的演变规律,无疑是历史观方面的一个创见。

第四,对于历史领域和礼乐刑法制度中神学迷信的批判。

柳宗元依据“生人之意”的社会历史观,对历史领域中的神学思想和各种宗教迷信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批判。在他的《非国语》中,六十七篇中有三十一篇就是直接批判神学历史观的。批判所及的历史人物有虢文公、伯阳父等二十八人。例如他批判周大夫伯阳父的“三川震”神学历史观时,针对伯阳父因西周三川皆震而说“山崩川竭,亡之征也,”批判说:山川是“天地之物”,阴阳之气冲击交错,这是天事,国家由于乏财用而灭亡,这是“人事”。柳宗元严格地区分了“天”和“人”,尖锐地批评了《国语》作者“多诬淫不概于圣”和当时社会的神学历史观。

在《时令》上、下篇和《断刑论》中,柳宗元几乎对一切礼乐刑政制度中以宗教迷信来违反“生人之意”的,均予以批判。如在对《月令》提出的“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之说,斥之为“瞽史之语”。对于赏于春夏而刑于秋冬之说,斥之为“伪”,宣称“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顺其时,以谄是物哉”。并且以其无畏的精神,表示自己的决心:“用子之说罪我者,虽穷万功,吾无憾焉尔”,显示了唯物主义的战斗精神。

九、刘禹锡的“天与人交相胜”学说

在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上,刘禹锡和柳宗元一样,坚持了唯物主义的“气”一元论,认为“元气”是天地的本原,自然界万物都是通过阴阳二气相互为用、运动而存在的,都是“乘气而生”。他首先肯定了客观世界的物质性,同时,他指出“空”与物质的关系,即使是无形的“空”,也并非空虚、抽象的非物质

存在,而在“形之希微者也”(《天论》中),所谓“无形”,只是人的肉眼或感官感觉不到它的细微形体,因而“空”并不是离不开物质形体的独立存在,只是一种细微的物质表现形态。所谓“无形”,只是“无常形”,即形体经常变化而已,故而,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无形体的虚空。这就有力地驳斥了佛教和玄学把“空”或“无”看作是世界本原的理论。这一深刻的思想观点,在古代思想史上是很有价值的。

独创“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学说 在柳宗元作《天说》以后,刘禹锡续作《天论》上、中、下三篇,对柳宗元的唯主义和无神论思想作了重要的补充和发展,指出韩愈与柳宗元之间论辩的核心是“天人之际”的哲学根据问题。他独创地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学说,深化了“无人之际”的论辩。

第一,区别了“天”与“人”,探索人与天(自然)的关系。刘禹锡本着“天”即自然的观点,区分“天之本”与“人之本”。他说:“以理揆之,万物一贯也”,不论是天的日月星“三光”和其山川五行的根本(天之本),也不论是人头目耳鼻和其内脏器官的根本(“人之本”),都是客观的物质存在。他对于“古之言天”的学派作了分析,表明自己与“高远卓诡”之说并不同识,就“阴鹭说”和“自然说”这两派而言,他对于承认世界有主宰(“神”)的“阴鹭说”,持否定态度。他认为主张世界“茫乎无有宰者”的“自然说”是对的,但还有不足之处,故而他提出了自己关于“天人之际”的学说。

第二,刘禹锡的无神论思想的杰出贡献,在于他独创地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学说。以往的唯物主义者,由于不了解自然和社会的区别,往往以自然规律来解释社会历

史现象,甚至为了强调自然规律的普遍性和绝对性,而忽略或抹煞了社会生活的特殊性和人的自觉能动性,以致陷入历史宿命论或偶然论。如汉代王充的“时命论”,就认为“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尽管他在世界本原问题上唯物主义的,但是运用到社会历史上却又把治乱的原因归结为天时,“昌衰兴废,皆天时也”(《论衡·治期》)。柳宗元的《天论》,只着重说明了天是客观的自然存在和自身运动,提出了天与人“各行不相预”的思想,并未认识到人能掌握自然规律和对自然界的反作用,因而只停留在天与人“涉不相干”的认识上。刘禹锡则在坚决反对“天人感应”的神学天命论的同时,在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基础上,创造性地阐述了天人关系。

刘禹锡在《天论》中说:“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他指出了自然界(“天”)和人类社会(“人”)的区别,它们各有自己的特殊规律。自然界的各种生动都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以“强”胜“弱”为其法则;人类社会则是以“是非”观念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准则。虽然,刘禹锡所说的“是非”,仍以封建礼法为标准,并未超出封建秩序的范围,但他却察觉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不同以及它们自身规律的区别,从而进一步指出人的职能和作用。自然的职能和作用是“生万物”,人的职能是“治万物”,而“人为保虫之长,为智最大,能执人理,与天交胜,用天之利,立人之纪”,即利用自然规律,从事于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对自然万物加以利用和改造,以服务于人类的需要。故而“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因此,“天”与“人”互相制约、互为消长,交互争胜。刘禹锡不仅把“天之所能”与“人之所能”作了区分,而且

把在劳动生产过程中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交相胜”、“还相用”的关系。说明他已初步探索到人与客观世界有着既对立又联系的辩证关系,这就进一步深化了“天人关系”的理论。

同时,刘禹锡还进一步把“交相胜”和“还相用”视为世界万物发展的普遍规律。他说:“万物之所以为无穷者,交相胜而已矣,还相用而已矣。”(《天论》上)他深刻地认识到,物质在运动过程中,不仅没有主宰者的操纵,而且也绝非单纯的对抗矛盾,而是循着客观的规律,不断地互相矛盾、统一,而不断地向前发展着。这些观点,都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第三,刘禹锡强调,在社会关系上必须做到“法大行”,就能达到“人胜天”。他提出了他理想中的以“法制”作为社会秩序的准则和判断是非的标准。他说:“人能胜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则是为公是,非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赏,违善必罚。”(《天论》上)这样,人的“是非”就战胜了“天”的“强弱”,人就胜天。反之,“法大弛,则是非易位,赏恒在佞,而罚恒在直,义不足以制强,刑不足以胜其非,人之能胜天之实尽丧矣”(《天论》上),如是,则天胜人了。为什么天能胜人?是因为人的社会政治状况“不幸”,而不是“天”的作用。这样,刘禹锡就把“天”和“人”的关系中的主要方面置于人,而且将人定胜天的思想进一步运用到了社会问题。

刘禹锡认为,当人们对客观世界茫然无知、人们被客观世界和规律所操纵时,就会祈求于天,即所谓“人不幸,则归于天”。就以操舟为例,在江海里行船,由于人们对风浪不了解,控制不了船的航行,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即所谓“理昧”时,

就会受自然的盲目力量所支配,任天命而忘人力,就会去祈求“天”,陷入有神论。相反,人们认识和掌握事物的必然性,则“理明”,就会相信自己有力量去征服自然,就会达到人胜天的目标。所以,他要求人们去认识事物的必然性规律性,不信天命重人力,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他还要求人们认识“数”与“势”,认为这样才能达到“理明”。所谓“数”,是指二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势”是指事物具有复杂的多样性变化的必然性、规律性。他以舟水二物为例,说明水与舟二物有内在联系“数”,“数存,然后势形乎其间”,“势之附于物而生”(《无论》中),“数”与“势”均和客观事物不可分离。“理明”就是认识了“势”的差异性,因而不信天命而重人力。刘禹锡还就达到“理明”的认识方法作了说明:“以目而视,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视,得形之微者也”(同上),说明他意识到认识由“粗”及“微”,由表及里的两个不同层次。刘禹锡从认识论上去探求有神论和无神论的分界,这也是他在无神论史上的重要贡献之一。

刘禹锡认为,在社会政治腐败混乱之时,“法制”破坏、是非颠倒,受赏的往往是奸佞小人,受罚的都是正直的人,形成“义不足以制其强,刑不足以胜其非,人之能胜天之实尽丧矣”(《天论》上)的局面,人们完全丧失了对自身力量的信任而屈从于“天命”,最后必然导致宗教有神论的滋长。所以他说:“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与怨不归乎天;生乎乱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举归乎天。非天预乎人尔!”(《无论》上)而且,此时的统治者为奴役人民,就抬出神来,即所谓“商俗已讹,引天而驱”。刘禹锡在这里把对宗教神权的批判和对

社会政治的批判结合起来,从对宗教有神论的社会根源的揭露,深入到了对现实社会封建特权统治的批判。他所期望建立的“人道明”的“法制”理想,虽然在内容实质上仍然不外是“圣君贤相”的贤人政治,但却表达了刘禹锡以此来达到否定维护特权统治的神权的目的,鲜明地反映了当时庶族地主阶级的政治要求。

十、《无能子》的自然观

《无能子》是晚唐无名氏的著作,作者的真实姓名和生平已不可考。但从《无能子》一书中的序言中,约略能知作者简略情形和其写作宗旨。《唐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无能子》3卷,明正统《道藏》太玄经部收录《无能子》上中下3卷。

《无能子》的作者,“少博学,寡欲”,因黄巢起义而“避地流转,不常所处”,生活清淡贫困。光启三年(887),他寓居于左辅(今西安附近)“景氏民舍”,从事著作。所著者,“其旨归于明自然之理、极性命之端,自然无作、性命无欲,是以略礼教而外世务焉”。《无能子》的作者于光启三年(877)所著的《无能子》一书中,却表达了他进步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想。

《无能子》继承王充的“气”的自然唯物论,指出“天地未分,混沌一气。一气充溢,分为二仪。有清浊焉,有轻重焉。轻清者上为阳为天,重浊者下为阴为地矣。天则刚健而动,地则柔顺而静。气之自然也。”在这里,“气”自然而变化出了天地阴阳。“天地既位,阴阳气交,于是裸虫、鳞虫、毛虫、羽虫、甲虫生焉”(《圣过》),“气”被看成是构成天地万物的物质基础。在

“气”的自然运行中，产生了天地阴阳万物，也产生了人，人和一切“同生天地，交气而已，无所异也”。（同上）他把世界万物、人类的产生，都解释为阴阳二气交错流动而生成的物质，天地是“阴阳气中之巨物”，天地与人类的关系，犹如江海之有鳖，山陵之有草木，毫无神秘可言、更无高低尊卑之分。他还进一步指出，天地是无知无觉无爱憎的，它并非是有感应而能主宰万物的神灵。他用寓言的体裁，借范蠡之口说：“夫天地无心，且不自宰，况宰物乎？天地自天地，万物自万物。春以和自生，冬以寒自杀，非天地使之然”（《范蠡说》），这就从唯物主义自然论的理论上，进一步否定了天命神权。但是，在对于人和动物的分界上，《无能子》把人和动物混而为一，说“智虑语言，人与虫一也；所以异者，形质尔”，从王充的“人力之长”、“万物之中有智慧者也”和刘禹锡的“人，动物之尤者也”和“裸虫之长、为智最大”的观点倒退为形而上了。

《无能子》还从“阴阳气交”而生万物的观点出发，批判了“灾异说”和“祥瑞说”。有人把梟看作是一种专门预告吉凶的鸟。《无能子》认为，虽然梟形貌凶恶，但它和人类、兽类、其他鸟类“俱生于天地无私之气”，是“偶随气之清浊厚薄自然而行”的物质，它们并不受任何神灵主宰或具有什么感应的能力。因此，他得出“凤者未必祥，梟未必凶”（《纪见》）的结论。

第二节 科技发明与文化艺术

一、天文仪器 制造的成就和天文学名著

隋唐时期传统天文仪器的制造不但得到很好的继承,而且得到进一步发展,使中国古代天文仪器的制造提高到了新的水平。隋朝开国之初,庾季才、周冢等人绘制的星图,在恒星观测中比浑象使用起来更方便,但并没有因此而使浑象的制造停顿。隋文帝时太史耿询制造出不用人力的水运浑象,放于室内其运转显示的星象与实际相契合,使汉代张衡的杰作得以继承和发展;耿询在炀帝即位后又有新贡献,他根据太史丞献上的古歌器,与宇文恺合作,吸收后魏道士李兰的称漏原理,制造出可以方便携带使用的马上刻漏以及固定在乾阳殿前的称水漏器,只要漏壶漏向称盘中的水够了一斤,就是时间过了一刻,所以漏出一两水的时间就是 $1/16$ 刻,比起浮箭法读刻划记时要灵敏的多。这种记时仪器在隋唐时代曾得到广泛使用。

唐初没有什么新的发明,进入贞观时期,出现了新的天文仪器。太史李淳风奏灵台上用的后魏铁浑仪“法制疏略,难为占步”。受太宗之令新仪于贞观七年(633)制成,称之为浑天黄

道仪。李淳风造的这架铜浑仪，比后魏铁仪多了一重，成为内外三重的复杂仪器。中间的一重叫三辰仪，是新加进来，它不但有赤道，而且还有黄道和白道。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有将仪器上黄道与赤道的交点对准天空中春分点和秋分点的方向，仪器上的黄道才与天球上的黄道平行。李淳风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将二十八宿距星按它们与冬至点的相对位置，将距度刻在赤道上。当内重四游仪的望筒对准某一距星的时候，将三辰仪赤道上该距星的固定度数与望筒所指该星重合，这时三辰仪上的黄道就对准了天球上的黄道；白道是更为复杂的事，因为它不但与黄道有交角，而且白道与黄道的交点还沿黄道运动。他根据黄白交点大约 249 个交点月沿黄道移动一周，就在黄道上打了 249 对孔，每过一个交点月，移动白道到下一对孔，解决了这个难题。李淳风使浑仪的制造达到空前复杂的程度，功能也从未如此完善过。

显然这件复杂的浑仪除了实测功能外，还在一定程度上具备演示功能，将人们在天空中看不见的赤道、黄道和白道直观地显现出来，特别是它们之间相对位置的变化，如果没有直观的形象是很难想像的，而这台浑仪将黄道和白道在空间的图景，表现于眼前，确实是学习天文知识难得的模型，难怪唐太宗十分喜爱，下令放置于宫中的凝晖阁。由于它被锁入深宫不面世，这件杰出的仪器未能发挥作用，灵台上使用的还是那架后魏铁浑仪。

开元九年(721)一行受诏编制新历，主要原因是旧历日食屡屡不效。一行考虑到改善日食预报必须实测日月相对于恒星的运行，了解“黄道进退”，提出制造黄道游仪。在梁令瓚的

努力下,新仪于开元十一年造成。该仪基本结构与李淳风的浑天黄道仪相同,外重六合仪上去掉了赤道而增加了卯酉圈,是由子午、地平和卯酉三个大圆环构成的中空球体;中间三辰仪的赤道上一度一洞,使黄道环能在赤道内游动,故取名为黄道游仪,当时认为岁差是黄道游动所致,实际上应当是赤道环在黄道环内向西游动,白道环也能在黄道内游动,因为黄道环上也是一度一洞。这台仪器制造目的明确,新仪完成后,开元十二年至开元十三年,在一行领导下使用它进行了大规模的恒星位置测量。通过实测,发现许多恒星的位置与古代观测值相比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一行当时未能给予明确的解释,近人研究,是岁差造成的恒星坐标的变化。尽管当时未能释因,一行还是相信自己的测量结果,并把它用到了大衍历中,表现了他的科学态度。而贞观年间李淳风也曾发现星位古今不同,却舍去自己所测,继续沿用汉代的数据。此外,一行用该仪器还作过许多工作,如恒星的黄道内外度和春极度,月亮的运动等。

一行和梁合瓚还合作制造了一台水运浑天视图,实际上是同张衡、耿询的水运浑象类似的仪器,据《旧唐书·天文志》载,该仪在铜球上缀有列宿、赤道和周天度数,有两环络在球外,上面分别有日月运行,仪器“注水激轮,令其自转,一日一夜,天转一周”。除演示天象外还能报时,有二木人每逢一刻击鼓,每逢一辰敲钟。根据记叙,这台仪器的制作水平明显地高于张衡。仪器制成后置于武成殿前,示于百官。过了一段时间,铜铁锈涩,不能自转,但它给后人留下启迪,为中国古代天文仪器的继续发展作出了贡献。

除天文仪器制造硕果累累外,唐代还产生了很多颇具影响的天文学著作。这里所指的天文学名著,是指那些能反映唐代天文学水平及天文学发展特点并对后世天文发展发生较大影响的天文学著作,也是没有失传至今犹能读到的作品。按照这一要求,我们选择了《大衍历》、《晋书·天文志》、《隋书·天文志》、《乙巳占》、《开元占经》、《天对》等有代表性的著作,分别作一些介绍。

《大衍历》是唐代开元年间由僧一行编撰的一部优秀的历法,它有很好的实测基础,测量资料一部分来自黄道游仪的观测,另一部份来自全国多个观测点的极高、日影和距离丈量。《新唐书·历志》中记载了该历的许多内容,我们已经在前面关于七曜不均匀运动的计算和日食的计算中介绍了大衍历的成就。大衍历不但有历术七篇(步中朔术、发敛术、步日躔术、步轨漏术、步交会术、步五星术),在历法的结构和内容上形成系统,而且还力图探讨历法原理,寻找历法的本质,从哲学的角度解释历法。

大衍历的回归年长为 $365 \frac{743}{3040}$,朔望月长为 $29 \frac{1013}{3040}$,一周天定为 $365 \frac{779.75}{3040}$ 度,分母都是 3040,是为通法。这些数据是建立在观测基础上,但一行在《历议》中的解释却令人费解。他说:“易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一六为爻位之统,五十为大衍之母,成数乘生数,其算六百,为天中之积;生数乘成数,其算也六百,为地中之积。合千有二百,以五十约之,则四象周六爻也(注:即二十四);二十四约之,则太极包四十九用也……,天地中积千有二

百，揲之为四，为爻率三百，以十位乘之，而二章之积三千，以五材乘八象，为二微之积四十，兼章微之积，则气朔之分母也。”为了说明取 3040 为通法，用了二章之积与二微之积的和。从以上引文可见，一行希望以《易》释历，以追求抽象的历理。历史上有的评论家认为一行“推木易象，终为傅合”，附会《易经》，以“易”“眩众”，还说此：乃千古定论”。此说过分，可看作是人们对一行不成功的历理探研的嘲讽。不过试图以易释历早已有之，一行在《卦候议》中就指出：“十二月卦出于孟氏章句，其说易本于气，而后以人事明之”。他只不过是进一步发展这种理论，使大衍历的数据披上神秘的色彩而已。这种将历与“易”联系的结果，似乎为星占学找到了理论根据，一行对此也深信不疑。在《日食议》中，他说没有推算日食的方法，就不能检验历法的精密程度；若日食都能推算准确，人们怎么能知道政德的好坏呢（“使日食皆不可以常数求，则无以稽历数之疏密；若皆可以常数求，则无以知政教之休咎。”）？所以他用政德去解释开元年间的日食“当食不食”。在《五星议》中更引经据典，说明用五星作占的方法和应验的例证，系统地讲述五星犯宿、失行、合日等“所以示政教从时之义”。一行关于历理的论述，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反映出唐代天文学家合历算家与星占家为一身的特点和对传统天文学体系的进一步强化。

李淳风的著作很多，这里选择《晋书·天文志》、《隋书·天文志》和《乙巳占》作为他的代表作予以介绍。学术界一般认为晋书和隋书的天文志是历代天文志中写的较好的，很有代表性，可以说建立了写天文志的格式。它内容全面，体系完整。历史上几家谈论天地结构的学说，论者、论据、不同观点的论

争,他都简明扼要地作了介绍,论述了天文仪器的名称、结构和功能以及研制者,记录了恒星天区的划分,星官名称、星数及它们的相对位置,列出了当时测量的十二次度数和分野原则,最后是各种各样的天象记录和用该天象所作的星占。通过天文志我们能得到古代天文学发展的大量信息和天象资料,开创了撰写天文志的新局面。一部天文志就是该时代天文学发展的总貌,撰书人的天文学思想也充分地深铸于该志之中。由这两部天文志可以看出,李淳风不但是天文仪器的设计制造家、数学历算家、天文学史家,还是一个星占家。两部天文志都用了一半以上的篇幅描述星占方法及其应验情况,他是一行以前引用《易经》说明“政教兆于人理,祥变应乎天文”的著名天文学家。

《乙巳占》是李淳风的重要著作,全书共十卷,全面地总结了各家星占学说,建立了一个非常系统的星占体系,从该书中可以了解到巫咸、甘德、唐昧、梓慎、裨灶、箕子、张衡、王兴元、谯周、管辂、吴范、崔浩、刘向、京房、郎颢、王朔、东方朔、焦贲、唐都、陈卓、刘表、郗萌、蔡邕、祖暅、孙僧化、庾季才、袁充、郭璞等各著名星占家的观点,不但有日月五星及流彗的占语,而且还有气象占及候风法,更引人注目的是为了使星占适应唐代的行政划分,李淳风参照历代的分野重新制定了新的分野,列出了对应的各唐郡名称,例如“角亢郑之分野,自轸十二度至氏四度于辰……今之南阳郡、颍川、定陵、襄城、颍阳、颍阴、长社、阳翟、郑鄆”。显然这种作法使传统天文学的星占部分得以强化。

不能把《乙巳占》看成完全是糟粕一堆,它是中国传统天

文学强化自己体系的产物,是重要的文化史史料。不仅如此,其中也保留着许多天文资料,如天象的记录和描述,贞观三年二分二至点的位置、岁差值、浑天游仪的结构等。

《开元占经》与《乙巳占》虽然都是讲星占的,写作上却有很大的区别。它不像《乙巳占》是李淳风对各派星占家消化吸收再创作的产物,而是唐代开元时期收集到的天文星占资料的分类汇编,编者在拟好的栏目内,尽可能将各派天文星占家的原著选摘出来,从而成为一部经过系统编辑的古代天文资料大全,就从这个意义上说,其重要性就远远超过《乙巳占》,正是这种作法使许多珍贵的文化科学资料没有泯灭,使我们今日还能一睹许多古代天文学家的精辟论述。

《开元占经》篇幅远大于《乙巳占》,共有 120 卷,除介始印度传来的《九执历》的内容外,有 119 卷介绍的都是传统的中国文化。作者是印度裔天文学家瞿昙悉达。其祖父瞿昙逸原是印度婆罗门僧人,隋代移居中国,他们一家不但精通印度的天文历法,并且收集、学习、精通中国的天文历法,祖孙三代均在唐代政府担任过负责天文的太史令或太史监。任太史令的瞿昙悉达于开元六年(718 年)奉旨翻译了印度历法《九执历》,该历也收在《开元占经》之中。

《开元占经》前两卷集录了古代天文学家关于宇宙理论的论述,卷 3 至卷 90 集录的是各种天象及星占占文,卷 91 至卷 102 集录的是各种气象现象及相应的占文,卷 103 抄录了李淳风的《麟德历经》,卷 104 讲算法并抄录了《九执历》,卷 105 是从先秦古六历到唐代神龙历共 29 种历法的基本数据,卷 106 至卷 110 讲的是星图中的星位,最后十卷是有关草木鸟

兽、人鬼器物的占文。

中外天文学史界十分重视《开元占经》，因为它保存了中国最古老的恒星位置测量结果；保存了先秦时期就形成的甘、石、巫三家星官的本来面目；保存了不少天象观测记录及论述；保存了仅见于本书的一些古代论天资料；记下了大批历法的资料，其中尤以《麟德历》与《九执历》为重要；记下了中印的科学交流；保存了许多已失传的古代文献资料的摘录；较全面的保存了中国星占术的资料。这是一部能供继续开发的文化宝藏。

《天对》是唐代文学家和哲学家柳宗元(773—819)的作品，收于《柳河东集》第14卷，是根据当时的天文知识回答屈原《天问》的一首诗。在回答天地之初如何识别浑沌时写道：“庞昧革化，惟元气存，而何为焉”，意思为浑沌变化而成，那时只有元气，并未按谁的意志而变；在回答旋转天的绳索系在那里？天边架在什么上面的问题时说：“乌僊系维，乃縻身位。无极之极，漭弥非垠”，即并不需要绳索才能固定其位置，天是无边无际广袤无垠的。仅从以上例句也可以看出唐代天文知识的普及，文学家没读过许多天文著作是写不出上面那些诗句的。

二、《缉古算经》与三次方程

解三次方程在中国古代称为“开带从(纵)立方”，是开立方问题的自然推广。在汉代的《九章算术》中已经有了一套完整而统一的开平方、开立方法，成为后世高次方程数值解法的

源泉。对于三次方程,虽然南北朝时祖冲之父子可能进行过探讨,但其著作已经失传,仅存片言只语的记载而含糊不清。现存最早系统地研究三次方程的著作,是唐初王孝通的《缉古算经》。

王孝通的生平不详,据《旧唐书》、《新唐书》、《唐六典》以及他本人的《上缉古算术表》等资料,可知他出身平民,少小学算,曾在隋朝为官,唐朝初年为历算博士,后来升任太史丞。他的《缉古算术》约完成于唐武德九年(626)之前,显庆元年(656)国子监开设算学馆,其书被列为教科书之一,遂改称为《缉古算经》。全书1卷,共20个题目。第1题是关系天文历法的计算问题,用算术方法解答。第二至第十四题是关于土木工程中的体积与长度计算,特别是已知某一部分的体积而返求特定的长度,因而需要列出并求解三次方程。第十五至第二十题是勾股问题,涉及三次方程及双二次方程。每问之后都有术文,主要是说明三次或双二次方程各项系数的算法。在一些重要术文之后附有王孝通的自注,一般都是说明立术或建立方程的理论根据及其运算过程。

在古代,由于缺乏一套简便有效的代数符号,要由实际问题列出高次代数方程相当困难。王孝通由实际问题的几何意义出发,经过一系列推导而确定方程的各项系数,因而每一项都有明显的几何背景,推导过程中需要使用复杂的几何公式、勾股恒等式与代数恒等变形,表现出高超的运算技巧与推理能力。书中的土木工程问题一般都比较复杂,例如第三题的第二部分说:假如要建造一道堤防,其垂直剖面是等腰梯形,底部地势西头低,东头高,因而堤防的底面是一个斜面,西头梯

形端面的高 H 大于东头梯形端面的高 h 。堤的上面宽是 a , 东头梯形的下底宽是 c , 西头下底宽是 b , 堤长是 d 。已求得堤的体积是 v 。并知道 $b-a=\alpha$, $c-a=\beta$, $H-h=\gamma$, $a-h=\delta$, $d-h=\epsilon$, 求 a 、 b 、 c 、 d 、 H 、 h 。这在今天看来也是具有一定难度的, 书中将问题归结为求解一个关于 h 的三次方程。

《缉古算经》中没有叙述求解一元三次方程的演算程度, 也没有数字计算的细草, 或许是因为这种算法早有其他算书记载, 而当时的主要困难是如何根据实际应用问题列出方程。现在的研究者一般认为, 求解三次方程的算法是由《九章算术》“开立方术”推广而来的, 实际上, 只要对“开立方术”的术文稍加修改就可做到这一点。

《缉古算经》用三次方程解实际应用问题是一个辉煌的成就, 这不仅是中国现存典籍中的最早记述, 在世界数学史上也是关于三次方程数值解法及其应用系统论述的最古老的著作, 其他国家的同类工作至少要晚 600 年以上。

三、赵州桥

赵州桥, 又名安济桥, 也叫大石桥, 座落在河北省赵县南边的洺水河上, 是闻名中外的古代桥梁建筑工程。

这座桥建成于隋朝大业年间, 距离现在已有 1300 多年的历史。虽然经历了冰雪风霜的侵蚀, 洪水的冲击和地震的威胁, 它依然巍然挺立, 坚实如故。

赵州桥的结构精巧, 布局合理。桥身全长 50.82 公尺, 宽 9.6 公尺。大拱的净跨度长达 37.37 公尺, 拱高仅有 7.23 公

尺。桥高与跨度呈 1:5 的比例,因此桥面坡度较小,便于行人往来、车马通行。拱顶高又便于桥下行船。桥面坦直,分三股道,中间走马车,两旁走行人。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赵州桥的大拱圈的两肩,各伏设两个对称的小孔,改变了以往拱圈上实填沙石的建筑规程,首创了世界上“敞肩拱”的新式桥型。这样的“敞肩拱”布局,符合结构力学的理论,和实腹拱相比,显然表现了造型的优美,桥体空腔,可以减轻桥身的自重,节省填腹的材料,又能增加汛期季节桥下的过水面积,小孔可以辅助宣泄洪水。

赵州桥气势雄壮,桥型美观,周围绿柳飘绕,桥影倒映水中,远远望去,好像一条长虹横卧洺水河上。

赵州桥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达到了世界拱桥建造技术的新水平。类似的桥梁建筑工程,直到 14 世纪才在欧洲出现,比赵州桥晚了 700 多年。

根据史料记载,赵州桥的设计者是隋朝一位普通的石匠,名叫李春。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历史上没有留下更多的记录,我们无法知道这位能工巧匠的身世和作为。就连隋朝之后的唐朝人,也只知道这“制造奇特”的赵州桥,是“隋匠李春”修造的,除此之外,没有提供更多关于李春的材料。这说明,在封建社会里,劳动人民的创造发明,不知有多少被埋没了。

尽管如此,我们从赵州桥的建筑特点,自然环境和当时的生产技术条件,可以想见,李春设计修造这样一座大石桥,真是了不起的创造。

赵州,在隋朝是一个交通要道。南来北往的商旅行人,因有洺水之隔,实不方便。客观上需要修造一座坚固的桥梁,以

适应经济文化的交流。可是,赵州地处洺水下游,河面宽阔,水流急湍,每年夏秋两季水势很大,造桥是很不容易的。

怎样既保证河道畅通,又使桥身坚固,造型美观又节省材料呢?李春巧妙地设计出单孔大石拱空腔式的新型桥。

李春利用天然河床的粗砂层作为桥台的基础。据桥梁专家测定,赵州桥桥台的反应力为 $5-6$ 公斤/ cm^2 ,而近代对同类砂石层许可耐压力计算为 $5.4-6.5$ 公斤/ cm^2 。可见,李春造桥的科学性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李春采用纵向并列砌置拱石技术,把并列的 28 道拱圈,用铁棒连续起来,拼成一个半圆形的大桥洞,使石块与石块之间互受压力,彼此挤紧不动,能各自独立承担荷载,也便于进行修理。每 1 块拱石有 1 吨多重,各面都钻有细密的斜纹,让拱石贴得更紧,并列的石拱用“腰铁”、“铁拉杆”横向连接,使桥身成为一个整体,非常坚固。赵州桥历经 1300 多年,桥台只下沉 5 厘米。桥面两侧的雕龙栏杆,“若飞若动”,表现了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独特风格。栏板和望柱的雕刻图案,线条柔和,构思巧妙,形态动人,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古往今来,不少的迁客骚人,作铭留记,对赵州桥作了无限的赞美。

赵州桥,代表了隋代桥梁建筑的杰出成就,显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智慧。

四、唐代的地理学

唐代疆域辽阔,交通发达,商业繁荣,地理学也随之大大提高了一步,特别是地图的绘制,已有了相当科学的方法。

唐代地理学著述很多,唐初最重要的著作是《括地志》。唐太宗的第四个儿子魏王李泰,延揽学士萧德言、顾胤、蒋亚卿、谢偃等人,根据《贞观十三年大簿》的资料编成是书,于贞观十六年(642年)奏上。《括地志》全面叙述了唐初政区的建置沿革,并介绍了各地的山川、风俗、物产和人物故事等。征引六朝时地理书甚多,张守节作《史记正义》,主要赖此书疏证古地名,《通典》、《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等也多引此书。全书共550卷,另有《序略》5卷,内容丰富,可惜南宋时亡佚,今仅存清人辑本数卷。

唐代以兵部职方员外郎掌天下之地图,州府每3年(后改5年)制地图送至中央,由于每3年绘制并呈报一次,故中央所藏各地图相当多,于是根据各州府的地图而绘制全国总图,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所以有“十道图”。唐太宗时依山川形势分全国为10道,“十道图”就是全国地图,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唐代十道图有:长安四年(704年)《十道图》13卷,开元三年(715年)《十道图》10卷,李吉甫《十道图》10卷。这些十道图除地图外都附有说明。唐代最有名的地图为贾耽所绘,贾耽是唐德宗时的宰相,性好地理学,凡四夷来华使者和唐朝出使四夷还朝的使者,贾耽必与之详谈,询问各处的山川形势,因此他对全国的地形、边境地区的情况了解相当透彻。安史之乱后,陇右地区被吐蕃侵占,至德宗时为时已久。唐政府对安史之乱前陇右及西方的旧戍已茫然不知,贾耽乃绘陇右、山南地图,并附河源形势,名为《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图》,另撰“别录”六卷,以解释地图。贞元十七年(801年),贾耽又绘制了一幅巨大的地图——《海内华夷图》,宽3丈,高3丈3

尺,其制图之法,一则继承了前代的“分率法”,即按比例尺作图,1寸代表100里;二则用黑字代表古地名,红字代表今(当时)地名,以示古今变化,这是后世地图用两种不同颜色的字来表现的开端。贾耽又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卷,作为对《海内华夷图》的解说。可惜原图已失,仅南宋绍兴七年(1137年)据原图缩绘的《华夷图》刻石保存在西安碑林,贾耽还有《皇华四达记》10卷、《贞元十道录》4卷。

此外,还有广陵李彦所画的五色《地志图》,图中遍画全国地形、物产、城邑、古迹和当时内外疆畛险要,而以5种颜色相区别,可惜久已失传。

唐朝另一部重要的地理学著作是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李吉甫是唐宪宗时的宰相,该书成于元和八年(813年),共40卷,目录2卷。叙述元和年间中国郡县概况,包括47镇。内容有户口、物产、土贡、山川险隘、州县沿革及四至等。每镇之前附以地图,故称“图志”。今图已佚,字亦有缺失。该书是现存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地方总志,对后世方志的编纂影响极大。

唐德宗时的宰相杜佑于贞元十七年(801年)撰成《通典》200卷,其中的《州郡典》14卷,在方志发展史上也占有一定地位。唐末人樊绰所著《蛮书》10卷,详细记载了云南的山川道路、民俗物产,为研究古代云南的地理和南诏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五、唐代中晚期的史学

唐代中晚期史学发展主要以刘知几所撰《史通》和杜佑所撰《通典》为代表。这两部史著都是属于开创性的,对其后的史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史通》,刘知几撰,成书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年),这是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史学批评和史学理论著作。刘知几20岁即考中进士,随后作了19年的获嘉县主簿。长安二年(702年),他42岁时,开始担任史官,先后任著作佐郎、著作郎、秘书少监等职,撰修国史,在史馆20余年。他遍读群史,长期从事修史工作,史学知识及编纂经验十分丰富,《史通》就是他数十年钻研史学的结晶。《史通》共20卷,分内、外两部分,各10卷。内篇39篇,阐述史书的源流、体例和编撰方法。在《六家》、《二体》2篇中,总结过去史书著作的类别和体例为六家:《尚书》—纪言;《春秋》—纪事;《左传》—编年;《国语》—国别;《史记》—通史记传;《汉书》—断代纪传。二体即编年体和纪传体。外篇有13篇,其中《史官建置》篇中论述了史官建置沿革,概括了过去政府编纂史书机构的变化。外篇还论述了历朝史书得失,对唐以前的史学进行了全面的总结。

刘知几提出史家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尤以史识最为重要。他在论修史时,提出编撰史书以“直笔”为原则的思想。在《直书篇》、《曲笔篇》中,刘知几从正反两方面详加论述了这一思想,认为一部好的史书“以实录直书为贵”,记载史事应“善恶必书”,“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

不书无损于劝诫”。他还认为，修史要注意史料选择，不仅要“采摭群言”，同时又要“明其真伪”；述史应以“简要为主”，要“文约而事丰”，反对浮词。在《疑问》、《感经》两篇中，刘知几对儒学经典提出大胆怀疑，并认为上古三代并非如儒家所推崇的那么美好，这些表现出刘知几的批判精神和进步的历史观。

《通典》，杜佑编撰。杜佑生于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卒于宪宗元和七年（812年），历任工部、兵部郎中，充水陆转运使，改度支郎中，兼和籴使，累迁户部侍郎判度支、检校礼部尚书、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后官至宰相（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度支盐铁等使。他历任中央和地方行政财政大使，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理财经验，对典章制度十分熟悉。杜佑为学不尚章句。认为诸经率多记言、罕有法制，而他却讲求经世致用之学，所以格外留心历代的典章制度及其沿革得失。正是具备了上述条件以及这种治学精神，才使杜佑完成了《通典》这部巨著。

杜佑编撰《通典》是在刘秩《政典》的启发下进行的。《政典》以《周礼》大官所职来分门别类编撰，共35卷。杜佑认为《政典》“条目未尽，因而广之”，从大历元年（766年）开始，至贞元十七年（801年）书成进奏，前后用了30余年的功夫。

《通典》共200卷，专叙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上溯黄帝，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肃宗、代宗以后的重要变革也附载于注中。分为九类：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每类又各分出若干子目。《通典》详细叙述了历代典章制度的源流、变革，文中不但列入前人有关的议论，而且还用说、议、评、论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

《通典》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论述典章制度的通史，其内容虽源于“正史”中的书、志，但典章制度前后因续关系在各断代史中难以照应，而《通典》则矫正了“正史”断代之不便。《通典》创立了史书编纂的新体例，为史学开辟了新途径，其后出现“三通”（即《通典》加上《通志》、《文献通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宋郑樵作《通志》，与马端临作《文献通考》，悉以是书（指《通典》）为蓝本，然郑多泛杂无归，马或详略失当，均不及是书之精核”。“三通”之后又发展为“九通”“十通”。《通典》卷帙浩繁，“实采摭群言”，其引书至少有 248 种，这使《通典》保存下大量古代的珍贵史料，“考唐以前掌故者，兹编其渊海矣”。

除此两部专著之外，唐德宗时的苏冕，撰自唐高祖至德宗九朝事，为《会要》40 卷；宣宗时，杨绍复等续编唐德宗以后七朝事为《续会要》；宋代王溥的《唐会要》，即是据此二书，补充了唐宣宗以后事而成的。苏冕开创了“会要”体裁，此后，《五代会要》、《西汉会要》、《东汉会要》等纷纷编撰出来。中晚唐的史学著作还有韩愈的《顺宗实录》，杂史笔记类如刘餗撰《隋唐嘉话》，刘肃《大唐新语》13 卷，姚汝能《安禄山事迹》3 卷，李肇撰《唐国史补》3 卷，赵璘《因话录》6 卷等。

六、火药的发明

唐朝科学技术上有很多发明创造，除雕版印刷以外，还有火药。

火药由“火”和“药”构成，这不是偶然的。原来火药里的两

种主要成分——硫磺和硝石都是药品，汉朝的《神农本草经》把药分成三品，硫磺和硝石分别列入“上品”和“中品”。在火药发明以后，药物学家仍然把它列入药类。例如明朝伟大的药物学家李时珍，就把火药收在他的《本草纲目》里，并指出火药能“治疮癰、杀虫、辟湿气、瘟疫”。可见火药最初是一种药品。

火药的发明和方士炼丹药有密切关系，它的产生，也经过了漫长的岁月。远在战国秦汉时期，历代帝王总想长生，于是就有一些人投其所好，自称能炼出长生不老的药来。这些炼丹家在崇山峻岭采花草、探金石，在深山古洞里炼黄金、制造长生药。由于这些人的大胆探索和辛勤劳动，往往发明和发现了新物质。

从战国到汉初，盛行神仙之学。当时有人认为，要想成仙，首先须要吃仙药，然后才能得到神仙的启示。所谓仙药就是“灵芝”、“巨枣”之类，吃了不会发生什么坏作用。最古传说中的神仙是在海外，秦始皇花了很多钱，派了不少人到海外求仙，都没有成功。汉武帝晚年也积极求仙。据说有个叫李少君的对他说：“要想长生，先要虔诚地祭祀灶神，其次是用丹砂炼成黄金，再用黄金制成食具，用这种食具吃饭就可以成仙，长生不老。”这就是我国炼丹术产生的历史背景。

炼丹术分为两类：一类是炼仙药，另一类是炼金银。仙药虽然失灵，但是，为了炼出金银，仍然有人积极探索炼丹的奥秘。在隋末唐初，据说有一位炼丹家，在太行山炼成“大还丹”。他的学生成弼因为父亲死了要回家办丧事，老师给他 10 粒仙丹，并说 1 粒丹可化 10 斤赤铜变成黄金。成弼回家办完丧事以后，杀了他师傅，将他师傅的仙丹全部偷来，然后制造黄金，

后来成了富翁。唐太宗听说这件事以后，立刻把成弼找来，让他炼黄金，据说炼了很多。当然，这些黄金并不是真金，而是一种合金。

炼丹家所常用的丹砂，是古代的主要颜料。丹砂可产生水银，水银又制成银珠。其他颜料如赭石、曾青、铜绿、石绿、藤黄等，也都是炼丹过程中出现的副产品。

火药也是炼丹中的副产品之一。它可能是在两种情况下产生的：或者，直接用类似火药的药料制造某种药时，这种药发生了火药的作用，从而发明了火药；或者，间接用类似火药的药料变化某种药时，这种药意外地发生了火药的作用，因此发明了火药。

第一次把火药的配方记录下来的是唐初的炼丹家和药物学家孙思邈。他写了一部《丹经》，书中谈到硫磺的“伏火”方法。为了叫硫磺“伏火”，他把硫磺、硝石各二两，研成粉末，放进沙锅里，掘一个坑，把锅放在坑里，使锅顶和地面平齐，然后用土把锅的四周填实。再把三个皂角烧红成炭，一个一个放入锅里，不小心就会起火。这种事说明孙思邈已经掌握了硝石、硫磺、木炭放到一起会起火的知识。

到了唐朝后期，有一本炼丹书叫《真元妙道要略》。书里谈到硝石“伏火”的时候，有时发生焰火。同时这本书还记载，把硫磺、雄黄、硝石放在一起、密闭加热，会起火烧了手脸和房屋。很显然，这就是原始的火药。

另一方面，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清虚子在《铅汞甲辰至宝集成》里，又提到“伏火矾法”。当时利用的药料是硫磺2两、硝石2两、马兜铃3钱半。前两种药料和孙思邈的“伏硫

磺法”所用的药料是相同的，最后一种是植物，这三种药料合起来正是火药的成分。但是由于硫磺、硝石是天然的，而且由马兜铃产生的二氧化碳太弱，所以不能爆炸。

总而言之，唐朝实际已经发明了火药，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把硫磺和硝石混合起来能发火焰，把硝石和木炭混合也产生类似火药的作用。过去所以未能发生较大的爆炸力，是因为药料不纯和几种药料不够标准的缘故。

我国古代军事和方术有密切关系，兵书里记载方术，方士书也记载军事。在唐朝炼丹家和药物学家孙思邈的著作里，也有军事问题。唐朝后期李筌的《神敌太白阴经》的前半部是兵书，后半部就是方士的言论。

唐朝皇帝自己宣称是老子李耳的后裔，因此特别尊礼老子和道教教徒，把道士、女冠，划归宗正寺管辖。当时不少方士借道家的名义奔走于帝王将相之门，谋求利禄。从太宗、高宗下至玄宗，有的炼黄金，有的合丹药。唐朝中叶以后，有些方士在长安及各州活动，给朝廷和军阀出谋划策、参与军事机密。例如李希烈和唐军作战时，他用方士的计策烧了刘洽的战棚和防御工事，他们用的可能就是火药。

到了唐朝末期，火药已经从炼丹家手里转移到军队中。没有炼丹家的启发，军事家决不会从难懂的方士著作里去找火药。

最初用火药制造的武器叫做“火箭”，唐朝咸通九年十月，庞勋起义进攻宿州时，在一个大风天里，“以火箭射城外茅屋，延及官军营，死亡多人。”（《资治通鉴》卷 251）这种“火箭”也叫“飞火”。宋朝路振的《九国志》记载，在五代时期，有一个叫

郑璠的攻打豫章，曾“发机飞火”，烧毁了豫章的龙沙门。郑璠率众突破龙沙门，被烧伤了皮肤。可见火药在晚唐和五代战争中已经发挥了威力。

总之，宋以前的火药武器共有两种。第一种是火箭，把火药的引线点着，用弓箭射向敌人的营寨、粮草。第二种古人称为“发机飞火”，就是用抛石机把点着的火药包抛向敌人。古代的抛石机又称大炮，因为这种炮抛的是石头，所以炮字最初用石字旁，后来发明了火炮，又变成火字旁。

到了宋朝，便发明了各式各样的火箭。但是这种火箭都是以燃烧为主，宋朝以后逐渐用火药制造爆炸性武器。

唐朝人发明了火药是毫无疑问的事，但是，火药对人类文明起了什么作用？唐人发明的火药是怎样传到世界各国的呢？在中世纪，有三大伊斯兰教王朝先后兴起，这就是阿拉伯帝国的倭马王朝（661—750年）、阿拔斯朝（750—1258年）和埃及的马木路克朝（1250—1517年）。阿拉伯帝国的极盛时期，疆域东起印度河流域、西临大西洋，横跨亚非欧三洲，对于东西方文化的沟通起了很大作用。唐朝和阿拉伯帝国（大食）经常往来，因此中国炼丹术也在8—9世纪传到阿拉伯。中国炼丹家以丹砂为万灵之主，用以制仙丹、炼金银，而阿拉伯炼丹家也把丹砂叫做“赤硫磺”，也用以制仙丹、炼金银，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硝（硝石）在医药炼丹术上是一种必须的药料，医药和炼丹术既然在8—9世纪传入阿拉伯帝国，那么硝石也很可能同时传入。1248年以前，在伊宾拜尔写的《医药典》中，提到“巴鲁德”（“中国雪”）。可见在12世纪以前，唐人发明的火药业已传到阿拉伯了。

另一方面，在哈桑的兵书里，也有有力地证明火药是从中国传去的。在这本书里，有三处焰火的配方，都写入“中国铁”，例如：

①实验花的成份：硝 10、硫磺 3、木炭 2、火石 4、中国铁 9、花 10。

②鸡斗的成份：硝石、硫磺 $1\frac{3}{4}$ 、木炭 $1\frac{1}{8}$ 、中国铁 2。

③契丹花用于火门的成分：硝 10、硫磺 2、木炭 $3\frac{1}{4}$ 、中国铁 10。

在 12 世纪以后，中国的火器也传入阿拉伯。据一种阿拉伯文兵书说，那时候阿拉伯有两种火器：一种叫“契丹火枪”，是和敌人交手时用的；另一种叫“契丹火箭”，是用于远射程的。很明显，这种火枪和火箭，必然是南宋人所习用的火枪和火箭。书中所说的“契丹”就是中国，并不是契丹和辽。

火药也是经由阿拉伯传入欧洲的。首先，唐人的炼丹术，于 12—13 世纪由阿拉伯传入欧洲，当时欧洲最负盛名的大亚力卑尔特和罗吉尔·培根，就是炼丹家。在这两个人的著作里，都提到火药，但是他们还不会制造火药。在他们死后数十年，欧洲才有了火药。欧洲人使用火药，固然是由于受了他们文字上的启发，但在实际应用上，主要是因为战争的需要。公元 1290 年，第八次十字军东征失败以后，法兰克人退出在亚洲大陆的亚加，转移到塞浦路斯岛上继续作战。当伊斯兰教国家进攻亚加时，曾用 92 座抛石机击毁了奥斯曼帝国堡垒上的一切防御工事。从此欧洲国家才开始接触到火药火攻法，才开始学习制造火药和火具。

唐朝发明的火药从阿拉伯传入欧洲,对整个世界文明发生了巨大的推进作用。恩格斯说:火药“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统治和奴役的政治关系起了变革作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

直到今天,火药仍然在工农业生产、科学技术和国防建设上起着巨大的作用。

七、药王孙思邈

孙思邈是隋唐时代的一个有名的医生,京兆原(今陕西耀县孙家塬)人,生于公元 581 年(隋文帝开皇元年),死于公元 682 年(唐高宗永淳元年)。他比扁鹊要迟 1000 多年,比华佗要迟四五百年,但他的品质、钻研学问的精神、对待病人的态度,与扁鹊和华佗都有相同的地方。

孙思邈自幼用功读书,据说 20 岁的时候便精通诸子百家的学说,很有学问,因此,后来有许多著名的人,如宋令文、孟诜、卢照邻等,都来拜他做老师。隋文帝也曾经要他去做国子博士,他托病推辞了。后来唐太宗和唐高宗又曾召他到京师,给他官做,他也没有接受。他专心致力于医学的钻研,替人们解除疾病的痛苦。

关于学医,孙思邈说过:有些人,仅仅读了 3 年医书,就骄傲起来,以为自己有治好一切疾病的本领,等到治了 3 年病以后,才知道自己懂得的实在太少。因此,必须孜孜不倦地学习,

还要弄清楚医学的源流,绝对不能道听途说,否则就是自己害自己。孙思邈为了学好医学,除了非常认真的研究古代经典医学著作、学习前代医学家的经验以外,还到处采集民间的单方,加以实验和总结。

孙思邈也接受并且发扬了我国古代医生行医的优良道德传统。他说:一个好医生,给人治病,一定要拿出全付精神,丝毫不能夹杂有贪求财物的念头。对于病人要有深切的同情和非常爱护的精神。医生的志愿就是为病人解除痛苦。不论贫富贵贱,也不论是否亲友,都要一律对待,把病人看作和自己的父母兄弟一样。遇到危险的病症,尤其不能考虑到自己的利害得失而踌躇不前。被请出门去替人治病的时候,不论山路怎样难走,不论深夜还是大寒大热的天气,都要立刻就去。这就是孙思邈一生对待病人的可贵态度。

孙思邈治疗过很多麻风病人。麻风病是一种很难治好的慢性传染病,他为了找到治疗这种病的方法,不怕传染,亲自看护病人,把各个病人的病状和在医疗过程中的情况,详细记录下来。

孙思邈留下了两部重要著作——《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从这两部有名的医学著作里,可以看出:他既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又有卓越的创造才能。

关于孙思邈的这两部书,宋代的林亿曾经说:这两部书,上自有文字起,下至隋朝止,无论医学的理论和方剂,没有不被采纳的,而且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清代著名医学家徐大椿也说:张仲景的学说到唐代发生了一个大变化。张仲景治病、论病的道理完全根据《内经》,所用的药方,都是古代圣人相传

的药方,并非自己创造;有时加减,也都有根据,用药的分量也有一定的标准。所用的药物都根据《神农本草经》,没有一味是假借的。但是,《千金方》则并不如此,孙思邈论病的道理,不但根据《内经》,而且也根据《内经》后的医学家的学说,应用的方剂,除了古方以外,还应用后来的方法。所用的药品,也并不完全根据《神农本草经》,而同时采取杂方和单方中常用而有效的药品;所以一种病有几种治疗方法,也有用一个方法可以治疗几种病的。这是医学上的一个大变革。他能够自成一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由此可见,孙思邈是我国医学史上一个富于创造性的医学家。

八、建筑艺术的发展——十里长安城

规模宏伟的首都

开元、天宝是唐朝盛强的顶峰,也是长安城最繁荣、最热闹的时期。长安城的规划、制度,在当年曾引起许多外国人的赞叹,在后世也不断被人们研究探讨。长安城里的生活集中地反映了唐代社会城市生活的面貌。

长安城就是隋朝大技术家宇文恺设计督造的大兴城。它的都城布局,坊市位置,都确立于隋朝时候,然而宫阙楼观,很多是唐代扩充加工的产物。

这座城位于终南山和渭河之间的平原上,像东都洛阳一

样,外面叫外郭城,它的北部正中包有宫城、皇城。宫城是宫殿区,皇城是官衙区,跟外面的民居商肆完全分开,表现出严格的封建秩序。全城街道宽直,坊市星罗棋布,方方正正,像棋盘,也像菜畦。城的东南部有个慈恩寺,是高宗做太子时为玄奘法师造的。寺中有座大雁塔,当时的人只要登临其上,那种严正的布局,就能尽收眼底。这座塔是城内的名胜,唐诗人杜甫、高适、岑参曾同行到此,所赋的诗至今为人传诵。

长安城是一座长方形的城市,经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工作,它的面貌越来越被认识得清楚了。它南北长 8651 米,东西长 9721 米,周围约 36.7 公里多,比明清时的西安城大 7 倍以上。

在城垣的南面,从西往东,有安化、明德、启夏 3 个城门,安化、启夏各有 3 个门洞,正中的明德门独有 5 个门洞,每个宽 6.5 米,极为宏伟。

从明德门进城,从南往北,有一条笔直的大街,直达皇城的朱雀门,叫朱雀门街,进宫城后,继续往北,伸展到宫城的承天门,所以又叫天街。这条街宽广百步,约 150 米。大街两旁,榆、槐成荫。东西两面各有 9 个坊,中间大多是庭园宽敞的宅邸,衬托出首都雄伟的气魄。

朱雀门是皇城的南门。皇城在全城北部的中央,朱雀门两侧有含光、安上两门。宫城与皇城的大小差不多,在皇城以北,向南的正门叫承天门。宫城和皇城之间东西向的横街,是长安城里最宽的一条街,宽达 441 米,实测发现残存部分也有 220 米。宫城以北就是郊区了,当时作为“禁苑”,畜养鸟兽、种植花木,筑有亭榭楼台,是帝王游乐的所在。宫城的北门玄武门,是

警卫宫廷的要害。

唐朝初年扩大宫殿区，在东北的龙首原上兴建了大明宫，于是长方形的大城在东北面凸出了一只角。

大明宫南面开 3 个门，正中的叫丹凤门。丹凤门有 3 个门洞，各宽 9 米。门北 610 米处有含元殿。含元殿有石阶三层，上层高两丈，中下层各高一丈五尺，曲折而上，叫做“龙尾道”。从高宗改建大明宫后，这含元殿便是朝堂所在。龙首原地形较高，加上三层石阶，从丹凤门仰望帝座，宛然似在云霄之中。诗人王维的名句“九天阊阖开宫殿”（《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写的就是这番气象。含元殿西北有太液池，是宫中的胜地。太液池西有麟德殿，宰相奏事，宫内宴会，和召见使节，往往在这里举行。其余殿堂还多，共有 30 多所。

大明宫因在原来的宫城东北，习惯上叫做“东内”；原有的太极宫便被叫做“西内”。到玄宗时，又兴建了兴庆宫，叫做“南内”。三者合称，叫做“三大内”。

兴庆宫原是玄宗做蕃王时的宅邸，在大明宫的东南面的兴庆坊。玄宗即位后大加扩建，陆续把南、北、西三面的坊，包进去一部分，东面紧靠城墙，没有扩建的余地。宫内有兴庆池、沉香亭、花萼楼等建筑。天宝年间，玄宗和杨贵妃在沉香亭赏芍药，派名乐师李龟年到一家酒楼上，找到大诗人李白，撰写《清平调》3 章，就是在这里发生的故事。

兴庆宫是皇帝的别业。玄宗为了往来游乐的方便，在大明宫、兴庆宫间，沿东城壁筑了夹城复道。他在中间自由往来，外面的人都无从看见。这条路沿着城壁可以通到芙蓉园。

芙蓉园在长安城的东南隅，是名胜所在，向来是个游览

区。它的水面叫曲江,开元时疏浚一番,开黄渠,把 浐水的上流引导进来。据实测南北约 1360 米,东西 500 多米,周围近 4 公里。此处有亭台楼阁,有垂柳,有芙蓉(荷花),江水澄清,烟光迷蒙。每逢岁时佳节,游人极盛。三月上巳日,正是风和日丽的时候,玄宗总要带着妃嫔,到曲江赐宴百官。一时车马喧腾,宾从杂沓,沿岸遍张彩幕,江中到处荡着彩船。“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杜甫《丽人行》),他们在这里赏心悦目、炫耀挥霍,不仅贫苦百姓不会有份,连一般的士大夫也要见之侧目的。

除宫殿、衙署之外,长安城里,由南北 11 条街和东西 14 条街,形成许多方格,一个方格一个坊,共有 109 个坊和 2 个市(占 4 个坊)。

坊是住宅区,它的结构是封闭式的。一部分的坊四面各开一门,街道成十字形,交点在坊的中心,尽头在坊门口。一部分的坊只开东西两门,街道也只有东西向的横街。住宅的门都在坊内,没有向外面开的。

商店集中在东西两市。市的四面各开两门,中间到处都是商店,正中有管理市的官衙,就是市令的办公地点。我国封建时代的城市,到唐朝为止,商业活动都受政府严格控制,商店依法应设在市内,不能随地自由开店。

这样大的一座城市,布局这样严整,在封建时代是很少见的都市设计。日本曾仿照它的规划,兴建平城京和平安京,可见其影响之大了。

长安城的游艺

长安城里盛行着各种游艺活动。尽管见于记载的多系贵族高官寻欢作乐的举动,我们毕竟从中了解到一些艺人的高超的艺术,社会上流行的活动项目,等等。从统治阶级上层分子参加游艺活动的情况,我们还可以知道唐朝的社会风气,不像宋朝道学盛行以后那样的死气沉沉,多少有点活泼泼的样子。

唐朝人很欢喜打马球。参加的人在场上骑马奔走,挥动弯头的杖击球,以争胜负。玄宗青年时是马球健将。有一次吐蕃使者到长安,中间有些好手,在球场上屡次赢球。那时玄宗做临淄王,他和另外3个贵族,组成一支4个人的球队,和10个吐蕃人比赛。他东西驰突,所向无敌,4个人打败了10个人,博得了对手的倾倒。他即位后,自己不打了,但仍时常登楼看球,兴致不衰。唐朝的妇女,也有欢喜打球的。骑马击球的女陶俑,神采飞动、姿态矫健,没有一点文弱的样子。这也可以看出唐与后世风气的不同。

当时各种游艺都很发达,出现了不少本领高强的艺人。玄宗有大宴会,常在兴庆宫的勤政楼举行,楼下大道上百戏杂陈,走索、弄丸、舞剑、寻橦,无所不有。那时宫廷里的驯兽能手,能使大象跟着乐声拜舞,还教练舞马,使马能跟着“倾杯乐”的曲子,奋首鼓尾,还能使马在力士举起的榻上舞蹈。舞马究意是什么样子呢?西安何家村出土的窖藏文物中,有一件仿皮囊形的银壶,两面各有一匹涂金的马,马颈上系的飘带和马尾,都向上扬起,嘴衔一杯,后腿屈膝,与张说《舞马词》描述的

“屈膝衔杯赴节，倾心献寿无疆”，正相符合。玄宗生日马舞表演的样子，得此宛在目前了。这自然是统治者享乐的活动，然而驯兽者的本领和心血，却是应该赞美的。

艺人王大娘能顶百尺长竿，竿上顶着木山，让儿童在上面活动，惊险达到极点。走绳索的绳子高有数丈，横至百尺，走索的女演员体态轻盈，令人叹为观止。有些中亚的艺人也来参加表演，使中国杂技吸收到不少有益的东西。

当时权贵爱好的游艺中，最受人批评的要算斗鸡。斗鸡起源很早，春秋时就有了。唐玄宗喜欢斗鸡，挑选六军小儿 500 人，专门训练斗鸡。有个贾昌，训练斗鸡有一套手段，据说他执鞭指挥，鸡都能听他的号令行动。斗完了，胜的在前，败的跟在后面，排了队回到鸡坊。玄宗因此授他军职。

中国的围棋，唐时已很发达。国手王积薪正是开元天宝时人。唐代后期，有第一国手苏师言与日本王子对奕，略占优势的故事。象棋大约出于唐的后期，相传是做过宰相的牛僧孺所创。牛僧孺写的《幽怪录》中有一篇《岑顺》，讲到象棋的下法，与现在的象棋大同小异，只缺士、象、炮而已。

玄宗和游艺的关系特别深，他喜爱音乐，又精通音乐，开元二年（714 年），设立教坊，选择乐工，亲自教习，叫做“皇帝梨园弟子”。“梨园”一词，起源于此，后世就用为“戏曲界”的代称。

唐时还没有完整的戏剧，然而各种歌舞戏和说唱活动都很发达。佛教徒为了宣传教义，利用文娱形式，说一段、唱一段，来讲述佛教故事，遗留下来的脚本有《维摩诘经变文》等。“变文”是佛教说唱文学的总称，它也被艺人用来讲述世俗的

故事。“说话”原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古老艺术，这时受了印度佛曲散文和韵文相结合的形式的影响，说唱文学大为发展。有的说唱昭君出塞，有的讲述伍子胥、季布的故事，或渲染武士们铁马金戈的争战，或描绘儿女们离合悲欢的爱情。后世弹词、宝卷等说唱文学，和变文显然是有关系的。

九、唐代书法绘画及其代表人物

王摩诘居官归隐

仕途失意

唐代的王维，字摩诘，多才多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评价，概括了他的蕴含着深刻哲理与禅韵的诗画成就。

王维才思敏捷，少年得志，15岁时，在长安以其清新雅致的诗作与名人广泛交游，并成为王公贵族的座上嘉宾。他20岁时考中进士，这在“五十少进士”的唐代是很少见的。因此，他年轻时，踌躇满志，渴望在政治上一显身手。

王维进入仕途的第一个官职是太乐丞，负责官方乐舞的教习与管理。然而，几个月后，他连这个微不足道的文化官也丢了。事情的原由很简单，乐舞中有一个舞黄狮子的节目，精彩热闹，但只是在皇宫中表演。一次演员们私自受邀，为某大臣宴会助兴，表演了这个节目。作为上司的王维虽不知情，还是受到管理失察的处分，被赶出京城，贬往济州（今山东长清）去管理仓库。他刚踏入仕途就栽了不大不小的跟头。

感情丰富的王维，在寂寞、单调的管理仓库的任上，一干便是5年。在求升不行、求调也不易的情况下，王维萌发了归隐之心。然而，他当时年纪还轻，仅仅感到仕途艰难，还没有完全绝望。于是，他便在“官”、“隐”之间徘徊。后来，政治上的继续失意，与佛教的影响使他一步步地走向归隐之路。

王维少年时，曾受到信奉佛教的母亲的深刻影响。在济州时，他结交了禅师，以禅理佛经来解脱精神上的苦闷。

这时，唐玄宗李隆基在位，唐朝的政治在腐败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唐玄宗从昔日的励精图治，倒退到因循苟安，从使用人才倒退到使用奴才。正直敢言的张九龄当了3年宰相便被罢去。而著名的“口蜜腹剑”的奸相李林甫却把持朝中大权达19年之久。当张九龄为相时，王维不但在京官行列中站稳了脚跟，而且不断被提升，当上了监察御史，官位虽不高，却颇受人们的重视。这是王维政治上最得意的时期，他归隐的念头暂时搁置起来。

张九龄去职后，王维也被看作是张九龄一边的人，被排挤离职。

继李林甫为相19年之后，登上相位的是靠着裙带关系而得志的杨国忠。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王维这样的才俊之士是没有出头之日了。

王维曾被派出塞，宣慰驻扎河西的唐朝军队。当王维看到广阔无垠的沙漠、滔滔奔腾的黄河时，胸襟为之一宽，看到塞北的红日西沉、烽烟不绝时，王维写下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千古名句。

傲啸终日

王维返京后，既担心被卷进官场倾轧的旋涡，又不甘心与李林甫之辈同流合污，于是开始了“弹琴赋诗，傲啸终日”的半官半隐的生活。

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年），王维买下了辋川别墅。这是唐初诗人宋之问的遗产，位于蓝田县境内。这里离长安不远，紧靠驿站；坐车、骑马，从长安半天即可到达。更吸引人的是这里环境优美，山川秀丽，林木掩映，恬静幽深，是修身养性的人间胜境。

作为辋川别墅的主人，王维常于公务之余，闲暇之日来到别墅，领略自然风光，洗涤胸中郁积的官场浊气，躲避不尽如人意的政治。他在这里吟诗作画、饮酒弹琴、访僧问寺、谈禅论经，绝口不言世事，过一小段十足的隐士生活。

王维不仅自己享用别墅的一切，同时也为诗友们敞开辋川别墅的大门，经常邀请一些人来别墅消闲，赋诗唱酬。王维于此时，写下了大量的被人传诵的好诗。

王维善于作画，因而他观察自然、刻画景物的艺术本领很高，在他的笔下，自然景物以及它们的动与静都显得清新宜人、富有韵味，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隔窗风惊竹，开门雪满山”，“嫩竹含新粉，红莲落故衣”，“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一些描绘辋川小景的诗，成了古今山水诗中的绝唱：“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竹里馆》）这些诗非常传神

地描绘了环境的清静幽美,表现了隐者清闲恬静的生活,以及摆脱了尘世纷扰后的怡然自得的心境。

在安史之乱前的15年里,王维往来于长安、辋川之间,过着身在朝廷、心在辋川的半官半隐生活。

悠闲舒适的隐士生活,是王维所向往的;纷扰险恶的官场生活,是令他厌恶的。但王维又不愿意彻底放弃官场生活,因为,他知道没有官场任职的收入,他就不可能有辋川别墅那种悠然自适的隐士生活。所以他只好边做官、边做隐士。

安史之乱时,他追随玄宗不及,为安禄山所获,被强迫作了伪官。安史之乱后,他虽又在朝中任职,但已不仅对政治完全绝望,而且感到生命的短促与精神的空虚,甚至秀丽的辋川山水也不能抚慰他空虚寂寞的心灵。

于是王维醉心于佛教,在家中过一种特殊的隐士生活。他除了上朝外,足不出户;除了公务交往外,他与官场人不再有任何往来。他深深地陷入对佛教的信仰中,专与那些僧人、禅师一起谈禅,消磨时光,求得心灵的平衡。

王维放弃了昔日那种奢华、讲究、富于情趣的生活,代之以简单、朴素的佛教徒生活。他成了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无人之时,他整日焚香独坐、诵读经文。后期,甚至他做的诗,也几乎与现实绝缘,充满了佛家空无寂灭的唯心哲理。王维也因此被后世的文人们捧为“诗佛”。他过着这种家居隐士的生活,一直到他生命的终点。

王维过着这种半官、半隐的生活,与其说他对政治还抱有一线希望,还不如说他是以做官为手段,创造保全自己隐士生活的环境与条件。

“颜筋柳骨”

在中国民间说起学习书法，往往称道“颜筋柳骨”，当作学书者的楷模。“颜筋柳骨”，是分别指书法家颜真卿（709—785年）和柳公权（778—865年）的艺术特色。

先谈“颜筋”。颜真卿的书法，雄强浑厚、韧若筋带，世称“颜体”。俗话说：“书如其人。”欲识颜书，得先知其人品。

那是天宝末年，叛将安禄山在渔阳敲响了鼙鼓，铁骑南犯，河北郡县望风披靡。唐玄宗闻乱叹道：“河北二十四郡，难道无一忠臣吗？”不久，即闻平原太守首举义师，屡挫贼锋，河北17郡起而响应，共推其为盟主，聚兵20万临敌，致使安禄山叛军首尾不能相应，既不敢南向江淮，又不敢急攻潼关。这时，唐玄宗遂又惊喜道：“朕不知平原太守何许人也，竟能若是！”

这位堪称中流砥柱的平原太守，就是书法家颜真卿，时年46岁。

正是这一年，颜真卿在平原（今山东属县）写下了《东方朔画像赞碑》。碑书笔笔凝重，字字磐石，筋强骨硬，严正峻峭。书法家将其誓死御敌的浩然正气倾注到笔端，化作其艺术的风格了。

28年后，颜真卿已是74岁的老人了。他又奉旨去劝谕叛迹已昭然的藩镇李希烈部。这是他的政敌为他设下的陷阱。他明知是险途，但却凛然就道。既至，李希烈养子千人，拔刀横目、汹汹欲试。颜真卿精神矍铄、举止自若，色不少变。叛军未敢贸然动手。

李希烈欲称帝号，胁迫颜真卿为其宰相。颜真卿守节不从、斥贼为逆、正气浩然。叛将为之失色。李希烈遂拘禁颜真卿，并挖下方丈大坑，传言说：“若不从，即坑之。”颜真卿视死如归，岿然曰：“死生有分，不用啰嗦！”李希烈亦束手无策。

后来，王师势振，李希烈虑有不测，又命架薪浇油、点起大火，告之曰：“若再不从，立遭火焚。”颜真卿愤然举身投火，又被救止。

早在这之前，颜真卿度贼势难久，而自身亦难免，遂给朝廷写下遗表，又自己撰就墓志、祭文，并指寝室西壁下说：“此吾葬身之处也！”

果然，最后叛军情势危急，遂将颜真卿勒死，时年 76 岁。

颜真卿一生，刚正不阿、忠贞不渝、临死不屈。他为人品格同其书法的风格一样，浑厚坚韧、正大方严。

颜体书风没有初唐书风（以欧阳询、虞世南等为代表）的清丽秀媚，却有着盛唐雍容伟壮的风姿。

人们谈起颜书，多指出它最明显的特色是“蚕头燕尾”、“横轻竖重”。

何谓“蚕头燕尾”？颜体横、竖笔的起端，下笔时均运用藏锋，而后顿转，故起端形若“蚕头”。它的每一捺笔末端，临终则着力顿挫，再起笔轻轻挑出捺锋，其状若“燕尾”。

何谓“横轻竖重”？即书写横笔时，用力较轻，笔划也略细；而书写竖笔时，贯注全力，笔划也较重。

前者给人以力透纸背的感觉，造成了笔力千钧的艺术效果。后者字字都给人以厚度感，具有浮雕美的艺术特色。

颜书碑贴流传至今的有 70 多种，近年还有新的发现。颜

体楷书的代表作有《千福寺多宝塔碑》、《东方朔画像赞碑》、《麻姑仙坛记》、《颜惟贞家庙碑》等等。行书名作有《祭侄季明文稿》、《争座位帖》、《刘中使帖》等等。这些都是千余年来学书者争相临摹的范本。

谈及颜书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清人王文治有诗曰：“曾闻碧海掣鲸鱼，神力苍茫运太虚，间气古今三鼎足，杜诗韩笔与颜书。”

在中国书法史上，自王羲之创新以来，王体统治书坛达数百年。唐初书法名家辈出，但皆袭晋人笔意，无所建树。至颜真卿出，始创新书体，体现了盛唐的时代风格，唐代方可言有书法。尔后，宋初书家学颜体，犹如唐初争学王体一样。故宋人有“学书当学颜”的诗句。

柳公权，字诚悬，是唐代与颜真卿齐名的大书法家。故世人如同称“李杜”、“韩柳”一样，并称其为“颜柳”。

柳公权书法，初学王羲之，继学颜真卿，并兼采历代书家之长，熔为一炉、自成一体，即“柳体”。柳体间架严谨、风骨挺拔，故有“柳骨”之谓，柳书的代表作有《玄秘塔碑》和《神策军碑》。

柳公权 29 岁才中进士，初做地方小吏，世不知名。40 多岁时，唐穆宗李恒在寺庙中偶然见到柳公权笔迹，甚为赞赏，思慕其人，柳公权方拜为京官，成为皇帝身边的人。柳公权活了 88 岁，历仕 7 个皇帝，为官 50 余年，官至太子少师。

史载，柳公权的为人品格，颇似其书风，字字严正、笔笔铮骨。

相传，唐穆宗在位，荒唐放纵，臣下少有敢谏者。有一次，

穆宗问书法运笔如何才能恰到好处，柳公权借机回答说：“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穆宗听出了弦外之音，气得脸色都变了。这就是世传的“柳学士笔谏”的佳话。

唐敬宗李湛，目光短浅、禀性猜疑，无甚作为，却喜颂扬。有次，他在便殿召对六位学士，当谈到西汉文帝崇尚节俭时，就举起袖子说：“朕这件衣服已浆洗过三次了！”学士们纷纷称颂他的节俭美德，唯独柳公权一言不发。敬宗遂问他为何不说话，柳公权说：“主宰天下的君主，应该进用贤良、斥退不肖、赏罚分明，能听得进各种不同意见。陛下穿件洗过的衣服，同治国安邦的大功大德相比，这只不过是件区区小事啊！”在场的大臣听了都吓得发抖，柳公权犯颜直陈却毫不畏惧。

柳公权刚正不阿的品格与其风骨峻峭的书法相表里，均为时人所推崇。公卿王侯们常常以重金聘他书碑。谁家为先人立碑如得不到柳公权的手书，就会被人讥为不孝。外国人来中国贡纳、贸易，也往往另备一份重金，叫做“购柳书”钱。

柳公权因此家富巨万。他把大宗金银财宝都交给家奴去管，经常被窃去也不在意。有一次一笥金银酒器又被家奴盗用。柳公权知道了，也只笑笑说：“银杯化羽逸去了。”不予追问。然而，柳公权的笔墨纸砚、图册书籍，都亲自保藏，家人也不得与闻。

“右相驰誉丹青”与“吴带当风”

阎立本，生年不详，卒于公元673年，雍州万年（今属陕西西安市）人，出身于贵族世家，做过工部尚书，后至右丞相。他博学多才，处理政务颇为能干、工书法，诗文也很出色，但却都

被他的画名掩盖了。他善画人物、车马、台阁，也兼及其他。他的画艺得自家传，与其兄阎立德同为唐初画坛双星。

有次，唐太宗泛舟春苑池，忽见异鸟飞来，随波荡漾，遂即命学士们赋诗，又召阎立本来作画。当时，阎立本已做主爵郎中，这是朝廷掌管封爵的官，职位已相当高了。可是，宣诏的人却不称其职衔，而连声唤他“画师”。阎立本急忙赶去，俯伏池边，审视着水鸟，调研着丹粉，心中颇不自在，又见同僚们在池中乘船赏玩、举杯赋诗，羞愧得满头流汗。他回家告诫其子说：“我自幼读书，学问文章皆不在同辈之下，只因我专于丹青，才有今日之耻，你们切记莫要学我作画了！”

阎立本的话虽如此说，可其嗜画成性、欲罢不能。后来，他官至右相，同左相姜恪共掌朝政。他虽身居高位，仍醉心于画。左相姜恪是将军出身，过去曾立功塞外。故而，时人谓之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这话本是含有嘲讥意味的，但是确是被它说中了。阎立本虽未能成为一代名相，可确成了驰誉古今的一代大画家。

阎立本一生的佳作甚多，流传至今的只有如下几件：

《历代帝王图》，这是其传世作品中最堪称道的。该图画了从西汉至隋朝的13位帝王，个性鲜明、栩栩如生。试以魏蜀吴三主来说：胁迫汉献帝禅位的魏文帝曹丕，是一副咄咄逼人的姿态；为恢复汉家帝统奔波一生的蜀主刘备，带有饱经风霜后的愁苦情状；割据江东自立为王的吴主孙权，表现出桀骜不驯的神情。这幅画卷，显示了阎立本传神写照的杰出本领，成为中国古代人物画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但这幅中国的千古名作，却在中国人民无权的时代被人

劫去，藏在美国波士顿博物馆。

《步辇图》，是记录汉藏两族友好历史的画卷。画的是藏王的使者来长安求婚，唐太宗接见使者，并允诺将文成公主婚配藏王的情景。整个画幅充满了亲切、融洽、和谐的气氛。此卷现藏北京的故宫博物院。

《萧翼赚兰亭图》，是一带有戏剧性的画卷。它描写的是唐太宗的大臣萧翼装扮成书生去拜见王羲之的后人辨才和尚，趁机骗取《兰亭集序》真迹的故事。画卷上的老和尚辨才踞坐着高谈阔论，书生打扮的萧翼在一旁洗耳恭听，但眼神却略带诡诈。这画把被骗人的粗心和骗子的虚伪狡狴，刻画得淋漓尽致，也是件难得的艺术珍品。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此外，还有《北齐校书图》、《醉道图》等等，但原作已失，恐系后人临作，并非真品了。

阎氏兄弟双星之后，唐代画坛呈现一片灿烂景象。这里只谈谈吴道子。吴道子是个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关于他的故事流传很多。

相传，有一天洛阳天宫寺里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因为人们听说吴道子要来画壁画了。

原来，几天前皇家画师吴道子随驾来到洛阳，偶遇故交书法家张旭，同时结识了将军裴旻。彼此久慕声名，相见甚欢。张旭被世人称为草圣。据说，他每当喝得大醉，呼号狂走，这时或提笔作书，或以头濡墨，所书皆精奇绝妙。故人称之为“张颠”，称其书为“颠草”。颜真卿、吴道子等人都向他学过书法。将军裴旻是位舞剑名手。据说一次在边塞战争中，裴将军被敌人团团围住，箭如密雨从四面八方射来。但见裴将军立马舞刀，飞

矢皆迎刃而断，敌人以为神，皆惊恐而走。他们三人见面后，裴旻请吴道子在天宫寺作一壁画，以为自己新近亡故的父母祈求冥福，愿以厚金相赠。吴道子说：“久闻将军剑名，如肯为我一舞，足以当惠，借君壮气，助我挥毫作画，尊意如何？”裴旻欣然同意，相约今日来舞剑作画。消息传开，洛阳人争相来看。

在佛殿前，裴旻正在舞剑，但见银光闪闪，有如银蛇飞舞。忽地只见那剑被抛入九霄，瞬间落下，犹如一道电光。裴旻不慌不忙举起剑鞘，飞剑恰然插入鞘中。这一惊险的场面，先是把众人惊得呆若木鸡，顿又发出了震山撼岳的欢呼。

吴道子待裴将军收起剑来，即刻走到粉壁前，不假思索，笔走龙蛇，壁画立成。当最后画及佛像圆光时，“立笔挥扫，势若风旋”，不用规矩、不差毫厘。观看的人围了一层又一层，先是屏息静观，待看到这一绝技，众人不禁惊讶赞叹不绝，皆以为神助。张旭看到这里，也脱帽向前，意兴勃勃地挥笔作书。只见他，疾若流星、轻若云烟，一洒而就。那围观的人们欢呼雀跃，说：“今生有幸，想不到一日间竟然目睹三绝！”

这个带有传奇性的故事，生动地说明了吴道子的为人风貌及其画作的艺术特色，以及他对社会的影响力。

吴道子，又名道玄，约生于唐高宗时代，活跃于开元、天宝年间。安史之乱以后，还有人见过他，生卒年已难考定了。他是阳翟（今河南禹县）人，幼年孤贫，流浪的生活和种种不公平的待遇，养成了他放荡不羁、好酒使气的性格。他初为画工、小吏，然其画名轰动两京，遂被召入宫廷，为皇家画师。

天宝年间，唐玄宗想看嘉陵江山水的奇丽景色，就命吴道子入蜀写生。吴道子饱览蜀中山水的奇伟壮美，却空手回到长

安。玄宗召见他，欲看画稿。他说：“臣无画稿，只有腹草。”玄宗遂让他在大同殿壁上作画。吴道子成竹在胸，凭借熟练的技艺，只消一日就画完满壁的嘉陵山水。在此之前，著名画家李思训也在这殿内作了幅嘉陵山水图，精雕细刻，用了好几个月的工夫。唐玄宗看了两人的作品后赞叹说：“李思训数月之功，吴道子一日之迹，皆尽其妙！”

李思训，人称小李将军，其子李昭道，人称小李将军，皆为唐代著名山水画家。他们的山水画色浓重、描绘细致，青山绿水、金碧辉煌，开中国青绿山水画派之先河。

吴道子的画，以水墨为主，疏笔淡染，挥洒自然、苍劲大方。这种风格的山水画，后来也形成一个流派，即水墨山水，亦称“吴装”山水。

吴道子的水墨晕染法极为人称道。传说他在内殿画过五条龙，每当天色阴沉将雨，那画面上就如生烟雾，青龙张牙舞爪、鳞甲飞动，好像欲腾空而去。可见他运用晕染法之绝妙。

吴道子的画，善用兰叶描和莼菜条的笔法，这是他首创的画技。“兰叶描”，即形如兰花叶状的线条；“莼菜条”，两端轻细，中间粗重，浑圆劲挺，犹如杭州西湖中出产的莼菜茎。运用这种线条描绘人物，富有运动感和节奏感，亦富于变化。这一创造，突破了东晋顾恺之以来那种粗细一律的铁线描法，提高了线条的表现力。吴道子以这种线条作画，钩出的衣纹饰带，犹如迎风飘洒，流畅自然，故有“吴带当风”之誉。

吴道子作画神速、创作甚多，只在洛阳、长安两京的寺观中就有 300 壁之多。然而，时移物迁，无一存世，他的画卷也只剩一幅《送子天王图》流传下来。但那亦恐非原作，大约是宋人

的临本。

《送子天王图》又名《释迦降生图》，描写的是佛祖释迦降生后，他的父亲净饭王抱着他去拜谒天神的情景。

此外，河北省北岳庙的石刻画《鬼伯》，西安碑林中的石刻《观音像》，相传是吴道子的作品，但有可能是后人摹拟刻就。从中可略窥吴道子艺术风貌之一斑。

吴道子以壁画的杰出成就，赢得了画坛圣手的称誉。至今，民间画工崇奉其为祖师。千余年来，吴道子久享盛誉，故而渐渐被神化了。相传，有个和尚对一贫士不以为礼，贫士就提笔在墙上画一驴子，后拂袖而去。夜里驴子叫个不停，又下来将屋中家具什物践踏坏了。天明，和尚寻驴不见，只见壁上画一驴，下有题字“吴道子”。和尚后悔莫及。又相传，唐玄宗夜梦一巨人捉鬼，醒来述说此事。吴道子遂画巨人像，玄宗一见十分惊讶，竟然与梦中所见，一丝不差。问他为何人，指为钟馗。据说钟馗捉鬼的画，始于吴道子。这类神奇的传说很多，至今在民间广为流传，足以说明吴道子对后世的广泛影响。

中国画史上载有吴道子的一条为后人所耻的罪过，在此顺便提一下。

当年，吴道子已独霸画坛，享有盛誉。这时，有位叫皇甫轸的新秀，声望骤起，据说皇甫轸在长安净域寺的壁上画雕，“其势欲脱”，即欲飞上天，可见其艺术亦超越众伦。吴道子心胸偏狭，畏其将威胁自己在画坛上的霸主地位，遂仗势雇人将这位年轻的画师杀害了。

书狂怀素

怀素，字藏真，湖南零陵郡人，书法家。书史上称他为“零陵僧”或“释长沙”。他的生卒年月，有多种说法：《续开元释教录》和《宋高僧传》都不同，有的说他卒在公元712年（景龙六年）。但从怀素的《自叙帖》上所书的时间上看“大历十二年”即公元777年，他还活着。《论书帖》及《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说：唐开元十三年—贞元元年即公元725—785年。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引詹瑛一文也认为怀素生于开元十三年，即725年，卒于785年。

怀素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书法家，他和张旭、颜真卿、邬彤、徐浩等人齐名，后世有“张颠素狂”，或“颠张醉素”之称。他与李白、杜甫、苏涣等诗人交情甚厚。他的草书称为“狂草”，用笔圆劲有力、使转如环，奔放流畅、一气呵成，可以说是一种古典的浪漫主义艺术，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

《高僧传》记载：怀素的曾祖父叫钱岳，唐高宗时做过绛州曲沃的县令，祖父钱徽任延州广武的县令，父亲钱强做过左卫长史。

陆羽《怀素别传》说：怀素的伯祖释惠融也是一个书法家，他学欧阳洵的书法几乎可以乱真，所以乡中称他们为“大钱师、小钱师”。可知怀素出身于官僚的家庭，且从小受到家庭的教育。陆羽是唐肃宗时人，和怀素几乎同时，他从小在寺院长大，对僧徒生活十分熟悉，著有《茶经》，他依据闻见写了《怀素别传》。

《高僧传》记载：怀素生前，母亲李氏，做了一梦，梦中看见

狂风暴雨，雷电齐鸣，从而怀孕。当他诞生的那天，香气扑鼻，神光满室。这梦象征着婴儿极为珍贵，将来定是“王者之师傅也”。

怀素自幼聪明好学，他生得眉清目秀，端严若神，器度宽宏，一举一动，少年老成，甚得父母钟爱。因此人人说他“学必成功，才当逸格”，学习上定能崭露头角。

怀素 10 岁，“忽发出家之意”，急得双亲唉声叹气，想阻止也阻止不了。所谓“猛利之性，二亲难阻”（《高僧传》）。他在《自叙帖》里也开门见山地说：“怀素家长沙，幼而事佛，经禅之暇，颇喜笔翰。”

他勤学苦练的精神是十分惊人的。

李肇《唐国史补》中曾描写道：“怀素好草书，自言得草圣三昧，弃笔堆集埋于山下，曾曰‘笔冢’。”

陆羽《怀素别传》还说：怀素家贫，家里买不起纸，只好在寺里的墙上、衣帛上、器皿上练字。陆羽又说：尝于故里种芭蕉万余株，剪其叶以供挥洒。称其园为“绿天”。后来又作了一块漆盘和一块漆板，写了擦，擦了写，以致把盘、板都写穿了。怀素“弃笔成冢，盘板皆穿”的勤学苦练精神，难怪李肇说他：“有笔如山墨作溪。”

怀素草书的名气，在青少年时代已经遐迩闻名了。当时有位朱逵处士，听说少年和尚草书有名，特从远处赶来衡阳，拜访怀素，并赠诗道：“衡阳客舍来相访，连饮百杯神转玉。”“笔下唯看激电流，字成只畏盘龙走。怪状崩腾若转蓬，飞丝历乱如回风。……于今年少尚如此，历睹远代无伦比。……”（《全唐诗》·卷 240。）

怀素在长沙的声誉，不但是士大夫知道，连当时的永州太守王颋也知道。王颋亲自登堂拜望怀素，赠诗道：

衡阳双峡插天峻，青壁谿谿万余仞。
此中灵秀众所知，草书独有怀素奇。
怀素身长五尺四，嚼汤诵咒吁可畏。
铜瓶锡杖倚向庭，斑管秋毫多逸意。……
我牧此州喜相识，又见草书多慧力。
怀素怀素不可得，开卷临池转相忆。

（《全唐诗》·卷 240）

怀素在衡州不但写字，而且吟诗，他诗道：

祝融高座对寒峰，云水昭丘几万重。
五月衲衣犹近火，起来白鹤冷青松。
（怀素《高座帖》）

这时候他如白鹤一样，要远走高飞了。

公元 757 年（至德二年），怀素 32 岁，作了一次求师访友的旅游。旅游的目的：《自叙帖》上说得很清楚：“恨未能远睹前人之奇迹，所见甚浅，遂担笻杖锡，西游上国，谒见当代名公，错综其事，遗编绝简，往往遇之，豁然心胸，略无凝滞，鱼笺绢素，多所尘点。”他想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要观摩“遗编绝简”。

有天到了南昌，写了一首《洪州诗》，抒发了他胸中的抱负

和夺魁的雄心壮志。可惜宋代《广川书跋》中没有全部把它记载下来,现存的只有“汉家聚兵楚无人”一句。书中解释道:“怀素似不许右军得名太过,谓‘汉家聚兵楚无人’也,其与阮籍言‘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是也略等矣!”怀素之意和阮籍对谢安说的一样,“就是因为天下人才太少了,才使您成名”。这一句诗,可知怀素胸怀大志,要超过王羲之,要与张芝“逐鹿中原”。

有次,在途中看到一幅张僧繇的《醉僧图》。几个和尚醉熏熏地在饮酒,怀素大感兴趣,便吟了一首诗:“人人送酒不曾沽,终日松间挂一壶。草圣欲成狂便发,真填画入醉僧图。”此画是对僧侣形象、不事生产、酗酒坐食的无情嘲笑,触到僧侣们的痛处。在唐代僧侣们拼凑了几十万钱,请阎立本画了一幅《醉道士图》,来转移视线,聊以自慰。怀素作为一个僧侣,见此图不但没有懊恼,而且吟诗歌颂,怀素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草圣欲成狂便发”。

怀素到了洛阳,见到了邬彤。邬彤是怀素的表叔。怀素便拜表叔邬彤为老师。《书苑菁华》说:“怀素师邬彤,授其笔法。”邬彤是金吾兵曹,即负责京城卫戍警备的长官,他又是张旭的学生,颜真卿的同学。邬彤便把怀素留在家中,探讨书法。邬彤把张芝临池之妙,张旭的草书神鬼莫测,王献之的书法如寒冬枯树等,一一给怀素讲解;邬彤又将作字之法的一个“悟”字教给怀素。所谓“悟”,就是要抓住自然界的某些现象,如山峦、鸟兽、虫鱼、花果、日月、星葵、风雨、雷霆、歌舞、战斗……观察、分析、研究,从中得到某种启发或感受,并把自己的喜怒哀乐等感情灌注在草书之中,因此获得了许多成就,如张长史的

“孤蓬自振”、“惊沙坐飞”、“担夫争道”等，都是“悟”出来的。

有天，怀素要辞别而去，邬彤关怀地对怀素说道：“万里之别，我无一物相赠，很感抱歉，我想有件宝物赠送给您。”当时相传说，邬彤藏有王羲之的《恶溪》、《小王》、《骚劳》3帖，这是无价之宝，怀素认为他将以此物相赠，可是及到临走之时，邬彤却对怀素道：

“草书竖牵，似古钗脚，勉强！”就是说草书的直连（如竖），应像古代的钗脚那样的古朴圆浑。

怀素离开洛阳，向京城长安出发。这次去京兆，是由礼部尚书张谓的邀请。唐代状元任华有诗记载道：“狂僧，狂僧，尔虽有绝艺，犹当假良媒，不因礼部张公将来，如何得声名一旦喧九垓。”

古人说：“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怀素对邬彤的谆谆教诲是刻骨铭心的。

有天，怀素看见了几块浮云，像棉花团似的一朵朵分散着，映照着温和的阳光，云块的四周放出了金色的光辉，太阳已经被浮云遮蔽住了，不禁令人忆起“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的李白诗句。一会儿这些积云又很快地消散了，它们又成为扁球状的云块，云块间露出碧兰色的天幕，远远望去这些白云就像草原上雪白的羊群，一会儿像奔马，一会儿像雄狮、像大鹏，有的像奇峰。

不料那东北角的几块积云，迅速地向上凸起，一忽儿乌云密布，铺天盖地而来。原来雷阵雨就要到了，这些积雨云越长越高，云底慢慢变黑、云峰渐渐模糊，一霎间，整座云山崩溃，乌云弥满了天空，狂风骤雨、雷电齐鸣，急得怀素不可开交。于

是他悟到了“骤雨旋风”、“雷电齐鸣”的情景，并把这些情景运用于狂草之中。这就是陆羽《怀素别传》上说的，“吾观夏云多奇峰，辄常师之”。又说：“其痛快处如‘飞鸟出林’、‘惊蛇入草’，一一自然。”从此怀素的狂草，有了一个飞跃，冲破了王羲之、王献之受章草的影响束缚，创造性地形成了他自己的狂草风貌。

《乐府杂录》记载：“开元中有公孙大娘善舞剑器，僧怀素见之，草书遂长，盖准其顿挫之势也。”公孙大娘是开元时有名的女舞剑家，她是个“玉貌锦衣”抱绝技的舞女。杜甫描写道：“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孙剑器初第一。”“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就是说看到公孙大娘的剑器舞，轰动四方，观赏者人山人海；看的人面目失色、神摇目眩，觉得天地都在上下旋转；她的剑光明亮闪烁，好像后羿射落九日；她的舞姿矫健轻捷，犹如群神驾龙飞翔；当她舞剑开始时，紧凑的鼓声暂歇好像雷霆停止了震怒；舞罢时，手中的剑影好像江海上平静下来的波光。怀素看了公孙剑器舞后，大为感动。她使转如环、风驰电掣、淋漓顿挫的武艺和激昂慷慨、惊心动魄的节奏，难道不可以运用于狂草之中？由此他的狂草在画形分布、笔势往复中增强了高昂回翔之态；在结体上也加强轻重曲折、顺逆顿挫的节奏感，无疑对他的狂草又一次提高。在长安怀素声誉青云直上，歌颂他草书的诗篇有37篇之多。

《广川书跋》说：“书法相传至张颠后，鲁公（颜真卿）得尽于楷；怀素得尽于草。”怀素是通过颜真卿而学到张旭笔法的。颜真卿是书坛的领袖。其“颜体”，可谓反映盛唐的繁荣强盛，

富有生机的社会风貌,对后代影响深远,脍炙人口,一直为书家所推崇。

怀素拜访颜真卿,颜氏以怀素是邬兵曹的弟子,乃接待他,并对怀素说了许多自己向张长史求学笔法的经历。颜真卿曾对怀素说:我 20 多岁时,曾游长安,师事张旭 2 年,略得笔法,自以为未稳。35 岁从醴泉罢职回来,又特往洛阳去访张旭,继续求教。……颜氏又说:有次我再三要求长史教笔法,长史许久不说,乃左右盼望,心情不舒畅而去,我乃跟其后,走到东竹林院小堂里,张公乃当堂坐在床上,而命我居于小榻边乃说道:“笔法玄微,难妄传授,非志士高人,岂可言其妙!书之求能,且攻真草,今以授子,可须思妙!”

于是乃举出十二笔意授颜真卿,颜传授怀素十二笔意即“平谓横、直谓纵、均谓间、密谓际……”等笔意。(见《佩文斋书画谱》。)这就是颜真卿后来写给怀素的序文中“真卿早岁常接游居,屡蒙激昂教以笔法”的追述。北宋黄山谷说:“怀素见颜尚书道张长史书意,故独入‘笔墨三昧’”(《山谷题跋》。)《藏真帖》也说:“颜传长史笔法,闻斯法若有所得也。”

有天,颜对怀素说:“张长史看了‘孤蓬惊沙’之外,还看见了‘公孙大娘剑器舞’,然后在书法中取得了‘低昂回翔’之态,不知邬兵曹(彤)有什么心得没有?”怀素对道:“邬兵曹的心得是‘竖连似古钗脚’。它古拙,圆而劲,这个比喻真好呀!”颜氏点点头,笑了一笑。两人没有再语。

过了几天,怀素要辞别而去,颜真卿道:“邬兵曹的直连学古钗脚,哪里及‘屋漏痕’好呀!”。“屋漏痕”是雨水漏在墙壁上的痕迹,形容书法用笔无起止之痕迹,要求用笔不飘浮,力透

纸背，严谨逼真的状态。怀素紧紧地握住颜公的手说：“我得之矣、我得之矣！”

过了一会，颜公慢慢地问怀素道：“你的草书除了老师传授外，自己有否获得感受？”

怀素道：“贫僧有一天傍晚，曾长时间地观察夏云的姿态。我发现云朵随着风势的转化而变化莫测，或如奇峰突起，或如蛟龙翻腾，或如飞鸟出林、惊蛇入草，或如大鹏展翅、平原走马，不胜枚举、美妙无穷。”

颜公道：“法师的感受好极了，你的‘夏云多奇峰’的体会，使我闻所未闻，增加我的广识，‘草圣’的渊妙，代不乏人，今天有你在，后继有人了。”

公元759年（乾元二年），怀素34岁。这年李白在巫峡遇赦后，从长流夜郎乘舟回江陵。在南游洞庭潇湘一带，被怀素找到。当时李白精神振奋，认为朝廷定要任用他了。所以吟出了“千里江陵一日还”的诗篇。这次碰见怀素。李白便写了一首《草书歌行》，赞扬他：

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
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中山兔。
八月九月天气凉，酒徒词客满高堂。
笺麻素绢排数箱，宣州石砚墨色光。
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
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
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
恍恍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

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同楚汉相攻战。

湖南七郡凡几家，家家屏障书题匾。

王逸少，张伯英，古来几许浪得名。

张颠老死不足数，我师此义不师古。

古来万事贵天生，何必要公孙大娘浑脱舞？

（《李太白全集·草书歌行》）

李白写此诗时已 59 岁，而怀素只有 34 岁，所以诗的开头称怀素为少年上人。明代解缙《春雨杂述》说：“张长史旭传颜平原真卿、李翰林白、徐会稽浩。”何遂《春渚纪闻》说：“李白的草书叫‘醉书’。”看来李白也是一位书法家，怀素除向颜真卿、李白求书求诗外，又向徐浩求笔法。

公元 767 年（大历二年），怀素 42 岁。他南下广州向徐浩学笔法。黄山谷云：“唐自欧、虞后，能备八法者独徐会稽（浩）与颜太师（真卿）耳！”（《题徐浩碑》。）郭沫若说：“怀素去广州依徐浩必当在大历二年四月以后大历三年十月之前，或者稍后一点也有可能，因朝廷的任免在前，而实际的年代应稍后。”（见《李白与杜甫》。）

《唐书·代宗记》大历二年四月“以工部侍郎徐浩为广州刺史、岭南节度观察使”，大概在这段时间。另一位诗人、草莽英雄苏涣在长沙遇见了怀素。当时正是徐浩去广州赴任，怀素要苏涣题诗，苏涣就挥写了一首《赠零陵僧兼送徐广州》的诗。这首诗太重要了，杜甫认为苏涣有济世的宰相之才，文可以比为庞德、谢安、苏秦、司马相如一类人物，武可以比为名将白起。杜甫对苏涣的生平性格是很了解的。苏涣的《怀素上人草

书歌》道：

张颠没在二十年，谓言草圣无人传。
零陵沙门继其后，新书大字大如斗。
兴来走笔如旋风，醉后耳热心更凶。
忽如裴旻舞双剑，七星错落缠蛟龙。
又如吴生画鬼神，魑魅魍魉惊本身。
钩锁相连势不绝，倔强毒蛇争屈铁。
西河舞剑气凌云，孤蓬自振唯有君。
今日华堂看洒落，四座喧呼叹佳作。
回首邀余赋一章，欲令羡价齐钟张。
琅诵口句三百字，何似醉僧颠复狂！
忽然告我游南溟，言祈亚相求大名。
亚相书翰凌献之，见君绝意必深知。
南中纸价当日贵，只恐贪泉成墨池。

（《全唐诗》）

苏涣的诗很有价值，它记载了怀素是张旭之后唯一继承人，又记载了怀素南游广州访问徐浩的史实。苏涣认为亚相的书法几乎凌驾于王献之之上，如果怀素去拜访他定可以得到亚相的赏识，并且南方的纸价会日渐昂贵起来。但苏涣担心书法写得多的话，怀素的钱就会如墨池那样涌进来。“南中纸价当日贵，只恐贪泉成墨池。”这句诗大有深意：一方面嘲骂权贵元载、鱼朝恩等贪官污吏，另一方面也警告怀素、徐浩。这正是苏涣的抱负。徐浩实际上是个大贪污分子。《资治通鉴》代宗

大历五年,说他“贪而佞,倾南方珍货以赂(元)载”。诗中“泉”即钱,这是苏涣对怀素的劝戒,劝他不要贪财如命,当然也不能为怀素所接受。大历三年任李勉为广州刺史,徐浩只有一年时间就免职了。大历八年九月吕崇贲为广州刺史。这年吕崇贲为部将哥舒晃所杀,哥氏造反,苏涣为谋主,战争坚持2年之久,苏涣得到少数民族的支持。可惜一场轰轰烈烈的造反运动,被一个大贪污犯、大刽子手路嗣恭镇压下去。可以肯定苏涣等人的造反是完全有理的。苏涣有首《毒蜂》的变律诗:“毒蜂一成窠,高挂恶木枝。”他把帝王将相、显族豪绅暗喻为一大颗“毒蜂窠”。两年后苏涣终于遭到杀身之祸,这表明毒蜂窠太毒了。苏涣的诗,在今天读起来,确是令人敬佩不已的。

怀素晚年是在四川成都“宝园寺”生活的。贯休诗:“师不谈经不说禅”;“不谈经”是不可能;“不说禅”可能是真。《唐释怀素食鱼帖》后李璿说怀素既食肉又食鱼。《书画题跋记》说,这是违背“老僧在长沙食鱼,吃□□肉深为不便”的。至于饮酒是受禅宗冲击波的影响是完全肯定的,但决不会如《金壶记》上所说的“一日九醉”的醉僧。大概醉翁之意不在酒,“狂僧不为酒,狂笔自通天”,他志在“狂草”而已。

怀素是东塔律宗的律师。他与法砺律师的“相部律宗”、道宣律师的“南山律宗”鼎立为三大律师。

所谓律宗就是主张以持守戒律为主的称为律宗。有位昙元德尊,他于《律藏》中采其合于自己意见的编集了一部《四分律》。后来有个道宣律师,他从《律藏》中着重解释了《四分律》的戒律,参考《瑜伽·大成乘戒本》,加以发挥,就开拓了“律宗”一科,成为“南山律宗”的大律师。后来还有个法砺律师,住

相州日光寺。他也研究《四分律》，是以《成实论》为依宗，著有《四分律疏》。有一天，他听了怀素对《四分律》的解释，大为吃惊。乃喟然感慨道：“我研习这书三年了，古人的义章错误实在太多，解释的任务要落在你的肩上！”从此怀素编撰《四分律开宗记》。怀素能懂梵文，能翻译印度文。他的从父钱起诗道：“释子吾家宝，神清慧有余。能翻梵王字，妙尽伯英书。”怀素以《大毗婆沙论》、《俱舍论》等为依宗，纠正了《旧疏》6/10 的错误。（见《高僧传》）。

后来称法砺的《律疏》为旧疏；称怀素的《律疏》为新疏。怀素因传习的地方在东塔寺，就称怀素为“东塔律宗”，又称《新疏》为“新章”。大历时元载上奏德宗在四川成都“宝园寺”置戒擅度僧，宣传怀素的《新疏》。收香水钱捐助发行《新疏》40 卷、《法华经疏》30 卷。

怀素在四川成都时，又向嘉陵江求笔法。郭忠虚《林泉高致》说：“怀素闻嘉陵江声而草圣益佳。”嘉陵江水汹涌澎湃，有一泻千里之势。他听了水声，看了水势，便联系到写狂草上，也应该有高低回旋、轻重曲折的节奏感。难怪《谱序》说：“素晚年所书，评者谓与张芝逐鹿。”又云：“比其少作，有加无已。”

晚年患风痹病，享年 61 岁（725—785 年）。元载又命如净公作《怀素传》，韦谔作灵坛传授《毗尼新疏记》。

怀素草书有：《四十二章经》、《千字文》、《自叙帖》、《苦笋帖》、《圣母帖》、《论书帖》、《去夏帖》、《贫道帖》、《逐鹿帖》、《酒狂帖》、《食鱼帖》、《客舍帖》、《别本六帖》、《藏真帖》、《七帖》、《高座帖》、《北亭草笔》等。

高 闲

高闲(约公元9世纪人),浙江吴兴人,湖州开元寺和尚,后入长安,住荐福、四明等寺。唐宣宗尝召其入御府书写,得赐紫衣,是唐代书法家。

《湖州府志》卷25谓:

“高闲,乌程人,髫年受具于开元寺,苦修不惰,兼工书法,好以雪川白纈书真草。论者以为‘智果得右军骨,智永得右军肉,闲独骨肉调匀,合二家之美’。入长安荐福寺,宣宗召见对御草圣,遂赐紫衣,号大德,引年归,韩愈送之以序。”据《高僧传》记载:“高闲还工于楷书。”

高闲草书现存草书《千字文》残卷,仅存“莽”字以下243字,前缺部分原有元鲜于枢补书,今也散失。高闲草书笔力雄健,气势豪迈,变化多端。宋《广川书跋》卷8云:“闲之书不多存于世,其学出张颠,在唐得名甚显。韩退之尝谓张旭喜怒忧悲必于发之,故能变化若鬼神。观闲书者,知随步置履于旭之境矣!……正善学旭者也。”

宋陈思《书小史》云:“高闲善草书,师怀素,深穷体势。”

宋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卷3,谓高闲书“神彩超逸,自为一家。”

《杨升菴集》云:“唐五僧善书,刘涇尝作书评:以怀素比玉,晁光比珠,高闲比金,贯休比玻璃,亚栖比水晶。”

元王恽《书画目录》:“高闲上人谔得韩序帖后,有韩琦、刘敞、富弼、欧阳修、宋敏求题云,此卷蜡纸书非摹本也,欧云如此韩公称实录云,书系颠草。”通过韩愈的序文,高闲的书法名

声大震，宋代名相、学者也纷纷为他题字。

唐陈陶，自号三教布衣，隐居洪州西山，有诗《题赠高闲上人》（见《书苑菁华》17卷）：

檐葡花间容，轩辕席上珍。华江秋菡萏，僧国瑞麒麟。内殿初抬稳，曹溪得没尘。龙蛇惊粉署，花雨对金轮。白马方依汉，朱星又入秦。剧谈凌凿齿，清论倒波臣。拂石先天古，降龙旧国春。珠环合浦老，剑去玉州贫。鸳鹭输黄绢，坛场绕白苹。鼎湖闻入梦，金阁静通神。海气成方丈，山泉落静中。猕猴深爱月，鸥鸟不猜人。……

张祜，有《高闲上人善草书》诗（见《书苑菁华》卷17）：

座上辞安国，禅房志沃洲。道心黄叶老，诗思碧云秋。卷轴朝廷饯，书函内库收。陶欣入社叟，生怯论经俦。日色帘初揭，风声笔未休。长波浮海岳，大点出嵩丘。不绝羲之法，谁穷智永流。殷勤一笺在，留着看银钩。

这两篇都是表榜高闲草书的，还有韩愈《送高闲上人序》（见《韩昌黎集》卷21），这篇序围绕书法创作，从抒情的角度来写，但基本上是规劝和批评高闲的。

《送高闲上人序》，不满350字，高度评价了张旭草书艺术取得划时代成就的原因。

张旭，字伯高，苏州人，曾做金吾长史的官。唐文宗时候，把李白的“歌诗”、裴旻的“剑舞”和张旭的“草书”称为三绝。张旭专心致志于草书，不管在喜、怒、哀、乐、怨、恨的时候都能坚持练习书法，而且还能把这种喜、怒、哀、乐的思想情绪灌注于草书之中。张旭是个“妙悟自然”的人，能把看到的山川、峰峦、鸟兽、虫鱼、草木、花果、日月、星癸、风雨、水火、雷霆、歌舞、战争等各种变化形象寄寓于书法之中，所以他的狂草神鬼莫测、骨肉兼备，成为世人公认的一种高超的艺术。他的狂草显示出惊人的奇迹，它无色而具有图画的灿烂，无声而具有音乐的旋律，故而引人入胜。

张旭是从“担夫争道”的故事中，“悟”到书法的笔划也应该有“互让互就”的精神。安禄山叛乱的时候，河北、河南相继沦陷，他听到了“战鼓惊山欲倾倒”的惊人之声和慷慨激昂的节奏，从而他“悟”到书法的结体，画形分布也应该有高低回旋、轻重曲折、顺逆顿挫的节奏感。

所以韩愈开门见山地指出：

“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富于书。”具体指出张旭之所以能成为狂草大家就是因为他能够从千姿百态的事物中，从变幻莫测的大千世界里，经过事物的某种启发，然后“悟”出即提炼成惊人的艺术形象。韩愈对于张旭的狂草创作作了系统、完整的考察，总结概括出：情感——书法，物象——情感——书法。这是韩愈的书法观。韩愈又认为，张旭的狂草

达到“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的艺术至境，是因为：“为旭有道，利害必明，无遗锱铢，情炎于中，利欲斗进，有得有丧，勃然不释，然后一决于书。”这里他强调，“利害必明”，“利欲斗进”，发而为书，才可能真情充沛，也才可能使书法作品成为真正的艺术。韩愈认定，高闲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今闲师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胶，是其为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泊与淡相遭，颓堕委靡，溃败不可收拾，则其于书得无象之然乎？”照韩愈看，一个出世的和尚是没有功利心的，即“闲之于草书”，没有得张旭之心，“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见其能旭也”。和尚一切归于泊淡，就不可能产生激情，没有激情也就无法论书了。鲜于枢评论道：“高闲用笔粗，十得六七耳！”大概高闲的草书容易给人一种用笔疏狂、肉多骨少的印象。

韩愈《送高闲上人序》，要高闲观察万物，从中受到某种启发而运用于书法这是正确的，但也有其片面性，他这种理论的出现，排斥和摒弃了长期艰难发展起来的书法艺术的独立意识及审美的价值。

从以上的资料看，韩愈认为高闲没有得张旭的心，但也有人认为高闲是学张旭、怀素的。从用笔的茂密与结体的流转或可寻得旭、素的遗轨，但更主要的是高闲汲取了传统草法中逸笔草草纵情驰骋的意趣。在用笔上，高闲以折为主，缺乏圆劲浑成，在笔断处容易产生气势不畅之感。另一方面，高闲由于结体是行草兼并，对于如何处理行草矛盾因素的统一略嫌融洽不足，在整体上也就减弱了草法的魅力。当我们欣赏他单个的字迹时，可以获得有雄强逸宕的感觉，表现出高闲磊落挥运的机趣；而当字与字联系起来作为整体看时，就和张旭狂草的

疾风骤雨式的倾吐相去甚远了。

璆 光

璆光，唐昭宗时僧人，浙江永嘉吴氏子，字登封。多作古诗，长于草隶，是位著名的书法家。

《永嘉县志》卷 36 方外：

“璆光字登封，姓吴氏，唐左庶子竞子后裔。幼舍家于陶山寺剃度。多作古调诗，长于草隶。陆希声谪官豫章，光往谒之，授其五指拨镫诀。乃西上，昭宗召对御榻前书，赐紫衣袍，归甬东终焉。”

《高僧传》璆光弟子从王襄，温州僧正智琮，皆得墨诀。称璆光“长于草隶”。

《宣和书谱》：“璆光潜心草字，名重一时，吴融、司空图皆称羨之。

《宣和书谱》又云：“观璆光墨迹，笔势遒健，虽未足以与智永、怀素并驾，然亦自一家法，为时所称。”

唐代书僧除怀素外，要算璆光的名气为大。

贯休有《璆光大师草书歌》（见《书苑菁华》卷 16）诗道：

雪压千峰横枕上，穷困虽多还激壮。
看师逸迹两相宜，高适歌行李白诗。
海上惊驱山猛烧，吹断狂烟着沙草。
江楼曾见落石星，几回试发将军炮。
别有寒雕掠绝壁，堤上玄猿更生力。
又见吴中磨角牛，舞槃盘力初触击。

好文天子挥宸翰，叶制本多堆玉案。
晨开冰殿教题壁，题罢紫衣亲宠锡。
僧家爱诗自拘束，僧家爱画亦侷促。
唯师草圣艺偏高，一掬山泉心便足。

这首诗内容丰富，赞赏聃光草书的出神生动，描述了聃光草书的运笔、结体和布局等特点。看聃光的作品，好似看高适的歌行，李白的诗。他的草书奔放流畅、一气呵成，气势奔腾如“江楼曾见落石星，几回试发将军炮”。它的结体是骇人眼目的，“别有寒雕掠绝壁，堤上玄猿更生力”。观此草书之奇迹，怎能不让天子口服心折呢！

吴融《赠聃光上人草书》诗（见《书苑菁华》卷17）：

篆书朴，隶书俗，草书贵在无羁束。
江南有僧名聃光，紫毫一管能颠狂。
人家好壁试拂挥，瞬目已留三五行。

摘如钩，挑如拨，斜如撑，回如斡又如夏禹锁淮神，波底不出牛难拔，又如朱亥椎晋鄙，袖中抬起腕欲脱。有时软，紫盈一穗，秋风曳空阔。有时瘦，巉岩百尺，枯松露槎枿。忽时风动更惊人，一声霹雳龙蛇活。稽山贺老昔时傅，又闻能者有张颠。上人致功应不下，其奈飘飘沧海边。河中一入天子国，络素载缣洒毫墨。不系知之与不知，便有一字千金值。

吴融说他书法似张颠素狂的狂草，他醉来把笔，放浪于粉

壁素屏之前，大显身手。他的笔划有时细，有时瘦，有时遒劲，有时凝重，笔势飞动如龙蛇。

罗隐也有诗《送讐光大师》：

禹祠分手戴湾逢，健笔寻知达九重。
圣主赐衣怜绝艺，侍臣擒藻许高聳。
宁亲久别街西寺，付诏初离海上峰。
一种苦心师得了，不须回首笑龙钟。

唐司空图《送草书讐光归越》（见《书苑菁华》卷17）：

“……讐光僧，生于东越（温州），虽幼落于佛，而学无不至。故遗迹道功之外亦恣为歌诗，以道江湖郁勃之气，是佛老而儒其业者也。虽孟荀复生岂拒之哉！今系名内殿且为归，荣足以光子远矣。永嘉西岭康乐胜游之最是行也，为我以论诗一篇题于绝壁。”（见《四库全书·子部》120 艺术类）。

司空图说他既善草书又擅长诗歌，既信佛又业于儒，说他就是孟子、荀子复生也不能违逆他，可见当时名声颇大。除了以上几人的诗序外，还有杨钜的《中楷送讐光序》、崔远《中楷送讐光诗》、张被《中楷赠讐光诗》、李石《中楷送讐光诗》、薛贻《中楷赠讐光序》、虞汝弼《中楷赠讐光诗》、陆扈《小楷赠讐光草书歌》。

《唐书本传》谓：“陆希声苏州人，博学善属文，昭宗闻其名，召为给事中，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位无所轻重，以太子太师罢。”

《宣和书谱》谓：“希声家世有书名，六世伯父柬之以草书

高天下；四世祖景融博学工书，擅名，至希声一出，遂能复振家法。”从此看来，陆希声一家是以擅长书法而著名的，他的六世伯陆柬之就是一个大书法家。陆柬之是当时大名鼎鼎虞世南的外甥，从小跟舅舅学书，后来他与欧阳洵、欧阳通、褚遂良等人齐名。陆希声的“拨镫法”正是从虞世南、陆柬之、陆景融等人中一脉相承的。陆希声自己说：

“希声自言昔二王皆传此法（拨镫法），自斯翁以至阳冰皆得之。希声以授沙门璆光，光复入长安为翰林供奉，引希声于贵幸，昭宗召为给事中，后位至宰相。”（见《书小史》卷10及《唐诗纪事》）。

唐陆希声所传的是“压、押、钩、格、抵”五字法。“压”是大拇指指肚部分紧贴笔管；“押”是食指与大姆指相对夹持笔管；“钩”是中指钩住笔管；“格”是无名指甲、肉相连处挡着笔管；“抵”是小指紧贴无名指以助之。五指之力，相互配合，执住笔管，并要求指实掌虚，腕和肘悬起。这样执笔写字，笔锋中正，运转容易，字迹圆劲得势。

《魏公题跋》卷之一，有《题送璆光序》：“璆光论书法，犹释氏心印，发于心源，成于了悟，非口手可传。此诚知书者，然当时名称如此而独不闻于后世，笔迹绝少，传者岂唐人能书者多如光辈，湮没无闻不知几何人耶！观诸公称誉之言，益非寻常僧流也。”

元朝赵孟頫大概看到过璆光的论书法言论，他认为璆光论书法，犹释氏心印，发于心源，成于了悟，非口手可传。大概古代书法家都掌握了一套“心手相印”、“心手双畅”的作字方法。

聿光的手迹，现在已看不到了。元代梅花道人吴镇的书法是学聿光的。《书史会要》说：吴镇“草学聿光。”明代沈周《吊梅花道〈墓〉》诗道：“梅花空有塔，千载莫欺人。草证聿光妙，山遗北苑真。”

亚 栖

亚栖，唐昭宗时僧人，洛阳人，是位书法家。

《宣和书谱》卷 19 谓亚栖“喜作字，得张旭笔意”。又云：“吾书不大不小得其中，道若飞鸟出林、惊蛇入草。”

《宣和书谱》谓：御府藏亚栖书迹有草书《对御草书歌》、《观智永草书歌》、《观怀素草书歌》、《观高闲草书歌》、《几何赋》、《潇湘逢故人赋》、《罗汉赞》等帖。

《僧彦修帖》：“颜修与亚栖、聿光齐名。”

《书小史》卷 10：亚栖在唐光化中，898 年，对殿草书，两次荣获紫袍，得到昭宗的奖励。有诗道：

通神笔法得玄门，亲入长安谒至尊。
莫怪出来多意气，草书曾悦圣明君。

元郑杓《衍极》卷 4，《古学篇》刘有定谓亚栖尝云：“凡书通即变，若执法不变，号为书奴。”

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云：“亚栖书开元寺壁，笔势浓郁，古帖有之，亦是晚唐奇迹。”

朱彝尊《曝书亭书画跋》：“怀素、亚栖皆有草书千文，是卷书法矜奇有惊蛇入草，猛烧吹烟之势……疑是南岳宣义大师

梦英笔也。”(见《跋草书千文》)。

亚栖草书也学怀素的狂草,运笔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有很多变化。他安排字的点画和字、行之间的关系,结体的大小、疏密、斜正都类似怀素。怀素因悟到“飞鸟出林,惊蛇入草”的观察事物,从而受到启发,联想而应用到书法上来。亚栖对此也有同感,从而对他的书法提高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所谓“飞鸟出林”就是看见了一群乌鸦,在黄昏时从丛林中飞出,它们有斜斜聚聚、曲曲直直的变化,这些斜聚曲直的交错线,既有条理,又有变化,既相成又相破,乱中有齐、齐中有乱,有密而窒、疏而不散的自然关系,从此他们悟出作书的线条也应该有如此的变化才对。

所谓“惊蛇入草”,是看到一条大蟒蛇,在弯弯曲曲急游时,两边的茅草平分得很有规律,有调和、有均衡,又有变化,蛇游到哪里,哪里茅草便平分在那里,很对称、很调和。惊蛇入草,这就是在草书中,运用平衡、对立、变化等的规律,对草书的画形分布、笔势往复增强了高昂回翔之态,加强了轻重曲折、顺逆顿挫的节奏感。

刘泾评书,说唐五僧,把亚栖放在第五位。

米芾对唐五僧人,没有一个满意。认为他们“变乱古法,惊诸凡夫”,“不能高古,高闲而下,但可悬酒肆(即酒店),讐光尤可憎恶”,亚栖更不在话下了。

其实唐代僧侣中还有僧彦修、僧文楚,也是素师余派。牟子才云:可惜刘泾未见过文楚的书,故不能定论。(见《杨升菴集》)。僧彦修,王世贞曰:“彦修盖与亚栖、讐光齐名。作诗语如避机懒归,书法如淮阴恶少年,风狂跳踉,俱非本色,可叹,

可叹。”唐代这几个僧人都是素师的余派。古代文人对僧书是看不起的，正如孙铎所说：“长沙是僧笔，山谷是文人笔。僧是长沙短处，文人是山谷长处。”又说：“唯未能去俗，凡俗体、俗笔、俗意、俗气，俱不免犯之，盖亦为长沙（怀素）所误。”另一方面又认为“素师手力劲，然字形丑，涪翁（山谷）手力弱，然字形媚”，如此等等都影响了这几位僧人的声誉。其实，草书流畅、奔放，为了大众化，为了方便，这是拥护新生事物、是好的。但过分飞动，天花乱坠，便显得软弱无力，便成“风狂跳踉”，为人所不取。僧彦修的狂草，当属亚栖流辈，《诗牋》的狂怪，有的离开了草书的基本法则，堕入魔道。亚栖、彦修之辈所使用的那种纤巧浮滑之笔，北宋黄庭坚不客气地批评他：“如京洛间人，传摹狂怪字，不入右军父子绳墨者，皆非长史笔迹也，盖草书坏于亚栖也。”

然而亚栖的草书，其用意在一个“变”字。他主张学书要得“法”，但得“法”不是最终目的，得了“法”还要能变，要变成自己的面貌，如果死守“定法”，纵然有入木三分的功力，最终不过是“书奴”。他在《论书》中道：“凡书通即变，王变白云体，欧变右军体，柳变欧阳体，永禅师、褚遂良、颜真卿、李邕、虞世南等并得书中法，后皆自变其体，以传后世，俱得垂名。若执法不变，纵能入木三分，亦被号为‘书奴’。”从这个意义上看，他还是进步的书法家。

贯 休

贯休（公元832——912年）字德隐，号禅月大师，浙江省兰溪市太平乡登高里人。他是唐末五代卓越的诗僧和书画家，

著有《禅月集》25 卷。

《宋高僧传》：(贯休)家贫，7 岁投本县和安寺出家为童侍。《禅月集序》吴融说他：“幼得苦空理，落发于东阳金华山。”贯休 7 岁能作诗，常常与僧人处默隔篱论诗，旁人听了大为惊奇。由于他天资颖悟、记忆力强，日诵《法华经》1000 字，过目不忘，几个月之内就把这部经学完，所谓“耳闻暂闻，不忘于心”。17 岁往江西庐山传经，曾受到大愿大师的器重。当贯休正在庐山念《法华经》的时候，这位大愿大师从床上起来迎接他道：“我不敢以众僧待你。”

几年后，贯休也开始登坛讲授经义，不仅讲《法华经》，还兼讲《大乘起信论》。他的弟子昙域说：“他这些年，可谓三冬涉学，百舍求师，寻妙旨于未传，起微言于将绝。”由于他的勤学苦练，对佛学教义有了深刻的体会，到处亲敷法座，足迹遍江、浙、赣、湘、鄂、蜀等地。《禅月集》中有：“雁荡径行云漠漠，龙湫宴坐雨蒙蒙”之句，所以雁荡山有“径行台”、“宴坐峰”，就是纪念贯休而得名的。

公元 894 年，正是群雄割据、藩镇跋扈、军阀混乱的局面，贯休也奔走于公卿之门，先谒见吴越王钱鏐，投诗作为见面礼道：

贵逼身来不自由，龙骧凤翥势难收。

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

(《全唐诗》卷 837)

钱鏐看了诗很不高兴，因为他有称帝的野心，休诗歌颂他

只有 14 州，所以钱鏐要求贯休把 14 州改为 40 州，然后才接见他。贯休道：“州亦难添，诗亦难改，闲云野鹤，何天不可飞耶！”（见《唐才子传》）当天就收拾衣钵拂袖而去。这是因为钱鏐这个人的底细，贯休是一清二楚的，钱氏出身无赖，不事生产，后得志衣锦还乡，豪华奢侈、劳民伤财，他的部下也追求声色，过着享乐腐化的生活。这些生活当然和贯休是格格不入的，他才气横溢、愤世嫉俗的诗歌便一触即发。他《题某公宅》讽刺道：

宅成天下借图看，始笑平生眼力悭。
地占百湾多是水，楼无一面不当山。
荷深似入苕溪路，石怪疑行雁荡间。
只恐中原方鼎沸，天心未遣主人闲。

诗中描写的地方，正是杭嘉湖一带。无疑，在这战祸频繁的形势下，难道老天会让“宅主人”过那安闲清福的日子吗！

公元 901 年，他登南岳衡山，于荆南途中遇见吴融（字子华，浙江绍兴人），当时唐昭宗为宦官韩全晦等人劫持，朱全忠、李茂贞等藩镇各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意图，吴融受昭宗命，赴京起草诏书。所以贯休把吴融比为汉朝的贾谊，赠以诗道：“汉文思贾傅，贾傅遂生还。今日又如此，送君非等闲。”两人感情可以想见。

公元 904 年某天，荆州节度使成汭（原名郭禹）做生日，一时收到祝寿的贺诗百余篇，其中也有贯休的贺诗。成汭也是个大流氓，“使酒杀人”出身，自己不会作诗，便命幕僚郑准

来评论诗的高下，郑准妒忌贯休，故意把休诗列为第三名。贯休气愤地说道：“他们成见如此深，岂可久住！”便想离开，谁知成汭听说贯休要走，便向贯休请教笔法，贯休怒气未消，心中暗想，你是个不学无术的大草包，难道也要附庸风雅来学书法么？于是毫不客气地说道：“此事必须登坛面授，岂可草草从事！”成汭大怒，便把贯休驱逐出境，流放到黔中去。

公元907年，朱全忠篡夺了唐朝皇位，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大梁，封高季兴为荆南节度使。《光绪兰溪县志》卷5：“贯休再至荆南，高季兴馆之龙兴寺，感时政作《酷吏词》。”《十国春秋》则说：“贯休在被成汭逐入黔中，后再至荆南，高氏馆之龙兴寺，他感时政作《酷吏词》，就被疏远，郁悵中题砚曰：入匣始身安。”人们以为这里的“匣”者即指蜀。他的《酷吏词》在诗集上明显地记载着：“有叟有叟，暮投我宿，吁叹自语，云太守酷，如何如何，掠脂挖肉，吴姬唱一曲，等闲披红束，韩娥唱一曲，锦段鲜明屋。宁知一曲两曲歌，曾使千人万人哭。不唯哭，亦白其头，饥其族。”此词的矛头，大胆地指向太守，揭露了新贵欺压贫民的酷政。贯休深忧悲伤，申诉人民的苦难。由此又与高氏闹翻，拿起一瓶一钵走了。

《益州名画录》谓：贯休于天福二年入四川成都，又献诗给蜀王王建道：

河北河南处处灾，唯闻全蜀勿尘埃。

一瓶一钵垂垂老，万水千山得得来。

王建看到诗中有“万水千山得得来”之句，很为高兴，便呼

贯休为“得得和尚”，赐号为“禅月大师”。对他大为赏识，有“礼待膝之前席，过秦王待道安之礼，逾赵王迎图澄之仪”。道安和图澄都是东晋十六国时有名的高僧，贯休的隆遇，已可概见。

有天，王建叫贯休念近作给他听，那时贵戚们俱在，贯休有意讽刺他们，便背诵《公子行》一诗：

锦衣鲜华手擎鹘，闲行气貌多轻忽。
稼穡艰难总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

公子哥儿们，手举老鹰行猎取乐，既不知稼穡艰难，又不知五帝三皇是何人物。诗中讽刺入木三分，王建看了大为称赏，可是贵戚们恨他入骨了。

贯休在蜀 6 年，所交朋友颇多，和他投赠诗篇的有齐己、方干、李频、罗隐、罗邺兄弟、章碣、吴融、韦庄、韩渥、郑谷、张为、周朴、冯涓、欧阳炯、牛峤、薛绍蕴、杜光庭等人。他于永平二年逝世，享年 81 岁。齐己有吊词道：

泽国闻师泥日后，蜀王全礼葬余灰。
白莲塔向清泉锁，禅月堂临锦水开。
西岳千篇传古律，南宗一句印灵台。
不堪只履还西去，葱岭如今无使回。

贯休是著名的诗僧，在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他的诗歌的特点是继承了聂夷中一派的传统，而与贾岛、齐己等相异，只歌咏山水与苦空生活，大异其趣，特别是他的讽刺诗受到人们

的推崇。吴融在《西岳集》评论他“多以理胜”，其旨归必合于道、太白、乐天之后，可嗣同美者，非上人而谁？这是把贯休的诗与李白、白居易等誉齐观。一般做五七言诗的人，只在声律、对仗、炼字琢句上下功夫，结果词不达意，反映不出时代的真实。而贯休诗，叹乱伤时，演情叙事，展铺抒发，有的放矢，不受声律对仗所拘束，表达了人民的愿望，时代的呼声，对统治阶级作出了有力的控诉。

胡凤丹《重刻禅月集序》云：“贯休一方外耳，而乃以悲愤苍凉之思，写清新俊逸之辞，忽而虎啸，忽而鸾吟，忽而夷犹清旷，神锋四出，又如千金骏足，飞腾飘瞥，……噫！贯休亦奇矣哉，若夫证园通于水月，参妙谛于烟云。一字一言，无非棒喝。”贯休写诗旨趣在于关心政治，在于警世，劝善惩恶，在于“棒喝”。齐己《寄贯休》则说：“子美曾吟处，吾师复去吟。是何多胜也，销得二公心。”

他们几人把贯休的诗，与李白、杜甫、白居易相提并论，就可看出对贯休诗评价之高了。他说：“僧家爱诗自拘束，僧家爱画亦侷促。”（见《全唐诗》卷837）。以为休诗“能创新意”，能为民喉舌，为人民所歌颂。

贯休诗以歌行为诗坛所推重。他的歌行意气豪放，词句粗率，当时人称之为“粗豪派”。其歌行的形式，完全为内容服务，他采用杂言，便于抒发情思、讽刺时政，五七言固定形式，难以适应，因而采取杂言的歌行，词句参差变化、音节抑扬徐疾，全由情思宣泄的情况与要求而定，使内容不因形式的拘束而受到损失，这就为五言七言新体长短句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如《酷吏词》和《富贵曲》，这两首诗句以四七言并用，以成音节，

就可以看出贯休歌行词句的独特之处。《全唐诗·禅月集引言》云：“休诗体奇险”。“奇”是就意说的，“险”是就句说的。《酷吏词》中：“云太守酷，如何如何”、“宁知一曲两曲歌，曾使千人万人哭，不唯哭，亦白其头，饥其族”。这些就是贯休诗“奇”与“险”相结合的地方。

贯休所作诗，自言 1000 首，编为《西岳集》，吴融替它作序。弟子昙域为增辑改为《禅月集》存世。

贯休的水墨罗汉画，《益州名画录》说，“画罗汉十六帧，庞眉大目者，朵颐隆鼻者，倚松石者，坐山水者，胡貌梵相，曲尽其能。或问之，答云：‘休自梦中所睹尔，’……”

《宋高僧传》：“休善小笔，得六法，长于水墨，形似之状可观。受杭州众安桥张氏药肆请，出罗汉一堂，云每画一尊，必祈梦得应真貌方成之，与常体不同。”

《清河书画舫》说：“信州怀玉山十六罗汉……西岳贯休作。”

欧阳炯《禅月大师应梦罗汉歌》道：

西岳高僧名贯休，高情峭拔陵清秋。
天教水墨画罗汉，魁岸古容生笔头。
时帧大绢泥高壁，闪目焚香坐禅室。
忽然梦里见真仪，脱下袈裟点神笔。
高握节腕当空掷，窄窄豪端任狂逸。
逡巡便是两三躯，不似画工虚费日。
怪石安排嵌复松，真僧列坐连跏趺。
形如瘦鹤精神健，骨似伏犀头骨粗。

倚松根，傍岩缝，曲录腰身长欲动。
看经弟子拟闻声，瞌睡山童欲成梦。
不知夏腊几多年，一手托颐偏袒肩。
口开或若共人语，身定复疑初坐禅。
案前卧象低垂鼻，崖里老猿斜展臂。
芭蕉花里刷轻红，苔藓文中晕深翠。
硬节筇杖矮松床，雪色眉毛一寸长。
绳开梵夹两三片，线补衲衣千万行。
林间落叶纷纷堕，一印残香断烟火。
皮穿木屐不曾拖，笋织蒲团镇长坐。

贯休以画罗汉最为著名，总是奇形怪状的，他的水墨罗汉十分重视罗汉精神面貌的刻画，他的线描勾勒达到了传神写照的高度成就，在这点上贯休继承阎立本是肯定的。此诗叙述了贯休怎样进行构思，怎样解衣磅礴挥毫，画些什么，如何施彩，如何刻画，如何安排背景，声誉怎样，谁人可以相比等，都作了具体而入微的描写。有诗曰：“休公逸艺无人加，声誉喧喧遍海涯。五千字句一千首，大小篆书三十家。唐朝历历多名士，萧子云兼吴道子。若将书画比休公，只恐当时浪生死。休公始自江南来入秦，于今到蜀多交亲。诗名画手皆奇绝，觑你凡人事事精。瓦官寺里维摩诘，舍卫城中辟支佛。若将此画比量看，最是人间为第一。”（《益州名画录》卷下）

贯休水墨罗汉的描写尤其生动。他画的是胡貌梵相，曲尽其态。他笔下罗汉是深目大鼻、颧高唇厚，奇形古怪的不像世间骨相，也就是说他把不同修行者的那种皈依佛法的状貌神

情刻画出来了。所谓“四象皈依”，无非是说不能画成一种类型，有印度僧侣，有西域僧侣，有中国和尚，有各民族的僧侣，虔诚的信仰，内心的世界何等复杂！贯休画罗汉其超人之处就是能集中精力刻画罗汉的超凡入圣的神态。这么好的作品，恐怕只有顾恺之与吴道子才能相比吧。

《十国春秋》谓：“贯休尝自梦得十五罗汉梵相，尚缺其一，有告曰：‘师之相乃是也’。于是遂为《临水图》以足之。”所以后来人传说：十六罗汉中，有一个是贯休自己的肖像。（《光绪兰溪县志》）。

从以上记载看，贯休的作画，始终不辍，走到哪里，画到哪里。有一天，他游杭州灵隐寺，在大雄宝殿的寺额上，看到了晋代葛洪所写的书法，在僧房里又看到了谢眺所书的联对，心中颇喜，正在欣赏之际，忽然有人虔诚地跪在他的前面，贯休禅师问他为什么，此人说恳请大师画一张罗汉，贯休见他颇有礼貌，就在灵隐寺画了一张水墨罗汉。此人正是杭州众安桥张氏药房的主人，这说明贯休在杭州时画过一堂罗汉，此图《宋高僧传第30》有记载。

传世的贯休十六罗汉，有绢轴、有纸本、有石刻。《冬心画佛题记》说，金冬心年十三四岁时，“逢上元节，随先处士过长明寺观（禅月大师画罗汉）真形十六轴，……实通神之笔也，后为彭城李公夺之，送入西湖圣因寺供养”。后来西湖圣因寺十六罗汉原为杭州长明寺的藏品，被彭城李公夺之转送为圣因寺的。还说由秀州汪君乾隆八年重装，金冬心书签题名：“世上一切下劣人不得瞻见也。”

1757年乾隆南巡至杭州，到圣因寺展礼，看到了贯休 16

应真像，后命丁观鹏重摹了十六帧。关于杭州圣因寺藏本，《秘殿珠林》裘日修在《唐人十六应真》跋文中也提到：“已巳有奉使南镇之命，道出武林西湖圣因寺，又得观贯休罗汉十六轴，辛未（1751年）寺僧大恒赞祝圣母皇太后万寿，来京师，遂持以献，皇上谓佛刹旧物，应归名山，仍以还之。……”

贯休的书法，《宣和书谱》说：休“作字尤奇崛，至草书益胜，崭峻之状，可以想见其人。喜书千字文，世多传其本，虽不可比迹智永，要自不凡。”又说：“又善书，时人或比之怀素，而书不甚传。”

《益州名画录》：“善草书图画，时人比诸怀素，画师阎立本。”

《唐诗纪事》：“休工篆隶。”由此可知，贯休善书法，称为姜体，草书最好，可与怀素相比，尤其喜欢书写千字文，能行书、隶书、篆书，并且自创一体、别树一帜。可是贯休书法手迹传世极少，所谓姜体到底是什么样的结体也无人得知，但可证明贯休的字在当时已自成一体，且为时人所重。

贯休善狂草，我们可从他所作的《观怀素草书歌》中可以看出，诗的内容十分丰富，揭示了怀素草书出神入化的根本原因，生动地描述了怀素写字时的颠狂情态，较全面地分析了怀素草书的运笔、结体和布局等特点，是一篇艺术化了的《怀素草书论》，从而可以看出贯休对狂草也有修养和深厚的功力。

众所周知，当时歌颂怀素的草书诗篇很多，根据《一统志》记载，就有 37 篇之多，而贯休万分热忱地一边叹息，“常恨与师不相识”；一边又遗憾“伊昔张渭、任华、叶季良，数子赠歌岂

虚饰，所不足者浑未道着其神力”。贯休颇自负，狂草绝艺、慧眼独具，因此挥笔抒发其意，补他们美中不足之处，难怪他要仰天叹息了。

刘泾是著名的书画鉴赏家，在次序上把贯休排在唐五僧的第四位，若就诗、书、画三者而论，那贯休的成就正如欧阳炯所说的：“若将此画比量看，最是人间为第一。”

永平二年（912年），有天，贯休忽然召弟子县域到自己的跟前，嘱咐说：“古人有言曰：地为床兮天为盖，物何小兮物何大，敬愜心兮自忻泰，声与名兮何足赖。吾之住世，亦何久耶。然吾启首足，曾无愧心，汝等以吾平生，事之以俭，可于王城外，藉之以草，覆之以纸而藏之，慎勿动众而厚葬焉。”语毕，奄然绝息。噩耗传出后，在城士庶无不悲伤。王建也深感哀痛，按贯休生前的遗愿，于次年（913年）3月17日以薄葬之礼，在成都北门外10余里的“白莲之塔”将他安葬了。按《唐才子传》记载，说是“敕塔葬丈人山青城峰下”。这是说葬在今灌县城西南30华里的青城山下。

贯休身短体胖，性格落落不拘小节。（见《十国春秋》）。《五代史补》说：“贯休有机辨，临事制度，众人未有出其右者。”常常在大街上徒步行走时大嚼果子，随便得很。又说，他初到成都时，有一天去看韦庄（王建时吏部尚书），适逢冯涓也来了，“遂为相见，欣然抚手曰：我与尔叔有分。”冯涓这时候已经是王建手下的御史大夫，听到贯休这种大口气怎么受得了，就拂袖而去。以后二人会面，冯涓再也不理他了。贯休毫不在乎，还向别人说：“我得和尚，为渠入蜀，何意见怪！”冯涓浙江东阳人，贯休浙江兰溪人，两县相近，贯休与冯涓叔有旧交情，实

为可能,是以贯休说,“我为他而来蜀。”冯涓不理贯休,也可知贯休胸襟之宽大。有一次与杜光庭(王建时户部侍郎)骑马在道中,忽然贯休的马颠仆坠粪,杜光庭戏弄他,连呼:“大师,大师,数珠落地。”贯休却从容回答说:“非数珠,盖大还丹耳。”杜光庭有惭色。所谓大还丹,是指道教的炼丹而言。杜光庭用佛教数珠(念珠)落地来讥讽贯休,贯休则以还丹(即丹砂)还击,可见贯休是个机智与诙谐的人。

道 芬

释道芬,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唐代中期画家。他工画山水、松石,有名于时,后因画《钓台江山》而死。唐代中期有不少诗为他的作品题咏,可惜他的真迹流传甚少。

《越画见闻》卷上,有顾况题《稽山上人道芬》画山水歌:

稽山真僧曰道芬,不服朱审李将军。
流汗平铺洞庭水,笔头点出苍梧云。
且看八月十五夜,月下看山尽如画。

此诗也载《全唐诗》卷265。顾况,浙江吴兴人,颇好诗咏、善画山水,著画评一篇。(见《历代名画记》卷2)。他素以善画闻,其所赏鉴,谅不同于一般。朱审,也是吴兴人,工画山水,《历代名画记》谓他的山水“深沉瓌壮,险里磊落,湍濑激人”。李将军指李平均,唐宗室,为江陵府法曹参军、淮安王神通之孙,画山水冠绝一时。是以顾况有“道芬不服朱审李将军”之句,诗中说明道芬山水清峭深远、胸藏浩气,格调极高。

《历代名画记》谓：

“会稽僧道芬、郑町处士、梁洽处士、天台项容处士、青州吴恬处士，并画山水，道芬格高，郑町淡雅，梁洽美秀，项容顽涩，吴恬险巧。”

《图绘宝鉴》卷2(唐)云：

“会稽僧道芬，……并善山水。芬格高。……”

道芬画松似真松树，十分苍老，且水墨淋漓。他画的松，好像是在天台山岩西最老的一株。

唐代窦庠有《赠道芬上人善画松石》诗：

云湿烟封不可阙，画时唯有鬼神知。

几回逢着天台客，认得岩西最老枝。

(见《全唐诗》卷271)

好的艺术品往往具有一种褫魂夺魄的感召力，使观者神游其境，感到逼真。

道芬画松石山水，学沈宁，沈宁学张璪。唐刘商有《酬道芬寄画松》诗：

闻道铅华学沈宁，寒枝淅沥叶青青。

一株将比囊中树，若个年多有茯苓。

(《全唐诗》卷340)

《历代名画记》卷10：沈宁，亦善树石山水，有格律，师张璪而少劣。张璪的松石山水，刘商也有诗道：“苔石苍苍临涧

水，溪风袅袅动松枝。世间唯有张通（张璪字文通）会，流向衡阳那得知。”因张璪坐事贬衡州司马，故有“流向衡阳那得知”之句。刘商，彭城人，字子夏，大历进士，官汴州观察使，工画山水树石，也师张璪。故沈宁、刘商、道芬等都是张璪画派的继承人。（刘商见《历代名画记》卷10。）

道芬因画富春江边严子陵《钓台江山》图而亡。

唐徐凝有《伤画松道芬上人》诗：

百法驱驰百年寿，五劳消瘦五株松。

昨来闻道严陵死，画到青山第几重。

（《全唐诗》卷474）

大概没有画完《钓台江山》就死了，道芬德高望重，故比他为严光。

道芬山水善六法。

《高僧传三集》卷28谓：

“释智晖，姓高氏，咸秦人也。……翰墨之外小笔尤嘉，粉壁兴酣，云山在掌，恒言吾慕僧珍道芬之六法，恨不与同时对壁连图，各成物象之生动也。”（见《高僧传》《后唐洛阳中滩浴院智晖传》）。

谢赫云：“画有六法：一曰气韵生动，二曰骨法用笔，三曰应物象形，四曰随类赋彩，五曰经营位置，六曰传移模写。自古画家，罕能兼之。”该道芬善于六法，特别是经营位置有他自己的风格，他的入室子弟叫宗偃，笔力奋疾是受到道芬大师的一定影响的。《历代名画记》卷1《论画山水树石》道：

“吴兴郡南堂有两壁树石，余（张彦远）观之而叹曰：此画位置若道芬，迹类宗偃，是何人哉？吏对曰：有徐表仁者，初为僧，号宗偃，师道芬则入室，今寓于郡侧，年未衰而笔力奋疾。……”

《历代名画记》作者张彦远曰：

“近代有侯莫陈厦，沙门道芬，精致稠沓，皆一时之秀也。”

道芬之松石山水，是继承张璪的，他在唐代的画坛上，自有其一席之地，不能淹没。

十、人才辈出的五代画坛

从唐末经五代十国到宋初，在绘画史上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时期。前后蜀和南唐的画院是高手云集的地方；一些不求闻达的艺术家，专心从事艺术创造，也有很高的造诣。几十年中间，人物、花鸟、山水都出现了许多名家，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南唐画院中人才最多，人物画家有顾闳中、周文矩等。

顾闳中传世的作品有《韩熙载夜宴图卷》，现存的虽然是摹本，但这一卷摹本已经足够使他不朽。

这个图卷把韩熙载这个人，晚年置酒高会、观赏舞乐的生活，写得极为生动。这时的韩熙载早已丢掉了北定中原的空想，而且因后主对北方籍人士心存猜疑，于是纵情声色，蓄伎乐数十人，常和宾客作长夜之饮。后主听说此事，便命顾闳中到他家里偷看，回来画成这个卷子。画卷把韩氏本人和宾客、女奴，一举一动以至神情态度，都精妙地刻画出来。服饰用具

都有根据。韩熙载戴的轻纱制的高帽子,是当时有名的“韩启轻格”。杯盘的颜色和形状,都是越窑青瓷。这确是有高度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的杰作。

契丹人(一说范阳人)胡瓌画契丹人马和塞外沙碛的景色,替北方兄弟的生活留下了出色的图卷。

徐熙在南唐名声很大,他没有做过官,也没有进画院,画的花果鱼鸟,都能独树一帜。宋人推崇他的画为神品,可惜作品不传,后人看不到了。

黄筌是成都人,在画院里做待诏。相传孟昶命他在偏殿壁上画了六只鹤,活鹤见了当是真的,想和它们站在一起。他又在壁上画野鸡,猫鹰见了,也当做活物,要飞扑上去。他在蜀亡后到汴京,不久去世。他的画风对宋代画院影响很大,持续100多年之久。

山水画的成就比人物、花鸟都大,对宋代画风的影响也最突出。

山水画到盛唐时才摆脱附庸地位,大李将军和小李将军是那时候的代表人物。唐末五代时,荆浩、关同、董源、巨然、李成等名家相继出现,是山水画历史上带有关键性的一个阶段,宋代画家都沿着他们的足迹前进。

荆浩是唐末、后梁时人,隐居太行山中,据说曾写生数万本,可见他下的工夫极深。他的笔法圆熟丰厚,继承盛唐以来画家的长处而有所发展,是继往开来的人物。关同是他的学生,长安人,学画时废寝忘食。他在画史上与他的老师有同等的地位。荆、关都是北方人,他们作画,师法的是黄河流域的自然界。

董源和巨然与荆、关不同，画的是江南山水。董源字叔达，南唐 锺陵（今江西南昌）人。他画的溪桥渔浦，洲渚掩映，一望可知是江南风物。巨然是个和尚，江宁人。他师法董源，又摆脱董氏富丽的色彩，走向平淡的一路。巨然在南唐亡后到过汴京，不久去世。

李成字咸熙，是唐朝宗室，隐居在山东的营丘。他常被认为是宋初画家，其实他在公元 967 年就死了，入宋不过 7 年有余。北宋末年的《宣和画谱》推他的山水画为古今第一。有人说夏天看他的寒林图，身上会感到寒意。

总的说来，这是一个山水画大有进展的时期。中国山水画以浑厚苍老、气韵生动为特色，这种特色是在五代时期形成的。山水画家以生活的地区不同，所见的真山真水有异，从而风格亦有区别，这也是从五代时开始的。

史学领域中，后晋政府曾修了一部《唐书》（现称《旧唐书》，以与宋欧阳修等所撰《新唐书》区别），先后由赵莹、刘煦等监修，因成于刘煦监修的时候，就题为“刘煦撰”。在《二十四史》中，这部书不算上乘之作，但保存唐代史料之功，决不可以抹煞。在乱离之世，后晋政府能够担当起为前代修史的责任，终究是值得赞许的。

五代十国是乱世，但乱世中也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透露出希望的地方。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是永远有活力的，能够战胜任何困难、克服一切障碍，开创崭新的光明的前途。五代史与其他任何时期的历史一样，以事实向我们提供了证明。

十一、雕版印书的盛行

唐朝末年，雕版印书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展。据当时人的记载，至少蜀中已有人印书出售。这些书多半是民间流通较广的佛经、历书、字书以及占梦、相宅一类书籍。五代时，印书的事业继续发展，江南和巴蜀两个地区印刷的书，种类繁多，最为突出。

这股潮流从民间开始，逐渐影响到社会上层。民间书肆开头印的都是佛经和日用各书。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读的儒家经籍，主要还要亲自或请人抄写。这种情形，对于文化的流传和书籍的保存，都有很大的不利。

五代时候，这种情形有了改变。冯道和后蜀宰相毋昭裔对印行经籍的事业都有贡献。

后唐长兴三年（932年），冯道请求根据唐朝石刻《九经》（唐以《三礼》、《三传》、《易》、《书》、《诗》合称《九经》），开成元年（836年）完成的石经，实有12经，除《九经》外，还有《孝经》、《论语》、《尔雅》，比后来所说《十三经》，只少一部《孟子》，雕版印行。后周广顺三年（953年），全书刻成，因由国子监负责雕印，后来就叫做“监本”。这件事历时20年以上方才完成。

后蜀宰相毋昭裔刻的书比冯道要多，而且用的是私人的财力，他的功劳自然比冯道大。相传毋昭裔少年贫寒，向人借《文选》、《初学记》，人家面有难色。他长叹道：“他年若能显达，愿刻板印此两书，以便学子。”后来他做了蜀相，果然不忘早年的心愿，出资雇佣工匠刻成两书，又续刻《九经》等书。他还主

持了刻蜀石经的工作，根据唐开成石经，命张德钊写字，孙逢吉、句中正校正，刻成 10 部（《孝经》、《论语》、《尔雅》、《周易》、《尚书》、《周礼》、《毛诗》、《礼记》、《仪礼》、《左传》），放在成都学宫里面。他对刻书可谓全力以赴，是有志气的人。据说他刻书的时候，很多人笑他做傻事。后来宋人灭蜀，查明书板是毋氏私人所刻，承认了他家的产权，子孙靠印书卖钱，生活很富裕。照这一点来看，印行的数量应该不小。

毋、冯二人都是刻书的倡导者，真正刻书的是无名的工匠。五代蜀中的刻本，今天尚有留存。

当时刻书的事情自然不止这两件。后晋宰相、大诗人和凝曾把自己的集子刻了几百部送人。前蜀以诗画闻名的和尚贯休，他的诗集《禅月集》也有刻本。

但是，印书还不过是个开端，刻本完全代替抄本，那是北宋中叶的事情。

第三节 隋唐五代 文学运动及其代表人物

一、辉煌灿烂的文化奇葩——唐诗

唐诗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辉煌一页，是中国诗歌的最强音。从隋代开始，进入唐朝，中国社会重新走向大一统。适

应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和宫廷享乐需要，上承齐梁时代的宫体诗、应酬诗，以其浓烈的脂粉气、吹捧气在帝国弥漫一时。另一方面，一大批有志之士，面对着统一帝国的日益强盛，要求继承《诗经》和建安风骨的现实主义战斗传统，积极反映现实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初唐四杰”的诗尽管显得文词华美，但对齐梁以来的宫体诗、艳诗激烈反对。特别是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慷慨悲歌，揭开了诗歌创作在复古中求革新的序幕。其后继李白、杜甫、高适、白居易、元稹、刘禹锡、韩愈的积极倡导，以及其他诗人的推波助澜，唐诗在不断革新中得到完善和发展，唐诗至善至美的风采便油然而致。中国诗歌发展至此亦达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正如康熙皇帝所说：“诗至唐而众体悉备，亦诸法毕该，故称诗者必视唐人为标准。”唐代诗歌的发展可分为四个时期：初唐、盛唐、中唐、晚唐。

初唐著名诗人有李世民、魏征、虞世南、上官仪、王梵志、刘希夷、张若虚等人。而成就最高的则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这“初唐四杰”和陈子昂，四杰批评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风“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开始自觉地革除齐、梁诗风的余绪，他们的诗歌拓宽了题材领域，表现出激越雄浑的情调。陈子昂在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方面都表现出鲜明而自觉的革新精神，在他《修竹篇序》中批评齐梁诗歌“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主张恢复《诗经》的风雅传统和建安、正始充实的风骨”。体现了诗歌在复古中求革新的主张。

初唐另一个值得一提的大事是唐代律诗的成熟。初唐时

期的宫体诗人沿袭梁陈诗风的程式作法,促进了新体诗向律诗的演进。在这方面上官仪的诗作颇有影响,一时号为“上官体”,他还在实践创作的基础上,将六朝以来诗歌对仗的方法正式归纳为六对:一是正名对;二是同类对;三是连珠对;四是双声对;五是叠韵对;六是双拟对。这些对仗的规范化虽然是为写作宫体诗服务,但对发展律诗的对仗技巧也有一定的作用。五律的最后定型,七律的成熟是在武后、中宗时的宫廷诗人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手中最后完成的。沈宋的主要贡献是以他们的诗歌范例,完成了律诗“回忌声病、约句准篇”,最后定型的任务。于是当时“学者宗之,号为沈宋”,后人也公认“五律自沈宋始可称律”“七言律滥觞沈宋”。

定型的唐代律诗,利用和发展了齐梁新体诗偶然出现的粘对规则,解决了两个律联之间的平仄关系问题,使一联之间平仄相对,两联之间平仄相粘。一对一粘,错综变化,唐代律诗还确定了四韵八句的形式,规定了中间两联必须对仗;总结出首句可用韵,可不用韵,押平声韵,一韵到底的规则。从此唐诗有了完整的规范,逐渐盛行起来,近体诗和古体诗也有了明确界限。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伴随着帝国的空前强盛,唐代诗歌也迎来了自己的辉煌时代。一方面诗歌内容充满奋发、进取的精神,另一方面名家纷呈,无论从题材、内容、表现形式,都呈现出空前的盛况。盛唐诗歌创作出现了很有影响的两个流派:山水田园诗派和边塞诗派。山水田园诗派以孟浩然、王维、储光羲、裴迪、常建、邱为、綦毋潜为代表。他们大都是在个人仕途失意且政治热情减退的情况下,接受佛道思想影响、寄情

山水田园的。他们的诗侧重于描绘幽静秀美的自然境界，表现闲淡清远的个人心境。在艺术上则融合陶渊明、谢灵运、谢朓之所长，又有所发展，创造了情景相生，意趣盎然的审美境界，显示出唐代文化多姿多彩的繁荣气象。边塞诗派以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王之涣、王翰为代表，他们的诗作多写惊心动魄的军旅生活和绚丽多彩的边塞风光，也集中地表现了唐代士人慷慨任侠的男儿风度和建功边塞的英雄气概。高适的《燕歌行》、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西师出征》、《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王昌龄的《出塞》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更令人骄傲的是盛唐出现了李白、杜甫二位最伟大的诗人。李白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自小“观奇书”、“游神仙”、“好剑术”，有多方面的才能和兴趣，有远大的抱负和理想，但终其一生壮志未酬。其诗今存 990 多首、体裁多样，擅长七言绝句，有很多乐府诗，律诗也不乏佳作，但最能代表其成就的当数七言古诗和五言古诗。李白的诗歌创作中有大量的政治抒情诗，充分展示了诗人非凡的抱负，奔放的激情，豪侠的气概，集中代表了盛唐诗歌昂扬奋发的典型音调。李白诗歌想象神奇、变化无端，句式长短错落，形成了雄奇飘逸的风格。太子宾客贺知章因赏识李白诗歌和风采，赞许他为“谪仙人”，后世誉之为诗仙，诗风雄奇瑰丽，飘逸不群。

杜甫是唐代盛极而衰这一历史转折时期出现的伟大诗人，出身于世代“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抱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思想，走着“达则兼济天下”的道路，但其理想没有获得伸展。目睹唐王朝的种种社会、政治、经济危机以及安史之乱带来的种种灾难，诗人用沉郁顿挫的笔触深

刻地反映了这一系列的生活和重大的社会事件,因而也赢得了“诗史”、“诗圣”的赞誉。杜甫的诗歌现存 1400 多首,不仅在内容上博大精深,而且在艺术方面也“千汇万状,兼古人而有之”。他能驾驭当时所有的各种诗体,并创造性地发挥了这些诗体的功能,为各种诗体树立了典范。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一位承前启后,影响极为深远的伟大诗人。他的诗歌在题材、内容、诗歌体式和修辞技巧方面,都集前人诗歌传统之大成,并有所创新和发展,并对中晚唐以后众多诗人和诗歌流派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中唐时期诗歌发展无论从内容、题材、风格都进一步多元化,而且诗坛上流派峰起,名人辈出。中唐前期活跃于诗坛的有以钱起、司空曙、卢纶为代表的“大历十才子”和元结、顾况、刘长卿、韦应物等。元结、顾况的诗,延续了杜甫反映民生疾苦,规讽时政的创作道路,又直接开启了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刘长卿擅长五言,号称“五言长城”,他和韦应物的诗歌都颇能深刻地反映社会生活。“十才子”的诗虽也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安史之乱给老百姓带来的灾难,但更多的是抒写个人生活的闲雅情趣以及战乱后的落漠感伤情思,他们在近体诗的形式技巧方面进一步走向圆熟精美、清淡有味的境界。

唐德宗贞元到唐宪宗元和年间,诗坛上不仅风格各异的流派相继涌现,而且在以前的山水田园诗派,边塞诗派等外,又出现了颇具规模的两大诗派:一是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新乐府诗派;一是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险怪诗派。新乐府诗派提倡“文章合为时而作,歌诗合为事而著”,主张诗歌创作“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因此其创作以通俗易懂见

长。白居易的新乐府诗主题明确专一，“首章标其目、卒章显其志”，每首诗下都有小序，阐明写作意图，并在结尾点明主题。语言直切通俗，诗中多有典型的人物和事例，因而其诗通俗易懂，广为流传。元白诗派直接影响到晚唐诗人皮日休、杜荀鹤和聂夷中等。元白之前，还有王建、张籍、李绅也有不少新乐府诗作。

韩愈在倡导古文运动的同时，也致力于更新诗风。他的诗继承了李白诗雄奇奔放的气势和杜甫诗体式变化，刻意求新的技巧，并有意在奇崛险怪方面另辟蹊径，自成一家。与韩愈诗风相近，在好奇争险方面各逞其能的诗人还有孟郊、贾岛、李贺、卢仝、刘叉等。他们的诗歌创作都取得了较高成就。

在元白和韩孟诗派外，柳宗元和刘禹锡也是自成大家的诗人。二人同登士第，又一同参与永贞革新，同遭贬官，是关系密切的好友，但诗风各异。柳宗元的诗大部分作于贬官永州、柳州时期，内容多写个人离乡去国的悲愤凄楚而又无可奈何的情怀。其叙事、咏史、寓言诗和山水诗也颇具特色。刘禹锡的诗歌创作有多方面的成就。他的不少诗也抒发了遭贬不遇而又悲愤不平的情思，但笔力刚健，意蕴深远。其咏史怀古诗亦堪称绝唱。民歌〔竹枝词〕〔杨枝词〕系列也取得了很高成就。

晚唐时期，唐王朝江河日下，诗歌创作也点染了浓厚的感伤色彩和衰落气象，杜牧和李商隐是晚唐前期出现的两位杰出诗人，他们与盛唐诗人李白、杜甫前后辉映，被称为“小李杜”。杜牧“苦心为诗”力求“高绝”，其长篇五古在晚唐独树一帜，其《感怀》近似于杜甫《北征》；他所擅长的七言律、绝，俊赏清丽，又感慨深沉；其咏史七绝构思精警，立意高远；其抒情之

作更才思俊逸,画面明丽。总体来看,杜牧的诗歌在日趋绚丽的晚唐诗坛,尚能保持明朗峻峭的风格,确不失鹤立鸡群的风范。李商隐是位很有政治抱负,又多才善感的诗人。但其仕途坎坷,壮志未获伸展,潦倒至死。其诗歌内容广泛,有感而发的政治诗在其诗作中占相当比重,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如《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安定城楼》等。爱情诗是其诗歌创作中最有特色的部分,这类诗或名《无题》,或取篇中两字为题,写得感情深挚缠绵,意象朦胧隐曲,造语精美,韵律和谐,这是前人爱情诗所没有达到的艺术境界,《夜雨寄北》、《锦瑟》、《无题》等都是千古绝唱的爱情之作。

晚唐诗坛还有一些诗风比较清丽的诗人,如温庭筠、韦庄、韩偓等,他们对宋以后的不少诗人颇有影响。

唐以后,宋诗虽一度繁荣,但总体上看,宋诗还是缺乏唐诗那种灵气与激情。宋以后,虽然诗人数量大增,但诗歌创作缺乏突破和创造,拟古气、道学气、学究气充斥诗坛,至五四运动以前,诗歌创作再也没有出现过唐诗那种流光溢彩的局面。

二、唐代三大诗人

谪仙李白

李白生于武周长安元年(701年),死于唐肃宗宝应元年(762年)。他诞生于安西的碎叶(前苏联的吉尔吉斯和哈萨克一带)。他父亲李客,是一个富商。在他5岁的时候,李客便携带全家从碎叶搬到绵州彰明县青莲乡。李白从此就在蜀中生

活,直到 20 多岁。开元十三年(725 年),诗人为了寻找机会发展自己的抱负和才能,便离开绵州,开始了漫游的生活。

李白离开四川以后,大约游历了 3 年光景,到 27 岁时,来到湖北的安陆。在这里,他和以前高宗时期的宰相许圉师的孙女结了婚,便暂时定居在安陆。从此以后,直到 35 岁,在近 10 年的时间里,他虽然仍在各地漫游,但大体上比较经常地住在安陆。大概在他 35 岁的时候离开安陆,北游到山西的太原。

李白是夏天到太原的,在元参军家做客,游览了周围的名胜。大概在这年秋天就离开太原了。

接着他就东游齐鲁,最常住的地方是任城和沙邱(今山东的济宁和掖县),而且在沙邱安了家,在那里住了很长时间。这时他和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五人共同隐居在泰山南边的徂徕山,常常一块饮酒酣歌,当时人称为“竹溪六逸”。

离开山东以后,他南下漫游江苏、安徽、浙江等地。经过了 10 余年的社会磨炼,他对当时的政治现实认识得比较清楚了。

唐玄宗听说李白才华出众,天宝元年(742 年),召他进京。李白虽然游历 10 余年,但并没有到过长安。现在皇帝下诏征召,他当然非常高兴。他认为这次进京,可能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为苍生谋幸福了。李白入宫,玄宗却只让他当了一个翰林供奉,这是一种以文学词章被顾问的侍从职务,不是实际官职。这时李白除了在宫内侍从之外,在长安结识了不少朋友,最著名者有贺知章、崔崇之、晁衡等。这些人的地位虽然各有不同,但都有那种放浪不羁的性格。他们经常饮酒,酒后则高谈阔论,表示不受现实社会的羁绊。

李白在长安 3 年,后被放还。在以后的 10 年中,他到过的地方很多,东西南北行踪不定,除了常回到任城家中以外,他经常留在梁宋一带。大约在他五十四五岁的两年中,他经常往来于广陵、金陵、宣城(今江苏、安徽)等地。56 岁的时候,他在庐山,被永王璘召为幕僚。就在这一年,永王璘和他哥哥唐肃宗争夺帝位。第二年,永王璘兵败,李白受到株连。被逮捕后囚在浔阳(今江西九江市)。后来虽经别人营救出狱,但仍被流放到夜郎(今贵州桐梓),当时他 58 岁。第二年,在流放途中遇赦,才得回来。62 岁死于当涂县。

李白是我们民族史上伟大的古典诗人之一,李白诗歌的最明显的特点,是充满着激昂向上、嫉恶如仇的精神。

李白很自负,他觉得自己不仅有诗才,而且有很大的政治才能,他经常自比周公、张良、韩信、诸葛亮、谢安等人,当他发觉自己的才能无处施展时,便愤慨极了。他说自己是杂草中的孤芳、群鸡中的凤凰。他极端蔑视邪恶势力,有许多诗是直接揭露腐败的统治阶级的。如《古风》51:

“殷后满中野,蓁施盈高门。比干谏而死,屈平窜湘源,虎口何婉变,女嬃空婵娟。彭咸久沦没,此意与谁论。”

在这首诗里,诗人把后期的唐玄宗比作残暴昏庸的殷纣王和楚怀王,而且把整个社会都和殷纣楚怀时期相比,对昏庸的皇帝和依势的佞臣进行了无情的抨击。

李白对一些封建社会的旧传统观念也持怀疑和蔑视的态

度。当时，孔夫子在一般知识分子心目中是最神圣的。李白有时却以孔子自比，甚至在高兴的时候，随便拿孔子开玩笑，并不把孔子看得高不可攀。在封建社会，“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读书人是最受尊重的。李白却常常嘲笑那些白首死读经书的儒生，大胆提出“儒生不及游侠人”的观点。当时多数知识分子参政都是通过科举，唐朝诗人绝大多数都赴京应考，李白始终没有去参加考试。他虽然热心政治活动，但从来不愿意卑躬屈膝的去追求官职。李白对束缚人的礼教观念进行了大胆的批判，他身上很少有历来读书人的那种迂腐、伪善。因此在许多士大夫心目中，李白简直是不可理解的。有人说他是“谪仙”，也有人说他是“狂士”。李白自己也感到和社会习俗冲突，自己不为社会所容，所以他也自称是“狂人”。

李白的诗歌还注意反映各阶层人民的苦难生活，为人民鸣不平。在李白的诗歌中，人物形象非常多，其中却很少有达官贵人，绝大多数是村女、征人、宫女、弃妇、歌妓、卖酒的老叟等社会下层人民。李白很了解这些人，对他们具有真实的感情。在《丁都护歌》里，描写了纤夫的劳动场面：

“云阳上征去，两岸饶商贾。吴牛喘月时，拖船一何苦。水浊不可饮，壶浆半成土。一唱《都护歌》，心摧泪如雨。万人系盘石，无由达江浒。君看石芒砀，掩泪悲千古。”

这首诗是在长江下游写的。当地政府在山上采取大石，用拖船搬运，天旱水浅，千万个劳动者用力牵拉，也很难到达江

边。但是监督的官员(都护)却限令极严,使劳动者无时喘息。李白想到这些石头使人民长期从事苦役,不禁感叹说:“君看石芒砀,掩泪悲千古!”《丁都护歌》是乐府旧曲,相传是“其声哀切”,李白用以歌咏新事,就更加悲恻感人了。从这里可以看出诗人对于劳动人民的态度和人道主义精神。

正因为李白同情人民群众,当他看到战争给人民带来痛苦时,总是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反对非正义战争。他写了不少反对战争的诗,如《古风》第34首说:

“羽檄如流星,虎符合专城,喧呼救边急,群鸟皆夜鸣。白日曜紫微,三公运权衡,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借问此何为?答言楚征兵,渡泸及五月,将赴云南征。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泣尽继以血,心催两无声。困兽当猛虎,穷鱼饵奔鲸,千去不一回,投躯岂全生。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

但是,李白并不是无原则反对一切战争的,他反对的是以人民的生命财产来满足统治阶级少数人的野心的那种非正义战争。当安史之乱爆发后,他渴望能消灭安禄山的叛军,而且反对唐玄宗的逃跑主义。后来他参加永王璘的队伍,写了不少抗战的诗。

李白还有许多诗歌,热情歌颂了祖国的美好河山。在李白的诗中,有浩浩荡荡的长江,有奔腾怒吼的黄河,有峥嵘的剑阁,有喷射百丈的瀑布,有恬静幽寂碧波荡漾的洞庭湖,有孤

直的松柏,有清涟水面的芙蓉,有茫茫的柳絮,有摧崩百川的大鹏,有能使人垂泪的猿啼,有悲哀的杜鹃,有翻飞万里的苍鹰,有引人深思的月光,更有闪电雷鸣……。所有这些,都为人们所喜爱,成为脍炙人口的杰作。李白笔下的大自然,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从李白的诗里,可以听到中国大自然的音响,可以看到中国山河的美丽图画。

李白诗歌的艺术特点主要表现在他所塑造的形象上。在李白的诗里,我们往往感触到一种超越现实的艺术形象,这种形象是由作者运用丰富的想象和大力夸张创造出来的。夸张比喻的手法在李白诗中随处可见。例如:他极言侠客的重义,便写出“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捧土塞黄河”等名句;本来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而诗人却写出“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以反衬战死者妻子悲恨的深重;要肯定文章的有力,则写“兴酣落笔摇五岳”;为了否定功名的价值,则写“功名富贵若常在,汉水亦应西北流”;为了表现自己的才能,则写“为君谈笑静胡沙”;形容安禄山叛军势焰之盛,则写“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倾”。在这些诗句当中,李白用夸张比喻的手法,把两种轻重显然极不相称的事物对举起来,以突出显示所要表达的意义,因此它所体现的感情及所发出的感人力量特别强烈。毫无疑问,假如诗人没有不可抑遏的激情和异乎常人的想象力,这是不可能的。

李白诗篇另一个艺术特点,就是它的艺术形象所概括的生活现象具有极大的广阔性。他形象地抓住许多难于直接联系着的事物,构成一副完整的形象。例如《行路难》,诗人的笔从酒肴案前忽然跃到黄河、太行、碧溪,以至沧海。再如《将进

酒》，这首诗的中心思想是要及时行乐以消除胸中郁积的惆怅。为了强调要及时，首先指出人生时光之易逝而不可复返。但对这一概念，诗人并不是抽象地叙述出来，而是以壮阔的自然界现象——黄河奔流的形象来比喻大量时光之如逝水、一去不复返，并把人生相当漫长的岁月转变缩短到朝暮之间，这样给人的时光消逝迅速之感便特别强烈。

李白的诗歌，是我国优秀的古代文化遗产，在文学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南朝齐梁以来，颓废淫靡的形式主义文学曾经泛滥一时，宫体诗就是它的代表。初唐的文坛，仍然蒙受着这种恶劣的影响，阻碍了文学的健康发展。陈子昂在唐代第一个提出了鲜明的战斗主张，对这股形式主义的逆流进行了正面的抨击。他反对“采丽竞繁”，提倡“汉魏风骨”和“风雅”、“兴寄”。这也就是要求文学家关心现实的重大课题，正视并反映现实，要求作品写得清新和刚健。陈子昂虽然在他的创作中贯彻了自己主张，然而他的作品却还存在着干枯板滞等特点。当然，要彻底清除这种影响，也并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要取得全面胜利，还有待于后人的不懈努力。

李白继承了陈子昂的理论，他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建安以后的形式主义文学，揭露了他们“绮丽不足珍”的实质，并且把恢复发扬古代诗歌的优良传统，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李白的诗就是他的理论和实践在创作上的光辉成就。过去陈子昂所没有做到的，李白做到了。陈子昂所没有完成的，李白完成了。陈子昂成为李白的先驱，李白继承和发展了陈子昂开始的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李白的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

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李白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了汉魏以来乐府民歌的丰富遗产。汉魏乐府中对社会生活规律的深入探索，两晋乐府中对幻想中美好世界的强烈追求，南朝乐府中人民的纯真的爱情，北朝乐府中的英雄气概和边塞景色，三调杂曲之类的豪唱狂歌，这一切，都对诗人具有深刻的影响，诗人通过自己的创作，熔炼成一个全新的风格。这是文学评论家一致承认的。

其次，李白对于汉魏以来乐府民歌遗产的继承，一方面忠实于民间文艺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又充分发挥了他的创造性。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他那些直接用乐府古题为题的诗篇，在同一题目之下，乐府古词的妙处，往往正因为李白的的新词而更加鲜明。汉魏以来，诗人拟作的乐府很多，其中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的也不少，但是像李白这样的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却是空前未有的。文学史证明，正是这样高度创造性的继承，才能把乐府民歌中的优良传统真正发扬出来。

李白的诗不但对当时的文学界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对以后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白和杜甫被后人推崇为“诗仙”、“诗圣”，成为后人学习的榜样。李白的诗由于被人们所喜爱，所以流行很广。像《静夜思》、《蜀道难》那样的诗更是家喻户晓。他的诗中那鲜明的个性，豪放的气魄，朴素的形式，浪漫主义的格调，是千秋万代也不会泯灭的，会永远在诗坛闪跃着奇光异彩。在李白以后的1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他的诗仍然影响和哺育一代代诗人，甚至到了近代，我们仍然可以从龚自珍等人的诗中看到李白的影响。

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李白贫病交困，到安徽南部的

当涂，投靠在那儿当县令的族叔李阳冰。就在这一年的十一月，这颗诗坛上的一代巨星陨落了，享年仅六十有二。

诗史杜甫

杜甫，字子美，曾自称少陵野老，因做过工部员外郎，被人叫做杜工部。他亲自经历了安史之乱这场大变乱，饱经丧乱，也受了丰富的锻炼。他用诗歌记实事、发议论，画出一幅幅流亡图，深刻地表现了这个时代。后人把杜甫的诗叫做诗史，其实他写得比许多史家更丰富、更生动。

杜甫出生在河南巩县一个衰落的世族家庭里。他在文学上用过苦功，“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他的经验之谈。他有一番抱负，希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然而唐朝政治正在走下坡路，杜甫受权臣排挤，找不到出路，在愁苦的生活中，他的眼光越来越注意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开始写出一批反映现实比较深刻的作品，如诉说农民沉重的兵役负担的《兵车行》；批判天宝年间一些不义战争的《前出塞》；斥责杨家豪门奢侈荒淫的《丽人行》；而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更直率地指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批评豪门贵族随便耗费农民的血汗，写出了传诵了1200余年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由此可见，在安史之乱以前，杜甫已经在写诗史了。

叛乱爆发时，杜甫刚到奉先（今陕西蒲城）探望家属，随即移居白水（今陕西白水南）。潼关失陷后，诗人带着全家，流亡道途，备尝艰辛。他把家口安置在鄜州（今陕西富县）的羌村（今名“大盛号”），只身出门，想到灵武见肃宗，中途被叛兵捉

住，送往长安。这时诗人不过 45 岁，但形容憔悴，不像个官儿，才没有被加上伪职。

他在长安住了 8 个月光景，听到叛军到处掳掠屠杀的消息，精神非常痛苦，又不知家属安危，忧虑不安。这些见闻感受，都熔铸在真挚动人的诗篇里。“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春望》），是这时的代表作。

至德二年（757 年）四月，杜甫逃出长安，西奔凤翔。他朝见肃宗时，衣破露肘、脚穿麻鞋、老瘦不堪。肃宗任命他做左拾遗，那是个“从八品上”的官，以对政事提意见为职责。不久，皇帝就讨厌他欢喜批评朝政的作风，以给假探亲为名把他逐出朝廷。

这位白头拾遗穿了一领青袍，徒步回家。一路上所见所闻，都写在 700 字的五言诗《北征》中间。《北征》是叙事诗，也可以说是篇奏议，在杜集中也属于罕见的名篇。

阡陌之间，人烟萧瑟，所见多半是呻吟流血的伤兵难民。深夜经过战场，又看到很多惊心怵目的景象。史家没有忠实地记录这场变乱造成的残败景象，更讳而不言人民遭受的苦难，诗人却绘影绘声地刻画出来了。

他称赞马嵬驿事变，“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态度十分明朗。他反对用回纥兵，“官军请深入，蓄锐可俱发”，婉转地提出单用官军便可破敌的意见。

他记了史事、发了议论，写出来又是艺术性极高的诗，这是极大的成功。

唐军收复长安后，杜甫仍旧做左拾遗，但是不久又被贬到华州（今陕西华县）做司功参军，管理祭祀学校等工作。这表示

皇帝把他完全丢开了。

乾元二年(759年),相州城下九节度使大军溃败,杜甫恰巧因事往来于洛阳、华州之间,亲眼看到兵荒马乱的景象,于是写出了《三吏》、《三别》等名篇。这些诗篇反映了人民的惨痛遭遇,也是对那些制造祸乱、残害人民的封建统治者的鞭挞。

连年战乱,人口减少,能当兵的青壮年尤其不多。统治阶级不顾人民的死活,把老弱妇孺都抓去服役。《新婚别》说:“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拉走的是刚结婚的新郎。新安县是“县小更无丁”了,官府却把未成年的“中男”拉去当兵。“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这就是诗人在新安道上的感受。“子孙阵亡尽”(《垂老别》),老头子只得挺身去上战场,“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孰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这是什么情景!甚至一个打了败仗的散兵,还到故乡,刚想“荷锄灌畦”,县吏已经来征发他入伍了。他的家属一个也没有了,“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无家可别,然而内心的沉痛,更甚于有家可别的人。在《石壕吏》中,诗人写的县吏半夜捉人的情景。这户人家,三个儿子都在军中,其中两个已在相州阵亡,家中除两老之外,只有个带着乳婴的媳妇。县吏不顾这些,只要抓人当差。老头跳墙逃走,老妇只得跟着县吏,到军队里去烧饭,第二天只好“独与老翁别”了。

诗人写了惊心动魄的流亡图,对政治的黑暗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不久便弃了官职,当一个“野老”了。

诗人浪迹天涯,访求一个容身的小天地。他先到秦州(今甘肃天水),继又南下同谷、经栈道、穿剑门入蜀,于十二月到成都,才定居下来。他一路上写了许多诗来记行踪、绘江山,也

反映了社会现实。《盐井》云：“自公斗三百，转致斛六千”。史书所载盐价，以每斗 370 钱为最高的数字，据此两句，可知转贩的售价，每斗高达 600 钱。杜诗真是信史啊！

杜甫在成都花溪西、临近锦江的地方，建了所草堂。这所著名的杜甫草堂，历劫犹存，解放以后，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经过妥善的整修，把总面积扩大到 300 亩左右，面貌焕然一新。

但是杜甫在世的时候，在草堂不过住了几年，后来又为生计所迫，沿江东下，在夔州（今四川奉节）、江陵、潭州（今湖南长沙）、衡州（今湖南衡阳）等地，漂泊多年。他的生活越来越贫困、健康越来越恶劣，竟于大历五年（770 年）病死在岳州（今岳阳）附近的客船上。

人民的诗人白居易

继李白、杜甫之后，唐朝另一个伟大的人民诗人是白居易。他吸收了前人的成果，在诗歌创作上达到了新高峰。

白居易（772—846 年），下邳（今陕西渭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他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唐德宗贞元十六年，进士及第，5 年以后当了周县尉，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县尉是封建王朝的下级官员，在这个岗位上，一方面对上级官员要奔走逢迎，另一方面对其属下人民进行压迫和剥削。这样的官场生活，白居易当然是不乐于久居的。但是在那近两年的县尉生活里，他却有了一些意外的收获。白居易由于亲眼看到下层人民生活的疾苦，丰富了他诗歌的创作源泉。从这时起，白居易写出不少名篇。元和二年（807 年）冬天，他被调到长安，又

经过一次考试，当了翰林学士。元和三年任左拾遗，他除了写一般的启奏外，更有意识地以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在这些诗里，他尖锐地揭露了贵族官僚的巧取豪夺，以及他们的穷奢极侈荒淫无耻的生活。他的诗歌在当时就发生相当的影响，使达官显贵们大为不满。不久，便遭受一连串的排斥和打击。元和十年（815年），被贬为江州司马，这件事是白居易的政治生活和文学生活的转折点。从此以后，他虽然并没有从根本上放弃改革政治的主张，但是，他再也没有青年时代那种锐气了。长庆二年（822年），出任杭州刺史，这是诗人多年的夙愿，所以他非常高兴。他得到任命以后，急忙整顿行装，十月初便到达目的地。到杭州后，本着“勤恤人庶，下苏凋瘵”的精神，事无巨细，他都亲自动手。当时杭州人民最大的困难就是饮水问题。李泌在杭州时，曾开凿6口井，白居易“复浚李泌六井，民赖其汲”。（《新唐书·白居易传》）白居易又组织力量增设湖堤，加高数尺，以蓄水灌田，从此濒湖10万多亩土地解除了旱涝的威胁，使杭州人民的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他在杭州3年，于长庆四年转任苏州刺史。在苏州两年多，后又担任刑部侍郎、河南尹。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卒，终年75岁。

白居易的晚年生活陷于“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的矛盾之中。这种矛盾是从贬谪于江州开始的，当时他察觉通过皇帝实现“兼济天下”之志是不可能的。良心促使他对人民的苦难又不能熟视无睹，所以只能在个人职权范围内替人民作点好事。诗人在忠州、杭州、苏州任职期间，程度不同地为人民解除了一些痛苦。从苏州“病免郡事”以后，他发现牛李党争日益激烈，看出政治改革更难了，便决定走“独善其身”的道路。在当

时恶劣的环境里，他不向权贵低头、不为党争所累，保持了人间的正义和自身的高洁，这种精神是高尚的。

元和二年（806年），白居易写出几首名篇，其中有《观刈麦》和《宿紫阁北村》二首。他在《观刈麦》一诗中写道：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
垄黄。妇姑荷箬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
南岗。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
日长。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傍；右手秉遗穗，左臂悬
弊筐。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家田输税尽，拾此充
饥肠。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
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

这首诗反映农民在炎夏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情景。一个劳动着的农民，顶着烈日，在拚命地干着。他忘记了疲劳，忘记了炎热，只知道珍惜夏日白天时间长。在他旁边有一个贫妇人，她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提着破筐，艰难地拾地上丢掉的麦穗。因为她家里剩下的麦子，已经拿去交税，现在为了活命，只能靠拾一点麦穗度日。诗的最后一段，诗人把农民的饥饿生活和自己的优裕生活作了对比而感到不安，并谴责自己。正因为这样，所以诗人的思想感情和人民群众的距离缩短了。从而使诗人的创作，逐渐走向新天地。

在元和三年以后的几年里，诗人白居易写了《秦中吟》和《新乐府》，充满了战斗激情，现在列举几篇有代表性的作品介绍一下。

在《卖炭翁》里，生动地反映了一个手工业者的悲惨遭遇，诗人写道：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唐朝后期的宫市，实际是以给皇帝购买生活必需品为名，公开掠夺长安工商业者的财物。白居易借着这样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故事，大胆地揭露了这种强盗制度。诗人首先用“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形象地描写了一个卖炭老人的外貌，然后指出“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老人就靠这一车炭维持生活。这可怜的老人，“身上衣裳单”，又加上“夜来城外一尺雪”，因此他是不会不希望天气能暖和一些的。但是，他为生活所迫，却“心忧炭贱愿天寒”，希望天再冷一些，希望炭价再高一点。这个反映卖炭翁内心矛盾的细节刻画，更加突出地写出了那时劳动人民的悲苦，深刻揭露那个社会的罪恶本质。叫人愤怒的还不止于此，这车炭却被宦官及其随从白白地抢走了，换来的只是不值多少钱的“半匹红纱一丈绫”，这是多么残酷的暴行呵！

元和四年（809年）正月，南方大旱，当时受灾面积很广，

波及到浙东、浙西、荆湖、襄鄂等地，灾情惨重、人民饥馑。到了三月，长安一带也发生旱灾，农民生活极端困难。但是地方官仍然催租逼税，逼得农民破产。诗人在《杜陵叟》一诗中写道：

“杜陵叟，杜陵叟，岁种薄田一顷余。三月无雨旱风起，春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忍知人弊；白麻纸上书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敕牒榜乡村。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

这首诗说明农民在旱灾袭击下，缺吃少穿、倾家荡产。皇帝虽然下了免税的诏令，但“十家租税九家毕”，免税的诏令不过一纸空文。这是一方面，诗人又注意另一方面。长安的贵族官僚却是骄奢淫佚、挥霍无度。这些现象使白居易非常愤慨，他以沉痛的笔调写下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诗篇——《轻肥》：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如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樽罍溢九醉，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桔，脍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诗人在这里无情地揭露了人民和统治集团尖锐的矛盾，

白居易的爱憎感情，表示得多么鲜明！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感情和人民群众越来越近了。

白居易的作品，不仅通过个别历史现象揭露封建统治者的荒淫无耻生活，而且还能抓住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根本上戳穿唐朝后期阻碍历史发展的主要症结，进行控诉和批判。他在《重赋》一诗中写道：

“厚地植桑麻，所要济生民。生民理布帛，所求活一身。身外充征赋，上以奉君亲。国家定两税，本意在忧人。厥初防其淫，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织绢未成匹，缁丝未盈斤；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岁暮天地闭，阴风生破村；夜深烟火尽，霰雪白纷纷。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端与寒气，并入鼻中辛。昨日输残税，因窥官库门：缁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号为‘羨余’物，随月献至尊。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

唐朝皇帝为了挥霍享乐，除了国库以外，还另设私库，储藏群臣贡奉的财物。节度使秉承皇帝旨意，在正税以外，又巧立名目，给皇帝进贡。因为进贡得到皇帝的欢心而擢升官职的人很多。但是在广大人民方面，由于被榨取这些“羨余”物，则造成“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的结果。而最高统治者并不珍惜这些从人民身上剥夺来的财物，他们挥霍不尽时，放在仓库里烂掉、化为尘土。这里诗人把讽刺的锋芒仅仅指向“贪吏”，

他不敢直接指出是皇帝的罪过，并且还美化皇帝，这是白居易的阶级局限，不应当过分苛求。

白居易的诗不仅有很高的思想性，而且有很高的艺术性。他掌握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描写了无数典型形象。白居易的现实主义创作是自觉的，具有鲜明的目的性，他力求高度地概括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选取最典型的事件人物，运用一系列方法来创造多种典型形象，全面地反映社会本质。

另一方面，诗人善于利用细节刻画，用对比抒情和叙事相结合等一系列艺术手法来塑造典型形象，使之鲜明突出。他无论写一个人物和一件事，都能感动读者，痛苦的令人流泪、愤怒的令人发指。读了白居易的诗，使我们感到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

从白居易的全部作品看来，他的语言通俗易懂、明白流畅，但同时又是经过千锤百炼，作了大量的艺术加工。

正因为白居易诗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所以他的诗歌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白居易的诗在唐朝就被广大群众所喜爱。他对元稹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儒徒嫠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不仅如此，他的诗还被“缮写模勒，鬻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白氏长庆集》序）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市民百姓，雅俗共赏，至于乐工歌伎，则更相兢习，所以元稹感慨地说：“自篇章以来，未有流传如是之广者。”（《白氏长庆集》序）特别是他的《长恨歌》和《琵琶行》，更是被很多人传诵。一个诗人的作品能这样密切地和人民的生活联系一起，是古典文学中所没有的事。

白居易的讽谕诗,对后代的影响最深远,唐后期的张籍、王建、元稹、李绅等,围绕白居易形成一个以新乐府为中心的现实主义诗歌高潮。到了晚唐,皮日休等现实主义诗人,就是受白居易的理论和创作的深刻影响,写出了具有强烈战斗性的诗篇,给诗歌发展开辟了新途径。唐朝新乐府的精神和艺术风格,被历代进步作家广泛地学习摹仿,用以指责当代的政治弊病,反映人民疾苦,并且和单纯追求辞藻格律的形式主义艺术流弊进行尖锐的斗争。宋朝的王禹偁、陆游等人的现实主义作品,都受其影响。王禹偁自己说:“本与乐天为后进”。除了著名作家以外,历代学习白居易的人还有很多。

白居易诗在国外也广泛流传。李商隐说:“姓名过海流入鸡林、日南有文字国。”日本、新罗诸国家也有传写。日本的嵯峨天皇曾经抄写许多白居易诗,藏之秘府,暗自吟诵。可见当时白居易诗已经获得很高的国际声誉。不少外国读者通过白居易的诗,和中国人民结成了文字姻缘,促进了中外友好关系的发展。

三、新乐府运动

乐府本是西汉朝廷采诗配乐的机构,后把能入乐的诗歌都叫乐府。有些作家为了更好地反映现实,便自度新曲或摆脱音乐束缚从事创作,于是有新题乐府出现。早期,由汉乐府的“缘事而发”变为曹操等人的借古题而写时事,为新题乐府之一变;初唐谢偃、长孙无忌的《新曲》,盛唐李白的《塞上》、《塞下》,杜甫的《兵车行》、《三吏》、《三别》等“因事立题”,是新题

乐府的三变。

在中唐，新题乐府又面临一场变革。元和四年（809年）李绅回到长安，任秘书省校书郎，他创作了《乐府新题》20首。不久，元稹在《和李校书新题乐府12首》的序里介绍了李绅乐府诗的产生经过：“予友李公垂，赋予新题乐府二十首，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予取其病时之尤者，列而和之，盖十二而已；昔三代之盛也，士议而庶人谤”。又说：“世理则词直，世忌则词隐；余遭理世而君盛圣，故直其词以示后，使夫后之人谓今日为不忌之时焉。”接着，元稹自己也创有《上阳白发人》、《华原磬》、《五弦弹》、《西凉伎》、《法曲》、《驯犀》、《立部使》、《骠国乐》、《胡旋女》、《蛮子朝》、《缚戎人》、《阴山道》十二首，采用的便都是李绅用过的诗题。元稹在有的诗题下，还抄录了李绅为每首诗写的小传。《阴山道》题下注说：“李传云：元和二年有诏，悉以金银酬回鹘马价”。说明李绅的乐府新题不是无病吟，而是针对某些事实所发的。同年二月，元稹为监察御史，三月一日充剑南东川详复使，离开长安入川，故知和李绅乐府在本年三月以前。李绅的原诗已经遗失，从元稹的和诗仅能知道12首题目。

几乎同时，白居易也写下了《新乐府五十首》。在此前，元年（808年）五月，白居易任左拾遗时，当时他36岁，正是意气风发之时，上任不到10天，就给皇帝上奏疏说：“授官以来，仅将十日，食不知味寝不遑安，惟思粉身，以答殊宠，但未粉身之所耳。”不久就连上谏章，先奏请免除江淮赋税以拯救灾民；又请多出宫人，减少宫中费用，消除孤居妇女的痛苦；反对宦官任“诸军招讨处置使”和王承宗作战；请罢用兵河北等等，甚至当面指陈皇帝犯了错误，差点受到处分。他经常面对案前盈箱

的谏纸,思考自己的责任,觉得愧对俸禄。同时他开始创作讽谕诗,以委婉的方式劝谏皇帝。元和四年,诗成,集为《新乐府》。在本组诗的序中他说明了目的和要求:“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断为五十篇,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而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则律,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50首用歌行,每篇之下标明题旨,如《七德舞》“美拔乱,陈王业也”,《法曲》“美列圣,正华声也”,《海漫漫》“戒求仙也”,《上阳白发人》“愍怨旷也”,《新丰折臂翁》“戒边功也”,《杜陵叟》“伤农夫之困也”,《缭绫》“念女工之劳也”,《卖炭翁》“苦宫市也”等等。它体大思精,题材广泛,从反对横征暴敛到反对宫市,从讥刺边功到谴责广蓄宫女,从民间到朝廷再深入宫内,凡是他认为不满意的事情全都作了批判。《新乐府》上承《秦中吟》的传统,成为白居易讽谕诗中的佼佼者。《秦中吟》写贞元至元和之际的事,其小序说:“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它主要揭露和斥责“羡余”制度给农民带来的痛苦,富女易嫁的陋习,官僚脑满肠肥,不顾江南干旱的食人惨景等等。《新乐府》反映的时代更为广阔,它写的是从高祖李渊武德(618—626年)到元和四年的事,揭示的问题更为深刻,影响更为深远。

之后,元稹、张籍(766?—830?)、王建等开始通过倡和,而进一步扩大新乐府的阵地。元稹作新乐府诗。善于模仿,既学李绅,也学白居易,他的这部分诗反映的社会面也极为广

泛,故称“元白”。如他的《田家词》、《织妇词》、《连昌宫词》、《估客乐》等,也都是新乐府中的名篇,但他对于现实的揭露和批判不像白居易那样大胆、深刻和旗帜鲜明。张籍的乐府诗有七八十首,其中约一半都用的是古题,但内容却是为时而著,为事而作。他的《野老歌》、《山头鹿》、《别离曲》、《征妇怨》等都是千古佳作,其中尤以反映农民生活最突出。王建与张籍齐名,人称“张王乐府”。在古题和新题互相参用上,两人也极为近似。王建乐府诗有不少新题材,如《水夫谣》写纤夫,《送衣曲》写妻子给丈夫送征衣,《簇蚕词》写蚕农,《织锦曲》写织女们的辛勤劳动,往往利用人物自白,或仅摆一摆事实便戛然而止,主观议论少,十分引人注目。张王二人乐府喜欢在结尾用重笔,并适当换韵以突出主题,语言通俗却凝炼精悍。白居易和他们相互赠答,共同切磋,影响了一代作家,创作新乐府成为浪潮和风气,进而成为中唐与古文运动并驾齐驱的文学革新运动。

新乐府运动影响很大,在各位作家还在世的时候,就已成为时代风尚。长安少年都仿效元、白两人的诗体,自称为元白体诗。一二十年间,官署、寺观、驿站墙壁之上,无不题元白诗,王公、妾妇、牧童、走卒之口无不吟元白诗,至于手抄本、摹勒本在市上贩卖,或用来交换茶、酒,处处都有。元稹本人曾在浙江绍兴山市看到乡村学童学诗,便问他们学的什么,学生齐声回答:“先生教我们元白诗。”白居易也看到,自长安到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旅店、行舟之中,往往题着他的诗句,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吟咏他的诗句。新乐府运动取得了不可轻视的成功。甚至,在嵯峨天皇时代,白居易的诗已

东渡日本,成为士庶模仿和追随的典范。

四、韩愈、柳宗元与古文运动

古文是与骈文对立的概念,其特点是散行单句,不拘形式,不像骈文讲究排偶、辞藻、音律和典故,在文体上恢复了先秦两汉的传统,因此叫做古文。

骈俪文是六朝的产物。六朝时期,士族门阀专政,他们生活空虚,写文章只能在骈辞俪句上争妍斗丽。到了北朝末期,颜之推、苏绰等人就反对骈文,主张文体改革。到了唐初,反对骈文者越来越多,其中最著名的是前面已提到过的陈子昂。他认为,改变文章的内容,必须配合适当的形式。他根据自己的主张,写了很多散文,对文体改革作出了贡献。陈子昂以后,有些学者写文章以五经为本,文体为之一变,开始了散文(古文)运动。其中著名者有萧颖士、李华、独孤及等人,他们继承了陈子昂的精神,开启了古文运动的先河。

唐代古文运动的领导者主要是韩愈和柳宗元。韩愈(768—824年),字退之,河南南阳人。唐德宗贞元八年(792年)进士,曾任刺史、吏部侍郎等官职。安史之乱以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藩镇割据的局面已经形成,中央政令无法贯彻。同时佛教道教势力猖獗,破坏国家税收,威胁李唐王朝的统治。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统治阶级中有些知识分子看到了这种政治危机,为了维护行将崩溃的王朝,因此打着“复古”的旗帜,主张恢复孔孟思想正统的统治地位。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是主要代表人物,企图以儒学来取代佛道的宗教。

韩愈认为,人们对儒家所谓“君臣之大义”、“夷夏之大防”发生了动摇,就是破坏了君臣上下尊卑贵贱的封建道德的准则。这种封建等级制度的破坏,就意味着整个封建统治秩序的走向崩溃。韩愈为了挽救这种危局,所以才不遗余力地提倡儒家道统,反对佛道。唐代的古文运动,是伴随着社会政治运动而产生的。因为韩愈等人要宣传自己在政治上的一套主张,宣扬儒家思想。当时的骈俪文已经成了自由表达思想的桎梏,文章内容要求突破那种旧形式的束缚,因此他们便不得不以借助“古文”为名,开展一个反对骈俪文的文体改革运动。韩愈在《答李秀才书》中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这个“道”就是儒家思想,韩愈原来是要从古人之“辞”以求古人之“道”。

韩愈一方面主张“文以载道”,一方面反对骈俪文,极力主张恢复先秦两汉的散文体,从词汇和语法两方面来建立新型古文的标准。他准备创造一种融化古人词汇语法而又适合于反映现实表达思想的文学语言,同时力求用这种新颖的文学语言,创造一种自由流畅直言散行的新形式,这就是韩愈文体改革的主要内容。

韩愈不仅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而且也是杰出的古文学家。他把新型古文广泛地用于政论、书启、赠序、杂说、碑铭等各种体裁,创造出很多优秀作品。

韩愈的政论有《原道》、《原性》、《原毁》、《争臣论》、《谏迎佛骨表》等,都是散文名篇。这类作品内容虽然宣扬儒家思想,有不少糟粕,但文中坚决反对佛道,反对寺院地主,客观上具有进步意义。唐代佛教、道教恶性发展,僧侣具有免税免役特

权,因此买“度牒”以投靠寺院的人越来越多。社会上大批人奉事佛道,不仅浪费了人力财力,直接影响了工农业生产,而且他们应纳的赋税,全部转嫁给一般人民,当然更加深了人民的苦难。因此韩愈的反佛论文,是打击寺院地主的战斗武器,在当时,有一定进步意义。

在韩愈的散文中,最有价值的是他的杂文。他运用这种文学形式对社会上许多不合理现象进行了大胆辛辣的嘲讽,内容犀利、形式活泼、短小精悍,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如《杂说》第四写道: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这里韩愈是用伯乐与千里马比喻贤臣难遇明主,而抒其不平之气。文章具有逼人的气势、通畅的文辞、精炼简洁的语言和形象的比喻,是他的具有高度艺术成就的散文代表作。

在《杂说》里,还有《说龙篇》、《说马篇》、《获麟篇》等,是借助龙、马、麟的遭遇,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和穷愁落寞的情怀。寓意委曲深致、构思精巧缜密,对后世散文产生了很

大影响。

韩愈的某些祭文和序文，如《祭十二郎文》、《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等，都是优秀的文学作品。里面具有诗一般的语言，形象的描写手法，把抒情、叙事、议论熔于一炉，具有强烈的感人力量。《祭十二郎文》，抒写了对亡侄的沉痛感情，曲折真挚、感人肺腑，被后代人誉为祭文中的千古绝调。《送李愿归盘谷序》，鄙视当时声威显赫的官僚，嘲笑追逐势力的官迷，赞美品行高洁的读书人。文中语调铿锵、情绪激昂、气势充沛。韩愈写道：

“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处秽污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侥幸于万一，老死而后止者，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

作者仅用寥寥几笔，写尽了那些利欲熏心的官僚向上爬的可怜可鄙的丑态。

古文运动另一健将是柳宗元（773—819年），他是河东人，贞元九年（793年）进士。曾任县尉、监察御史、员外郎、刺史等职。由于参与王叔文的政治革新，被大宦官迫害而被贬为永州司马。他在永州生活了10年之久，后调任柳州刺史。这两个地方都是边远地区，荒僻贫困。柳宗元在这样的生活磨炼中，并不妥协屈辱，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保持其优秀品质，怀着郁愤孤独地死在柳州，仅仅活了47岁。

元和元年，柳宗元离开首都以后，以文章为政治斗争的工

具,他竭力主张文章的内容必须“明道”,所谓“明道”就是宣扬正确的思想或主张。作品的思想内容必须通过辞藻形式来表达,而辞藻形式又要服务于思想内容。文章如果单纯讲求形式,只追求辞藻的华丽,是不可能具有生命力的。但是,在柳宗元以前,社会上流行着骈体文,他坚决反对这种文体。柳宗元以“明道”为己任,认为文学的功能在于“褒贬”和“讽谕”,写文章就是为了对美好的事物进行歌颂、宣扬,对丑恶的东西加以批判、讽刺,从而赋予他的“明道”主张以具体的内容。这在客观上不仅反对了文学中的形式主义、繁琐主义,而且进一步明确了文学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把文学和社会政治生活紧密联系起来。

在封建社会,《五经》是社会公认的经典著作,是学习的典范。柳宗元认为,要写好文章,必须以《诗》、《书》、《礼》、《春秋》、《易》为本,并参考《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史记》等书,以吸收融合它们的各种优点。

柳宗元不仅宣扬古代散文,而且写出了大量优秀作品。在他的文集里,保存着很多论文,阐发了他的哲学和政治思想,并通过对社会现象和历史事实的剖析,谴责一切不合理的事物,提出作者自己的见解。如《六逆论》一文,深刻地分析了现实社会的贵贱问题,揭露了“视其贱者而贱之,贵者而贵之”的世俗观点,反映了阶级矛盾。在《封建论》中,一方面指出分封制的产生在于“势”,并不是天意或圣人之意,肯定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作者解剖了分封制度,批判了“继世而理”的世袭世禄制度造成“不肖居上,贤者居下”的畸形状态。柳宗元利用《封建论》借古喻今,斥责豪门地主对政权的垄断,

并有力地抨击了藩镇割据。柳宗元这些散文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强烈的战斗性,这是柳文主要成就之一。

古文运动是直接继承先秦两汉优秀散文传统的,柳宗元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最出色地继承和发展了这个传统。他的讽刺散文,把先秦诸子散文仅作设譬之用的寓言片断,发展成完整的更富于文学意味的短篇,使寓言取得一种独立的文学地位。不仅如此,柳宗元还在寓言中带进更为深厚的现实内容,使之能成为具有战斗特色的讽刺文学。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三戒》,文中借驴、麋、鼠3种动物的故事来讽刺那些或位宠而骄或盲目自大的得意忘形之徒,并指出他们自取灭亡的下场。《黔之驴》写道:

“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而入。至,则无可,放之山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慙慙然莫相知。

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稍近,益狎,荡倚冲冒,驴不胜怒,蹄之。虎因喜,计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嚙,断其喉,尽其肉,乃去。

噫!形之龙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这类寓言时常概括了一种普遍的生活真理,其讽刺对象是比较广泛的。但这些徒有其表、虚张声势的“庞然大物”,在

统治集团中却是大量存在的。因此，这种寓言无疑是刺向整个官僚集团一把锋利的匕首。

柳宗元另一篇现实主义的作品是《捕蛇者说》，作者在这500字的短文中，深刻揭露出赋役之毒甚于蛇毒的真相，具体地描写了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苦，暴露封建剥削的残酷性。蒋家祖孙三代都以捕蛇为业，以毒蛇交税，以致：“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为十二年，几死者数矣！”但是当柳宗元表示代他请求官府废除这种以蛇交税的办法时，捕蛇者竟“大戚”致于“汪然出涕”，说：“斯役之不幸，未若复吾税不幸之甚也。”作者以层层逼近的手法，明确点出主题，指出封建赋役对于人民比毒蛇更毒更苦，人民宁愿冒生命危险去捕蛇，却不愿当政府的纳税户，说明“苛政猛于虎”。作者在字里行间透露了对劳动人民的真挚同情，并天真地希望“观人风者”能有所醒悟，减轻人民负担，体现了作者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

柳宗元在传记文学方面也有很高成就，他写了不少市民和劳动者的传记，真实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倾注了作者强烈的爱憎，为人民发出不平的呼声。如《童区寄传》反映边区的人口买卖和劳动者的反抗精神；《种树郭橐驼传》以树为喻，反对奴役和压迫剥削人民；《段太尉逸事状》，反映军阀的残暴横行，以及人民被迫害被杀戮的命运，同时歌颂了不避艰险爱护人民的段太尉的英雄形象。

韩愈、柳宗元领导下的古文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散文发展的转折点。形式主义的骈体文，经过唐朝韩柳领导的古文（散文）运动打击以后，开始走上了衰亡的道路，他们把文体从骈俪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把活泼流畅的散文送入艺术之宫，

扭转了 300 年来的文风。

五、唐代传奇小说

传奇是唐代文学的一朵鲜花,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尤占重要的地位。

自古以来,人民中间一直流传着瑰丽精彩的故事,却很少形之文字。唐代以前的小说,只有一些片段的轶事、志怪,没有什么比较完整的作品。到了唐代,特别是中唐以下,风气陡变、作家辈出。他们或据传说、或取实事、或自创情节来极意刻画,始成为文情并茂的短篇小说。鲁迅说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论断完全正确。

唐代城市经济日益繁荣,社会生活也更显复杂,人们要求多种多样的文学表现形式和文化享受。市井之间,说唱的通俗文艺日益流行,如变文之类。新兴的庶族士大夫,较少受阀阅世家礼法的束缚,又不像宋以后的士大夫套上道学的枷锁,思想比较开朗自由,并不鄙薄小说的写作。一批写传奇的作家,就在这种空气中应运而生。

《游仙窟》的作者张鷟是武则天时的进士。沈既济以卢生在邯郸道上的一梦,揭露官场世态,写了名篇《枕中记》,他本人也做过礼部员外郎等官。大诗人白居易的兄弟白行简,朋友陈鸿,都是传奇作家。有两位宰相,也写过传奇。一位是白居易的朋友元稹,他写的《莺莺传》是《西厢记》故事的起源。另外一个牛僧孺,他写的《玄怪录》一书,质量不高,但他对传奇显然是极感兴趣的。

奇显然是极感兴趣的。

古文运动的两员主将，同传奇都有关系。韩、柳的部分名篇，至少是颇具传奇气息的。韩愈的《毛颖传》把毛笔人格化；柳宗元的《螭蝥传》借小虫骂贪官，都是这类作品。

传奇因“作意好奇”得名，好的作品不仅情节曲折，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也很丰富。

李朝威的《柳毅传》描绘了一个生动可喜的人神恋爱的故事。“洞庭龙女，牧羊荒野，蛾脸不舒，中袖无光”，这是封建婚姻制度下受压迫的妇女的写照。赤龙千尺，挟着雷霆雨雹，冲天飞去，杀小龙、救侄女，作者塑造了刚烈的钱塘君的英雄形象。柳毅见义勇为，万里传书，又不肯居“杀其婿而纳其妻”之名，表现出正直勇毅的性格。他拒婚，心中却又挚爱龙女，作者曲曲传出他的心理状态，最后让龙女化身卢氏，成为眷属，使读者也为之喜出望外。

唐代社会上，门阀士族还有深厚的势力。作者突破偏见，写了几个可尊敬的妓女。白行简的《李娃传》写李娃与荥阳公子的爱情。公子沦落为乞丐时，李娃闻声相认，抱颈拥归，鼓励他、帮助他，终于使他功成名就。蒋防的《霍小玉传》是悲剧。小玉深爱李益，李益登第做官后，却别娶高门，明知小玉病重，也不肯一去探望。后来李益被黄衫豪士逼到病榻前，使小玉于临终前痛责薄情郎君，死后又给他种种惩罚。作者塑造了一个刚烈而又深情的妇女形象，相形之下，李益显得十分卑下。

陈鸿的《东城老父传》写贾昌因斗鸡受玄宗宠信，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腐朽，这是取当代实事，略加渲染而成的。陈鸿还有《长恨歌传》一篇，为白居易《长恨歌》而作，一韵一散，可以

并传。

传奇中有些篇目的思想内容很成问题，而流传甚广，影响颇深的，如元稹的《莺莺传》和杜光庭的《虬髯客传》。《莺莺传》里的张生，对莺莺始乱终弃，作者说他善于“补过”，表现了十足的封建意识。后来戏曲作家克服了这个严重缺陷，才提高了西厢故事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虬髯客传》写隋末虬髯客、李靖、红拂女三个人物的离合，被人叫做“风尘三侠”。作者用意在于宣扬李唐的正统观念。其余写侠士故事的传奇，如《红线传》、《聂隐娘》等篇，写侠女为主效力，已开后世武侠小说的先河，更杂有不少糟粕。

总的说来，唐传奇是丰富多彩的，既为后世小说的进一步发展开创了道路，又给后世诗人和戏曲作家提供了大量题材，实在是我国文学史上一笔珍贵的遗产。

六、饱经沧桑的唐末五代文人

在唐末五代的丧乱中，许多文人学士流散四方，寻觅一片容身之地。他们有的年辈较早，但卒年已在公元900年以后，在这个大动荡的时期里生活了20年以上，应该可以算是五代文人。有的生年稍晚，更毫无疑问是这个时期的人物。他们历尽沧桑，饱经忧患，因而从立身处世到吟诗作文，无不透露沉痛的气息。这实在是五代文化史上的一个特点。

中原战乱最烈，但是幽谷之中，也并非绝对没有才人的栖身之地。中条山王官谷（在今山西永济以东虞乡镇东南）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名诗人司空图（837—908年）隐居的所在。

司空图字表圣，做过唐朝的知制诰、中书舍人，他原是虞乡人，见天下大乱，隐居山中，自号知非子、耐辱居士。这两个别号看起来充满消极逃避的气息，实质上却是愤惋不平。他不接受征召，拒绝与朱温合作。一个无拳无勇的书生，能这样做，也就很不容易了。

他是一个文学批评家，写了 24 首四言诗，说明 24 种诗的境界，总称《诗品》。其中《含蓄》一首的头四句说：“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己，苦不堪忧。”从来论者多注意头两句，其实第三、四句却透露了作者的真实感情，不要被恬淡空灵的表面迷惑了，他的内心实在是痛苦得很！

罗隐(833—909 年)的五七言诗，特别是七言诗，在五代是比较优秀的。罗隐字昭谏，余杭(今浙江杭州西，今余杭在临平镇)人，在钱镠手下做节度判官、给事中。他也不受朱温的征召。鲁迅称赞他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他的诗集《甲乙集》，有许多感慨伤时的作品，如《筹笔驿》的中间两联，“时来天地皆同力，远去英雄不自由。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说的是三国蜀汉的亡国恨，意思实指唐朝。又如《甘露寺火后》有句“六朝胜事已尘埃，犹有闲人怅望来”，甘露寺在镇江，这里反映的大约是孙儒匪军焚掠以后的情况。至于《登夏州城楼》的“万里山川唐土地，千年魂魄晋英雄”一联，气魄雄浑，艺术上颇有可取，作者对唐朝一统时的强盛的眷念之情，溢于言表。

吴越虽小，环境很安定，罗隐又本是浙人，他的后半生是生活得很愉快的。有许多人却不是这样子。在唐昭宗时做过兵部侍郎等官的韩偓(844—914 年以后)，字致尧，小字冬郎，

京兆万年(今陕西安东南)人,因被朱温贬斥而流亡福建,依靠王审知,度过了寂寞的晚年。他是个诗人,但向来说他多写艳情,是“香奁体”的专家,恐怕未必完全符合他的内心世界。

在异乡避乱的文学之士中,孙光宪是很值得称道的一位。孙光宪(约900—968年)字孟文,贵平(今四川仁寿东北)人。他避居荆南,历仕高氏三世,最后劝高继冲归宋。他自号葆光子,显然是在乱世不宜太露锋芒的意思,与司空图的别号用意相似。他搜集大量图书,校勘抄写,到老不止;又集所知士大夫轶事和社会风俗,写成《北梦琐言》一书;所作的词,意境高超,大部分见于《花间集》。综观他的生平,政治上拥护一统,文化上毕生努力不懈,两个方面都很突出。

唐末从关中流亡入蜀的人最多,文学家韦庄是其中名望最高的人,道士杜光庭(850—933年),字圣宾,他的籍贯有疑问,一说是长安(今西安)人,一说是处州缙云(今属浙江)人。但他从关中避乱入蜀,则是不成问题的事实。他在前蜀做过官,得到广成先生、传真天师的封号,后来隐居春城山。他写了不少道书,又作了一篇传奇小说《虬髯客传》。著名的“风尘三侠”(李靖、红拂、虬髯客)故事就出于这篇传奇。故事说唐初军事家李靖早年谒见隋朝权臣杨素,杨家侍女红拂看出他是英雄,与他私奔,遇到侠士虬髯客。虬髯客原来想起兵夺隋朝天下,后见李世民,认为“天命有属”,乃厚赠李靖夫妇,自己远走海外,另立新国。传奇宣扬李世民是“真命天子”,似乎没有什么可取,然而在唐末五代而写这样的作品,用意显然在于怀念强盛统一的唐朝,自有它的积极意义。

唐末流亡四方、饱经沧桑的文人学士,为数极多,上面所

说,只在诗文上成就较著名的人士中,略举数人而已。

七、唐五代词

关于词的特征、起源和发展

词,大约是在初盛唐产生、从中唐以后流行起来的一种新诗体。词在唐、五代通称为曲子词,原是为乐曲(燕乐)配唱的,后来逐渐脱离乐曲而成为独立的文体,简称为词。词的体制比诗复杂。每首词最初都有与其相配合的乐调,称为词调,每一词调都有一个或几个名称,称为词牌。每一词调为配合乐曲,在句数、字数和声韵方面都有特定的格律形式,被称为词谱。写词,要依词谱填写,叫作填词。每一词调一般反复吟唱,分为上下两段,叫作上阕和下阕,或上片和下片。词,又称长短句。因为多数词谱的句式长短不齐。有些词调,如《浪淘沙》、《雨霖铃》等,原是唐代七言绝句体,后来为配乐而增减字句,演变为长短句。所以词体在声律、手法等方面都受到唐代近体诗的影响。

词,起源于民间。现传最早的唐代民间词是在甘肃敦煌石窟发现的曲子词写本残卷,有160多首,敦煌曲子词的题材相当广泛。其中反映妇女生活情感的词,有较高的艺术性。如两首《望江南》:“天上月,遥望是一团银。夜久更阑风渐紧,为奴吹散月边云,照见负心人。”“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临池柳,者人折了那人攀,恩爱一时间。”描写歌伎内心的悲怨之情,出语自然,比喻生动。有名的《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

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见，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连举六种不可能出现的自然现象来表达永远不变的爱情，具有乐府民歌的风味。

中唐前后，由于民间词的广泛流传，一些有名的诗人开始填词。张志和的《渔歌子》之一：“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在清新明丽的水乡画图中，点缀着悠然自适的渔翁形象，寄寓了士大夫隐逸山水的情趣。因而这首词为当时和后代许多诗人所唱和、仿作，甚至远播日本，为嵯峨天皇及宫廷贵族所唱和。韦应物的《调笑令》，较早描写了边塞风景：“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王建的《调笑令》（又名《宫中调笑》）描写宫女失宠的哀怨：“团扇，团扇，美人病来遮面。玉颜憔悴三年，谁复商量管弦？管弦，管弦，春草昭阳路断。”这两首小令声律急促，句式长短参差，已显示出词调跌宕多姿的特点。

白居易和刘禹锡，是中唐时期填词较多的诗人。白居易的《忆江南》3首，浅显平易、流畅自然，与他的诗风格一致。其一：“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其二：“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他的《长相思》：“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融情于景，以景写情，已经是词体的格调。刘禹锡在贬官期间，学习巴楚一带民歌，写作了一些清新活泼、含思婉转的民歌体词，如《竹枝词》其一：“杨柳青青江水

平，闻郎岸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以“晴”双关“情”，表达了恋人间的微妙情感。其二：“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依愁。”比喻生动，语浅意浓。总体看来，初期文人词的题材比较广泛，但在表现手法、词句形式等方面，还比较接近诗歌和民歌，很少能适应词的特点，形成自己的风格。相传为李白所作的两首词《菩萨蛮》和《忆秦娥》，意境阔大，感慨深沉，超过当时一般词作。

温庭筠及花间词派

晚唐五代时期，文人填词的风气更为普遍。五代后蜀人赵崇祚编有《花间集》，收集这一时期的“诗客曲子词五百首”，共18家。其中选温庭筠的词数量最多，达66首，又列在词集之首，后人称之为“花间鼻祖”。温庭筠是第一位大量填词，并以词名家的文人。他精通音律，“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相传他的几首《菩萨蛮》，就是供宫女们唱给唐宣宗听的，由于这种特殊用途，温词大多描写妇女的容貌、服饰和情态，字面艳丽精密、情调轻柔婉约，形成了典型的词体风格。如《菩萨蛮》：“小山重迭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描写一位女子醒后独自画眉、照镜的微妙神态，与“双双金鹧鸪”的华丽服饰相互映衬，含蓄地表达了她怅然若失，又不易明言的情感。《望江南》：“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苹洲。”只选取倚楼望帆的特写镜头，就融情入境传达出一位女子悠长不尽的相思之情。《更漏子》

中：“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几句，造景写情，含蓄有味。由此可见温词为配合一定声情的词调，很注意遣词精美，声律和谐，情思婉转细腻，已经确立了词体的独特风范。

《花间集》中与温庭筠齐名的词人是韦庄。但韦庄词的风格清新疏朗，自成一家。如他描写爱情的两首《女冠子》：“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除却天边月，没人知。”“昨夜夜半，枕上分明梦见，语多时，依旧桃花面，频低柳叶眉。半羞还半喜，欲去又依依。觉来知是梦，不胜悲。”这两首词合写一事，第一首上片回忆一年前与恋人相别的情景，下片写别后相思；第二首上片写由相思而梦见恋人，下片结句点出梦醒后的悲苦。构思别具匠心，语言明白如话。韦庄还有直接抒发个人生活情感的词，如《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双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刻画明丽秀美的江南风景，却引出了去国离乡的愁怀。这明说韦庄已经开创了以词体抒情的先例，而不同于温庭筠的应歌之词。

温、韦之外，孙光宪（？—968年）字宪文，他的词，题材有所拓展，除男女艳情之外，还有描写江南风土、边塞远征、吟咏史事以及田家小景的词，风格也简劲疏朗，可以自称一家。如他的《风流子》：“茅居槿篱溪曲，鸡犬自南自北。菰叶长，水蓴开，门外春波涨绿。听织，声促。轧轧鸣梭穿屋。”以简淡质朴的语言，描写农家生活小景，这在《花间集》中是独放异彩的。他描写闺情别绪的《谒金门》，起句突兀，笔力简劲，表达出女

子沉痛欲绝的悲怨：“留不得，留得也应无益。白纥春衫如雪色，扬州初去日。轻离别，甘抛掷，江上满帆风疾。却羡彩鸳三十六，孤鸾还一掷。”他的一些词句，如《浣溪沙》：“片帆烟际闪孤光”、《思帝乡》：“看尽满地疏雨打团荷”，写景疏阔，很有意境。

此外，欧阳炯、李珣的几首《南乡子》，描写江南水乡风情；李珣的《渔歌子》抒发隐逸情趣；鹿虔扆的《临江仙》“金锁重门荒苑静”，感慨历史兴亡，也都别具特色。《花间集》所选词家大部分集中在西蜀，他们的词作大体上蹈袭温、韦余风，题材偏于闺情，情调流于柔婉，语言比较轻艳，被后人称作花间词派，直接促成了“词为艳科”的风气。

李煜及南唐词人

在战乱频繁的五代时期，南唐曾偏安于江南一隅。一些词人集中在首都金陵，为适应席宴听歌的享乐生活，“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倚丝竹歌之，所以娱宾而遣兴也”。但到中主李璟后期，国势日衰，南唐词也由席宴遣兴之作，转变为抒情写意的新诗体，并染上浓重的感伤色彩。南唐词的代表作家有李璟、冯延巳和李煜。

李璟(916—961年)的词，仅存4首。比较有名的是两首《摊破浣溪沙》。其二写道：“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无限恨，倚阑干。”上片写秋景，意象衰残，王国维《人间词话》称赞“菡萏”两句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下片写梦中怀念远人，语意深沉，完全没有花间词的绮艳色彩。

冯延巳(903—960年),字正中,曾官至中主朝宰相。遗有《阳春集》,收词119首。他的词情思深婉,语言清丽。如《采桑子》:“笙歌放散人归去,独宿江楼。月上云收,一半珠帘挂玉钩。起来点检经由地,处处新愁。凭仗东流,将取离心过橘州。”透过宴罢人去的情境,流露出孤独愁闷的人生感伤。《鹊踏枝》“谁道闲情抛掷久”,表面写词人的“闲情”、“新愁”,结尾“独立小桥风流袖,平林新月人归后”两句,又似乎寄寓了词人苦苦追寻后的失落感,意境深沉,耐人寻味。又如《谒金门》:“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闲引鸳鸯香径里,手授红杏蕊。斗鸭阑杆独倚,碧玉搔头斜坠。终日望君君不至,举头闻鹊喜。”以十分细腻的笔法,刻画出女子“终日望君”的痴迷神态和微妙心理。总之,冯延巳的词善于因情设景,以景写情,细腻地表达词中人的复杂心绪,又常常流露出更为深沉的人生感慨。这与《花间集》中的艳情词已有不同的境界,并直接启发了北宋晏殊、欧阳修的词风。

李煜(937—978)字重光,是南唐后主,多才多艺。他的一生经历了南唐的衰危和灭亡,最初过着纵情享乐的帝王生活,最后沦落为终日以泪洗面的宋朝囚徒。这使他的词也相应分为前后两期。他的前期词多写宫廷豪华场面和艳情生活,如《玉楼春》中“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笙箫吹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遍彻”,《菩萨蛮》中“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等词句。后期词主要写他对故国、往事的怀念追思,充满了深痛哀伤的情调。如《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又如《浪淘沙》：“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这类词念往伤今，感情真切，又明白如话，很容易引起读者某种类似的感情联想和共鸣，历来为人传诵。李煜词改变了花间词人多托写女性的传统，直接抒发深沉的个人的身世感慨，“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使词体成为宜于抒情、格调深婉的新诗体。李煜词善用白描，长于比喻，也大大丰富了词体的表现手法。如两首描写离愁别绪的《乌夜啼》：“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深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都使人过目成诵，又寻味无穷。总之，李煜是南唐成就最高、对宋词影响最大的词人。